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下）

陈庆英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

（下）

陈庆英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永红　　　封面设计:李建雄　　　版式设计: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陈庆英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ISBN 7-80057-825-9

Ⅰ.陈…　Ⅱ.陈…　Ⅲ.藏学-文集　Ⅳ.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125 号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下)

陈庆英　著

中　国　藏　学　出　版　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0　字数:930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80057-825-9/K·152

定价:47.80 元(平)

目 录

清代藏族历史篇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提到，并阐发其政治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资料汇编也分别收录了这方面的汉文史料记载。不过，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有关史实，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因此出现了对于这些清朝的资料未能充分整理研究就广为利用解释的情况。为了更准确地利用这一些重要的史料，将它们与有关的藏文、蒙古文、满文史料进行对比分析的确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当然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甚至有可能会在进行这样的探讨分析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

一

1642年10月，由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一个使团，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西藏（当时清朝称之为图白忒部落）到达清朝（后金政权在1636年已改国号为大清）当时的都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这个首次由西藏派来清廷的使团，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清朝君臣对使团给予极高规格的隆重接待。《清实录》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十月己亥条记载说：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朝觐，上起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两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藏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酌纳之。①

这一段记载，按照以上的标点断句，编入了已经出版的多种史料集和档案汇编之中，为近年许多藏族史著作和论文所引用，研究者大多认为，从这一段记载已可清楚看出，该使团对清朝所使用的名义，是西藏（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派遣的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初二日条。

前来与清朝联络的使者。率领使团的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两位喇嘛，同来的有他们的徒众，还有厄鲁特部落的使臣及其从役。使团给清太宗皇太极带来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当时的政权首领第悉藏巴的书信。但是也有学者有过不同的认识，前几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湘云女士曾向我指出，她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之间不应当点断，而应当连读，也即是说，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其实是一位喇嘛的名号，他是西藏使团的为首之人。本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见解，但是由于这一段记载中又明白记载“上升御榻坐，设两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所以西藏使团的率领者显然是两位喇嘛，故笔者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应当连读之说虽然认为应当采纳，但是仍然存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在 1995 年 1 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与戴青绰尔济可能仍应该是两个人，西藏使团从西藏出发时是以戴青绰尔济为首，途中增加了一个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且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地位高于戴青绰尔济。笔者还认为途中增加的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很有可能即是出身于厄鲁特蒙古的格鲁派高僧咱雅班智达。① 最近笔者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应当对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物再做一次讨论。

关于西藏使团是由哪些人组成，在《清实录》中有两处提到。《清实录》同月壬戌条又记载：

---

① 拙文《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载《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91—314 页，1995 年版。

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厄鲁特部落古木伊尔登下和尼图、奇尔山下土尔噶图、达赖巴图鲁下喀喇户济、阿巴赖山津、塔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桑噶尔塞伊尔登下额尔白黑、王什克下库尔墨、实尔格齐诺颜下琐诺木、额尔克塞桑下吴兰……①

但是到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遣还西藏使团时，《清实录》所记载的使团的组成人员又稍微有所不同：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红帽喇嘛噶尔马、昂邦萨斯下、济东呼图克图、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藏巴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②

如果将以上史料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喇嘛对照比较，可以设想西藏使团为首的两位喇嘛其实是《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中的戴青绰尔济（se chen chos rje）和戴青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条。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条。

俄木布（se chen dbon po）二人，而伊拉古克三是当时厄鲁特蒙古人对高级活佛的一种泛称，并非某一位活佛的专称。“伊拉古克三”本身是一个蒙古语词，其意为“特出的”、“不同凡响的”、“在众人中地位最高的”，后来在蒙古有几个转世活佛伊拉古克三，才使“伊拉古克三”成为某个转世活佛的专称。我们这样设想，在顺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份蒙古文的请安表文中可以找到例证。这份请安表文为：

顾实汗上表请安。表文曰：

叩祷幸福武威显赫人间高贵皇帝陛下，寄托于佛教宝地笃信宗教之诺门罕，衷心上奏：当此吉祥时日，圣上御体安福，内心扶持宗教。尤其闻知圣上笃信伊拉古克三宗喀巴净化宗教（当是清净教法之意），发展古代教皇（当是法王之意）事业之大名，心中甚为喜悦。吾处赖三宝之眷佑，一切平安。敬谨协助钦差为唐古忒呼图克图等赐号、颁赏。奉敕之天使前来唐古忒，一切事宜，均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意办理。谨奏。……①

此表文中一方面称从清朝返回西藏的戴青绰尔济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方面在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名字之前也加上伊拉古克三之号，可见当时伊拉古克三这种尊号在蒙古人中间使用得比较宽泛。在藏文中“宗喀巴”之前一般加的尊号为 rgyal ba（意为佛、胜者、王者）或者是 rje btsun（意为尊胜），因此“伊拉古克三”这一称号应当即是藏文 rgyal ba 一词的对应词，意为胜者、王者，可以用来指地位崇高的转世活佛。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地方还可以见到，《佛教图像学》一书

① 一史馆藏蒙文老档，见多吉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第 221—222 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

中收有康熙皇帝时刻印的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插图，有500多幅佛、菩萨、护法神、高僧像，其中第75幅为“自在顶幢王佛”，梵文为Indraketuvijya，清代翻译的藏文为dbang po-vi tog gi rgyal mtshan gyi rgyal po，蒙古文为Erketu oki ilagugsan。[①] 也是以伊拉古克三对译藏文的rgyal po，即“王者、胜者”。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中有一封写于阴木鸡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给顺治皇帝的表文，表文中提到木猴年（顺治元年1644年）jur jir pog to rgyal po（即清太宗皇太极）派使者与se chen chos rje（即戴青绰尔济）为首的西藏的使团带来大批汉地出产的礼品，这一封表文是对清太宗皇太极的来书的回复，表文中还提到再派最近曾去清朝为王臣演法的名叫jyanamkarma即“佛陀的事业者”的高僧为使者，进呈这一份表文。[②] 由此也再次说明，梵文的jya藏文的rgyal ba蒙古文的ilagugsan是意义相同的词语。而《梵藏对照词典》正是把jya解释为佛陀、战胜四部魔军的胜利者、帝释天王的。[③] 了解梵文藏文蒙古文的这三个词的对应关系，对于我们西藏使团的这两位为首的高僧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

① 罗开什·钱德拉编著：《佛教图像学》，第93页，印度Pradeep Kumar Goel for Aditya Prakashan 1991年版。

② 见《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藏文版，第30—32页；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25—227页。

③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编译局编纂：《梵藏对照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安世兴编著《梵藏汉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二

笔者在《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一文中提出，西藏首次派遣到沈阳去的使团很可能是由厄鲁特蒙古的著名高僧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nam mkhav rgya mt-sho，公元1599—1662年）率领的。我当时所依据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 咱雅班智达出身于厄鲁特蒙古贵族，是固始汗的二哥拜巴噶斯的义子，在厄鲁特蒙古最初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时，他代替拜巴噶斯的儿子出家为僧，于1617年到达西藏，入格鲁派寺院学佛。他先后担任过琼结日沃德庆寺、坚叶寺、达布喀尔桑丹林寺的住持，艾绒噶丹曲顶寺、拉顶寺、喀托曲德寺、旺仁曲德寺的讲经师，后来出任格鲁派的重要寺院山南曲科杰寺的达布扎仓和拉萨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① 特别是他在1638年五世达赖喇嘛从四世班禅受比丘戒时，是在坐的十名证明师（陪同受戒补全足数之比丘）之一。② 因此从咱雅班智达在厄鲁特蒙古和西藏格鲁派的地位看，他是担任双方的共同的代表的最适合的人选。

2. 从咱雅班智达的名号看，也与《清太宗实录》的记载相符合。已经有学者指出③，在托忒蒙古文（此种蒙古文即是

① 第悉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221—223页，205、201、203、197—198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著：《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上册，第178—179页。

③ 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93页。

咱雅班智达所创造的）的《咱雅班智达传》中对他有7种不同的称呼，即：（1）纳木海嘉木措，此即藏文 nam mkhav rgya mtsho 的蒙古人读音，藏文读音为南喀嘉措，意为“天空海”，这是咱雅班智达出家时起的法名。(2) 乌和特隆归达赖，此是南喀嘉措（天空海）的蒙古语对应词。(3) 拉然巴呼图克图，这大约是因为他获得过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又具有转世活佛的地位，因而被称为拉然巴呼图克图。(4) 车臣俄木布，俄木布即藏语的“温波”（dbon po)，指子侄外甥等后辈亲属。车臣（se chen）为蒙古语词睿智之意，常用着蒙古王公首领的名号，此处是因为拜巴噶斯及其儿子鄂齐尔图有车臣台吉的称号（后来鄂齐尔图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赠给车臣汗的汗号)，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所以称其为车臣俄木布，表示他是拜巴噶斯和鄂齐尔图的亲属。(5) 车臣绰尔吉，此即藏文的 se chen chos rje，异译为色钦曲杰、塞青曲杰、塞钦曲杰等，《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戴青绰尔济，也是此词语的音译。(6) 阿巴车臣绰尔济，这是因为咱雅班智达担任过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而获得的称号。(7) 咱雅班智达，这是厄鲁特蒙古人对他的最常用的称呼。[①] 而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五世达赖喇嘛对咱雅班智达常用的称呼是琼结班智达、夏仲热绛巴（zhabs drung rab vbyams ba，rab vbyams ba 在清代文献中常被译作兰占巴，指获得格西学位的博通经论的高僧)、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等。在咱雅班智达的这些称号中车臣绰尔吉、车臣俄木布与《清太宗实录》中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的名号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都相符合。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第178—179页。

3. 从咱雅班智达的事迹看，他也很可能是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1637 年，固始汗在率部从新疆南下青海并击杀占据青海的支持第悉藏巴、噶玛巴的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以后，带领少数随从到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第巴索南热丹等格鲁派首领，双方并互赠名号，协商下一步的行动。固始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去传法，五世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但是没有即时动身。固始汗返回青海后，在 1638 年又派遣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等到拉萨迎请五世达赖喇嘛，但是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前去青海。在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返回青海时，咱雅班智达（《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在此处称他为阿巴洛本车臣巴，即阿巴扎仓的讲经师车臣曲杰）与他同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还说，由于第悉藏巴不准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而且警告索南热丹不要与蒙古人交往，引起墨尔根噶居和索南热丹的极大反感，墨尔根噶居返回青海后向固始汗报告这一情形，成为固始汗决心消灭第悉藏巴的直接动因。1639 年 8 月，厄鲁特蒙古的都日雅勒和硕齐（此人可能是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之子都喇勒和硕齐，为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堂兄弟）和一个被称为车臣曲杰的高僧一起到达西藏，在与索南热丹联络后，都日雅勒和硕齐领兵向后藏进发，宣称要以武力摧毁第悉藏巴在日喀则修建的针对扎什伦布寺的新寺院，又由四世班禅出面进行调解。正是在此时，由素以在调解敌对各方之间充当调解人著名的四世班禅斡旋，奇迹一般地使第悉藏巴、萨迦派、噶举派的各个首领人物竟然同意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四世班禅联合派出一个使团，携带他们各自的信件到沈阳去与清朝联络，看新兴的清朝是否可以做西藏各教派的施主，而且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人就是这一位车臣曲杰。为了做成这样一种安排，四世班禅和第悉藏巴进行了怎样

的谈判而达成一致，至今没有见到任何藏文史料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清太宗实录》中保存了第悉藏巴参与了这一次西藏遣使清朝的事情的记载以及清太宗皇太极曾写信给第悉藏巴，人们从藏文史料中无法详知这一情况。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西藏使团是在1640年1月拉萨祈愿大法会后从拉萨出发的，而西藏使团到达沈阳的时间是1642年的10月，在路上走了将近3年，而且1639年10月清太宗皇太极已经派出了一个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去西藏，走到呼和浩特等待喀尔喀部派人同行，因喀尔喀部始终未派出人员，所以察汉喇嘛等人一直停留在呼和浩特等待，却没有遇到西藏的使团或听到西藏使团的消息，可见西藏使团并没有走从青海到鄂尔多斯、土默特的传统的路线。当时又是明朝末年农民战争最为激烈之时，李自成、张献忠攻破河南、湖北，同时清朝军队也突入长城，攻击河北、山西、山东，西藏使团也不可能走甘肃、陕西一线。故西藏使团所走的路线，应当是从青海绕道新疆厄鲁特蒙古，再到喀尔喀蒙古，再从喀尔喀蒙古到沈阳。而这一路线正与咱雅班智达在这几年中的活动路线相符合。据《咱雅班智达传》记载，1639年秋天他到达鄂齐尔图在塔尔巴哈台的营地，还为鄂齐尔图的弟弟阿巴赖的母亲去世做了超度法事，1640年他在该地参加了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首领参加的制定著名的《卫拉特法典》的王公贵族大会（丘尔干会议）。1641年他到了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部，[1] 这是咱雅班智达惟一的一次到喀尔喀部活动。由此继续前行，咱雅班智达是可能在1642年到达沈阳的。

3. 再从《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的西藏使团的随行人员看，

[1]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第5—6页。

也与咱雅班智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太宗实录》1642年10月25日条所记载的为西藏使团派出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古木伊尔登、奇尔三、达赖巴图鲁、都喇尔和硕齐、桑噶尔塞伊尔登、王什克、窦尔格齐诺颜等，而1643年5月5日条所记载的派遣使团随行人员的蒙古首领有：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奇尔三等人。他们之中能够辨认出身份的有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的儿子衮布伊勒登、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儿子达赖巴图鲁（即固始汗的第六子多尔济）、桑噶尔扎，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阿巴赖，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的儿子都喇尔和硕齐等。可见组织此次西藏使团到沈阳的蒙古首领主要是固始汗和鄂齐尔图兄弟，而咱雅班智达是拜巴噶斯的义子，又是鄂齐尔图兄弟主要供奉的喇嘛，同时他与固始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咱雅班智达作为这个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4. 咱雅班智达拥有“伊拉古克三”的称号，还可以从他的转世的情况看出。1662年咱雅班智达在进藏的途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去世后，其徒众经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认定了转世灵童，鄂齐尔图夫妇将转世灵童认作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即是蒙古世系表中所记载的鄂齐尔图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儿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①] 这也证明咱雅班智达确实在厄鲁特蒙古人中间是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

5. 曾经长期经营西北，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作战的康熙皇帝写过一篇《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一开头就说：

① 见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表三十五。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330页，表一，和硕特世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汗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为施主，颇极安宁。”① 康熙皇帝对于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交往历史极为注意，是最了解实际情形的人，他说西藏使团经过厄鲁特蒙古数年始达盛京，应当是记录了真实的情形。

6. 关于《咱雅班智达传》没有记载咱雅班智达到沈阳通使清朝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到该书写作时的环境。该书的作者是咱雅班智达的弟子和长期担任他的索本堪布的喇德纳巴德喇，按理说他应该知道咱雅班智达的主要的活动。但是该书写于咱雅班智达去世后30年的1691年，此时作者本人也已经70岁，手头缺乏资料，因此出现了一些关于咱雅班智达在西藏的活动的不准确的说法，比较《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特别是关于咱雅班智达与清朝的交往，很可能是作者有意不写。当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统治卫拉特蒙古以后，击杀咱雅班智达的主要供养者鄂齐尔图，对原先属于咱雅班智达的僧人和徒众进行迫害甚至杀戮，强迫青壮年参加对清军作战，使作者生活在恐怖之中。② 1691年噶尔丹再次全力东进，意图与清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即使清楚咱雅班智达朝清的情形，大概也只好在书中回避不写。

依据以上几点，加上本文前面所说明的“咱雅”这一称号本身即是蒙古语“伊拉古克三”的对应词，所以笔者认为咱雅班智达应当即是《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

① 《西藏志·卫藏通志》，第13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第49—50页。

三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藏文史料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带领西藏使团到沈阳朝觐清太宗皇太极的车臣曲杰。《安多政教史》在讲到青海省民和县的巴州寺时说：

巴州寺（ba jovi dgon）丹巴达吉林（bstan pa dar rgyas gling），由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se chen chos rje）金巴嘉措（sbyin pa rgya mtsho）修建。他生于尼唐寺（nyi tang dgon）附近。当时，按照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提出的满洲（jur chi）的皇帝的势力日益强大去看看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施主的指示，他于第十一饶迥的铁龙年（公元 1640 年）前去穆克顿（mug tun）。一到该地，立刻瑞相纷呈，他被皇帝尊为应供喇嘛。木猴年（公元 1644 年）年底，东方皇帝的京城发生了时变，流贼夺取了大明崇祯皇帝的皇位，但是未能保持住，又丢失于满洲之手。他预言了顺治皇帝前去登上众敬王的皇位的日期时辰，并和皇帝一同到了北京。皇帝登上御座之后，为了使社稷稳固，他在皇城里的“僧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塔前立有吉祥天女和狮面母两尊所依止的三根牛毛幢。这三根幢，现在的人们不知其来历，改成了三根汉式的长旗杆。在皇城外的后面，为了保佑社稷，修建了黄寺和佛经、佛像、佛塔。有一些时候，为了改变事情缘起，规定了在城墙上吹号角巡逻的制度，至今仍在奉行。强巴却乔嘉措被康熙皇帝尊为上师，曾赐给师徒三尊等许多贵重的佛像、佛经、佛塔。乾隆皇帝邀请嘉央伦珠嘉措，在穆克顿修建了悉扎拉吉林寺，创立讲经学习制度。以上三师是兄弟，现在仍由其家族执

掌寺院，受历代皇帝的尊重。①

汉译者在注释中已经指出，从清太宗到乾隆皇帝历时 90 余年，这三位喇嘛不可能是兄弟，他们可能只是亲戚而已。

本世纪初青海塔尔寺的色多活佛洛桑楚臣嘉措著有《塔尔寺志》一书，在讲到塔尔寺密宗扎仓的历任堪布时记载了一位巴州活佛金巴嘉措的事迹，称巴州活佛源于那措译师楚臣嘉哇，至金巴嘉措时受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派遣去沈阳，被清朝皇帝奉为上师。以下的记述与《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大致相同。②

这里将带领西藏使团到沈阳去的车臣曲杰认为是修建巴州寺的金巴嘉措，并且记载了金巴嘉措在今天的北京的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山上修建白塔的事迹。乾隆皇帝在琼华岛上立过好几座碑，他写的碑文中只是提到"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又说"山顶为广寒殿，盖即建塔之所，山中为仁智殿，则今普安佛殿是。塔后列刹竿五，或谓之转梵经，或谓之资了远。其下为藏信炮之所，八旗军校轮流守之。盖国初始定燕京，设以防急变者。雍正年间复申明其令，载在史策，其发信炮金牌则藏之大内。"《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中附录有顺治八年建北海白塔碑文，文中说："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为诺木汗，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庀材鸠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为之记。"雍正

---

①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 年藏文版，第 180—181 页，吴均等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5—176 页。

② 色多·洛桑楚臣嘉措：《塔尔寺志》，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年藏文版，第 281—283 页。

十一年重修碑文中则说："白塔在皇城西北隅，创自顺治八年辛卯，世祖章皇帝从喇嘛诺木汗所请而俾之驻锡结香，讽呗祝厘者也。"[①]《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的记载为研究北京北海白塔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研究西藏首次遣使清朝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依据这些记载，是一个名叫金巴嘉措的出身于安多地区的僧人被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去沈阳，他有车臣曲杰的称号，所以在此之前他可能已经在蒙古地区传教活动多年，也可能他与固始汗有密切关系而得到这一称号。无论如何，这是藏文史料之中指明了到沈阳去的车臣曲杰的名字和家乡的重要资料。不过，从年代上看，《安多政教史》说金巴嘉措到沈阳后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的说法，则有可怀疑之处。按《清太宗实录》记载，西藏使团在1643年的5月遣还，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在1643年的8月去世，西藏使团可能在路途停留，以便和使团同行的察干格隆等人等待新君之命，1644年正月，顺治皇帝再命察干格隆等随西藏使团进藏，使团应当继续前进。按《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车臣曲杰和察干格隆等人在1644年冬末已经到达拉萨。而清军是在1644年5月在多尔衮的率领下进入北京，顺治皇帝是在9月底到北京，10月在北京登基。如果金巴嘉措是率领西藏使团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他随顺治皇帝一同到北京，就不可能在当年年底到达拉萨。不过正如《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所表明的，金巴嘉措有可能是在1645年再次被五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并且此后的一些年中在北京活动，受到清朝皇室的尊崇。至于说他在顺治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册，第364—370页。

八年（公元 1651 年）建北京北海白塔和东黄寺，因为此年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决定在 1652 年进京，所以很可能是作为清朝为接待五世达赖喇嘛而修建的系列工程的一部分，并不一定就是专门为金巴嘉措所建。

特别重要的是，《安多政教史》提到金巴嘉措的称号是“佛陀事业者车臣曲杰”，而这一称号亦见于康熙皇帝时因为帮助准噶尔部噶尔丹汗而被康熙皇帝下令在北京“剥黄处死”的那一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第悉桑结嘉措所编写的《五世达赖喇嘛续传》中记载，1689 年 4 月 11 日，以“曲杰佛陀事业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chos rje rgyal bavi vphrin las pa yi la gug san kho thog thu）为首的清朝使者到达拉萨，颁发了大量纯金制作的法器（有的重达百两、数十两）、珠宝、绸缎南京哈达数千条，第悉桑结嘉措称皇帝前后的赏赐以此次最为丰盛。[①] 实际此次即是康熙皇帝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西藏要求达赖喇嘛（此时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第悉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办理诸事）派人一起去准噶尔，劝谕噶尔丹不得攻打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第悉桑结嘉措即派济咙呼图克图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起前去准噶尔噶尔丹处。在 1690 年 8 月噶尔丹与清军在乌兰布通大战时，他们在高处观战，并为噶尔丹诵经，选择作战日期，在噶尔丹战败后又帮助噶尔丹施行缓兵之计，使噶尔丹逃脱。此后济咙活佛跑回西藏，而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即追随噶尔丹，至 1697 年噶

① 第悉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第二册（该书仍以《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为书名，排列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第四、第五、第六册，故《五世达赖喇嘛续传》的第二册，亦即《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第五册），藏文木刻本，第 270 页。

尔丹彻底失败时才被清军抓获，解回北京处死。此时距西藏使团到沈阳已有50多年，这一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显然不会是金巴嘉措，从他们都拥有“佛陀事业者”的称号看，后者很可能是金巴嘉措的转世。

由此看来，虽然《安多政教史》说巴州活佛金巴嘉措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并修建北海白塔的事有一些讹误和夸大，可能是把他后来在清朝任职时参与北海白塔的修建和将普净禅林改建为东黄寺等活动提前而认为他与顺治皇帝一起进北京，但是说他是到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却是可能性相当大的。

四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尽力考察了清朝开国时可能具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名号并有可能作为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前去沈阳的格鲁派僧人的事迹。按照现今的习惯，我们称之为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和巴州活佛金巴嘉措。从上述的资料看，巴州活佛金巴嘉措是《清太宗实录》中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但是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按成书于顺治年间的《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说：

是时，生灵归依之圣班禅额尔德尼、能识一切达赖喇嘛二人降旨，封昔日承运之密纳克固什绰尔济为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之号，遣往东方之天帝—崇德圣聪合罕处，赍送奉运之书奏曰：

窃观三界之中，生生轮回之众生，则得自由人之珍身者，诚属稀如白日之星辰也。就中得为揽天下之权柄而为合罕者，

其难得不啻如获如意琼珍矣。是以值此争斗之秋，而为应运之大力合罕者，以政教抚育天下大众，乃可称为合罕之分也。谨此，奉请扶持佛教，而为我教之施主，故具印文奉达。

合罕乃躬自迎见，叩拜已了，请入盛京城，尊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为功德喇嘛，受如意接引之灌顶聆听精微之教义，而初获法教焉。于是，岁次癸未（公元1643年），当伊勒固克散呼图克图之辞归也，奉献尊喇嘛以无量之赆仪。并由主上奉献二圣喇嘛以无数珍宝金银及各色财帛，而降密旨曰："我将取大明合罕之大都城矣。容先理竣世事，再遣使请二圣喇嘛，拜活佛而恢宏教法可也。"言讫遣归。[1]

这里又提出一个密纳克固什绰尔济即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此人按该书前面的记载是在1626年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与土默特部的鄂尔多斯的图巴台吉在拉萨互赠称号时，"圣班禅额尔德尼示本源于多塔尔·密噶特·根登达尔罕·桑噶斯巴之子，而降旨曰：'彼此番为我弟子已三次矣。'遂赐固什·彻辰绰尔济之号。"[2] 而《咱雅班智达传》记载咱雅班智达属于和硕特部古勒青鄂托克的桑哈斯家族的人[3]，至今在咱雅班智达的家乡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仍有姓古勒青的人，可见"桑噶斯巴（即是桑哈斯）"可能是小氏族的名称，或者即是咱雅班智达的父亲的名字。这样，去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伊拉古克三又有可能仍然是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我们知道，《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出身于鄂尔多斯

①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0—461页。

②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第444页。

③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所收成崇德译注《咱雅班智达传》，第3页。

的王公之家，是图巴台吉的堂侄，他记载的图巴台吉之时的事情，当是有可靠的资料为依据的。这样，认为咱雅班智达即是去沈阳的西藏使团的为首的高僧，也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

《蒙古源流》的这一段记载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为考察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出身提供了一件依据。而且它收录了五世达赖喇嘛给清太宗皇太极的信件的内容，并说清太宗皇太极遣还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时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代有即将兴兵入关夺取明朝帝位的密诏，揭示了西藏方面首次遣使清朝这一历史重要事件的政治内容，而这一信件的内容在《清太宗实录》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四世班禅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书信集》中都没有记载，所以这一资料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五

经过一番考察探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太宗实录》关于西藏使团到达沈阳时受到隆重接待的情景的描述，这才悟出实录中所说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并非是虚说。原来是“设二座”、是“命两喇嘛坐”！这就是说，西藏使团是由两个地位相等的高僧所率领的。而且这两个高僧都有车臣曲杰也即是戴青绰尔济的称号，而且都可以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只是在崇德七年（公元 1642 年）10 月 25 日条的记载中，才写道：“以朝鲜贡物分赐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这里指明了“两喇嘛”即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和戴青俄木布二人。实际上，《清太宗实录》在这里还是有所省略，

完整地说应当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俄木布，前者是指巴州活佛金巴嘉措，后者是指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而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也可以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的，只是巴州活佛金巴嘉措没有可能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俄木布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642 年到达沈阳的西藏使团是由两位格鲁派的高僧率领的，一个是一位安多地区的僧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金巴嘉措，他后来再次被达赖喇嘛派到北京，并且曾在北京任职，参与了清朝的一些宗教活动，他还在他的家乡青海民和修建了巴州寺，因而又被称为巴州活佛，他的转世即是康熙皇帝时因支持准噶尔部噶尔丹而被清朝处死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不过后来这一活佛系统似乎仍有转世，成为与青海塔尔寺密宗扎仓有密切关系的塔尔寺的巴州活佛；另一个是和硕特蒙古的高僧咱雅班智达，他后来在厄鲁特部传法，被尊为厄鲁特和喀尔喀四部七旗的喇嘛，以创制托忒蒙古文而著名，他的转世即是和硕特部车臣汗鄂齐尔图的义子伊拉古克三。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控制厄鲁特四部以后，咱雅班智达僧俗徒众分散，其后再无传承。后来在喀尔喀还出现过另外的伊拉古克三活佛和咱雅班智达活佛，但是他们的世系都与西藏首次遣使清朝一事无关。

关于西藏和蒙古厄鲁特部的首领（甚至包括了被他们作为敌手的第悉藏巴）联合派遣西藏使团前往沈阳朝觐清太宗皇太极的事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固始汗、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索南热丹等人为什么要精心安排西藏各派政教首领联合遣使清朝？除了共同寻求新的中央王朝的政治支持以巩固自己在青海、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之外，从当时的形势看，固始汗控制青海以后，进一步的

目标显然是控制康区和西藏，固始汗要出兵攻灭当时统治着前后藏地区的第悉藏巴政权，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击败第悉藏巴的武力反抗，而在于如果第悉藏巴觉察到固始汗和格鲁派的图谋或得到固始汗进兵的准确消息就会提前对格鲁派动手，打掉固始汗在西藏的内应和建立政治统治的同盟者，而失去格鲁派就意味着固始汗统治西藏的计划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当时格鲁派已经得到第悉藏巴与康区的白利土司结盟反对格鲁派的消息，如果在固始汗进兵康区、西藏时白利土司将其阻击在康区，第悉藏巴抢先攻击格鲁派，后果难以预料，若因此造成格鲁派在西藏的垮台，不仅对固始汗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计划有严重妨碍，而且对于固始汗在已经信奉格鲁派的内外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中的声望和地位也有严重妨碍。因此固始汗进兵西藏首先就遇到一个投鼠忌器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固始汗采取了稳住第悉藏巴、分头击破的方针，一方面以白利土司在康区支持苯教迫害佛教各派僧人为理由，用保护佛教的名义进兵康区，另一方面派人进藏，与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索南热丹等格鲁派首领配合，用文武结合的策略，使第悉藏巴政权不敢对格鲁派动武，又给第悉藏巴造成固始汗的目标只限于青海、康区和格鲁派还是愿意承认第悉藏巴在前后藏的统治的假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索南热丹等人经过周密的策划，由四世班禅出面，有意拉入第悉藏巴以及他支持的噶玛巴、萨迦法王等人，并以第悉藏巴为首致书清太宗皇太极，使第悉藏巴误以为固始汗和格鲁派尚无意推翻其统治，减少第悉藏巴对格鲁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公元 1606—1642 年）当时还比较年轻，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不足，他此时仍在忙于制定法典，平衡各教派的关系，他的手下又意见不一，因此对于固

始汗的进逼和格鲁派与固始汗的联合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自然也不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第悉藏巴和噶玛巴却英多吉、萨迦法王等人参加西藏遣使清朝的行动是被动的、无明确目标的行动，而四世班禅、固始汗、索南热丹等人则是精心谋划，精心实施，西藏使团绕道厄鲁特蒙古，又与留在新疆的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阿巴赖等人联络，声势更大，并且把到达沈阳的时间刚好控制在固始汗和格鲁派联合起来给第悉藏巴以最后一击之后。固始汗在 1642 年藏历 3 月攻破第悉藏巴的首邑桑珠孜，俘获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大约在当年秋末，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被固始汗下令处死，因此当西藏使团 10 月到沈阳时，第悉藏巴已经被消灭了。

原载《中国藏学》，1998 年第 1 期

明末清初格鲁派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之事迹新探

咱雅班智达（公元1599—1662年，亦作咱雅班第达）是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著名高僧。他出身于蒙古贵族，出家后到西藏格鲁派寺院中长期学佛，后又几次奔波于蒙古和西藏之间，他一生的活动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的传播、格鲁派在卫拉特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西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以及蒙古与西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创制了适用于卫拉特蒙古的托忒蒙古文，并用来翻译佛典（或者是将原先的蒙古文译本改写为托忒蒙古文）、医书及文学作品，在卫拉特蒙古的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他的弟子喇德纳巴德喇所撰写的蒙古文本《咱雅班第达传》的几种抄本的发现和公布，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对咱雅班智达的事迹以及与之相关连的这一时期的卫拉特的宗教、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发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①] 可以说蒙古文本的咱雅班智达传已经得到蒙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

但是，对咱雅班智达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因为迄今学术界对咱雅班智达的认识主要还是依据《咱雅班智达传》，而该书本身具有一些对学术研究来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地方。此书是咱雅班智达的弟子和长期担任他的索本堪布（负责宗教领袖的饮食起居的高级侍从）的喇德纳巴德喇所写，按理其记述来自亲身的耳闻目睹，是清楚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应注意到此书写作于1691年以后，即咱雅班智达去世后约30年，此时作者已是70岁高龄，因此书中完全可能出现因事隔多年记忆不准而造成的缺漏和记述的模糊。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作者写作此书时的环境，当时噶尔丹汗统治着准噶尔部和卫拉特蒙古，对原先属于咱雅班智达的僧人进行迫害和杀戮，作者作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在噶尔丹与喀尔喀部和清朝已经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对咱雅班智达的一些重要活动可能有不便明说的苦衷。[②] 当然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并不能否认《咱雅班智达传》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正应该因此而从

---

① 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原苏联学者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964年，马曼丽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日本若松宽《蒙古喇嘛教历史上两位弘法者—内齐陀音与咱雅班第达》、《卡尔梅克接受喇嘛教的历史侧面》。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中的《卫拉特的圣者，扎雅·班第达》一节。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咱雅班第达传〉》。诺尔布、冯锡时《〈咱雅班第达传〉的若干问题》。《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收入《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

② 关于噶尔丹掌权后控制和杀戮咱雅班智达属下僧人事，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55—57页。

《咱雅班智达传》的记述出发，结合其他资料特别是那一时期的藏文资料《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和第悉桑结嘉措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来进一步分析，以便求得对咱雅班智达的事迹的新的认识。

一、关于咱雅班智达的家世

《咱雅班智达传》说：“（圣者咱雅班智达）属和硕特家系古勒青鄂托克桑哈斯家族的人。其祖父是都尔本卫拉特颇有名望的洪果·扎雅齐。在洪果的众多子女中，长子是拜巴噶斯，拜巴噶斯有子八，咱雅班智达排行第五。”又说：“（咱雅班智达）转生于土猪年（公元1599年）。以车臣汗之父诺颜拜巴噶斯巴图尔为首的四卫拉特诺颜皆许愿其子弟做班第。别的诺颜纷纷送其子做班第时，拜巴噶斯巴图尔诺颜（对咱雅班智达）说：‘代替我子做班第吧！’（咱雅班智达）十七岁时，向曼殊室利呼图克图接受班第的戒礼，做了班第。”①

由这两段记载可以确定咱雅班智达出身于和硕特部，家族为古勒青鄂托克的桑哈斯氏。他是代替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儿子出家为僧，因此可以说是拜巴噶斯的义子，拜巴噶斯的亲生儿子是车臣汗鄂齐尔图和阿巴赖二人。但是，这样一来前一段译文中的“其祖父是都尔本卫拉特颇有名望的洪果·扎雅齐。在洪果的众多子女中，长子是拜巴噶斯，拜巴噶斯有子八，咱雅班智达排行第五”就显得很费解。若认为此处是指咱雅班智达的义父拜巴噶斯，那么其祖父洪果·扎雅齐应是指固始汗和拜巴噶斯的父亲哈尼诺颜洪果尔，但是作为和硕特部首领的哈

① 《咱雅班第达传》，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3页。

尼诺颜洪果尔一家应是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尔的后裔，其姓氏应为博尔济吉特，他们并因为这黄金家族的姓氏在卫拉特四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显然与“古勒青鄂托克的桑哈斯氏”不符。若认为此句是指咱雅班智达的生父，那就应认为其生父与义父同名，而且其祖父的名字与哈尼诺颜洪果尔的名字也相近。正因为看到这一问题，诺尔布和冯锡时的文章认为是蒙文本在转写方面有错误，并将此段重译为：“他出身和硕特部古鲁格沁鄂托克桑噶斯家族。他的祖父是都尔本卫拉特著名的恐奎·扎雅齐。恐奎·扎雅齐有许多儿子，其中长子是巴巴汗。巴巴汗有八个儿子，其中第五子是圣者咱雅班智达。”①

实际上，关于咱雅班智达的家世，其传记中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谈到他去世前最后一次进藏的情形时，传记说：“呼图克图（咱雅班智达一行）于月中旬经过库鲁克塔格山，渡过海都河，顺塔里木下行，翻越诺格图达坂。经过浩勒古力到达噶斯，在那里宿十多日，将乘畜养肥，又启程了。至乌尔腾地方遇见了伊查干，磕头会面之后回到故乡。从故乡出发到哈齐尔图商地方住了四、五日，呼图克图又病了。”这里清楚说明咱雅班智达的家乡在噶斯、乌尔腾到哈齐尔之间。这几个地名至今犹存，噶斯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西缘，附近有噶斯库勒湖，清代仍是新疆到青海、西藏的交通要道，现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镇。乌尔腾和哈齐尔都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哈齐尔为现今乡政府所在地，该处原有一座哈齐尔寺，1904 年 7 月间因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从拉萨出逃库伦的途中到过此处，受到过哈齐尔寺活佛和堪

① 诺尔布、冯锡时：《咱雅班第达传的若干问题》，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 302—303 页。

布等人的款待。[1] 而从噶斯到哈齐尔一带在雍正年间青海蒙古划分二十八旗时，是属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西右翼中旗，俗称台吉乃尔旗（今为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因境内有乌图美仁河而得名），该旗首封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车凌那木扎勒是拜巴噶斯和固始汗的异母兄哈纳克土谢图的四世孙。至今乌图美仁乡的蒙古族群众中仍有姓古勒青的人（当地称姓氏为“牙斯”，即骨系），是否有姓桑哈斯的，尚不清楚。看来是经过近四百年的演变，古勒青已从一个鄂托克的名称变成了家族姓氏。据当地人说，古勒青为平民的姓氏，而非王公台吉之姓，可见咱雅班智达的生父并不属于拜巴噶斯和固始汗的家族。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咱雅班智达的家乡是在今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乌图美仁乡，其家庭可能是哈纳克土谢图的属民。从传记称该地是咱雅班智达的故乡来看，他的家庭可能在固始汗1637年南下青海之前就已游牧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南端噶斯到哈齐尔一带。这一带与西藏紧邻，翻越唐古拉山西段即到西藏的那曲，古代是新疆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之一，现今的青藏公路亦从这一线穿过唐古拉山。拜巴噶斯选中咱雅班智达做他的义子、让他代替其子出家并到西藏去学佛，可能与咱雅班智达家乡邻接西藏、对西藏情况较为了解有关。

二、藏文史籍对咱雅班智达的称呼

自元明以来，藏传佛教上层人士的称谓变得十分复杂，对同一个人，有在家时起的俗名，有出家受戒时上师起的法名、

---

①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1)，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7页。

密法名，有从活佛转世系统得来的称号，有因僧职、学位而带来的称号，有因出生地、姓氏、学经的寺院或扎仓带来的称号。对咱雅班智达的称呼也是这样。已经有学者指出① 在《咱雅班智达传》中对他有7种不同的称谓：1. 纳木海嘉木措，此即藏文 nam mkhav rgya mtsho 的蒙古人读音，藏文读音为南喀嘉措，意为“天空海”。这是咱雅班智达的名字。2. 乌和特隆归达赖，此是南喀嘉措（天空海）的蒙古语对应词。3. 拉然巴呼图克图，这大约是因为他获得过拉然巴格西（在拉萨正月祈愿法会上考取的格西）的学位，又具有转世活佛即呼图克图的地位，因而被称为拉然巴呼图克图。4. 车臣鄂木布，这是一个蒙古语藏语混合的称号，鄂木布即藏语的 dbon po，指子侄外甥等后辈亲属，车臣鄂木布是指咱雅班智达是车臣汗（即鄂齐尔图）的亲属。5. 车臣绰尔吉，绰尔吉即藏语的 chos rji，意为法主、法王，相当于蒙古语的诺门罕。6. 阿巴车臣绰尔吉，此处的阿巴即藏语的 sngags pa，意为密咒师，也可指专门修习密咒的密法院或密宗扎仓。咱雅班智达被称为阿巴车臣绰尔吉，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哲蚌寺的阿巴扎仓的讲经师。7. 咱雅班智达，班智达源自梵文，是指精通佛教大小五明学识的学者。对“咱雅”的意义说法不同，有的认为源于梵文（实际上应是藏文），对应于藏文的 rgyal ba，意为“胜者，佛陀”，有的认为出自蒙古语，意为“命运”。我们认为“咱雅”（Caya）一词应是出自蒙古语，很可能与他的祖父洪果·扎雅齐的名字有关，咱雅即扎雅，“扎雅齐”为“有福运的人”之意。

① 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293页。

“咱雅班智达”这一称号通常是蒙古人对他的称呼，对照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和咱雅班智达的传记，我们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对咱雅班智达常用的称呼是琼结班智达、夏仲（对高僧或活佛的称呼）、热绛巴（rab vbyams pa，亦译作兰占巴，指获得格西学位的博通经论的高僧）等，另外提到的称呼还有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等，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中还有在同一段落中即用不同的称呼称咱雅班智达的情形。第悉桑结嘉措的《黄琉璃》中通常称咱雅班智达为琼结热绛巴·南喀嘉措，“琼结热绛巴”的意义与五世达赖喇嘛所说的琼结班智达的意义相近，因此我们可以判定，《黄琉璃》中的琼结热绛巴·南喀嘉措即是咱雅班智达。在研究藏文史料关于咱雅班智达的记载时，我们首先应注意到这种名称的多样性和因时而异的特点。

三、咱雅班智达在西藏学经的情况

《咱雅班智达传》对他在西藏学经的情形，只有以下一段概略的记述：

“蛇年（公元1617年），（咱雅班智达）到西藏，在第巴处暂时做随员。后入佛教寺院学习。他诵经修法，卓认超群，精通相学为众人折服，他在参尼扎仓修完（必修经论），（在大昭寺）攻取拉然巴格西学位。他知道一个词的含义后，以此类推理解了很多概念，从未搞错一句，更使众人钦佩，名扬四方。居特巴经堂派人请咱雅班智达做阿巴扎仓的经师，（居特巴）寺院的主持喇嘛抱怨道：‘让车臣拉然巴做阿巴扎仓经师于他有利，对我（的名义）有害’。这话使居特巴寺院的僧众大惊。（咱雅班智达）做了阿巴扎仓的经师，此后，在达赖喇嘛格根19岁时，由博格达喇嘛为达赖喇嘛授比丘戒，咱雅班智达成

为业坐中（陪他的）十格隆之一。得到吉本（或哲布尊）阿巴两个法位。……（咱雅班智达）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二十二年。”

这段记述过于简略，有不少容易使人误会之处。例如说咱雅班智达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整整二十二年，实际上他到西藏的当年（公元1617年）五世达赖喇嘛刚出生，1621年才被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次年2月才被迎入哲蚌寺坐床。五世达赖喇嘛从幼年起的历任经师都有详细记载，其自传中从未提到过咱雅班智达曾任此职。此外，吉本、阿巴只是加在名称前的一种称号，并不是一种法位或学位。不过这段记述中说咱雅班智达在五世达赖喇嘛19岁受比丘戒时是业坐中的十格隆之一，可以得到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证实。自传中说：

“（公元1638年）三月五日吉时，在（大昭寺）觉卧佛像前的地板上，由所有教法之主班禅仁波且洛桑却吉坚赞任堪布和屏教师，由林麦夏仲嘉央官却群培任业轨范师，（色拉寺）切巴协阿孺·译当巴强巴门朗任报时师，由哲蚌寺都哇（扎仓）经师达辛巴图丹南杰、洛色林（扎仓）经师颇康巴嘉央扎西、杰哇（扎仓）经师吉唐巴却彭措、阿巴（扎仓）经师车臣巴南喀嘉措、郭莽（扎仓）经师桑岗巴洛桑阿旺、夏果尔（扎仓）经师朗孜哇白玛群培、德阳（扎仓）经师格日哇、色拉寺堆巴（扎仓）经师伦布哇、麦巴（扎仓）经师贡如哇等九人为补全足数之比丘，给我传授了具足戒（比丘戒）。”①

由此可见，咱雅班智达在1638年时的职务是哲蚌寺的阿巴扎仓的讲经师（slob dpon，洛本），而不是《咱雅班智达传》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173页。

所说的居特巴寺院的阿巴扎仓的经师。居特巴寺院是指拉萨的上下密院，是甘丹寺的密宗扎仓，其下并没有阿巴扎仓的机构。因此从拉萨三大寺的系统来说，咱雅班智达是属于哲蚌寺僧人，而不是甘丹寺的僧人。在给五世达赖喇嘛授比丘戒时，他是业坐中的十格隆（包括五世达赖喇嘛）之一，是陪同受戒的身份，他不会因此而得到吉本或阿巴的法位。

说咱雅班智达初到西藏时“在第巴处暂时做随员”，也说得很不清楚，汉译者在注释中认为此处的第巴是指藏巴汗彭措南杰，第巴是“第悉藏巴”的简称。实际上第巴、第悉是指掌握一方行政权力的首领，因此当时西藏有大大小小的许多第巴，而不是仅有藏巴汗才能称为第巴。藏巴汗彭措南杰对格鲁派是持敌视态度的，几次与支持格鲁派的地方势力和蒙古军事力量发生武装冲突。咱雅班智达到达西藏后的1618年，彭措南杰的军队还在拉萨攻破哲蚌、色拉两寺，杀死格鲁派僧俗五千余人，并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因此作为格鲁派的学经僧人咱雅班智达不可能去充当彭措南杰的随员，也没有立即进入哲蚌寺或色拉寺学经。他很可能是首先到了西藏山南的琼结，短时期当过琼结第巴的随从。琼结第巴即五世达赖喇嘛出身的琼结巴家族，或称萨霍尔家族。相传该家族源于吐蕃王朝时期进藏的印度僧人，发达于元朝末年帕木竹巴政权兴起之时，五世达赖喇嘛的六世祖官却仁钦之兄班觉桑布当过帕竹政权的桑珠孜（今日喀则）的宗本，是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兴建扎什伦布寺的主要施主和支持者，官却仁钦之子多杰才丹在琼结兴建日沃德庆寺，成为格鲁派在山南地区的重要根据地。琼结巴家族既是帕竹政权的重要陪臣家族，又是格鲁派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咱雅班智达入藏后先给琼结第巴当随从是合乎情理的。此后咱雅班智达入日沃德钦寺学经，并以学识优异

获得格西学位而著名。《黄琉璃》记载日沃德庆寺的第十三任法座是琼结热绛巴·南喀嘉措，主修密法的相当于日沃德庆寺的密宗扎仓的琼结坚叶寺的第三十一任法座是琼结曲浦巴·南喀嘉措,[①] 都应是指咱雅班智达，也与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称他为琼结热绛巴相符合。在咱雅班智达的名字之前冠以西藏的地名，从藏传佛教高僧称号的习惯上讲，也并不难理解，它恰好证实咱雅班智达进藏后最初是到琼结活动和学经，并在琼结成名，最先在琼结担任格鲁派的僧职，因此格鲁派上层人士中习惯于用这一称号来称呼他。

在山南琼结学经、获得格西学位并出任日沃德庆和坚叶寺的住持后，咱雅班智达也没有立即前往拉萨活动。17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格鲁派仍然受到第悉藏巴政权的敌视和压制，虽然由于格鲁派的施主蒙古各部的封建主和军事力量经常进出拉萨而使第悉藏巴不敢以武力大规模迫害格鲁派，但是来自后藏的对格鲁派的威胁始终存在。在这种形势下，格鲁派把拉萨东南方的达布、工布作为重要的活动地区。五世达赖喇嘛在这一时期经常从拉萨到该地区，朝礼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创建的曲科杰寺，并与周围的僧俗地方势力增进关系。咱雅班智达这一时期也到达布地区活动，据《黄琉璃》记载，他曾担任过地方首领拉加里家族兴建的艾绒噶丹曲顶寺的第四任讲经师、达布喀尔桑丹林寺的第七任法座、拉顶寺第七任讲经师、喀托曲德寺的第三任讲经师及旺仁曲德寺的第八任讲经师。在这几处记载中，称他为琼结热绛巴（或琼结巴）南喀嘉

① 第悉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年藏文版，第 221—223 页。

措。[①] 从这段记载对应的时间看，咱雅班智达的职务变换似乎过于频繁，不过这可以用他同时兼任不同寺院的僧职来加以解释。在此之后，咱雅班智达进入位于西藏山南桑日县东部的由历辈达赖喇嘛担任寺主直接护持的曲科杰寺。据《黄琉璃》记载，该寺有协巴、达布、阿里、噶尔巴、南杰等五大扎仓，其中南杰扎仓的部分僧人直接随侍达赖喇嘛，所以后来在拉萨布达拉宫里随同达赖喇嘛诵经修法的僧人的组织也叫南杰扎仓。《黄琉璃》记载达布扎仓的第十五任讲经师为琼结热绛巴·南喀嘉措[②]，显然即是指咱雅班智达。他能够出任曲科杰寺的这一高级僧职，表明他当时已成为格鲁派领导集团中的一名重要成员。

另一方面，17 世纪 30 年代西藏政治形势的发展，也在促使咱雅班智达为格鲁派发挥更大的作用。

1634 年，喀尔喀部的却图汗移牧青海，击败原在青海的支持格鲁派的土默特火落赤部。1635 年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兵进藏，支持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攻击格鲁派。格鲁派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中一面派人去向卫拉特部求救，一面争取阿尔斯兰，力争使其改变态度。阿尔斯兰入藏后并未急于攻击格鲁派，反而与第悉藏巴发生了冲突，使格鲁派平安地渡过了一次危机。1636 年年底，卫拉特的固始汗在巴图尔珲台吉的支持下为救援格鲁派而南下青海，于 1637 年初在青海湖边击杀却图汗，控制了青海地区。当年秋天，固始汗从青海到达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他们互赠尊号，协商了互相支持的行动计划。咱雅班智达可能正是在这个时期从曲科杰寺

① 《黄琉璃》，第 205 页、201 页、203 页。

② 《黄琉璃》，第 197—198 页。

来到拉萨，进入哲蚌寺，并因哲蚌寺阿巴扎仓僧众的要求担任了阿巴扎仓的讲经师。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互赠称号时，还给双方的主要随从赐给了称号，如索南饶丹（格鲁派掌权后的首任第巴）被称为"达赖强佐"，仲麦巴·成勒嘉措（第悉桑结嘉措的伯父，格鲁派的第二任第巴）被称为"宰桑第巴"。作为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的义子和格鲁派的高级僧人，咱雅班智达可能参加了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的会见，并得到了"车臣曲杰"的称号，所以1638年3月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时（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21岁而不是《咱雅班智达传》所说的19岁），他作为9名业座中的比丘之一，被称为"阿巴洛本（阿巴扎仓讲经师）车臣巴南喀嘉措"。阿巴洛本是咱雅班智达在西藏所担任的最高僧职，在整个蒙古格鲁派僧人中，作为学经僧人晋升到拉萨三大寺的扎仓的讲经师一级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

四、咱雅班智达从西藏返回蒙古的情形

关于咱雅班智达从西藏返回卫拉特蒙古的经过，《咱雅班智达传》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述也略有不同。《咱雅班智达传》说："两圣者发慈悲，下诏命（咱雅班智达）返回卫拉特蒙古地方生根，为济佛教与众生。班禅再三下诏说：你去蒙古，为宗教与众生之利益。班禅对他说：你是很不平凡的僧徒。并把手中的玛瑙念珠赐予他。达赖也下诏说：为了我，为了蒙古喇嘛教的产生，去讲习经典，弘扬佛教。……返回卫拉特之事：启程于其四十岁之土虎年（公元1638年）。兔年（公元1639年）秋到达鄂齐尔图台吉的营地。"似乎咱雅班智达是奉达赖喇嘛和班禅之命专为弘传佛教而直接返回卫拉特

的。不过这里说的达赖喇嘛和班禅的话，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格鲁派早已在蒙古传播，就是信奉最晚的卫拉特部也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说咱雅班智达回蒙古去使佛教在蒙古产生、生根，与实际情况不合。另外《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说1637年固始汗与五世达赖会见时，双方决定派遣达尔汗囊索根敦达吉去卫拉特和喀尔喀地区传教，以加强联系，《咱雅班智达传》也说到他返回卫拉特时已有一个印藏（当是热振）呼图克图亦称堪布诺门罕的在当地弘法，还和咱雅班智达辩论过经典，并自认为名气比咱雅班智达要大。另一方面，1638年时格鲁派还在藏巴汗的统治下，格鲁派与固始汗联合推翻藏巴汗的计划正在紧张的实施，作为与格鲁派和固始汗都有密切关系的咱雅班智达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似乎也不会仅为了传教就派遣他返回卫拉特去。

按《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1637年固始汗在拉萨时邀请达赖喇嘛到青海去，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但是在固始汗离拉萨回青海后，格鲁派僧俗首领中对达赖喇嘛去青海的意见不一，第巴吉雪巴等人反对，所以达赖喇嘛没有及时动身。1638年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后，固始汗派遣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宰桑墨岱齐等300余人到拉萨迎请达赖喇嘛去青海，索南饶丹到日喀则去请求第悉藏巴批准，遭到拒绝，第悉藏巴还警告索南饶丹不要与蒙古人交往过密，使得索南晓丹大为愤慨。墨尔根噶居等到日喀则会见班禅时，又见到第悉藏巴在日喀则兴建土木，侵逼扎什伦布寺的情况。墨尔根噶居等人返回青海向固始汗报告这些情形，成为固始汗决心消灭第悉藏巴的直接起因。当然这是格鲁派对固始汗兴兵入藏的解释，有可能墨尔根噶居等人进藏本身就是为了观察时机，为固始汗进兵做准备。恰恰在固始汗的使者年底从拉萨动身返青海时，除达赖喇

嘛让墨尔根噶居向固始汗说明自己不能去青海的原因外，还有上年随固始汗进藏的卓尼曲杰和咱雅班智达（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为阿巴洛本车臣巴）与他们同行。① 由此可见，1638 年咱雅班智达从西藏前往青海固始汗处，并不完全是为弘传佛教，很可能是受命参与格鲁派和固始汗进攻第悉藏巴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五、咱雅班智达与西藏首次遣使清朝

1637 年 8 月，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上表清太宗皇太极，提出喀尔喀与卫拉特派人协助清朝廷请达赖喇嘛。1639 年 10 月，皇太极派察汉喇嘛等人带着给藏巴汗和达赖喇嘛的信启程进藏。1646 年察汉喇嘛等行抵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时，却不见喀尔喀、卫拉特派人前来会合，因此滞留在该地。与此同时，1639 年底到 1640 年初，西藏方面却派出以戴青绰尔济（车臣曲杰）为首的使团，带着藏巴汗、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法王等各派首领给清朝的信前往沈阳。这两个使团超出常理地没有在途中相遇，西藏使团在 1642 年 10 月抵达沈阳，受到皇太极隆重的礼遇。1643 年 6 月西藏使团从沈阳出发返藏，皇太极派察汉格隆等与他们同行，并带去清朝给达赖喇嘛、藏巴汗、噶玛巴等西藏各派首领的礼品和信件。而与这次遣使同时，占据青海的卫拉特部固始汗于 1639 年底出兵康区，击灭与藏巴汗结盟的白利土司，接着在 1642 年进兵西藏，与格鲁派合兵攻灭第悉藏巴。这样一面共同遣使清朝一面又互相攻伐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第 178—179 页。

的情形，使西藏首次遣使清朝成为清代藏族史上头一件具有重大意义但又绝难理清的大事件。咱雅班智达作为与卫拉特和西藏都有特殊关系的重要人士，与这一连串的变故有重要的牵连。下面我们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尝试对这一问题提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1638年底固始汗的使者墨尔根噶居从拉萨回青海时，卓尼曲杰和咱雅班智达与之同行。从藏文史料透露的信息看，墨尔根噶居向固始汗报告西藏的情形，促使固始汗决定攻灭藏巴汗。从当时的形势看，固始汗入藏攻灭藏巴汗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藏巴汗的武力反抗，而在于如果藏巴汗得到准确的消息，会提前对格鲁派动手，打掉固始汗在西藏的内应。当时格鲁派已得到藏巴汗与康区白利土司结盟反对格鲁派的消息，如果在固始汗进兵时白利土司将其阻击在康区、藏巴汗抢先攻打格鲁派，后果难以预料，若因此造成格鲁派的重大损失，对固始汗在蒙古各部中的地位和以后的计划也会有严重影响，这对固始汗来说是一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对此固始汗采取了稳住藏巴汗、分头击破的方针，一方面以白利土司在康区支持苯教迫害佛教各派僧人为由，用保护佛教的名义进兵康区，另一方面派人进藏，给藏巴汗造成固始汗和格鲁派有意承认藏巴汗在前后藏的统治的假象。可能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固始汗、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等人在遣使清朝的问题上，有意拉入藏巴汗及其支持的噶玛巴、萨迦法王等，并以藏巴汗为首致书皇太极，使藏巴汗误以为固始汗和格鲁派尚无意推翻其统治，减少其采取武力行动的决心。《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1639年8月，卫拉特蒙古的都日雅勒和硕齐（du ri yal kho shor chi，此人可能是准噶尔部额伯内伊勒登之子都喇勒和硕齐，为巴图尔珲台吉的堂兄弟）和车臣曲杰到达拉萨，在与格鲁派联络后，都日

雅勒率兵前往后藏，声称要用武力平毁藏巴汗在日喀则新建的寺院，同时达赖喇嘛又通过车臣曲杰加以制止，又由四世班禅出面在藏巴汗和都日雅勒之间调解，接着由四世班禅提出，派车臣曲杰为使者，由藏巴汗和各教派首领致书皇太极，争取新兴的清朝做西藏各派的施主。通过这样文武两手，固始汗和格鲁派迫使藏巴汗就范，对紧接着的固始汗进兵康区不能做出反应，坐视白利土司被固始汗攻灭。格鲁派还在表面上做出愿与藏巴汗和解的姿态，1640年拉萨正月祈愿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由索南饶丹安排在法会上齐诵了四世班禅撰写的祈愿藏巴汗长寿的祈愿文，以此进一步麻痹藏巴汗。

1640年正月祈愿法会结束后，车臣曲杰和都日雅勒作为西藏的代表动身去沈阳，此时清朝的使臣已到呼和浩特，大概西藏遣使的事已通知卫拉特和喀尔喀各首领，所以喀尔喀诸汗并没有按原先的约定派人与清朝使团会合，而使察汉喇嘛一行停留在呼和浩特。至于车臣曲杰其人，《四世班禅自传》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在讲到此事时都未加说明，只记了这个称号，未写出他的名字，留下了一个谜。不过我们知道，咱雅班智达在1638年时已经有阿巴车臣曲杰的称号，而且他是在1638年底从拉萨去青海的，很可能在与固始汗协商后，在1639年又与都日雅勒一起进藏，并且因为他担任过西藏大寺院的扎仓讲经师，使得藏巴汗同意以他为使者带书去沈阳。当然这个车臣曲杰也可能是另一个卫拉特蒙古的僧人，但是这以后使团的活动情况，仍然可能和咱雅班智达有密切关系。

车臣曲杰一行前往沈阳所走的路线，虽然藏汉文史料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没有走从青海到宁夏再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这一线。因为他们如走这一线，当时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都已在清朝的统治之下，在呼和浩

特的清朝的使团不会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另外从《清实录》的记载看，护送和陪同西藏使团到达沈阳并受到清朝赏赐的人为“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1]，这里的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应即是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之子鄂齐尔图和阿巴赖兄弟，都喇尔和硕齐即是与车臣曲杰一起去西藏又以西藏使者身份返回的都日雅勒和硕齐。《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述的西藏使团离开拉萨时只有车臣曲杰和都日雅勒，到达沈阳时多出了鄂齐尔图和阿巴赖，或者是鄂齐尔图和阿巴赖派出的人员，这说明西藏使团在途中经过了鄂齐尔图和阿巴赖的营地。而据《咱雅班智达传》的记载，鄂齐尔图 1639 年到 1642 年时的营地在塔尔巴哈台即今新疆塔城一带，这就说明西藏使团出发后绕了一个大圈子，经过新疆塔城再往东经喀尔喀部到沈阳，这就使得停留在呼和浩特的清朝使团察汉喇嘛等无从知道西藏已经遣使之事。

另一点使人费解之处，是西藏使团抵达沈阳时多出一个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而且是使团的为首之人。《清实录》崇德七年（公元 1642 年）十月己亥条记：

“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觐，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

① 《清实录》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记：“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上率诸工、贝勒等送至演武场，设大宴饯之。”

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由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同来喇嘛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绒单、绒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物，酌纳之。”

同年十月壬戌条记：“以朝鲜贡物分赐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戴青俄木布……”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五月丁酉条又记：

“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又赐厄鲁特部落和尼图巴克式、阿巴赖达赖、都喇尔和硕齐下额尔德尼、巴图鲁奇尔三下土尔噶图、阿巴赖山津等朝衣、帽靴等物。上率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设大宴饯之。宴以鞍马、银壶等物赐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喇嘛。仍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率梅勒章京参政以上各官送至永定桥，复设宴饯之。遣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同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喇嘛前往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红帽喇嘛噶尔玛、昂邦萨斯下、济东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达克龙胡土克图、藏巴汗、顾实汗处，致书各一函。”

对于以上几段记载，有的学者认为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戴青绰尔济之间不应点开，读为“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而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中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

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中的“及”字，可能是后来修改实录时加进去的，这样伊拉古克三与戴青绰尔济实际是一个人。这样解释，与《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述相符，只不过是车臣曲杰到沈阳后增加了一个清朝方面记录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的称号。不过这一解释还难以说明崇德七年十月已亥条的“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因此仍应认为伊拉古克三与戴青绰尔济是两个人，这就成为使团从拉萨出发时由车臣曲杰为首，到沈阳时成为伊拉古克三和车臣曲杰率领，而且伊拉古克三的地位高于车臣曲杰。这一问题大概要等有关的满文档案公布后才能解决，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后说较为合理，不过我们认为到沈阳时使团中增加的这位为首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很有可能即是咱雅班智达，现将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咱雅班智达这几年活动的路线与西藏使团行经的路线基本相符。据《咱雅班智达传》的记载，他 1638 年离开西藏后，1639 年秋到达鄂齐尔图在塔尔巴哈台的营地，还为阿巴赖母亲去世做了超度法事，1640 年 9 月他在该地参加了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首领参加的制定《卫拉特法典》的丘尔干会议，1641 年他到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部，这是咱雅班智达惟一的一次到喀尔喀部活动。而这一时间正与西藏的使团 1640 年从拉萨出发，到达鄂齐尔图的营地后又转往喀尔喀部的时间相符。咱雅班智达这次到喀尔喀三部，时间只有一年，也没有举行大的宗教活动的记载，因此他可能主要不是为了在喀尔喀传教，而是率使团经过喀尔喀前往沈阳。

其次，从“伊拉古克三”这一称号的本身看，“伊拉古克三”是蒙古语词，意为“特出的”、“不同凡响的”、“在几个人中地位最高的”。这一称号在藏文这一段记载中没有出现，显然是到沈阳时新加的，是清朝根据西藏使团自己的介绍记录下

来的。为什么会用这一称号？我们知道当时咱雅班智达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阿巴车臣曲杰、车臣曲杰，而率领使团从拉萨出发的人的称号也是车臣曲杰（戴青绰尔济），这就形成因咱雅班智达的加入而使团两位负责人都叫车臣曲杰，为了区别，使团中的蒙古人就称地位较高的咱雅班智达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咱雅班智达获得过拉然巴格西学位，担任过哲蚌寺的扎仓讲经师，按惯例具有转世的资格，因此称他为呼图克图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由于咱雅班智达的沈阳之行，使他临时得到了一个“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的称号，而且他的这个被清朝记录下来的称号，后来又被用来称他的转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叙及。

再次，从《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的西藏使团返回拉萨的情形，也可以看出咱雅班智达与西藏使团的关系。据该书记载，1644年冬末，西藏派往沈阳的车臣曲杰和清朝的使臣察干格隆等带着清朝皇帝的信函和礼品返抵拉萨，紧随其后喀尔喀左翼的诺门额津（应即是赛音诺颜部的丹津喇嘛，号诺门罕）和琼结班智达（即咱雅班智达）等人也到达拉萨，他们一起在哲蚌寺大经堂连续熬茶布施20余天，并向达赖喇嘛等奉献了许多百份、千份礼品。① 可能咱雅班智达和使团一起返回拉萨的途中，为等候诺门额津而迟误，所以紧接着使团抵达拉萨。按格鲁派寺院的惯例，奉命外出的僧人在返回本寺后要将外出获得的钱财用一部分布施僧众，咱雅班智达与使团的人一起在哲蚌寺熬茶布施，也说明他与西藏使团的活动有关。

最后，“伊拉古克三”这一称号与咱雅班智达的转世有关。清朝汉文史料中关于伊拉古克三的记载，除这次西藏遣使沈阳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第251页。

外，还有1688年到1696年准噶尔的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中作为使者帮助噶尔丹，因而最终被清朝处死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以往一些论着中将这两个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混为一个人，实际从年代看，他们之间相差了50多年，不应该是一个人。汉文资料认为，后一个伊拉古克三是和硕特部鄂齐尔图的儿子，并将其列为鄂齐尔图的第三子。[①] 实际上这一伊拉古克三之成为鄂齐尔图的第三子，与咱雅班智达成为拜巴噶斯之子一样，也是义子，而且这一伊拉古克三即是咱雅班智达的转世。《咱雅班智达传》记载，1662年咱雅班智达在进藏途中圆寂后，其徒众通过郭莽喇嘛经达赖喇嘛指示，在西藏找到了他的转世。1665年鄂齐尔图夫妇到西藏去，见了转世灵童。鄂齐尔图的夫人杭悲克多拉玛说："一则是我们喇嘛经师的转世，二则我无子女，想把这个幼童带回家，然后再学经。"他们向达赖喇嘛陈述了这样的请求，实际就是要认转世灵童为义子。达赖喇嘛说灵童年龄还小，待日后再说，并要鄂齐尔图夫妇以后给灵童送来粮食（供养），虽然没有让带走灵童，但让送来供养，也可以看作是达赖喇嘛默认了鄂齐尔图认灵童为义子。[②] 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1665年底鄂齐尔图及其夫人彭措卓玛（即杭悲克多拉玛）到西藏，向达赖喇嘛奉献礼品。到1666年6月15日，鄂齐尔图通过第巴征得固始汗之子达延汗和格鲁派上层集团的同意，在哲蚌寺举行即汗位仪式，由达赖喇嘛赠给鄂齐尔图以车臣汗的名号及印信，因举行仪式时传来鄂齐尔图之子噶勒丹的妻子去世的消息，彭措卓玛悲痛

---

① 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表三十五。《卫拉特蒙古简史》，表一。

② 《咱雅班智达传》，第43—44页。

得在仪式上昏厥过去。达赖喇嘛为鄂齐尔图传授教法后，随即为他们返回卫拉特送行。达赖喇嘛认为这对鄂齐尔图夫妇是一个不祥之兆。[①] 鄂齐尔图夫妇认咱雅班智达的转世为义子应即在1665到1666年间，未能将转世带回卫拉特，可能是因为临行匆忙，也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认为征兆不祥而未同意。其后咱雅班智达的转世在西藏的情况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还有一些记载，1666年9月闰10日，达赖喇嘛为灵童剃了发，并传授了六臂观音教诫。[②] 此后达赖喇嘛还几次会见过咱雅班智达的转世。如果说鄂齐尔图有一个儿子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而且与达赖喇嘛有很深的关系，那么这个伊拉古克三只能是鄂齐尔图夫妇的义子、咱雅班智达的转世。而从咱雅班智达的转世被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又适足以证实咱雅班智达本人也曾有过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称号，只不过他的这个称号是在他参加西藏使团去沈阳时临时得到的，因此除了《清实录》的记载外，其他地方并不用这一称号来称呼他。这就造成了《清实录》记载得轰轰烈烈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在藏文、蒙古文史料中渺无踪迹的情形，即使是在《清实录》中，也是在1642年、1643年突如其来，随即不见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在事隔将近50年后，又突然出现一个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将《清实录》记载的1642年抵达沈阳的西藏使团中的首席代表比定为咱雅班智达，当然这一结论是否能够完全成立，还有待新的资料的发现。冯锡时在《卫拉特蒙古简史》第三章第三节指出，在《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丁巳条下的记载“上御太和殿，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第29—30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第46页。

赐厄鲁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图克图单储特霸达尔汉绰尔济……等宴”，喇木占霸胡图克图是指咱雅班智达，单储特霸是强佐的对音。喇木占霸即藏文的热绛巴，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确实曾用热绛巴夏仲（即喇木占霸胡图克图）称呼咱雅班智达。如此说成立，说明咱雅班智达1642年去沈阳之后，还曾经派遣其属下的强佐到北京朝觐过顺治帝。

至于《咱雅班智达传》为何不明说咱雅班智达的沈阳之行，一种可能是作者为其师写传不大注重政治方面的活动而造成的漏记，一种可能是作者当时在噶尔丹的统治下，而噶尔丹当时正与清朝进行殊死搏战，作者在高压下不便说明其师在西藏和卫拉特蒙古与清朝的关系中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将此事有意回避过去。

六、咱雅班智达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

《咱雅班智达传》记载，在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春动身去北京朝觐顺治皇帝前夕，咱雅班智达于1651年冬天到达西藏，并在1652年夏天在青海又会见了在进京途中的达赖喇嘛。这事的起因，是鄂齐尔图1648年为咱雅班智达筹集进藏布施的物品，从属下各鄂托克征集了一万匹骟马，命20名蒙古僧人到汉地贸易，1650年将贸易得到的汉地物品献给咱雅班智达。于是咱雅班智达于1650年冬天起程进藏，于1651年10月到达拉萨。《咱雅班智达传》记载他在西藏活动的情形时说：“达赖喇嘛格根、顾实诺门罕、大第巴自齐齐克塔拉返回。午时，在哈拉塔拉打中伙时，咱雅班智达等磕头迎接达赖喇嘛等。第巴说：‘你向我献了哈达，我也要向你献哈达。’……那年法会

时，达赖喇嘛想约请远方来的施主们，达赖喇嘛说：应当让甘丹西勒图去，我不去了，拉然巴咱雅班智达、楚库尔乌巴什、额尔德尼浑台吉、蒙古佛法主持者伊克阿勒德图绰尔吉等众施舍主向顾实法王、大第巴请示说：我们的愿望是，第一我们是远方来的众生，来听法会，第二想在达赖驾到经堂时贡献供品，所以（达赖喇嘛）应当去。顾实汗、第巴答道：那就去吧。当问道法会由谁先供贡品时，第巴说：先是拉然巴咱雅班智达，其次是阿勒德图绰尔吉，其次是楚库尔，其次是额尔德尼浑台吉。呼图克图（咱雅班智达）佛仓里的银子数目是十一万两。向达赖喇嘛佛仓和僧徒们献银五万两，其中的二分之一用于塑造佛像。一万两用于修建哲蚌寺的金房顶。向各地诵经、学经者奉献五万两银子……"① 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则说，1648年底清朝使者喜饶喇嘛等到达拉萨，五世达赖喇嘛表示接受邀请，愿意前往北京朝觐，但又提出担心染上天花及热病，故只能在北京作不长时间的停留，并派噶居喜饶坚赞前往清朝说明缘故。1651年7月清朝使者车臣温波和博若才仁到达拉萨，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索南饶丹向各地僧俗宣布了进京朝觐之事。拉萨三大寺僧众担心五世达赖喇嘛会像三世达赖喇嘛那样一去不返，所以纷纷前来劝阻，五世达赖喇嘛以诏命不可违背为由，决意进京，并为说服僧众，立下了保证不出三年就要返回西藏的文书，并盖印担保。七月底达赖喇嘛为进京朝觐之事而与固始汗、第巴一起赶往山南朝礼曲科杰寺。曲科杰寺所在之地藏语称为"杰梅朵塘"（rgyal me tog thang），即杰地方的有鲜花的平坝，正与《咱雅班智达传》所说的"齐齐克塔拉"（有鲜花的草原）相符合。当达赖喇嘛一行从曲科杰

① 《咱雅班智达传》，第26—27页。

寺返回，到达恰噶地方时，“琼结班智达从喀尔喀（当为卫拉特）蒙古前来会见，他向我奉献了一根长一卡（相当于十二指的宽度）、宽三指、厚半指的金条”。1652年正月，“我（五世达赖喇嘛）在动身之前主持了为期八天的正月拉萨祈愿法会。本年有大批客人前来，以喀尔喀诺门额津、吉雪第巴曲杰的转世为首的楚库尔乌巴什一行多人奉献了成千累万的礼品，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献银一万两、绸缎一千多匹，琼结班智达奉献了以将近一万两黄金为主的珍贵的汉地物品，作为一切善根回向圆满菩提。土马年（公元1618年）发生战乱时，遍知一切索南嘉措的银质灵塔的门饰被吞巴·扎额坚拿走，为了修复，琼结班智达捐献了用金、玉制成的多格窗棂。阿巴诺门罕给哲蚌寺的公私僧众布施了作为助缘的银子。寺院的财库向他们回赠了可以拿出而又不失体面的礼品。”[1] 正是在对比这两段蒙文和藏文史料的记载后，使我们确认《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所说的琼结班智达、阿巴车臣曲杰诺门罕、阿巴诺门罕即是蒙文史料中的咱雅班智达。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一事，主要是在西藏格鲁派僧俗上层和固始汗之间协商决定的，达赖喇嘛为自己能够成行做了很大努力。达赖喇嘛进京在咱雅班智达到达西藏之前已经成为定局，因此认为咱雅班智达及鄂齐尔图等卫拉特部的首领对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一事起了重要的牵制或决策作用，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咱雅班智达、鄂齐尔图、诺门额津等卫拉特和喀尔喀的僧俗首领可能会了解清朝历次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及双方为此联络的情形，他们选择在五世达赖喇嘛动身之前或自己或委托他人到西藏向达赖喇嘛奉献大量的礼品和布施，实际上只应该看作是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第328页、343—344页。

他们对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的一种支持。

关于咱雅班智达对清朝的态度，《咱雅班智达传》有一段很使人费解的记载："宰桑巴勒巴齐在青海去世，查干格隆自青海来西藏，请达赖、班禅念祝福词，请示为（巴勒巴齐）祝愿祈祷，应当念诵什么经？达赖喇嘛答道：金刚经念诵一万遍。班禅高兴地说：那很容易。（咱雅班智达一行从西藏到青海后）等了一个月之久。以达赖洪台吉为首的大小诺颜在青海湖边的沙巴尔台为达赖喇嘛修筑法坛，让众人磕头迎接他。（咱雅班智达）在那里拜见了（达赖）喇嘛格根，并对他说：'为了宗教与众生的利益，为了兴旺佛教，在蒙古语族中没有人能比满洲博格多皇帝更高贵的了。'又说：'他不会违反你的谕诏。对皇帝讲一讲，要传播蒙古字，要在蒙古普及佛经。'达赖喇嘛格根笑道：'你的话虽然对，但是那个汗是骄横的，到那边再说吧。'后来咱雅班智达对僧众们公开讲：达赖喇嘛对满洲汗一点也不信奉。"① 前苏联学者兹拉特金将这段对话的双方理解为固始汗的儿子达赖洪台吉和咱雅班智达，并认为称满洲汗是骄横的人是咱雅班智达，由此提出"他（咱雅班智达）和巴图尔浑台吉一样是清朝的反对者，并且不赞成采取讨好清朝的政策"。② 我国的一些学术论著受兹拉特金的影响，也依据这一记载作过类似的阐述。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咱雅班智达率西藏使团去过沈阳，因此他对清朝的态度对西藏、蒙古僧俗首领是有重要影响的，对这段记载的确有必要辨析清楚。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咱雅班智达的确在青海见过进京途中的五世达赖喇嘛，但是会见的情形与《咱雅班智达传》

① 《咱雅班智达传》，第28页。

② 《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汉译本，上册，第180页。

所说的有很大的不同。据自传记载，1652年藏历7月11日，达赖喇嘛遇见了皇帝派来迎接的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人，沙济达喇在切吉（今青海共和县境内）向达赖喇嘛送交了圣旨、赐给的衣帽、念珠及乘马100匹。12日青海西纳、木雅、申中等部落在清朝供职的僧人100多名和上千名蒙古人前来迎接。13日达赖喇嘛在青海湖边登上一个新建的石头法座，为聚集的三千多蒙藏人士传法。咱雅班智达正是在这时会见达赖喇嘛的。自传中达赖喇嘛只有一句话提到咱雅班智达："我在一个新建的石座上落座后，夏仲奉献了三十余匹绸缎并以八十匹马、骆驼等作为乌齐尔济台吉属下的米桑巴勒巴齐的回向礼品。"这里的夏仲显然是指咱雅班智达。当天向达赖喇嘛献礼的有额尔德尼岱青之子洛桑丹增、济农之女乌尔却克、在西宁的清朝的两位官员派来的人员、青海蒙古首领墨尔根济农、阿噶格楚、喀尔喀宰桑渥巴锡等，衮布才旺、浓农等人为达赖喇嘛举行了盛大宴会。当时固始汗之子达赖洪台吉并不在场。当天达赖喇嘛还给喀尔喀的杰康则活佛和咱雅班智达传授了六臂观音灌顶加持，给济农的母亲等三千余人传授观音菩萨随许法，很难设想达赖喇嘛会在繁忙的应酬和传法活动中，在清朝的高级官员和在朝廷任职的众多僧人面前与咱雅班智达从容议论对清朝皇帝的看法，并公开说自己认为清朝皇帝骄横。另外咱雅班智达当时也不可能要求达赖喇嘛或其他什么人对清朝皇帝讲传播蒙古字和在蒙古普及佛经的问题。因为作为一名卫拉特的学识渊博的僧人，咱雅班智达当时正开始他的创制托忒蒙古文的工作，《咱雅班智达传》列举了他从1650年到1662年期间为四卫拉特翻译的经、咒、史、传的目录，其中大部分以前已有蒙古文译本，因此咱雅班智达的"翻译"应当是把原先的回鹘式蒙文本改写成托忒文本，所以咱雅班智达不可能希望

清朝皇帝传播他认为有严重缺陷的回鹘式蒙古文，也不可能希望清朝皇帝帮助他传播刚刚创制的托忒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是依据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特点创制的，主要适用于卫拉特各部，而当时卫拉特各部还未归入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咱雅班智达自身与卫拉特各部首领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不会舍近求远地去要求清朝皇帝帮助他传播托忒蒙古文。所以我们认为《咱雅班智达传》的这一段记述是十分离奇的，是不可信的，不应依据它去分析咱雅班智达或五世达赖喇嘛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事实上，五世达赖喇嘛对清朝的态度和他对顺治帝的印象，在其自传中另有清楚的表述。

七、在拉萨为咱雅班智达举行的超荐仪式

《咱雅班智达传》记载，咱雅班智达于1662年8月22日在进藏途中在哈齐尔地方去世，当即派了额尔和宰桑到西藏报丧，随后将其遗体就地火化。10月初，咱雅班智达的骨灰运到拉萨，“四十九天中，每天由达赖喇嘛给他念经，四十九天后，把呼图克图的灵柩运到布达拉前面的快乐林中，奉献了一万种祭品，达赖喇嘛格根察看了灵柩，吹了一下，福气的手抚摸了呼图克图的灵柩。达赖喇嘛说，火化时火大了。在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等黄教的大小寺院放了布施，色卡勒（萨迦）、卡尔玛（噶玛）为首的红教寺院也毫无偏见地放了布施。以通事囊苏为首的我们一行人去扎什伦布寺放了布施。参加葬礼的大小喇嘛纷纷到扎什伦布寺的佛像前磕头，为咱雅班智达修制灵塔，献出一千两银子。”

《咱雅班智达传》的作者喇德纳巴德喇是进藏为咱雅班智

达办理超渡法事的僧人，按理他的记述应是准确无误的，但是由于写作已事过多年，就是亲身经历也有模糊之处，如说在扎什伦布寺为咱雅班智达建灵塔，就可能不准确，因为咱雅班智达是哲蚌寺僧人，担任过哲蚌寺阿巴扎仓的讲经师，按理为他建灵塔应建在哲蚌寺，而不是扎什伦布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虽然是五世达赖喇嘛晚年时编集整理的，但是由于达赖喇嘛可以查阅和利用事件发生的当时所写的记录，因此在细节上比《咱雅班智达传》要准确得多。因此《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述，适可为《咱雅班智达传》提供证明和补充。按达赖喇嘛的记述，1662年9月初3日，“阿巴车臣夏仲在途中亡故，以强佐哲摩南喀仁钦为首的僧人们抵达拉萨，后又依愿前往曲果麦林卡，向我敬献了以七千两白银、二百匹缎子、绢、茶叶、布匹、巴撒尔的地毯、马匹、骆驼为主的产自汉地、蒙古、阿里、霍尔等地的大批物品组成的万份礼品。为超荐曲杰(车臣夏仲)，举行了隆重的回向祈愿法事。空旷的林卡（供人游玩的林园）似乎要被财物塞满一般，令人惊奇不已。”1663年3月11日，“作为阿巴车臣夏仲的外部纪念佛像，塑造了一尊弥勒佛银像供奉在（哲蚌寺）郭莽扎仓，由以襄巴阿然巴为首的扎仓的几位僧人装藏并开光。应郭莽扎仓卸任堪布噶如哇之请求，我撰写了赞颂祈愿文，祈愿此佛像久住世间”。5月5日，“以郭莽扎仓卸任堪布噶如哇为首的车臣夏仲的僧人们做施主，在不中断灵器酬补法事的情况下，举行了盛大的祈祷法事。此外他们还敬献了一幅用白缎绣绣成的长一庹半有余、宽两肘八指的佛像，上面有十二尊补足的佛像，每尊佛像都佩戴有珍珠、瑚瑚、玉石装饰的赤金冠、颈饰、耳饰等，另外还敬献了一幅同上述佛像大小相同的国政七宝图，以此作为灵器供的供品和扎仓的公共财物”。13日，“我给车臣夏仲的僧人们

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十一面观音、四面文殊、六臂怙至三尊的随许法。14 日清晨，我又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传授了禁食斋戒长净仪轨”。至此，对咱雅班智达的长达半年多的在拉萨的超荐活动才告结束。

原载《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 年

五世达赖喇嘛
阿旺罗桑嘉措年谱

藏历第十饶迴火蛇年［公元 1617 年　明万历四十五年　清（后金）天命二年］五世达赖喇嘛 1 岁

藏历九月二十三日拂晓，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山南琼结的秦瓦达孜城堡（今西藏琼结县县城所在地）出生。父名霍尔·都杜饶丹，母名赤坚贡噶拉则。

按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云裳》中的叙述，他出身的霍尔家族亦称萨霍尔家族，源于古代孟加拉萨贺尔国的王族。其先祖移居西藏的情形，有两种说法。一说有一名叫达玛巴拉的萨霍尔家族的人，是对佛教传入西藏起过重要作用的喜瓦措（静命）大师的侄子，又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在吐蕃王朝赤松德赞赞普时入藏，后来在西藏娶妻生子，传出霍尔家族。一说达玛巴拉先从印度到中亚地区巴达霍尔国，在该国的修行院中传法，赤松德赞（第悉桑结嘉措的《黄琉璃》说是赤松德赞之子塞那累江允）派兵攻打巴达霍尔国，将该修行院的财宝、白哈尔护法和达玛巴拉等僧人带回西藏，达玛巴拉跟莲花生学法，在西藏娶妻定居。后来达玛巴拉的六世孙多杰仁钦及其两

个儿子多杰扎巴和多杰巴瓦在霍尔巴萨地方兴建庄园，约从此时起，该家族被称为霍尔家族。其中多杰扎巴一系又称“康细巴”（外屋氏），多杰巴瓦一系又称“江杜巴”（柳园氏）。五世达赖喇嘛为多杰巴瓦之后。多杰巴瓦的孙子为霍尔·扎西本和堪钦粗达哇，堪钦粗达哇在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出家，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叔父京俄居尼宁巴·仁钦多吉的受戒弟子，又是给绛曲坚赞授沙弥戒的堪布。霍尔·扎西本的儿子为霍尔·宣努桑布和扎西善巴。堪钦粗达哇和宣努桑布在大司徒绛曲坚赞反对萨迦和雅桑、止贡等势力控制帕竹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堪钦粗达哇在与雅桑的战斗中阵亡，宣努桑布自幼充当绛曲坚赞的仆从，后升任绛曲坚赞的司茶侍从。绛曲坚赞任帕竹万户长后，委任他为管家，后因对绛曲坚赞的忠诚和战争中的指挥才能被提升为帕竹万户的军事长官。当萨迦本钦甲哇桑布逮捕绛曲坚赞要以武力接管乃东城堡时，宣努桑布忠实执行绛曲坚赞的命令，坚守乃东不降，保住了帕竹万户，因此被绛曲坚赞视为心腹和最得力的臂膀。帕竹政权统治西藏后，霍尔家族成为帕竹的家臣和世代任职的官宦人家。扎西善巴之孙霍尔·班觉桑布在担任帕竹政权的桑珠孜（今西藏日喀则市）的宗本时，成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施主，在根敦珠巴1447年创建扎什伦布寺时捐赠大量资财和土地，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霍尔家族与格鲁派建立关系的开端。不久，班觉桑布被仁蚌巴排挤出桑珠孜，班觉桑布的幼弟官却仁钦在帕竹政权任职，主持修建了琼结的秦瓦达孜堡寨（其遗址留存至今），并在琼结定居，从此霍尔家族与琼结地方紧密相连，又被称为琼结家族。班觉桑布兄弟又与格鲁派的第4任甘丹赤巴夏鲁哇·勒巴坚赞关系密切，请夏鲁哇为其做延续子嗣的法事而生子霍尔多杰才丹，所以在夏鲁哇去世后，多杰才丹出资在甘丹

寺为他建立供祀，并负责供祭夏鲁哇的灵塔（在甘丹寺）。多杰才丹还出资在琼结秦瓦达孜西南兴建日沃德钦寺，成为格鲁派在山南地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五世达赖喇嘛之父都杜饶丹是官却仁钦的五世孙，据说曾担任过帕竹政权的宗本。

五世达赖喇嘛的母亲贡噶拉则出身于浪卡子家族，该家族亦称羊卓家族，源于元代著名的萨迦本钦阿迦仑·多吉贝。阿迦仑本是萨迦班智达的一个施主贡噶德杰收养的一个弃婴，后被送到八思巴身边当仆从，因得八思巴喜爱，逐步提升，后出任萨迦本钦，在萨迦和止贡派争夺对帕竹的控制权的战乱中，他率萨迦的军队配合元朝军队击溃止贡和西蒙古的联军，后又到大都朝见，因战功获得元朝皇帝颁赐的世袭羊卓万户的诏书，故定居于羊卓雍湖边的浪卡子。浪卡子地处前后藏交界之地，该家族成为后藏地区的一支重要地方势力，在后藏的仁蚌巴、第悉藏巴相继兴起并与前藏的帕竹政权争雄的过程中，该家族是仁蚌巴和第悉藏巴的支持者，与第悉藏巴彭措南杰关系密切，在宗教上与第悉藏巴支持的觉囊派有紧密联系，奉觉囊寺的活佛多罗那它（公元1575—1634年，为藏文《印度佛教史》的作者，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称他为达丹活佛，因他1614年在第悉藏巴的支持下创建了达丹彭措林寺）为家族的宗教指导者。

五世达赖喇嘛父母的婚姻是由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促成的。当时第悉藏巴的势力深入前藏，击败拉萨地区支持格鲁派的吉雪巴，1610年又击败山南贡噶宗的雅郊巴，1612年攻取了乃东，控制了前藏大部分地区，并为限制已与蒙古军事力量建立关系的格鲁派势力的发展，在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下令禁止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可能是第悉藏巴考虑到霍尔家族是与帕竹政权关系密切的山南的一支重要地方势力，为争取该家族对第

悉藏巴统一前后藏的事业的支持，故彭措南杰指示浪卡子家族将贡噶拉则嫁给霍尔·都杜饶丹。浪卡子家族接到指示后，请多罗那它卜算，多罗那它测算后称此项婚事妥善吉祥并给以祝福。在第悉藏巴的安排下，1616年贡噶拉则嫁到琼结。

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后，浪卡子家族派人去告诉多罗那它，请他为孩子起名并作法事护佑，多罗那它为婴儿起名贡噶米居多嘉旺格杰波，第悉藏巴也专门派人参加了庆贺婴儿诞生的喜宴，表示善意的祝贺。

年底时，绛巴仁增阿旺曲嘉丹贝坚赞（绛巴仁增为宁玛派的转世活佛）从多康地区到琼结，为新生婴儿作法事护佑。

当年，被第悉藏巴击败的拉萨地区的领主吉雪巴·索南南杰以拉萨红山（布达拉山）的相传是松赞干布从印度迎请来的洛格夏惹观音像为礼品，请蒙古喀尔喀部确科尔兄弟派兵进藏，确科尔兄弟率兵3000到拉萨，帮助格鲁派和吉雪巴攻打第悉藏巴在拉萨地区的军队，前藏反第悉藏巴的势力又有所抬头。

土马年（公元1618年　明万历四十六年　清天命万年）五世达赖喇嘛2岁

闰三月　绛巴仁增阿旺曲嘉丹贝坚赞为五世达赖喇嘛做了许多加持法事。

七月　第悉藏巴的军队1万余人经堆龙河谷反攻到拉萨，击败喀尔喀部确科尔的军队，攻下色拉、哲蚌寺，杀死格鲁派僧俗5000余人，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避往阿里扎仓。后经达垄寺活佛阿旺南杰调解，允许色拉、哲蚌寺僧人回寺，但要交纳大量罚金。第悉藏巴分兵攻前藏各地，惩罚起事反抗的各僧俗势力。

土羊年（公元1619年　明万历四十七年　清天命四年）五世达赖喇嘛3岁

雅郊地方格鲁派帕德寺的僧人因受第悉藏巴的惩罚，离寺出走。帕德寺部分僧人到琼结后，与琼结内部反第悉藏巴的人结合，声言要清除在琼结的第悉藏巴的内奸（指五世达赖喇嘛的母亲），使琼结发生内乱。贡噶拉则闻讯后，携五世达赖喇嘛与几名侍从连夜逃离秦瓦达孜，躲过追捕的人，先到德吉林寺躲避，后按第悉藏巴的指示，到贡噶附近的曲布拉雄居住。

琼结动乱时都杜饶丹在雅拉香波朝山，闻讯后亦逃离琼结，来到曲布拉雄。都杜饶丹原先受第悉藏巴信任，后因与第巴古拉巴结为知己，使第悉藏巴产生猜疑，他在贡噶时打算到多康地区去，被第悉藏巴禁止，不久按第悉藏巴的命令单独前去桑珠孜，受到软禁。

贡噶拉则母子住在曲布拉雄期间，开始出现都杜饶丹之子应是某个活佛的转世的议论。有的人说应是贾曹仲巴活佛（噶玛噶举派楚布寺的活佛）的转世，有的人说应是喇嘛拉孜哇（主巴噶举派）的转世。当哲蚌寺吉索派人到桑耶寺向护法神禀告土马年战乱情况并请求预言时，护法暗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应出在雅隆的一个官府家，因此贡噶拉则的多数侍从又到处宣扬贡噶拉则的儿子可能是哲蚌寺活佛（即达赖喇嘛）的转世。这些传言立即引起第悉藏巴的注意，从桑珠孜派人前来命令贡噶拉则母子迁到桑珠孜居住，以便监视。由于都杜饶丹在桑珠孜已被软禁，贡噶拉则不愿前往，派人向浪卡子娘家求助，由浪卡子家族首领出面担保贡噶拉则到浪卡子居住，才获第悉藏巴准许。贡噶拉则母子于藏历十一月下旬迁到浪卡子地方居住。

此年中，哲蚌寺的强佐索南饶丹（又名索南群培，曾任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声称要去曲科杰寺发掘前辈达赖喇嘛的秘密仓库，以缴纳第悉藏巴对哲蚌寺的罚金，获第悉藏巴允准，并派人随同前往监视。途中索南饶丹摆脱第悉藏巴的使者潜逃，经工布、那雪前往青海，向在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请求发兵进藏帮助格鲁派。

铁猴年（公元1620年　明泰昌元年　清天命五年）五世达赖喇嘛4岁

五世达赖喇嘛在浪卡子舅父家居住，深得舅父喜爱，与舅父的两个儿子同坐同行，没有什么分别。其间曾到过邬金措莫宗豁，虽见过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但是与第悉藏巴没有什么交往。据《云裳》记载，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常在舅父家里举行供祀仪式，念诵片段偈语，模仿僧人动作，以为游戏，对各教派的区别并不了解，也谈不上崇敬某一教派。他喜欢听人讲故事，也喜欢印度人的语言。

本年秋末，应索南饶丹的请求，青海蒙古首领拉尊罗桑丹增嘉措和古如洪台吉二人率领大军抵达藏北。第悉藏巴严令四世班禅前去调解劝阻，四世班禅经拉萨到达当雄，暂时劝止了蒙古人的进军，然后返回拉萨，在哲蚌寺修缮了三世达赖喇嘛的银质灵塔，以求好的缘起，并在哲蚌、色拉寺传法。

铁鸡年（公元1621年　明启元年　清天命六年）五世达赖喇嘛5岁

在索南饶丹和吉雪巴等人的请求下，蒙古军向拉萨进发。七月初，蒙古军和第悉藏巴的军队在拉萨西面的江塘岗开战。十一日，蒙古骑兵冲击后藏军队的营地，杀数百人，后藏军队

大败，逃往药王山，七千多人被蒙古军围困。当时四世班禅正在哲蚌寺闭关静修，听到开战的消息后，立即出定，徒步赶去调解，在蒙古军火枪、飞箭齐发，骑兵准备再次冲锋时，四世班禅向拉尊呈献重礼，劝阻了蒙古军的进攻。由于蒙古军的这次胜利，迫使第悉藏巴派代表在四世班禅、甘丹赤巴楚臣群培、林麦夏仲官却群培、达垄寺活佛的居间调停下与蒙古军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定第悉藏巴归还以前夺去的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寺属庄园，恢复格鲁派在前后藏被迫改宗的寺院和庄园，拉萨大昭寺由四世班禅派人管理，将拉萨西面的德庆宗和北面的澎波地方交第巴吉雪巴管辖。

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协议使格鲁派及其支持者恢复了在拉萨地区的地位，加上第悉藏巴彭措南杰在这一年去世（一说退位隐居到寺院），便使不准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禁令作废，四世班禅和索南饶丹等格鲁派上层人士立即着手寻访和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当时灵童的人选有雅隆地区曲嘉颇章的意云诺布、格卡萨地方拉拉阿嘉的儿子、娘布地区的一个幼童和都杜饶丹的儿子。经四世班禅和林麦夏仲官却群培商议决定，前往拉萨以北的热振寺，在文殊菩萨的佛像前陈设糌粑丸子抽选，结果抽中了都杜饶丹的儿子。

转世灵童抽定后，即由四世班禅主持，哲蚌寺甘丹颇章派遣察哇噶居巴·桑杰喜饶为代表，与拉尊的代表达玛库雅台吉、古如洪台吉的代表卓尼曲杰金巴达吉（公元1547—1614年，甘肃卓尼藏族人，早年入藏学经，受四世达赖喇嘛派遣与强巴活佛、东科尔活佛一起到喀尔喀传教，此时是随蒙古军入藏）等人一同前往桑珠孜向第悉藏巴禀报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众使者路过浪卡子时，向五世达赖喇嘛的舅父说明情况，并要求他负责转世灵童的安全，并且照顾好灵童的饮食起居，

保证其身体健康。

使者到达桑珠孜时，刚继位的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只有16岁，威权未立，主要由其内臣仲尼旺宫瓦和外臣岗苏克2人管事。第悉藏巴批准了达赖喇嘛转世，但旺宫瓦和岗苏克提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不应去前藏哲蚌寺，现今扎什伦布寺学风兴盛，灵童可以在扎什伦布拜班禅为师出家学经，在学业完成以前还是以居住在扎什伦布寺为好，费用可以由第悉藏巴方面提供，灵童第一次到桑珠孜时可以隆重欢迎，比照噶玛巴活佛光临的例子款待。察哇噶举巴则坚持灵童应迎请到哲蚌寺居住学经，可以请班禅到拉萨为灵童剃度传法，并以达玛库雅台吉等率兵驻扎在达那，如不允准灵童去拉萨将不利于后藏相威胁。支持第悉藏巴的宗教首领意见也不统一，在藏北羊八井的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担心灵童到拉萨对其不利，派其管家赶到桑珠孜，鼓动将灵童留在后藏，但后藏觉囊派的活佛等则担心达赖喇嘛的转世留在扎什伦布可能会成为第悉藏巴信奉的上师，影响他们的地位，主张让灵童到哲蚌寺去居住。经过一番争议，第悉藏巴最后决定允许迎请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去哲蚌寺居住，并派遣其代表洛库巴与察哇噶举巴一起到浪卡子办理灵童启程的有关事宜。

水狗年（公元1622年　明天启二年　清天命七年）五世达赖喇嘛6岁

察哇噶举巴等从桑珠孜到达浪卡子后，即为五世达赖喇嘛动身作准备，并很快起身。察哇噶举巴将前世达赖喇嘛用过的佛像和念珠混在别的佛像和念珠中让灵童辨认，灵童并没有认出，但是察哇噶举巴出门后称灵童完全认出了前世的物品，是完全可信的转世。后来当五世达赖喇嘛学经不用功时，他就悔

恨地说："那时你并没有认出前辈的用品。"到临行前一天，舅父家为灵童沐浴，戴上银盾、耳环等饰品，穿上用羊羔皮里子和汉地所产绿色布料做面子的蒙古式皮袄，认为这样才像地方首领家出身的公子。舅父对他说："在哲蚌寺中生活很幸福，地位崇高，去了会很好的，要努力学习知识。"母亲则因儿子要离去而十分伤心，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发时浪卡子地方的许多人前来送行。走了一天后，灵童因不见家人而闷闷不乐，察哇噶居巴又派人去把保姆叫来，灵童才变得高兴一些。

转世灵童一行越岗巴拉山行抵拉萨附近的聂塘地方时，受到以索南饶丹为首的色拉、哲蚌寺僧众和施主们的欢迎，他们向灵童呈献吉祥哈达作为见面礼。

二月二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抵达哲蚌寺，僧众出寺列队欢迎。迎入甘丹颇章的森穷恩噶（喜乐寝殿）后，僧俗信众纷纷前来请灵童摩顶加持。因为人多，其间稍一疏忽，灵童没有把手放到蒙古僧人根敦嘉措的头上，他以为是因为自己以前伤过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心又没有献礼请求宽恕的缘故，所以对灵童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笃信不疑，就悄然退出，并将此事四处向人讲说。

三月十八日，四世班禅在哲蚌寺甘丹颇章森穷恩噶殿剃度五世达赖喇嘛出家，起法名为罗桑嘉措。

几天以后，达赖喇嘛与蒙古拉尊会见时，拉尊说："我要在达赖喇嘛身边住一个晚上。"于是就睡在达赖喇嘛的身边。四世班禅只好不脱皮袍靠着坐了一夜，达赖喇嘛因为年幼，与平常一样入睡。达赖喇嘛的保姆随他到哲蚌寺，住了十几天后，因寺内不准饮酒，生活不习惯，故离开拉萨返回浪卡子。

吉雪夏仲阿贝是拉萨附近的一个地方首领，以前曾与四世达赖喇嘛有隔阂，又认为索南饶丹以前是自己的部下，如今地

位高于自己，心中不满。他希望格鲁派与第悉藏巴的矛盾加深，以便显示他和蒙古人关系的重要。出于这些考虑。他鼓动拉尊让达赖喇嘛前往青海蒙古地方。说：“如果现在能把达赖喇嘛接到蒙古去，火落赤（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一定会很高兴，对蒙古六大部落来说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因此拉尊和古如洪台吉不顾达赖喇嘛是否情愿，坚决要把他迎往青海。索南饶丹和察哇噶举巴不同意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五世达赖喇嘛自己也害怕去青海，甚至为此伤心落泪，但拉尊和古如洪台吉认为这是索南饶丹和察哇噶举巴教达赖喇嘛这样做的，仍坚持要达赖喇嘛前往。索南饶丹等希望四世班禅出面劝说蒙古人，但四世班禅也主张达赖喇嘛可以去青海而不愿出面。在这种情况下，索南饶丹和察哇噶举巴担心拉尊和古如洪台吉会以武力强行把五世达赖喇嘛带往青海，于是决定带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暂避一时。先由察哇噶举巴到德钦孜与当地首领岗钦鼐商议把灵童转移到艾日果地方的办法，又派遣颇拉岗巴为使者到后藏去向第悉藏巴说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原因。为秘密离开拉萨，决定把侍从达赖喇嘛的曲科林扎仓临时分开，索南饶丹于五月二十四日委任命桑仲热绛巴为30名僧人组成的随行的扎仓的洛本（讲经师）。五月二十五日晚上，五世达赖喇嘛一行秘密离开哲蚌寺，到黎明时已抵聂塘。二十六日抵达绒恰噶宗，在那里居住了两天，然后到艾日果曲宗，受到当地首领玛本巴·阿格旺秋的迎接和侍奉。在艾日果居住期间，五世达赖喇嘛以卓波朗巴格隆为老师，每天早、中、晚三次学习拼读和书写。其他时间玩耍。一个多月后学会了拼读，两个多月后即能念诵简单经文。此后不久每天记诵吉祥天女退敌朵玛酬补仪轨赞颂中的两首偈颂。

五世达赖喇嘛一行离开拉萨后的第三天，古如洪台吉和第

巴吉雪巴率领800名蒙古骑兵到了拉萨，可能是为了实行迎请达赖喇嘛去青海的计划，因达赖喇嘛、索南饶丹等人已离开拉萨，他们又不知其行踪，所以古如洪台吉没有做什么就返回藏北去了。后来知道达赖喇嘛住在山南艾日果曲宗后，拉尊派遣格隆丹达尔到艾日果去向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解释说，双方的福田施主关系应当密切，不愿因此事产生嫌隙。

索南饶丹等人为了减少第悉藏巴对达赖喇嘛在山南艾日果居住一事的猜疑，派人去请求第悉藏巴派代表前来察看。第悉藏巴派遣定本南喀周和喇嘛东嘎哇等人到艾日果。南喀周与索南饶丹私人关系密切，但喇嘛东嘎哇等人忠心于第悉藏巴，指派南喀周为监视人，不经过南喀周，索南饶丹等连一个字的书信也收不到，甚至一碗糌粑以上的物品出入也要经过检查。在被监视期间，琼结的日沃德庆寺派协本钦饶送来大量布施及藏、蒙各处平安的盖印文书，索南饶丹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因而欢喜接受。

水猪年（公元1623年　明天启三年　清天命八年）五世达赖喇嘛7岁

藏历新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艾日果度过。因为年幼没有参加庆祝新年的集会。后来众侍从议论说如能去参加献礼仪式将会是一个好的缘起，达赖喇嘛也为参加献礼做了准备，但因饮食不适嘴部肿痛，所以献礼也未去参加。艾、达布地区有许多人在新年期间前来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为其中的一百余名新出家的僧人剃度起名。因担心达赖喇嘛年幼记不住这么多名字，所以事先将名字写在许多纸条上，由达赖喇嘛一一分赐给众僧。

四月，五世达赖喇嘛一行离艾日果返拉萨。在绒拉甲村城

堡受到拉嘉里法王洛桑图多等人的欢迎。途中又在恰噶宗居留4天。在娘布渡口受到巴日扎仓全体僧众的迎送。途经泽当时受到山南地区僧俗大众和琼结宗本觉莫宗巴·诺贝彭措等人的欢迎和款待。途中又遇第巴吉雪巴与第悉藏巴的军队开战，故五世达赖喇嘛绕道伦珠拉孜、止那等地返回哲蚌寺。

木鼠年（公元1624年　明天启四年　清天命九年）五世达赖喇嘛8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参加哲蚌寺盘德勒雪林扎仓僧人举行的敬神酬补仪式。登上僧众座次的首座，与哲蚌寺各扎仓的执事僧、高僧等人交谈。

三月十一日，五世达赖喇嘛离开哲蚌寺前往位于山南桑日县的二世达赖喇嘛创建的曲科杰寺巡礼。从哲蚌寺出发时按照惯例以执事、侍从、旗幡、器乐为前导。行抵拉萨城区后住在秀波郭那夏巴家，然后朝礼大昭寺各殿堂。在绕行大昭寺外围巡礼路时，有一头骡子受惊，从达赖喇嘛右边冲撞而过。一些人说这是不祥之兆，应作法事禳解，一些人说这是吉祥天女（藏传佛教的吉祥天女像是忿怒女神骑一头骡子，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保护神）环护的吉兆。五世达赖喇嘛觉得这只是骡子受惊吓，无所谓吉凶之兆。次日五世达赖喇嘛在拉洞渡口过拉萨河，行至桑阿喀寺受到当地僧俗大众的欢迎。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森本仲措仁增向五世达赖喇嘛献了一尊金刚手菩萨铜像。行抵甘丹雪（甘丹寺的山下面）时，受到甘丹寺法台甘丹赤巴扎巴嘉措等的欢迎。五世达赖喇嘛前行到嘉玛农达地方时，住在一所只有门和天窗而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一些人说这是比丘不能住的，算什么寝舍，达赖喇嘛开玩笑说，这样倒不必担心山上滚石砸到身上。此后达赖喇嘛又经嘉德寺、仁钦

林、如托等地到达沃喀地方的精奇寺（宗喀巴早期曾多次在该寺修行），受到以林麦夏仲官却群培为首的僧众的欢迎。住在精奇寺的5天当中，当地僧俗以牧民的食品招待赠礼，沃喀宗各寺庙的庙祝为五世达赖喇嘛举行了盛大的初十日跳神活动（按宁玛派传统在每月初十和二十五日举行的跳神仪式），沃喀宗本都迥吉浦巴也前来拜会。林麦夏仲等人与达赖喇嘛一起从精奇寺前往曲科杰寺朝礼。

在曲科杰寺，达赖喇嘛巡礼了各佛殿和护法神殿，并从林麦夏仲听受了格鲁派的大威德十三尊灌顶法和退敌天女修行法的随许等。五世达赖喇嘛受到曲科杰寺僧众的热情款待，达布和娘布地区的许多施主和僧人也赶来拜见。

五月，达赖喇嘛一行从曲科杰寺经墨竹工卡返回拉萨，又在色拉寺停留了5天，受到色拉寺三大扎仓和各个康村的欢迎和款待。还接受色拉寺各扎仓和康村赠送的大量礼品，色拉寺附近的帕旺喀寺的活佛亦备果品等前来会见。

当年冬末，三世达赖喇嘛在呼和浩特创建的格鲁派大寺的住持夏仲强巴活佛率僧徒一百余人在拉尊和古如洪台吉的五百骑兵的陪护下抵达拉萨。第悉藏巴虽然认为夏仲强巴是宗教上的贵客，但对蒙古骑兵的到来感到忧虑，第悉藏巴发给索南饶丹一份盖印的信件，信中说“希望他们是为善业而来的贵客，会受到教化，但必须警惕土默特军兵不怀好意”。夏仲强巴在哲蚌寺广场上举行僧众大会，会场中央陈设雕刻精美的嵌有珍珠的木质宝座，树立用蒙古绸缎绣成的伞盖，迎请达赖喇嘛登上宝座，赠送了绸缎、金银、乐器、瓷器、珊瑚树以及汉地的珍奇物品等，并向僧众发放布施。达赖喇嘛说这座珍珠木宝座、伞盖都是汉地制造的价值连城的宝物，但众人不知其价值，竟拆散瓜分。此后的四十多天里，呼和浩特来的僧人们每

天两次或者三次在哲蚌寺发放斋僧茶饭、哈达、绸布、茶叶、银两等布施。还有一些蒙古人轮番到后藏第悉藏巴那里，向他赠送见面礼品和缎匹等。在他们的迎请下，四世班禅年底从扎什伦布启程前往拉萨。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会见时的礼仪问题，索南饶丹等人商议，说按理应在缎面坐垫上相互致礼，但也可以实际上不还礼。索南饶丹要五世达赖喇嘛看他的手指头是伸直还是弯曲行事。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会见时，五世达赖喇嘛本想向班禅大师敬礼，但是看到索南饶丹的手势，就没有敬礼，只是对四世班禅的到来口头上表示谢意。

木牛年（公元1625年　明天启五年　清天命十年）五世达赖喇嘛9岁

在哲蚌寺按照惯例庆贺新年后，达赖喇嘛到拉萨城里参加格鲁派的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住宿在昂巴努巴瓦家中。本年的祈愿大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达赖喇嘛由于年幼，只听了几次说法和祈愿，就再没有去参加。法会会场中并排设三个宝座，达赖喇嘛的座位居中，南面是四世班禅，北面是呼和浩特的夏仲强巴活佛。参加法会的还有林麦夏仲、森康贡活佛和各寺的执事、僧人，共五千余人。法会期间达赖喇嘛还朝礼大昭寺觉卧佛像、观音菩萨像等。祈愿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从拉萨返回哲蚌寺。

二月三日，在哲蚌寺的森穷恩噶寝殿中，由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任堪布（亲教师）、林麦夏仲嘉央官却群培任轨范师、郭莽扎仓掌堂师桑结扎西任报时师，给五世达赖喇嘛传授了沙弥戒。四世班禅给五世达赖喇嘛和夏仲强巴活佛传授了密集不动金刚灌顶法、长寿灌顶法和六臂依怙随许法等。此外，四世班禅还给夏仲强巴活佛传授了比丘戒。

夏仲强巴活佛离拉萨返回蒙古时，达赖喇嘛按西藏的礼节给他赠送了佛画、佛像、珊瑚、氆氇、红糖、大米等物品。在按照索南饶丹教给的话对夏仲强巴说："要在蒙古地方弘扬教法"时，因年幼紧张，一开口就说成了"要利益糌粑（糌粑为炒面，在藏语中教法和糌粑两个词的读音接近）"。夏仲强巴活佛说"这是因为年幼，我知道你要说的是利益教法。"

在夏秋两季，达赖喇嘛学习念诵噶当派（格鲁派认为自己是继承和发展噶当派的教法传承）的主要典籍《噶当书》（噶当派祖师印度高僧阿底峡及其弟子、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等人讲论佛法的记录），大致了解了噶当派的历史。

冬季，蒙古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济哝王之子图巴台吉和夏仲强巴等僧人从北路到达拉萨，昌都的帕巴拉活佛从南路到达拉萨。图巴台吉请求为了众生举行上师瑜伽和"丹巴玛"等修法仪轨，达赖喇嘛为他念诵了上师瑜伽中的偈语。帕巴拉活佛向达赖喇嘛献了马骡、茶叶等物品。

图巴台吉等人将达赖喇嘛请到拉萨，召集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隆重集会，举行上师瑜伽、丹巴玛修行仪轨和回向法事。图巴台吉向僧众布施以金银、绸缎为主的数以万计的蒙古和汉地出产的物品。图巴台吉的近亲、僧人达温岱青曲杰布施了数以千计的物品，扎仓曲杰和达尔罕安木齐布施了数以百计的物品，车臣曲杰布施了 30 件物品。图巴台吉还邀请达赖喇嘛到他们在拉萨住宿的罗若瓦欧珠的家中，按蒙古习俗设宴招待。并赠送了皮袍等礼品。

土默特部首领温布洪台吉（疑即俺答汗的曾孙鄂木布楚琥尔）派遣乌勒齐特囊索、多果温穷、塔布囊 3 人到哲蚌寺奉献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修建银质灵塔的资金，他们呈献了可给上千人熬茶的大铜锅以及白银近千两、绸缎、黄金、珠宝等

物品。随即由察哇噶举巴、温布绛巴负责，由活佛贵杰多吉任设计，由诺布扎西等15名尼泊尔工匠组成建造云丹嘉措的银质灵塔的作坊。达赖喇嘛在此期间向图巴台吉等人传授了从林麦夏仲那里学来的简略的长寿灌顶法，并在冬末阅读一部讲述吐蕃王朝时代西藏传播佛法的印度高僧莲花生历史事迹的手抄本《玛呢遗教》。

火虎年（公元1626年　明天启六年　清天命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10岁

在哲蚌寺庆贺新年后，图巴台吉等蒙古施主请求达赖喇嘛去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达赖喇嘛未去，给土默特部的代表们传授了六臂依怙随许法，给扎仓曲杰索南扎西传授了白色文殊随许法。本年的祈愿大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

二月，四世达赖喇嘛的银质灵塔建成，由林麦夏仲嘉央官却群培等人装藏，班禅大师主持开光仪式，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堪布和僧人等参加念诵经咒。因图巴台吉的请求，五世达赖喇嘛前去参加了灵塔开光仪式。

图巴台吉等人又提出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方去，达赖喇嘛回想起几年前拉尊和古如洪台吉要求他去蒙古时的情形，不禁伤心落泪。蒙古僧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五世赖喇嘛回忆起三世达赖喇嘛和俺答汗的会见的缘故，又有人说这是五世达赖喇嘛预见到图巴台吉等人返回土默特时土默特部被察哈尔林丹汗攻灭的缘故。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四月，图巴台吉一行动身返回蒙古，行前达赖喇嘛在甘丹颇章的大厅中为他们饯行，并按他们各人身份高低分别赠送了珊瑚、琥珀、氆氇等礼物。图巴台吉赠给五世达赖喇嘛以“达

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的尊号。按照扎仓曲杰的报请，由索南饶丹安排，五世达赖喇嘛赠给图巴台吉“岱松洪台吉”称号，给随行的蒙古高僧和贵族也分别赠给称号，并按蒙古习俗令译师高声宣读这些新赠的称号。帕巴拉活佛离开拉萨之前，也在甘丹颇章举行排座集会为其送行，五世达赖喇嘛向帕巴拉活佛回赠了礼品。

本年中，由林麦夏仲给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讲授弥勒五论之一的《现观庄严论》，并由一名比丘专门督促背诵偈句。又由格隆尊追诺布给达赖喇嘛讲授声明和鼓谱。当年拉萨地区疹子流行，达赖喇嘛在去都哇苏康处熬茶时染病，二十多天卧床不起。经医师仲措坚叶巴等人治疗，病情好转。达赖喇嘛痊愈后举行了“八法酬补仪轨”，感谢神灵。此后又阅读了《贤愚因缘经》和《报恩经》。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提到该年中有一位夏仲在后藏去世，消息传来，索南饶丹在附近各寺院中悄悄举行悼念活动。那位夏仲的遗体被弃置于桑喀宗，被琼结地方的一位得道者运回琼结。夏格巴《西藏政治史》认为这里所说的夏仲即是被第悉藏巴监禁在后藏的五世达赖喇嘛的父亲霍尔·都杜饶丹。第悉桑结嘉措《黄琉璃》中也有类似说法。

藏历第十一饶迥火兔年（公元 1627 年　明天启七年　清太宗天聪元年）五世达赖喇嘛 11 岁

本年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由甘丹赤巴嘉央官却群培（即林麦夏仲）主持。法会结束后，他到哲蚌寺，与索南饶丹、察哇噶居巴商议，决定让达赖喇嘛学习因明学。五世达赖喇嘛自己当时很想学习密法的经咒和仪轨，但是不由自主，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学经。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由林麦夏仲给他讲授了许多因明方面的重要偈颂。在察哇噶举巴的帮助下，达赖喇嘛

每天深更半夜反复诵习，刻苦强记。一个月后，又从曲科杰寺召来几名僧人在达赖喇嘛身前辩论所习偈颂的义理，让达赖喇嘛仔细思考。从三月起，每天下午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给达赖喇嘛讲授《三十三本生经》、《噶当书》，直到夏季。

从五月起，由噶举巴洛色和嘉拉哇扎西嘉措等担任达赖喇嘛的伴读。达赖喇嘛在学习时只穿披单，自带茶碗，与阿旺扎西、罗桑班觉、阿旺格勒、达东群则、夏康活佛等僧人席地而坐，一同学习教理和进行辩论，与学经僧人毫无差别。

秋天，由曲科杰寺堪布桑仲热绛巴给达赖喇嘛讲授佛法，由扎西嘉措进行辅导。

土龙年（公元1628年 明思宗崇祯元年 清太宗天聪二年）五世达赖喇嘛12岁

一月四日，四世班禅从日喀则到拉萨，主持本年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

二月，四世班禅被迎请到哲蚌寺甘丹颇章，每天下午给达赖喇嘛讲授佛法，内容有《修习百法》、《纳塘百法》、各种常用的随许法，文殊菩萨的内、外、密三种灌顶法和白色胜乐长寿灌顶法等。另外还传授了金刚手菩萨、马头明王修习法以及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部分著作。由于达赖喇嘛学习时专心致志，毫无倦怠，四世班禅大为高兴。一个多月后，四世班禅动身返回扎什伦布。在索南饶丹的主持下，利用上年土默特图巴台吉捐赠的资金重新修建了哲蚌寺的大经堂，由拉萨各寺院及寺属庄园派人出力，到本年二月大经堂建成竣工，达赖喇嘛亦常到大殿中明亮的居室中进行修习。

春天，达赖喇嘛的母亲从浪卡子前来拉萨，此时恰值五世达赖喇嘛右眼患病，经医师坚叶仲措哇医治，吃药诵咒均无济

于事，后经医生噶仲巴巴本桑用油煎的药剂治好了眼病。但达赖喇嘛每次与母亲相见时眼病又复发，似乎有魔鬼作祟，因此在母亲居留拉萨的三个多月中，达赖喇嘛与母亲只见了三次面。

四世班禅指示说，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大喇嘛，只要通晓经义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辩，学习辩经。因此达赖喇嘛向甘丹赤巴林麦夏仲请求，除讲授大乘菩萨的十地五道的内容外，不必详细讲授因明学。按此请求，在秋季法会上，甘丹赤巴给达赖喇嘛讲授了色拉寺杰扎仓所传习的《现观庄严论》的总义。此后由索南饶丹用讲解经义的办法给达赖喇嘛传授了色拉寺杰扎仓所习《波罗蜜多宝鬘》。

十月，达赖喇嘛按索南饶丹和察哇噶举巴的要求，每天晚上一边修证，一边念诵马头明王咒 2000 多遍。在一个半月中，达赖喇嘛曾多次梦见在一间大佛殿中朝拜一尊高达两层楼的马头明王像。冬季法会结束时，与五世达赖喇嘛同样出身于琼结家族的主巴噶举派的活佛布桑旺波来到拉萨，五世达赖喇嘛和他互相拜会宴请。表面上一团和气。

本年二月和九月，清太宗皇太极联合归附后金的部分蒙古台吉、贵族，两次兴兵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林丹汗也兴兵攻打归顺皇太极的喀喇沁、阿鲁科尔沁等蒙古部落，漠南蒙古内部和蒙古与后金之间的战乱更为剧烈。

土蛇年（公元 1629 年　明崇祯二年　清天聪三年）五世达赖喇嘛 13 岁

在哲蚌寺庆贺新年后，达赖喇嘛在元月份应邀到拉萨附近的娘占仲麦巴家族的私人庄园中做客，受到殷勤招待，并得到丰厚的馈赠，还在庄园中住宿一夜。这是五世达赖喇嘛与仲麦

巴家族交往的开始。接着达赖喇嘛到色拉寺，在第一期春季经会上学习了《现观庄严论》第二品及第四品的内容，还受到色拉寺各个扎仓和康村的款待。来自康区昌都的商人阿布恰等在色拉寺的僧众大会上向达赖喇嘛呈献了茶叶、马匹、铠甲、犏牛等上百种礼品。由于皇太极、林丹汗之间的战乱波及到河套、青海，从青海入藏的道路不安全，蒙古土默特部的达温达尔罕曲杰和扎尼温穷经过汉地的驿路到打箭炉（今四川甘孜州康定），再经过康区到拉萨。二月，达温达尔罕曲杰在色拉寺僧众集会上向达赖喇嘛献礼，并捐赠黄金百两、每包六封的茯茶100包，作为建造哲蚌寺金顶的基金。按照甘丹赤巴林麦夏仲的指教，五世达赖喇嘛给达温达尔罕曲杰和扎尼温穷传授了密宗事部三怙主、忿怒明王、救度母等几种随许法。五世达赖喇嘛等人在色拉寺停留到二月底，才返回返蚌寺。

夏天，四世班禅在途经拉萨时到哲蚌寺停留3天，为达赖喇嘛传授了大密忿怒马头明王随许法。六月间，达赖喇嘛到拉萨北郊的格培寺进行夏季观想，熟读经文。秋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跟从林麦夏仲学习《现观庄严论疏》及有关律学的著作。昌都地区的阿旺活佛及其索本堪布到哲蚌寺，在僧众大会上向达赖喇嘛奉献大批礼物，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及六臂怙主、密宗事部三怙主等修习随许法。秋末，达赖喇嘛到拉萨东北的静修圣地帕邦喀巡礼。冬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跟从林麦夏仲继续学习《现观庄严论疏》，并开始学习《俱舍论》的内容。

铁马年（公元1630年　明崇祯三年　清天聪四年）五世达赖喇嘛14岁

本年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主持。达赖

喇嘛在春季跟从林麦夏仲学习哲蚌寺僧人达木曲贝所著的《了义不了义智慧唯识宗圆满法》，并与哲蚌寺洛色林、郭莽等扎仓的学问僧讨论经典理义，还参加了森康贡活佛与色拉寺杰扎仓卸任堪布强巴默朗举行的辩论经典的活动。对于达赖喇嘛学经的方法，格鲁派僧人中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应像学问僧一样先学推理和辩论，有的主张在显宗方面只要熟读格鲁派五部大论即可，不必从事繁复的辩论经典和逻辑推理，有的主张应尽快开始学习密宗。本年里桑仲热绛巴提出，达赖喇嘛应入拉萨上密院去学习密宗，遭到索南饶丹的拒绝。达赖喇嘛本人逐渐对因明和辩论感到兴趣，开始与一些僧人模拟起座对辩《释量论》的内容。索南饶丹还安排仲译阿旺格勒给达赖喇嘛教授藏文书法，但达赖喇嘛认为自己不可能为人写字而度过一生，以后如需要可以由书写者代劳，因此学习几天后即将学习书法之事弃置不顾。

七月十四日，五世达赖喇嘛因觉摩隆寺吉索的邀请，与林麦夏仲一起去该寺巡礼。在寺内停留的四天中，达赖喇嘛为僧众念诵了《本生经》、《噶当书》等。在诵经时有花雨从天而降（指下雪），参加聚会的人认为这是《噶当书》赐予的重要加持。夏末，以达扎济咙活佛为首的许多藏南的香客到达哲蚌寺，向达赖喇嘛敬献了茶叶、铠甲、马牛等大量礼品。八月，达赖喇嘛与二十多名僧人一起闭门学习中观应成派和自续派的见地。

九月二十日，达赖喇嘛和林麦夏仲应甘丹寺僧众的邀请从哲蚌寺启程前往甘丹寺巡礼。次日抵达甘丹寺时，受到近千名僧人列队欢迎。

达赖喇嘛在住宿在甘丹赤巴的居室中，在 14 天中达赖喇嘛多次瞻礼甘丹寺的宗喀巴银质灵塔及历任甘丹赤巴的灵塔、

佛殿、佛像等，并登上宗喀巴大师的银质法座，向僧俗大众念诵了五叶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甘丹寺各扎仓、康村及吉哇轮流设宴款待达赖喇嘛一行。

在从甘丹寺返回的途中，有巴达霍尔人的使者前来，请求达赖喇嘛为他们被马踢死的首领官其克做回向送名法事。达赖喇嘛做了回向，但不知怎样送名，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完成，便由夏拉霍尔（似指裕固人）的囊索向达赖喇嘛奉献了一块非常珍奇的宝石。达赖喇嘛在桑阿喀寺居住了两天后，经拉萨返回哲蚌寺。

十二月初，青海隆务地区的格尔迪活佛和昂秀活佛到达哲蚌寺。索南饶丹安排达赖喇嘛参加下年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因此由林麦夏仲向达赖喇嘛详细讲解了《本生经》以及在僧俗大众面前讲经说法的规则及注意事项。达赖喇嘛还前去观看了哲蚌寺僧人考取“林塞”（格西学位的一种的辩经，抓紧背诵经文，为参加祈愿大法会做各方面的准备了。

此时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攻破土默特等部，以蒙古各部的大汗自居，为图集中蒙古各部力量与后金对抗。在宗教上林丹汗与格鲁派有联系，与噶玛噶举派也有联系，他将格鲁派在呼和浩特的迈达里诺门罕（似即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的夏仲强巴活佛）、卓尼曲杰等僧人迎请到他在巴林部兴建的察汉浩特，又奉噶玛噶举派的沙尔巴呼图克图为上师，自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并在1628年、1629年召集僧人、译师30余人，校订整理前人蒙译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的部分经典的译文，补译缺译部分，泥金抄写《甘珠尔》蒙译本108函，又在察汉浩特修建藏传佛教的金顶白庙。由于采取了这些办法，林丹汗对抗后金的事业得到一些蒙古族佛教僧人的支持。当年，在拉萨的土默特王族出身的达温达尔罕曲杰对索南饶

丹、甘丹赤巴林麦夏仲和达赖喇嘛说："蒙古各部落都已被察哈尔王所征服，如果他派人前来迎请（达赖喇嘛），还是前去为好。"并请求达赖喇嘛对此做好准备。五世达赖喇嘛并不愿意去蒙古，而是对以前一些高僧到印度去求学的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效仿他们到印度去求法，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成行，去印度的念头也就渐渐消失了。

铁羊年（公元 1631 年　明崇祯四年　清天聪五年）五世达赖喇嘛 15 岁

在哲蚌寺庆贺藏历新年后，达赖喇嘛和林麦夏仲一起到拉萨参加正月祈愿大法会。法会的前两天（初三、初四），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主持，在大昭寺举行说法和祈愿活动。第三天（初五）由达赖喇嘛效仿甘丹赤巴主持法会，这是五世达赖喇嘛首次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他的侍从和助手都很担心，唯恐他背诵不全经文，但是一切都很顺利。从第四天开始由达赖喇嘛和林麦夏仲轮流在大昭寺内做祈祷法事，瞻礼大昭寺内的觉卧佛像，向神像呈献各种供养。春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跟从林麦夏仲学习《现观庄严论》第五品及《入行论疏》。四月初，山南地区的首领第巴嘉日哇派使者才旺达结到哲蚌寺迎请达赖喇嘛，因此达赖喇嘛带领侍从仪仗于五月十一日从哲蚌寺出发。在抵达曲隆那喀地方时，因当年大旱，索南饶丹说应该求神降雨，因此达赖喇嘛将三世达赖喇嘛传下来的从金刚长寿岩请来的金刚橛带到河边进行洗浴，以求降雨。当晚该地果然降了一场大雨。此后抵达哲蚌寺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属寺朵噶丹南杰寺时，因同行的许多人患了病，停留了两天。行至鲁康渡口时，赞普后裔罗桑图多法王及其属下穿着古代藏族的盛装前来迎接。达赖喇嘛一行在僧俗人众列队欢迎下抵达恰噶宗，

罗桑图多法王与达赖喇嘛在第三级石阶上互相敬献哈达。此后达赖喇嘛前往日果曲宗，当地首领到城堡外一站之地设灶郊迎，艾地区的七座寺院的僧人列队迎接。达赖喇嘛下榻于扎西同曼的达波扎仓的经堂里。达赖喇嘛在此居住了一个半月，多次给当地僧俗首领传授长寿灌顶及马头明王、白度母、六臂依怙的随许法等，并参加了达波扎仓的僧人的夏季法会。在达波扎仓的僧众大会上，寺院的索本向达赖喇嘛赠送黄金十两和马匹、酥油等大量礼品，达赖喇嘛为上万僧俗传授了长寿灌顶法。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达波、涅地区的部落首领及宁玛派、噶玛噶举派、主巴噶举派的僧人和信徒。此后达赖喇嘛一行经过洛、拉嘉里、绒恰噶等地，从鲁康渡雅鲁藏布江前往仁钦岗朝拜，在仁钦岗的温泉边居住四天，又经曲隆到达曲科杰寺，受到僧众的夹道欢迎，各扎仓都设宴款待。达赖喇嘛朝拜了曲科杰寺山脚下的护法殿，并增添驱魔食子，供养护法神。达赖喇嘛还去朝拜了曲科杰寺附近的神湖，观看湖中幻景。据称当时在观世音菩萨湖中出现了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和拉萨的全景，使在场的人大为惊奇。离开曲科杰寺后，达赖喇嘛一行在精奇寺停留四天。因此时盛传有大批蒙古人到达藏北，第悉藏巴深感不安，几次派人给索南饶丹送来书信，因此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匆忙结束在山南地区的巡游，沿雅鲁藏布江北岸上行至桑耶寺，朝礼桑耶寺大神殿。后又从桑耶经过松喀香仲，翻过色山，于九月十日返抵拉萨。在拉洞渡口过拉萨河时，达赖喇嘛受到以温萨·桑杰益西的转世为首的二百多名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僧俗人众的欢迎。达赖喇嘛在拉萨下榻于果那夏寓所，随即会见以温萨活佛为首的蒙古人等。晚上初更时分，达赖喇嘛前去朝礼大昭寺各个殿堂，向吉祥天女像供献了灯具。次日达赖喇嘛一行从拉萨返回哲蚌寺。

当时，陆续到达藏北当雄的蒙古人有：以阿克岱青为首的近千名喀尔喀人，以墨尔根诺颜为首的三百多名厄鲁特人，拉尊和古如洪台吉率领的护送卓尼曲杰和扎德曲果安木齐进藏的三百多名土默特人。这些蒙古僧俗首领都与格鲁派有关系。其中的高贵者被安排住在哲蚌寺甘丹颇章的大殿里，并按蒙古人的风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阿克岱青每次出行都由许多喀尔喀军兵簇拥，如临阵迎敌，显示军威。厄鲁特人穿着西藏人以前没有见过的衣袍，使拉萨人惊讶地议论："好似白头人（指中亚缠白色头巾的穆斯林）的服饰。"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后，多次被蒙古人请到僧众集会上，主持发放布施，并得到大量的礼物。不久，青海蒙古信奉的察罕诺门罕及其徒众也来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献了上万件礼品。卓尼曲杰和扎德安木齐将达赖喇嘛迎请到色拉寺，在寺中石板广场向达赖喇嘛呈献成千上万的礼品。达赖喇嘛向僧俗大众讲授了长寿灌顶法。喀尔喀的阿克岱青和厄鲁特的墨尔根诺颜通过车臣曲杰翻译，当面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地区去。十二月，达赖喇嘛给阿克岱青传授了十一面观音随许法。

水猴年（公元 1632 年　明崇祯四年　清天聪五年）五世达赖喇嘛 16 岁

本年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达赖喇嘛因哲蚌寺住有许多蒙古客人而未去拉萨。二月间，蒙古客人离哲蚌寺返回藏北，四世班禅应邀到哲蚌寺居住二十多天，为达赖喇嘛传授喜金刚灌顶法、二世达赖喇嘛的著作等。

三月，甘丹赤巴林麦夏仲到哲蚌寺，为达赖喇嘛讲授《入中论注疏》、《俱舍论注疏》等，直到秋天。这期间由罗桑曲扎、扎西坚赞、扎西顿珠、扎西班觉等人担任达赖喇嘛的伴

读。四月清太宗第三次兴兵远征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战败，率部众10万西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撤至甘肃大草滩永固城一带，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为后金所有。当时在藏北的阿克岱青带领的蒙古兵击败藏北的霍尔部落，威胁到后藏北部地区。第悉藏巴对此大为惊恐，准备召集前后藏的军队与之对抗，同时下令要格鲁派的四世班禅和索南饶丹到藏北的蒙古人中间去调解争端。四世班禅和索南饶丹先后去藏北，经过劝说，阿克岱青等蒙古人退回到原先所在的地方，使第悉藏巴解除了忧虑，改善了第悉藏巴与格鲁派的关系。但是在四世班禅等人去藏北调解、后藏军队开近当雄时，拉萨盛传后藏军队要攻打色拉寺和哲蚌寺，达赖喇嘛手下的一些人急忙隐藏和转移寺院的财宝，结果是一场虚惊。

九月，在迎立五世达赖喇嘛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察哇噶举巴病故，负责达赖喇嘛各种活动和哲蚌寺行政事务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索南饶丹手中。索南饶丹调换了达赖喇嘛学经的伴读人员，指定仲麦巴·赤列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固定的助伴，这成为仲麦巴家族在格鲁派中举盛发达的开端。由索南饶丹安排，达赖喇嘛等人为察哇噶举巴诵经超度。达赖喇嘛又拜喀仲群则为师，学习书写来往应酬信函等。

秋末，又有蒙古永谢卜部四子王部落的一些人因反对林丹汗失败而移牧藏北，其中信奉华热达垄寺的首领喇嘛扎布却库尔等人到拉萨朝拜大昭寺觉卧佛像，又到哲蚌寺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此前拉萨大昭寺由扎什伦布寺派热绛巴曲贝管理，因经济利益等问题与拉萨地方首领发生矛盾。索南饶丹和哲蚌寺派人到后藏向四世班禅和第悉藏巴请求，由第悉藏巴批准，哲蚌寺派代表接收了大昭寺的管理权。

水鸡年（公元1633年 明崇祯六年 清天聪七年）五世达赖喇嘛17岁

一月初，第悉藏巴方面因北方蒙古草原的战乱渐有波及到西藏之势，故派萨迦法王图多旺秋丹巴主持，以为整个藏区百姓安乐而祈祷的名义在大昭寺举行大乘长净仪轨，所以格鲁派的正月祈愿大法会推迟到二月举行。索南饶丹和萨迦法王互献茶礼，建立关系。二月一日，色拉、哲蚌寺僧众及拉萨首领迎请达赖喇嘛到大昭寺，举行祈愿大法会。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提议，法会由达赖喇嘛主持，这是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单独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

由于土默特和鄂尔多斯的大批蒙古香客来拉萨朝礼，而蒙古人有竞相学习金刚杵和八种教诫灌顶的习惯，所以索南饶丹和林麦夏仲将帕邦喀活佛请到哲蚌寺，由他给达赖喇嘛讲授金刚和八种教诫灌顶的内容。

三月底，达赖喇嘛一行从哲蚌寺启程，再次前往曲科杰寺。行至拉萨东北的墨竹工卡一带时，因在藏北的蒙古喀尔喀部军兵与当地霍尔部落再次发生冲突，第悉藏巴派人送来指示，要达赖喇嘛等人到藏北去调解，所以达赖喇嘛一行从墨竹工卡折向西北，到达在拉萨北面的噶当派的主寺热振寺。索南饶丹从热振前往蒙古部落中调解订约，达赖喇嘛则住在热振寺。朝礼该寺各个殿堂、佛像及阿底峡像等，还登上仲敦巴的法座，为热振寺僧人讲说《宝生佛本生经》。附近达垄寺的活佛阿旺扎西贝珠派人来邀请达赖喇嘛到达垄寺去，达赖喇嘛以急于去曲科杰寺为理由谢绝，达垄活佛又派其囊索前来献礼。经过索南饶丹的调解，霍尔部落向蒙古人送交骏马百匹、牛500头、羊上千只，但双方仍未完全达成共识。故达赖喇嘛等人又应霍尔部落头人的邀请，从热振寺向东行，经过止贡寺前

往尼洋河上游的霍尔部落的放牧地。达赖喇嘛途经止贡寺时，受到止贡寺住持及当地地方首领的献礼迎送。达赖喇嘛在霍尔部落的头人的牧地居住了10天，给部落头人等传授了长寿灌顶等教法。此后达赖喇嘛一行翻越娘布香德拉山和达果谢甲山，前往曲科杰寺。

达赖喇嘛在曲科杰寺参加了该寺的夏季经会，向聚集在当地的达波、娘布地区的僧俗人众宣讲《宝生佛本生经》5天，并瞻礼曲科杰寺著名的静修地的内供圣物。此后达赖喇嘛前去朝礼曲科杰的吉祥退敌天女的神湖，观看湖中的幻景。据说此时蓝色的湖面显现出一座有许多寺院和街市的繁华大城市的景象。此后达赖喇嘛在沃喀和精奇寺分别小住数日，又经墨竹工卡和拉萨返回哲蚌寺。

秋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闭关坐静一个半月，念诵经咒，对六臂依怙、事业阎罗、毗沙门等神不断做施食供养，又依据三世达赖喇嘛以往的心愿，在哲蚌寺建立八大天神酬补仪轨。

本年冬天，蒙古永谢卜部首领噶玛伊勒丹经达垄到拉萨，拜见了五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马头明王随许法，并赠给礼品。

噶玛伊勒丹从哲蚌寺前往楚布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在拉萨西北堆龙河谷），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因他先去哲蚌寺拜见达赖喇嘛，故避而不见，只派寺院堪布出面敷衍。噶玛伊勒丹对此大为恼火，便带兵攻击楚布寺的属民，因蒙古人的到来而引起的动乱逐渐迫近拉萨。

木狗年（公元1634年　明崇祯七年　清天聪八年）五世达赖喇嘛18岁

在哲蚌寺庆贺新年后，达赖喇嘛前去拉萨，主持了拉萨的

正月祈愿大法会和二月祈愿法会。二月底返回哲蚌寺后，跟从林麦夏仲学经一个多月。

五月，达赖喇嘛跟从甘丹赤巴林麦夏仲学习班钦索南扎巴所著的续部教法，并主持哲蚌寺郭莽扎仓的僧众集会。

七月，达赖喇嘛到拉萨新修复的噶丹康萨宫度夏，并在庄园中设宴款待色拉寺、哲蚌寺的堪布和僧职人员等。此时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却央多吉也到拉萨巡礼朝佛，并与达赖喇嘛举行了会见。但只是平常礼节性的交往。

当年年初，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绰克图台吉，属土谢图汗部）率众4万到甘肃大草滩与林丹汗会合。由于受到后金势力西进的威胁，林丹汗和却图汗计划向青藏高原发展，作为在与后金对抗失败时的一条退路，他们通过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与第悉藏巴和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建立了一些联系，准备结成共同对付敌对势力的联盟。但是此后不久，林丹汗在大草滩病死，其妻苏泰和儿子额哲及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陆续东返鄂尔多斯。在这种情况下却图汗自率部众从大草滩南下青海，很快据有青海湖一带草原。随后，却图汗按照与噶玛巴却吉旺秋商定的计划，派遣其子阿尔斯兰率兵万余人，从青海向西藏进发。途中阿尔斯兰诱骗先前已在藏北的喀尔喀部的阿克岱青，将其杀害，兼并了他的部众。五世达赖喇嘛评论说，蒙古各部首领出于同一血统，以前除了在战场上互有杀伤外，没有私下互相残杀的行为，是林丹汗和却图汗开了罪恶的先例。由于阿尔斯兰进藏和却图汗在青海迫害格鲁派僧人，白利土司在康区监禁佛教僧人的消息接连传来，格鲁派上层集团也感到了危机。夏季，林麦夏仲在拉萨大昭寺觉卧像前猛力祷告，祈求神佛护佑，索南饶丹和第巴吉雪巴则通过哲蚌寺的僧人捎密信给译师那钦和山尼卡钦，让他们化装前往在天山游牧

的蒙古厄鲁特部，请求皈依格鲁派不久的厄鲁特部发兵援助。

九月，达赖喇嘛从拉萨返回哲蚌寺，由甘丹赤巴林麦夏仲给他讲授《生起和圆满次第》、《续部十三品注疏》、《宗喀巴大师传》等。藏北、工布地区的一些僧俗首领前来哲蚌寺拜见达赖喇嘛，并呈献礼品。本年由于青海地区的战乱，送到拉萨的布施和礼品极少，因此藏北和工布首领的赠礼对哲蚌寺起了很大的作用。

木猪年（公元1635年 明崇祯八年 清天聪九年）五世达赖喇嘛19岁

本年拉萨正月祈愿法会由达赖喇嘛主持，因时局紧张，参加者不多。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达赖喇嘛曾派人送信给帕邦喀活佛，请求他传授更多的教法，但帕邦喀活佛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不能前来哲蚌寺。所以达赖喇嘛3月初动身去帕邦喀寺，跟从帕邦喀活佛学习和体验多种佛教密法。达赖喇嘛说，从此他开始醉心于追求纯正的佛法的修炼。帕邦喀活佛虽然是专心静修的苦行僧，但是他对西藏的政治形势以及西藏和周围地区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预言五世达赖喇嘛会效法帝师八思巴的故事到汉地去做皇帝的上师，索南饶丹会成为掌握西藏行政权力的长官。他的预言当时在格鲁派人士中也被当成一种戏言，林麦夏仲对五世达赖喇嘛说："你不是商人，到汉地去干什么，第悉藏巴的权势这样大，索南饶丹怎么会成为掌权的长官。帕邦喀活佛善于顾全别人的脸面，也善于嘲讽别人。"

四月，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随即和索南饶丹等少数随从前往曲科杰寺，在该寺大经堂为僧众讲说《宗喀巴大师传》，历时15天。由于形势变幻莫测，佛事活动从简，达赖喇嘛又

返回哲蚌寺。对于已经到达藏北的阿尔斯兰的蒙古军的意图，西藏各派都不完全了解，因此对阿尔斯兰入藏的态度都是顾虑重重。第悉藏巴派萨迦法王图多旺秋丹巴再次到拉萨大昭寺举行烧施和跳神，驱魔禳灾，意在阻止蒙古人深入西藏腹地。但是法事结束之后，紧接着大队蒙古军就出现在拉萨北面。因此五世达赖喇嘛说萨迦法王的活动又似乎是招引蒙古人的法事。夏初，与宁玛派有关的素尔钦波·却央让卓到达拉萨，达赖喇嘛向他学习旧密法。他们师徒二人在五、六月间闭关修习，诵持真言，并做摄伏敌魔的法事。到七月雪顿节时，达赖喇嘛结束闭关，观看了雪顿节演出的藏戏。秋季达赖喇嘛准备在格培寺闭门念修，阿尔斯兰的军队在当雄一举击溃永谢卜的四子王部落，永谢卜首领有的被杀，有的逃窜，达垄寺专门派人到格培寺向索南饶丹通报了这一消息。达赖喇嘛认为阿尔斯兰暂时还不会进兵拉萨，因此仍按计划进行静修。

多数藏文史籍称阿尔斯兰率军进藏是为了实行却图汗与噶玛噶举派红帽活佛制定的彻底消灭格鲁派、联合第悉藏巴做噶玛噶举派的施主以统治西藏的计划。但是从阿尔斯兰入藏后的行动看，这个计划并不是很明确的。红帽活佛在噶玛噶举派中的地位低于黑帽活佛，他的安排并不能完全代表第悉藏巴及受其尊崇的各教派首领的意见，而阿尔斯兰也并不是噶玛噶举的坚定的信奉者。在当雄击溃和兼并原先在藏北的蒙古各部后，阿尔斯兰用了几个月时间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在拉萨的格鲁派虽然在地理位置上首当其冲，但是格鲁派在当时已归第悉藏巴管辖，格鲁派并没有军事力量可以与阿尔斯兰对抗。从阿尔斯兰入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来，格鲁派的这种弱点反而使其不容易与阿尔斯兰发生冲突，格鲁派有可能不会成为阿尔斯兰的第一步打击目标。因此当时索南饶丹在格鲁派人士

一片惶恐中请帕邦喀活佛占卜时，占卜的结果说虽然形势危急，但能够以念经供佛予以排除。果然，不久以后格鲁派的形势就有了重大转机。

可能阿尔斯兰看到西藏军事防御力量薄弱，就计划独自以武力统治西藏，而不愿仅仅充当噶玛噶举派的施主和第悉藏巴的联合者。阿尔斯兰到楚布寺去会见黑帽系活佛，由于阿尔斯兰以统治者的语气说话，态度傲慢，黑帽系活佛却央多吉难以忍受，突然离开楚布寺前往多吉扎寺，噶玛巴与阿尔斯兰的联合出现裂痕，而格鲁派索南饶丹等人却在这时与阿尔斯兰互派信使，赠送礼品，建立了一些关系。此时又有卓尼曲杰和土默特的库雅台吉等人来到哲蚌寺熬茶布施，向达赖喇嘛赠送大量礼品。却图汗也派伦布台钦给西藏各教派的多数喇嘛带来了礼品，其中也包括给达赖喇嘛的礼品。由于这些因素，到了冬天，形势反而变得对格鲁派较为有利。

为了达到以武力直接控制整个西藏的目的，阿尔斯兰改变了人藏前却图汗与噶玛噶举红帽活佛的计划，在冬末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阿尔斯兰兵分三路，左翼开往止贡，威胁拉萨以东以南的地方势力，右翼指向后藏北部，威胁在日喀则的第悉藏巴，中路由阿尔斯兰率领直插羊卓雍湖，目标是占领江孜，围攻日喀则。这样，阿尔斯兰的主要攻击目标从格鲁派改变为西藏最有军事实力的第悉藏巴和一些地方势力。阿尔斯兰先攻破羊卓雍湖边的白地。白地的地方首领被杀，接着又攻占浪卡子，浪卡子地方首领（五世达赖喇嘛舅父家）弃寨逃走。第悉藏巴已准备弃江孜和日喀则远逃，前后藏各地领主都惊惶失措。但是阿尔斯兰隆冬分兵远征，又不了解地理民情，本身困难也很多，加之塔朗喇嘛向阿尔斯兰诡称后藏大兵前来迎战，布满山谷，使阿尔斯兰没有决心攻打江孜，而将全部军队

撤回到拉萨一带，再定行止。

三月，后金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等率兵前往鄂尔多斯收降林丹汗东返的部众，寻找林丹汗的妻、子。多尔衮招降林丹汗的妃子苏泰、囊囊及其子额哲等，带回沈阳。又有喇嘛墨尔根将林丹汗供奉的相传是八思巴所造的摩哈噶喇像载往沈阳献给皇太极。至此，漠南蒙古各部全都归于后金的统治之下。

火鼠年（公元1636年　明崇祯九年　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五世达赖喇嘛20岁

藏历新年时，阿尔斯兰派人到哲蚌寺送信，要求达赖喇嘛到拉萨。当晚，阿尔斯兰由其宰桑伊希嘉措领路到达赖喇嘛在拉萨下榻的噶丹康萨。阿尔斯兰事前曾下令与达赖喇嘛会见时谁也不准磕头，但次日举行会见时，阿尔斯兰自己却突然向达赖喇嘛磕头礼拜，并请求加持。阿尔斯兰还命令以前趁战乱从哲蚌寺拿走物品的尼泊尔人佐古罗阇等修复哲蚌寺的屋脊宝瓶。本年拉萨正月和二月的祈愿法会由达赖喇嘛主持。阿尔斯兰等人也朝拜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显然是阿尔斯兰在与第悉藏巴发生冲突后为在拉萨站稳脚跟而与格鲁派修好的一种表示。

春季，第悉藏巴的军队从后藏开到藏北南木措（腾格里诺尔）湖一带，同时第悉藏巴下令派噶玛巴活佛、达垄活佛和格鲁派扎什伦布寺的仲巴活佛、达赖喇嘛等人到藏北与蒙古人谈判。由于蒙古军的到来以及战乱，此时藏北及后藏一带疫病流行。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经澎域前往藏北，在年占拉山下的居拉住宿。帕邦喀活佛预言："根据你们住地的名称（居拉之意为粘合），蒙藏两族会像两块酥油粘合在一起，密不可分。"这可能是暗示达赖喇嘛应加强与蒙古人的关系，借充当调解人之机

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达赖喇嘛的手下与蒙古人的多次谈判，达成了停战的协议，使后藏军队避免了交战。此时阿尔斯兰也患病，无力开展军事行动。达赖喇嘛在澎域期间接受了当地僧俗人众的礼拜和赠礼，然后返回拉萨格培寺静修。不久因疫病有向拉萨蔓延之势，达赖喇嘛在六月间带领部分侍从去曲科杰寺。索南饶丹带领蒙古人的代表前去江孜西北的白朗，与第悉藏巴签订停战协议，签约时格鲁派的四世班禅在场作证。

达赖喇嘛经果噶拉山抵达曲科杰寺，居住了两个多月，修习佛法。此时阿尔斯兰的部分蒙古军进到嘉域、古尔一带，第悉藏巴也派兵到涅地区，山南、工布一带又发生混战。曲科杰寺夏季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移居到曲科杰寺山下的梅朵塘，秋季又去朝礼拉托顶神湖。素尔钦·却央让卓也到达曲科杰寺，五世达赖喇嘛跟从他学法五个月。索南饶丹等人到曲科杰寺后，因西藏时局变幻莫测，格鲁派前途未卜，所以达赖喇嘛等人在曲科杰寺时常举行祈福禳灾的法事，祈求神佛护佑。

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的49个封建主聚集在沈阳，以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和科尔沁部的首领奥巴为首，承认皇太极为汗，并给皇太极上尊号为“阿固达鄂罗锡叶克齐德格都额尔德木图徧喇穆达果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

四月，皇太极祭告天地，受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同年，在呼和浩特地区活动的四世班禅的弟子、蒙古族僧人内齐托因率门徒30人到沈阳会见皇太极，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另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呼和浩特的高僧）在鄂尔多斯的转世满珠习礼也与皇太极建立了关系，这些联系成为格鲁派与清朝的关系开端。

本年中，格鲁派向厄鲁特蒙古求援的使者到达新疆，厄鲁特各部首领聚会商议，当时厄鲁特受到沙俄和喀尔喀部的威

胁，内部亦因争夺牧场、属民多次纠纷，各封建主也想寻找向外发展的机会，在此之前土尔扈特部已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因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表示愿率部到西藏帮助格鲁派。当年秋末，固始汗和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率兵一万人从新疆出发，穿过南疆于年底到达青海湖西面的柴达木盆地。固始汗的南下使格鲁派的命运得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火牛年（公元 1637 年　明崇祯十年　清崇德二年）五世达赖喇嘛 21 岁

本年正月，固始汗和巴图尔珲台吉在青海湖北岸一举击溃却图汗的四万大军，却图汗被俘，旋即被杀。在格鲁派僧人及青海藏族首领的帮助下，固始汗很快占有了青海的主要藏族地区。固始汗将其女阿明达兰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一说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之子），送巴图尔珲台吉的部众回新疆。固始汗、巴图尔珲台吉随即与卓尼曲杰、土尔扈特部的南木扎勒等人以朝佛的名义前往西藏。

1636 年时，因阿尔斯兰未实行打击格鲁派的计划反而攻击第悉藏巴，噶玛巴红帽活佛向却图汗控告，却图汗下令诱杀阿尔斯兰，但噶玛巴红帽活佛反被阿尔斯兰所杀。阿尔斯兰听到固始汗南下青海的消息后，率部仓皇东返，沿途抢掠。到康区后，其部将岱青按却图汗以前的密令谋杀了阿尔斯兰及其亲随 3 人，却图汗派往西藏的军队随即烟消云散。

本年藏历新年后，达赖喇嘛在曲科杰寺与仲麦巴·赤列嘉措一起学习藏族的历算法，附带学会了星命卜算的基本内容。从闰二月开始，达赖喇嘛练习在地上绘制计算图，进行演算，还在曲科杰规划设计哲蚌寺大经堂的壁画装饰等，并且自己攻读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六月，达赖喇嘛到达波

地区，并再次巡礼拉托顶神湖，认为看到了汉藏金桥将要恢复之兆。

从夏初开始，关于青海、西藏政治军事形势一系列新变化的消息接连传到曲科杰寺。固始汗从青海动身时，派人到曲科杰通知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要求在拉萨举行会见。秋天时传来固始汗一行将到当雄的消息，于是达赖喇嘛等离开曲科杰向拉萨进发，途经恰噶宗时，受到当地首领的迎送。在温多扎的鲁顶住宿时，受到本萨夏多玛的款待。在途中达赖喇嘛又听到帕邦喀活佛圆寂的消息。因哲蚌寺僧人中有疾病流行，达赖喇嘛没有回寺，而是到拉萨住在噶丹康萨。达赖喇嘛很想去帕邦喀瞻礼帕邦喀活佛的遗体，参加他的火化仪式，但为等待固始汗，身不由己，没有去成。

固始汗一行抵拉萨后，即在噶丹康萨会见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等人，向达赖喇嘛献银4000两，卓尼曲杰等人也献了大量的礼品。格鲁派人士立即宣称固始汗是智麦伦布活佛预言的进入西藏的金刚手菩萨化现的王者，将使西藏获得平安。在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前陈设了宝座，请固始汗就坐后，达赖喇嘛按蒙古人的习俗赠给固始汗“丹增却吉杰波”（执掌教法法王）的称号和印章，并赠送了一尊宗喀巴大师金质像和大批礼物。达赖喇嘛还给固始汗的儿子和属下官员赠给各种称号。固始汗赠给索南饶丹“达赖喇嘛强佐”称号，赠给仲麦巴·赤列嘉措“宰桑第巴”称号，赠给仲麦巴的副手“墨尔根鄂托齐”称号，赠给强俄鼐·扎西彭措“乌勒沁第巴”称号，赠给达东鼐“卓哩克图达尔汗迪木齐”称号，对达赖喇嘛的主要侍从也都赠予了名号。双方商议今后的事务时，决定派遣达尔汗囊索根敦达吉去厄鲁特和喀尔喀地区传教，以加强联系。固始汗还邀请达赖喇嘛去蒙古地区传法，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但格鲁派僧俗

人士对此看法不一。第巴吉雪巴等人不愿达赖喇嘛前往，故固始汗离去后，达赖喇嘛推迟了行期，并未动身。固始汗还向班禅大师赠送了 2000 两银子等礼品。

十月初，四世班禅应邀到达拉萨。因当时哲蚌寺仍有僧人患麻疹，所以四世班禅和达赖喇嘛都住在噶丹康萨，为五世达赖喇嘛接受比丘戒做准备。四世班禅给达赖喇嘛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文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的戒律著作，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的道歌等，还传授了一些灌顶法和随许法。到十二月初，因拉萨也有人患麻疹，达赖喇嘛移居到曲隆扎西岗，四世班禅应邀前往甘丹寺传法。达赖喇嘛在曲隆扎西岗在仲麦巴的帮助下修订了年历，并为新年的到来向三界之主举行献供法事。

土虎年（公元 1638 年　明崇祯十年　清崇德三年）五世达赖喇嘛 22 岁

一月，达赖喇嘛为避天花仍居住在曲隆扎西岗。二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住于噶丹康萨，四世班禅亦由甘丹寺返回拉萨，为达赖喇嘛传授了 15 种金刚鬘灌顶。三月五日（《四世班禅自传》中记为四月五日），在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前，由四世班禅任堪布和屏教师、泽当巴·强巴默朗任袪邪师、林麦夏仲嘉央官却群培任轨范师，由哲蚌寺和色拉寺各扎仓的堪布和洛本添足额定的比丘之数，给五世达赖喇嘛传授了比丘戒。林麦夏仲给达赖喇嘛传授犯戒还净法并予以加持后，在达赖喇嘛的罗桑嘉措的名字之前新加上阿格旺秋（语自在）几个字，故五世达赖喇嘛又被称为阿旺罗桑嘉措。受戒后，达赖喇嘛前往帕邦喀寺，为帕邦喀活佛的银质灵塔祝赞吉祥，在返回的途中还朝礼了拉萨的布达拉山（玛波日）。此后，达赖喇嘛在噶丹康萨跟从素尔钦波继续学习历算、占星术、声明学等。素尔钦

波还给达赖喇嘛讲授了建立如来善逝八塔的《量度经》，由孜喀活佛挑选西藏和尼泊尔工匠组成作坊，按达赖喇嘛的规划在哲蚌寺建造如来善逝八塔，历时4个月完工。达赖喇嘛还命布松仲措哇和罗巴群则负责，整修大昭寺觉卧像的头饰。头饰以前用珍珠镶嵌，此次以松耳石饰件代替，并在新制飘带上饰以黄金30两、白银50两。本年，因西藏大旱，达赖喇嘛在其住处祈雨，并派仲麦巴去沃噶征收秋粮，后又派囊索诺尔布前往接替，因收粮不顺利，又派罗巴群则前去协助。囊索诺尔布入赘于拉萨以东的格喀萨地方首领家，故成为该地方的一名领主。

本年中，达赖喇嘛跟从拉萨地区的学者第巴香喀哇学习梵文声明学著作，选用夏鲁译师的注释本讲授。第巴香喀哇因西藏地区真正精通梵文的学者甚少，向达赖喇嘛推荐了敏珠翢、甲尔波译师喜饶巴桑、绰浦堆夏巴三人，请达赖喇嘛择师进一步学习。

秋季，林麦夏仲到噶丹康萨，与达赖喇嘛、卓尼曲杰、达香曲杰等人一起讲论经典。由达赖喇嘛任堪布给达香曲杰授了沙弥戒。又由林麦夏仲任亲教师和轨范师、达赖喇嘛任屏教师，给噶举噶东巴等授了比丘戒，这是五世达赖喇嘛首次给人传授比丘戒。

秋末，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固始汗派遣墨尔根噶居喜饶嘉措、宰桑墨岱齐、宰桑国师等三百余人的使团前来迎请达赖喇嘛去青海，索南饶丹为此前往日喀则请求第悉藏巴批准，遭到拒绝，第悉藏巴的臣僚康扎巴还警告索南饶丹不要为本派利益与蒙古人交往过密，使索南饶丹大为愤慨。固始汗的使者又前往日喀则会见四世班禅，见到第悉藏巴正在大兴土木建寺。派鸟拉到扎什伦布寺后山上采石，巨石从山上滚下，砸坏扎什

伦布寺僧舍，班禅大师及寺僧俱惶恐不安。扎什伦布寺僧俗人士还向使者谈了第悉藏巴凌辱格鲁派的情况。使者返回青海时，达赖喇嘛给墨尔根噶居等人赠礼送行，传授了他们请求的教法，并要他们向固始汗报告自己一时不能前往青海的原因。卓尼曲杰、阿巴车臣曲杰等人也与使者结伴返回蒙古。墨尔根噶居到青海后向固始汗报告日喀则的情况，据说这成为固始汗决心攻灭第悉藏巴的直接起因。

土兔年（公元 1639 年　明崇祯十二年　清崇德四年）五世达赖喇嘛 23 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向佛像敬献题有祈愿词的哈达。参加新年庆宴后，达赖喇嘛到拉萨主持了正月和二月的拉萨祈愿法会，本年因时局不定，参加法会的人较少。随后达赖喇嘛前往拉萨南面的扎叶巴寺朝礼，巡游静修僧居住的石窟，并在达瓦浦岩洞中诵经祈祷，登上阿底峡曾坐过的法座，为聚集的信众讲说《噶当书》。返回拉萨后，达赖喇嘛在噶丹康萨居住两个月，编订了一部大型年历书，由仲麦巴负责实用派历算和五曜运算部分，达赖喇嘛自己完成体系派历算、五曜的搭配，年月的解说和书首礼赞等。琼结日沃德庆寺百余名僧人到拉萨来为第悉藏巴做经忏法事，请求达赖喇嘛传授文殊菩萨的内外密三种随许法，并一同举行长净仪轨，达赖喇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请达赖喇嘛去日沃德庆寺，达赖喇嘛考虑如去琼结抛头露面，会招致第悉藏巴的不满，因此婉言谢绝。没有去自己的出生地。三月底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在寺内学习声明论和藏医学论著，并派遣南杰赤列和阿旺丹增前去迎请甲尔波译师来寺讲授梵文声明。到夏季末才知道甲尔波译师已去世多年，只好迎请达垄译师前来讲授，增进了格鲁派与达垄噶举

派人士的联系。

本年夏天，达赖喇嘛给来自安多地区的100多名僧人剃度，传授了沙弥戒。

八月，厄鲁特蒙古的都日雅勒和硕齐和色钦曲杰（《清实录》记为戴青绰尔济）率大批香客到达拉萨，在哲蚌寺布施斋僧十余天，并向达赖喇嘛奉献白银6000两和2000多匹绸缎。他们邀请达赖喇嘛到色拉寺，在僧众集会上向达赖喇嘛再次献礼。举行发愿回向活动。月底传来达赖喇嘛母亲在浪卡子去世的噩耗，经商议后由索南饶丹前往羊卓办理达赖喇嘛母亲的丧事。发放了布施，并在哲蚌寺、止贡寺、达垄寺、噶尔巴寺和扎什伦布寺等处呈献了丰厚的回向礼品。

都日雅勒在拉萨受到格鲁派人士的鼓动，领兵前往后藏，声称要平毁第悉藏巴新建的针对扎什伦布寺的寺院，达赖喇嘛等向色钦曲杰反复陈述利害，才使战事得以避免。年底时，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给色钦曲杰及其随从传授了密集灌顶法。四世班禅参加调解都日雅勒和第悉藏巴间的冲突后，也在年底前到达哲蚌寺，与达赖喇嘛一起筹备新年的祈愿大法会。

1637年8月，喀尔喀土谢图汗遣使向皇太极上表，提出喀尔喀和厄鲁特愿派人和皇太极的使臣一起去西藏迎请达赖喇嘛。本年十月，皇太极派额尔德尼达尔汗格隆、察汉喇嘛等人出使，携带有皇太极致图白忒汗（指第悉藏巴）和掌佛法大喇嘛（指达赖喇嘛等）的书信。这是清朝首次直接向西藏派遣使者。

铁龙年（公元1640年　明崇祯十三年　清崇德五年）五世达赖喇嘛24岁

拉萨正月祈愿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达赖喇嘛也前去参

加，聆听班禅大师讲经说法。法会期间仲钦贡噶群培将达赖喇嘛母亲经常戴在颈间的一串珊瑚念珠交给达赖喇嘛，作为母亲传给他的纪念物。有人要求在祈愿法会上齐诵四世班禅撰写的祈祷第悉藏巴长寿的祈愿文，索南饶丹对此做了安排，但僧俗都不愿意，结果只有领诵师像应试人那样念了一遍，使在场的后藏人员多少还有点体面，第悉藏巴及其臣僚听说后，因此对格鲁派深为不满。

四世班禅提出，派色钦曲杰前去女真人的地方，看新兴的清朝能否当西藏各教派的施主。拉萨祈愿法会后，色钦曲杰和都日雅勒动身上路时，达赖喇嘛让他们带了给博格达汗（蒙古人对皇太极的尊称）的书信和礼品，并给色钦曲杰和都日雅勒送了礼品。此时格鲁派还在第悉藏巴的管辖之下，因此色钦曲杰还带有第悉藏巴以及萨迦、噶玛噶举、达垄噶举、主巴噶举等派首领的书信和礼品。这是西藏方面首次派遣使者去与清朝联系，而色钦曲杰和都日雅勒又从进藏朝佛的蒙古香客变成了西藏各方联合委派的与清朝联系的代表。而上年清朝方面派往西藏的使团，因未见到喀尔喀派人前来一同进藏，故在呼和浩特一带牧马停留。

班禅大师来拉萨时，带来了芒域译师，本年中由芒域译师给达赖喇嘛讲授梵文和声明学。

本年初，固始汗巩固在青海的地位后，兴兵进藏，在途中折向康区，攻打反对佛教特别是反对格鲁派的白利土司。夏末，有不少蒙古人从康区到达拉萨，固始汗派侍卫什底巴图尔给达赖喇嘛送来一封密信，可能是要格鲁派配合他的军事行动，以便在消灭白利土司后进兵西藏时攻灭第悉藏巴。索南饶丹主张按固始汗的指示行事，但五世达赖喇嘛认为，战乱虽不可避免，但格鲁派不能盲目行事，第悉藏巴与格鲁派的关系没

有公开决裂，还有改善的可能，第悉藏巴得到萨迦、噶举、觉囊等教派的支持，如果与第悉藏巴公开为敌，格鲁派可能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因此格鲁派应设法争取避免战乱。在鲁普林卡的蒙古包内为固始汗的信使噶居格年顿珠送行时，索南饶丹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对信使说，格鲁派要求彻底消灭白利土司，但固始汗在消灭白利土司后最好返回青海，可派两位王妃来拉萨建立善缘，在西藏不应发生战乱。但是在第二天索南饶丹到噶丹康萨给格年顿珠送交物品时，利用喝茶的机会，与信使进行了密谈，由索南饶丹以格鲁派的名义向固始汗发出了进兵消灭第悉藏巴政权的要求。

秋末，达赖喇嘛住在噶丹康萨，阅读声明、藏医、历算等方面的著作《声明集分论》、《诗镜论》、《居希》、《旃陀罗波声明论》、《胜乐秘义详解》、《时轮纲要》、《宗派通论》、《三律仪疏》等，继续跟从芒域译师学习梵文，并为格鲁派的前途做禳解驱邪法事。索南饶丹提出要举行威猛伏敌仪轨，虽然这是宁玛派的仪轨，格鲁派很少有人精通，但索南饶丹说："俗谚说'如果对伤口有效，则不妨用狗油治疗'，那就让宁玛派自己去做威猛伏敌仪轨吧！"此时第悉藏巴方面的一些咒师也举行了诅咒固始汗的仪式，政治斗争发展到在宗教仪式上的竞争。

十月底，温都曲杰、色钦托因、墨尔根噶居等人从青海到拉萨，在僧众集会上发放布施，向达赖喇嘛献银4000余两及大量绸缎，额尔德尼托因交给索南饶丹白银2000两，作为给大昭寺觉卧佛像建造金顶的基金。

铁蛇年（公元1641年 明崇祯十四年 清太宗崇德六年）五世达赖喇嘛25岁

正月，达赖喇嘛在拉萨参加了祈愿法会，随后返回哲蚌

寺。不久达赖喇嘛患病。经本仓擦绒巴等人诊断，是感染了轻度天花。此时固始汗已将康区全部征服，白利土司战败逃跑，最后还是被俘获。固始汗派噶居格年顿珠和他的大王妃前往拉萨通报情况，并派色钦渥巴锡等人向达赖喇嘛请安问候。得到固始汗在康区胜利的消息后，达赖喇嘛在哈达上题词，敬献神灵，献给扎仓咒师殿、乃穷护法殿，并举行祭祀刹土神的抛掷朵玛（敬神食子）的仪轨。来自蒙古军中的色巴钦布和甲瓦曲杰等人熬茶斋僧、发放布施，并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达赖喇嘛在僧众集会上宣讲《噶当书》，历时一个月。

固始汗攻灭白利土司后，佯装率兵返回青海，行进一段后，又折向西藏，因此关于他的动向在西藏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返回青海，也有人说他正领兵临近西藏。直到固始汗将要抵达当雄时，索南饶丹才向达赖喇嘛说明："现在无论我们向第悉藏巴及其臣僚说些什么都是下策，而且只能使其心生猜疑。过去我们只能说甘丹颇章是拥护藏巴汗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固始汗的恩德从藏巴汗的法度下解脱出来，以后就再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机会。因此遣送信使格年顿珠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固始汗应当用兵后藏的请求。"面对固始汗的军队是格鲁派请来西藏的事实，达赖喇嘛再次要索南饶丹到当雄劝说固始汗回兵，并说如索南饶丹不便前往，达赖喇嘛可以自己去见固始汗。索南饶丹提出待卜算后决定，于是在吉祥退敌天女像前占卜，结果是请固始汗进兵暂时不失为善策，但长远的结果不好。索南饶丹说："暂时有好处就可以了，长远来说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因此格鲁派并没有做劝阻固始汗的事情。固始汗来信说，四世班禅待在扎什伦布寺有危险，可以借口大王妃上了年纪，不能去后藏，要求准许班禅到拉萨来会见。索南饶丹等按固始汗的安排派人去请四世班禅，四世班禅行至仁

蚌地方时，固始汗领兵进藏的确切消息由达垄寺报告给第悉藏巴，因此四世班禅被迫滞留在喀日丁地方。索南饶丹听到班禅被阻的消息后，急忙前往当雄会见固始汗，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固始汗率主力经南木林直插日喀则，攻打第悉藏巴，蒙古军分兵一部，由格鲁派配合，招降前藏各地方首领，格鲁派的达东鼐等人随固始汗行动。此时绒巴丹增带着第悉藏巴的手谕到拉萨，追问索南饶丹去当雄的目的。达赖喇嘛只得谎称索南饶丹是去尽力劝说蒙古人退兵的，并因为说谎而感到惭愧。达赖喇嘛随即召集哲蚌寺和色拉寺各扎仓的堪布，告诉依靠固始汗攻灭第悉藏巴的打算，各扎仓执事均表示拥护，并声称不论吉凶如何，都没有什么可悔恨的。达赖喇嘛内心颇感不安，但表面上努力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

此后，索南饶丹陪同固始汗的王妃等人到达拉萨，熬茶斋僧、发放布施。贡吉王妃向达赖喇嘛赠礼达 4 万多件。在朝佛进香的轻松气氛下，波东古颜率蒙古军直趋堆龙河谷，切断交通。觉摩隆寺僧俗分为拥护第悉藏巴和拥护第巴吉雪巴及蒙古人的两派，在后一派的配合下，蒙古军队攻占了觉摩隆。索南饶丹派出仲麦贵巴和扎喀切松欧珠到山南招降各地方势力，又派僧人到琼结日沃德庆和精奇寺活动。在固始汗兵临城下时，第悉藏巴及萨迦法王等集中兵力坚守桑珠孜（今日喀则）城堡，顽强抵抗，固始汗的进展并不顺利。索南饶丹本以为固始汗进兵后第悉藏巴会望风归降，不想战事异常激烈，因此提出请求，要达赖喇嘛去日喀则调停。达赖喇嘛说："现在人们都耳闻目睹我们甘丹颇章背叛了第悉藏巴，而且派达东鼐领着蒙古军队去攻打后藏，这叫我怎么出面调停呢？第悉藏巴君臣老谋深算，就算一时高兴接受了调解，也会在蒙古兵回去后进行报复。从固始汗派来信使说他将进兵后藏之时起，就应下定决

心与后藏开仗，不能脚踩两只船，只有从教法和世间法两方面去尽力。不论胜败如何，我们再不能在第悉藏巴统治下生活。”达赖喇嘛不断举行忿怒镇压法事和宁玛派的威猛伏敌法事，祈祷胜利。

五月底，索南饶丹发动哲蚌寺的青壮年僧人和寺属庄园的武装攻打拉萨西郊的东嘎宗，一连数日攻不下，色拉寺的僧人也来助战，终于攻下东嘎宗城堡，堆龙河谷德庆宗的守军也闻风瓦解。四世班禅得到蒙古军的解救，和蒙古使者一起经北路到拉萨。达赖喇嘛还和素尔绛央喇嘛一起写信劝降曾抵抗蒙古军的岳摩活佛。接着格鲁派和蒙古的联军又攻下曲水宗，地方长官南木色阵亡。奉第悉藏巴之命增援曲水的贡噶、扎多、琼结等地的军队闻讯惊散。不久，甲、古尔、邦等地的军队归降了格鲁派，拉嘉里土王在仲麦巴的劝说下决定保持中立，不出兵帮助第悉藏巴。日沃德庆寺僧人包围琼结宗，琼结地方势力也归顺了格鲁派。

六月底，达赖喇嘛在哲蚌寺举行大规模的供祭天铁金刚杵的法事和放咒活动，格鲁派僧人在大庭广众下呼唤着第悉藏巴君臣的名字进行诅咒，有人说这不一定起作用，达赖喇嘛认为“要渡河哪管水深浅”，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虽然蒙藏联军在前藏进展顺利，但固始汗围攻桑珠孜城堡却久攻不下。囊索诺尔布率拉萨地区的军队前往后藏协助固始汗，索南饶丹等人也从江孜赶往日喀则。色布饶丹负责为蒙古军调配粮草给养。仲麦巴和诺尔布负责攻打日喀则附近山上的碉堡炮台。仲麦巴·贵巴扎西中弹负伤，诺尔布仓皇退回，索南饶丹立即派人去给仲麦巴·贵巴扎西治伤。

攻打日喀则的战事仍在激烈进行时，蒙古喀尔喀、厄鲁特部陆续有香客到达拉萨。厄鲁特左翼（准噶尔）首领墨尔根岱

青（似即巴图尔珲台吉之弟）在进藏途中病故，其妻到达拉萨后请达赖喇嘛到鲁浦林卡主持超荐法事，向达赖喇嘛赠送金银、布疋、骡马、蒙古包等物品近万件，达赖喇嘛与僧众为其夫举行了圆满消除一切恶趣的仪轨。喀尔喀夏仲强巴的森本堪布色钦诺门罕为首的僧人在哲蚌寺连续发放布施15天，达赖喇嘛也不得不去接受他们奉献的大量礼物。

精奇寺为首的格鲁派僧人包围了沃噶宗，不久，本来就与格鲁派关系密切的沃噶首领吉浦巴归降，格鲁派接管了沃噶宗。但信奉噶玛噶举的工布噶悉起兵攻打格鲁派的据点曲科杰寺，在雪喀瓦即将攻破寺院时，涅巴顿珠才仁和曲杰孜莫哇领着数百名厄鲁特蒙古兵赶到，把工布军驱逐回去。噶玛巴（黑帽活佛）要求给予一份答应保持噶玛噶举派原有地位权利的盖印文书，就不再对抗格鲁派，达赖喇嘛认为战胜之后就是要收复以前丧失给噶举派的寺院和庄园等，因此没有答应。

第悉藏巴发现日喀则难以长期坚守，多次致信达垄寺活佛、四世班禅和贾曹仲巴，请求他们充当调解人，而没有给达赖喇嘛写信。年底前，因日喀则即将被攻破，第悉藏巴努力即将灭亡，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互相致信祝贺。

水马年（公元1642年 明崇祯十五年 清崇德七）五世达赖喇嘛26岁

正月和二月的拉萨祈愿法会由达赖喇嘛主持，本年香客众多，贡献的财物也很多。喀尔喀土谢图汗多尔济的代表扎了一顶用白旃檀木作支架的蒙古包，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包内进行款待，并代表土谢图汗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去。达赖喇嘛还为以鄂尔多斯东科尔活佛为首的200多名僧人剃度或授比丘戒，给东科尔活佛起名为阿旺嘉央伦珠。准噶尔墨尔根岱青的妻子建

造了一尊银质如来佛像，作为其夫的善根，达赖喇嘛为其装藏，并祝赞开光。色钦诺门罕将建造纪念夏仲强巴活佛的银塔的材料交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即认真负责监造。二月底，达赖喇嘛为色钦诺门罕等人返回蒙古赠礼送行。

三月，固始汗攻破桑珠孜城堡，俘获第悉藏巴的消息伟到拉萨，达赖喇嘛向本尊护法呈献题词哈达酬谢，表示庆贺。色拉、哲蚌和大昭寺的僧人在屋顶上遍插旗幡，以庆祝胜利。达东鼐从后藏返回，带来固始汗的口信，要达赖喇嘛准备到日喀则去。三月八日举行了祭神供献食子活动。十一日达赖喇嘛离哲蚌寺前往后藏。达赖喇嘛一行穿过堆龙河谷，翻过秀古拉山到达伍由林噶。达赖喇嘛本想去朝拜当地圣迹，因有固始汗的大王妃及许多蒙古人随行，未能遂愿。达赖喇嘛抵达托卜嘉谷口的德庆地方时，固始汗率领索南饶丹、额尔德尼岱青、吉雪夏仲玛钦等人在该地迎接。在会面时，固始汗将战胜品中的八思巴曾用过的法铃和被称为“索波贝杰”的绿宝石碗献给达赖喇嘛。后藏萨迦、觉囊派的一些僧人也前来设法和达赖喇嘛建立关系。

二十五日达赖喇嘛到达扎什伦布寺，受到寺僧列队夹道欢迎。达赖喇嘛会见了四世班禅，受到扎什伦布寺各拉章的宴请。双方赠送了大量礼品。蒙古人和后藏的许多僧俗人士都来拜见达赖喇嘛。帕木竹巴的首领也从乃东赶来会见，虽然帕木竹巴的势力已十分衰微，达赖喇嘛仍然对他给予尊重。随后，在桑珠孜城堡的大厅里举行了难以计数的蒙藏人士参加的盛大集会，当大众就座之时固始汗按藏传佛教人士传颂的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三次大布施的例子，向五世达赖喇嘛赠送了释迦牟尼舍利、八思巴曾使用过的宝饰、仁蚌巴制作的精美的帐幔、佛像等，宣布他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献给达

赖喇嘛。这次大会标志着格鲁派与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联合政权正式建立。

达赖喇嘛认为，推翻第悉藏巴之后，必须收回格鲁派以前失去的寺院和领地，使所有的教派都相安无事，他引用八思巴的例子向固始汗说明让各派相安的道理，使固始汗合掌胸前，点头称是。达赖喇嘛虽然巡礼了扎什伦布寺，会见了一些后藏的高僧，但因为当时战乱初息，人们普遍在为财产和土地进行谋算，所以没有就佛法教理深入讨论。

达赖喇嘛在日喀则停留了一个月，于四月二十五日动身返回拉萨，当时噶玛噶举派正酝酿发动叛乱，形势紧迫。达赖喇嘛经夏鲁到白朗时，已经传来古云巴在门隅发动僧侣和主巴(不丹人）起兵作乱的消息，固始汗和索南饶丹也到白朗，与达赖喇嘛商量了派兵平乱之事。达赖喇嘛说，第悉藏巴时主巴首领要送儿子到后藏作人质，我们将其释放，他们却起兵作乱，真是忘恩负义。

达赖喇嘛到达东孜时受到僧俗人众载歌载舞的隆重欢迎，瞻礼了白居寺各个殿堂和著名的白居寺大佛塔。白居寺的格鲁派七大扎仓设宴招待达赖喇嘛，并赠送了礼品。达赖喇嘛想从江孜到通玖宗去参观一座佛殿，但因发生战事，需要军队护送才能前往，因此没有去成。索南饶丹要把仁蚌和喀孜两个地方交给第巴吉雪巴（吉雪台吉）管理，请求达赖喇嘛发给命令文书，达赖喇嘛认为把喀孜交给吉雪巴很不合适，但还是发给了文书。达赖喇嘛到达浪卡子时，受到两位舅父的欢迎款待。舅父详细询问他学习显密经论的情况，比一些喇嘛格西还要郑重其事。此后达赖喇嘛翻越岗巴拉山，到达帕竹政权时的首邑之一贡噶（贡日噶波宫），受到当地僧俗的欢迎。然后渡过雅鲁藏布江，经森波日山，应林麦夏仲的邀请到桑浦寺巡礼，为寺

僧摩顶传法，并瞻仰了俄译师的灵塔。向桑浦寺护法神呈献了哈达，在桑浦寺住宿一夜，又在桑浦内邬庄园停留两天。

五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渡拉萨河回到哲蚌寺。

六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到达拉萨罗布林卡，色拉寺和上密院的僧众列队欢迎。在林卡中扎下帐幕居住了 15 天，庆祝格鲁派的胜利后，达赖喇嘛派哲蚌寺僧人涅贡昂曲杰去担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嘉央活佛的经师，派贡本曲杰扎西去担任车臣汗的喇嘛，随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代表一起去蒙古。甘丹赤巴此时也来到罗布林卡，在聚会时颂扬了固始汗对佛教的护持后，达赖喇嘛等一行到大昭寺朝拜觉卧佛像。拉萨人众扮演松赞干布、王妃、大臣，并举着国政七宝庆祝，涅塘人和扎西岗人表演了跳神，还表演了许多种杂耍。达赖喇嘛委任额尔德尼曲杰为江孜白居寺的堪布，此人后来担任首批派到西藏学习藏文的清朝人的教师。因此他可能是长期在西藏学佛的蒙古僧人。

七月十六日，达赖喇嘛回到哲蚌寺。由于此年长途奔波不息而接触的人多，达赖喇嘛患病，到八月底才痊愈。仲麦巴家族的贵巴扎西在日喀则因战伤去世，达赖喇嘛为其书写祈愿解脱恶趣的总持咒文，并制作了一些印塑泥佛像。拉嘉里新法王举行坐床典礼，请达赖喇嘛参加，达赖喇嘛因病后身体欠佳，未能前往。

秋末，噶玛巴黑帽活佛住在山南洛扎，策动在前后藏和工布发动大规模叛乱。喀尔喀右翼的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东科尔活佛、杰康孜活佛等人到达拉萨。据说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是因为噶玛巴和蒙古的战事前来密商的。此后固始汗和索南饶丹率军经墨竹前去工布平乱。雪喀巴率领的工布叛军包围了精奇寺，当固始汗的大军赶到后，工布军 5000 多人被歼，前藏

形势稳定下来。但是与此同时后藏的僧俗大张旗鼓地发动叛乱，南木林宗很快被叛军占领，仁蚌宗守将曲贝投降了叛军，白朗宗被围，日喀则也受到严重威胁。班禅大师派人到拉萨递送情报求救，囊索诺尔布也被迫放弃江孜宗逃走。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派仲麦巴赤列嘉措去要求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发兵帮助平乱，几经推诿之后，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才让仲麦巴带领他的300名兵丁与固始汗的大王妃贡吉的部下阿勒达和硕齐率领的蒙古兵会合，开往后藏地区平乱。固始汗在精奇寺之战获得胜利后，深入工布，再歼叛军8000余人。在战斗中，噶尔巴的厨师（掌膳食官）曲央被俘，从他的护身佛盒（嘎乌）中搜出一件噶尔巴的密谕，其中有杀死固始汗，监禁四世班禅和达赖喇嘛、摧毁格鲁派的各个寺院，将被关押在内邬庄园的第悉藏巴解救出来的计划。固始汗见到这份文书后深为震愤怒，立即下令彻底打击噶举派，并下令将噶玛噶举派僧人打上印记点交给格鲁派寺院监管，强令其改宗，还传令处死了关在内邬庄园的第悉藏巴，这就使叛军恢复第悉藏巴政权的希望破灭。噶玛巴活佛看见大势已去，从洛扎逃往云南丽江。当固始汗在工布征讨叛军时，达赖喇嘛觉得应趁机拿出格鲁派的威势来，故特意派出使者向固始汗要求在上下工布各划出两三个宗豁由甘丹颇章政权管辖。索南饶丹和达东鼐称赞达赖喇嘛考虑政务比他们周密，在回信中要求达赖喇嘛对政务进行管理，使之完善。达赖喇嘛考虑到格鲁派长远的利益，参与政务的勇气也大为增加。固始汗在工布获得全胜后，达赖喇嘛为表示对神佛的感谢，向护法神敬献了写有题词的哈达。

当时格鲁派人士中传说喀尔喀的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与噶玛巴黑帽活佛建立了书信联系，担心他会支持噶玛噶举派，虽然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多次表白他是支持格鲁派的，但格鲁派

和固始汗方面对他的疑虑很难完全消除。在这种气氛下，固始汗率领部分军队从工布战场先期返回拉萨。

本年十月底，西藏方面派出的色钦曲杰（按《清实录》记载，到达沈阳的还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他是在途中参加到西藏的代表团中还是伊拉古克三和色钦曲杰是指一个人，尚待考证）等抵达沈阳。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伊拉古克三和色钦曲杰等人进上达赖喇嘛、第悉藏巴及萨迦、达垄等派首领给皇太极的信件和礼品。伊拉古克三和色钦曲杰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并献驼马、串珠、皮张、茶叶等礼品。至此，西藏地方与清朝的直接联系正式建立。

水羊年（公元 1643 年　明崇祯十六年　清崇德八年）五世达赖喇嘛 27 岁

正月初，因固始汗与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产生嫌隙，一时形势紧张。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准备隐藏到色拉寺山洛康村，达赖喇嘛向固始汗陈说利害，劝厄鲁特和喀尔喀双方和好。达赖喇嘛的意见得到固始汗的大王妃贡吉的赞同，固始汗也勉强同意。达赖喇嘛并派强林诺门罕和仁绛巴阿旺格勒将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迎护到拉萨，给固始汗和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一起传授了“六臂依怙随许法”，让他们互相立誓和好，消除嫌怨，还让他们一起参加了拉萨正月和二月的祈愿法会。

正月祈愿法会期间，宁玛派的伏藏师域摩活佛从山南多吉扎寺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奉献了却吉旺布和仁达林巴等伏藏师掘出的珍贵经典，以祝贺格鲁派取得的胜利，并与达赖喇嘛互相传习教法，结下法缘。达赖喇嘛将章、夏、兰三地的一些寺属庄园和大量财物赐给域摩活佛和多吉扎寺。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等人在祈愿法会上向达赖喇嘛奉献成千上万的各种物品，

五世达赖喇嘛形容他们“好像要入寺为僧一般”。达赖喇嘛在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所献银质曼遮上题词，又为藏居·丹巴达吉撰写了供日常讽诵的《文殊菩萨修习法》，还应额尔克台吉的请求撰写了《观音菩萨现证法》、《妙音菩萨修习法》。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通晓藏语文，达赖喇嘛给他解说经典，释难解惑，使他心悦诚服。他在祈愿法会上邀请达赖喇嘛去蒙古，称这是全体喀尔喀人的请求。二月祈愿法会后，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动身返回喀尔喀，达赖喇嘛为他赠礼送行。

二月，达赖喇嘛从拉萨返回哲蚌寺，时固始汗和索南饶丹率兵去后藏。达垄寺活佛阿旺扎西贝珠到拉萨缔结噶举派与格鲁派之间的协议，他要向达赖喇嘛行礼致敬，达赖喇嘛提出按以往惯例互换哈达，举行会晤，使达垄方面的人感到很高兴。达赖喇嘛跟从素尔钦波听受了许多教法。当月底，因管事人疏懒，达赖喇嘛的住所哲蚌寺甘丹颇章失火，在修复期间达赖喇嘛移居到色拉寺，直到初夏才返回哲蚌寺。索南饶丹在去后藏时提出将日喀则、协噶、拉孜三地交给第巴吉雪巴管辖，达赖喇嘛不同意，索南饶丹坚持己见，仍照他的安排行事。固始汗也对此不满，打算返回青海，达赖喇嘛请求固始汗为了格鲁派的教法留在西藏，固始汗不得不同意留下。五世达赖喇嘛因此在其自传中称赞固始汗有胆识、有毅力，信仰坚定。

三月，达赖喇嘛住在色拉寺时，林麦夏仲从桑浦寺到色拉寺。他向达赖喇嘛提出，应在拉萨布达拉山修建一座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把色拉寺和哲蚌寺联接起来使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稳固可靠。又说布达拉山是观世音菩萨的住地，修建一座嘛呢修行庙对涤除福田施主身上的罪孽大有好处。达赖喇嘛说只希望在蒙古人留驻期间不出大错，没有修建城堡之类的想法。林麦夏仲针对当时蒙藏各方的状况，从眼

前、长远和最终三方面向达赖喇嘛讲说了布达拉山修建城堡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必要。他分析说，如果蒙古方面有什么变化，西藏再发生这样的战乱，达赖喇嘛也许不得不逃往藏北依赖蒙古人，就会使格鲁派受到重大损失。要使格鲁派站稳脚跟，就要以“矛不见血不折回”的决心修建布达拉城堡。这是格鲁派人士中最早提出的兴修布达拉宫的建议。因此达赖喇嘛称赞林麦夏仲在教法方面与文殊菩萨没有两样，在世俗方面比作大梵天王也当之无愧。

四月，固始汗从后藏返回，达赖喇嘛返回修复的哲蚌寺甘丹颇章，为固始汗传授了长寿灌顶法，为固始汗的王妃还愿撰写了《诸佛菩萨赞颂》。达赖喇嘛任命江达曲杰图多班觉为江达寺堪布，并为国师喇嘛的银质灵塔装藏开光。又派遣翁则多阿林巴、南喀彭措、罗桑顿珠等人到贡噶去学习跳神舞蹈。其间，达赖喇嘛还给喀尔喀僧人罗桑班觉和阿旺格勒讲授梵文和声明论疏课程。因前两年连续发生霜灾，达赖喇嘛举行了防止霜冻的埋藏宝瓶法事。

固始汗的大王妃达勒贡吉病倒，延请达赖喇嘛去做祛邪经忏法事，并传授随许法。此时固始汗和达勒贡吉又提出要达赖喇嘛去青海，达赖喇嘛通过素尔钦波向宁玛派域摩活佛请教该不该去青海，域摩活佛回信说现在的蒙古人并不是真正的迎请者，若干年后会有与蒙古人服饰不同的人从东方前来迎请，你到那时前往，但是不要久留，要即时返回西藏。这说明当时西藏一些高僧已觉察到新兴的清朝的影响，预测清朝有可能在蒙古人之上对西藏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另据《清实录》崇德八年九月戊申条记载，当年固始汗已遣使向清朝奏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因此该年固始汗邀请达赖喇嘛去青海的本意可能是为清朝迎请达赖喇嘛

做准备，而这一意图可能已被一些西藏高僧察觉。同时固始汗还要求五世达赖喇嘛写一部详细记载西藏王统世系和各地方僧俗势力沿革的历史书，因此达赖喇嘛从夏初开始写作，至七月三日在哲蚌寺甘丹颇章写成《西藏王臣记》一书。此书本来计划要译成蒙古文，故缮写员由蒙古僧人阿旺格勒担任。另外此书是为了让固始汗了解西藏地方政治的沿革而写的，因此比较注重元明两朝西藏各政治势力的变化情况，不同于一般宗教史家所写的教法史，对藏族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书末还附有固始汗的一篇小传，对史学界了解固始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年夏天以温萨活佛和土尔扈特岱青（疑即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为首的大批香客从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牧地来到拉萨。土尔扈特岱青向达赖喇嘛赠送100匹带鞍具的马。温萨活佛和土尔扈特岱青又请达赖喇嘛到大昭寺，呈献了成千上万件重要礼品，达赖喇嘛在大昭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回向祈愿法事。此外，由达垄寺活佛居间调停，噶玛噶举派楚布寺的贾曹活佛扎巴却央（公元1617—1658年）来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献礼致敬。在噶玛巴黑帽活佛却英多吉逃到山南和丽江期间，贾曹活佛代管噶玛噶举派在前后藏的寺院和庄园，他向固始汗和达赖喇嘛请求归还在噶尔巴之乱中被格鲁派占据的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和庄园，结果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同意归还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则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另一方面通过贾曹活佛的这次献礼致敬，噶玛噶举派从此承认了达赖喇嘛对它的管辖权，达赖喇嘛派遣一名官员常住楚布寺，监督噶玛噶举派的行政事务。至此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统治地位确定下来。

十一月，因哲蚌寺一带又有天花传染，为避痘症，达赖喇

嘛和固始汗等经过墨竹工卡前往沃噶，并从沃噶前往曲科杰寺朝礼。年底，达赖喇嘛居住在沃噶宗，固始汗等人返回拉萨。

本年五月，西藏派往沈阳与清朝联系的使者伊拉古克三、戴青绰尔济（色钦曲杰）等离开沈阳返回西藏。皇太极率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设宴饯行。又命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人送至永定桥，再设宴饯行。皇太极还派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等人和伊拉古克三等同行，带去皇太极给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噶玛巴红帽活佛、第悉藏巴、固始汗及萨迦、主巴、达垄等教派首领的信件。八月初，皇太极病逝，顺治帝继位，年仅6岁，由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前往西藏的使臣和伊拉古克三等可能停留于途中，以待新君之命。

木猴年（公元1644年 明崇祯十七年 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五世达赖喇嘛28岁

达赖喇嘛在沃噶度过藏历新年，并写信请林麦夏仲去拉萨主持祈愿法会。沃噶蔡居瓦在沃噶举行盛大的金刚橛跳神活动，达赖喇嘛为100多人授比丘戒或剃度出家，并为温仲希瓦桑布讲授长寿灌顶法。春季，达赖喇嘛召请涅完昂拉瓦·阿旺坚贝洛追到沃噶，并跟从他依据《无上喜乐注疏》学习占卜术。春季，温布额尔德尼珲台吉在返回喀尔喀的途中维修了塔尔寺的宗喀巴纪念塔，用白银将塔身包裹，并写信告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他寄去了祝贺信。

夏初，温萨活佛在扎什伦布寺突然亡故，土尔扈特岱青为防止染上天花，从日喀则移居藏北当雄。土尔扈特岱青和固始汗的大小王妃急着要返回蒙古，索南饶丹请求达赖喇嘛到萨丹，以便为土尔扈特岱青等送行，因此达赖喇嘛从沃噶启程，

经墨竹、仁钦里、汤嘉铁索桥前往萨丹。土尔扈特岱青和大小王妃从日喀则到拉萨后，达赖喇嘛从萨丹返回哲蚌寺，大王妃达勒贡吉用日喀则的珍宝玉石等饰物为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的释迦牟尼像新制作了头饰，达赖喇嘛为此撰写了祝贺头饰制成的文章。达赖喇嘛还应土尔扈特岱青和大小王妃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佛法，并赠礼送行。当时，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为反对沙皇俄国控制土尔扈特部的企图和贸易限制，与沙皇俄国当局尖锐对立，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土尔扈特岱青急忙返回故乡可能与此有关。1644 年夏天，和鄂尔勒克及其几个儿子在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河流入里海处）附近在与俄军战斗时阵亡。土尔扈特岱青为和鄂尔勒克长子，返回伏尔加河流域后继立为土尔扈特部首领。蒙古史学界认为，土尔扈特岱青（书库尔岱青）能够巩固对土尔扈特部的统治，建立土尔扈特汗国（俄国人称其为卡尔梅克汗国），他到西藏的访问及得到达赖喇嘛的承认和支持是重要原因之一。

夏季，达赖喇嘛将林麦夏仲从桑阿喀请到哲蚌寺，为达赖喇嘛详细讲说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七月底，宁玛派的域摩活佛去世，达赖喇嘛主持了超荐和火化遗体的仪式。秋初沐浴节的 7 天中，达赖喇嘛到拉萨丹布林卡下帐居住，举行喜宴，从这一年起，五世达赖喇嘛历年到拉萨过沐浴节时都受到仲麦巴家族的盛宴款待。秋天，达赖喇嘛派遣持律师阿旺群培去厄鲁特部办理公事，并要求第巴索南饶丹修复了在日喀则的松赞干布创建的厌胜寺藏章寺。

此年中，因固始汗不满第巴吉雪巴控制后藏大部分地区，吉雪巴只好交出对日喀则的管理权，囊索诺尔布接任日喀则宗本，人称第巴诺尔布，成为格鲁派中的另一股势力。秋末，帕竹派的首领从乃东到拉萨，向达赖喇嘛献礼致敬。

本年正月，顺治帝命察干格隆等和伊拉古克三等人仍按原计划进藏，并增加迎请达赖喇嘛的使命。冬末，色钦曲杰、察干格隆等人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固始汗等转交了清朝皇帝的信函及礼品。不久，喀尔喀左翼的诺门额津（以即赛音诺颜部的丹津喇嘛，号诺门罕，为喀尔喀八扎萨克之一）、厄鲁特部的著名高僧琼结班智达（即扎雅班智达）等人也抵达拉萨。察干格隆、色钦曲杰、诺门额津、琼结班智达等人在哲蚌寺连续发放布施 20 余天，向达赖喇嘛分别奉献百份、千份礼品，达赖喇嘛按他们的要求传授教法，并给一百多人授了出家戒或比丘戒，为蒙藏人士做了大圆满菩提回向法事。

此年夏季，举兵反对固始汗的噶尔巴等人从山南洛扎逃往康区。固始汗和索南饶丹派出一支 700 多人的蒙藏联军开往门隅，与支持噶举派的不丹发生冲突，蒙藏联军作战失利，领兵的囊索欧珠、仲孜鼐等人被俘，蒙古兵战败逃回。固始汗和格鲁派的西藏地方政权和支持噶举派的不丹之间的战争正式开始。

本年中达赖喇嘛开始写作《现观庄严论注疏》，由仲然巴索南曲桑担任校订。达赖喇嘛还为巴图尔珲台吉携带念诵撰写了《六臂依怙献供法》，还撰写了《嘉央喇嘛官却群培（即林麦夏仲）传》。

本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崇祯帝自杀。四月，明朝大将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军。五月初，清军占领北京，八月，顺治帝从沈阳动身来北京，并宣布迁都。九月，顺治帝到北京，于十月初一祭告天地，在明朝皇宫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建都称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为辅政王。

木鸡年（公元1645年 顺治二年）五世达赖喇嘛29岁

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度过藏历新年，向欲界主母供献食子，呈献祈求满愿的敬神哈达。西藏各地方首领、各宗豁的长官、各个寺院及僧团的执事等先后前来哲蚌寺向达赖喇嘛呈献新年礼物。在新年宴会上，达赖喇嘛按献礼的名册给各僧俗首领奖赏了大量物品。固始汗从贡噶给达赖喇嘛写信祝贺新年，达赖喇嘛回信为其祝赞吉祥。

达赖喇嘛到拉萨参加正月和二月的祈愿法会，来自各地的香客奉献了大量财物。在法会期间达赖喇嘛寄发了委任芒域译师才丹坚赞为昂仁寺堪布的文书，为色钦曲杰撰写了僧俗二规取舍的文章，为土谢图汗多尔济依止本尊而撰写了宗喀巴大师祈愿文，为巴图尔珲台吉依止金刚持而撰写了上师瑜伽修习法，为喀尔喀诺门额津撰写了祈愿文。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为工布盘德寺的活佛等百余人传授了出家戒或比丘戒。达垄玛钦活佛从山南洛扎来拉萨拜见达赖喇嘛。

由于林麦夏仲等人的建议，格鲁派决定按地方首领的例规兴建一座城堡作为政权中心，考虑到贡噶庄园距离色拉、哲蚌等格鲁派大寺院很远，因此选定在拉萨布达拉山（玛波日山）修建。按林麦夏仲的请求，达赖喇嘛三月二十五日离哲蚌寺前往布达拉，主持兴建城堡（即布达拉宫）的净地仪式。

二十六日进行准备，索尔钦波负责煨桑物品和向八部鬼众供施，喇钦昂拉哇进行历算测日。二十八日索尔钦波在房顶插置经幡，进行祷告，吹响宗喀巴、萨迦班智达等先辈圣贤的法螺。二十九日在布达拉山中心陈列金刚橛供品，由格丁喇嘛率领跳神官及南杰盘德林扎仓僧众举行净地仪轨。

原先在布达拉山上供有松赞干布的本尊神像圣者洛格夏拉像（自在观世音像），第巴吉雪巴曾将此像迁到扎噶，后来又

为请兵将此像献给土默特色钦台吉，被带往青海。固始汗的大王妃达勒贡吉在青海从东科尔温布处寻得此像，派曼殊室利曲杰送回西藏，于二十九日到达拉萨大昭寺。

四月一日，正式举行兴建布达拉宫的净地典礼，拉萨各寺庙僧众和四乡男女老少倾城出动，僧俗人等各持伞盖、旗幡、熏香、花束、乐器夹道迎送圣者洛格夏拉像从大昭寺启程，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由大队蒙藏骑兵簇拥，随后护送，直接送到布达拉山的后殿，举行讲说此佛像的历史的仪式。下午开始破土动工，由南杰盘德林扎仓的僧人挖土，背土的人的名字都带有吉字、善字。此外还举行了埋藏宝瓶、祭祀龙类、镇伏怨敌的仪轨，达赖喇嘛为布达拉宫动工兴建撰写了《上师作法仪轨》和《欲界自在天女酬补请托圆满吉祥颂》。

开工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于四月十一日返回哲蚌寺。1642 年固始汗的大王妃达勒贡吉下令拆除第悉藏巴在日喀则修建的大寺院，将木料运到拉萨用于修建大昭寺的回廊，到这时建成了内有 100 根柱子的殿堂和有 8 根柱子的门楼。按达赖喇嘛的命令在襄地方创建了噶丹曲科寺，达赖喇嘛任命喀尔喀热绛巴罗桑班觉为该寺的讲经师。四月间，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大经堂连续宣讲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前半部分，历时 20 多天。达赖喇嘛又规定在宗喀巴忌辰（十月二十五日）在桑耶寺供献五种供品各 60 份，在甘丹寺宗喀巴灵塔献五种供品各 50 份。

夏季和秋季，由格丁喇嘛和多吉扎寺僧人贡桑旺布在哲蚌寺传授念诵金刚橛和寿命主的咒语，达赖喇嘛应格丁喇嘛的请求撰写了《本生祈愿文》，撰写了《曲科杰寺规》，按林麦夏仲的指示写成了《现观庄严论教法传承祈愿》。达赖喇嘛向索南饶丹建议创建一所有 30 多名学僧，生活由地方政府供给的医

宗学院，讲习《四部医典》，学院建成后，命名为“索日卓盘林”(利生医宗学院)，达赖喇嘛委任努玛尔宁塘夏仲·罗桑嘉措为医宗学院的堪布。

秋季，达赖喇嘛召请后藏学者班钦曼卓巴的传承弟子绛央旺杰多吉到哲蚌寺，为达赖喇嘛详尽解说声明学中的疑难问题。达赖喇嘛还跟从他听受了仁蚌巴所写的《诗学明镜注疏》、《声律学》、《音势论》、《三十颂》以及《五曜历算表》等。格鲁派中一些人对此讥讽说：“这是把喇嘛寄托给俗人家。”达赖喇嘛认为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许多向俗人求教的例子，因此对这些讥讽不以为然，并在旺杰多杰的鼓励下撰写了《长韵律占星经论》，在旺杰多吉返回后藏时赠送了大批礼物，报答师恩。

秋天，云南丽江木土司派遣的使者抵达拉萨，向固始汗和达赖喇嘛请安致敬，并附带给达赖喇嘛送来礼品。当时噶玛巴黑帽活佛逃到丽江，木土司是噶玛巴的支持者，他此次遣使是想与格鲁派改善关系的一种表示。此时又发生止贡寺活佛的内侍那古瓦控告止贡活佛诅咒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的事件，达孜台吉将止贡活佛诱骗到拉萨，将其侍从监禁在达孜审讯，审问出确有此事，故达孜台吉决定没收止贡的大部分宗谿，查封止贡活佛在拉萨的住所。素尔钦波请求达赖喇嘛帮助止贡活佛，因此达赖喇嘛两次写信给索南饶丹，为止贡活佛求情，但都遭到拒绝，达赖喇嘛又写信给固始汗，派格西格达瓦送去。次日止贡活佛的侍从被放出，止贡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磕头立誓再不诅咒格鲁派，止贡寺的大部分寺属庄园被没收，但为止贡派保留了止贡寺以及收入可以供给 20 多名僧人衣食费用的庄园。事后，止贡活佛写信给达赖喇嘛表示感谢，但格鲁派的大多数人却为达赖喇嘛没有趁此机会扫除止贡派而感到失望。桑耶松喀地区的人不愿归属扎喀瓦第巴管辖，向索南饶丹控告

扎喀瓦，索南饶丹和达赖喇嘛商议后决定，将扎喀、桑耶、松喀移交给达孜台吉，以便于维修桑耶寺。达孜台吉即向达赖喇嘛提出，请求给予资助，维修桑耶寺的殿堂。在大昭寺和小昭寺庙祝们的请求下，本年里达赖喇嘛撰写了《拉萨大昭寺小昭寺寺志》。

火狗年（公元1646年　顺治三年）五世达赖喇嘛30岁

达赖喇嘛在哲蚌寺欢度藏历新年后，前往拉萨，主持正月祈愿大法会，在法会上讲说《释迦牟尼本生经》，并向大、小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宗喀巴大师像、吉祥天女像呈献有题词的敬神哈达。当时，拉达克派遣使者前来，为其王僧格南杰的逝世而奉献斋僧茶、白色和红色宝石、黄金、藏红花等物品，在法会上举行了隆重的回向祈愿法事。

青海东科尔活佛朵居嘉措、贝钦台吉、火落赤部首领的转世等人到拉萨，在僧众集会上发放斋僧茶和回向礼物，举行大圆满菩提法事。当时盛传朵居嘉措是通过“夺舍法”转世的活佛，其上一世活佛甲哇嘉措在去厄鲁特蒙古的途中在甘州去世，没有经过投胎转生，灵魂像鸟儿飞翔一般进入一个正被送往墓地的20来岁的汉人青年的尸体中，尸体复活并声称自己就是东科尔活佛。五世达赖喇嘛说像卓弥译师那样的大成就者据说可以用夺舍法让灵魂离开或进入自己的身躯，像东科尔活佛这样的用夺舍法转世。何故如此，不得而知。

拉萨祈愿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前往桑阿喀寺，祝贺林麦夏仲在该寺建的佛像完工，在该寺住宿两天。林麦夏仲向达赖喇嘛提出，止贡寺在格鲁派的首寺甘丹寺创建时曾担任过施主，希望达赖喇嘛对止贡寺给予帮助。从桑阿喀寺返回时，达赖喇嘛巡礼了蔡公堂寺，下榻于曲赤拉章，并为该寺大佛塔和

经堂的维修工程抛撒鲜花祝赞吉祥。

藏历三月初二日，嘉央喇嘛官却群培（即林麦夏仲）在甘丹寺宗喀巴大师像前圆寂，达赖喇嘛闻讯后派人去大昭寺献装饰佛像的黄金2两，向觉卧像和甘丹寺宗喀巴大灵塔呈献题词敬神哈达及供灯，悼念林麦夏仲去世。

四月，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听到顺治帝在北京即位称帝的消息，即派乌巴什克雅台吉为使者，前往北京敬献贺信及礼品。

主巴派活佛布山旺波的转世灵童，有琼结贝觉饶丹之子和出生于洛扎拉康的两个灵童，主巴派内部因转世问题而争执不休，拉孜活佛为此到拉萨请求达赖喇嘛辨认，达赖喇嘛依据在本尊神像前占卜和晚上的梦境，回答说洛扎拉康的那个孩子很可能是真正的活佛。

夏季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僧众集会上讲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历时20多天。又按林麦夏仲生前的指示，撰写了一部解释疑难的《俱舍论注疏》。接着闭关念修极密四业法，历时一个多月。其间给乃东夏仲、达垄寺活佛、塔尔寺法台赞布诺门罕、曼卓班钦等人写了回信，又应热绛巴罗桑曲扎的请求撰写了《从贾曹杰到嘉央官却群培的菩提道次第注（即从贾曹杰到官却群培的34位甘丹赤巴的传承事迹）》等。

按照域摩活佛生前所写的转生的地点、山川、寺院、村庄的预言，在曼喀南色林寻找到绛巴仁增阿格旺布的转世灵童。6月间灵童来到拉萨，6月16日达赖喇嘛为灵童剃度，起法名为罗桑白玛赤列特却旺格杰布。

八月间，乃东夏仲师徒到拉萨。

八月十四日，达赖喇嘛为帕竹家族出身的乃东夏仲剃度，起法名为罗桑钦则旺秋诺增却吉杰布，并给他传授皈依律仪、长寿灌顶和六臂依怙随许法。九月间，喜饶喇嘛到达拉萨，为

在喀尔喀蒙古身患重病的色钦曲杰嘉哇赤列举行经忏法事。当喜饶喇嘛返回蒙古时，达赖喇嘛命他代向顺治帝上表献礼。此时不丹首领向第巴索南饶丹请求通过绛巴达波与琼结巴建立密切关系，请拉萨方面派人去不丹，共同约束南北僧侣寺院，禁约那些阻挡锡金人到西藏的人，以便按第悉藏巴时代的例规向西藏交纳大米税。并说在猴年得罪了蒙藏联军，很感不安，请设法让门隅和藏人得到安宁。第巴索南饶丹倾向同意不丹的和平建议，但后藏襄扎西孜寺的僧人坚持要不丹人把仲孜嘉协蔡寺交给他们管辖，并为此给班禅大师写了措辞不逊的信，于是索南饶丹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

冬天，达赖喇嘛在翁则罗桑云丹的协助下研习舞蹈和跳神。撰写了《布达拉宫帕巴拉康佛殿志》，因固始汗的劝请写了《向宗喀巴大师祈愿文》等。

火猪年（公元1647年　顺治四年）五世达赖喇嘛31岁

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庆祝藏历新年，向佛像敬献了写有祈愿词的哈达。在去拉萨参加祈愿法会的途中，被吉雪活佛迎请到扎西同曼（住宅名）招待赠礼，都日雅勒也向达赖喇嘛呈献了百份礼品。在法会上达赖喇嘛向觉卧佛像、护贝龙王像、乃穷护法呈献了敬神哈达，并给吉隆的满愿观音像送去了敬神哈达。拉加里法王在法会上向僧众布施，并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大量礼品。达赖喇嘛按惯例设午宴招待拉嘉里法王、吉雪巴、第穆活佛等，并给参加辩经的僧人提供晚饭甜茶。达赖喇嘛还给拉嘉里法王等人传授了灌顶法、随许法等。拉巴领主及属下准备雕刻《般若》、《俱舍论》、《王统世系》的印版，达赖喇嘛为此写了序言，并为两名刻版者写了日常念诵的祈愿文，还为固始汗第六子达赖巴图尔和才旺丹津二人体验佛法撰写《檀香度

母修习法》。

在法会上，达赖喇嘛为主巴活佛剃度并授沙弥戒，为之起名为罗桑米旁旺布欧敦珠贝辛达噶举嘉措，并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白度母和六臂依怙随许法，赠送了袈裟、马具等大批礼物。青海西纳囊索为首的安多地区的香客来拉萨参加祈愿法会，达赖喇嘛为他们传授了教法。祈愿法会后，在返回哲蚌寺的路上，达赖喇嘛登上布达拉山，观看修建布拉宫的工程，向圣者洛格夏拉像呈献了敬神哈达。

夏季和秋季，达赖喇嘛住在哲蚌寺，用了3个月写成《入中论注疏》，在恰多巴顿宁伦珠的劝请下写成《格言教诲》，在康巴咒师的劝请下编写了《汗王（固始汗）行状》，从十月到十一月写完了《诗学明鉴注疏》，请曼卓班钦审阅后，与《诗学明鉴》(即《诗镜论》）一起刻版刊行。当时固始汗正在制定在西藏通行的法律条文，达赖喇嘛为这部《蒙古公共法典》写了前言。当年，护法神预言说固始汗可能遇到违碍，占卜的结果也是如此，为去除危害，固始汗从贡噶派雪多曲则到拉萨负责举行消除违缘和使蒙藏各地平安的专门的经忏法事，在法事结束举行退敌咒语灵器供法事仪轨时，达赖喇嘛到盘德勒雪扎仓担任仪轨的金刚阿阇黎。扎叶巴寺成立噶丹桑阿羊孜扎仓(密宗学院)，有百余名青年出家，达赖喇嘛前去给他们起了法名，并任命琼结果贝热绛巴罗桑扎西为该扎仓的堪布。甘丹赤巴达布曲杰（似即第38任甘丹赤巴丹巴坚赞）去世，甘丹寺派人送来回向礼物，达赖喇嘛为其诵经祈愿。

秋初，顺治帝派遣的使者克雅喇嘛等僧俗人员到达拉萨，同来的还有蒙古等地的香客。厄鲁特曲杰迎请达赖喇嘛到僧众集会上，钦差们向达赖喇嘛转交了皇帝的圣旨和赏赐物品，并向僧众发放了大量的布施。达赖喇嘛给钦差们传授了文殊、度

母、金刚手、弥勒、药师佛的念修随许法，并传授了灌顶法。当钦差离开拉萨回北京时，达赖喇嘛派人随钦差进京呈献奏折及礼品，另外还带去达赖喇嘛给贡伦阿玛王（应是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的书信和礼物。达赖喇嘛还给与钦差同来的香客中的 20 多人剃度授戒。据四世班禅自传，此次钦差还给四世班禅转交了顺治帝的圣旨的礼物等。

秋季，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的长子堪卓（一译为罕都）率青海等地的香客到达拉萨，堪卓向达赖喇嘛奉献备有银鞍的白马等礼品。达赖喇嘛给堪卓传授了马头明王随许法，给察罕诺门罕的代表及扎尼鲁本等传授六臂怙主随许法，给吉雪夏仲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固始汗、索南饶丹等前往后藏，此时有人报告一些其他教派的僧人向固始汗和格鲁派施放恶咒，使格鲁派僧人做的法事仪轨不起效用。固始汗和索南饶丹下令宁玛派的法事只准康巴咒师按固始汗的命令举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举行。

冬季，达赖喇嘛应林麦温布的请求前往桑普寺居住两天，为林麦夏仲的灵塔建成抛撒鲜花祝赞，还向灵塔和护法神献了题词哈达。十二月，喀尔喀夏仲强巴的转世代表及嘉协曲杰、诺门达拉等到达拉萨，布施斋僧茶并向达赖喇嘛献礼。

土鼠年（公元 1648 年　顺治五年）五世达赖喇嘛 32 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按照惯例在哲蚌寺担任退敌天女酬补仪轨的金刚上师，向退敌天女呈献敬神哈达。帕竹首领给达赖喇嘛写来诗体新年贺词。新年后达赖喇嘛前去拉萨主持祈愿大法会。给 100 多人传授了比丘戒，并在八日、十五日等吉日给沙弥尼传戒，向大昭寺各佛殿献敬神哈达。喀尔喀香客返回时，达赖喇嘛给夏仲强巴活佛和额尔德尼珲台吉寄去书信。

从上年底到本年初，西藏派兵大举进攻不丹，前藏军进至距不丹首府普那卡仅一天路程之地，后藏军包围了洪热喀地方。但是第巴诺尔布一军战败后仓皇退回帕里，使深入不丹的前藏军连撤回都非常困难，此次西藏出兵以先胜后败结束。

三月，固始汗和索南饶丹从后藏返回拉萨，与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随后固始汗前往当雄时，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索南饶丹前往当雄安排桑珠德钦寺的兴建工程时，达赖喇嘛向财神、文殊像呈献了祈愿工程顺利进行的敬神哈达。

四月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及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代表、色多托因等人到达拉萨，色多托因向达赖喇嘛献马 40 多匹。

五月，达赖喇嘛给精奇寺堪布洛巴曲杰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摧破金刚随许法，给甲山（铁桥）活佛讲授了夏仲达波的著作。此时布达拉宫的兴建工程进入绘制壁画阶段，在大厅中绘有从藏人起源到佛教在西藏弘传的历史，索南饶丹又召集以曲央嘉措为首的前后藏的技艺高明的画匠，绘制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的前世及转生的故事，在甘珠尔殿中绘制菩提道次第传承（即格鲁派历代传法大师），在围廊上彩绘拉萨祈愿大法会的场景。达赖喇嘛应工匠们的请求撰写了韵文和散文的布达宫赞颂及大厅壁画的题记。达赖喇嘛的舅父古云巴·更噶嘉钦饶丹从浪卡子到哲蚌寺。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及马头明王、度母、文殊、胜乐、六臂怙主的随许法等。

六月，达赖喇嘛依照索南饶丹的请求主持当年的住夏活动，哲蚌寺各扎仓的堪布与达赖喇嘛一起住夏。洛色林扎仓的堪布布达巴主张住夏的时间应为 3 个月（按印度佛教徒的传统，僧人在雨季住夏安居 3 个月，在此期间内僧人不得外出），引起了争论，达赖喇嘛认为布达巴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在西藏根据僧众的情况，通常住夏安居只有印度一半的时间。

萨迦派的温仁波且到哲蚌寺，达赖喇嘛给他讲授了《祖师问道录》等经文，谈论佛法。他又要去贡塘寺听受佛法，请求索南饶丹供给听法的薪俸，索南饶丹在历数萨迦派曾经给格鲁派造成的损害后，还是同意了给温仁波且拨给一份薪俸。固始汗从当雄到拉萨，与达赖喇嘛、索南饶丹商议后，共同派遣格杰班第去召请巴图尔台吉。并派额尔德尼色多曲杰携带通行证书前往喀尔喀，作为办事的代表。噶当派的主寺热振寺改宗格鲁派后，仍然是上下两寺各自传承教法，经第巴索南饶丹亲自调停，由达赖喇嘛委任绛孜曲杰阿旺多杰为热振寺吉索堪布，颁给委任文书，命其统管热振上下两寺。达赖喇嘛给固始汗及其第六子达赖巴图尔传授了马头金刚和怙主随许法。达赖巴图尔前往康区时，达赖喇嘛为其饯行。

八月，按照桑耶寺大护法的请求，达赖喇嘛给桑耶寺献了铙、钹等供品。时噶丹曲科央孜寺建成，达赖喇嘛给热绛巴阿旺格勒授比丘戒，派遣他去噶丹曲科央孜寺讲经传法。此时达赖喇嘛患了严重的鼻炎，由强俄本仓演盘负责治疗，索南饶丹协助照顾侍候。

九月，温仁波且在拉萨为达赖喇嘛举行祈愿长寿的法事，达赖喇嘛向他请教了萨迦派察尔钦大师的《上师祈愿经》和禳解病魔的法事。达赖喇嘛给以墨竹恰噶京俄为首的一些僧人授了比丘戒，并应强俄本仓演盘的请求撰写了《宇妥精粹羯磨仪轨》。以曲杰阿旺坚赞为首的喀尔喀香客到达哲蚌寺，接连几天在僧众集会上向达赖喇嘛赠礼，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回向祈愿并传授佛法。

十月，索尔钦波到达哲蚌寺，达赖喇嘛向他请教了耳传教诫、格鲁派的密咒等教法。由达赖喇嘛任堪布、南杰扎仓的讲师夏康巴任屏教师，给第穆活佛传授了比丘戒，起法名为阿旺

格勒坚赞。

十一月中，止贡夏仲却吉扎巴到哲蚌寺商借物品，达赖喇嘛给他讲解了《律论详注》，并向他请教草药方面的知识。顺治皇帝派遣的使者喜饶喇嘛、藏巴噶居、达赖曲杰、墨尔根俄布、楚臣库雅等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赏赐的缎匹、珍宝等物以及召请达赖喇嘛进京会见的谕旨，达赖喇嘛给使者们传授了长寿马头金刚随许法，并赠送了礼品。

土牛年（公元1649年 顺治六年）五世达赖喇嘛33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按例在哲蚌寺向神像呈献供品和哈达，并主持庆贺新年的集会。正月初三，达赖喇嘛到布达拉宫，为顺治帝派来的使者们传授了马头金刚、怙主、叶衣佛母随许法。达赖喇嘛对使者们说，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同意前去北京，但因中原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所以到北京后不能长期停留，并将这一想法写成奏章，派噶居喜饶和翻译霍尔扎西先行带回北京复命。五世达赖喇嘛认为，在第悉藏巴统治时，由于法律不严和战乱，常有盗匪阻断商路交通，造成物价昂贵，民生艰难，从固始汗入藏建立格鲁派统治后，从打箭炉至阿里之间一片安宁，老媪可以负金而行，这是固始汗和索南饶丹的功绩，因此五世达赖喇嘛为固始汗和索南饶丹撰写了传记。

三月，乃东夏仲前来拉萨，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沙弥戒，并起法名为罗桑索南旺秋扎巴南杰贝桑，达赖喇嘛还给乃东夏仲和乃宁赤巴传授了吉祥退敌天女随许法。在定日协噶尔建立的格鲁派寺院，原由一位后藏老喇嘛负责，但此人克扣僧俸，给寺院造成损失，所以达赖喇嘛命工布恰那热绛巴桑结班觉前去该寺担任堪布，管理寺院。固始汗的小王妃病危，达赖喇嘛

为她传授了几种随许法，并祈愿她往生善趣。小王妃临终前，为了积善，向大昭寺觉卧佛像献了酥油灯和哈达，向格鲁派各主要大喇嘛送了回向礼品，向以三大寺为首的132座寺院发放了布施，总计约合粮食25000克（每克合28市斤）。另外还捐青稞5100克，在拉萨龙王潭建造一座一层楼高的镶嵌珍珠宝玉的银质大菩提塔。此时固始汗也患重病，达赖喇嘛为他做经忏法事，进行禳解。

四月，达赖喇嘛给以乃宁夏仲和色拉寺杰巴扎仓堪布为首的一些僧人传授了莲花极密大灌顶法和四部灌顶教诫，还给杰巴扎仓和下密院的300多僧人讲授了宗喀巴大师的《四大赞颂》等，给医宗学院和木鹿寺僧众传授了药师佛和六臂依怙随许法，给喇嘛卓玛鼐、咒师敦珠扎西、却本、翁则四人传授了仁增热丹林巴所传的大圆满灌顶教诫、观修法要，历时20个昼夜。

四月十五日，哲蚌寺僧众举行集会念诵经咒，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随后举行长净仪轨，并绕行布达拉宫，转经祈福。

四月十九日，色拉寺僧众在布达拉宫大经堂中向达赖喇嘛呈献了大批祈寿的礼品。达赖喇嘛委派冈果热绛巴阿旺嘉措为洛扎多沃宗新建的甘丹端尼寺的上师。拉嘉里法王经三代人刻印成《现观庄严论》和《俱舍论》，派人将印成的经典送到哲蚌寺。

五月，达赖喇嘛以三界佛母灵器进行供祭，召来以艾巴活佛霍尔达为首的能工巧匠，在布达拉密法乐园内殿中塑建麻哈噶喇、金刚橛、退敌天女、毗沙门、宝帐怙主等护法神像，在护法殿中塑建护贝龙王像，并进行装藏。第穆活佛阿旺格勒坚赞前往康区，行前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威猛火剑灌顶法、马头

明王、怙主随许法等，并给第穆活佛的随从传授了教法。

六月，达赖喇嘛给扎那曲杰等人传授《噶当教法史》，给曲杰本达哇、布卓阿旺伦珠、强俄肅古云巴、嘉雅格隆等人传授那若空行体验法等，历时近一个月。

七月，达赖喇嘛建立忿怒明王修行供，给色拉寺的嘉央扎巴等僧人教习施放六十食子的方法，随后派嘉央扎巴去后藏寺院为新建的银塔装藏献供。

八月，达赖喇嘛向素尔·嘉央喇嘛请教了许多旧密和新密的甚深教法。

十月初，金刚持甘珠尔钦波到哲蚌寺，达赖喇嘛向他请教60余种灌顶法，并谈论修证体验，为时达三个月。

十二月，班钦曼卓巴日宁嘉措日增去世，其弟子派人来向达赖喇嘛报丧，并奉献念诵超度经的礼品，达赖喇嘛派人送去回信及礼品，在哲蚌寺中安排经忏法事。

铁虎年（公元1650年　顺治七年）五世达赖喇嘛34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到布达拉宫，参加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向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呈献了祈愿利乐增盛的哈达，并给60多人传授了比丘戒。新年期间，为纪念固始汗小王妃的外供银质佛塔造成，供奉于龙王潭，达赖喇嘛参加了为之开光的仪式。祈愿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

二月，以察罕诺门罕为首的一批香客从青海到拉萨哲蚌寺，向达赖喇嘛呈献佛像等大批礼品，达赖喇嘛给达瓦活佛传授了沙弥戒，为他起法名为丹增晋美多杰。

三月，五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向顺治帝请安的使者噶居喜饶返回拉萨，带来顺治帝赐给达赖喇嘛的银器、雕鞍，赐给固始汗的甲胄、腰刀、雕鞍等。顺治帝派遣的使臣诺木齐喇嘛、

达温诺尔布温布、多诺克雅等人也到达拉萨，再次向达赖喇嘛颁赐了召请进京会见的圣旨和礼品等。清朝的使臣们还向僧人接连发放布施10天，达赖喇嘛的侍从等也都得到了礼品。本月中，达赖喇嘛委派墨如噶居彭措曲丹为哲蚌寺德阳扎仓堪布。达赖喇嘛开始按桑浦寺热瓦堆扎仓的课程学习因明学。

六月，清朝使臣诺木齐喇嘛等离开拉萨，达赖喇嘛派色钦温布罗桑却培随钦差去北京，向顺治帝呈表，献舍利子等礼品。察罕诺门罕离拉萨回青海，达赖喇嘛给他传授随许法，并赠礼品送行。

曼卓班钦到哲蚌寺居住一个多月，达赖喇嘛向他请教如何识别青铜、杂铜、汉地所造的新旧佛像的知识，他作了详细介绍。蒙古都日雅欢津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献了绸缎、金银、茶、布匹、坐垫、马、骆驼等成千上万的礼品。都日雅欢津体弱多病，达赖喇嘛给他传授随许法，并做了驱魔洗浴仪式。达赖喇嘛给巴日活佛阿旺白玛赤列传授了比丘戒，给乃宁夏仲岗坚堪布传授了根敦嘉措文集中的尼古六法经文传承。

闰八月，达赖喇嘛患鼻炎，病势减轻后向贡塘寺甘珠尔钦布请教《怙主密示》、《内外教导之常规》及坛城仪轨等，甘珠尔钦布为达赖喇嘛举行了祈寿仪式。

九月，达赖喇嘛在僧众大会上宣讲《宗喀巴大师传》、《菩提道次第论》等经文。并给丹萨贡东居仁波且、曼卓班钦旺杰、喀尔喀右翼的东科尔活佛写信。当时达赖喇嘛为了藏区的安乐，要求每个宗本、头人都举行初十日的供养仪轨，布置了念诵的经典和羯磨仪轨，但是由于对初十供养的看法不同，有许多人不积极执行。

十月，达赖喇嘛的一些侍从患了热病，达赖喇嘛自己也染上了喉症，经过医生强俄巴兄弟二人的精心治疗和索南饶丹等

人的护理，并做了经忏法事，经10天后达赖喇嘛渐渐痊愈。

十二月，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子嘉央活佛和卫拉特部的都古棱策仁等许多蒙古香客到达拉萨。由于嘉央活佛被认为是哲蚌寺的创建者嘉央曲杰的转世，所以他受到哲蚌寺僧众排列马队的盛大欢迎。嘉央活佛在哲蚌寺连续向僧众布施十多天。索南饶丹为对抗南方的不丹举行镇伏法事，命素尔波且在贡塘寺主持，又下令在帕日的山上设置“龙达”，准备派阿旺南杰去主持，但阿旺南杰不久就突然生病去世。

铁兔年（公元1651年　顺治八年）五世达赖喇嘛35岁

藏历新年过后，达赖喇嘛到拉萨主持正月祈愿大法会。嘉央活佛、涅贡昂孜巴曲杰、噶居曲觉、都古棱策仁等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呈献了缎匹、金银、茶叶等大批礼品。祈愿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应帕旺喀寺住持曲杰噶居赤列嘉措的邀请到帕旺喀寺巡视，又到大昭寺居住几天，然后返回哲蚌寺。

二月，达赖喇嘛在哲蚌寺诵持密集文殊金刚咒，并举行火祭护摩仪轨。因哲布霍尔仓曲杰之请撰写了《退敌天女咒语传承》。

三月，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重描乃穷护法神唐卡，并写祝祷文，加以供奉，又举行祭祀四面怙主的八日朵玛供。

四月，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重温以前读过的经书，并准备给嘉央活佛等人传授灌顶。

五月八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开始给以乃宁夏仲赤巴、森康贡活佛、嘉央活佛、林麦夏仲、热振堪布、色拉寺和哲蚌寺各扎仓的堪布为首的近千名僧人，以喀尔喀巴图尔珲台吉等蒙古首领为首的百余名蒙藏官员传授密集文殊金刚法。

二十五日，在吉祥圆满的坛城中为以上众人灌顶。此处的

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子嘉央活佛，应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蒙文《哲布尊丹巴传》说，他是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的儿子，生于崇祯八年九月，名罗桑丹贝坚赞，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15岁赴西藏，次年在班禅处受沙弥戒，在达赖喇嘛处聆听金刚数珠王之经，始称哲布尊丹巴喇嘛，并盖以黄伞，班禅和达赖喇嘛谕示他不必在藏久住学经，即返喀尔喀建寺传法。

从此时开始，五世达赖喇嘛先后命人刻版印制有关论著，并做出了在噶丹彭措林寺（即觉囊派多罗那它所建的达丹彭措林寺，改宗格鲁派后更名）刻印佛经的计划。此后的12年中先后刻印了《菩提道次第论》、《菩提道次第广论》，根敦珠巴的《毗奈耶经因缘广集》，克珠诺桑嘉措的《时轮大疏无垢光饰》，勒钦贡加的《噶当教法史》，根敦嘉措的文集、根敦珠传、根敦嘉措传以及五世达赖喇嘛自己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林麦夏仲传》等，并筹备刻印藏文大藏经。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给以嘉央活佛和涅贡昂曲杰罗孜巴为首的许多人传授了根敦嘉措文集第一函和《那塘百法》等。由第巴索南饶丹负责，给嘉央活佛师徒赠送了丰富的礼品，并给喇嘛夏康诺门罕、强佐仲尼拉杰等人也送了厚礼。按五世达赖喇嘛的安排，在唐萨噶丹曲科林寺新建讲经院，由索南饶丹委派坚赞列巴去担任该寺堪布，在阿里穹宗噶波地方创建了格鲁派的噶丹培杰林寺，达赖喇嘛委派噶居巴喜饶桑布去担任堪布。嘉央活佛等离开拉萨返回蒙古。

从七月起，五世达赖喇嘛在一个半月中跟随素尔金刚持学习显密教法，特别是请教洛扎达哇宣努的大圆满法和贡巴桑塔的修炼法。看来他此时学习的主要是宁玛派的密宗修行法。五世达赖喇嘛从青少年时起就对宁玛派的修炼法极感兴趣，相信

坚持修炼大圆满法就不难修成光明虹身。尽管他偏爱宁玛派修炼受到格鲁派不少人的讥讽，但仍坚持不悔，这在第悉桑结嘉措的《黄琉璃》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七月中，五世达赖喇嘛给噶玛噶举派岗波寺活佛诺布的转世传授了沙弥戒，取法名为罗桑赤列南杰厄端珠贝香达却格德。第巴索南饶丹不愿给岗波活佛赏赐，五世达赖喇嘛为此劝说第巴，并指示在排座次等方面对岗波活佛给予与主巴活佛相同的待遇。

1650年十二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再次派遣喜饶喇嘛、藏巴噶居、达赖曲杰、墨日根布俄、楚臣库雅等使臣进藏。他们于7月底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颁发谕旨和缎匹、珍宝等物品，敦请达赖喇嘛进京会见。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们传授了马头金刚随许法，并赠送丰厚礼品。1651年三月和四月，顺治帝两次遣官员使者携敕谕人藏召请达赖喇嘛，敦促尽快启程进京。七月底，清朝前一批使者色钦温布和波若才让等到达拉萨。在此以前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索南饶丹已在私下为达赖喇嘛进京做了一些准备，这次接到诏书后，索南饶丹才通告全藏各地，并建立制作所需物品的作坊。消息传出后，西藏僧俗纷纷转告，以甘丹赤巴为首的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的上师和执事僧们聚集商议，担心五世达赖喇嘛会像三世达赖喇嘛那样离开拉萨后一去不返，决议尽力劝阻达赖喇嘛前去汉地。如劝阻不成，则要求达赖喇嘛必须在3年内返回，不要在汉地耽搁。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决心已定，在僧众提出的要尽快返回的协议书上画了押，以征得三大寺僧众对进京一事的认可。

八月，噶玛噶举派楚布寺的贾曹活佛通过达垄强佐的斡旋，来到哲蚌寺向达赖喇嘛表示敬意。当时噶玛噶举黑帽系活

佛却英多吉已逃到云南丽江，贾曹活佛扎巴乔央是西藏地区噶玛噶举派的代理首领，他到哲蚌寺向达赖喇嘛致敬，标志着西藏地区噶玛噶举派的僧人和寺院承认了格鲁派的统治。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嘉色活佛著的《修心教言》。

考虑皇帝的圣旨要求必须在龙年（公元1652年）初启程进京，而进京前还需去桑耶、昌珠、曲科杰等地朝礼，所以五世达赖喇嘛于八月二十九日匆忙离开哲蚌寺，前往山南。动身后先在拉萨大昭寺逗留5天，此时四月从北京出发的清朝使者喜饶喇嘛、噶居喇嘛、察罕达汗曲杰、多卜藏古西、多吉达尔汗诺颜为首的200多人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圣旨、金银、绸缎等大批赏赐物品，催请达赖喇嘛进京。喜饶喇嘛还交给达赖喇嘛白银一万两，作为给皇帝做护佑法事念诵《甘珠尔》经的费用，索南饶丹为此安排许多宗本和头人负责在几年中接连念诵《甘珠尔》经。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们传授了灌顶法等。

九月四日，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索南饶丹一同从大昭寺出发，地方首领噶丹巴在城郊设灶迎送，蔡贡塘寺的喇嘛在拉洞渡口迎送。达赖喇嘛一行在德庆孜停留3天。

九月八日，解除住夏，达赖喇嘛在途中到一处护法殿中，献敬神哈达，派遣色钦达杰随波若才让去北京报告皇帝，将尽力赶在水龙年（公元1652年）七月中旬到达皇帝的身边。达赖喇嘛还应波若才让的请求写了一篇自我赞颂文，供他经常念诵。当天达赖喇嘛一行抵达甘丹寺，受到甘丹赤巴官却曲桑和僧众的欢迎。达赖喇嘛等在甘丹寺停留3天，仔细朝礼寺院各殿堂，向宗喀巴大灵塔、释迦牟尼像和依怙殿献了敬神哈达，并进行祝祷。达赖喇嘛还登上宗喀巴大师的法座，向全寺僧众讲了一段关于菩提道次第的经文。

九月十二日，达赖喇嘛从甘丹寺出发时，陈设供品，举行祈请螺髻大梵天降临的仪式。行至墨竹工卡时，达尔罕和硕齐设午宴招待，并赠送礼品。止贡寺活佛和法台官却彭措也赶来，向达赖喇嘛献了被称为止贡神石的蒙古印章，达赖喇嘛向止贡活佛询问了伏藏教法。当晚达赖喇嘛宿于嘉桑地方。

十三日，本珠宗巴和喀杰德寺僧人献礼迎送。

十四日，仁钦林寺僧人在途中献礼迎送。

十五日，经如托到达扎西松多，盘德寺曲杰释迦拉旺前来赠送了氆氇等大量礼物。其后达赖喇嘛一行在精奇寺停留两天，向寺僧讲了一段《噶当书》，向弥勒佛像和银塔献了题词哈达。十八日宿于盘德寺附近。

九月十九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曲科杰寺，受到僧众列队欢迎。达赖喇嘛在僧众集会上传授了六臂依怙随许法，讲解了一段《现观庄严论》。二十七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去朝拜吉祥退敌天女的魂湖，湖中出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各种不同地方的景象，达赖喇嘛认为这表明前往汉地的时机已经到了。朝拜神湖后，达赖喇嘛在伦珠噶蔡（自成乐园）地方闭关修行 7 天。又到山下的依怙殿中增供食子，呈献题词哈达，在经院中连续 3 天举行酬补仪轨。

十月五日，五世达赖喇嘛到曲科杰寺中心大殿，向弥勒大佛像呈献题词哈达，祈愿佛法兴盛不衰。给岗波活佛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会见旺日、姜拉、朱巴、仲达等地来拜见的许多人。给他们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给仲达堪钦图多班觉单独传授《百余食子》教诫。

离曲科杰寺到达梅朵塘地方时，达赖喇嘛给遍布山谷的僧众和达布、娘布的 2000 多名僧俗人士宣讲《上师瑜伽》，并摩顶赐福，抛撒青稞祝赞吉祥。僧俗人士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大批

礼品。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等向寺院发放了布施，对献礼者回赠礼物。

十月九日，达赖喇嘛在途中朝拜了沃喀萨丹林寺中宗喀巴居住过的寝室。此后在察塘停留7天，向上下沃喀的僧人和信徒说法加持，得到酥油、干酪等布施。达赖喇嘛在沃喀宗内为新造《甘珠尔》经撒花祝赞，又为新建的八十大成就者药泥塑像撒花。此后达赖喇嘛又在桑日宗停留三天，给本萨阿尼仲母子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受到盛情款待。此时收到巴索活佛寄来的诗体书信，敦请达赖喇嘛写一部自传，并要求达赖喇嘛早日从汉地返回，达赖喇嘛给他写了回信。

十月二十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恰噶，拉嘉里夏仲赤巴阿旺噶丹饶丹及其臣下到雅鲁藏布江渡口迎接。盛设仪仗，汉藏形式兼有。达赖喇嘛在拉嘉里王白天比晚上还昏暗的古寝宫中住了四天，拉嘉里王举行盛大排座集会宴请，白天有的人还得掌灯就座。拉嘉里王及艾、涅地方各寺院僧俗人士前来拜见。琼结班智达（咱雅班智达）从喀尔喀蒙古前来拜见。献给达赖喇嘛一根长一卡（相当12指的宽度）、宽3指、厚半指的金条，使艾巴人大为惊叹。达赖喇嘛给拉嘉里夏仲等人传授了长寿马头明王随许法和长寿灌顶法。仲策瓦温布称达赖喇嘛此次汉地之行对佛法大有禅益，将使佛法善业弘扬于四方。

十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一行前往泽当，在嘉噶夏林寺与吉雪台吉错杰巴、喀尔喀诺门额津相遇，受到蒙藏人士的迎接。阿里扎仓（曲科杰寺的一个扎仓）僧众列队欢迎，并表演了望果节的歌舞。当夜宿于色康孜，扎仓设荤素宴款待。此后经扎喀宗到泽当，当地萨迦派和格鲁派僧人列队迎送。在拉叶地方，阿却寺（从泽当寺分出的山南最早的格鲁派寺院）僧人和哲布林寺僧人奉献了供养和大批礼品。达赖喇嘛

朝拜了色林寺的却吉扎巴的图巴色林玛佛像，又应贝贡桑孜师徒的邀请去桑木丹林寺朝拜，瞻仰了尊胜上师（萨迦派）索南坚赞的沙弥身像和穿过的袈裟等，并在像前祈愿，向护法神献了哈达。又到松赞干布住过的曲嘉颇章的修行茅舍朝礼。当晚达赖喇嘛一行在帕竹的首领和则错、日沃曲林、扎西曲德、热穷浦等寺僧人的隆重欢迎之下到达乃东，当天正是五供节（宗喀巴忌辰，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乃东所有寺院灯火通明，如群星璀璨，蔚为壮观。在排座大集会上，达赖喇嘛首座，诺门额津和固始汗并排对坐。达赖喇嘛给帕竹夏仲师徒传授了白度母寿施如意轮随许法，举行了会供轮和跳神等，帕竹夏仲亲自担任跳神领舞师。达赖喇嘛等在乃东居住两天，参观了帕竹京俄的灵塔、各护法殿，看到乃东宫殿前帕竹首领们的官邸大都倒塌，城堡和经堂等已年久失修，显出破败景象。帕竹首领夫妻不和，内外交困，达赖喇嘛表示帕竹首领如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但帕竹首领仍以曾统治过全藏的家族的后裔自居，没有提什么要求。达赖喇嘛离开乃东后，前往昌珠寺朝礼祈愿，在护法殿中呈献哈达，嘱托事业。第悉藏巴时期曾为昌珠寺建立供养制度，后来遭到破坏，五世达赖喇嘛遂请第巴索南饶丹重新设立更为盛大的供养。在前往琼结的途中，达赖喇嘛巡礼了才曲本巴大塔（寿命泉水塔）。当时有长寿水从塔中流出，众人认为兆头大吉，固始汗也饮了一口长寿泉水，感到非常高兴。顺路又参观水晶崖修道秘窟，在那里认真祈祷。到唐波且寺后，朝拜经堂。

十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在日沃德庆、坚叶、巴日、扎西德庆等寺僧人和琼结僧俗大众的欢迎下到达自己的出生地琼结城堡。

十一月初，达赖喇嘛两次被请到日沃德庆寺，向僧众宣讲

中观见地方面的经论，并给寺僧分发粮食作为旬薪。又在琼结城堡给扎西德庆寺僧众讲上师瑜伽法。巴日寺僧人为达赖喇嘛举行了初十跳神活动（巴日寺为宁玛派寺院）。后，达赖喇嘛又应邀去坚叶寺。原准备顺道去桑耶，因天气太冷而改变主意。在坚叶受到寺僧侍奉款待，得到氆氇等大批礼物。达赖喇嘛因为桑耶秦浦地方的人原先信奉宁玛派，后来仁蚌巴敦月多吉将秦浦献给噶玛巴曲扎嘉措，令其改信噶玛噶举，后来又在该地建了一座格鲁派寺院，但关系不太和睦，所以下令把秦浦地方交给巴日寺管辖，众人虽对此怀疑，但仍立即办理交接手续。达赖喇嘛给热穷浦活佛等人授了比丘戒，为热穷浦活佛起名为洛桑却嘉旺布，又应热穷浦上下咒师的请求给他们念咒诵经。

十一月十日，达赖喇嘛到琼结松赞干布陵朝礼，在陵墓上的经堂中向怙主像和马头明王像呈献哈达，祝愿祷告，与该扎仓僧人一起修习心愿任运成就的七支密法，会见了从涅地区六大寺院前来的僧人。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等前往赞塘，中午在唐波且寺用饭，朝拜了热巴巾的王妃昂楚绛曲所建的玉叶拉康。赞塘地方僧俗前来拜见。第巴索南饶丹听人说赞塘的人爱夸大渲染别人的话，一再请求达赖喇嘛对众人作二规方面的指示时，说话要谨慎。在章穷林卡，达赖喇嘛等受到绛桑丹孜寺僧人列队欢迎。达垄夏仲阿格旺秋从昌都前来拜见。因始汗和索南饶丹等和达赖喇嘛从章穷林卡分路，固始汗经曲洛卡等地回拉萨，达赖喇嘛从哲巴渡口过雅鲁藏布江前往桑耶寺。桑耶寺格鲁派扎仓僧人和当地僧俗在多达迎接，表演了歌舞杂要，达赖喇嘛宿于桑耶寺边的行宫。次日达赖喇嘛到桑耶大佛殿，献盛大供养，广做祈愿法事，又到护法殿会见桑耶寺护法。因传说桑耶

护法性情古怪凶暴，除萨迦款氏后裔和止贡的几个协敖外，一般的大喇嘛会见桑耶护法往往会遭到戏弄甚至发生危险，还说噶玛巴米觉多吉就是会见桑耶护法后不久去世的，所以达赖喇嘛的侍从们都惊惶不安提心吊胆。当桑耶护法到院子里迎接，绕达赖喇嘛9圈时，侍从们吓得东逃西窜，发出惊叫。达赖喇嘛坐在虎皮坐垫上，将五股金刚杵置于护法头顶，进行收服差遣，并向护法进甘露、神饮（酒），献了礼品，并按索南饶丹事先的安排，没有请求预言吉凶就离开护法殿。达赖喇嘛仔细参观了桑耶寺四大洲八小洲和各个王妃殿。

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达赖喇嘛在黑波日山顶举行了盛大的威猛镇伏法事，向大黑天神祷告祈请。下午朝礼了噶曲拉康，然后到桑耶秦浦，在秘密岩洞的走廊与扎仓僧人一起祈祷赞颂，广发誓愿。达赖喇嘛还在秘密岩洞中闭关坐静两天，向洞中的毗卢遮那亲手塑造的莲花生像献了写有祈愿文的敬神哈达，仲麦巴为延年益寿也献了题词哈达。

达赖喇嘛离开桑耶寺后，沿雅鲁藏布江北岸西行，经过章达到达宁玛派的多吉扎寺，受到仁增活佛的迎接，双方互赠礼品。行至昌果谿卡时，与固始汗和索南饶丹会合。

十二月一日，达赖喇嘛一行翻越扎玛山，到达桑浦乃乌托寺，朝拜了该寺的佛像佛塔。次日主巴活佛来迎接，达赖喇嘛在乃乌柳林中扎帐居住两天，主巴活佛请达赖喇嘛兼任堪布和阿阇黎为他剃度出家，达赖喇嘛让拉孜活佛担任阿阇黎，自己担任堪布，为主巴活佛剃度。

十二月四日，达赖喇嘛一行从桑浦渡过拉萨河，回到哲蚌寺。

水龙年（公元1652年　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36岁

正月达赖喇嘛依惯例供奉护法，举行新年宴会。因三世达赖喇嘛1577年离开拉萨时，在六月提前举行1578年的正月祈愿法会，人们认为这是造成他一去不返的倒错缘起，因此请求五世达赖喇嘛在动身之前主持正常的正月祈愿法会，并到拉萨主持祈愿法会8天，并接受了喀尔喀诺门额津、曲库尔渥巴锡、阿巴车臣曲杰琼结班智达等人奉献的大量财物。达赖喇嘛向护贝龙王献供后返回哲蚌寺，祈愿大法会由甘丹赤巴官却曲桑接着主持。从此年起，改由艾巴文书阿旺才仁专门负责记录五世达赖喇嘛的各种活动。

二月，卫藏各地赶来哲蚌寺拜见和送行的僧俗人士很多。不丹活佛和德钦曲科寺僧人来到哲蚌寺，说以前不丹德钦曲科寺是从萨迦派延请轨范师讲经，这次想从格鲁派中迎请，因此达赖喇嘛派遣曲科尔寺僧人列巴热绛巴前去教习经典。又委派仲然巴·班觉达吉继任已故帕旺喀喇嘛噶居巴赤列彭措的法座。达赖喇嘛还为在浪卡子的亲属朋友、各个第巴以及昂仁堪布、贝康堪布等僧人做了顺合心愿的法事。达赖喇嘛年底前已致信第穆活佛，约他前来拉萨，此时收到第穆活佛回信，相约在丹曲科林相会，结伴去汉地。甘丹赤巴、夏孜曲杰等人想为达赖喇嘛送行到堆龙河谷，达赖喇嘛考虑他们年事已高，请他们就在哲蚌寺举行送行仪式，然后返回。达赖喇嘛还给第巴和盘德曲杰释迦拉旺师徒传授了大威德十三尊灌顶法。临行前，达赖喇嘛又仿照八思巴去汉地时设立十三种职司的例规，建立了职司制度，安排随行的马队。三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出发前往汉地。为求吉祥，特地向吉德山嘴经过乌察木，抵达丹巴林卡中预先安设帐幕之处，达赖喇嘛在那里为色拉、上下密院、拉萨和附近前来送行的人群做了无上瑜伽的法缘和加持法事。乃东夏仲说按以前西藏首领将八思巴送行到当雄的惯

例，为求得相似的缘起，无论如何应送到当雄。

十七日，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经师和僧人、各地方首领民众前来送行。达赖喇嘛在他们的簇拥下渐次到达伦珠热丹（堆龙德庆县境内），在该地放牧的马群中挑出叫做潘德昂巴和穹木的两匹马供达赖喇嘛骑乘。三大寺的大部分送行者从伦珠热丹返回本寺，仅有色拉、哲蚌两寺的几位经师跟随到当雄。拉嘉里王要求达赖喇嘛发一迅速返回西藏的誓愿，达赖喇嘛即为他起誓。

十八日，行经觉摩隆时，森康贡活佛献午餐，觉摩隆寺吉索向达赖喇嘛献了礼物。途经蔡波时，楚布寺贾曹活佛向达赖喇嘛献了佛经、佛像和镶有红宝石的鞍具等。尚敦噶尔哇的古东伦珠当了白利的上师和女婿，固始汗父子对他不满，达赖喇嘛为他解难，给他授了比丘戒，起法名为阿旺楚臣。又给拉嘉里王及其属下传授了度母和六臂观音随许除障法。到达羊八井时，德钦羊八井寺的僧人出寺列队迎接。羊八井寺京俄向达赖喇嘛献汉地制造的大威德十三尊像，说此像为羊八井寺主要供物，请达赖喇嘛加意保存。

三月二十三日，达赖喇嘛等在噶摩设帐住宿，班禅大师从扎什伦布寺来到这里送行。达赖喇嘛向班禅大师献了厚礼，并在6天中与班禅大师交谈，聆听教诲。达赖喇嘛请四世班禅传授修心大秘诀的经文传承，班禅大师传授一半后停止，说剩下的等达赖喇嘛从汉地返回后再传授，以作达赖喇嘛顺利返回的缘起。班禅大师从此处返回扎什伦布。达赖喇嘛在此地给固始汗传授了嘉东玛的百次长寿灌顶，又应都日雅勒之兄坎卓托因之请，讲解《中观教程》。

二十九日，达赖喇嘛宿于同曼。

三十日，在途中朝礼了杂杰摩地方的佛塔，在念青唐古拉

山前由随行扎仓的僧人举行向念青山神祈祷供奉的仪式。当晚降了大雪，达赖喇嘛说这是念青山神喜悦的征兆。

四月二日，达赖喇嘛行抵桑珠德庆，应当地首领夫人喜饶卓玛的请求，达赖喇嘛撰写了祈愿文。此时乃东活佛、森康贡活佛、拉嘉里法王、止贡活佛以及色拉、哲蚌寺的经师等送行者都已陆续返回。固始汗到桑珠德庆后身体不适，亦与索南饶丹等返回拉萨。达赖喇嘛给热振寺的上师及僧人念诵了六字真言，给固始汗之子达赖巴图尔的夫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洛桑隆日担任达赖喇嘛的却本和随侍，又负责传授比丘戒事务，故达赖喇嘛给他改名为洛桑图多，他后来升任为第巴。达赖喇嘛在此地还修改校订1646年他所著的《三世达赖喇嘛传》。又向唐古拉山神广献供品祝祷，还写了向唐古拉山神的祈祷文。

二十一日，达赖喇嘛离开桑珠德庆，到卓玛隆温泉住了3天。因下大雪，做了煨桑祭祀，以保佑牲畜。行至夹堪时，达赖喇嘛给吉雪台吉措吉多杰传授了马头明王四灌顶加持法。行至羊拉时，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一行赶来会合，并说固始汗身体已经康复。得至那隆噶尔摩，达孜台吉多吉南杰返回，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六臂观音灌顶加持法。行抵巴巴隆时，康区使者赶来送礼，请求达赖喇嘛承许第五辈达扎济仲（即济咙）活佛阿旺却吉旺秋转世事宜，达赖喇嘛为此做了祈愿。善巴活佛阿旺彭措身体病弱，但仍想尽力追随达赖喇嘛去汉地，行至此地，已无力继续前进，遂返回本寺。

四月三十日，行至朗宁山口，向甲索仁哇咱日山的地方神咱乌玛波举行供奉祈祷。达赖喇嘛献了写有愿文的敬神哈达。

五月一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肖莽宗木拉，随行的达赖巴图尔身体不适，达赖喇嘛给他传授长寿灌顶法和除障法，次日即痊愈。当地霍尔查巴尔达部落的首领噶玛索南盛情款待并献

马100匹等，达赖喇嘛给他传授无量寿佛灌顶法，又为几位巴布隆山间修行者念诵六字真言。行至那曲渡口时，达赖喇嘛与准备直接前往家乡厄鲁特左翼的阿克曲库尔（当即土尔扈特部的书库尔岱青）相遇，阿克曲库尔按蒙古礼节向达赖喇嘛奉献了大量供养。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在那曲的许多属民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在此给喜饶卓玛夫人授了居士戒。当地的布玛尔、翁布、嘉巴日等人向达赖喇嘛献马260匹。

五月九日，达赖喇嘛在拉那尔冈向聚集的3000多霍尔安多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霍尔麦巴献带犊母犏牛100头、公犏牛20头。随行的曲科林扎仓僧人因帐幕、灶具发生争执，由第巴赤列嘉措加以平息。

十二日，行至仲杂，达赖喇嘛因随行的上、下密院、热哇堆巴（桑浦寺的格鲁派扎仓）、阿里扎仓、达布扎仓（阿里和达布扎仓属曲科杰寺）各30名僧人的请求，撰写了他们各自所需的规章。

十四日，行至下秋卡，第巴赤列嘉措对随行人员的行为进行教诲，并要他们写下不违背规章的甘结（保证书），并在供斋僧茶时在僧俗人众集会上宣读了规章。达赖喇嘛因赤列嘉措和强佐诺尔布不和，任命曼仲才旺达吉为辅佐，与赤列嘉措、诺尔布一同管事。行抵贝地方时，囊索欧珠和阿里仲巴请求赐予一块用达赖喇嘛亲赐的名义划给的领地，达赖喇嘛为了不伤情面，与赤列嘉措商议后决定赐予。

十九日，行抵噶嘉，达赖喇嘛给第巴赤列嘉措等传授长寿灌顶和马头明王加持法。原先达赖喇嘛打算让萨迦、噶举、宁玛各派都逐渐改宗格鲁派，得到许多格鲁派人士的赞同，此时达赖喇嘛权衡利弊，又觉得应该允许不同教派存在下去。在此地达赖喇嘛将对西藏修复寺院、举办法事，在色拉、哲蚌寺兴

建金顶等事务的想法书写成备忘录。

二十三日，行至努拉山中的湖边，此时，在途中已行两月，又盛传汉地热病等传播很广。随行的人都满面愁容，甚至有的伤心落泪，只有诺尔布面露欣喜之色，达赖喇嘛认为他定是相信去汉地的人不能返回而沾沾自喜。为振作精神，行至努拉山腰时，第巴赤列嘉措吩咐仲尼仲巴等人挂起吉祥拂巾，全体人员将马头勒转一次，以求圆满返回的缘起。当晚宿于努达曲参卡，已顺利越过唐古拉山。此后行经盖巴噶波，渡过努曲和阿克达木河。行至曲郭扎西奇巴附近的噶尔巴拉则雄时，白日部落的多达玉杰和曲珍兄妹向达赖喇献马 70 匹、铠甲 9 副、牛 150 头，以及酥油、奶酪等。达赖喇嘛给当地僧俗人士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马头明王加持法。曲珍、索南贝桑等请求达赖喇嘛务必写一发誓很快从汉地返回的誓文，达赖喇嘛为此写了祈愿文，又因却本和翁则的请求做了茶供，因墨尔根噶居巴和色钦温波的请求写了煨桑祭祀文《吉祥漩》等。

六月二日，抵达牙哥雄，达赖喇嘛写了《八大名号赞》供香察官却南杰念诵。行至扎宁噶布时，坎卓（亦译罕都，固始汗之孙）的使者额尔德尼和硕齐从通天河边赶来接应。说康区僧俗百姓为达赖喇嘛过通天河正在绑扎牛皮船，赤列嘉措即派绰浦哇和察麦巴二人去绑扎皮船，囊索耿珠和代本乌尔巴去拉敦玛一带观察水情。六日，达赖喇嘛行抵托库勒托罗海格德尔古，罕都派数百人正在通天河边绑扎牛皮船，但清朝派来的使臣在距该地半日程的拉敦玛地方找到了浅滩，可骑马渡河，因此达赖喇嘛等从浅滩处渡过了通天河。白居寺堪布说应当给此滩重新命名，但达赖喇嘛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因听说楚玛尔河只要下雨就无法渡过，所以七日达赖喇嘛等多赶了一程，渡到楚玛尔河对岸住宿，结果当晚就下了大雨。在楚玛尔

河的沟口处，达赖喇嘛受到以罕都为首的大批康区僧俗牧民百姓的欢迎。奉献了很多马匹、铠甲、茶叶、皮张等物品。达赖喇嘛给众人传授了六字真言随许法，给罕都单独传授了三部怙主和摧破金刚随许法。在此地给随行人员二等以上的每人发乘马一匹，又将剩下的500来匹马和2000钱黄金派囊索欧珠和代本乌尔巴二人带回西藏交给第巴索南饶丹。渡过哈拉乌苏到达曲那察摩时，阿噶格楚向达赖喇嘛献80峰骆驼和马鞍等。罕都等人返回康区。

十四日，达赖喇嘛从那棱哈拉乌苏派遣仲尼玛尼巴进京向皇帝送信并陈述途中情形。达赖巴图尔属下的衮布才旺、扎西、德钦火洛齐等送来骆驼100峰，墨尔根济哝派人送来马、骆驼甚多。行至直浦那朵玛时，哲务霍尔仓、革吉活佛献马、骡、犏牛、茶叶各100件及许多财物。从直甫戎到都瓦色勒布的41天中，达赖喇嘛为路遇的进藏学佛的僧人传授教法。为13人授了比丘戒，为30人授了沙弥戒。到达夏拉图后，达赖喇嘛开始撰写《四世达赖喇嘛传》。到扎陵湖边时，班玛活佛献马、骆驼。车臣珲台吉遣乌金格隆等送来50峰骆驼。到达博戎觉时，厄鲁特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家的转世喇嘛刚坚热绛巴洛桑丹巴和哈日东墨尔根热绛巴的温波等向达赖喇嘛献了礼物。使者宰桑囊索送来了温萨活佛和巴图尔珲台吉的信件。途经阿布齐都塘时，达赖喇嘛给察罕库图勒都派来送骆驼的100多名阿拉善人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第穆活佛从康区赶来会合，一起前往汉地。玛尔喀热绛巴和阿力克贝桑等人前来献马、黄金，并请求达赖喇嘛去阿力克的噶布滩。此后从“措曼秀摩五兄弟湖”中的董拉措那克和白乌土克措两湖的岸边经过时，达赖喇嘛向玛沁蚌拉山神祭礼并嘱托事业。

二十六日，达赖喇嘛在白乌土克措湖滨给阿力克部落的才

达等100多名蒙古人做了加持法事。

二十七日中午，墨尔根噶居巴喜饶嘉措前来献给达赖喇嘛一匹枣红骏马作为坐骑，起名为“诺布龙雪”（宝贝风翼）。达赖喇嘛在阿力克部落僧俗的迎接下到达噶布滩，住宿3天，给90多人授了比丘戒，给30多人授了沙弥戒。墨尔根济哝、额尔德尼岱青、衮布策旺等前来迎接。达赖喇嘛在以前三世达赖喇嘛坐过的台座上给大批蒙藏僧俗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阿力克部落献马、黄金以及许多牛羊。此后在途中，达赖喇嘛遇到1651年九月他派去京城向皇帝报告启程时间的色钦达杰，达赖喇嘛说他在青海湖边滞留两个月，像石头给太阳当信差一样。三十日达赖喇嘛行抵登努尔特山，曾任哲蚌寺翁则的热绛巴索巴献一枚羊蹄金和一匹达赖喇嘛行营中也找不到的骏马。夏琼曲杰意希嘉措和欧曲喀曲杰献了马匹、银两，拉尊车臣克赞献马匹。

七月一日，达赖喇嘛行抵拉郭雄，宰桑固始等50骑穿着土默特服装来迎。此后穿过衮额尔格异常险峻的峡谷，行抵杭尼逊里穹土时，上阿力克部落献马，行至乌布钦雄时，却克图宰桑、额尔德尼和硕齐、墨尔根巴什布施了马和牛羊。喀尔喀部那巴诺门罕格格勒贝丹的使者前来，献银两、绸缎、茶叶等，杰康则活佛从喀尔喀部来此献衣物、银两、马羊、茶叶等近2000件。佑宁寺吉哇派人来献马100匹。此时色多曲杰从厄鲁特部返回，向达赖喇嘛递交了厄鲁特各部首领给达赖喇嘛的回信。

达赖喇嘛行至切吉时，安多五部落各出100名骑手来迎。厄鲁特诸首领为达赖喇嘛举行赛马比赛，额尔德尼岱青获第一，他将所得一副银鞍献给了达赖喇嘛。车臣珲台吉和丹增等500骑来迎，向达赖喇嘛献马200匹，安多五部落、申中囊索、

塔尔寺曲杰等献马 100 多匹以及绸缎、水果等。达赖喇嘛给 2000 多人做了加持法事。

十一日，顺治帝派来迎接达赖喇嘛的理藩院侍郎沙济达赖等人到达切吉（在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向达赖喇嘛送交了圣旨以及珍珠念珠、帽子、衣物、马 100 匹等赏赐物品。在哈图，达赖喇嘛给杰康则活佛母子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

十二月，青海湟中一带的西纳、木雅、申中等部落在清朝供职的僧人等 100 多骑、厄鲁特王公等千余骑作为大队的前导前来迎接。

十三日，达赖喇嘛等抵达青海湖边固始汗和济咙的部落，达赖喇嘛给以额尔德尼岱青之子洛桑丹增和济咙之女乌尔却克为首的 3000 蒙古人做了加持法事。济咙之女献了一个中等青蛙大小的黄金钱包，哈日东都尔什热绛巴打算在哲库建寺，达赖喇嘛指示应以十一面观音为本尊，以退敌天女为护法，并为该寺起名为噶丹却林寺。达赖喇嘛登上一个新建的石头法座，咱雅班智达献绸缎 30 匹、马和骆驼 80 作为给米桑巴勒巴济超荐的回向礼，墨尔根济咙、阿噶格楚献马 200 匹、蒙古包 100 多座，佑宁寺吉索献马 40 匹。西宁的两位官员派人送来茶叶、大米、水果等，喀尔喀部宰桑渥巴锡献马 100 匹、骆驼、缎子等。衮布才旺、济咙和噶丹达吉为达赖喇嘛举行盛大宴会。还给达赖喇嘛的随从们赠送了马匹。达赖喇嘛在集会上念诵了观音菩萨经咒，还给以济咙的母亲为首的 3000 多人传授了观音菩萨随许法。

十八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恰喀布拉克时，西宁城的回民掌教率 50 余人前来敬献重礼。献哈达 300 条、绸缎 7 匹、马鞍两副、茶 8 包以及各色水果 3 驮，依汉地礼节向达赖喇嘛致礼和赞颂。达赖喇嘛询问掌教敬奉什么神，掌教答说敬奉的是

天，达赖喇嘛认为大约与敬奉大自在天、遍入天相类似，向日月等礼拜。这是五世达赖喇嘛与伊斯兰教的首次接触。达赖喇嘛给塔尔寺的法台东喀哇·却西贝丹嘉措、佑宁寺的喇嘛、达赖曲杰、和硕齐活佛等念诵了六字真言。钦差乌格德克用15天时间从北京赶来此处传达圣旨，夏琼寺法台、阿尔杰囊索等100余骑也到此处迎接。行至仁摩湖时，西宁东科尔活佛朵居嘉措、隆务寺喇嘛等前来，献马匹和牛。

二十日，达赖喇嘛一行至蒙古人称为博罗充可克（今青海海晏县水峡），藏语称为噶尔塘玛尔坤措莫的地方安营。喀尔喀部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弟弟伊勒登诺颜献了上等绸缎、银两、马匹等。达赖喇嘛会见了拉尊穷哇的侄子额尔克台吉、额尔克曲杰等1000余人，达赖巴图尔的夫人阿尔塔尔也携幼子（萨楚墨尔根）前来拜见。此后行至上郭密部落附近时，部落头人向达赖喇嘛献黄金50钱、马250匹，达赖喇嘛让部落头人立下以后不抢劫偷盗的誓言。

二十一日，达赖喇嘛行至乌尔肯希巴立台地方时在神幡上用梵文书写“各地方神务必遵循上师莲花生的训诲的誓言”，命人安设在那里。又派人携甲胄、金银、茶叶、药材等，去青海湖祭奠。察罕诺门罕到此献马300匹、巴颜喇嘛献马10匹、下郭密部落献黄金20两、马5匹。额尔德尼岱青献白银500两、缎50匹、马骆羊500，霍尔阿齐图诺颜献绸缎、马匹等100件，车臣达吉等献厚礼。达赖喇嘛给清朝使臣沙济达喇、索南巴什罕察、通摩克热绛巴郭查及阿噶格楚等人传授了白度母如意轮随许法，给鄂尔多斯曼珠室利、堪布活佛、本萨阿宁、额尔德尼岱青、阿萨肯阿玛等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达赖喇嘛还派热绛巴夏仲（咱雅班智达）携带达赖喇嘛送给新疆的厄鲁特各部首领的礼物返回厄鲁特部。此后即收到第巴索南饶

丹的来信，说固始汗改变了主意，要让其长子巴图尔台吉留在厄鲁特部，故达赖喇嘛派索南旺杰去追回热绛巴夏仲，但未能追上而返回。

八月一日，随行的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僧人在行营举行念诵退敌天女经和酬补法事，达赖喇嘛担任法会的金刚上师。五日又举行盛大的跳神仪式。六日举行避除凶神恶鬼的修行法事。七日，塔尔寺阿嘉活佛、塔尔寺法台和居巴扎仓堪布、羊官寺囊索，达赖曲杰、文都噶居巴等僧俗人士来献马匹、绸缎等，罕达垄经师献汉地制造的药师佛像、铃、钹等礼品100件。七日下午，达赖喇嘛返回蒙古人萨噶第巴的辖地，达赖喇嘛给锡金、西藏各大寺院写信，鼓励为佛教及众生安乐埋藏伏藏宝瓶。隆务热绛巴、西纳囊索、佐摩喀寺和塔尔寺僧众、拉科热绛巴等献马、牛等厚礼。达赖喇嘛给以哆巴温波为首的70多人授了比丘戒。车臣珲台吉迎请达赖喇嘛到新建的台座上，献了以2000匹马为主的礼品一万件，广惠寺赞布喇嘛献了以500匹马为主的礼品千件，托因喇嘛献5个镶银茶桶为主的礼品百件。达赖喇嘛给佑宁寺、塔尔寺等寺院的近万名僧人讲授了索南嘉措近传的大悲观音随许法。又因宰桑比依齐的请求，去到固始汗的大王妃达勒贡吉新建的大蒙古包中，为阿噶格楚新写造的经籍撒花祝福。给喜饶喇嘛、宰桑比依齐、曲鲁台吉、宰桑固始等人传授了马头明王四灌顶加持法，为申中囊索的新旧唐卡和夏琼曲杰新造的银字《甘珠尔》经撒花祝赞，还因赞布喇嘛的请求写了为自己祈寿和迅速返回藏区的祈愿偈颂，还为赞布喇嘛新建的寺院经堂命名为噶丹曲科林和丹曲林(即后来雍正帝赐名的广惠寺)，给赞布喇嘛和额尔德尼岱青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六臂观音随许法，给东科尔活佛、墨尔根济哝、阿噶格楚、申中囊索等200人传授了秽迹金刚和黄色赞巴

拉随许法，给佑宁寺和赞布喇嘛属下的250名僧人授了比丘戒，给150人授了沙弥戒。塘尔垣寺的活佛与300多名僧人前来献黄金13两、马100匹，谢贝塔布之孙献银500两。达赖喇嘛给夏琼寺、塔尔寺、佑宁寺等寺院回赠了马匹银两等。给随行的7个扎仓的僧人每人发马一匹、羊两只。达赖喇嘛还派拉尊穷哇的属下巴玛克台吉将1000多钱黄金和800匹马送往拉萨第巴索南饶丹处，并给固始汗带去慰问信件和衣物，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寺的吉索管事每人赠银100两，还给恰德喇嘛素尔钦却央让卓和多杰强甘珠尔巴去信赠银。

十七日，五世达赖喇嘛与厄鲁特部送行的首领们一起从博罗充可克到岳洛托。次日早晨车臣珲台吉的夫人向达赖喇嘛献珍珠装饰的五面神幡后返回。达赖喇嘛等穿过森林峡谷，宿于察罕托克。十九日，达赖喇嘛等进入边墙，中午经镇海堡，当地官员献水果、面粉、猪羊肉等，并供午餐，下午行抵塔尔寺，受到僧众欢迎，达赖喇嘛驻于厄鲁特部首领才旺丹津为他新建的汉式寝宫（塔尔寺大拉让）中。达赖喇嘛仔细瞻礼了塔尔寺各神殿的佛像，登上三世达赖喇嘛的台座，给聚集的汉、藏、土、蒙古等族的5000人众宣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并撒花祝福。塔尔寺僧众为达赖喇嘛举行了祈祷长寿的仪式，并献马12匹、绸缎、金银、茶叶等千份礼品。

二十二日，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到西宁，西宁文武官员100余骑到途中迎接。行近西宁城墙，前面有举告示牌和铁鞭的仪仗开路，使城中百姓不能近前。华热祝贡寺活佛到西宁向达赖喇嘛献马匹。厄鲁特各部首领及塔尔寺曲杰、申中囊索等送行者从西宁返回各自住地。

此后，达赖喇嘛至平戎驿，在白马寺不远的草场上扎帐住宿，附近很多人前来拜见。次日行至碾伯（乐都县）时，城中

汉民持经幡、伞盖、吹奏唢呐等出城迎接，卓仓囊索和僧人献茶叶、绸缎等千份礼品，佑宁寺僧人来献马匹。当地官员以茶、冰糖、水果、肉食等款待。二十五日行抵老鸦城，受到地方官员侍奉。

二十六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老鸦城向北进发，经冰沟时有华热东峡等地僧俗前来拜见，献马40匹。庄浪城官员到此迎接。抵斯日德仲时，德仲、色拉隆寺500多僧人列队接迎。德仲囊索索巴仁钦和温布喜饶扎巴献缎子百匹、伞盖、马鞍等，色拉隆寺僧众等献马60匹，塘让寺活佛等献马匹、黄金150钱，马700匹。二十七日，途中有许多从肃州等地远道前来的人迎送。达赖喇嘛给以多巴固始为首的人做了加持法事。通过大通河桥后，庄浪城文武官员前来迎接。以油炸面点款待。达赖喇嘛给附近寺院的43人授比丘戒和给16人授沙弥戒，为80人剃度出家。前行至庄浪城外扎帐住宿时，当地官员送来面食和活鸡、活猪等，达赖喇嘛将鸡、猪都放了生。鲁参将等献哈达、有底托的碗、锡盘8个、马鞍等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马头明王随许法。二十八日，行抵平定城，附近的嘉多尔达等献银壶、净瓶、绸缎、鞍具等礼品。华热地区僧众献马百匹。行抵三眼井时，鄂尔多斯的巴图拉、多吉本等人献马百匹，华热·桑布坚赞等献马30匹、绸缎等礼品。达赖喇嘛在一个石座上向华热地区的许多藏人和汉人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

九月三日，达赖喇嘛行抵永泰城，达赖喇嘛给华热地区的45人授比丘戒，给50人授沙弥戒。次日，清朝派遣的使者诺木齐喇嘛及一名宫廷侍卫、一名章京抵达永泰城，向达赖喇嘛送交圣旨和御赐珍珠念珠等。

五日，达赖喇嘛一行穿越戈壁到达长城边，行至鹿滩住

宿。

六日，因途中无水，兼程140里到达长流水住宿，达赖喇嘛在此住宿4天，给诺木齐喇嘛、库洛齐活佛传授了六臂观音四灌顶加持法，并准备奏章和礼品等，让诺木齐等带回北京。

十日，达赖喇嘛向中卫进发，察哈尔部察罕塔颜齐、班第塔颜齐派人送来马、骆驼40多匹（峰）。此后达赖喇嘛换乘清朝官员准备的轿子，抵达中卫城，当地官员按汉地习俗设宴款待，达赖喇嘛派往京城送奏章的仲尼玛尼巴返回此处会合。

十三日，达赖喇嘛一行经过镇虏堡时，清朝使者察罕达尔汗曲杰送来马匹骆驼近40只，行抵石空寺堡附近住宿。达赖喇嘛听到关于石空寺的传说，但只能在远处瞻礼而未能去朝拜。此后经枣园堡至广武营附近住宿，望见黄河对岸传说中释迦牟尼曾预言过的牛角山寺。此后达赖喇嘛至宁夏城附近，在一座观音庙附近休息时，见到两位汉僧，达赖喇嘛称他们时常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耶”，还有的人在黑色汉装上套着黑色袒衣，自称为佛教徒。

九月二十一日，五世达赖喇嘛经宁夏城郊到达黄河渡口。达赖喇嘛称该地黄河水三倍于雅鲁藏布江，似乎要融入蓝天，水色泛红。

达赖喇嘛等乘坐清朝官员准备的几艘大船渡过黄河，行抵夏丹时，受到阿克喇嘛等100余名僧人和鄂尔多斯善丹贝勒等500多人的欢迎。善丹贝勒献了金质曼扎和马匹、骆驼100多匹（峰），阿克喇嘛、塔颜齐等献马、骆驼100匹（峰）等厚礼，另有金银、茶叶等，达赖喇嘛给达尔罕诺颜、沙济达喇、喜饶喇嘛、阿克喇嘛等传授了五字文殊随许法。并让他们立下学习密咒的誓愿。

二十三日，沙济达喇携达赖喇嘛的奏章和礼品先行返京，

达赖喇嘛给鄂尔多斯的苏曲库尔诺颜、鲁扎布台吉等百余人传授四臂观音随许法，给善丹贝勒的弟弟坚白仁钦授了比丘戒，给善丹贝勒授密宗事部三怙主随许法。此时又有皇帝派遣的侍卫拉玛、衮布、巴台章京等抵达，送交了敕谕及礼品。

十月一日，达赖喇嘛行抵布尔斯克。次日途经哈拉乌苏时，遇到皇帝派往西藏给达赖喇嘛和固始汗送印信和用具的鄂勒噶喇巴冈。行至托苏图时，以班智达鲁易坚赞为首的500名僧人向达赖喇嘛献金质曼扎、银400两、马100匹及绸缎、茶叶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因侍卫拉玛的请求给他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拉玛即携达赖喇嘛的奏章和礼品回京复命。

三日，行抵乌兰布喇克时，额林臣郡王、额林沁贝子、色棱贝子等1000余骑来迎，献白银、马匹等厚礼。衮布达罕曲杰、班智达鲁易坚赞、杭锦喇嘛等献银200两、马100匹作为传法的酬劳，请达赖喇嘛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达赖喇嘛还给5000多蒙古人加持并撒花祝福。行至巴颜托罗海，夏日乌勒都齐等300人前来献彩绸、金银曼扎等礼品。行抵萨苏诺尔盐湖边时，郭勒古却古尔从呼和浩特派直拉什前来报告帐篷、木料已备好，并送来配金鞍的马和白骆驼。额林臣郡王献金银器皿、马羊等百份礼品。善丹贝勒的夫人等献银1000两、骆驼100峰、羊1000只、茶叶、绸缎等近两万份。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法。

四日，在途中遇到却古尔派人送来马匹、骆驼、茶叶等，行至什达布日都时，布颜图固始和伊勒登贝子父子率3000余人，向达赖喇嘛献银质曼扎和绸缎等礼品，藏巴噶居巴献金茶筒和马鞍等。在乌勒曲尔都，达赖喇嘛给9人授比丘戒、为4人剃度、给18人授居士戒，给车臣岱青的女儿等500人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行至哈拉布拉克时，色棱贝子、仁达那台

吉、温穹台吉等僧俗前来拜见并献礼。达赖喇嘛给色棱贝子、释迦贝子等传授四臂观音随许法。

十六日，达赖喇嘛行至黄河岸边，给额尔克车臣、释迦贝子等传授了马头明王四灌顶加持法。给 24 人授了比丘戒、给 9 人授了沙弥戒，为 14 人剃度，给 70 多人授了居士戒。

十八日，达赖喇嘛准备渡黄河，前一艘船过河后，突然刮起大风，因此达赖喇嘛等在博托格鄂勒苏安营。十八日到二十日的 3 天中，大风不停，呼和浩特塔颜齐向达赖喇嘛献马匹，其中 80 匹配有鞍子，达赖喇嘛等举行朵玛回遮法事，风仍不停，又下起大雪。二十二日大风撕裂帐幕门帘，达赖喇嘛认为是不祥之兆，又举行焚烧魔鬼衣物及撒真言芥子法事。

二十三日风势逐渐减小。达赖喇嘛派墨尔根噶居巴喜饶嘉措进京向皇帝呈送奏表。给塔颜齐属下的 9 人授比丘戒、给 40 人授沙弥戒，并传授大悲观音随许法。

二十五日为宗喀巴忌辰。达赖喇嘛行营在晚上燃点酥油灯供祭。当晚一丝风也没有，达赖喇嘛认为这或许是宗喀巴的教法兴盛的征兆。

二十六日，达赖喇嘛渡过黄河行抵土默格尔。此后在途中为贝库和硕齐所造佛像佛经撒花祝赞，给乌拉特部首领、塔颜齐等传授了六字观音菩萨教诫，给土默特部的 3 位台吉及章京、喇嘛等传授了六字观音随许法。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从鄂日库出发，向岱噶进发。在此之前，从该年八月开始，达赖喇嘛和清朝双方就会见的地点进行了多次商议。八月份清朝收到达赖喇嘛的奏表，内称："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顺治帝九月命诸臣商议会见之事，讨论皇帝是否亲自出长城迎接，满洲诸臣认为皇帝可亲往边外迎之，若达赖喇嘛愿入内地，可令带少数随从入关内；众汉臣认为，皇

帝不应亲自出长城迎接，可于诸王、大臣中派一人代迎。顺治帝九月里通知达赖喇嘛将亲往代噶与之会见，十月又通知达赖喇嘛不能去代噶相见，故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代迎。所以达赖喇嘛离鄂日库后，即有诺木齐喇嘛等前来通告额辛格亲王（即和硕承泽亲王，额辛格为满语，对应于汉语的“承泽”）已启程前来迎接。途中有许多人前来拜见献礼，达赖喇嘛每天要给3000来人摩顶。一位皇帝寺庙的管庙人向达赖喇嘛献了有黄金底座的碗、玻璃制品等。

十一月二日，达赖喇嘛一行与前面有盛大仪仗开路、后有2000多骑簇拥的额辛格亲王相遇。亲王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镶缀珍珠的袈裟等礼品，亲王自己献了刻有七政宝的金曼扎作为见面礼。

五日，达赖喇嘛和额辛格亲王前往乌苏图鲁，卓哩克图王向达赖喇嘛奉献厚礼，有金曼扎、金盘、银曼扎、银盘、珍珠念珠等，达赖喇嘛给400人做了加持法事。

十六日，达赖喇嘛行抵代噶，住在顺治帝为他新建的一座带围墙的汉式行宫中。强林诺门罕向达赖喇嘛献厚礼。扎仓曲杰等人献配有金鞍的马、骆驼，藏巴热绛巴献黄金茶筒、缎子10匹、白银200两等礼。达赖喇嘛给京城的喇嘛洛桑格隆等5人授了比丘戒，给3人授了沙弥戒，给扎仓曲杰、卓哩克图王、洛桑格隆、喀尔喀部的两名塔颜齐喇嘛、席力图活佛等200人传授了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给阿克喇嘛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觉若台吉曲杰和12名章京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噶玛额驸奉献了玛瑙念珠、金质曼扎等，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达赖喇嘛还因额辛格亲王之请求撰写了四臂观音和七目白度母修行法。

二十一日，钦差墨尔根噶居和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到达代

噶。因达赖喇嘛此前曾多次奏称因内地有天花和气候炎热，不能在汉地久留，因此墨尔根噶居传达旨意，要达赖喇嘛的3000多人的大队随从留在代噶，达赖喇嘛只带300人立即轻装进京。达赖喇嘛按皇帝的旨意，即于二十七日带少量随从离代噶进京。

二十八日，达赖喇嘛在库克乌苏给苏昆塔布囊和梅林章京等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给300人做了加持法事，噶玛额驸父子献了披风、缎子等。三十日喀尔喀左翼汗王派往北京进呈奏表和进行贸易的使者们拜见了达赖喇嘛。

十二月五日，达赖喇嘛行经张家口，宿于鲁雅村。此后路经巴颜苏木（宣化）时，有上千人到城门口，因担心天花病，额辛格亲王派人把他们驱回城中。此时有温萨活佛和巴图尔珲台吉派往京城向皇帝请安和进行贸易的一些人来拜见达赖喇嘛。经过怀来时，皇帝敕建的新寺院的百余僧人出迎，喇嘛松曲热绛巴嘉央扎巴向达赖喇嘛献了厚礼。行至昌平州时，黄寺喇嘛桑洛阿香等30人来迎，皇帝派洛桑格隆送来配鞍宝马两匹，供达赖喇嘛骑用。达赖喇嘛称这两匹马很肥大，不便骑乘，但因是皇帝特赐，所以还是选了其中一匹白马骑乘。行至沙河时，却藏巴和嘉喇嘛前来献了水晶念珠和袈裟等。行至北京附近清河时，顺治帝派遣的辅政亲王（指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顺治帝堂叔。皇太极去世时，命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1647年十月罢济尔哈朗辅政，降为郡王，由多尔衮任摄政王。1648年四月复济尔哈朗亲王爵。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济尔哈朗辅政，称辅政叔王，1652年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五世达赖喇嘛抵京时，济尔哈朗是清朝权势最重、地位最高的宗室大臣），在3000骑的簇拥下前来迎接，其仪仗的盛大更超过额辛格亲王。

而且辅政亲王到达后，额辛格亲王的仪仗立即减去，达赖喇嘛感到惊异，认为这是与西藏不同的皇家礼仪。辅政亲王向达赖喇嘛赠送玛瑙念珠、用50两黄金制的金茶筒、镶嵌珠宝的金鞍、大哈达等作为见面礼，并设宴款待。

达赖喇嘛到京后，先到城南一个叫做“前流”的地方住了两天。顺治帝以田猎的名义出城到南苑与达赖喇嘛会见。

十六日（汉历为十二月癸丑，公历为1653年1月14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南苑。进入宫墙后行至隐约可见皇帝临幸地时，达赖喇嘛的随行众人下马步行，行至与皇帝相距四箭之地时，达赖喇嘛也下马步行。达赖喇嘛到皇帝身前时，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握住达赖喇嘛的手通过翻译问好。之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让达赖喇嘛在距他仅一庹（两臂平伸的距离，约4肘长）远的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就坐。赐茶时，皇帝让达赖喇嘛先饮，达赖喇嘛称不应该，于是同饮。达赖喇嘛向顺治帝进呈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氆氇、蔗糖、唵叭香以及马匹、羔皮各千件等礼品。顺治帝设宴款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顺治皇帝的印象是：皇帝很年轻，看起来只有17岁（实际只有15岁），但很有气势，在群臣中像无辔的狮子从容纵横。当晚，达赖喇嘛返回前流住宿。

十七日，达赖喇嘛移居到位于北京东北的、顺治帝拨9万两白银专为他修建的住所黄寺（达赖喇嘛自传称为金色寝殿，可能是因房中墙壁用了大量金箔装饰。清朝档案亦称为黄房）。

十九日，科尔沁部秉图郡王等百余人到黄寺，向达赖喇嘛献了金盘、缎子等物，毕力克图囊索献珍珠念珠。达赖喇嘛给毕力克图、哈仁图台吉、皇宫的几位文书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

二十五日，皇帝派内大臣噶巴喇阿马和鄂罕阿玛等人到黄

寺，给达赖喇嘛颁赐银曼扎、瓷器、金托盘以及净瓶、绘彩龙的瓷盘、香炉、长号、唢呐等，另外还有幡、伞盖、宝幡、飞幡等物品，达赖喇嘛认为这些都是合于帝师身份的用品。达赖喇嘛给藏巴热绛巴、固始汗派来的使者等人传授了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留在代噶的随从派措那东巴前来奉献给达赖喇嘛祝贺新年的礼品。

水蛇年（公元 1653 年　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喇嘛 37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在黄寺举行供奉三界之主的经忏法事，并献祈愿哈达。虽旅居北京，仍像在拉萨一样举行了新年排座宴会。从初一到初三，有许多在北京的满蒙王公、贝勒、大臣等穿戴朝服到黄寺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科尔沁秉图王、御前侍卫拉玛、正蓝旗的格西等 50 人传授了大悲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给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及其随从洛桑格隆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硕塞献重 400 两的金供灯、首饰、宝石、绸缎等大批财物作为达赖喇嘛给他姐姐做回向法事的礼品。巴图尔宰桑和班玛塔素尔克二人各向达赖喇嘛献银 100 两。八日，达赖喇嘛的随行医生本仓强俄巴因患疑为瘟热的病，在北京去世，达赖喇嘛在其临终前给他做了禳解邪魔的随许法事。

一月十一日（汉历正月戊寅，公历 1653 年 2 月 8 日），五世达赖喇嘛遵旨前往皇宫太和殿。达赖喇嘛到达时，大臣等已经到齐，皇帝尚未驾临，故让达赖喇嘛先在一两肘宽的坐榻上落座。顺治帝从大殿北门驾临时，音乐齐奏，达赖喇嘛从坐榻上起身站立，皇帝登上御座台，令鄂罕阿玛请达赖喇嘛入座坐下，由噶巴喇阿玛担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的翻译。接着皇帝为五世达赖喇嘛举行了盛大宴会。每张桌上有 50 个盘子，皇帝用金盘，其他人用银盘。皇帝还赏赐了陪同达赖喇嘛进宫会

见的第穆活佛、白居寺堪布、仲麦巴赤列嘉措、墨尔根噶居巴、车臣温布、达赖喇嘛的索本、森本、却本、翁则等15人。

十二日，达赖喇嘛在黄寺向佛像献偈颂和幡帜。

十四日，起随行达赖喇嘛的扎仓僧人举行7天向欲界之主供灵器朵玛的法会，达赖喇嘛献了写有祈祷文的敬神哈达。辅政亲王（郑亲王）之子简纯王兄弟（简纯亲王济度和辅国武襄公巴尔堪）向达赖喇嘛献金质曼扎、金鞍，承泽亲王献厚礼。达赖喇嘛给他们和鄂齐尔多尔格、达云多尔格等20人诵传皈依发心、忏悔、百门食子等经教，给黄寺的僧人、衮布扎布、衮布台吉、几位贝子等传授大悲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给毕力克图囊索传授上师瑜伽，给侍卫楚臣等30人传授白伞盖佛母随许法。衮布台吉向达赖喇嘛献黄金茶筒、白银1000两、缎子80匹等礼物。桑珠曲培格隆献了用30两黄金和300两白银打造的曼扎。衮布台吉还向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赠送了银两和大缎等。

因礼部请问达赖喇嘛初次来京诸王应否筵宴，顺治帝传旨诸王依次设宴款待达赖喇嘛一行。十八日，郑亲王为达赖喇嘛举办宴会。二十一日，由恰噶岱亲王宴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承泽亲王传授了发愿转生极乐净土的经文，给亲王、布诺台吉、哈仁图台吉、衮布台吉等传授了五字文殊随许法，给秉图王之子叶毕格尔、阿尤喜宰桑等传授了观音随许法。

二十三日，伊哩图王宴请达赖喇嘛。固始汗的王妃和鄂齐尔图台吉的使者从厄鲁特到京，桑洛阿尚等僧人向达赖喇嘛献珍珠袈裟、绸缎、金银等，白塔寺喇嘛热绛巴等献重30两的金曼扎和龙蛋等，当嘉喇嘛等献银两、大缎等百份礼品，内济托因献白银1000两，还给达赖喇嘛的随从布施银1000两。

二十七日，承泽亲王为达赖喇嘛举办有80桌的宴席，并

献念珠、伞盖、坐垫等。额尔克王及其属下两位贝子献金银曼扎、马匹、绸缎等。

二十九日，贡贡王设宴款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说由于宗喀巴大师对蒙古汉地给予特别的摄持，故他生起有缘大悲之心，给京城内外的汉、藏、蒙古僧人布施白银近万两。呼和浩特的内济托因受到内蒙古大部分人的信奉，强林诺门罕对此产生忌妒，向王公大臣指出内济托因的过失，双方一时争执不休。顺治帝命噶巴喇阿玛和鄂罕阿玛二人传谕达赖喇嘛，命达赖喇嘛裁决内济托因和强林诺门罕的争执。

二月一日，达赖喇嘛派墨尔根噶居和车臣温布对双方的陈述进行辩查，达赖喇嘛认为内济托因是为利益众生和传播宗喀巴的教法，但缺乏合格的高僧指导，强林诺门罕所说的内济托因的过失属实，但强林诺门罕的控告主要是出于忌妒。达赖喇嘛说虽然不便完全表明自己的这种见解，但是皇帝的谕令不便推托，因此他做了公正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裁定，将争执限制在宗教事务方面。并将此办理情形奏报了皇帝，使皇帝感到满意。达赖喇嘛给内济托因传授了胜乐、密集、大威德、喜金刚的修习念诵法。此时内济托因已 90 多岁，清朝命其率弟子回呼和浩特居住，不久内济托因即在呼和浩特圆寂。

达赖喇嘛给策楞齐钦章京、鄂尔克岱钦、色布腾王等 100 多人传授了观音随许法，给承泽亲王、都哇曲杰阿旺曲培、曼殊台吉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塔尔尼齐格隆献 20 两重的金曼扎、珍珠等礼品。

三日，齐克星王宴请达赖喇嘛。

十一日，色布腾王向达赖喇嘛献金瓶等。有在五台山静修的 300 名汉僧前来，向达赖喇嘛献文殊菩萨加持过的宝瓶等。达赖喇嘛因承泽亲王的请求撰写了汉地所需的焚香祭礼愿文。

十二日，尼勒格王宴请达赖喇嘛。顺治帝派噶巴喇阿玛颁赐给达赖喇嘛珍珠披风及各色绸缎、两拇指大的价值无比的珍珠等，给达赖喇嘛的随从每人赐50两重的银元宝三个，银茶筒一个、大缎15匹、鞍具等。

十三日，达赖喇嘛撰写文殊菩萨诗体赞颂，给色布腾王、察罕达尔汗曲杰等传授白度母随许法，给承泽亲王传授马头明王随许法、黑色文殊随许法，给鄂尔克岱钦传授马头明王随许法，给侍卫拉玛、乌格德克贝子等传授观音随许法。又因嘉雅噶尚热绛巴的请求，草拟了塔尔寺寺规。

十八日（汉历二月乙卯，公历1653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又因顺治帝派人前来召请而入宫。此前达赖喇嘛已奏称因水土不服身体有病，随从也多病，愿返回西藏。顺治帝与群臣商议，决定对达赖喇嘛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以册印，让达赖喇嘛先去代噶，清朝召蒙古诸王贝勒在代噶与达赖喇嘛会见。所以此次在太和殿会见是顺治帝为五世达赖喇嘛饯行。当天在太和殿赐宴后，达赖喇嘛返回黄寺，为黄寺的三世佛殿撒花祝赞。皇帝派人送来赐给达赖喇嘛的重50两的金茶筒一对、金盘一对、黄金500两，还有银茶筒8个、银盘、白银1000两。重1000两的大银罐一个、大缎1000匹、金鞍10副、虎皮豹皮水獭皮各10张、茶叶100包等送别礼品。顺治帝的母亲（即孝庄皇太后）也赐给达赖喇嘛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大缎100匹。达赖喇嘛给桑洛阿尚热绛巴等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上师瑜伽等。给医师洛桑仁钦传授了药师佛随许法，撰写了承泽亲王劝请的自注祈愿文等。又为松曲热绛巴赤勒在五台山兴建寺院捐赠资财，还寄去为清除该寺障碍而给神鬼八部所写的文书。给鄂勒格王的额驸索南、墨尔根诺颜父子、曲杰台吉等800人传授了观音菩萨主从三尊随许法。郑亲王向达

赖喇嘛献了以100两黄金、金茶筒、金盘和100匹大缎为主的千份礼品，承泽亲王献了以100两黄金、150匹大缎为主的千份礼品，其他诸王也献了与此相当的礼品。强林诺门罕向达赖喇嘛献了以珍珠念珠、300两黄金、哈达为主的千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京城的汉族僧人散发了5000多两白银的布施。

二十日（汉历二月丁巳，公历1653年3月19日），五世达赖喇嘛等从黄寺启程离京返藏。临行时顺治帝特派贝固前来颁赐给达赖喇嘛由食指头大小的100粒玛瑙、珍珠串成的朝珠一串，并传旨将以前赏给的伞盖、飞幡等列于队前作为仪仗。当晚行至清河，郑亲王率大臣、侍从等3000余人送行至此。次日郑亲王赠给达赖喇嘛汉式帐幕、伞盖、坐垫等，并以皇帝的名义举行盛大送别宴会。午饭后郑亲王又送行至三俱卢舍之地返回，临别时他又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达赖喇嘛。承泽亲王、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官兵护送达赖喇嘛继续前行。行至沙河时，达赖喇嘛给包括一名汉僧在内的5个人授了比丘戒，行至玉岭时，又给17人授了比丘戒，给15人授了沙弥戒。

二十五日，行至沙城歇宿。达赖喇嘛在此寄出给固始汗和第巴索南饶丹的信。在给第巴的信中指示要恢复初十封山川的禁令。又给色拉、哲蚌寺的吉索和桑耶、乃穷、尊摩蔡、唐波且护法写信。行至出长城的察罕托海地方时，达赖喇嘛给噶勒章京等传授观音菩萨随许法，给承泽亲王和吴达海贝子传授了白色不动金刚和黄色财神随许法。

三月一日，喀尔喀部嘉央活佛和土谢图汗的使者到布尔哈苏特都地方，向达赖喇嘛递交了问安信函。2日察哈尔和土默特部300人前来请求达赖喇嘛加持，献马60匹。喀尔喀部诺门额津的使者也来此递交了信件和礼品。达赖喇嘛给沙济达

喇、衮布塔、噶玛额附拉察布等千余人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法，他们献马350匹。还给吴达海贝子、承泽亲王、若伦阿萨肯大臣等传授了摧破金刚、无量寿佛、狮子吼观音随许法等。

三月十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代噶，受到蒙藏僧俗人众的盛大欢迎。达赖喇嘛在代噶给承泽亲王和吴达海贝子传授了降香度母、黑色文殊等随许法。因格隆阿旺洛桑的请求写了戒律教诫，为沙济达喇写了五字文殊现观论。此外，达赖喇嘛还给承泽亲王传授了内供佛像礼拜法以及每月15日规定的八支教诫、供亲王仔细探究的降香度母的师承录和念诵要点。当承泽亲王离代噶返京时，达赖喇嘛又给他传授了无量寿佛灌顶法，并派索南旺杰随亲王进京，向顺治帝呈献奏章和礼品。达赖喇嘛称承泽亲王已领悟到前世的宿慧，皈依佛法，而且信仰坚定，对达赖喇嘛等表现出恋恋不舍之情。此后苏尼特部噶玛图热诺颜等百余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重300两的银罐、金曼扎、马80匹，苏尼特部多罗王献金曼扎等礼品。

三月十七日，喀喇沁部图热诺颜等200多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了用60两黄金制成的金盘、50两黄金制成的金罐、重50两的银罐一对，珍珠袈裟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给图热诺颜、库鲁克却库尔等千余人传授了密宗事部三怙主随许法。

三月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及随从僧人等在代噶排列供品法器等，向地方神祈请，寄托心愿。托布克和硕额津、恰噶尔雅达格乌勒都齐等500人向达赖喇嘛献了金银、鞍马、绸缎等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观音菩萨随许法，给20人授了出家戒或比丘戒，给图热诺颜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七目白度母随许法，给苏尼特多罗王传授青色狮面母随许法，给喀喇沁扎萨克多罗王传授白伞盖佛母随许法，给以土默特部三位台吉、达尔罕曲杰、衮布台吉等为首的2000多人传授了四臂观

音和度母随许法。上述众人向达赖喇嘛奉献了大量金银、绸缎、皮张、马匹等。

四月四日，阿巴噶部布尔达察布父子、喀喇沁部唐古特台吉等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绸缎等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观音和白度母随许法。此后，察罕巴贝车臣亲王率百余人前来，献金银曼扎、金银盘、茶筒、带金鞍的马匹等100多件礼品，达赖喇嘛说这位亲王学识很广，著有佛法方面的偈颂。达赖喇嘛给亲王传授了白色文殊随许法和每月望晦日斋戒的戒条律仪等。这时，在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中开始出现各种疾病。有的人失明，执事僧因护法指示为此应请求护持，请求达赖喇嘛撰写了一篇祝愿长生和顺利返回西藏的祈愿文。四月十二日，随行的僧俗人众在行营青天大帐幕中向达赖喇嘛献大缎40多匹，请达赖喇嘛为他们祈请、发愿、祝赞。达赖喇嘛还给他们传授了马头明王加持法和红色阎罗敌随许法。察哈尔部的和硕亲王（布尔尼）率500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100两黄金制成的曼扎、袈裟、饰有珍珠的桌子、金银盘盏、马匹、皮张等千件礼品，达赖喇嘛为他们传授了经教。

从四月十七日起，随行的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僧人举行为期7天的金刚橛修行和抛投灵器的法会。二十三日举行集会和跳神，以及会供，达赖喇嘛梦见三界之主不悦，写了祈请文书送到法会上，并在酬神时献了题词敬神哈达。墨尔根王和玛济克王布施了大量财物，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忿怒金刚随许法，给苏尼特部的仁钦等500人传授了大悲观音的经教。二十九日，科尔沁部卓哩克图亲王和巴图鲁王率500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盘、茶筒、绸缎、银两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观音菩萨和白度母随许法，给苏尼特的图热诺颜、铁穆尔和硕齐、敖汉的巴木苏却库尔等500余人传授了观音随

许法，给15人授了比丘戒、给32人授沙弥戒。剃度17人出家，给20人授了居士戒。

五月一日，敖汉部巴木苏却库尔等200人向达赖喇嘛献绸缎金银等，达赖喇嘛给墨尔根王和玛济克王传授了皈依发心、上师瑜伽、金刚心修诵等，并让他们朝拜了自己的内供佛像。科尔沁卓哩克图王等又献以金曼扎为主的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摧破金刚随许法，给墨尔根噶居、车臣温布、都哇曲杰等讲解了《经要三义》，使他们在十天内即可获得圆满成熟。达赖喇嘛还给行营的僧俗人众每人发给价值15两白银的绸缎、念珠等物，给博若才仁、墨尔根噶居、第巴恰巴、朗布耥等人传授了上师灌顶法。此后，苏尼特部的腾机特亲王、浩齐特部的博罗特额尔德尼王前来向达赖喇嘛献各种珍宝、锦缎、金银等，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观音和白度母随许法，给额尔德尼王单独传授了黑色文殊随许法，给库鲁克却库尔等800人传授了马头明王、白伞盖佛母、白色胜乐长寿灌顶，给肯特尔贝子等1300人传授了随许法和上师瑜伽等。达赖喇嘛还应腾机特亲王的请求撰写了佛陀赞颂文，为衮布公撰写了祈愿文，给卓哩克图亲王、布木巴台吉等传授了无量寿佛随许法，给乌喇特部多勒巴公等2000人传授了观音和白度母随许法，给塔颜齐为首的2000多人传授了随许法。给47人授了比丘戒，给48人授了沙弥戒，给34人授了居士戒，给13人授了沙弥尼戒。此时，清朝派遣的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人到达代噶，举行盛大宴会，在宴会上颁给顺治帝赐给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金印的印文为汉、蒙古、藏三种文字书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金册每叶有最厚的书叶厚，宽4指，长一卡（拇指尖至中指尖伸开的距离），共15叶，连合在一起，可以

开合折叠。册文为“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达赖喇嘛说金印上的藏文印文为蒙古译师所译，译文较拙，他在自传中所用的藏文译文是由一位善巧翻译的汉人译师译出的，可见他本人对此印的重视。达赖喇嘛收到金册金印后，随即给具吉祥欲界大自在者（应是指顺治帝）写了吉祥偈颂，启用金印，作了荐新。

二十日，固始汗和索南饶丹派遣的催请达赖喇嘛返藏的使者噶如哇·阿旺班觉和达尔罕囊索抵达代噶。顺治帝派遣的到代噶为达赖喇嘛饯行的固山贝子吴达海也从京城抵代噶。达赖喇嘛会见了苏尼特部丹巴台吉、多尔济台吉、曲什穹公等。给吴达海贝子等50人传授了随许法，给青哈特乌喇特部的堆巴衮等2000人传授了观音菩萨和白度母随许法，给以洛桑格隆为首的100名学经僧讲授了《经要三义》。二十五日，清朝的阿萨肯阿玛给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交付了驮马等。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和随行僧俗举行了盛大的焚香祭祀，祈愿路途平安。

闰五月一日，达赖喇嘛从代噶启程，同行的还有清朝派往西藏给固始汗颁赐金册金印的侍卫拉玛、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行抵察罕布喇克时，达赖喇嘛给苏尼特部首领等300人

传授了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给达尔罕渥巴锡授了居士戒。

二日，吴达海贝子、达尔罕诺颜等送行者离开达赖喇嘛返京。察罕久格都尔班库罕等11位首领和从喀尔喀逃出不久的本塔尔却库尔及其属下前来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席力图活佛、本塔尔却库尔等3000人传授了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

六日，达赖喇嘛抵达呼和浩特，为重新修复的三世达赖喇嘛创建的寺院撒花祝赞，并应班第塔颜齐的请求写了一篇自赞文。当晚，达赖喇嘛给阿克喇嘛、诺颜本布和喀尔喀的本塔尔等1500人传授了红黄两色文殊随许法，给库鲁克却库尔、托布克章京等僧俗5000人传授了观音和白度母随许法。其后的两三天中，有数千人前来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交给达尔罕曲杰、库鲁克、托布克章京50钱黄金、200匹马，供修缮呼和浩特城使用，还为30人剃度或授比丘戒。

十二日，达赖喇嘛在途中顺便巡礼珠杰拉康寺。当晚行至距黄河渡口5里处住宿。在此停留的5天中，达赖喇嘛给土默特部的3位台吉和呼和浩特僧俗人士传授了观音菩萨随许法。

十六日，达赖喇嘛渡过黄河后，受到额林臣郡王和班智达鲁易坚赞为首的僧俗500余人欢迎。喀尔喀右翼各王公派使者100人来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他们一一写了回信。十七日，达赖喇嘛派达尔罕囊索先行回藏，向固始汗和第巴索南饶丹通报受到皇帝封赏和已经启程回藏的路途情形，还带去达赖喇嘛给索尔钦波和甘珠尔巴写的信、给乃穷大护法的信和献给大昭寺觉卧像的写有题词加盖钦赐金印的大缎敬神哈达。达赖喇嘛又去额林臣郡王的寺庙和济哝王的释迦佛殿撒花祝赞。并给济哝王等传授了无量寿佛和马头明王合一的随许法，济哝王设午宴款待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又给济哝王、善丹贝勒、释迦贝子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观音菩萨经教，给50人

授了比丘戒，给60人授了沙弥戒，给30人授了居士戒。

达赖喇嘛从代噶动身之前，就有人向达赖喇嘛进言，说汉地山水险恶，固始汗年事已高，为了达赖喇嘛旅途平安和固始汗的健康等，应当举行一次广为宣扬的向僧众布施的善举。从五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在黄河北岸渡口时开始，达赖喇嘛接连举行向在拉萨、贡噶、琼结、洛扎、多布宗、沃噶、日喀则、南木林、仁蚌、江孜、拉孜、昂仁和协噶尔等地的12个僧团和未包括在这些僧团中的48200名僧人布施了绸缎、银两、粮食等，给没有计入僧团的八大寺院也发放了布施。到这时共计用去哈达17600条，绸缎缝制的佛像法衣、华盖、披风、围幔126件，大缎200匹，礼巾19900条，绸36匹，礼巾15100条，黄金370两，白银25300两，珠珠166两，布200匹，金器7套，金银马鞍199副，珍珠166两，布200匹，金器7套，金银马鞍199副，青稞71700驮，另有茶叶、酥油、盐、米、肉等折合粮食55600斤。

闰五月二十二日，达赖喇嘛行至巴尔克河，在此休息3天。此时发现随行的却林扎仓的个别僧人和驮夫染上天花，故举行法事、诵经遮止。此后的半个多月中，每晚针对瘟疫抛撒真言芥子，并在风中树立摧破瘟神的法轮。达赖喇嘛给额林臣王、固始诺颜、伊勒定贝子、策楞贝子等传授了灌顶和随许等，给40多人授了比丘戒，给10人授了沙弥戒。

六月一日，达赖喇嘛行抵乌兰布喇克。在离开鄂尔多斯之前，达赖喇嘛给送行的固始诺颜、善丹贝勒、额林臣贝子等1000多人传授了文殊随许法、上师瑜伽和马头明王加持法等。

六月七日，达赖喇嘛乘船渡过黄河，宿于叫做乌尔都斯的平滩。许多蒙古首领要求从随同达赖喇嘛的拉萨下密院僧人中迎请喇嘛，达赖喇嘛特备法器用具及驮马等派遣这些僧人前

去。宁夏牛角悬记寺的汉僧和官员百姓等携油炸食品在途中拜见。几名汉僧说要化缘修缮寺院，达赖喇嘛向他们布施了4匹马。

十九日，达赖喇嘛行抵三眼井，受到当地官员的迎送。抵达松山堡时，达赖喇嘛给华热地区藏汉僧俗5000多人传授了观音菩萨随许法，给60人授了比丘戒，给42人授了沙弥戒，剃度11人出家。青海的赞布喇嘛到嘉龙路口迎接达赖喇嘛。

六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行抵庄浪，当地3位官员设宴为他接风。佑宁寺僧人一再恳请达赖喇嘛去佑宁寺，但是因为以前东科尔活佛、吉雪曲杰等大喇嘛在佑宁寺突然圆寂，人们传说佑宁寺一带的土地神凶恶，所以第穆活佛等随行的高僧都不愿去佑宁寺，于是达赖喇嘛命第穆活佛等人经西宁大路前进，他自己带300人的马队直接前往佑宁寺。达赖喇嘛在途中给德栋寺、色涅寺、华热东峡、雪摩塘喇的土、汉、藏等族僧俗5000人传授了六字观音教法，给30人授了比丘戒，给32人授了沙弥戒，还朝礼了供有喇钦·贡巴饶色灵骨的寺院（白马寺）。六月三十日，五世达赖喇嘛抵达佑宁寺，寺僧900人出寺列队迎接。达赖喇嘛登上寺院右侧山上新设的法座，为僧俗万余人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做了加持法事。七月一日，佑宁寺在大殿设宴款待达赖喇嘛，按当地风俗向达赖喇嘛献了茶叶、绸缎、布匹、马、牛等礼品，达赖喇嘛在大经堂中传授了五字文殊随许法。

离开佑宁寺后，达赖喇嘛从西宁北面向青海湖前进。途中首先受到车臣珲台吉和策旺丹增率500骑迎接，珲台吉献白马100匹为贽见礼。却藏热绛巴属下的僧人和百姓在达克滩向达赖喇嘛献了午餐。此后又有墨尔根济喉、衮布策旺、噶丹达吉率600骑迎接。此后，因赞布喇嘛的请求，达赖喇嘛前往赛柯

合新寺（即青海大通广惠寺），寺院设荤素宴席款待，献绸缎、茶叶、马匹等，并赠给达赖喇嘛一部大慈法王时期刻印的朱砂本《甘珠尔》经，五世达赖喇嘛将这部《甘珠尔》带回拉萨后，供奉在哲蚌寺中。达赖喇嘛在赛柯合寺给 2000 多人传授了玛尼教法。赞布喇嘛请求达赖喇嘛以特殊的缘起诵传《大宝积经论》，虽然当时时间来不及，达赖喇嘛还是为此念诵了三叶经文，还给赞布喇嘛和 30 名僧人传授了六臂观音四灌顶加持法。

七月六日，达赖喇嘛行抵哈拉乌苏温泉，此前他在鄂尔多斯时左脚化脓，虽经治疗，并未全好，所以在此温泉洗浴，去除了病根。这时有固始汗派遣的第巴江热哇·衮布才旦、仲尼仲巴、班禅的坚赞吞布拉章的代表等从西藏前来，向达赖喇嘛递交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件 40 多封以及礼品。

七月十一日，达赖喇嘛行抵察罕托罗海。4 天中从青海湖周围各部前来拜见的首领和民众超过 7000 人。达赖喇嘛给 160 人传授了比丘戒，给 30 人授了沙弥戒。给随行的清朝官员阿萨肯阿玛传授了马头明王加持法，并让他回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红、白水晶念珠等大批贡礼。从十六日起的 3 天中，随行的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僧人举行法会，达赖喇嘛去担任法会的金刚上师，向所有护法神献供、施食和赞颂，并敬献题有偈颂的哈达。十九日清晨举行了盛大的焚香祭祀，迎请大护法神降临附体，并向护法神献礼。二十二日，达赖喇嘛给察罕诺门罕、塔尔寺和佑宁寺等寺院的囊索、青海各部首领及属民等一万多人传授了观音菩萨主从三尊随许法，给济咏却什吉、额尔德尼岱钦、阿米达喇等人传授了马头明王和长寿灌顶法，给阿噶格楚、噶丹达吉、衮布策旺等人传授了马头明王随许法，还因策旺丹增劝请，撰写了金刚持帕旺喀巴的赞颂文和自赞文。

七月二十六日，达赖喇嘛从察罕托罗海行至措秀波巴颜诺尔，给白玛活佛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上师瑜伽，给却藏曲杰班觉嘉措及其僧人传授了不动佛显入坛城教诫。行至恰卜恰寺院附近时，达赖喇嘛给塔尔寺曲杰和西纳囊索传授了金刚手菩萨随许法，给墨尔根台吉传授了秽迹金刚随许法。

八月一日，车臣珲台吉和济咙等青海蒙古送行者离开达赖喇嘛返回，达赖喇嘛给丹增穹哇传授了依怙随许法，给宰桑固始的属民传授了玛尼教法。

五日，达赖喇嘛行至阿力克部落的天然温泉，晚上洗了温泉浴。有2000多名朝拜者聚集在此，时逢阿力克部落发生鼠疫，担心随行人员染上，所以朝拜者一律不准进入达赖喇嘛的行营。应墨尔根噶居巴的请求，达赖喇嘛撰写了向玛沁蚌拉山神祈祷的祷告文。

八日清晨，达赖喇嘛等向玛沁蚌拉山做盛大的煨桑祭祀。又派人把刀剑、彩箭、白绸飞幡、箭袋、弓等供物送到有地方神祇的城堡中去，这时突然下了大雪，达赖喇嘛认为这是玛沁蚌拉山神喜悦的表现。

九日，达赖喇嘛行至阿拉克沙尔，随行僧人举行了酬补神灵和念诵等仪轨。此时顺治帝派遣的使臣到达，并将受封为国师的印信和诏书、赏赐品颁给第穆活佛。达赖喇嘛说似乎是因为嫉妒，帕巴拉活佛和第穆活佛师徒间产生了隔阂，不久他们即离开达赖喇嘛返回昌都。

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通天河河谷为以色卡寺、拉布寺、拉秀寺喇嘛为首的僧俗600人念诵了六字真言，得到众人所献黄金、马匹、铠甲等。

八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行抵治曲古尔班诺门罕的牧地附近安营，休息4天。以昌都温仲喜哇桑布和首领罕都为首的巴

尔康、邓柯的僧俗人士上千人前来拜见献礼。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密宗事部三怙主随许法。

九月一日，达赖喇嘛从治曲启程，第巴派革吉班第和阿难达带六匹乘马前来迎接。达赖喇嘛赠给阿难达一件皮袍，给觉丹寺、拉秀寺的100名僧人授了比丘戒。在俄马山跟，达赖喇嘛会见了罕都，给他传授了马头明王加持法，又因第巴达尔巴的请求，在献给察尔钦的灵塔的敬神哈达上题了词。

十九日，达赖喇嘛行至唐古拉山上，按普贤菩萨心传秘藏的仪轨反复降伏诸部鬼神。随行的曼卓班钦在从代噶到西宁期间一直患病，到青海湖边时本已康复，此时又突然发病，到二十日故去，尸体就地火化。此后在途中有达赖巴图尔、迈达拉杰、囊索欧珠、霍尔布玛尔等陆续前来迎接，达赖喇嘛分别给他们传授了四臂观音、马头明王的随许法。在夏克，达赖喇嘛的随行僧众做了供祭大护法神的法事。在楚木拉哇，达赖喇嘛给达赖巴图尔的夫人等以及1000名霍尔安多人传授了观音菩萨随许法。

十月一日，达赖喇嘛在肖莽苏穆拉给达赖巴图尔管辖的1000个蒙古人和100多霍尔人做了加持法事。五日，达赖喇嘛行至那隆噶尔摩，在此可以望见念青唐古拉山，故停留3天，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念青唐古拉山神的仪式。藏北地区蒙藏僧俗首领聚集于此迎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到拉萨朝佛后返回的霍尔仓曲杰阿旺彭措传授了上师供奉、陀罗尼念诵等经教。在扬喇路口，色华钦布以蒙古习俗盛宴款待达赖喇嘛，其属下僧俗部众也都前来拜见。从措列当湖到波仓河时，达垄寺的温仁波且阿旺南杰勒珠前来迎接。此后，达赖喇嘛行至热振寺，停留3天，迎请热振寺的文殊金刚和阿底峡塑像广为供奉，并修习噶当十六明点法，接受了灌顶。热振寺吉索在大经堂中设宴

款待达赖喇嘛，并献了礼。止贡寺的古章巴活佛官却仁钦来到热振寺，向达赖喇嘛献坐垫、瓷碗、哈达、乘马等。当年七月，第悉桑结嘉措诞生，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时，桑结嘉措之父仲麦巴·阿苏克到那隆噶尔摩迎接，并将桑结嘉措出生之事告诉达赖喇嘛，按达赖喇嘛1652年五月初经过藏北和桑结嘉措次年七月出生的时间推算，以前一些学者推测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达赖喇嘛见宰桑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无意向其弟仲麦巴·阿苏克赠送更多从汉地得到的物品，就自己送给仲麦巴·阿苏克上等珍珠念珠等礼品。此后在途中达赖喇嘛受到乃宁夏仲、第巴嘉日巴、色拉寺和哲蚌寺经师等人的迎接。达赖喇嘛行至达垄寺时，寺僧出寺列队迎接并献礼品。达赖喇嘛在僧俗集会上做了加持法事并发放大量布施，本来还打算进入达垄寺巡礼，因人群拥挤未能如愿。当时在西藏有一些人传布流言，说达赖喇嘛已在途中亡故，是由一个替身穿戴装扮后冒充达赖喇嘛，引起许多人怀疑。

十月十五日，达赖喇嘛行抵伦珠宗时，纳摩夏喇嘛在路边林中窥探，认出达赖喇嘛并非替身冒充才放心地出来。澎域各寺院僧众和百姓也到伦珠宗迎接，达赖喇嘛在此会见了主巴活佛、德钦却库尔和达孜台吉措吉多杰等。

十六日，达赖喇嘛在途中受到甘丹赤巴官却曲桑、夏孜曲杰坚贝强巴南杰、甘丹寺各扎仓经师的迎接。在塘萨甘丹却科尔用午餐时，达赖喇嘛会见了素尔巴钦波，为该寺新建的经堂撒花祝赞。

十八日，达赖喇嘛行抵恰日达孜宗，曲杰强巴阿旺伦珠在途中拜见。在达孜宗停留的3天中，达孜台吉兄弟盛情款待并献绸缎等物品。达赖喇嘛给达孜的僧众传授了马头明王加持法

和七日白度母随许法。札巴、沃那、达浦、拉隆、强巴林、谐拉康等寺院和达孜各家贵族向达赖喇嘛献了礼品。达赖喇嘛请螺髻大梵天神降附人体，举行了成就事业的酬神供养。行至格日林卡时，扎西迥曲杰和塘嘉、拉布、格日新寺的僧众和施主前来拜见。在仲多地方，达赖喇嘛派其却本和密咒师阿旺赤列去年衮山谷中敬献供品。从扎噶到蔡公堂，沿途都有人群载歌载舞欢迎达赖喇嘛，日沃德庆寺堪布、巴日活佛、墨如喇嘛、叶尔巴寺的经师等也前来迎接。在拉达，甘丹桑阿林寺僧人列队欢迎并设午宴款待。达赖喇嘛与该寺经师琼结巴·洛桑扎西详细交谈了各方面的情形。行至噶摩囊时，以固始汗、索南饶丹为首的色拉、哲蚌、觉摩隆等寺院的僧人、各地首领、仲科尔等骑马来迎。二十四日当天，达赖喇嘛在色拉等寺的僧队和拉萨百姓举着七政宝的歌舞队的迎接下，抵达拉萨大昭寺。

十月二十五日，四世班禅的代表从扎什伦布寺前来，德瓦巾寺、白居寺、德庆曲科尔、唐波且等寺院的代表和桑珠活佛、伦布孜巴等也到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献礼。当天是宗喀巴大师忌辰，拉萨城的酥油供灯特别明亮。

十月二十六日，多吉扎活佛、乌金措摩、热穷浦活佛、坚叶巴、桑日的本萨阿尼仲母子、恰巴本萨等僧俗人士向达赖喇嘛献礼，达赖喇嘛赠给阿尼仲所请求的《佛语疏释》。聂塘扎西冈、麦如、拉萨的策吉等地的人们为达赖喇嘛表演了跳神和歌舞。厄鲁特部苏勒屯台什向达赖喇嘛献银400两，达赖喇嘛给达赖巴图尔和车臣温布传授了阿弥陀百次长寿灌顶法，给顶波且寺僧人传授了白度母如意轮随许法。十月三十日，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父子一起到大昭寺各殿堂向佛像敬献了敬神哈达并做祈愿，还向具吉祥护贝龙王祈愿献供。

十一月一日，达赖喇嘛及随从等用大缎等装饰大昭寺回廊

壁画，并举行宴会，请乃宁活佛讲论佛法。

二日，第巴吞巴·衮布扎西在达赖喇嘛住处为达赖喇嘛举行宴会并献礼。玛尔康的头人、温布等向达赖喇嘛献了马匹、茶叶、铠甲等。达赖喇嘛会见了楚布仲巴大师、觉拉活佛多杰宁波等，应吞巴·衮布扎西的请求写了莲花生赞颂文，给阿旺赤列写了向历辈索尔钦波祈愿文，因本仓夏却瓦策旺多杰的请求撰写了医方明注疏等。达赖喇嘛还给固始汗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达赖巴图尔传授了秽迹金刚和六臂观音灌顶除障法，给苏勒屯台什、噶丹达吉、第巴吞巴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卓木达堪布图多班觉传授了六臂观音灌顶加持法。贡噶宗各寺僧人和仲科尔按其宗堆色钦巴·南杰才仁的安排到拉萨来向达喇嘛献礼，甘丹桑阿林的僧人和经师也献了礼，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与尊胜佛母相关的祈愿长寿的法事。

十一日，固始汗在他的拉萨的住所翻修一新的噶丹康萨设午宴款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向固始汗赠送了缎面皮袍等大量礼品，并给参加宴会的僧俗人士赠了礼品。下午在江塘岗为达赖喇嘛举行了各种歌舞娱乐活动。当天达赖喇嘛在哲蚌寺2700名僧人列队欢迎下返回哲蚌寺的甘丹颇章。此后的3天中，哲蚌寺吉索在大经堂、盘德勒雪林和却科林扎仓在自的僧舍举行宴会款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80人授了出家戒或比丘戒。因第巴恰巴居美父子同时去世，杰布扎西得到继任地方首领的机会，他请求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灌顶。

返回哲蚌寺后，随达赖喇嘛去汉地的仲科尔们大都请了假，达赖喇嘛也认为从汉地到西藏的换水土期间保养身体至关紧要，故应在哲蚌寺闲居。他跟随从扎西曲德寺来哲蚌的甘珠尔巴复习菩提道次第及摄要等经教。此时，随达赖喇嘛到拉萨的侍卫拉玛、内大臣囊努克等，向固始汗颁赐了顺治帝给固始

汗的金册金印，册文为："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当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尔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固始汗启用金印，向大昭寺觉卧像敬献盖印哈达作印样时，由达赖喇嘛在哈达上题写了偈颂。

十二月三日，森康贡活佛从波窝曲多来到哲蚌寺，向达赖喇嘛献了茶叶、马匹、铠甲等礼物。年底，达赖喇嘛担任扎仓举行的法会的金刚上师，在时轮法会上抛撒真言芥子。

木马年（公元 1654 年　顺治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 38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欲界大自在天敬献供品、朵玛及题辞哈达，在哲蚌寺举行节日排座宴会。达赖喇嘛给固始汗传授了阿弥陀百次长寿灌顶法和宝帐怙主随许法。又请乃穷护法降附人体，迎至甘丹颇章，固始汗询问几年中能否康健，护法说 73 岁是一个关口，达赖喇嘛撰写了祈愿文。

一月八日，达赖喇嘛的却本去温泉时，达赖喇嘛让他给桑耶和唐波且的护法神捎去达赖喇嘛写的有关从汉地平安返回而酬谢神灵的偈颂和供礼。同时，达赖喇嘛在两三天中给清朝护送达赖喇嘛回藏和向固始汗颁赐印册的使者侍卫拉玛、藏巴噶居、囊努克多尔格大臣、修世岱多尔格大臣、莽瓦扎尔果齐、诺力扎尔果齐、笔帖式阿齐和杰日特等人传授了随许法，诵传了经文。并依照一些人的愿望，授给出家戒或比丘戒。当侍卫拉玛等回京时，达赖喇嘛还派遣姜洛金噶居·阿旺诺桑和达博温穷随同去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侍从们议论要是能给额

辛格亲王（和硕承泽亲王硕塞）赠送一件在拉萨祈愿大会上在大昭寺觉卧像前念诵加持过的袈裟，定会有益处，达赖喇嘛觉得这个意见很对，特意为袈裟题写了偈颂后，交阿旺诺桑和达博温穷带去北京赠给额辛格亲王。

从一月中到三月下旬，因素尔钦波到哲蚌寺，达赖喇嘛向他请教摄集上师密意的经典及新旧密乘的灌顶经教等。

二月上半月，达赖喇嘛给冈宁活佛恰多诺尔布传授了长寿灌顶，给潘德活佛和竹拉喇嘛传授了六臂观音除障随许法，会见了鄂戎、噶恰、居米等工布地区的僧俗人士。大概这期间达赖喇嘛身体不好，双脚肿胀，据说出现了极其险恶之兆，所以在哲蚌寺盘德勒雪林扎仓举行修习阎罗敌和祈愿延长寿数的法事，在曲科杰寺伦珠噶察、哲蚌寺密法殿、乃穷寺、贡噶宗、叶尔巴寺等处举行了酬补供神法事，达赖喇嘛向各寺护法神殿敬献了题有求神偈颂的哈达，在色拉、哲蚌寺供奉度母、白伞盖佛母的印塑泥像，还给前后藏大部分寺院布施了斋僧茶。达赖喇嘛派第巴达尔巴阿旺彭措伦珠跟从印度波罗奈斯城的婆罗门班智达郭卢喇摩什学习声明学，经过 10 个月勤奋学习阿旺彭措伦珠不仅精通了声明，还熟练地掌握了印度口语。

三月初，达赖喇嘛给大昭寺的各个佛像涂金、敬献百供和敬神哈达。这一时期还对哲蚌寺大经堂、门楼、银塔殿、寝殿等处的壁画进行涂色或重绘，工程由达如瓦诺尔布负责。乃东的夏仲仁波且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奉献了白度母如意轮。达赖喇嘛向夏仲仁波且和曼隆巴等询问各种向白度母嘱托事业的传规。达赖喇嘛在此时写完了古格曲杰宁多嘉措以前劝请的班禅大师的秘传，还为赞布喇嘛的寺院写了向吉祥退敌天女施食及托付事业的偈颂。

从四月到五月上半月，达赖喇嘛因为脚病在哲蚌寺严格闭

关修行洛扎伏藏所传的业缘大鹏法。当时因达赖喇嘛回西藏后很少露面，拉萨又流传起达赖喇嘛因不服水土早已去世、现在不得不严格保密的谣言。

五月二十日，达赖喇嘛结束闭关，担任了向三界之主供奉灵器的酬补法会的金刚上师。二十一日晚右脚尖又突然疼痛，二十二日参加早晨法会后又不能行走，只好再次休息，由仲麦巴·赤列嘉措负责照料，又请本仓强俄巴治疗，10天以后才逐渐康复。强俄巴想用穿刺放血的办法慢慢治疗，去除病根，但是由于以前早已安排本年夏天固始汗、索南饶丹和达赖喇嘛一同到后藏巡视，索南饶丹一再催促。因此只好由强俄巴为达赖喇嘛做了用角吸血的治疗，可以不妨碍行走，即准备动身。动身前，达赖喇嘛派却本到乃穷寺供设佛像和灵器，在雄·扎西孜巴到阿里去赴任之前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会见了曲杰觉杰巴和俄尔巴夏尔巴。当请假的仲科尔返回后，将清朝赐给达赖喇嘛的伞盖、宝幢、飞幡和旌旗等拿出来，作为达赖喇嘛一行的俗人队列的前导。

六月十三日，达赖喇嘛一行从哲蚌寺出发，当晚行抵夏塘的沃尔住宿，达赖喇嘛朝礼了阿底峡的灵塔等，并发了誓愿。十四日，中午在江地方用餐时，主巴活佛和雍增活佛前来拜见。十五日，噶丹桑额林寺僧人举行盛大跳神活动欢迎达赖喇嘛一行，晚上住于曲水时，达赖喇嘛给塔尔巴林寺僧人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十六日，在曲科羊则驻锡时，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讲授了长生缘起和新写的般若论释。此后达赖喇嘛在娘萨乘船过雅鲁藏布江，翻过达乌拉山在隆桑住宿，浪卡子夏仲兄弟和乌金措摩活佛德庆赤列措莫等前来侍奉献礼。行抵嘉塘草原时，年图塔克举行了盛大的野营宴会，达赖喇嘛给霍尔的属民们传授了观音主从三尊随许法。二十二日行抵嘉温泉，达

赖喇嘛因脚部肿胀未消，不能脱藏靴，所以在此住宿，洗了温泉后病痛即平复。二十四日行抵噶丹强巴林寺，僧众集会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喇嘛讲授了《菩提道次第略论》。

二十六日，行抵仁蚌宗，当地许多僧俗人士前来迎接。本来约定四世班禅在仁蚌与达赖喇嘛等会合，但达赖喇嘛一行抵仁蚌时，四世班禅已经离开。因此达赖喇嘛等在仁蚌停留数天后，经过兰、白朗等地，于七月六日抵达扎什伦布寺。当晚达赖喇嘛在坚赞吞布拉章的大经堂举行的宴会上，会见了四世班禅，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七日和八日，扎什伦布寺的吉哇和各个扎仓分别宴请达赖喇嘛等，并赠送了许多礼品。按班禅大师的指示，达赖喇嘛在扎什伦布寺大经堂为全寺僧众讲解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噶当书中的《祖师问道录》并朝礼了弥勒殿等扎什伦布寺的各个殿堂。

七月十一日，达赖喇嘛等移住日喀则。十三日，四世班禅亦到日喀则居住，以后的29天中，达赖喇嘛经常去拜见四世班禅并请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文殊教法。讲解温萨耳传教法，达赖喇嘛还对班禅大师的讲解做了记录。在此期间，后藏日喀则、襄、伍由、白朗各地僧俗民众携带大批礼品前来拜见，每日不绝。达赖喇嘛给郭仓苦行僧等讲解了三要义、中观、上师瑜伽、修心七要等，给襄甘丹曲科寺僧人讲解了入中论，给达丹彭措林寺僧众讲解了菩提道次第，给拉仁波且和达那寺堪布传授了无量寿佛和马头明王修习法，撰写了向上师班禅仁波且祈愿文、对布顿大师的赞颂文等。达赖喇嘛还准备给后藏僧俗大众传授一次长寿灌顶，以广结法缘，但在准备进行时发现日喀则第巴诺尔布及其属下为此广收灌顶供养，达赖喇嘛担心会给人以贪图财物的口实，取消了传授灌顶的计划。

达赖喇嘛原想趁此次到后藏的机会巡礼纳塘、萨迦、俄

尔、夏鲁等著名寺院，并已派人通知了萨迦达钦和拉堆等地的人士，请他们不必来日喀则。但此时固始汗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在厄鲁特部的亲属昆都仑渥巴锡（固始汗之兄）、鄂齐尔图台吉（固始汗侄子）及赛汗菊夫人要来西藏，想尽快返回拉萨，所以阻止达赖喇嘛去巡游各地，因此达赖喇嘛又派人去通知拉堆地区的僧俗首领赶来日喀则会见。

八月一日，达赖喇嘛会见了拉堆丹萨贡的夏仲仁波且。七日，达赖喇嘛会见了色居巴、仁钦则寺的僧众，昂仁寺的经师，拉孜、达孜、协噶尔等地的僧俗人士，给白居寺的堪布和讲经师、江孜地区的仲科尔讲解了三要义教诫。此时达赖喇嘛的旧病又复发，由本仓强俄巴进行治疗，仲麦巴·赤列嘉措和却本洛桑金巴负责护理。二十一日，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等从日喀则移住扎什伦布寺，达赖喇嘛按四世班禅的请求在扎什伦布寺大经堂做了祈寿法事。此时因厄鲁特部的客人将到拉萨，哲蚌寺派出的洛本多德嘉措到达扎什伦布，请固始汗和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在扎什伦布寺给昂仁、白居、郭仓、仁钦则等寺院的堪布和僧人等传法。剃度拉孜寺 30 名僧人出家。八月二十七日，固始汗得了不消化的病，达赖喇嘛为他做了祈寿和供奉马头明王的法事。待固始汗的病稍好一些，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等就于九月三日从扎什伦布寺出发，中午在拉章坚赞吞布用午餐，与四世班禅在席间进行了交谈。当晚达赖喇嘛一行在寺僧的欢迎下抵达夏鲁寺。四日上午，达赖喇嘛朝礼了布顿大师的圣水、金刚铃杵、梵文经典、锡杖、佛像、居室等，下午夏鲁寺为达赖喇嘛举行了跳神。五日晚，达赖喇嘛等行抵白朗，在林卡中下帐住宿，白朗地方的僧俗人士前来拜见。六日和七日，达赖喇嘛一行在白朗休息，将塔尔巴寺的内供圣物喀且班钦的锡杖、铜号、梵文经典等迎请到营地

礼拜和祈愿。十日，行抵仁蚌的卡如顶，因固始汗身体不适，在该处住了5天。达赖喇嘛瞻礼了曲隆寺的内供圣物，并认真祈愿，给江孜宗堆果那夏色波欧珠和仁蚌宗堆达波扎西传授了无量寿佛和马头明王修习法。十七日，达赖喇嘛等行抵隆桑，浪卡子夏仲兄弟和桑顶活佛、牧区贵贱人等前来拜见。并设宴款待达赖喇嘛一行。十九日，翻过岗巴拉山后，丹津温布和鄂齐尔图台吉的代表到达。二十日，乘船渡过雅鲁藏布江，下船后在河边有人献茶，准备举行集会，但固始汗突然气往上涌，达赖喇嘛为他加持时，也在刚开始吟诵时突然不省人事，使在场的人都惊慌失措，十分恐惧。他们举行了威猛金刚仪轨，达赖喇嘛才苏醒过来，慢慢能够看见和说话，众人这才放下心来。在曲水住宿时，贡嘎和曲水各寺的僧人前来拜见。在扎西孜住宿时，达赖喇嘛给固始汗做了长寿灌顶。

二十五日，达赖喇嘛行抵堆龙河桥时，受到噶哇东、觉摩隆寺僧人的迎接。当天回到哲蚌寺甘丹颇章后，鄂齐尔图台吉前来，达赖喇嘛给鄂齐尔图等传授了金刚手菩萨随许法。三十日，达赖喇嘛到噶丹康萨，给固始汗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威猛火刃灌顶法。因固始汗病情沉重，十月一日，达赖喇嘛再次去噶丹康萨，此时白玛林和扎玛的僧人为固始汗诵经修法，已做了三天的施食和回遮法事，达赖喇嘛抛撒了真言芥子。当晚拉萨囊巴努巴哇住宅失火，达赖喇嘛认为是极凶险之兆，就按需要做千次长寿灌顶的预言，采取将瓶内本尊数增加到一百，使一次灌顶可达百次之数的办法，为固始汗做了千次灌顶。此时固始汗已神志不清，其王妃贡吉又在厄鲁特部，所以由第巴索南饶丹关照，在色拉、哲蚌寺为固始汗举行了大规模的诵经修福法事，达赖喇嘛为此撰写了一篇向白度母祈请延长固始汗寿命的祈愿文，供僧众念诵。在返回哲蚌寺的途中，达赖喇嘛巡礼

了布达拉宫的经堂，为新写造的《甘珠尔》经撒花祝赞。

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后，给鄂齐尔图台吉及其夫人恰那多吉为首的新客人传授了观音菩萨、金刚手菩萨随许法，给森康贡活佛和蔡巴活佛传授了百次长寿灌顶法。台吉夫人恰那多吉请求改名，达赖喇嘛给她起名为彭措卓玛。十月十一日，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向哲蚌寺大经堂的壁画撒花祝赞，鄂齐尔图向达赖喇嘛献了金银、绸缎为主的千份礼品。并向参加法会的僧众发放茶叶、银两、锦缎等布施。达赖喇嘛为去后藏时请求题字的平民百姓补写当时未来得及书写的题词，又按甘珠尔喇嘛的指示撰写了强巴仁增钦波阿格旺布的传记。

十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到噶丹康萨为固始汗做了阿弥陀佛百次长寿灌顶法，驱魔法事和水遮法事等诵经祈福的仪轨，但没有多少功效，由林多曲杰和本仓强俄巴经常在固始汗身边诊治，病情也不见好转。达赖喇嘛说五供节的供灯预兆整个年景的好坏。二十五日，晚色拉寺、哲蚌寺的供灯因狂风而不能点燃，噶丹康萨的供灯则连灯盏也被狂风刮走，所以征兆十分险恶。

二十六日，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会见了喀尔喀部阿克岱钦之子察罕，给他传授了长寿怙主随许法，给噶丹桑阿林的僧人讲授北传伏藏经典中的三法要及寿命主教诫，给推散达吉林扎仓的僧人传授了皈依、发心、积聚资粮等教法及他自己新写的《宗喀巴大师赞颂——杜鹃之歌》，并给邦戎噶居扎巴等 23 人授了比丘戒，剃度 50 人出家。

十一月三日，昆都仑渥巴锡一行到哲蚌寺拜见了达赖喇嘛。五日至二十日，达赖喇嘛闭关静修，请索尔钦波前来传授了意集灌顶等深密教法。二十二日，昆都仑渥巴锡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献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观音

随许法，给羊官寺京俄夏哈尔活佛、西扎第巴等传授了火刃灌顶法。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继续跟从素尔钦波学法。

从十月底到十二月初，固始汗病情虽未明显加重，但体力逐渐衰竭。

十二月七日傍晚，固始汗病情恶化，第巴索南饶丹匆忙从拉萨出发，半夜时到哲蚌寺告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迅即准备停当，连夜赶往拉萨，黎明时分到达噶丹康萨，当时固始汗已经出现即将去世的迹象，达赖喇嘛等仍然为他念诵了甚深陀罗尼咒、三誓愿等。八日下午，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那巴诺门罕、格勒贝丹和阿巴赖（鄂齐尔图之弟）的夫人色罕菊（咱雅班智达传说色罕菊是鄂齐尔图的后母，当是阿巴赖之母，但五世达赖传说她是阿巴赖之夫人，究竟孰是，待考）等许多人前来拜见，格勒贝丹向达赖喇嘛大谈他在蒙古的活动对格鲁派的好处。当天固始汗在噶丹康萨去世，由第巴索南饶丹负责，以德钦夏仲意云为首的许多蒙藏人士在噶丹康萨操办丧事，仪式以蒙古习俗为主，西藏习俗为辅，规模很大。由拉萨上下密院550名僧人念诵密集一个月零七天，由帕邦喀17名僧人念诵大悲观音菩萨，由塔尔巴寺僧人做灌顶沐浴仪轨。在拉萨大小昭寺陈列金水、供灯和敬神哈达。给前后藏各地区各教派的寺院和60700名僧人布施了斋僧茶饭。在下一年的拉萨祈愿大法会上给6000僧人发放了9次哈达、银两、绸缎、食品等布施，在进行年供时给色拉、哲蚌两寺僧众熬茶。布施的金银、珍宝、绸缎、地毯、鞍具、马匹等折合粮食达584500多克（1克合28斤）。另外还用3000钱黄金建造金汁书写的《甘珠尔》、在小昭寺塑造佛像，仅塑造佛像所用的工钱、酬金折合粮食就达21500克。

十二月中旬，达赖喇嘛用7天时间认真修持以固始汗为对境的依止大悲观音菩萨解脱众生的本尊坛城仪轨。会见了从康区前来的色尔钦南杰才仁。给他传授了莲花生的上师瑜伽，书写了供色罕菊夫人念诵的清净七支祈愿文和阿尤喜请求的祈愿文。22日达赖喇嘛和盘德勒雪林扎仓僧人到噶丹康萨，依止大威德十三尊布面坛城为固始汗的遗体做了盛大的灌顶沐浴法事。

木羊年（公元1655年 顺治十二年）五世达赖喇嘛39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献朵玛和敬神哈达，举行排座宴会，为扎仓重写了尊胜佛母千供仪轨。一月四日，哲蚌寺吉索在吉康宴请达赖喇嘛和各位讲经师。决定恢复第悉藏巴时期中断了的前后藏日常念诵《甘珠尔》经的传统，由第巴索南饶丹指定各寺庙轮流月份，从本年起进行。其次序为：正月，贡噶托日协珠林、仁蚌噶丹强巴林；二月，曲水塔尔巴林、白居寺的格鲁派扎仓；三月，噶丹顿聂林、冈坚曲培、尼寺、伦则寺和恩摩宗各寺；四月，推散达吉林、噶丹沃门林；五月，觉摩隆、贝色、聂塘等地的寺院和襄噶丹曲科寺；六月，曲科羊孜、冈坚、嘉钦孜、日沃当钦寺；七月，沃喀各寺及乃宁、仲孜、色顶寺；八月，噶丹顿尼林、噶丹培吉林；九月，日沃德钦、噶丹沃门林、茫噶达尔林；十月，推散达吉林、桑珠噶丹、德贡、奔巴、达夏寺；十一月，甘丹桑热林、襄噶丹曲科林寺。布达拉宫和多瓦常年诵经不断，并被指定代为阿里宗喀设置诵经活动，其他大寺此前已增设长期念诵《甘珠尔》活动。

一月五日，达赖喇嘛到大昭寺，撰写了专为超荐固始汗的祈愿偈颂供祈愿大法会念诵。又因鄂齐尔图台吉和夫人的请求

写了祈愿文和度母赞颂。八日，按惯例开始举行祈愿大法会，达赖喇嘛在大昭寺庭院内献了敬神哈达，那巴诺门罕和色罕菊向达赖喇嘛献了万份礼品，达文巴颜曲杰、固始曲杰、文都囊索等献了百份礼品，还向参加法会的僧众发放了茶叶、银两和绸缎。拉嘉里首领、吉雪各地的首领、森康贡活佛和楚布寺在曼扎院内为超荐固始汗奉献了大量财物。第巴索南饶丹为超荐固始汗额外布施了食物、金银、哈达、酥油和青稞等。达赖喇嘛给主巴和德钦曲科寺僧人传授了无量寿佛灌顶法，数目符合固始汗的寿数，给达赖巴图尔传授了阿弥陀佛百次长寿灌顶法，给色罕菊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白度母随许法，给萨迥托果南杰父子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六臂观音朵玛灌顶除障法。类乌齐的达垄夏仲阿旺扎西贝珠到达拉萨，请求向达赖喇嘛叩头礼拜，达赖喇嘛会见了他，给他传授了他请求的宗喀巴大师所传的文殊类教法。1642 年起索南饶丹自行决定将森康贡活佛的座位的坐垫降低三层，此时达赖喇嘛发现，即吩咐索南旺杰改正过来，使森康贡活佛的坐垫与达垄夏仲的坐垫相齐。

在祈愿法会上，达赖喇嘛还给鄂齐尔图台吉、色罕菊等两千多名蒙古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金刚手菩萨随许法、马头明王加持法等。达赖喇嘛隐约听说，鄂齐尔图派人向第巴索南饶丹请求给予印信（当时鄂齐尔图在厄鲁特被推选为鄂齐尔图车臣汗，此次进藏的目的可能即是请西藏方面承认其汗号并给印信），在送走鄂齐尔图后，索南饶丹派索南旺杰往噶尔贝达地方送去印章。达赖喇嘛认为，按蒙古的习惯给予鄂齐尔图以和固始汗相等的地位和印，是对双方有光彩的事，但是不符合汉地和西藏的习惯。达赖喇嘛还给察瓦活佛传授了教法，察瓦活佛想要学习宁玛派教法，达赖喇嘛向他指出宁玛派不适合他们蒙古地区，宁玛派的书籍、神像也不宜带到蒙古地方去。达赖

喇嘛还给上密院的5人授了比丘戒，给12人授了沙弥戒，并剃度到甘丹、色拉、哲蚌三寺学经的阿巴赖属下的78名蒙古人出家，给他们授了戒。

一月三日，达赖喇嘛在僧众列队欢迎下到达色拉寺，在大经堂为僧众传授文殊类教法的随许、加持以及噶当书的内容。结束时作为今后到色拉寺讲经的缘起，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开首一段。班智达郭古拉要返回印度婆罗尼斯，达赖喇嘛赠给他黄金8钱、白银100两。色拉寺吉索和各扎仓、康村设宴款待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收到岗波活佛寄来他的著作《梵天摧伏阎罗王缘起论》及信件，达赖喇嘛给他回了信。达赖喇嘛还因宰桑和硕齐、衮布才旺、色罕菊的请求写了自赞文，供他们念诵，给洛桑坚巴和曼仲才旺达吉写了本生祈祷文，为第巴阿旺彭措伦珠去楚布寺学习《旃陀罗声明论》写了不生违碍的祈愿文，为阿巴诺门罕所造阿里扎仓的弥勒佛像写了祈愿文，给12人授了比丘戒，剃度130人出家。

一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到帕邦喀绛曲林寺，给僧人传授曼荼罗法要等。用乌尔都文、梵文、藏文合壁的祈祷词装饰寝室的墙壁。二十八日中午，达赖喇嘛在仲麦用午餐，为仲麦巴家族传授阿弥陀长寿灌顶，晚上抵色拉寺。二十九日，为解除第巴索南饶丹健康方面的疑虑献了赎命物并施洗礼，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三十日，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

三月四日，达赖喇嘛给昆都仑渥巴锡授了居士戒。当时阿巴赖打算在一个有五座山、五座雪山和五个湖的地方建寺，到西藏请求解除疑虑的预言，一些人说寺址很好，他们就放了心，还有人说该地寓有五部佛、五部空行、长寿五仙女之意，尽量说好。达赖喇嘛没有听说这些，当色罕菊询问他时，他卜算后说该地征兆非常凶险。色罕菊立即派人去把达赖喇嘛的话

转告阿巴赖，但阿巴赖似乎并未听从，仍然兴建了寺院，此即阿巴赖寺（该寺在额尔齐斯河上游，1657年建成开光，1661年准噶尔和和硕特内部发生混战时，阿巴赖被鄂齐尔图、僧格的联军围困在阿巴赖寺中）。达赖喇嘛还给门麦拉喇嘛、霍尔安多哇、赤列喇嘛等传授了六臂观音四灌顶随许法。八日，达赖喇嘛给大黑天献供施食并献哈达。九日至十九日，达赖喇嘛闭关静修。从这时开始的几年中，由第巴索南饶丹主持，由尼泊尔人森哈、扎西、达那牟尼及藏人喀热农噶瓦、顶钦巴、拉鲁则巴负责管理，刻制佛像印版，共刻佛、菩萨、金刚、度母及西藏个各教派祖师、僧的像上百幅。

三月二十一日，闭关结束后，达赖喇嘛为哉务霍尔仓曲杰撰写了祈愿文和77种修心法，给热绛巴玛哇顿月坚赞报告前去就任夏琼寺法台情形的信写了回信，为德阳扎仓讲经师彭措却丹写了弥勒佛赞颂文，为吉雪活佛阿旺丹增赤列写了上师瑜伽。给22人授比丘戒，给70人授沙弥戒，给宰桑和硕齐传授了马头明王灌顶法。

四月四日，达赖喇嘛收到为达孜台吉措杰多吉去世而送来的甲胄、马蹄金等回向礼，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八日作好准备后，九日，达赖喇嘛在布画坛城中给以色罕菊夫人为首的蒙古权贵们传授了格鲁派的大威德四灌顶法、上师供养和施食仪轨等，并赠如来舍利等为他们送行，阿尤喜夫人向达赖喇嘛敬献了百粒大珍珠串成的念珠。十九日，达赖喇嘛给哲蚌寺德阳扎仓的僧房和后殿弥勒像祝赞撒花。扎仓僧众在经堂为达赖喇嘛举行了祈寿法事。清朝派来的使者达温曼珠宝利、达温诺尔布嘉措、侍卫楚臣等到达拉萨。二十五日，清朝使者向达赖喇嘛送交了皇帝的圣旨和礼品。二十八日，金字使者们分别向达赖喇嘛赠送了绸缎、金银等礼品，并给哲蚌寺各扎仓熬茶布施。

达赖喇嘛按例款待和酬谢清朝使者，并给他们传授了怙主四灌顶加持法。

五月四日，达赖喇嘛给贡噶宗管寺庙官格顶喇嘛讲授了京俄拉色日巴的《京俄六法》，给阿里仲巴嘉察巴为首的郭仓苦行僧等讲授了喀且班钦、无著、帕邦喀巴的论著，给喀尔喀的额尔克阿克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六臂观音随许法。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达赖喇嘛闭关静修，向素尔钦波请教了《八部善逝佛语总集》等多种甚深经教。十日，达赖喇嘛给岗波活佛洛桑赤列南杰授比丘戒，为江热所刻《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传》写了题记，给戎巴佐庆巴南喀周扎的转世灵童剃发，起名为俄色年扎嘉措，并给他和洛扎沃觉巴曲杰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德钦曲科、珠旺、顶波且三位活佛前来，献了绸缎和宝石等礼品，达赖喇嘛为他们进行了加持，并与他们交谈。从十一日起的七天中，达赖喇嘛担任退敌天女施食灵器供修法事的金刚上师。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九日，达赖喇嘛继续向素尔钦波听受灌顶经教等。

七月十日起的三天中，达赖喇嘛会见和款待皇帝的使者，给他们传授了教法，并派松曲热绛巴为正使，穷结郭仲巴为副使，与钦差们一同进京，向皇帝进呈奏表。达赖喇嘛的舅父古宣巴·贡噶嘉钦热丹久病后在伦布宗去世，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还为赤坚木古章的去世做了祈愿超度。二十三日，达赖喇嘛给达仓热哇堆巴师徒传法，给门·麦拉喇嘛等三人授了比丘戒，给 40 人授沙弥戒。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大法会上讲授《噶当六论》，十一日至十七日，达赖喇嘛参加沐浴节，到河中沐浴。珠旺活佛受命担任拉达克德丹寺的上师，行前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并说他虽然愚拙，但品德很好，

对格鲁和主巴两派能做到不偏不倚。

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三日，达赖喇嘛给主巴活佛、德钦曲科活佛和坚叶噶居洛桑南杰等40人传授阿底峡的教诫、传记及灌顶法等。

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二日，达赖喇嘛给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僧人讲解各种灌顶法、修习法祈愿供祭仪轨及偈颂等。

十月三日，扎仓僧众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而向达赖喇嘛供献财物，并建立无量寿佛彩砂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从七日起，有许多格孜和阿力克部落的人来向达赖喇嘛献马。达赖喇嘛为其中的10人授了比丘戒，为30人授了沙弥戒。

十一月一日至七日，达赖喇嘛会见了强巴活佛、江热曲杰、温多苏曲杰等，给衮布才旺和坎卓沙弥尼传授了长寿灌顶法。九日，强巴活佛向达赖喇嘛献了百份礼品。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去拉萨，给为超荐固始汗而新建的门仲祀殿举行开光仪式。从贡色到祀殿之间挤着黑压压的人群，几乎连马也没有落蹄的地方。二十四日，达赖喇嘛给小昭寺僧众传授上师瑜伽，并会见吉雪地区的各位首领。二十六日，达赖喇嘛等依止十三尊大威德举行圆满开光仪轨，与此同时卸任甘丹赤巴官却曲桑在噶丹康萨主持了固始汗的遗体的火化仪式。为纪念固始汗建造的佛像由尼泊尔工匠轮番加班，夜晚点灯赶工，在冬至前完成。二十七日，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会见了官却曲桑。

十二月上半月，达赖喇嘛给潘德活佛讲授了他新写的《大昭寺志》，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等。在大昭寺回廊给约如噶丹活佛等1000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约如噶丹活佛授了沙弥戒，起名阿旺坚白诺布。还给强巴活佛、土尔扈特的衮布伊勒登（和鄂尔勒克之子）和却克图宰桑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诺们格隆和坎卓沙弥尼传授了随许法等。

十四日，哲蚌寺举行金刚橛修行法事。二十三日，举行文殊退敌诵咒法事，达赖喇嘛担任法会的金刚上师。

火猴年（公元1656年 顺治十三年）五世达赖喇嘛40岁

本年藏历闰正月，在闰月过藏历年，达赖喇嘛向吉祥喜乐天献施食，敬献求神护佑的哈达。

一月四日，在哲蚌寺举行新年排座宴会。五日至十日，达赖喇嘛严格闭关，修供缘度母。十二日，哲蚌寺在吉康举行新年庆宴，宴会后达赖喇嘛到大昭寺参加正月祈愿大法会。在法会上温萨活佛、衮布伊勒登等人向达赖喇嘛献了供养和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随许法等。

一月二十六日，达赖喇嘛从大昭寺启程，经拉洞渡口、索康前往德庆孜，途中受到地方首领噶丹巴、托果南杰和蔡公堂寺、桑阿喀寺僧人的迎送。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和僧众为德庆孜新写造的《甘珠尔》举行依止十三尊大威德的开光仪式，并撒花祝赞，随后举行了庆祝开光的排座宴会，达赖喇嘛给执事僧和仲科尔、贵族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及随许法等。二十九日，在返回拉萨途中达赖喇嘛应甘丹赤巴阿里巴贝丹丹巴坚赞的邀请到桑阿喀寺，在僧众集会上念诵了宗喀巴大师赞，并向弥勒像发愿。中午又应素尔钦波邀请到蔡·却赤拉章，巡礼蔡羊官寺各殿堂，并撒花祝赞。

二月一日，达赖喇嘛到色拉寺，为新建造的如来八塔举行开光仪式，色拉吉索和各扎仓赠送了厚礼。五日，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给衮布伊勒登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金刚手随许法，并给受命去担任厄鲁特曲杰的哲蚌寺卸任戒师送行。

三月八日，达赖喇嘛举行抛掷朵玛的法事，派遣车臣温布去青海处理青海蒙古左右翼之间的一些事宜。从十二日到二十

三日，达赖喇嘛给森康贡活佛、白居寺堪布、哲蚌寺讲经师等人每天午后用一做法时间讲解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文集。阿里东波活佛前来，给哲蚌寺僧众熬茶布施，向达赖喇嘛献黄金100钱。二十九日，达赖喇嘛给强巴活佛、白居寺堪布、决巴巴图尔等传授了十三尊大威德灌顶。从四月一日开始，达赖喇嘛给森康贡活佛等讲授根敦嘉措文集，给强巴活佛等15人传授了比丘戒，给30人授了沙弥戒。为固始汗的骨灰做了法事后，调泥制成小佛像（擦擦），并在礼帛上印制固始汗像。还给索南旺杰讲解了《诗镜论》中的三章。

当时，西藏和尼泊尔在边界上发生冲突，第巴诺尔布等将中尼边界上的帕巴觉卧瓦底像送到哲蚌寺。四月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将此像迎至寝室，在像前推测将来的情形，并供养3天，然后送至布达拉宫佛殿。青海蒙古左右翼之间再次出现争端，故达赖喇嘛又派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前往青海。

五月一日，达赖喇嘛给绛巴阿旺伦珠、林多曲杰洛桑嘉措、本仓强俄巴、坚叶热绛巴丹增、江拉鼐等人传授灌顶加持、随许、修行等教法。因十五日将有月食，故达赖喇嘛从十一日开始闭关修行。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本已决定派森康贡活佛去蒙古，但森康贡活佛突然于十三日圆寂。十五日月食时，达赖喇嘛做了天铁邬摩加行法事。五月中旬，第巴索南饶丹到贡噶宗处理分配领地和清查税赋等事务时，有一天突然在寝室中昏厥了一顿茶饭的时间，众人惊慌失措，以为他已去世，正准备向达赖喇嘛报信时，第巴又苏醒过来。所以派人到拉萨请求达赖喇嘛护持，达赖喇嘛派人送去念经费和法器等。认为是第巴决定搬迁贡噶的叶衣护法的神殿而引起护法神的忿怒造成的。

六月，达赖喇嘛因皇帝颁赐的金印很重，命人配制了印

纽，并为此写了荐新偈语。并为总管喇嘛丹巴雅培等新铸的熬斋僧茶的大锅和却本、翁则为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新造的镀金长号写了修造记。由于西藏与不丹的战事仍在进行，哲蚌寺举行灵器供法会，达赖喇嘛去担任法会的金刚上师。

六月十八日，印度孟加拉王沙哈苏杂派遣的玛哈玛德沙比（穆罕默德·沙比）到达哲蚌寺，向达赖喇嘛赠送了许多西印度的财货。印度使臣是为建造国王宝座需要水晶石，听说拉萨附近旬地方有莲花生大师的修行地“白水晶石洞”，有水晶石柱和梁，故派使臣来求取，达赖喇嘛说这纯粹是把流言当作了真情。西藏派往巴塘担任宗堆的色钦鼐和管辖康区的固始汗之孙罕都、昌都的南色等之间发生矛盾，不便留任，故达赖喇嘛派遣达尔罕噶居去继任巴塘宗堆，并指示他兴建巴塘寺。二十二日达赖喇嘛因护法指示在火化森康贡活佛遗体时不宜住在哲蚌寺，故前去布达拉宫，在观世音像前诵经供奉7天。

七月一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见茂济喇克洪台吉（固始汗之侄）后返回哲蚌寺。五日，哲蚌寺僧众聚集大经堂齐诵祈愿蒙藏联军战胜的咒语。六日，达赖喇嘛与素尔钦波打卦卜算战争的吉凶，所得卦象为险卦，即通报第巴索南饶丹。此后，达赖喇嘛向素尔钦波请教伏藏教法，给达赖巴图尔和茂济喇克洪台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怙主随许除障法，撰写了祈愿森康贡活佛、山巴钦波、巴索（济咙）活佛迅速转世的祈祷文和第巴索南饶丹向观音像献印新的偈颂。从二十二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每天前往丹巴林卡沐浴。当时蒙藏联军攻入不丹，第巴索南饶丹等前往后藏安排后勤支援等事务，拉萨的贵贱人等也处在忙乱之中。

九月四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行，还在扎仓做念诵咒语、祈愿催伏敌魔的法事。第巴索南饶丹到达尼如河边时，因地势

过高呼吸困难，第巴诺尔布密报达赖喇嘛，请达赖喇嘛劝说第巴索南饶丹退兵，此时索南饶丹处也派人来请求做护佑索南饶丹身体的法事，达赖喇嘛派人到各个寺院熬茶斋僧，索南饶丹逐渐康复。仲麦巴·阿苏克在日喀则因食物中毒去世，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度法事，焚烧阿苏克的名牌时，达赖喇嘛说看清了他将投生之地。达赖喇嘛还为阿苏克的头发和遗骨做了法事，和泥做了许多泥塑佛像。

十月三日，强林额木齐桑杰迥乃和呼和浩特的德木齐达尔罕曲杰作为清朝的金字使者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送交皇帝的敕谕和礼品，达赖喇嘛对他们加以款待，并赠送礼物。同来的克色等人为额辛克亲王（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去世而向达赖喇嘛送交大量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亲王做了超荐法事，祈愿亲王一切善行回向圆满菩提，并认真火化了他的名牌。此后，又有喀尔喀左翼诺们额津、塘格日托因等人前来。清朝使者和蒙古客人在各寺院熬茶斋僧，并布施金银、绸缎、茶叶等。达赖喇嘛给额木齐、达尔罕曲杰、诺门额津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藏巴活佛和阿力克部落的百名客人传授了观音随行法。十七日，止贡夏仲到哲蚌寺住留3天，达赖喇嘛和他仔细商讨早期密咒方面的问题。给如托旺波彭措南杰的信写了回信，五供节（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忌辰）前夕，巴图尔台吉（即固始汗长子达延鄂齐尔汗）主仆、白居寺堪布、车臣温布等人一同从青海抵达拉萨。十一月八日和九日，达赖喇嘛会见巴图尔台吉等，并设宴款待他们。十日，达赖喇嘛右脚的旧病复发，并伴有热症，仍由本仓强俄巴医治，由仲麦巴·赤列嘉措和却本负责护理。月底，巴图尔台吉一行前去后藏会见四世班禅。由于脚病，达赖喇嘛未能亲自会见和礼送清朝的使者，所以由拉萨的官员代表为使者们送行，并派人随同前往送奏表和礼品，达

赖喇嘛还寄发了为松曲热绛巴赤列在五台山建寺勒碑记事的题词和给居住在汉地的毕力克图囊索的用乌尔都文写的复信。

十二月，达赖喇嘛脚病未愈，仍在哲蚌寺静养。

火鸡年（公元 1657 年　顺治十四年）五世达赖喇嘛 41 岁

因为脚病未愈，本年藏历年达赖喇嘛只参加了哲蚌寺新年酬补仪轨和宴会，未参加拉萨祈愿法会等活动。

一月八日，盘德勒雪林扎仓僧人向达赖喇嘛献礼并举行祈愿战胜阎罗王的法事。达赖喇嘛给 60 人授了比丘戒，给 100 人授了沙弥戒。二十日，达赖喇嘛给喀尔喀诺门额津等僧俗人士传授了十三尊大威德灌顶法及随许法等。

二月，达赖喇嘛脚病仍未治愈，又由曼贡章吉巴阿旺顿珠以牛粪疗法及角指疗法治疗。

四月，又从堆龙取来温泉水洗浴，才逐渐康复。达赖喇嘛为自己常用的 400 函书籍编写了目录。

五月，达赖喇嘛给洛扎特协喇嘛等 67 人授了比丘戒，给 100 多人授了沙弥戒。

六月初，达赖喇嘛闭关静修，迎请苏尔嘉央喇嘛来哲蚌寺，向他请教《新密十万续》及零星教法。十一日和十二日，桑浦寺和策色寺僧众向达赖喇嘛献曼扎等礼品并祈愿他长寿，达赖喇嘛给桑浦寺堪布和讲经师传授了上师瑜伽，给巴图尔台吉的夫人等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六月十二日，后达赖喇嘛继续闭关修行，此时病情仍然不轻，故七月中为根除病痛又修习遍入天、光音天等修行法。

此时西藏的蒙藏联军在不丹因不耐暑热和疾病流行而失败，有人建议将指挥军队的达赖巴图尔和茂济喇克洪台吉撤回，但他们不愿离开军队而撤回。不久茂济喇克洪台吉在军中

病逝，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由洛本强巴仁钦为他火化遗体，用骨灰和泥做了许多泥塑小佛像。由于这些挫折，由上下密院的两位曲杰和扎什伦布、俄尔寺出面调停，与不丹达成保持和平的停战协议，使蒙藏军队得以平安撤回。

七月二十八日，达赖巴图尔、第巴等人到哲蚌寺会见了达赖喇嘛。

从八月三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每天去河中沐浴。二十日，达赖喇嘛为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新建的僧舍撒花祝赞，并在法会上传法。二十六日起的一个多月中，达赖喇嘛给郭莽扎仓卸任堪布噶如哇阿旺班觉、南杰扎仓讲经师洛桑达吉等12人讲解《菩提道次第论》。

十月一日，扎西穹曲杰向达赖喇嘛敬献礼品并祝愿长寿，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百次灌顶法及随许法。十月中，都日雅勒和硕齐从厄鲁特部到拉萨。二十三日，他向达赖献了以500两黄金、6000两白银、1500匹绸缎、布匹、茶叶为主的万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马头明王随许法等。

十一月到十二月，达赖喇嘛仍闭关修行。十二月中，达赖喇嘛为都日雅勒和硕齐等人饯行。

土狗年（公元1658年　顺治十五年）五世达赖喇嘛42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向欲界之主献供品施食及题有嘱托本年事业偈颂的哈达。以喜饶喇嘛善丹格隆、贝日顿为首的清朝使臣抵达拉萨，在哲蚌寺大殿举行的宴会上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赏赐物品。喜饶喇嘛等于上年六月离京，进藏的目的除存问达赖喇嘛、四世班禅外，还因帕竹阐化王派人进贡并请换敕印，故清朝派他们来查看情形。顺治帝给达赖喇嘛的敕谕说：“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

因其归化效力，诚悃可嘉，故两赐敕印，以示奖劝。今复遣坚错那卜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颗，并故明所给敕书求换。及览该部奏，称阐化王原系图白忒国主，后为图白忒藏巴汗所破，隶之属下。明季藏巴汗又为厄鲁特国顾实汗所破，以阐化王给与达赖喇嘛转给第巴，阐化王遂于达赖喇嘛处受格隆萨喜尔为喇嘛。第巴因有阐化王敕印，遂以边内安岛人为阐化王人，遣之以来。及问来使坚错那卜等，言阐化王久隶第巴。而此次奏章复言皆为阐化王所奏，贡赋亦称阐化王。夫阐化王既属第巴，而屡次进贡仍称阐化王原名，今番进贡请换敕印，又不奏明，前后甚属不符。可将原委具实备书，付存问使人西喇布喇嘛萨木坦格隆具奏。”

一月五日，达赖喇嘛到拉萨，参加巴图尔台吉继承固始汗的汗位的即位典礼。达赖喇嘛说此次典礼场面很大，但是没有热烈气氛。这可能与蒙藏联军南征不丹的失利有关。达赖喇嘛与察罕诺门罕、白居寺堪布、车臣温布等熟悉蒙古方面习惯的人商议，认为汗王的名号应有“金刚”之意，所以在六日汗王即位时，达赖喇嘛赠给他的名号为“丹增多吉杰布”，蒙古语称为“达延鄂齐尔汗”，“鄂齐尔”即梵文金刚之意，与“多吉”相同。以甘丹、色拉、哲蚌、扎什伦布寺为首的格鲁派寺院在当天向达延汗献了念珠、茶叶、绸缎、氆氇等大量礼品。按照事先议定的，此后 3 天由乃东、止贡、达垄等寺院的代表、各大小活佛、贵族，堪布、执事僧，浪卡子、拉嘉里、吉雪等各地方首领、仲科尔向达延汗献礼。本来说只向达延汗一人献礼即可，结果在场的蒙古各部首领都无精打彩，只好给他们都分配礼品。

此时，楚布寺的贾曹仲巴活佛扎巴却央和达赖喇嘛的大舅父浪卡子夏仲贡噶旺钦彭措去世，分别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回向

礼品，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盛大的超荐法事。桑耶大护法指示，要萨迦法王和达赖喇嘛互相交换一种教法，萨迦法王请求传授《楚布百法》，达赖喇嘛传授了其中的一章，达赖喇嘛想向对方请求《多闻子手册》，因第巴反对，没有接受对方的传法。达赖喇嘛在法会期间向在场的达延汗、清朝使者、西藏各地僧俗首领传授了灌顶法、随许法等，撰写了供达延汗念诵的祈愿偈颂。达延汗、达赖渥巴锡、杜尔伯特托因、坎卓托因、清朝的使者等，白居寺堪布、达尔吉噶居等分别向达赖喇嘛献了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60人授了比丘戒，给80人授了沙弥戒。

二月，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闭关修行，早晚修炼，白天读书。当时第巴索南饶丹年事已高，身体不佳，一些人向达赖喇嘛提醒此事，达赖喇嘛开始考虑如第巴去世，应采取匿丧的办法，对今后一年的活动作了考虑。

三月一日黄昏，聂雪嘉日通过仲麦巴赤列嘉措向达赖喇嘛报告第巴索南饶丹病重。二日早晨，达赖喇嘛赶到拉萨，见第巴中风症状严重，即用诵经、除毒、用药等办法抢救，但到三日中午第巴即去世了。达赖喇嘛即召集内部众人，宣布对第巴之死秘不发丧，让达如哇诺尔布在匿丧期间担任他的助手，并派人去日喀则向第巴诺尔布通报情况及匿丧的决定。此后达赖喇嘛又去同达延汗和达赖巴图尔密商。五日，达赖喇嘛返回哲蚌寺，由仲麦巴赤列嘉措在达赖喇嘛和拉萨的达如哇诺尔布之间充当联系人，把各地向拉萨的第巴索南饶丹的请示事项及时报告在哲蚌寺的达赖喇嘛，然后又把达赖喇嘛的决定传达到拉萨，再以第巴的名义发布。达赖喇嘛安排从色拉、哲蚌寺抽调300人集中念诵《甘珠尔》一个月，各大宗豁也举行念诵《甘珠尔》的活动，并熬茶布施，以此悼念第巴索南饶丹。这期间

达赖喇嘛的脚病复发。仍由本仓强俄巴治疗，由仲麦巴赤列嘉措护理，当仲麦巴事务繁忙时，则由翁则洛桑却丹协助。觉囊派的达丹彭措林寺改宗格鲁派后，仍有不少僧人依然坚持觉囊派，不时与格鲁派派去的僧人发生矛盾，这时为便于匿丧和改变达丹彭措林的状况，达赖喇嘛派聂塘仲钦等前去，将原为觉囊派的僧人分别迁到其他分寺，又派哲蚌寺曲科林扎仓僧人去达丹彭措林讲经院学经，改寺名为噶丹彭措林，使其成为表里如一的纯粹的格鲁派寺院。青海蒙古左右翼中又发生领主争夺属民的纠纷，达赖巴图尔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划分鄂托克，与其他首领产生矛盾。达赖喇嘛把达赖巴图尔召请到哲蚌寺，由车臣温布和吉热担任翻译，对他进行劝导，平息了青海蒙古的这一内争。

四月，达赖喇嘛派色拉热绛巴嘉央扎巴和曲果麦巴诺尔布随清朝的使者进京向皇帝送奏表和贡品，达赖喇嘛给清朝使者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六臂观音加持法，给 20 人授了比丘戒，给 50 人剃度。拉萨公众不知第巴索南饶丹已去世，请求达赖喇嘛写一首给第巴的长生偈颂，达赖喇嘛按他们的愿望撰写。

五月，达赖喇嘛应日楚噶丹寺讲经师强巴仁钦的请求撰写了《菩提道次第论详解》，又为新峻工的盘德勒雪林扎仓佛像装藏并撰写该佛像建造志。由于护法神指示说第巴索南饶丹患病是森康贡的魔鬼附于第巴身体，应将森康贡拆除，尽管人们疑虑不安，还是拆掉了森康贡殿，并由扎仓僧众在废墟上做金刚仪轨禳解。印度婆罗尼斯班智达郭古拉 1655 年返印度时，达赖喇嘛让他搜求波你尼声明学的典籍并约请其兄班智达瓦拉巴扎一起前来，此时他们一起到达拉萨，由达尔巴任译师，从六月五日起为达赖喇嘛讲授波你尼声明论。

七月六日，盘德勒雪林扎仓向达赖喇嘛献礼并举行依止无

死光彩砂坛城的长寿仪轨，并斋戒7天。十五日，达赖喇嘛参加郭莽扎仓僧人集会，给第巴辛巴德勒和索本格拉哇传授大悲观音教法。从本年七月起，在卫藏、康区、安多各地每年举行防霜雹的诵咒活动，抽调部分僧人诵咒静修将近两个月，由达赖喇嘛发布念诵的咒语。在达赖喇嘛不能发布咒语的年份，由诵咒僧人的强佐从经筒中抽选咒语念诵。

八月，送交喀尔喀右翼额尔德尼洪台吉去世的回向礼的使者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为其超荐。十四日起达赖喇嘛到药泉沐浴7天。喀尔喀左翼多尔济秉图向达赖喇嘛献了各种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事部三怙主随许法，给达孜台吉父子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九月，达赖喇嘛闭关三个七天，任命德柱堪布纳摩夏巴为泽当安雀寺的上师，给达延汗兄弟传授了阿弥陀佛的百次长寿灌顶法。华热地区来的客人向达赖喇嘛献马200匹。达赖喇嘛给150人授了比丘戒，给200人授了沙弥戒。从九月二十日起的一个半月中，达赖喇嘛给哲蚌寺郭莽、德阳、都哇、阿巴等扎仓的堪布、讲经师等70人详细讲授了《菩提道次第论》。第巴江拉哇兄妹想去跟随昂仁堪钦学习声明，请达赖喇嘛写信引荐，达赖喇嘛在信中称赞昂仁堪钦是世间首屈一指的声明学家。

十月，达赖喇嘛给多吉扎寺的仁增活佛和僧人传授伏藏典籍中的教法，给60人授了比丘戒，给近百人授了沙弥戒。茫噶达哈敦（王妃）和昆都仑渥巴锡等向达赖喇嘛献了绸缎、金银、茶叶、布匹等千份礼品。闰十月七日，达赖喇嘛给30名僧人讲授禁食斋戒长净仪轨。仁波且曼隆巴为达赖喇嘛撰写长寿祈愿文并献礼。达赖喇嘛给昆都仑渥巴锡等50人授了比丘戒，给茫噶达等10人授了沙弥尼戒。给他们讲授了大悲观音修习法等。

十一月十日，达赖喇嘛会见达延汗兄弟、喀尔喀达尔罕诺颜、墨尔根曲杰等。十六日，达赖喇嘛赠给达赖巴图尔以“达赖洪台吉”名号，并赠给衣报，箭袋、宝剑等物，给7人授了比丘戒，给达尔罕诺颜等10人授了沙弥戒，为达波江拉哇所刻《四世达赖喇嘛传》印版写了跋文。

土猪年（公元1659年　顺治十六年）五世达赖喇嘛43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欲界之主献供，举行新年宴会。一月五日，给20多人授了比丘戒，给30人授了沙弥戒。七日，桑洛墨尔根曲杰迎请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大经堂，敬献银茶筒17个、高脚托盘13个、缎子300匹、白银200两、茶50包、带鞍具的马9匹。十日，由达赖喇嘛任堪布、由德钦曲科哇任轨范师，给主巴活佛授了比丘戒。因为在第巴索南饶丹的匿丧期，达赖喇嘛没有去参加拉萨祈愿法会，由甘丹赤巴主持，将大小祈愿法会合并举行。达赖喇嘛用七八天时间向尼色衮布索南请教甚深教法。

祈愿法会后，为第巴索南饶丹发丧，在大昭寺、桑耶、昌珠、雍布拉岗等处供净水和献哈达，向卫藏大部分寺院布施了斋僧茶，建立念诵《甘珠尔》和《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法事。达赖喇嘛为其超度，扎仓每天举行依止五部空行的回遮法事。

二月，因乃穷大护法指示，由仲麦巴·赤列嘉措负责，在哲蚌寺洛色林扎仓、达赖喇嘛寝宫建造镀金佛像和响铜佛像，准备为达赖喇嘛举行福寿法事。二月十一日，达赖喇嘛给达延汗兄弟传授阎罗敌随许法，给达延汗兄弟和青海蒙古左、右翼的各个首领颁赠了印章，并派遣索南旺杰等前往青海湖地区颁发。十四日，由达孜首领多吉南杰任施主，甘丹赤巴和三大寺

各扎仓堪布等聚集哲蚌寺大经堂，举行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大法会。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七日，为遮止内外违碍，达赖喇嘛举行念修，第一个七天念修忿怒金刚，第二个七天念修摧破金刚，第三个七天念修阿弥陀佛。

三月八日，达赖喇嘛向刹土神多绰旺波献供施食，并连续敬献题有祈愿偈颂的哈达。十日起的15天中达赖喇嘛闭关修行，并给桑洛墨尔根曲杰等传授随许法送行。十七日，达尔巴译师译完波你尼声明论，达赖喇嘛为此赐给班智达郭古拉兄弟衣服各一套、黄金110钱、白银150两。二十六日，达赖喇嘛宣布成立为第巴索南饶丹举行经忏法事的僧团，并派强佐顿希等人到布达拉宫筹备此事。

四月八日到十四日，达赖喇嘛按乃穷大护法的指示，到布达拉宫自现观音像前闭关7天。十六日，达赖喇嘛向卫藏各地正式宣布第巴索南饶丹逝世及匿丧结束。拉萨、贡噶、日喀则各地聚集各寺僧人诵经、供佛，给各寺院、活佛等致送了回向礼品。从二十九日起建立8个僧团，用3天时间延僧修福并发放布施；在布达拉宫集合拉萨地区上万名僧人，由甘丹赤巴阿里巴·阿旺多吉主持；在贡噶集合6500名僧人，由卸任甘丹赤巴官却曲桑主持；在泽当集合7000名僧人，由孜措大堪布洛桑丹培主持；在沃喀集合近千名僧人由精奇寺堪布仁钦洛追主持，在日喀则集合10100名僧人，因四世班禅未能驾临而由冈坚堪布洛桑嘉措主持；在江孜集合4000名僧人，由白居寺堪布喜饶云丹主持；在拉堆绛集合6000多名僧人，由昂仁堪钦主持；在仁蚌集合1100名僧人，由乃宁夏仲之弟主持。此外，还向未包括在这8个僧团中的热振、达垄、措那、洛扎、聂拉木、吉隆等地的162所寺院的14000名僧人发放了布施和斋僧茶饭。在超荐法会期间向各地125182名僧人布施的物品总计

折合粮食达775052克，加上匿丧期间诵经等所用物品折合粮食382000克，共计为悼念和超度第巴所用物品折合粮食1157000多克。一些人认为这样超度第巴是没有先例的，有些过分，但是达赖喇嘛认为第巴索南饶丹为格鲁派的教法呕心沥血，其功业为众人称颂，因此这样规模的超荐法事并无过分之处。

五月，达赖喇嘛因各地活佛、地方首领的代表及僧俗人士纷纷来到拉萨，就留在布达拉宫处理接待会见事务。达垄活佛、德钦曲科寺的活佛等在谈话中劝达赖喇嘛自己任命各机构官员，把实际权力接管过来，但是浪卡子和拉萨等地的首领对此吞吞吐吐，不愿明确表态。达赖喇嘛委任第巴的长子为日喀则宗堆，并委任自己的亲属东卡鼐为其助手。

为纪念第巴索南饶丹，由达赖喇嘛下令，由仲色白玛热丹负责，用15克铜、230钱黄金建造宗喀巴像作为身所依，用4000两白银、670钱黄金和80克铜建造一套善逝如来八塔作为意所依，由森厦洛的囊索官却达吉负责，用5000钱黄金写造了一部《甘珠尔》作为语所依，还写造了三部《宗喀巴文集》供在三大寺。以上等项所用工钱及装藏、开光所用物品折合粮食共为25500克。达赖喇嘛在如来八塔上题写陀罗尼咒和梵文偈颂，写了《甘珠尔》写造记。

为在封授领地的文书上盖印，达赖喇嘛将皇帝赐给的金印上的汉文印文择录制成一方新印，并将印新和所写偈颂献给观世音像和欲界之主。

五月二十一日，达延汗兄弟到拉萨要求按蒙古风俗为第巴索南饶丹守灵和做回向法事。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马头明王长寿灌顶法，并同他们谈论格鲁派的历史，就重要事务进行商议。达延汗兄弟二十九日返回当雄。

六月初，第巴诺尔布从日喀则到拉萨。当时以第巴诺尔布为首的一些世俗贵族和达赖喇嘛等格鲁派上层之间因第巴索南饶丹去世后行政权力的分配产生分歧，互生隔阂。十六日，达赖喇嘛派仲尼仲巴去诺尔布处转告拟请他继任第巴的事项及任命的条件，第巴诺尔布表示接受。

七月，清朝所派的却典喇嘛（札木巴喇嘛）和衮布格隆等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领受了皇帝的敕谕和赏赐物品。随来的察罕拜巴献了车臣亲王和策楞贝子夫人去世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此后却典喇嘛去日喀则会见四世班禅。衮布格隆去乃东实地查看帕竹首领的情形，达赖喇嘛派色钦温布和仲尼仲巴随行。衮布格隆奏报乃东的情况后，清朝政府决定不把乃东的帕竹首领列为进贡之家，不予换发印信文书。明朝赐给乃东阐化王的玉印在送北京验看后，由羊官囊索带回乃东，路上被盗匪砸坏，乃东想与清朝直接联系的企图彻底破灭。达赖喇嘛决定为固始汗建立定期祭祀的基金。划定雅德、斯日隆、哇莫等处27家岁入2770克粮食为在哲蚌寺定期祭祀索南饶丹的基金，温察、扎卡、雪江、扎西迴等处18家岁入1391克粮食为在色拉寺定期祭祀固始汗的基金。

七月二十五日起，达赖喇嘛去林卡沐浴。因住在布达拉宫行走过多，故达赖喇嘛的脚病又有所加重，所以八月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调养休息。因地方贵族郭那厦巴的领地盖噶萨距布达拉宫很近，所以达赖喇嘛决定将盖噶萨划归布达拉宫，而在山南地区换给一片大致相等的地方，并派达哇噶顿前去送礼商洽，第巴诺尔布与郭那厦关系密切，郭那厦色波、扎西岗才仁等私下串连，此事遂成为达赖喇嘛与第巴诺尔布关系紧张的导火线。

八月八日，达赖喇嘛给多吉扎仁增活佛授了比丘戒。十日，达赖喇嘛命仲色哇负责，建立作坊，用300钱黄金和数千颗璁玉、珍珠，为布达拉宫的自现观世音菩萨像新造头饰。察罕诺门罕上年在途中患病圆寂，此时为他送超荐礼的人到拉萨，达赖喇嘛为其举行祈祷法事，并写了祈愿察罕诺门罕迅速转世的愿文，还为仁增岳摩哇之弟恰多诺尔布做了超荐法事，撰写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所造百函佛经的目录。

九月初，达赖喇嘛为政教的声望和藏区百姓的安乐，指派23名金刚上师、103名领诵超度经僧人，在前后藏的准巴江寺、藏章寺、朋波山、孔廷寺、玉杰伦孜寺、昌珠寺、拉木堆寺、大昭寺、则尼萨寺、桑耶寺、艾旺觉噶寺以及日喀则、拉萨等地主持轮会供和念诵《白伞盖仪轨经》、《般若经》、《药师佛经》的活动。达赖喇嘛给随清朝使者前来的100多名出家人授了比丘戒。乌克热台吉等向达赖喇嘛献了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

十月初，昂仁堪钦、白居寺堪布、德柱堪布等拜见达赖喇嘛，谈论第巴诺尔布之事。十日，达赖喇嘛给60人授了比丘戒，指示达尔巴译师将他译完的波你尼声明论印制成经函，并由江孜瓦贝丹彭措安排抄写等。当时盛传第巴诺尔布及其支持者从拉萨潜逃到日喀则，可能发起大规模骚乱，气氛突然紧张。十一日早晨，达赖喇嘛和仲麦巴赤列嘉措、仲尼仲巴、代本乌尔巴等人商议，决定向后藏派兵，并派聂雪嘉热到当雄向达延汗兄弟说明缘由。达赖喇嘛给乌克日台吉传授了摧破金刚随许法，乌克日台吉即率兵一百由仲尼仲巴任向导作为前锋开往后藏。达赖喇嘛又命聂塘仲钦和代本乌尔巴为将军，集中前藏兵马准备开拔。不久襄扎西孜巴达珠派人送信来，表示支持达赖喇嘛反对第巴诺尔布，扎什伦布寺强佐洛桑格勒等派人来

报告日喀则方面的情况。清朝使者却典喇嘛等返回时，达赖喇嘛派额尔德尼色多托因曲杰和琼结本塘索南旺布二人同去北京向皇帝呈进奏表和贡礼。当时由于达延汗兄弟对达赖喇嘛和第巴诺尔布的争执并不明确表态，所以双方相持不下，除互相恐吓威胁外，并未大规模动武。十月底，达赖喇嘛同意甘丹赤巴和额尔德尼堪布、达垄强佐前去后藏调解。

十二月七日，达赖喇嘛派洛追却达和努巴喜年贝桑去后藏树立旗幡和风轮，并指示在桑浦、哲蚌、桑耶、曲科杰等寺院举行诵咒修行等法事。

闰十二月，昌都温仲喜哇桑布也想趁第巴索南饶丹去世后达赖喇嘛与第巴诺尔布相持不下的混乱时机谋取权力，争取成为执掌昌都、工布一带的首领，因此以经商的名义到达拉萨探听消息，但因时局不定，未能听到什么。此时又有传言说达延汗准备把澎域和墨竹工卡划归盖喀萨和郭那厦家族，故达赖喇嘛派从青海返回不久的索南旺杰和乌勒吉喀夏喀前去当雄向达延汗兄弟说明理由，反对此事。盖喀萨家族的两位舅父（《安多政教史》说固始汗入藏后娶藏族妃额尔克哈敦，生子达什巴图尔，此二人可能是额尔克哈敦的亲属）到了当雄的桑珠德钦，达赖喇嘛又派扎那曲杰洛桑阿旺等人去交涉此事。因拉萨河流域一带有不少贵族与他们二人关系密切，所以达赖喇嘛又下令各个首领不得与他们联络交谈。

二十五日，达延汗兄弟到拉萨，达赖喇嘛向他们说明两位舅父与第巴诺尔布勾结，曾鼓动不丹军队破坏协议进犯帕里等事，使他们声言放弃对两位舅父的支持。

铁鼠年（公元1660年　顺治十七年）五世达赖喇嘛44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参加向欲界之主献供品的法会，会见

了达延汗兄弟。多吉扎活佛打算连续三年闭关修行，达赖喇嘛按他的请求，给他传授了有关教法。本年由卸任甘丹赤巴官却曲桑主持了正月祈愿大法会。

一月，达赖喇嘛给昌都温仲、乌克日台吉等传授了大威德四灌顶法。给将返回康区的20人授了出家戒或比丘戒，为他们送行。

三月八日，达赖喇嘛以内外密三种供品供奉黑色自在天。召请嘉央曼卓班钦的弟子多巴来担任文书，抄写《上师密集》等书，并帮助整理文稿。因他的梵文藏文书法字体很好，达赖喇嘛让江色巴·嘉央贝桑跟随他学习书法。

由于达赖喇嘛争取到原先犹豫不定的达延汗兄弟的支持，在日喀则的第巴诺尔布的支持者很快失势，达赖喇嘛派遣赞拉等人去接管他们的属地，并给予惩处，以示警告。在达延汗兄弟的劝说下，那些人交出了领地，扎西岗才仁到了达延汗身边，后被送往贡噶，盖喀萨两位舅父避往达垄，由达垄寺做保人而被允许住在该地。止贡寺夏仲准波活佛的转世在娘波出生，此时由该寺堪布、讲经师陪同到拉萨，达赖喇嘛给他授了沙弥戒，起名官却赤列桑布。达延汗兄弟从拉萨去藏北之前，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法。达赖喇嘛派遣热振堪布丹巴达吉前往厄鲁特蒙古传法，委任阿里热绛巴继任热振寺堪布。

四月初，墨尔根济农到哲蚌寺，他手脚不灵的病突然好了，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白色焰口母赎命法、阿弥陀长寿灌顶法和马头明王加持法等。达赖喇嘛在1643年第巴索南饶丹给一些寺院划给寺属土地和民户的基础上，给日布德庆、拉哇堆、日沃却林、帕邦喀、扎西德庆、泽当安雀、桑丹孜、绒巴林等寺院和扎仓以及尼色哇、古隆巴、索南旺杰、卓哩克图温

布等僧俗人士赐给了土地和属民。

从四月开始，按达赖喇嘛的安排，由噶丹桑阿林的比丘洛桑班觉主持，召集鄂尼活佛、瓦卓等工匠，在大昭寺各殿堂建造佛像及松赞干布、拉托托日年赞、文成公主、尼泊尔公主、噶尔东赞、吞米桑布扎等人的像。又将宗喀巴像移入噶丹拉康作为主尊，并塑造贾曹杰、根敦嘉措、索南嘉措、云丹嘉措等人的像。

从五月十六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行四个七天。闭关前达赖喇嘛召集仲麦巴·赤列嘉措、阿里仲巴、达如鼐、鄂尔鼐、桑达鼐五人商议，在闭关期间可以由他们决断的事由他们处理，决定不了的要事由仲麦巴在早晚两座法之间逐一扼要禀报，听取达赖喇嘛的指示。闭关期间将自现观音像迎请到达赖喇嘛寝室中，陈列供品，进行念修。与此同时，拉萨上密院、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僧人也进行诵咒念经的活动。在桑耶、昌珠、雍布拉岗、桑浦、曲沃日、松赞干布陵等处也安排了法事活动。

六月十四日，达赖喇嘛结束闭关，给却克图宰桑等传授了禁食斋戒长净仪轨，给墨尔根济农等传授了斋戒律仪。依照仲麦巴赤列嘉措的建议，达赖喇嘛决定在每年曲科杰的夏季法会上布施斋僧茶 15—30 次。达赖喇嘛给顺利回到印度波罗尼斯城的班智达瓦拉巴扎兄弟寄来的信写了回函。

六月间，达赖洪台吉和墨尔根济农提出，在他们返回青海之前，确定第巴一职的人选。本仓强俄巴、车臣温布、阿里仲巴等提出仲麦巴应担任第巴。当时提出的人选为诺尔布、色布哇和仲麦巴三人中的某一个人。达赖喇嘛等人倾向于仲麦巴，并派人到当雄去请达延汗到拉萨来。达赖喇嘛派仲尼仲巴去敦请仲麦巴，并陈述各方面的利弊，到第三次仲麦巴才同意出

任。

七月十三日，仲麦巴继任第巴的仪式在哲蚌寺甘丹颇章的顶楼上举行，达赖喇嘛在给仲麦巴祝福后，给他赐名为萨迴赤列嘉措，达延汗、墨尔根济农、达赖洪台吉赠送了贺礼，加以礼敬和奖励。以前达延汗继位时，达赖喇嘛赠给他的名号为“丹增多吉杰波”，一些人对“多吉杰波”作为王号有不同看法，因此达赖喇嘛在这次仪式上又将此名号改为“丹增达延杰波”。拉萨各大寺院及地方首领等纷纷前来献礼祝贺，达赖喇嘛为新铸的第巴印章和达延汗与第巴合用的朱印向神像荐新而题写了祈愿文。达赖喇嘛还任命扎桑达瓦·洛桑丹增为代本鄂尔巴的副手。

七月十六日，达赖喇嘛赠给墨尔根济农“额尔德尼毕锡尼图”名号、印章和各种礼品，墨尔根济农即启程回青海。二十日，达赖喇嘛在不动金刚布画坛城内给达赖洪台吉和郭莽扎仓讲经师赤列嘉措等 25 人传授了灌顶。

八月三日，达赖喇嘛为达赖洪台吉返回青海馈赠厚礼。八月六日起的七天中，达赖喇嘛前去沐浴。从十八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七天。八月前二十六日，仲麦巴·桑结嘉措（当时只有 8 岁）来到达赖喇嘛身边，以后桑结嘉措即常住在身前。后二十六日起（当月藏历闰二十六日），达赖喇嘛跟从娘敦曼隆巴洛追却格多吉修习娘派扎玛教法，在几天中请教了邬陀夷、天梯等深奥修法，并给娘敦传授了修行法。

九月，前后藏各地前来祝贺第巴就职和向达赖喇嘛献礼者纷至沓来。达赖喇嘛给许多献礼者传授了教法，给善巴钦波活佛剃度，起名为彭措索南贝桑，给工布磋钦拉尊南喀晋美的转世剃度，起名为阿旺贡桑晋美。九月二十三日，厄鲁特左翼王妃向达赖喇嘛献绸缎 100 匹、银 350 两，工布潘德寺的使者、

达波地区的仲达堪钦图多班觉等献万份礼品。九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返回哲蚌寺，从二十八日起闭关修行。

十月二十六日，达赖喇嘛到大昭寺，由强巴仁钦作助手，用5天时间给大昭寺新造佛像装藏。

十一月四日，达赖喇嘛与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僧人为大昭寺新建佛像及神像等举行依止吉祥金刚童子布画坛城的金刚橛开光仪式。接连几天，达赖喇嘛向大昭寺各个殿堂和觉卧像、弥勒法轮像、护贝龙王像献了题有祈愿辞的哈达。十一月八日，达赖喇嘛到布达拉宫，给喇嘛东嘎哇的转世剃度，起名为仓央周扎。此时达赖喇嘛因事繁心燥，脚部又有不适，经医生阿旺拉色治疗调养，二十二日逐渐康复。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从当雄前来的达延汗、恰巴本萨、喀尔喀右翼杰康孜活佛的使者等，给恰巴本萨、宰桑固始等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六臂观音随许法。这一时期，康区从噶玛噶举派改宗格鲁派的扎日林温布以阿谀奉承的办法得到管理康区的固始汗的孙子罕都的信用，而扎日林温布又与敌视格鲁派的定塘囊索相勾结，用计谋使罕都处死了手下一些真心信奉格鲁派的人，这些情况传到拉萨，使达赖喇嘛深为焦虑。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六日，达赖喇嘛又闭关修行，向曼康巴请教那若空行母加持法等深密教法，并修行忿怒金刚等法。十七日闭关结束后，达赖喇嘛向达延汗传授了六臂观音四灌顶加持法，收到喀尔喀左翼嘉央活佛、夏尔康诺门罕、诺门额津等人派使者来敬献的金银绸缎等礼品，还为达延汗新铸的金印向佛像献印新撰写了题词。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因洗了从山谷温泉取来的水，达赖喇嘛右脚化脓，流黄水，随即肿胀，行走困难，只能静卧休息。

铁牛年（公元1661年 顺治十八年）五世达赖喇嘛45岁

因为脚病，达赖喇嘛没有参加本年的新年酬补仪轨和排座宴会。新年前由第巴赤列嘉措护理，过年期间第巴事务繁忙，由却本洛桑图多看护，到一月十三日达赖喇嘛基本康复。达赖喇嘛增派郭莽扎仓讲经师赤列嘉措为索南旺杰的助手，办理有关青海方面和华热地区的各种有关事务。清朝派遣的使者黄寺喇嘛玛尔宁热绛巴和当加喇嘛等抵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赏赐物品，并献了他们自己奉献的珍贵的汉地物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文殊、度母随许法等。杜尔伯特的客人向达赖喇嘛献了金银、绸缎、茶叶等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杜尔伯特王妃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度母随许法，给60人授了比丘戒，给50人授了沙弥戒，剃度52人出家。

一月十六日，达赖喇嘛验看前年开始建造的18尊金佛像和90尊响铜佛像，并会见达延汗、岗坚堪布等僧俗人士。

按达赖喇嘛的指示，由仲色哇·白玛热丹设计、琼结热绛巴贡噶丹增负责监工，从二月一日起建立作坊，用黄金1940钱、绿松石140块、珍珠527粒以及银币等，为大昭寺的觉卧像打造新头饰，至本年七月完工。达赖喇嘛写了祈愿偈颂，刻在头饰上。此后规定在夏季洪水时期用宗喀巴所献的旧头饰，冬春季则用这件新头饰，二者的材料和式样都很相近。二月八日，任命江仲鼐、色欠鼐二人为后藏措钦代本。十六日，却本和翁则二人设午宴款待达赖喇嘛，并献礼品，在哲蚌、色拉、多吉扎、琼结等寺院举行了酬补法事，并给各主要寺院布施斋僧茶。

四月初，达赖喇嘛给达延汗、两位王妃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禁食斋戒仪轨、祈愿等教法，又因拉萨公众的请求，撰写了祈愿自己和第巴长寿的偈颂。四日，第巴彭多哇·丹松穿上袈裟，请达赖喇嘛赐名，达赖喇嘛为之起名为洛桑才旺，达赖

喇嘛讥讽说，“藏地半数人将穿黄衣”的预言就要实现，像这样未受过戒的出家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六日，达赖喇嘛给噶玛噶举的曲杰止穹活佛剃度，为之起名洛桑却吉旺布。从四月七日到六月底，达赖喇嘛除会见少数客人外，跟从娘敦洛追却格多吉学习上下伏藏经文传承及修行仪轨等。

五月一日，达赖喇嘛为清朝的使者送行，给他们传授了观音、文殊的随许法等，并派色拉寺哈尔东热绛巴和达波温穷和使者同行，到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贡品。达赖喇嘛还给额尔克王的上师班觉嘉措和去鄂尔多斯的扎德热绛巴传授了二世达赖喇嘛文集中的本尊修行和随许法等。察罕达尔罕曲杰给达赖喇嘛寄来抄写《甘珠尔》的蓝纸等，达赖喇嘛给他写了回信。

六月十四日至闰六月五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自现观世音殿向曼隆巴·洛却多吉请教经部灌顶、八秘法等早期伏藏的教法。六月中，由于发动乱事的盖喀萨家族两舅父等反对势力的败局已定，达赖喇嘛举行以大威德为主的诸本尊护法的酬补仪轨，向护法献供，向本尊献了祈愿给予成就事业之权的敬祝哈达。

六月底，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征得达赖喇嘛的同意，给一些寺院、活佛、僧人、贵族赏赐土地和属民，或赐给整个的豁卡（庄园)。其中包括：赐给扎什伦布寺坚赞吞布拉章以琼结孜扎沃豁卡，计27户，岁入2200克粮食。赐给岗坚曲培寺以玉贝玛尔豁卡作为五供节法事的基金，计17户，岁入1400克。将达那扎西定豁卡赐给隆子寺，计50户，岁入3550克。将达那沃伦和夏巴豁卡赐给曲杰卓玛普巴，计25户，岁入2300克。将戎库隆巴的16户、岁入1150克赐给浪卡子夏仲色农巴。将孔查和宁布豁卡的8户，岁入550克赐给曲杰曲弥巴。将澎波才如瓦的8户，岁入230克赐给甘丹寺娘绒扎仓。

赐给乃宁夏仲8户，岁入600克，作为甘丹寺宗喀巴灵塔的供礼基金。将江孜塘白瓦的谿卡赐给洛巴才旺多杰，计23户，岁入1100克。第巴仲麦巴虽未表示要求赐给土地，达赖喇嘛还是决定把巴仲和直隆谿卡赐给他，计50户，岁入2500克。

乃宁夏仲古章巴圆寂后，其家族首领乃宁雪拉哇以游方僧洛桑丹增为师受比丘戒，成为集家族首领和寺院法台于一身的人，一些人认为他的受戒仪式不够隆重，所以又请达赖喇嘛任堪布为他授了比丘戒。

七月，因廓尔喀人进犯浪布城，达赖喇嘛派雄·扎西孜鼐、江仲鼐和麦恰鼐三人率后藏军兵前去抵御。

七月十三日，按达赖喇嘛的指示，由仲色哇设计，建立作坊，以黄金300钱、银600两建造须弥山坛城。十五日，达赖喇嘛派札布鼐洛桑勒丹去青海办理几件事情。二十三日，给喀尔喀昆都仑都尔格齐等传授长寿灌顶法及随许法等。八月二日，宗堆南色林巴率涅地区的僧俗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黄金百钱等，缔结寿缘，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灌顶法，给50人授了比丘戒，剃度130人出家。十一日，精奇寺堪布桑杰贝桑前来为达赖喇嘛祝寿。十三日，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吉索为他设宴。次日，僧众向达赖喇嘛献礼，并祝赞吉祥，察雅活佛献了茶叶等礼品。十八日起的半个月内，达赖喇嘛给精奇寺堪布尼色顷则等传授秘籍及耳传教法等。华热地区的客人来献马100匹，达赖喇嘛给96人授比丘戒，给60人授沙弥戒。

九月一日，达赖喇嘛会见了喀尔喀部王族的达尔玛格底和达尔玛噶雅等500人，他们献了绸缎、金银、茶叶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给20多人授了比丘戒，给达尔玛噶雅和活佛洛桑赤列等30人授了沙弥戒，喀尔喀客人十三日去后藏。月底，达延汗从藏北来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

十月九日，喀尔喀部杰康孜活佛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黄金绸缎等，达赖喇嘛给以他为首的学经僧人讲授了自己的论著等。从青海送来了车臣洪台吉去世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车臣洪台吉作了诵经、祈愿等超度法事。达赖喇嘛分派12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般若八千颂》、《宝积经》、《贤劫经》、《金光明经》的活动，命色拉、哲蚌寺念诵《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咒》半个月。决定由达赖洪台吉主持青海划分地界事宜，由郭莽扎仓堪布和索南旺杰二人协助。从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三日，达赖喇嘛闭关修行。昌都温仲喜瓦桑布和南色二人发动战乱，第穆活佛前来禀报，达赖喇嘛派琼结热绛巴贡噶丹增和冈仓鼐二人前去制止。四世班禅罢免了夏鲁寺堪布，经第巴允准，任命日布翁则为堪布。夏鲁堪布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向他请教金刚界灌顶法和道果教法，并赐给他堪布委任书。十一月十四日，达赖喇嘛赐给哉务曲杰“大司徒都元师”的名号和印章，并赠礼送行。喀尔喀客人从后藏返回，达赖喇嘛给达尔玛噶雅授了比丘戒，给活佛洛桑赤列传授慈氏五论。类乌齐第巴仁钦坚赞前来申诉类乌齐和昌都之间的领地纠纷，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随许法。拉达克人派遣一个名叫其古的大臣前来，给达延汗和第巴送来言辞粗鲁的信，为不丹人助威。

本年正月顺治帝逝世，康熙帝继位。

水虎年（公元1662年　康熙元年）五世达赖喇嘛46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供奉三界之主，举行新年宴会。

一月八日，达赖喇嘛给100多人授了比丘戒，剃度60人出家。十六日，达赖喇嘛给杰康则活佛传授马头明王修行法，并设宴款待他，还会见了主持本年祈愿大法会的甘丹赤巴泽当巴·洛桑坚赞，给他传授了菩提道次第。二十二日，达赖喇嘛

在布画坛城内给类乌齐第巴、郭莽扎仓和德阳扎仓的轨范师等传授了十三尊大威德灌顶法。

二月七日，达赖喇嘛到色拉寺，吉索和杰麦两扎仓设宴款待。达赖喇嘛在马头明王殿的佛像前接受了四灌顶，并在大法会上向全寺僧众传授《佛名号经》、《普贤行愿品》等经教。九日，达赖喇嘛从色拉寺到帕邦喀，为新造密宗事部三怙主像撒花祝赞。在仲麦用饭后返回布达拉宫。二月十二日，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圆寂，达赖喇嘛闻讯后即派拉康顷则和切松鼐二人去扎什伦布，在班禅遗体前敬献写了祈愿偈语的哈达，并参加遗体火化和超度法事，向扎什伦布寺僧人发放布施。达赖喇嘛还撰写了祈愿班禅大师的转世迅速降生的偈语，供于色拉和哲蚌寺大经堂中。二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启程去桑耶寺，参加桑耶寺修缮工程完工及开光仪式。达延汗和第巴送行到达拉后，于三月一日返回拉萨。

三月二日，达赖喇嘛从彭措林到桑耶时，萨迥多吉南杰、阿里扎仓讲经师、噶布夏仲、巴日活佛等率马队来迎。途中因该地原为扎什伦布寺属地，在四世班禅治丧期间不便盛陈仪仗，但是到达桑耶石塔后，即按桑耶护法所说要使人们想起赤松德赞时代的话，在队伍前面竖起经幡、宝幢、伞盖，器乐齐奏，陈列仪仗。中午，桑耶寺在大经堂设午宴款待，下午达赖喇嘛巡礼了桑耶各经堂和佛殿，向三界乌孜大殿献了银曼扎、伞盖、绸缎等，向本尊神像献了哈达。三日上午，达赖喇嘛恭请桑耶大护法到白哈尔阁，献哈达、神饮、瓷器、甲胄、宝剑、箭袋、马鞍等，大护法药叉为达赖喇嘛做了护佑，将神魂石放在达赖喇嘛头顶，并洒了有咒药的甘露，并给达赖喇嘛讲说了关于未来的预言。四日，达赖喇嘛给阿里扎仓的僧众传授了上师瑜伽。七日和八日，达赖喇嘛与随行的南杰盘德勒雪林

扎仓的僧人一起，依止金刚橛布画坛城，为修缮一新的桑耶寺殿堂和佛像开光。达赖喇嘛还给第巴拉嘉里的幼子剃度。九日，达赖喇嘛噶恰塘的帐幕中给参加开光的僧俗人士传授了加持法。十日，达赖喇嘛在鲁顶给僧俗首领赐茶、加持和赠礼。十一日，在黑波山举行煨桑祭神。十二日，桑耶寺设宴为达赖喇嘛饯行。次日达赖喇嘛离桑耶寺启程，十五日到桑浦，受到达延汗、第巴和拉瓦堆扎仓僧众的迎接。十六日往于乃邬林卡，十七日返回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应扎什伦布寺公众的请求，撰写了祈愿四世班禅迅速转世的偈颂，又因达赖洪台吉的请求，寄去给青海湖地区诸神、龙的焚香祭祀文。

四月十一日，达赖喇嘛到哲蚌寺，为去年拆除森康贡寝殿后新建的殿堂和弥勒殿开光。任命翁则阿旺扎西为监工，由活佛霍尔达尔等人负责建造密宗佛像，达赖喇嘛对塑像材料、工具、工匠等进行了加持。十四日，达赖喇嘛返回布达拉宫，给萨迥托果南杰传授了比丘戒，给他的夫人本萨霍尔摩削发剃度，为二月份新刻成的《四部医典》写了长短书跋。十六日至五月八日，达赖喇嘛闭关修行。

六月十七日，都日雅勒的两位夫人到达拉萨，为都日雅勒去世向各寺院布施，并向达赖喇嘛献礼，达赖喇嘛为都日雅勒做了超荐，给两位夫人授了出家戒，并指示各寺院为都日雅勒举行诵经活动。当时潘德活佛兄弟纠合工布和康区的部分首领，与拉萨对抗，一些人认为格鲁派内部不宜互相征讨，第巴请达赖喇嘛定夺，达赖喇嘛打卦卜算后，认为应当发兵。

七月一日，第巴到色钦塘与达延汗商议出兵之事，并向玛本和如本发布了指示。

八月一日，清朝的使者桑洛墨尔根曲杰和额尔克噶居等抵达拉萨，这是康熙帝即位后首批派来的使臣，他们向达赖喇嘛

递交了康熙帝的圣旨和礼品，墨尔根曲杰、叶尔巴曲杰、夏琼曲杰等献了绸缎等百份礼品，察罕喇嘛和呼和浩特塔颜齐派来的人也献了大批礼品。为超荐顺治皇帝，夏琼曲杰还向僧人们布施了大批新出库的被称为“南京哈达”的特殊哈达。随清朝使者前来的巴什善齐、波昆、班德、摩格图、噶玛什、色颜、乌勒吉、波如等人是朝廷派来西藏学习藏语、正字法及翻译的人，达赖喇嘛安排他们的薪俸和生活用品由江孜供给，并因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精通蒙古文和藏文，故命额尔德尼担任他们的老师，后来他们想学藏文修辞学，达赖喇嘛又安排昂仁堪钦的弟子仲孜哇洛桑诺尔布给他们讲授。

八月十七日，浪卡子送来达赖喇嘛的乳母措曼去世的回向礼，达赖喇嘛在观音像前为她做了引导六道轮迴的法事。

八月二十二日，咱雅班智达（阿巴车臣夏仲）在进藏途中在柴达木盆地圆寂。九月三日其强佐哲摩南喀仁钦等到达拉萨，迎请达赖喇嘛到曲果麦林卡，向达赖喇嘛献白银 7000 两、缎子 200 匹、茶叶、地毯、马匹、骆驼等汉地、蒙古、中亚的物品上万件，达赖喇嘛为咱雅班智达做了超荐法事。六日，达赖喇嘛给 130 人授了比丘戒，给 91 人授了沙弥戒。德钦鼐夏仲曲杰玛钦洛桑却嘉旺秋和本萨霍尔摩等人到布达拉宫小住半月，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灌顶法等，给本萨霍尔摩授了沙弥戒，她向达赖喇嘛献了顶髻绿松石和琥珀等。在安排向工布出兵的同时达赖喇嘛下令在 13 个宗谿念诵《甘珠尔》、《般若》、《宝积》、《金光明》、《佛名号经》等，并举行供祀白伞盖佛母等法事。十二日，下密院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在法会上传授了上师瑜伽，喀尔喀部嘉央活佛的使者坚叶拉哲巴等到达拉萨，达赖喇嘛在叶巴扎仓给他们传授了随许法。车臣曲杰嘉哇赤列的经师额尔德尼固始和诺云温布等到拉萨，向达赖喇嘛献

白银 1000 两，达赖喇嘛给 96 人授比丘戒，给 84 授了沙弥戒。

喀尔喀右翼毕喜伊勒图王在东科尔活佛的寺院中暴卒，诺门额津与墨尔根贡杰在途中相遇，一起到拉萨，于九月二十一日为毕喜伊勒图王念经积善。达赖喇嘛给 92 人授比丘戒，给 49 人授沙弥戒。

十月三日，桑洛墨尔根曲杰任施主，在南杰扎仓举行阿弥陀佛长寿仪轨。六日，达赖喇嘛会见从青海来的达赖洪台吉，给 111 人授了比丘戒，给 140 人授了沙弥戒。八日，达赖喇嘛给墨尔根曲杰传授了加持法和随许法。九日，又给所有从汉地来的僧俗客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车臣洪台吉之子多尔济为其父去世来拉萨，向达赖喇嘛献银 1000 两，达赖喇嘛做了超荐法事。鲁本墨尔根曲杰向达赖喇嘛献绸缎 100 匹、茶 100 包，王妃也献了绸缎、茶叶、银两等。

十一月二日，由额尔德尼固始任施主，在南杰扎仓举行长寿仪轨。因达延汗在征讨工布的军中坐阵指挥，所以清朝的副使额尔克噶居去工布传达皇帝的圣旨。达赖喇嘛对昌都和类乌齐的争执发出指示，使罕都与类乌齐首领和解，恢复了昌都地区的安宁。二十二日，为奖励达赖洪台吉在划分华热地区部落地界中的功绩，达赖喇嘛赠给他衣物、红白水晶石和氆氇等，并在他的名字多尔济之后加上“墨尔根洪台吉”的名号。

十二月三日，清朝的使者离拉萨返京，达赖喇嘛派桑拉巴坚纳和嘉才仁随行，向皇帝进呈奏表和贡品，此次在例行的奏表和礼品外，还带了专门祝贺康熙皇帝即位的贺表和红白念珠、青金石念珠、玄狐皮大氅、氆氇等贺礼。

二十二日，厄鲁特鄂齐尔图台吉的使者到达拉萨，阿里日土的土王彭措南杰写信来索要夏鲁译师校勘的梵藏对照本《经部密意集》、《慈氏四论》、《医术集要宝鬘》等，达赖喇嘛给他

写了回信。

水兔年（公元1663年 康熙二年）五世达赖喇嘛47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依照惯例供奉欲界之主，举行新年宴会。

一月四日，达赖喇嘛给桑耶大护法传授了成熟解脱灌顶法。五日，达赖喇嘛给以额尔克和曼吉为首的蒙古人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给鲁本墨尔根曲杰、丹达尔活佛、阿里沃却活佛等传授了《般若八千颂》等，会见了前去参加正月祈愿大法会的甘丹赤巴。十一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洪台吉、罕都的母亲、阿噶格楚等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等。墨尔根曲杰希望得到新印的《甘珠尔》，达赖喇嘛给他捎去一套墨印本。

二月一日开始，达赖喇嘛向察仓巴洛追却格多吉听授经部《宝积经》、《五部传记》（译师法师记、后妃记、国王记、大王臣、鬼神记）。达赖喇嘛指示对前后藏的所有寺院进行调查，按僧人、学经、法事等情况分为三类。调查的结果是：第一类以格鲁派寺院为主，大部清净的计有750座，僧人近5万；第二类为好坏混杂的寺院，计有500座，僧人3万；第三类为赞康、尼姑寺、僧尼男女修行者混住的寺庙650座，有僧人2万人。合计寺庙1800多座，僧人近10万。根据调查统计的情况，对第一、二类寺庙僧人，每年冬春两季随同斋僧茶饭一起发放数量不等的布施，对第三类寺庙的僧尼等每隔两年发放一次布施。第一、二类寺院中又有300座寺庙是视其僧人增减情况每年在秋季随斋僧茶饭布施一次。十日，第巴仲麦巴离拉萨去迎接从工布战场归来的达延汗。二十二日，达延汗和第巴一起回到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月底，达垄夏仲阿旺南杰勒珠到拉萨，达赖喇嘛设宴款待，达垄夏仲痛切诉说昌都僧俗

部众互相冲突的情形，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六臂观音加持法。

三月一日，达赖喇嘛给郭仓喇嘛达日杰察巴等苦行僧40人传法，给42人授了比丘戒，给92人授了沙弥戒。并为达垄夏仲送行，给达延汗兄弟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度母随许法。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六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闭关静修。

为纪念咱雅班智达，哲蚌寺建造了一尊弥勒佛银质像，供奉在郭莽扎仓，由香巴阿然巴等装藏开光，应郭莽扎仓卸任堪布噶如哇的请求，四月十一日达赖喇嘛撰写了赞颂祈愿文，祈愿此佛像久住世间。十四日，达赖喇嘛返回布达拉宫。十五日给善巴活佛等人授了沙弥戒，会见了色多、塔尔巴、隆子等寺院的堪布。十六日，代本鄂尔巴从工布送来一尊铜佛像，作为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的依止像，桑浦寺两位曲杰给达赖喇嘛送来大批物品，供建造坛城之用。四月下旬，达赖喇嘛给达延汗兄弟、温萨活佛传授了教法，并寄去吉雪曲杰阿旺丹增赤列从蒙古来信请求的教言和祈愿文。

五月一日，卸任甘丹赤巴、夏孜曲杰、上下密院、安雀寺、扎什伦布寺各扎仓的讲经师等向达赖喇嘛献礼，并举行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二日，达赖喇嘛给扎什伦布寺的客人们传授长寿灌顶法和六臂观音加持法。五日，以卸任郭莽扎仓堪布噶如哇为首的咱雅班智达的僧徒们为施主、为达赖喇嘛举行盛大祈寿法事，献给达赖喇嘛一幅长5庹半、宽2肘8指的缎绣佛像。上绣12尊佛，佩有珍珠、珊瑚、玉石装饰的金冠、颈饰、耳饰等，还有一幅与此大小相同的缎绣国政七宝。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观音、文殊的随许法及斋戒长净仪轨等。达赖喇嘛还为使用檀香木新印题写荐新偈颂，任命热绛巴努珠嘉措为哲蚌寺德阳扎仓的堪布，努珠嘉措声明只能

任此职6个月。达赖喇嘛以青海是汉、藏、蒙古三族聚居之地，就近管理十分紧要，给达赖洪台吉赠送厚礼，请其返回青海，达赖洪台吉遂于二十三日离开拉萨，前往青海。达赖喇嘛因1661年廓尔喀人围攻济咙时伦珠冈钦巴坚守有功，将克叶松雪豁卡计7户，岁入300克粮食赐给他，又将沃雄曲郭豁卡60户人家岁入1500克赐给潘德寺的格鲁派僧人，将10户岁入1100克的土地赐给达波旺仁寺。

六月七日，达垄夏仲到拉萨拜见达赖喇嘛，商议修缮类乌齐寺院之事，达赖喇嘛给他传授教法后，于十二日为他赠礼送行。十三日达赖喇嘛给温萨活佛等13人授了比丘戒。

八月六日起，达赖喇嘛前往沐浴3天。由让松钦波强俄囊索为达赖喇嘛的脚疾诊治，断定为脚气病，即普通所说黄水病，服药和外敷药膏10天后，达赖喇嘛可以行走，由却本和翁则二人负责护理。达赖喇嘛与第巴商议后，任命彭措热丹为扎什伦布寺的强佐。

九月五日和六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乃东夏仲、达延汗之子多尔济、诺尔布嘉措、岗波活佛、达扎济咙活佛、罕都洛桑丹穷等。达赖喇嘛准备去德卓温泉，但突然神志昏迷，左脚开始疼痛发炎，右脚的脚气病也复发，影响全身血液流通，身体非常不适。二十九日，达赖喇嘛派格顶巴为首的贡噶地方的僧人在布达拉宫大殿举行大规模的白伞盖佛母供祭法事。

十月一日，由衮尼扎仓巴代表达赖喇嘛举行酬补法事。又下令在11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八千颂》、《贤劫经》、《佛名号经》的活动，在拉萨、桑耶、昌珠等寺陈列百供，并放生100只牛羊、10万尾鱼，以为达赖喇嘛祈福。又在哲蚌、琼结的寺院中举行降魔法事。

从十一月起，达赖喇嘛的脚气病和关节疼痛逐渐平复。

十一月二十七日，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的灵塔建成，达赖喇嘛派东卡鼐到日喀则去，敬献了伞盖、百供、缎子等。

十二月三日，达赖喇嘛给达扎济咙活佛等74人授了沙弥戒，给达扎济咙活佛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及各种随许法等，并在达扎济咙活佛去康区之前赠送厚礼送行。达如鼐去琼结任职时，达赖喇嘛指示他在琼结建立各寺轮流诵经的制度，他规定每年从一月到十二月由堆色达吉林、日沃德庆、巴日、扎西德庆、扎西孜曲德、日沃曲林、查米僧团、泽当安雀、哲布林、拉仁阿里扎仓、扎日沃南杰等寺院轮流集中108名僧人诵经做法事，每年诵经的茶饭、用品及布施等费用折合粮食为27300多克。厄鲁特部的喜饶僧格向达赖喇嘛献各种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给他的大小王妃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55人授了比丘戒，给62人授了沙弥戒。十二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派却本等人去曲科杰寺向弥勒大佛像献百供，并在各护法神殿献食子、敬神哈达。十二月二十四日，罕都向达赖喇嘛献金银、茶叶、皮张等万份礼品。

木龙年（公元1664年　康熙三年）五世达赖喇嘛48岁

二月一日，达赖喇嘛和热振寺堪布、强林堪布举行诵经法事活动。二日，达赖喇嘛为罕都举行祝福长寿的法事，达延汗也来参加。三日开始，达赖喇嘛向恰达查仓哇请教《般若十万颂》等。二十八日起达赖喇嘛的脚病又有加重，而且右臂肘部肿胀，由本仓强俄鼐服侍治疗。

三月一日，曼隆巴为达赖喇嘛举行驱魔和赎命的经忏法事。八日又向刹土神献供。到三月中达赖喇嘛的手脚肿胀消退，到三月底四月初基本痊愈。三月十七日起，达赖喇嘛研读佛本生经《如意宝树》，认为雄敦译师在八思巴的资助下所译

的这部经典有一些不完全之处，达赖喇嘛和达尔巴译师一起重新进行了编纂和翻译，并希望将来找到梵文全本再以校勘的方式加以注释。到闰三月四日，将重译《如意宝树》及跋送往噶丹彭措林寺刻版。以钦差却典喇嘛和格隆桑珠曲培为首的清朝使者到达拉萨。

闰三月十三日，钦差会见达赖喇嘛时，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赏赐物品，还有300面出自元朝内库的大缎所制的珍奇的军旗，达赖喇嘛认为这些军旗献给护法神，倒非常有用。却典喇嘛、格隆桑珠曲培和色布腾王所派的喇嘛向达赖喇嘛献银1000两、大量缎子等物品。从十四日开始，按宗堆的安排，贡噶地区僧俗部众和寺院举行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活动，并派人向达赖喇嘛敬献素缎和氆氇等礼品。

十五日，达赖洪台吉和额尔德尼的使者从青海前来，为衮布才旺去世，其部众来拉萨供奉三宝并向僧众布施，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察瓦活佛和热振堪布丹巴达吉的使者从厄鲁特部前来，向达赖喇嘛献各种礼品。达赖喇嘛给119人授比丘戒，给250人授沙弥戒，剃度13人出家。二十日，却典喇嘛向达赖喇嘛献大缎蒙古包、器物等，供达赖喇嘛沐浴时使用。又献黄金100两、白银350两、缎子9匹作为给布达拉宫的五尊大悲观音像建造金顶的基金。

四月四日，因逢大旱，哲蚌寺经师和200名僧人到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献礼后，迎请观世音像举行献浴活动，念诵经咒，又向大昭寺殿堂和佛像献浴，下午果然降了雨。六日，达赖喇嘛给达延汗传授长寿灌顶法，并给将返回蒙古的众人传授加持法。八日，按夏鲁巴钦波的指示，达赖喇嘛下令绘制白度母如意轮唐喀画像，此后每月八日，达赖喇嘛都令豁卡夏巴建造这种唐喀。从十九日起达赖喇嘛研习戒律经论，给皇帝派来

西藏求学的善齐巴什等撰写了启迪智慧的讽诵文，因为代本色钦巴等人的请求，撰写了祈愿自己长生的祈愿文，因密院讲经师之请写了祈愿第巴长寿的祈愿文。

五月十七日，达赖喇嘛给噶珠瓦钦布的侄子索南旺格杰布授比丘戒，给沙弥尼坎卓传授长寿灌顶，并因沙弥尼坎卓献了伏藏典籍《除毒灌顶金刚石》，赐给她黄金100钱。鄂齐尔图台吉之子噶勒达玛的夫人去世，给达赖喇嘛送来以白银1000两为主的回向礼。

六月六日，达赖喇嘛用3天时间为1658年建造的释迦牟尼、无量寿佛、宗喀巴的黄金像装藏。从六月上半月开始，以日摩瓦曼塘鼐和达垄巴衮为大工头，带领14名工头和86名工匠用三个半月修缮了拉萨八廓转经路，工程负责人为第巴达尔宣和郭贝热绛巴却扎嘉措。修缮中在巴廓北面绘制了《华严经》中的清凉世界，东面绘制了《大般若经》中的缘起图，弥勒十功业、极乐世界，南面绘神变图。又由拉康顷则和定钦巴监工，由布第才色巴、南杰才让扎西等制成大小金鼓60面、定鼓16面，又由洛桑才仁主持，由活佛霍尔达、巴卓等绘制大昭寺正门的四大天王像。第巴还趁兴建这一工程之便，在娘真曲桑新建一座寺庙。达赖喇嘛应巴塘宗堆达尔罕噶居和罕都的请求，新写了理塘图丹绛钦林寺和巴塘噶丹盘德林寺、热吉林的寺规，赐给罕都朱印。六月十日，由清朝的钦差任施主，南杰扎仓举行曼荼罗会供，向僧人发放布施，达赖喇嘛应钦差的请求，题写了偈颂。达赖喇嘛给洛扎的尼德巴第活佛洛桑阿旺却扎旺布授了沙弥戒，给他传授了《普贤行愿品》、《三聚经》等教法。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了帕巴拉活佛，收到印度婆罗尼斯的信和礼品，信中表示愿调解不丹和西藏的纠纷。十二日，达赖喇嘛给帕巴拉活佛授了比丘戒。

七月四日，达赖喇嘛在布画坛城内给帕巴拉活佛、罕都、洛巴热绛巴传授了十三尊大威德灌顶法。五日，达赖喇嘛给罕都等传授念修、随许等教法，并为他们返回康区赠礼送行。六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们传授了长寿灌顶和密集类教法。九日，达赖喇嘛为清朝使者设宴送行，并派额尔德尼固始的外甥噶居洛桑扎西和车臣达尔吉去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贡品，以及对赏赐军旗一事的谢礼。委派泽当勒钦巴去担任察哈尔王的上师。十日，达赖喇嘛给桑洛车臣曲杰传授了密宗事部三怙主随许法，收到浪卡子为索南布赤夫人逝世送来的回向礼品一串上等念珠，并写了回信。

八月二日，由帕巴拉活佛任施主，南杰扎仓举行阿弥陀佛长寿仪轨，为达赖喇嘛祈寿，并向僧众布施。收到噶农活佛夏多诺尔布圆寂的回向礼，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并写了祈愿活佛迅速转世的祈愿文。三日至十七日达赖喇嘛闭关修行。二十日，罕都又到拉萨，达赖喇嘛为他接风并做祈寿法事。二十三日罕都为达赖喇嘛的传法献黄金 50 钱、白银 50 两、绸缎、茶叶等大量礼品，然后去后藏。

九月四日，达赖喇嘛派锵清巴阿旺钦则和旺增诺尔布去桑耶青浦献礼品和法器，会见了从康区前来的第穆活佛。第穆活佛向达赖喇嘛献茶叶 500 包、骡子 100 头、马 30 匹。六日，青海阿力克部落僧俗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马 200 匹。为青海蒙古首领曲什吉和衮布才旺去世，却克图宰桑和墨尔根巴什来拉萨献回向礼，达赖喇嘛为他们二人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还会见了热穷浦活佛、德钦曲杰洛桑曲嘉旺秋和达孜台吉多吉南杰等，接受了乃邬地区百姓的献礼。

八日，锵青巴阿旺钦则到达桑耶青浦，按护法的预言，将一副代替达赖喇嘛的面具安放在秘穴扎玛格乌仓，表示达赖喇

嘛在此静修，以此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一日，第巴恰巴夫妇来拉萨向达赖喇嘛献礼，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另给370人授了比丘戒，给260人授了沙弥戒。达赖喇嘛给帕巴拉活佛讲授了宗喀巴文集中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上师瑜伽等经教和度母、观音随许法等。并为帕巴拉活佛赠礼送行。擦绒格隆携带登记册来拉萨，请达赖喇嘛为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的灵塔撰写建造志。

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从当雄前来的达延汗等。

十月三日，从止贡温泉取来泉水供达赖喇嘛洗浴，因多次出现彗星，安排17个宗豁举行诵经活动。又由第穆活佛任施主，南杰扎仓举行法会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三日，达赖喇嘛给甲桑活佛和多吉扎活佛传授甘露宝瓶灌顶传承，及观世音教法等。达赖喇嘛还给仲麦巴·桑结嘉措（当时12岁）传授了甘露宝瓶灌顶，给第穆活佛传授了噶当十六明点、金刚教法等。达赖喇嘛和第穆活佛还商谈了保证康区安宁的办法。

十一月六日，白居寺送来堪布喜饶云丹圆寂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达孜台吉转告桑耶护法要达赖喇嘛迎请波密的宁玛派伏藏师顿都多吉的指示，达赖喇嘛、第巴和达孜台吉三次去函邀请，顿都多吉都借故推托不肯前来，故达赖喇嘛命人将顿都多吉的信送去给桑耶大护法过目。

从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下旬，达赖喇嘛闭关修行。德钦曲杰洛桑却嘉旺秋圆寂，达赖喇嘛派锵清巴洛桑钦则等送去供做超度法事的金银和绸缎等。

木蛇年（公元1665年　康熙四年）五世达赖喇嘛49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照例举行酬补法事及新年宴会等。由贡噶尼色巴·嘉央丹增担任抄录，达赖喇嘛对自己的听法笔记

进行了整理，编写了受法录的次序和章节。达赖喇嘛收到巴塘达尔罕噶居的礼品，命南杰扎仓僧人为他念诵了长生偈语。本年为藏区的安乐，达赖喇嘛指示除按例规安排各地诵经外，还要增加由沙弥、咒师和苯教僧修习忿怒游戏金刚和药师佛的活动，并在前藏、达布、工布各寺院布施斋僧茶。达赖喇嘛为后藏各寺院登记册写序，吞·勒丹旺波请求达赖喇嘛撰写雅莽多杰三兄弟和觉卧聂巴僧格栋的祈祷文并加进他属于吞米后裔的内容，达赖喇嘛没有找到他与第巴雅郊巴同宗的根据，不过仍把他写成与第悉藏巴同属于涅氏家族。

二月二日，拉萨发生地震，达赖喇嘛认为这次地震是吉兆，第巴仲麦巴命郭莽扎仓讲经师赤列嘉措去担任鄂齐尔图台吉的上师，他向第巴陈明因身体有病不能前往，但第巴不准，所以只好辞去郭莽扎仓的职务前往厄鲁特，达赖喇嘛命德阳扎仓讲经师阿旺洛追嘉措继任郭莽扎仓讲经师，任命却巴热绛巴阿旺丹增为德阳扎仓讲经师。

达赖喇嘛下令，将喀如的年收入100克粮食的出租地赐给二世达赖喇嘛家族的达那多吉丹寺，将嘉美豁卡和加摩拉扎豁卡共计15户岁入1250克的土地赐给达尔罕噶居，将4户人家岁入150克的零散地赐给木匠扎萨哇，并给其他一些人封授了属民土地。

三月一日，达摩哇洛扎却扎请求在达赖喇嘛面前考试《医学四续》，达赖喇嘛测验了他对本续文义的了解，并考了其他续的内容，他通过了考试。三月十五日起，达赖喇嘛向查仓巴钦波学习《十万续》的经文传承。

四月十日和十一日，大昭寺和小昭寺400多名僧人向达赖喇嘛献礼。达赖喇嘛因担任内室传达的侍从琼结果巴哇彭措旺布努力学习藏、梵文字和算学，所以任命他为自己的助手。达

赖喇嘛给37人授了比丘戒，给56人授了沙弥戒，会见了冈坚曲培寺的堪布。

五月九日，由羊卓第巴日沃扎巴·贡噶才旦多布加捐赠财物任施主，南杰扎仓僧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仪轨，当时发生轻度地震。达赖喇嘛收到回向礼后，为墨尔根济农的去世做了超荐法事，因杰林堪布楚臣坚赞的请求写了供琼结地方僧俗念诵的祈愿文。十日，拉萨公众向达赖喇嘛献礼，祈愿他长寿，策居巴和墨如哇分别表演了跳神。察雅活佛返回康区前，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白伞盖、六臂观音随许法，诵传了道次第教诫。

六月，阿巴赖的夫人色罕菊向达赖喇嘛献礼，达延汗和鄂齐尔图台吉写造甘珠尔经，达赖喇嘛因囊索官达哇的请求，撰写了供抄经人念诵的祈愿文。七月十四日，由俗人仲科尔向达赖喇嘛献礼。

八月八日，雅多、颇章、止古地方提供资财南杰扎仓僧人依止不死光明彩粉坛城修习长寿仪轨，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一日，以甘丹赤巴和绛孜曲杰为首的百余名僧人到布达拉宫，陈列坛城，祝愿达赖喇嘛长寿，并撒花祝赞，达赖喇嘛为他们诵传了上师瑜伽和上师供。以都噶尔拉康的觉哩齐格隆和察罕喇嘛的温波洛桑班觉为首的清朝使者到达拉萨。二十三日，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诏书和礼品，送交了皇帝的舅父科尔沁秉图王去世的回向礼冬夏服装五套及金银、绸缎、金鞍等，达赖喇嘛为其举行了超荐法事。

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在达尔巴译师译完波你尼声明论的基础上，完成了把阿鲁都迪拉哇扎拉雅所著的声明论注疏从梵文译为藏文的工作，为此念诵真言。因格隆俄色的劝请，达赖喇嘛撰写了为察罕诺门罕祈寿的愿文，另外给146人授了比丘

戒，给 137 人授了沙弥戒。十九日，夏鲁堪钦到达拉萨。

达赖喇嘛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六日闭关修习。堪钦索南却珠的外甥想学习梵文论著及声明论等，达赖喇嘛认为对教法有益，派他到达尔巴译师处学习，并给他提供五年的生活费用。因康区及青海发生天花，达赖喇嘛派扎那曲杰等僧人诵咒修法，以防蔓延到拉萨，又派人去德卓温泉取来泉水，洗浴 7 天。

十月二十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传授观音、白色文殊、度母等随许法，给副使洛桑班觉等 35 人授了比丘戒，给 45 人授了沙弥戒。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了林多曲杰官却班觉、察米堪布索南坚赞、卓尼墨尔根曲杰等，二十四日会见羊卓桑顶活佛、止贡强佐、噶蔡喇嘛仁增官却伦珠、那雪波那喇嘛等，撰写了供清朝派来西藏学习藏语文的善恰巴什念诵的祈愿文、给博科巴什的白色文殊修习法、供色罕菊夫人、索南卓玛念诵的祈愿文等。三十日，给洛桑班觉和色罕菊夫人等传授了金刚手随许法等。

十一月一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从藏北前来的达延汗，给清朝正使觉哩齐格隆传授长寿灌顶和白伞盖随许法。二日，达赖喇嘛给清朝两位使者送行，并派达尔东嘎居洛桑饶丹和朵德洛美甲巴·洛桑达吉前去进献奏章，并给结束在藏学习藏语文的清朝人员赠送书籍和礼物等，送他们返回。四日，由察罕诺门罕任施主，南杰扎仓举行祈寿法事。八日，达赖喇嘛会见厄鲁特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台吉和准噶尔部的楚琥尔乌巴什等僧俗上千人。九日，喀尔喀诺木齐阿喀及其弟扎什伦布吉康喇嘛的转世向达赖喇嘛献千份礼，涅巴曲杰桑珠嘉措献百份礼。达延汗和鄂齐尔图台吉在塘波切写造的甘珠尔经完成，迎请至布达拉宫大经堂，达赖喇嘛为之赞颂吉祥。堪布活佛额尔德尼固

始、托因格隆等向达赖喇嘛献礼，杰巴活佛献金盾、金盘等。十一日，达赖喇嘛给诺木齐阿喀和吉康活佛传授长寿灌顶及观音随许法，并给吉康活佛等授沙弥戒，赠给他在汉藏蒙古等地通行的路引文书。因鄂齐尔图台吉年事已高，达赖喇嘛给他写了一篇便于念诵的短文，又为楚琥尔乌巴什写了上师瑜伽文，给绰浦讲经师的诗体信写了回信。

十二月，达赖喇嘛一面休息，一面闭门修行。

火马年（公元1666年　康熙五年）五世达赖喇嘛50岁

藏历新年向吉祥退敌天女献供时，色罕菊夫人献给达赖喇嘛一面镶缀珍宝的柱面幡，蒙藏僧俗4000余人及尼泊尔库库木王的使者举行排座宴会。

一月二日，达赖喇嘛会见达哇活佛、桑措喇嘛喜饶桑波、达波仲达哇等。三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洛桑坚赞、浪卡子夏仲等。四日起，达赖喇嘛实行对外部闭关，跟随夏鲁哇钦波修习喜金刚法的灌顶、道次及加持、随许、经咒等。

二月三日，达赖喇嘛会见鄂齐尔图台吉、楚琥尔乌巴什、色罕菊夫人、达孜台吉父子等蒙藏人士近百人，周加哇·官却才旦绘制了一幅达赖喇嘛的画像唐卡，请达赖喇嘛在唐卡背面写题记。五日，楚琥尔乌巴什向达赖喇嘛献斗蓬、帽子、绸缎、茶叶、银两等千份礼品，喜饶卓玛夫人通过车臣温波翻译请求达赖喇嘛答应在百劫中长久住世，达赖喇嘛只得口头答应。达赖喇嘛还会见浪卡子夏仲、拉康格如夏仲、羊官京俄、桑措喇嘛、止贡羊日喇嘛、第巴吞巴·扎西热丹、巴塘宗堆吉浦巴、江若色顶巴等，以色欠鼐为首的后藏地区的定本30人、定本以下百余人前来献礼。达赖喇嘛给鄂齐尔图台吉及其夫人彭措卓玛等传授金刚手、六臂观音随许法等，给乌勒肯希达哈

额尔克的15岁的女儿授了沙弥尼戒，为霍尔尊穷的儿子剃度出家。十日，达赖喇嘛给杰巴活佛、则钦鼐、色欠鼐、绛林杰波等传授火刃灌顶法，为上密院僧人等加持。

三月一日，鄂齐尔图台吉向达赖喇嘛献玄狐皮大氅、茶叶、绸缎、金银等千份礼品，曼隆巴前来拜见，与达赖喇嘛讲论新伏藏等教法。

四月，达赖喇嘛去曲卧日修行供佛，在14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佛名号经、十万般若颂的法事。由达赖洪台吉任施主，在甘丹寺为宗喀巴灵塔修建金顶祀殿，加上西藏地方增补的资金，共用黄金4800钱、白银23600钱、银1260克（每克合28斤）、铁136克，工钱折合粮食11300克。达赖喇嘛因曼隆巴的劝请为听法笔记写了诗体礼赞文。

四月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达延汗、鄂齐尔图台吉、阿其衮布、洛巴喇嘛衮勒、协噶尔曲德讲经师、贡塘森康夏喇嘛嘉央坚赞、绰浦喇嘛阿旺丹增、工布扎西曲林寺喇嘛等。按达赖喇嘛的指示，刻印了诺桑嘉措、邦译师、宗喀巴、达仓译师、色拉杰尊巴等人的论著，达赖喇嘛认为刻印这些论著对批驳多罗那它的他空见有益。达赖喇嘛给夏康诺门罕、协噶尔喇嘛等传授灌顶、给左翼活佛甲哇嘉措等48人授了比丘戒，给59人授了沙弥戒。

五月五日，因第巴在布达拉宫新建工程，达赖喇嘛前往哲蚌寺，受到僧众列队迎接。六日，达赖喇嘛会见哲蚌寺各扎仓讲经师和僧众，僧众为达赖喇嘛祈寿诵经。

七日，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大经堂，接受僧众献礼，哲蚌寺吉索设宴款待达赖喇嘛。十日，拉萨公众到哲蚌寺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十一日，达赖喇嘛因拉萨公众的请求，撰写了祝愿佛法弘扬、福田施主长寿、世界安乐的祈愿文。十六日，达赖

喇嘛的却本、翁则设宴招待哲蚌寺僧众，分发月形大氅等礼品，朗布鼐居美在席上献吉祥祝词，达赖喇嘛在席上给楚琥尔乌巴什一家、准噶尔策凌等传授六臂观音灌顶加持。二十四日，从德卓温泉取来泉水，达赖喇嘛闭关沐浴7天。

六月三日，达赖喇嘛给达延汗、鄂齐尔图、楚琥尔乌巴什等传授六臂观音灌顶，次日又给达延汗传授长寿灌顶，桑浦寺法台及僧众等到哲蚌寺向达赖喇嘛献曼扎等礼品祈寿。扎什伦布寺坚赞团布的强佐彭措热丹前来哲蚌寺拜见了达赖喇嘛。十日，达赖喇嘛给鄂齐尔图、楚琥尔乌巴什、哲蚌寺的曲杰官尼本巴等传授灌顶，给楚琥尔乌巴什赠送氆氇、水晶等礼品送行。楚琥尔乌巴什的夫人喜饶卓玛为其父昆都仑乌巴什净罪向南杰扎仓献8岁身量的金刚菩萨银像。达赖喇嘛给坚赞团布强佐传授了灌顶及随许法等。曲杰官尼本巴的侄子被任命为格顶寺的法台，他请求达赖喇嘛在委任文书上加盖清朝赐给达赖喇嘛的大金印，达赖喇嘛满足了他的愿望。十四日，强佐彭措热丹迎请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大经堂，向达赖喇嘛献绸缎、银器等九件礼品35份，并向哲蚌寺僧众发放布施。当时正是扎什伦布寺在托布加谿卡寻访到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本已接到扎什伦布寺供养，又因寺僧意见不一而送回托布加南多颇章寺内居住之时，强佐彭措热丹是寻访班禅转世灵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此他这次到哲蚌寺拜见五世达赖喇嘛，当与认定转世灵童有关。

六月十五日，鄂齐尔图台吉在征得达延汗和格鲁派上层集团的同意后，在哲蚌寺举行即汗位仪式，达赖喇嘛给鄂齐尔图传授了十一面观音和忿怒母随许法，给其夫人彭措卓玛传授了文殊身人坛城随许法和弥勒教法等，恰在此时，运送鄂齐尔图台吉的儿子噶勒丹的妻子去世的回向礼即带鞍具的十匹马和几

座蒙古包的使者抵达，因此彭措卓玛在鄂齐尔图即汗位时因儿媳去世的悲痛而昏厥过去，达赖喇嘛认为这是鄂齐尔图和彭措卓玛今后会遇到不幸的征兆。下午，达赖喇嘛赠给鄂齐尔图帽子、衣物等，赠称号为车臣汗，并送印信、礼物等为之送行。六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再次会见强佐彭措热丹，商议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事宜。达赖喇嘛指示说：（托布加的）这位灵童错认的可能性很小，不过班禅的转世与其他活佛不同，如果不十分慎重，出现在却吉扎巴和主巴白玛噶波转世时的那种争执不休的情况，对今后不好。因此彭措热丹可去甘丹寺，请甘丹赤巴在宗喀巴灵塔前拈糌粑丸子卜算，在热振寺请堪布在觉卧坚白多吉像前卜算，从哲蚌寺派翁则去大昭寺觉卧像前卜算，达赖喇嘛自己在哲蚌寺尊胜母像前卜算，如果结果都相符，就可确定无疑。因此强佐彭措热丹即去甘丹寺和热振寺。在六月底的雪顿节期间，展出了缎绣大佛像，表演歌舞杂耍等。

七月三日，达赖喇嘛登上哲蚌寺夏廓扎仓法会的首座，恰那喇嘛措美·洛桑群培向达赖喇嘛献氆氇、马匹等工布地方的礼品。达赖喇嘛为他新收集到的书籍编目。在七月八日哲蚌寺朝祭龙塔时，达赖喇嘛给哲蚌寺 7 个扎仓的讲经师等诵传了经咒。十六日，强佐彭措热丹去甘丹、热振寺后动身回后藏，达赖喇嘛赠给绸缎氆氇等礼品作为奖励。阿巴赖、准噶尔僧格洪台吉的夫人才旺杰莫、苏格宰桑等数百人抵达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从二十四日到八月七日，以第巴吞巴和哉务活佛为首的西藏僧俗 3000 人，以阿巴赖、色罕菊、才旺杰莫为首的蒙古人 200 名，哲蚌寺的僧人 2000 余人在哲蚌寺举行大法会，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法会开始时，乌勒肯丹增托因向达赖喇嘛献绸缎、银两、马鞍等百份礼，色喀喇嘛嘉央的侄子献黄金 200 钱及上等茶叶等。墨尔根扎萨克

图去世，送来了绸缎、衣物、武器等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为哉务活佛南喀桑珠讲授了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文集，八月十四日开始的5天中，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居住沐浴，十七日，到仲麦巴在曲桑新建的佛殿撒花祝赞，仲科尔僧俗二百余人向达赖喇嘛献礼。以前达垄夏仲曾对第巴索南饶丹说达玉温泉对治疗黄水病有益，因此医生强俄巴劝达赖喇嘛前去洗浴。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出发，当晚住于娘真。二十二日，在途中朝礼了贝丹孜的宝帐怙主神殿，中午在萨当鲁顶用餐后，将达延汗所带大队随从留在大路边，达赖喇嘛和达延汗只带50余人于当夜到达温泉边。达赖喇嘛在温泉洗浴期间，达垄寺法台阿旺南杰勒珠、则仁钦扎寺、热振寺、觉丹寺、年波寺、赛米寺、江隆曲顶寺、唐萨甘丹曲科寺、堆垅喀热寺等寺院的喇嘛和澎波、萨当等地首领前来拜见献礼，贡噶宗堆格布哇派噶扎巴多吉南杰前来献白伞盖十七尊的坛城唐卡，本布扎西献茶叶绸缎等礼品，第巴波多哇和班仲巴、年波秀波等设宴款待并献礼。

九月二日，达赖喇嘛从温泉到萨当，三日，以曲杰觉杰巴为首的僧人在那烂陀寺经堂向达赖喇嘛献喇嘛丹巴所著喜金刚咒语，觉杰巴向达赖喇嘛讲述了贝丹孜的历史。五日，达赖喇嘛到萨当鲁顶，当地首领献茶百包、马300匹，杰拉康僧俗献酥油、肉、牦牛等畜产品。七日达赖喇嘛离萨当，八日经甘拉山宿于洛美豁卡。九日中午在仲麦用餐，当晚在哲蚌寺僧队迎接下抵达哲蚌寺甘丹颇章。十日，以贝康堪布本仁巴为首的仁蚌宗的拉德和米德的代表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大经堂会见了尊摩蔡喇嘛、喀的喀囊索、塔尔寺温波、阿巴赖、色罕菊、才旺杰莫等人。可能因为路途中连续翻山劳累，十日晚，达赖喇嘛脚痛病又发，由曼官章杰巴和仲措阿旺

勒桑二人医治，由锵清巴服侍，并由曲杰喀热巴等人诵咒祈祷。从十一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习。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达赖喇嘛脚病渐愈，命人从德卓温泉取来泉水，从十月十七日起洗浴7天。由达赖喇嘛指示，本月开始在16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宝积经、佛名号经的法事。为给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建立每年供祀基金，赐给江孜曲德的泊甲章康以卓喀的玉协谿卡，计8户人家，岁入550克，将澎域卓萨比囊谿卡、曼喀的25户人家、岁入1500克赐给仲麦巴·桑结嘉措，将邦域谿卡6户人家、岁入300克赐给拉孜拉康巴。

十一月二日，达赖喇嘛虽未能会见远道来的阿力克、哇述、嘉戎等地的信徒，但下令送给他们护身结、法物和饮食等。乃穷护法附身显灵，达赖喇嘛派却本献神饮、衣物、缎匹等。十日，阿巴车臣夏仲的转世由郭莽扎仓卸任堪布噶如哇领来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转世灵童剃度，并传授六臂观音教法。郭莽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献礼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为赞布诺门罕顿珠嘉措举行超荐法事。十一日，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到布达拉宫，途中受到达延汗、温萨活佛、阿巴赖、达垄强佐等人的迎接，由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安排，在布达拉宫举行蒙藏僧俗首领参加的排座宴会，下午达赖喇嘛会见德柱堪布、墨如洛本、达波仲达哇等。从十七日开始达赖喇嘛闭关修行7天。二十三日闭关结束后，达赖喇嘛给温萨活佛传授长寿灌顶，并赠给袈裟氆氇等作为送别礼，温萨活佛临行前，达赖喇嘛又赠给他一串珍珠念珠，向他反复叮嘱政教两方面应如何进行的事宜，并派人陪同他去厄鲁特登上法座，温萨活佛把他在扎什伦布一所新建的住宅献给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很高兴地接受了。达赖喇嘛还给才旺杰莫传授了善行、积福、十一面观

世音修持仪轨及随许法等，还赠给她水晶、氆氇等送别礼品。在南色林巴彭措旺波去担任日喀则宗堆和则宗噶居去担任巴塘宗堆之时，达赖喇嘛给他们一起传授了金刚手菩萨随许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日，达赖喇嘛又闭关修习，派却本到哲蚌寺供礼各护法神，由翁则洛桑丹增和曲杰喀热巴等几名僧人陪同达赖喇嘛做法事。闰十二月中，达赖喇嘛做施食供修，撰写听法记。

火羊年（公元1667年 康熙六年）五世达赖喇嘛51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世间女神敬献供养，并举行蒙藏僧俗人士参加的排座宴会，还有尼泊尔库库木王和拉达克德丹王的代表参加。二日，鄂特欢向达赖喇嘛献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色罕菊等传授皈依、发心等教法，给106人授了比丘戒，给74人授了沙弥戒。四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洛桑坚赞，给达垄强佐和色多托因传授六臂观音灌顶加持。五日，彭域周嘉哇官却才旺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沙弥戒，他把周嘉巴的土地及属民102户的名册献给第巴仲麦巴，达赖喇嘛征求各方意见后，派人前去接收。十一日，达赖喇嘛向螺髻梵天献供，并派人向春堆、桑耶护法献供，请求授记。二十一日，收到吉雪曲杰洛桑丹迥嘉措去世的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举行了超荐法事，并剃度乃宁夏仲古宣巴的转世出家，给他起名为贡噶德勒。

二月，为了积福及祈愿藏区安乐，达赖喇嘛下令在19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贤动经、解脱经、金光明经及莲花生遗教的活动。

三月三日，扎什伦布寺仲尼噶钦根敦楚臣到布达拉宫，带来强佐彭措热丹的信件及银质曼扎、器皿及绸缎等礼品。清朝

派遣的以德勒格尔格隆和喜饶俄色为首的100余人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递交了诏书和礼品，另外还有两份密封的关于汉藏之间关系的文书，当年由于青海方面发生越界等纠纷，清朝在庄浪集合军队，另外由于在北京的一些僧人不守清规，许多出家人被逐出寺院，所以随同清朝使者来拉萨的香客比以往减少了许多。德勒格尔格隆还带来了鄂尔多斯策仁台吉的女儿去世的回向礼。乃宁夏仲、白居寺堪布云丹僧格及江孜地区的僧俗人众等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绸布、皮张、庶糖等，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觉扎活佛、第穆洛穷、巴热活佛、工布甲果哇索南旺波等，他们在第巴索南饶丹时曾得到少许薪俸，1642年还得到过固始汗发给的印信，但是由于未计入活佛名册中，仲尼等未给他们发给薪俸，使他们空手返回。达赖喇嘛奖赏了派去北京后返回的使者达东嘎居和洛美甲巴二人。俄尔堪布甲林曲杰去世，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回向礼品。七日，达赖喇嘛会见了达延汗及其王妃、儿子、达孜台吉、桑日本萨、仲达堪布等。达赖喇嘛给阿巴赖、仲达堪布等传授了随许法等。达赖喇嘛命人从绒地取来温泉水，从十四日起洗浴8天。

三月底至四月十八日，达赖喇嘛闭门休息并撰写听法笔记。十九日，达赖喇会见了主巴强佐曲旺、达布珠巴、仲孜哇等，在哲蚌寺讲经师和百余名僧人举行的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会上，强巴林寺和杰林僧团向达赖喇嘛献礼。

五月十四日，达赖喇嘛给阿巴赖的小王妃等人传授斋戒仪律，叶尔巴寺150名僧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会，清朝使者德勒格尔格隆和喜饶俄色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献金银制成的曼扎等，策嘉布为首的那仓的人众献马、牛上百头。达赖喇嘛给包括清朝两位使者在内的44人授了比丘戒，给清朝副使喜饶

俄色改名为洛桑彭措。西藏西南的作木朗（后为廓尔喀所并）王的使臣济都班达日、阿难陀班达日等人向达赖喇嘛献长一庹有余的象牙、白细布等，达赖喇嘛说在汉地见过活的大象，但是也没有这么长的象牙，因此这根象牙十分珍贵。达赖喇嘛给作木朗的使者赠送了大缎、银砖等，并写回信让其带回。达赖喇嘛赠给阿巴赖等人念珠、氆氇等物品，为他们送行。

六月十二日，扎什伦布坚赞团布拉章的强佐彭措热丹派擦绒本仓格隆和索本洛桑丹增到拉萨，请五世达赖喇嘛为新造的甘珠尔经撰写祈愿文，达赖喇嘛立即写好付给。另据《五世班禅传》记载，擦绒本仓格隆和索本洛桑丹增这次到拉萨是向达赖喇嘛详细报告考察班禅转世灵童的情况，达赖喇嘛表示确认托布加地方出生的灵童为四世班禅的转世，并指示扎什伦布寺将灵童接入寺中举行坐床典礼。

七月一日，江拉鼐、珠巴鼐、南色林巴、仲尼仲巴、达如鼐、两位代本为首的仲科尔等在南杰扎仓的会供轮法会上向达赖喇嘛献礼。在仲科尔排座宴会上，达赖喇嘛与欧珠谈论医学方面的问题。达赖喇嘛给一些寺院和贵族封赏土地和属民。第巴仲麦巴规定各地马步军兵旗帜武器。二十一日，拉萨四部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达赖喇嘛会见清朝两位使者、强林堪布、南巴京俄、车臣温波、扎西则巴索南官波等人。二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洪台吉和罕都的代表、门域的甘托克王、热振堪布、塔尔巴堪布等人。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授智慧大鹏随许法，并派强林堪布楚臣坚赞和康赛热丹与清朝使者一起去北京呈奏表贡礼，并让青海蒙古首领为消除与清朝的矛盾而派人向清朝献马、牛等物品，并要求青海蒙古首领划清地界、不偷盗抢掠、不阻碍贸易来往，与清朝保持良好关系。因达赖洪台吉管理青海事务的功劳，达赖喇嘛和第巴、达延汗商议后，对

达赖洪台吉给予奖赏。

八月五日，达赖喇嘛会见达孜台吉父子、门域梅拉喇嘛、呼图克图丹增活佛等人。十四日，不丹大臣喇嘛拉恩波、康区德格喇本彭措去世后，派人到哲蚌寺大经堂献礼，由南杰扎仓僧人为他们做了法事。

九月一日，帕巴拉活佛从康区到拉萨，拜见了达赖喇嘛，献茶叶 300 包及马、骡、牦牛等。达赖喇嘛下令在 19 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佛名号经、药师佛经等经咒的活动。六日，夏鲁堪钦从后藏到拉萨，达赖喇嘛向他请教许多甚深教法。

十月三日，达赖喇嘛因却本的请求撰写了向峡谷、山口、山崖的守护女神多吉玉珍玛常时祈请的愿文。扎什伦布寺派其阿巴扎仓洛本冈钦巴、本仓擦绒巴、翁则却央等人携带四世班禅的用品到温波朱仓对托布加出生的班禅转世灵童再次进行考察后，强佐派仲尼宣巴噶居群培到拉萨向达赖喇报告，达赖喇嘛即派日楚甘丹洛本强巴仁钦、甲尔波仲尼多吉旺秋、代本鄂尔巴三人前往日喀则，在十月七日举行的五世班禅的坐床典礼上赠礼祝贺，并指示给五世班禅起名为洛桑意希，达延汗也派了代表前去送礼。八日，甘丹赤巴、夏孜和绛孜曲杰、甘丹寺僧人 200 多人以及襄南木林的宗堆绰浦哇、襄甘丹曲科寺的僧人等向达赖喇嘛献礼祈愿达赖喇嘛长寿。十日，达延汗及其亲随等从藏北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达延汗的王妃、儿子等人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等。为 114 人授了比丘戒，为 77 人授了沙弥戒。十八日，帕巴拉活佛任施主，南杰扎仓僧人举行会供轮法会，祈祷达赖喇嘛长寿。此后，达赖喇嘛和达延汗应邀去参加达孜台吉的儿子迎娶乃东孜的女儿的婚礼，途中达赖喇嘛顺便到甘丹寺，向宗喀巴灵塔献了曼扎、茶叶等供养。

从十一月五日起到十二月上半月，达赖喇嘛的脚病又犯，由达摩哇协助强俄巴进行治疗。

十二月五日，达赖喇嘛脚病平复，会见了帕巴拉活佛、洛扎第巴当巴、卓尼曲杰洛桑尼玛、第巴萨隆巴、扎什伦布托因洛桑多吉、达垄夏仲等。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噶尔丹因吃错了药突然亡故，为他积福做超度法事的噶居桑结扎西抵达拉萨，向达赖喇嘛献绸缎、衣物、武器、银器、玉器、黄金、金鞍、带鞍具的马100匹、不带鞍具的马200匹、骆驼300峰，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并因吉雪曲杰的请求写了为噶尔丹祝愿的祈愿文。二十四日，以宗堆切松痈、第巴达尔巴为首的拉孜地区的僧俗仲科尔以及噶丹沃门林寺的法台、桑丹寺堪布江孜夏仲为首的僧人等向达赖喇嘛献黄金、绸缎、布匹等，祈愿达赖喇嘛长寿，从沃喀宗也有僧俗百余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

土猴年（公元1668年　康熙七年）五世达赖喇嘛52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举行敬神酬补法事，阿巴赖的使者夏日乌坚来献柱面幡及念珠五串。卓尼曲杰在排座宴会上向达赖喇嘛献千份礼品。萨迦达钦阿旺贡噶扎西举行继位仪式，达赖喇嘛派达尔巴宜巴阿旺赤列为代表前去送礼祝贺。

一月四日，达赖喇嘛会见了甘丹赤巴洛桑坚赞。达赖喇嘛给53人授了比丘戒，给39人授了沙弥戒。从五日开始，达赖喇嘛闭关修习一个月，撰写听法笔记。因彭域周嘉哇官却才旺将土地属民献给第巴仲麦巴后又生反悔，因达孜台吉的坚持请求，达赖喇嘛下令将土地属民还给周嘉哇。

二月七日，达赖喇嘛前去达吉曲顶给德钦本萨传授灌顶和仪轨。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帕巴拉活佛、拉孜曲德喇嘛、曲

杰哲桑巴、第巴彭多哇等。十三日，达赖喇嘛赠给帕巴拉活佛绸缎、袈裟、铙钹、蔗糖、马、氆氇等，为他们送行。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墨如喇嘛、贡塘森康夏喇嘛、达延汗的幼子等。从一月开始，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患病，因事务繁杂，未引起警觉，没有及时医治。到二月份病势加重，派仲措哇每天前去把脉，但脉象不明显，医药已无济于事。延至二月十七日，仲麦巴·桑结嘉措派人向达赖喇嘛报告第巴病危，达赖喇嘛即赶往仲麦，到达时第巴已逝，便向第巴遗体赠送了佛舍利子等，并为第巴念诵经咒及佛名号经，因星宿推算等，匿丧4天，到二十日发丧。向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桑耶寺、甘丹寺的佛像及宗喀巴灵塔献绸缎、曼扎、经幡、哈达等，并献净水、酥油灯等供养，并派人向达延汗和青海蒙古首领通告第巴去世。本拟将第巴遗体迎至布达拉宫火化，因担心冲犯神鬼，故运至甘丹寺由帕邦喀的经师主持火化。并在各地寺院中举行诵经、布施及超荐法事。

三月七日，在大昭寺回廊举行有哲蚌、色拉及拉萨附近各寺僧人6000人参加的法会，迎请甘丹赤巴泽当哇洛桑坚赞主持，超荐第巴赤列嘉措，在三天中向僧众发放布施和茶饭。以后在前后藏各地举行，共向3级以上的1622座寺院及其84100名僧人发放了黄金2745钱、白银10214钱，绸缎、茶叶、钱粮等物品折合粮食共计145200克。用各地僧俗为第巴去世所献的物品建造纪念第巴的药师佛等佛像唐卡35幅，至二十五日完成，达赖喇嘛为唐卡写了题记，由夏鲁堪钦依止金刚界坛城为唐卡举行了开光仪式。

达延汗在二月份第巴仲麦巴去世时身体状况就很差，使众人很不放心，达赖喇嘛为他传授了赎命和长寿灌顶，似乎略有好转。

三月十二日车臣温波因达延汗病危到达赖喇嘛处请求护持佛像，还未返回，在途中就听到达延汗去世的消息，又到达赖喇嘛处报丧，达赖喇嘛即去噶卓杰蔡林卡，为达延汗念诵往生经和佛名号经等，因按蒙古风俗需要哭灵，故无法匿丧，即献袈裟等回向礼，由达赖喇嘛为其举行超荐和祈愿。达赖喇嘛与车臣温波、阿里仲巴、达如鼐等人商议后，返回布达拉宫，即派车臣达吉和官布扎布去召请王子仁特那，并派人去青海向达赖洪台吉为主的蒙古首领报告达延汗去世的情况。随后在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布达拉宫、上下密院等处向佛像献绸缎、经幡、银质曼扎等供品及净水、酥油灯供养。并向甘丹赤巴、萨迦达钦、多吉扎活佛、桑顶寺活佛及扎什伦布的班禅大师等通报。

四月五日，在噶卓杰蔡林卡聚集僧人 8450 人，由卸任甘丹赤巴官却曲桑主持，为达延汗举行三天超荐法事，向前后藏二级以上的 653 所寺院及其 62200 名僧人发放了布施和茶饭。共用黄金 3180 钱、白银 1220 两，绸缎、哈达、茶叶、皮张、钱物等折合粮食共计 289300 克。

五月，因第巴仲麦巴和达延汗相继去世，达赖喇嘛下令在 46 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佛名号经、药师佛经等经咒的活动，并为第巴仲麦巴和达延汗建造纪念他们的佛塔、佛像、佛经。卓尼曲杰洛桑尼玛离拉萨前，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马头明王、金刚手随许法，因卓尼曲杰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法的功绩，达赖喇嘛赠给他袈裟、氆氇等物品作为奖赏。

六月，达赖喇嘛闭关修行。达赖喇嘛下令给一些寺院和贵族封赏土地和属民。

七月一日，以日喀则宗堆贡噶乃赛顿珠，扎什伦布寺推桑林扎仓的洛本和坚赞团布拉章的代表为首的日喀则地区的僧俗

人众前来献礼，担任施主，由南杰扎仓僧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作木朗部的代表前来，向达赖喇嘛递交其王的信件及火炮、火枪、布匹等礼品。二日，达赖喇嘛派定本贝雅为代表前去阿里给格鲁派寺院发放布施。

八月一日，甘丹赤巴洛桑坚赞、夏孜曲杰、绛孜曲杰等一百多僧人为达赖喇嘛诵咒作法，祈祷达赖喇嘛长寿。次日，昂仁地区僧俗人士等为达赖喇嘛祈寿。本年中由珠嘉林巴和格尔勒阿达负责，由尼泊尔工匠阿玛尔森哈等人将连接布达拉宫西南山脚和药王山脚的三座塔的铁链修复，并建风铃 30 个，除铁、铜等材料外，工钱折合粮食 1600 克。纪念第巴仲麦巴的银塔建成，达赖喇嘛派却本前去为银塔装藏。

九月，在哲蚌寺格桑拉康新建的铜质贤劫千佛像完成，在色古拉康新建铜佛像 691 尊、银佛像两尊、铜质曼扎 11 个。又由琼结热绛巴负责，在色拉寺新建两座供祀殿，两殿内各建铜质佛像数百尊。十三日，桑浦拉哇堆扎仓僧众、热振寺堪布和吉索、白居寺堪布云丹僧格等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达延汗的长子仁特那及随从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还会见了拉孜活佛、吞·勒丹旺波、羊卓白玛林巴等人。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十月二日，贡噶多吉丹寺的洛本南前仲巴、蔡贡塘寺喇嘛为首的僧众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达赖喇嘛还会见了俄尔堪布珠康巴·贝却坚赞、杰勒雪林喇嘛及从阿力克、那雪前来的香客数百人。三日，哲蚌寺德阳扎仓洛本为首的堆龙策色寺的僧人向达赖喇嘛献礼，举行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仪轨，达赖喇嘛给 225 人授了比丘戒，给 70 人授了沙弥戒，还会见了达延汗的大小乌尔格（王公的帐圈）的人士、尼泊尔阳布（即廓尔喀）王的使者、羊孜喇嘛、洛扎喀曲和果曲喇嘛等。十三日，

达赖喇嘛会见嘉色喜培活佛、王子仁特那、王妃古茹、索南曲宗等人。达赖洪台吉为建造甘丹寺金顶献黄金80两。达赖喇嘛为积福命10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贤劫经、宝积经、金光明经等经咒的活动。十五日，喜培活佛和仁特那王子向达赖喇嘛献绸缎、茶叶、马匹，察哈尔王的喇嘛泽当勒钦巴献金银、缎匹，达延汗的小乌尔格为达延汗积冥福献蒙古包、衣物、马鞍、箭袋等，察雅活佛献茶叶百包。第穆活佛应达赖洪台吉等青海蒙古首领的邀请前往青海，在途中因病圆寂，派人给达赖喇嘛送来绸缎、粮食等回向礼，达赖喇嘛应温波索南诺布的请求，撰写了祈愿第穆活佛迅速转世的愿文。

十一月二日，清朝使者雅隆安木齐、达温席力图曲杰的温波以及同行的鲁本曲杰、叶尔巴曲杰等抵达拉萨。雅隆安木齐等向达赖喇嘛递交了诏书和礼品等，并口头传达了要达赖喇嘛促进汉蒙和好的旨意。清朝使者和同来的香客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大量汉地的物品。四日，喜培活佛向达赖喇嘛献元代所造织锦红色阎罗敌像为主的礼品，并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五日，清朝使者捐资在南杰扎仓举行会供轮法事，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喇嘛给鄂尔巴噶居和昌都济仲活佛授了比丘戒。洛扎报告门域阿觉部落侵扰边界，请派兵进行反击。代本达如哇、珠巴鼐等准备出兵时，萨迦、扎什伦布、吉雪台吉等表示愿出面调解，达赖喇嘛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十二月十四日，科尔沁噶萨古阳宰桑等向达赖喇嘛献哈达、绸缎、银器、马鞍等。喀尔喀诺门额津年老病重，不辞辛劳到达拉萨，乘马车去朝拜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觉卧佛像，病情减轻，又要求到布达拉宫拜见达赖喇嘛，请求达赖喇嘛护持。二十九日达赖喇嘛左手肘部疼痛，至三十日肿胀不消，由达摩鼐敷药，仲麦巴·桑结嘉措和却本二人打卦卜算，声称无

妨，因此达赖喇嘛还是去参加了年底的酬补法事，次日果然肿痛消失。

土鸡年（公元1669年 康熙八年）五世达赖喇嘛53岁

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敬献供养，元月一日和二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有汉地、喀尔喀、厄鲁特、西藏僧俗人士3000多人参加的庆贺新年的宴会。十四日中午，达赖喇嘛突然感到严重不适，却本、翁则、仲麦巴·桑结嘉措、达如鼐、札尔波鼐等近侍建议举行祈祷仪轨，因此达赖喇嘛下令在13个宗豁举行忏悔罪业、念诵白伞盖佛咒语及祈寿的法事，在拉萨祈愿法会上施主布施财物。鉴于西藏的服饰几经变化，到当时许多人的服装是蒙藏混杂，上身穿蒙古服，下身及腰带、靴鞋等是藏式的，还有一些俗人穿僧人服装，达赖喇嘛因此下令藏人一律穿藏装，不准俗人穿僧装，并要各地具呈甘结。

二月一日，诺门额津、岱青和硕齐等人向达赖喇嘛献茶叶、绸缎、银器、皮张、香、马鞍等物品，并出资帮助建造如来八塔以积福。帕巴拉活佛派其强佐却扎西来献茶叶50包及马、骡等物品。达赖喇嘛因曾被清朝派到西藏学习藏语文的善恰巴什的请求撰写了对北京的旃檀觉卧佛像赞颂和祈祷的愿文。从一月起，达赖喇嘛即患感冒，由仲措哇拉桑和达摩鼐用药治疗，因多次感冒和服药，影响到腿部，二月二十日腿部疼痛，又对脚病进行治疗，到三月九日，小腿肿胀，服用白药数天后，才勉强能够行走。在这期间，由仲麦巴·桑结嘉措和翁则二人服侍照料。当时桑结嘉措年仅17岁，仍通宵不眠守护达赖喇嘛，白天仍然精力充沛，办事毫无疏漏，使达如鼐十分惊奇。达赖喇嘛又派桑结嘉措协助嘉央丹增和锵清巴二人处理往来文书，内外传达，派达摩哇和锵清巴协助却本处理事务，

由仲措哇拉桑负责治病。十九日，达赖喇嘛派却本去曲科杰寺向护法神献敬神哈达和供品、食子，当却本领命准备动身时，达赖喇嘛的病情就明显好转。他认为这是护法神护佑的征兆。为了积福，达赖喇嘛又下令在8个宗豁举行念诵十万般若颂、佛名号经等经典的活动，并向桑耶、昌珠、雍布拉岗等地的神像献供养。又因本年生病时间长，在哲蚌寺、色拉寺、帕邦喀熬茶斋僧多日。

四月四日和五日，达赖喇嘛设宴款待清朝的使者和喀尔喀的僧俗客人，为喀尔喀客人送行。依照却本的安排，达赖喇嘛命达如哇负责在前藏江南江北的58座寺院熬茶斋僧，举行净罪祈福法事。恰达钦波从曲卧日到布达拉宫居住十天，给达赖喇嘛传授甘露漩灌顶等教法，达赖喇嘛派人去曲卧日向守护神献供施食。甘丹赤巴泽当巴洛桑坚赞圆寂，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派打箭炉萨噶头人送去了衣物、银号、马鞍等祭礼。本年中有几天山谷被雾气罩住，日月不明，众人惊疑，达赖喇嘛认为这是甘丹赤巴圆寂的先兆。清朝使者雅隆安木齐等上年十一月到拉萨时，达延汗已去世，所以清朝给达延汗的诏书无法递交，想在新汗继位前暂存在达赖喇嘛处，使者们请求说，诏书事关重大，如不送交，恐受朝廷处分，因此达赖喇嘛二十日在闭关中会见了清朝使者，接受了清朝给达延汗的诏书，并派唐萨洛本洛桑嘉央和曾去过北京的康萨热丹到北京去进呈奏表和贡礼，并报告汉蒙和好的情形。因第穆活佛去世，当地首领派格隆帕巴诺布送来了金银、茶叶、绸缎等礼品。玛尔康果沃温波和打箭炉甲拉本也送来了礼品。本月中达赖喇嘛又下令给一些寺院、贵族封授土地属民或建立法事活动的基金，其中给担任清朝使者的雅隆安木齐封给托布加曲果地方的一岗土地岁入粮食280克、颇章地方岁入300克的土地。

六月二日，却本和翁则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绸缎、马鞍等百份礼品，并献黄金1000钱修建昌珠大屋顶殿。楚布寺报告仲巴活佛的强佐去世，请求达赖喇嘛委派其继任者，达赖喇嘛认为活佛比强佐重要，指示楚布寺去寻找活佛的转世，并说愿提供路引和资助，但是不见楚布寺的行动，后来听说是因为在云南丽江的噶玛巴已指认其身边的一个弟子为仲巴活佛的转世，不过达赖喇嘛还是按楚布寺的请求指派了继任强佐的执事。六月里，达赖喇嘛摆脱杂务，闭关修习。

七月七日，达赖喇嘛会见上密院讲经师、拉哇堆扎仓的讲经师、达孜台吉父子等。贝康卸任堪布本仁巴去世，送来了回向礼，由朗布鼐负责举行超荐。仁波且宁日哇圆寂，也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因仲麦巴家族的囊索贵巴扎西在攻打第悉藏巴的首府日喀则时受伤亡故的战功以及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多年忠心效力，特别是仲麦巴·桑结嘉措从小就交给达赖喇嘛养育护持，所以将仲麦巴家族所有领地封给桑结嘉措掌管，并赐给桑结嘉措一颗达尔罕的印章。又因为有对桑结嘉措不利的征兆，为了避邪，达赖喇嘛指示桑结嘉措不要住在布达拉宫或其私人庄园中，而到曲桑的神殿中居住。

八月二日，达赖喇嘛会见工布各地首领、杰曲堪布、参卓堪布、觉摩隆堪布等。定本贝雅和阿里德丹王的使者诺诺杰到拉萨，要求达赖喇嘛像资助阿里的格鲁派僧人那样对他们给以资助，达赖喇嘛给以驳斥，双方没有谈妥，不过定本表示愿为格鲁派提供运输和喂养骡马的方便。对于第巴职务的继任者，在格鲁派上层人士中有不少议论，曾有人提名琼结热绛巴、达尔罕噶居、总管事阿旺门朗等，不过以达垄强佐和达如哇为首的多数人主张应由却本罗桑图多继任第巴。因此达赖喇嘛在七

月份派索南旺杰为代表去青海时，命他除与青海蒙古首领商议达延汗的汗位继承人的问题外，还通报和商议选择第巴职务继任者的情况和问题。本日达赖喇嘛派尚察官却南杰去向却本罗桑图多传达要他出任第巴的意思，但罗桑图多没有立即接受。达赖喇嘛的近侍达如哇诺布出家为僧，达赖喇嘛为其起名为洛桑欧珠。从十八日起的7天中，南杰扎仓举行迎请五部空行的诵咒法事，达赖喇嘛每天早上去法会上诵咒。这期间罗桑图多同意出任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出任第巴时，前来献礼和求见者川流不息，达赖喇嘛恐有少数献礼者被遗漏，未被通知到，因此命人查点一次，通知被遗漏者前来参加第巴就任仪式。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了达延汗的儿子仁特那、王子达什彭措等人。

经塔尔巴寺囊索日吉宁波仔细测算，确定闰八月一日为举行罗桑图多就任第巴职务仪式的吉日，罗桑图多即在大殿向达赖喇嘛献汉地所造无量寿佛像一尊、绸缎、马匹、茶布等作为对任命他为第巴的谢礼。在当天举行的就职仪式上，达赖喇嘛赐给他大小两枚印章、缎盒、钥匙等。最先由名字吉祥的达孜第巴拉加热丹向第巴献礼，接着是蒙古各首领及塔尔巴寺的僧众，然后是蔡、德钦、色拉、哲蚌、扎什伦布的代表以及第巴的属民旬地方的僧俗人众，还有作木朗、阳布、阿里等部的代表。从当天起，陆续由达尔巴译师、朗布哇居美、萨哇珠巴桑珠杰波在仪式上讲诵吉祥祝词，藏巴卓巴、丹巴、娘朵、德细、乃旬等地的人们表演了歌舞，蔡公堂、涅塘扎西岗、墨如哇、拉萨泽居哇的人们表演了噶尔舞蹈和跳神。达赖喇嘛任命嘉达尔哇·喜年达吉接任却本职务。二日，达孜台吉在布达拉宫大殿举行庆宴，岱青之子塔尔巴向达赖喇嘛献百份礼品，昌都强佐、第穆和察雅活佛的代表、拉日喇嘛等献茶叶、甲胄、

马骡等。三日和四日，由德钦台吉和地方政府举行宴会招待前来献礼祝贺者。达赖喇嘛会见印度班智达廓古拉的商人黎拉迷达罗、墨浦喇嘛洛桑班觉、噶丹彭措林的管事、阿巴扎仓的喇嘛岗钦巴等人。六日，甘丹寺夏孜曲杰、第巴彭多哇等前藏上部地区的人士前来向第巴献礼祝贺。七日，达赖喇嘛和第巴罗桑图多一起向螺髻梵天奉献衣服、武器、绸缎、神饮（酒）、马鞍等供品，请求降示预言。八日，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并设宴款待蒙藏人士，扎什伦布寺的代表擦绒格隆讲诵吉祥祝词。翁则和扎仓僧众向达赖喇嘛献礼祈寿。十二日，工布、娘布地区僧俗人士来向第巴献礼祝贺，达赖喇嘛会见了噶尔扎仓僧人和恰那喇嘛等。十六日起，第巴罗桑图多突患虫疾，因此在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熬茶斋僧，布施银两，在南杰扎仓建立祈福法事，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无量寿和威猛灌顶。由强俄鼐为首的医生对第巴进行治疗，逐渐康复。二十三日，在念修金刚橛的法事上，达赖喇嘛给新任却本喜年达吉等17人授了比丘戒，给10人授了沙弥戒。

九月一日，第巴病愈，在以后的一些天中陆续接受达布、沃喀、拉嘉里、贡噶、山南、雅隆等地僧俗代表的献礼祝贺。达赖喇嘛给嘉日哇父子传授了随许法，嘉日哇的两个儿子要求出家为僧，第巴通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给其长子起各为阿旺彭措旺秋，给其次子起名为噶丹热丹旺波。达赖喇嘛给觉拉活佛晋美珠巴及其管庙官阿旺贡桑等15人授了比丘戒，下令在20个大寺院中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华严经、佛名号经、白伞盖、药师佛等经咒的活动。从八日起，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7天。喀尔喀右翼诺门额津及部众向达赖喇嘛献50两的银锭20锭、绸缎百匹等礼物。郭莽扎仓讲经师噶如哇建造了无量光佛的唐卡，达赖喇嘛为其书写了唐卡上

的题记。十七日，日喀则、江孜、白朗、昂仁、仁蚌、拉孜等地的僧俗首领前来向第巴献礼祝贺，达赖喇嘛会见了乃宁夏仲、白居寺堪布、噶觉活佛、贝康堪布等，还会见了从康区东部来的果沃本布、噶蔡喇嘛等。二十一日，吞·日伦巴设宴款待蒙藏僧俗首领。达赖喇嘛给伦波孜堪布、达垄强佐、车臣温波、霍尔安多的五位首领等传授了长寿灌顶，并从本日起实行外部闭关，开始向掘藏师仁增钦波请教宁玛十万续。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中间出关一天，受仲尼仲巴家的款待，达赖喇嘛命人刻印《贤劫经》、《佛五千四百五十三名号经》、《丁香帐》及曼隆巴寄来的不动金刚的论疏等。

十一月五日，准噶尔部僧格的使者到拉萨向达赖喇嘛赠礼。达赖喇嘛会见达扎济咙、浪卡子夏仲及前去门域调停争端的泽当强佐、扎什伦布寺的代表预钦巴、喀尔喀诺门额津、拉仁波且、德钦台吉父子、达延汗的两位王妃、王子仁特那等。八日，达赖喇嘛会见前来向第巴献礼的止贡寺活佛。九日，举行盛大的八大法行饮血金刚跳神活动，达赖喇嘛观看了这种宁玛派传下来的跳神活动。二十八日，达赖喇嘛右手发炎，加重了手臂肿痛。达赖喇嘛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听受和修习宁玛十万续。

十二月上旬，达赖喇嘛的老师夏鲁哇钦波来布达拉宫居住3天后去贡噶治疗。达赖喇嘛手臂肿痛加剧，由仲措哇拉桑用白药加大剂量治疗，由翁则和却本服侍。因患病未参加年底的酬神法事。

铁狗年（公元1670年　康熙九年）五世达赖喇嘛54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因病没有参加敬神和排座宴会，在布达拉宫会见了王子达什、仁特那及少数担任职事的仲科尔。

一月八日起，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温水洗浴，大有效用，不过手臂肿胀未消，此时索南旺杰从藏北来，称扎杰莫的温泉有疗效，故又取来该处泉水洗浴，病情迅速减轻。祈愿法会期间，达赖喇嘛布施药品，由曲杰那林巴和达摩甭二人治好了许多病人。

二月一日，夏鲁哇钦波从贡噶到布达拉宫居住8天，给达赖喇嘛授了经咒等，使达赖喇嘛病情大为好转。又从扎杰莫节隆谷口温泉取来泉水洗浴，对手脚消肿大有好处。达赖喇嘛下令在19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佛名号经、药师佛经等经咒的活动。康区类乌齐济仲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马匹、甲胄等礼品。达赖喇嘛为达延汗的两位王妃、王子仁特那夫妇等举行宴会，并给乃东夏仲和类乌齐济仲还礼送行。十日，日沃曲林寺吉索任施主举行会供轮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七日南杰盘德勒雪林扎仓举行坛城供为达赖喇嘛祈寿。第巴罗桑图多去温泉和山南巡视，却本喜年达吉也要去温泉，遂与第巴同行。由第巴组织缝制了舞衣、面具等，达赖喇嘛下令从本年起举行每月初十的跳神活动。又命班觉扎西和丹增热丹二人负责，在大昭寺回廊殿新建祖孙三法王、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及大臣像，在邬金殿新建莲花生大师像和菩提塔，在小昭寺回廊殿新建龙王、药师佛像及如来八塔等，用去黄金112钱、藏区造金箔1446张，汉地造金泊6180张以及各色颜料等，工钱折合粮食3700克。

三月五日，达赖喇嘛听到厄鲁特内部鄂齐尔图车臣汗兄弟不和、厄鲁特发生内乱的消息，派岗坚堪布官却仁钦为代表前往，并带去给厄鲁特各活佛、首领、贵族的信件和口信，想帮助他们和好。但因准噶尔的僧格与巴噶班第也一直不和，所以达赖喇嘛的劝告没有产生多大效果。按照蒙文和汉文资料记载，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其弟阿巴赖一直不和，僧格与其异母兄

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关系也一直紧张，鄂齐尔图和僧格的叔父、巴噶班第之父楚琥尔乌巴什是支持僧格的，《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此处可能是将车吉台吉误为车臣汗，而且说巴噶班第反对僧格，也与汉文资料所说不同，未知孰是。青海蒙古也发生抢劫马匹的事件，达赖洪台吉禁止不住，达赖喇嘛认为厄鲁特可能会遭到内乱的打击。十七日，第巴达尔巴译师阿旺彭措伦珠给玛微旺秋和洛色客巴二人教完了梵文波你尼声明论和语法等，达赖喇嘛派玛微旺秋和洛色客巴去噶丹彭措林寺负责刻印经论的校订工作。由达孜台吉兄弟出资对桑耶寺进行了修缮，并建立供养。

三月和四月中，达赖喇嘛一面闭关修习，一面继续撰写听法笔记。

五月八日，查仓巴钦波到布达拉宫，居住了半个月，给达赖喇嘛传授了赎死、驱鬼、除障、迎遮等仪轨。

六月十一日起的几天中，哲蚌、色拉、桑浦、下密院的僧众举行盛大的供奉三宝的法事，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喇嘛在法会上会见了阿巴车臣夏仲的转世、楚布寺强佐、贡塘森康夏喇嘛、梅拉喇嘛等。五世班禅从日喀则来拉萨，达赖喇嘛十四日派人在丹巴达设灶郊迎，将五世班禅迎到布达拉雍喜康下榻。十五日，五世班禅一行到布达拉宫，所有仲科尔都向五世班禅献了哈达。五世班禅在大殿拜见达赖喇嘛时，献了佛像、佛经、绸缎、茶叶等礼品。像岗波和主巴活佛到布达拉宫那样给五世班禅铺设了坐垫。在上午举行的排坐宴会上，达尔甭和擦绒甭依据经典诵念了吉祥祝词。十七日，坚赞团布拉章的主要执事侍从、卸任热吉洛本、擦绒格隆、索本、仲尼、格隆洛桑南杰等人到达赖喇嘛的住所拜见了达赖喇嘛，擦绒甭向达赖喇嘛献了一幅精美的胜乐唐卡。从二十二日到七月一日，达赖

喇嘛给五世班禅及其侍从、达扎济咙活佛、帕邦喀住持、尼玛塘喇嘛洛桑曲扎、梅拉喇嘛、车臣温波及一些仲科尔传授了赞颂佛名号、长寿经祈愿、忏悔、白伞盖、度母等教法及宗喀巴文集和根敦嘉措文集的零星内容。人们说传法的过程中有一天下了花雨，达赖喇嘛说如果是真的，那可能就是五世班禅是真正无误的转世的证明。

七月二日，以钦差格隆桑珠群培和当加索南扎西二人为首的清朝使者到达拉萨，其中有清朝派来为达延汗烧纸致祭的却典喇嘛旦巴格隆、丹增格隆、索诺木佐领章京、拉图札尔固齐、两名文书、披甲四名。此外还有结伴前来的察罕达尔罕曲杰的温波、喜饶喇嘛、科尔沁卓哩克图王的使者等。两位钦差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诏书和礼品，钦差和客人们还献了他们自己的绸缎、金银等礼品。阿巴王捎来了大批绸缎和镶嵌拇指大的琉璃宝石的金质曼扎等。上年四月达赖喇嘛派去北京的使者唐萨洛本洛桑嘉央在汉地去世，达赖喇嘛因扎仓和周嘉格隆的请求为他写了纪念祈祷文。达赖喇嘛下令由达尔巴译师等校订，依据伍由地方的底本刻印了《五部遗教》，还刻印了《秘密心要》和苯教的《十万龙经》等。

七日，由五世班禅出资，八日，由达孜台吉出资，南杰扎仓僧众举行会供轮法事，依止彩粉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喇嘛下令在15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八千颂、佛名号经、六字真言、药师佛等经咒的活动。十四日，王子仁特那兄弟前来向达赖喇嘛献清朝因达延汗去世所赐的助祭银一千两和大量绸缎等，再次为达延汗举行超荐，有的人说达赖喇嘛不必再次主持超荐，达赖喇嘛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做了广大的回向祈愿。当天，达赖喇嘛还因五世班禅的请求，担任堪布和阿阇黎，给五世班禅授了沙弥戒，因未能在一起受戒，达赖喇

嘛又另外给阿巴车臣夏仲的转世和额尔克台吉的托因二人授了沙弥戒。因清朝的法度严格，派来致祭达延汗的僧俗人士在完成公务时不得兼带私事，所以十五日却典喇嘛个人又向达赖喇嘛献净瓶、50两重的银锭20个、绸缎等百份礼品，其他香客和达延汗的次妃、彭措的夫人、尚敦丹嘉、清朝使者中的其他人也献了礼。又有人送来霍尔本尊穷的回向礼品马一百匹、盔甲等，达赖喇嘛又为其做了回向祈愿。

二十二日，达赖喇嘛给五世班禅及随同前来的达扎济咙、帕邦喀住持、哲蚌寺洛色林和郭莽扎仓的讲经师、阿巴车臣夏仲的转世、周嘉格隆、后藏的青年僧人25名等传授了格鲁派的依止大威德十三尊布画坛城的灌顶。二十六日，达赖喇嘛给80人授了比丘戒，给95人授了沙弥戒，给6人授了居士戒。从二十八日开始的5天中，达赖喇嘛到河中沐浴，由涅巴洛桑金巴负责，在林卡中搭起南杰扎仓1668年新制的两顶大帐篷，举行僧俗人士参加的排座宴会。

八月二日起的几天中，达赖喇嘛给达扎济咙、五世班禅传授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文集中的护法神的酬补、供养、祈愿等，又因五世班禅的强佐的请求，传授了五世达赖喇嘛自己文集的目录、祈愿文、随许法等。五世班禅及扎什伦布寺的人士想较长时间在达赖喇嘛身边听受教法，但达赖喇嘛考虑到五世班禅年幼（当时年仅8岁），须提防染上天花等疾病，所以没有同意，并在七日给五世班禅赠送绸缎、银器、瓷碗、氆氇、茶叶等礼品，为五世班禅送行。十一日和十二日，达赖喇嘛又给五世班禅传授了一些常用的教诫及一世班禅克珠杰所著的宗喀巴大师传的前言。十三日，五世班禅动身前，达赖喇嘛设宴款待他，并作了临别赠言。当天，达赖喇嘛还为门域的梅拉喇嘛送行。十九日，岗波活佛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岗波活佛因身

体肥胖，怕染上疾病，迅即离拉萨返回岗波寺，达赖喇嘛还给叶尔巴曲杰和鲁本墨尔根曲杰赠礼送行。

九月三日，达赖喇嘛给却典喇嘛、丹巴格隆、清朝使者中的章京、札尔固齐、科尔沁卓哩克图王的使者等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又下令在10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华严经、宝积经等经咒的活动，会见了协噶尔曲德的执事僧、继任阿巴车臣夏仲法座的噶居南喀坚赞等，给清朝使者中的丹巴格隆等18人授了沙弥戒，给73人授了比丘戒，清朝使者等人向达赖喇献了金质曼扎。当天达赖喇嘛还给华热地区、阿力克部落的香客89人授了比丘戒、给18人授了沙弥戒、给8人授了居士戒。达赖喇嘛为《西藏王臣记》、《十万般若颂》、《般若八千颂》、《贤劫经》的刻印写了祈愿文，为山洛阿升曲杰在安多强巴本林寺（炳灵寺）为弥勒大佛像贴金写了祈愿文，为汗达垄活佛兴建寺院写了向护法嘱托事业文，因颇罗宗巴的请求为他写了供养祈愿文，写了供索诺木佐领章京念诵的祈愿文。十六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和客人们传授长寿灌顶和六臂观音随许法，并给他们赠礼送行。达赖喇嘛还派恰那日沃噶丹寺的喇嘛洛桑群培和雅隆扎西拉巴为使者前去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以前达赖喇嘛给皇帝的表章中用“圣驾脚前奏请”，这次清朝使者带来的敕书中皇帝附带提到可不用此词语，达赖喇嘛说不好推辞皇帝的美意，因此这次写为驾前祈请，以略表恭敬之意。二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达波旺仁堪布、江洛坚喇嘛、贡噶管庙官、却央嘉措活佛等。厄鲁特部的吉雪活佛、楚琥尔乌巴什夫妇等500余人从厄鲁特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献了绸缎、金银等百份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大悲观音和叶衣佛母随许法，阿南达的夫人因阿南达去世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阿南达做了超荐法事，并为阿南达

夫人剃度出家。吉雪活佛向大昭寺、色拉、哲蚌、甘丹、扎什伦布寺的佛像献了敬神哈达和饰品。

十月一日，按照螺髻梵天的授记，达赖喇嘛下令在9个宗谿举行念诵甘珠尔等经咒的法事。由曲杰那沙林巴、阿旺拉桑、达摩鼐三人制造了许多“佐周达协”药。二十日，巴塘宗堆达尔罕噶居和察雅洛穷涅巴等向达赖喇嘛献茶叶、马匹等礼品。二十五日，达尔罕噶居向达赖喇嘛报告康区的情形。

十一月二日，墨尔根格隆到达拉萨，带来了准噶尔部中卓特巴巴图尔等人夜袭僧格扎都，并杀害了僧格扎都的消息，并向达赖喇嘛呈献了僧格去世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立即为僧格做了回向祈愿、焚化名牌的超荐法事，并出资点酥油灯，在三大寺熬茶斋僧。十八日，喀尔喀左翼嘉央活佛、诺门罕、土谢图汗、西策什里派遣来西藏迎请甘珠尔经的一百余人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献了绸缎等礼品。

十二月三日，达赖喇嘛派南杰扎仓的涅巴洛桑金巴携文书及供品去向螺髻梵天请求授记，又因吉雪活佛的劝请为僧格扎都的去世写了祈愿文。六日，由吉雪活佛和楚琥尔乌巴什担任施主，南杰扎仓举行依止彩粉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墨尔根济农的孙子博贝主仆百余人到拉萨，与达温热绛巴一起向达赖喇嘛献了大量礼品。八日，按照嘉央活佛的心愿，喀尔喀的使者们捐赠资财，南杰扎仓举行依止彩粉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噶玛噶举红帽活佛意希宁波向清朝请求准许他返回楚布寺居住，清朝同意，并向西藏发了敕谕，并派人护送红帽活佛返藏，但康区的罕都无故派兵侵扰汉地边界，阻止红帽活佛返藏，造成战乱，达赖喇嘛闻讯后，于十六日派札尔波洛桑勒丹去青海，设法平息纠纷，迎接红帽活佛回藏。

铁猪年（公元1671年　康熙十年）五世达赖喇嘛55岁

元月一日，达赖喇嘛向欲界自在天女献施食供养，举行主要是蒙古各首领参加的排座宴会。二日，举行按藏俗举办的有色拉寺和哲蚌寺各扎仓讲经师、堪布参加的庆祝新年的排座宴会。本年的历书由仲麦巴·桑结嘉措按浦派历算的实践编制。由杰那沙林巴、果摩拉巴阿旺赤列等3人受达赖喇嘛之命管理医药历算，为各个尊卑贵贱的病人提供治疗。九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洛桑顿月、王子达什、达孜台吉、扎西迥曲杰等人，给123人授了比丘戒、给140人授了沙弥戒。夏鲁哇钦波率僧徒30余人到达拉萨，并在十二日按布顿大师所传的长寿仪轨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在第巴使用新制红色印章而献给觉卧佛像、吉祥天女、护贝龙王的印新上题写了祝词。接着，达赖喇嘛在1个月中实行外部闭关，向夏鲁哇钦波请教了梅钦山巴钦波编目整理的《修心文类》、《萨迦五祖文集》、《修行法百门》等。十三日，车臣曲杰、墨尔根格隆等人到达拉萨，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绸缎、皮张等作为噶勒达玛和僧格二人去世积善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回向善业的仪式。达赖喇嘛给楚琥尔乌巴什夫妇等人传授了金刚手和六臂观音随许法，并赠送礼品为他们送行。

二月初，楚琥尔乌巴什等人行至藏北当雄，听到在准噶尔部的内乱中温萨活佛又击破巴噶班第的消息，因此在二月十一日楚琥尔乌巴什从当雄派人回拉萨，提出要甘丹赤巴等人前去，达赖喇嘛觉得这一要求太过份，但是由于格鲁派与厄鲁特的关系，宽宏大度地派遣两位堪布前去也不是不可以，因此派遣仲尼达尔达前往。吉雪活佛不愿返回厄鲁特，打算在西藏居住，以父母为对境进行修心，达赖喇嘛对他说，在现今这个悲痛时期进行修炼并无益处，还是应当返回厄鲁特去，但是达赖

喇嘛的这些话，并未能把吉雪活佛从追求寂乐的道路上拉回来。达赖喇嘛又下令在19个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药师佛、度母等经咒的活动。二十五日，达赖喇嘛向夏鲁哇钦波赠送绸缎、银元宝等礼品，夏鲁哇钦波一行动身返回后藏。1669年年底达赖喇嘛派索南旺杰去青海与蒙古各首领商议达延汗汗位的继承人问题，虽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由于达延汗是在狗年（公元1658年）即位的，而1670年又是一个狗年，虽然达延汗在位期间境土平安而且寿尽善终，但是只在位11年，因此一些人认为新汗不宜在狗年即位，故汗位又空悬一年。经过卜算，确定本年三月三日为新汗（仁特那王子，名彭措，亦译朋素克）即位的吉日，所以从年初起达赖喇嘛和第巴即派人通知上下各地僧俗人等。

三月三日，新汗身穿蒙古汗王的服装和皮袍，戴上有缨穗的帽子，身佩武器，登上宝座，达赖喇嘛赠给他绸缎、银器、茶叶、蔗糖、絮边坐垫等礼品，宣布新汗的汗号为丹增达赖汗。汗王的亲属达什等人在典礼上向达赖汗呈献了礼品。在地方首领、活佛、仲科尔当中，首先献礼的是名字吉祥的达孜台吉拉加热丹，接着是德钦、蔡巴、拉萨各大寺院、桑浦寺的林堆曲杰和林麦曲杰、达扎济咙活佛、霍尔仓曲杰、喜培活佛、萨迦达钦、乃东孜、扎什伦布寺坚赞团布拉章、主巴噶举噶尔巴的代表、嘉日夏仲、达波和工布各首领以及拉萨的僧俗民众等。在蒙藏首领的排座庆宴上，由萨哇珠巴桑珠杰波诵读经典，表演了器乐歌舞，拉萨泽居哇和墨如哇表演了跳神，如细和乃旬宁孔等歌舞队表演了歌舞。四日，甘丹寺、那烂陀寺、达垄寺、白居寺及朗卡子、第巴彭多哇、吞巴、后藏地区的仲科尔等献了礼品。五日，达赖喇嘛、达赖汗等人到大昭寺，继续接受各地僧俗人士的献礼祝贺。此时达赖喇嘛的手脚又出现

病痛，由翁则和却本二人服侍，睡眠时则由格隆嘉央扎巴照料，由典康本仓、仲措哇拉桑、达摩哇二人诊病治疗，不久病痛平复。二十七日，掘藏师仁增钦波前来，为达赖喇嘛做了驱魔祈福的仪轨法事。

四月初，温萨活佛派定结措索巴前来拉萨，给达赖喇嘛送来信件和礼品，还呈献了僧格扎都从白头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征集的税赋中计划献给达赖喇嘛的黄金 1000 钱，以及温萨活佛献的佛像及黄金 1000 钱，达赖喇嘛给僧格年幼的儿子们回赠了珍珠包，还给温萨活佛捎去详细的口信。从十日起的 5 天中，达赖喇嘛用扎杰莫温泉的泉水洗浴，消除病痛。典康本仓献了许多医学口诀，达赖喇嘛赐给助缘和奖品。二十三日，达赖喇嘛赠给萨迥以墨尔根台吉的名号，给仁钦以车臣台吉名号、给博贝以额尔克济农名号，并赠给衣帽、印章、水晶、茶叶、氆氇、油漆皮箱等，给他们传授了随许法，他们前往青海。二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了绛孜曲杰、达扎济咙、阿里扎仓和达波扎仓的洛本、泽当强佐、工布地区的首领等。达垄夏仲玛钦去世，派强佐和索本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并赠送了礼品。哉务霍尔仓曲杰向达赖喇嘛请求传授教法，达赖喇嘛给他和喜培活佛、工布扎西热丹、第穆哇的喇嘛等人传授了文殊、七目白度母、大悲观音、六臂观音的加持法等，并传授了一些教诫，赠给霍尔仓曲杰袈裟、氆氇等，为他返回“大司徒都元帅”的法座送行。

五月一日起，哲蚌寺僧众 300 人、甘丹寺以甘丹赤巴为首的僧众 300 人、色拉寺僧众 200 人、拉萨四部的僧众 300 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绸缎、茶叶、布匹及诵过经咒的曼扎等，并念诵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吉祥祝词。达赖喇嘛给 130 人授了比丘戒，给 120 人授了沙弥戒。五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汗及其少数

臣仆传授了长寿灌顶及红色度母随许法、六臂观音护持等。十日，南杰扎仓举行初十跳神活动，达赖汗王臣亦前往观看，达赖喇嘛给将返回藏北的400多名蒙古人传授了加持法。十二日，第巴罗桑图多去扎杰摩温泉，次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达赖喇嘛下令从五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之间，由前后藏的萨迦和格鲁派的30座寺院及其有关的宗豁轮流举行念诵甘珠尔、十万般若颂药师佛、度母等经咒。

六月二日至五日，由第巴出资，在布达拉宫大殿由南杰扎仓僧众举行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五日，达赖喇嘛会见新就任的桑浦寺林多曲杰、达垄强佐、诺颜呼图克图、喀尔喀诺门额津的子侄等。达赖喇嘛给鄂齐尔图车臣汗的使者传授大悲观音随许法，为之送行。1669年七月，小昭寺的一面墙壁突然倾倒，由第巴罗桑图多负责，从1670年开始维修，至1671年年中完工，为重修殿墙、殿顶用去铜163克、黄金7180钱、银21541钱，还修缮和新塑了佛像、神像等。十五日，因恰达曼隆巴钦波洛却多吉圆寂，派人送来了他的一套袈裟，达赖喇嘛派人送去了绸缎和写有题词的敬神哈达，并在僧众集会上祈愿曼隆迅速转世。又派康萨热丹送去了超荐法事的助缘粮食、茶叶、绸缎、哈达等，以及为建造纪念曼隆巴的佛像捐赠的白银150两、黄金1两。达赖喇嘛还为达赖汗献给护贝龙王的敬神哈达书写了题词。二十二日，达赖喇嘛给仲麦巴·桑结嘉措及南杰扎仓的僧人传授了无垢仙人教诫、猛咒除病灌顶及随许法等。三十日，达赖喇嘛又给仲麦巴·桑结嘉措传授了根本灌顶及加持、随许法等。

本年中，经第巴罗桑图多安排，由囊索官却和贝那仁钦负责在唐波且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甘珠尔部分完成，用去黄金

540两。第巴为自己净除罪障，又用黄金132两、白银373两写造了一部甘珠尔。拉堆协噶尔两位宗堆等人写造了墨写甘珠尔。

七月五日，达赖喇嘛为这三部甘珠尔写了建造记及后记等。二十六日，作木朗王的使者巴查纳热扎及翻译伦珠前来，递交了作木朗王的手书及礼品。

八月二日，第巴罗桑图多建造的嘉央官却群培以前的历任甘丹赤巴的唐卡画像由23位学者画成，达赖喇嘛为此写了前言及祈愿文。八日起的三天中，达赖喇嘛用河水洗浴。十日，达赖喇嘛会见热振堪布、达扎济咙活佛、厄鲁特车臣汗的使者等。

九月二十七日，察罕诺门罕活佛从青海来拉萨，向达赖喇嘛献黄金百两、马一百匹以及茶叶皮张等。三十日，达赖喇嘛给130人授了比丘戒，给察罕诺门罕活佛为首的270人授了沙弥戒。

十月一日，达赖喇嘛给察罕诺门罕传授长寿灌顶及六臂观音四灌顶加持法等，永谢布鲁官台吉向达赖喇嘛献马15匹。四日，达赖喇嘛给仲麦巴·桑结嘉措传授长寿灌顶。十三日，墨尔根洪台吉的两位夫人及儿子从青海前来，甲尔波哇洛桑勒丹向达赖喇嘛详细报告了前去青海办事的情形。

十一月二日，达赖汗及其王妃、儿子及大队随从到达拉萨，上午在布达拉宫大殿会见达赖喇嘛，相互问候。下午许多蒙藏人士前来拜见，墨尔根洪台吉的两位夫人向达赖喇嘛献绸缎、银两等百份礼品，哉务霍尔仓曲杰的使者献马32匹、骡子49头。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昌都济咙活佛、苯教雍仲学者古东伦珠、那仓拉加布等。二十七日，哲蚌寺哈尔东康村僧人向达赖喇嘛献礼并设宴款待达赖喇嘛。为达垄夏仲阿旺扎西

贝珠的圆寂，其强佐洛桑阿旺写造甘珠尔，达赖喇嘛为其写了题记和祈愿文。达赖喇嘛会见了夏琼堪布意希嘉措和厄鲁特左翼岱青和硕齐的夫人和儿子、女婿等，达温曼殊室利曲杰向达赖喇嘛献了大批汉地和蒙古的物品。汉地一位懂得医学的和尚巡礼汉藏各个佛教圣地，经打箭炉顺利来到拉萨，拜见达赖喇嘛，他善治眼病，达赖喇嘛认为这对众人有益，就派仲措哇拉桑跟他学习治疗眼病，并为此赐给他白银10两、衣服一套，但汉僧将银两退还。汉僧想要去印度，达赖喇嘛赐给他沿途通行的文书，并命达尔巴译师把文书译成印度语，由果巴哇用兰扎体书写，使汉僧大为高兴。仲措哇用汉僧的药方冶病，使一些人眼睛复明，不过仲措哇没有向汉僧学习其他的医术，达赖喇嘛说这是由于骄傲自满的习性难改的缘故。

十二月中，清朝的使者梅林章京阿景岱、博济章京、玛努札尔固齐等俗官9人以及为察罕塔颜齐去世进藏做回向法事的香客等抵达拉萨。其中的强林安木齐桑结迥乃从京城出发时是同行的香客，但是过了唐古拉山以后成了朝廷的使者之一，使达赖喇嘛难以理解。二十日，清朝使者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礼品，达赖喇嘛设宴款待清朝使者和同来的香客。二十一日清朝使者及香客等向达赖喇嘛献了绸缎、金银等礼品，递交了内外王公、活佛、官员等人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年底，达赖喇嘛举行了制服时敌的文殊咒语念诵仪轨。

水鼠年（公元1672年 康熙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56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欲界自在天女呈献供养、施食。在元旦的庆贺新年宴会上，参加的有以达赖汗为首的蒙古各首领、清朝的钦差、尼泊尔阳布王的使者等，第巴达尔巴译师和朗布莆居美二人依据经典诵读了吉祥祝词，还演奏了汉地、印

度的器乐，表演了各种舞蹈等。达赖喇嘛因西藏各地的服饰几经变易，尤其是贵族官员的衣帽、饰品等各行其是，难以区分高低尊卑，在仲麦巴赤列嘉措任第巴时就想统一规定服饰等级，但没有办成，以后由第巴罗桑图多负责，召来达那沃伦巴进行考察设计，并参考了乃东孜和拉堆绛贵族官员的服饰，规定了僧俗官员的官服和饰品等。在一月二日的有达赖汗、清朝使者、三大寺堪布、僧俗仲科尔参加的宴会上，有职司的官员都按规定统一了服饰，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吉祥八徽、国政七宝及八吉祥物。并由以翁则官却嘉措为首的十余名僧人祝赞吉祥，由第巴格布哇一边祝赞吉祥八徽、八吉祥物，一面将物品献到达赖喇嘛手中，由达尔巴译师和萨哇珠巴嘉央旺波依据经典讲说吉祥祝词。达赖喇嘛近些年来一直很想去参加拉萨正月祈愿法会，都因担心在人多的地方染上感冒引发手脚病痛而未前去，今年是规定官员服饰后头一次举行祈愿大法会，达赖喇嘛更想去参加，但最终还是因为对身体状况没有把握而未去成，于三日派第巴前去参加。六日，强林安木齐捐赠大量物资与南杰扎仓僧人一起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因强林安木齐的请求撰写了供北京的僧人们念诵的偈颂，因翁则洛桑云丹的请求撰写了百种食子施食法。第巴拉嘉里的三个儿子同时举行继位仪式，达赖喇嘛派甲尔波哇洛桑勒丹等前往。达赖喇嘛说以前除少数地方首领外，没有举行地方首领继位仪式的例规，更何况三个人同时举行仪式，这只会加重差民的负担，因此一些人比喻这是不惊动母鸡而取走鸡蛋的办法。十五日，夏琼曲杰捐资在南杰扎仓举行依止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献以白骆驼为首的百份礼品，墨尔根和硕齐的夫人也献了绸缎、金银、茶叶等物品，车臣汗的女儿那玛塔尔从远方给达赖喇嘛捎来了大量物品。十八日，鄂齐

尔图车臣汗专门派遣的噶居桑结扎西到达拉萨带来大批物品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洛桑顿月、绛孜曲杰、拉仁波且、第巴德钦巴父子等。二十六日，清朝的使者们到达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讲述了罕都在汉藏边界地方破坏法度的情形，翻译了皇帝的圣旨并做了各方面的解释，达赖喇嘛即设法进行补救。因诺颜呼图克图在途中身体不好，达赖喇嘛又派都哇扎仓卸任堪布温都尔曲杰代替他前往。囊索官却达吉带来唐波且写造的甘珠尔的部分样品，请达赖喇嘛过目。

从二月一日起的6天中，达赖喇嘛给多吉扎仁增活佛、掘藏师德达林巴兄弟、却本、格隆嘉央扎巴等人传授了无量寿、曼达罗、大悲观音、八大法行、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的灌顶加持等教诫。七日，达赖喇嘛会见夏鲁堪布古尚仁钦钦则却珠、嘉林堪布阿托巴、恰那巴等，给拉堆甘宁活佛剃度，起名为邬金丹增诺布，给仁增多丹旺波的转世起名为勒旦丹增贝拔。从二十日起，达赖喇嘛腰部感到疼痛，故在中午因却本的请求给前去当雄的王子达什送行后即闭门休息，由两位医生诊治，仲措哇拉桑怀疑是瘟热，达摩哇认为是染上传染疾病，并给开了汤药，达赖喇嘛认为前几年不时有天花流行时，自己都没有传染上，现在没听说有天花流行，自己怎么会传染上天花呢，所以心存怀疑，又请本仓强俄巴前来诊断，强俄巴也说可能是传染疾病。二十二日，达赖喇嘛骨头酸痛，根据病情和擦绒章松贝丹坚赞的医书看，确定为染上了天花。由本仓强俄巴及其学生仲措哇拉桑和达摩哇用药治疗。达赖喇嘛患的是天花中的轻型天花（藏语称为白天花），但是第巴等人认为应当保密，所以对外只是宣布达赖喇嘛手脚疼痛的旧病复发。在达赖喇嘛病重的几天当中，由仲麦巴·桑结嘉措昼夜服侍，却本、

翁则、格隆嘉央扎巴三人也在身边服侍，因此次病情比以往都重，出现了发烧昏迷的情况。达赖喇嘛说他夜间可能使却本等人也感到厌烦。达赖喇嘛患病期间，多吉扎活佛在7天中为他做法事，向唐古拉山神献供。

三月中，达赖喇嘛所患天花病逐渐痊愈，又从堆龙扎本莫温泉取来泉水洗浴3天，以治疗手脚肿痛，又用涂抹酥油的办法进行治疗。

四月一日，达赖喇嘛派昂仁桑珠噶丹寺的上师洛桑丹培和江洛坚丹增贝桑为使者去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奏表中说愿遵奉皇帝和好汉蒙政务之旨意而行。达赖喇嘛还设宴款待清朝的钦差及同来的香客等，并对他们带来的内外王公的信函一一写了回信。强林安木齐又向达赖喇嘛献无量寿佛像、银元宝4个、绸缎等礼品。达赖喇嘛因为天花顺利痊愈而派人到曲科杰、乃穷、桑耶、拉穆、唐波且等地向护法神呈献供养。四月二日起，索康·顿珠旺杰等在拉萨的仲科尔纷纷前来献礼，祝贺达赖喇嘛病愈。八日，达赖汗及其臣下、哲蚌寺吉索和各扎仓堪布、康村等也因达赖喇嘛病愈送来大批礼品。十日，达赖喇嘛派蔡公堂的羊官寺曲杰措切去厄鲁特担任鄂齐尔图车臣汗的上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汗及其儿子拉藏鲁旺(白）等传授了长寿灌顶，会见了达延汗的大小乌尔格的官员、拉嘉里派来送礼的使者以及墨竹恰噶京俄等。五世达赖喇嘛见到四世达赖时的一本记事册，将各地僧俗首领按地位高低排列，第一是汉地的皇帝，其后是萨迦达钦、乃东王、达垄、噶玛噶举红帽黑帽活佛，以下是甘丹赤巴、扎什伦布、岗波、止贡巴、主巴、楚布仲巴、帕巴拉等活佛，以下是类乌齐曲杰、多吉扎、桑顶活佛、觉热、铁桥、第穆活佛、乃宁夏仲，以下是夏鲁、桑浦林堆、林麦曲杰、达扎济咙、森康贡活佛、阿

旺、司徒、尼德、迪扎活佛、喀尔喀强巴、东科尔、嘉央、杰康孜活佛、丽江土司、察哈尔王、济农王、喀尔喀和厄鲁特各王，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等级排列已经过时，应当参照现今情况仔细分析。

五月三日开始的7天是“雪顿”，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应阿里拉达克堪布达吉南杰的请求，给阿里拉达克的58座格鲁派寺院3900多名僧人发放每人一个半涅嘎的茶叶、每10人一两银子的布施，并派扎西孜鼐和彭波江郊巴前去办理，并由第巴给拉达克德丹王写了信。八日和十日，桑顶活佛和扎什伦布寺强佐彭措热丹及各扎仓的堪布等、第巴日沃扎巴、吞·日伦巴等送来大批礼品，五世班禅也捎来了绸缎等礼品。达赖喇嘛认为以前没有一份明确的排列座次的文书，在僧俗首领集会时容易造成错乱，因此下令编定新的座次文书，规定各僧俗首领在集会时坐垫的高低、质料等，以符合各人的身份地位。按新定的座次文书规定，达赖喇嘛的坐垫最高，为五双（即十层坐垫）；其次是萨迦两位达钦，为四双（八层）；再次是泽当协敖、乃东孜、达垄法王、噶玛噶举黑帽活佛、红帽活佛，为三双半（七层）；再次为甘丹赤巴、扎什伦布、主巴、岗波、楚布仲巴、帕巴拉等活佛，康区类乌齐曲杰，为三双（六层）；第巴的坐垫比此稍低（五层）；再次为多吉扎、博东觉热、羊卓桑顶、森康贡、康区达扎济咙、第穆、甲山巴（铁桥）、喀尔喀嘉央、强巴、杰康孜、东科尔、乃宁、格热拉巴等活佛或法台，为两双（四层）；再次为夏鲁堪布、措德细堪布、桑浦寺的两位曲杰（林多、林麦）、洛扎的迪扎、巴俄、涅热察雅、四位司徒的转世、哉务霍尔仓曲杰等，为三层坐垫加靠背软垫；再次为甘丹绛孜曲杰和夏孜曲杰、乌尔多善巴、嘉色喜培、噶举派哉务、珞商珠、头色达哇、热穷浦、康区阿

旺、觉热卓衮、拉孜珠旺等活佛、那烂陀觉杰巴、扎西孜的首领、类乌齐巴、噶尔巴哇、岗波和格热的贵族、昂仁、阿里赤孜、桑丹、岗坚曲杰、曲科伦波、达尔章莫切、伦孜、纳塘、俄尔、色多坚、白居寺、图丹南杰、襄日沃格培、杰蔡贡、扎强林、扎塘、日沃德钦、泽当阿却巴、坚叶巴、涅德柱、塔尔巴、精奇、热振、觉摩隆、桑阿喀等寺院的堪布、恰域、墨竹恰噶、德庆羊八井的京俄、曲嘉德达林巴、桑耶噶波哇、达那卓玛哇、乃细巴等密咒传承师，为五层薄垫；再次为扎觉扎哇、艾扎那哇、拉堆色加喀哇、贡噶管庙官、曲杰扎桑巴、泽当绛玛哇、涅多哇和拉萨三大寺、曲科杰寺、扎什伦布的各个洛本等，为三层薄垫；再次为浪卡子、拉、恰、吉雪、达垄的首领及萨迦达钦的夫人，为四层卡垫；乃东孜的主母为三层卡垫。因为顺治和康熙初年派到西藏的朝廷的使者大都由蒙藏佛教僧人担任，而他们在宗教上的地位一般都不高，所以座次文书中规定对清朝皇帝的使者铺五层薄垫，与甘丹寺夏孜曲杰、绛孜曲杰的地位相等，比印度、尼泊尔等小王的使者高好几级。对蒙古汗王的坐垫视具体情况而定，最高是喀尔喀的汗王，稍低一点的是达赖汗、车臣汗等厄鲁特的汗王。达赖喇嘛还规定在新的排座宴会上，在自己的坐位附近给仲麦巴·桑结嘉措和森本、却本等主要侍从执事铺设坐垫，高度为五层或三层薄垫。十六日，日次沃德钦、坚叶、巴日等穷结地区的寺院出资在南杰扎仓修供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九日，达赖喇嘛为扎什伦布等寺院前来献礼的人员送行，应扎什伦布强佐和洛本等人的请求，达赖喇嘛撰写了祝愿自己和五世班禅长寿的祈愿文。

闰五月一日，固始汗的第四个王妃及王子达什、哉务噶觉活佛、泽当强佐、夏鲁洛本等人前来向达赖喇嘛献礼。五日，

达赖喇嘛再次为康区的事务派甲尔波哇洛桑勒丹去青海。六日，由达赖喇嘛任堪布、帕邦喀洛本任轨范师给哉务噶觉活佛授了比丘戒。七日，达垄夏仲衮邦巴前来会见达赖喇嘛，赠送马60匹等礼物。九日，达赖喇嘛给达垄夏仲、上密院洛本等人传授了长寿灌顶。十一日，夏鲁堪钦到达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一个多月中向他请教喜金刚灌顶、大鹫护法、空行母、不动金刚等教法。二十七日，准噶尔部噶尔丹洪台吉派遣的使者到达，向达赖喇嘛呈献大批礼品。

六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因准噶尔部噶尔丹洪台吉尽心光大佛法，广施顺缘，故赐给噶尔丹红色印章和印匣，同日，喀尔喀部杰康孜活佛的使者到达。十六日，达赖喇嘛给夏鲁堪钦、掘藏师却吉杰波、仲措哇阿旺拉桑、达摩哇、却本阿旺喜饶等人传授了宇妥巴的医学精要、嘱托护法、医药天女随许等。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拉仁波且以及喀尔喀部噶勒丹哈坦巴图尔为强巴活佛圆寂派来的致送回向礼品的使者，尼泊尔叶楞王的长女招朗塔森哈古玛拉扎呼为婿，派噶玛拉为使者，携书信和礼品前来，请求达赖喇嘛给以护持。

七月十七日，达赖喇嘛前去河中洗浴。十八日，达赖喇嘛会见了带来书函和礼品的作木朗王的使者扎那跋纳陀。因以前的大帐篷已不适用，第巴又新制一顶大帐篷，起名为“南恩宣巴”（青天童子）。十九日，达赖喇嘛在大帐篷内举行宴会，参加的人有多吉扎活佛、扎西孜的温仁波且、德顿仁增钦波、羊卓万户、作木朗王的使者等。

八月一日，强林堪布、以卓贝德哇为首的工布僧俗人众向达赖喇嘛献礼，另有从安多地区来的申中囊索叔侄献银300两、马13匹，以及绸缎茶叶等，鲁本温波献马10匹、鲁本才旦献马23匹、洛桑丹达献马12匹。十一日，馆觉噶居洛桑彭

措圆寂，送来回向礼马 46 匹、骡子 65 头。华热囊索扎巴坚赞送来马 49 匹，玛赖墨尔根台吉送来马 11 匹。

九月三日起，达赖喇嘛用止贡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7 天，以后又用墨竹如托温泉的泉水洗浴手脚两天。十二日，白居寺卸任堪布云丹僧格向达赖喇嘛献马 15 匹、止贡强佐献马 14 匹、第穆温波索南诺布献 50 两的银元宝 10 个、银 300 两、茶叶 700 包、马 5 匹、带驮鞍及垫子的骡子、犏牛各 100 头。从十三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两个 7 天，进行修炼。

十月一日起，达赖喇嘛向多吉扎活佛、温仁波且、德顿仁波且、佐钦活佛、却本阿旺喜饶等人讲授春天没有讲完的经教。十三日，从厄鲁特部返回拉萨的热振卸任堪布丹巴达吉请求向达赖喇嘛报告厄鲁特的情形，当时虽然正是第穆温波出资为祈愿达赖喇嘛长寿举行法会之时，达赖喇嘛还是在法会上会见了丹巴达吉。丹巴达吉是 1660 年三月因厄鲁特首领的要求由达赖喇嘛派去厄鲁特的，在厄鲁特蒙古生活了 12 年，据丹巴达吉说，当卓特巴巴图尔一伙被僧格抓获监禁时，卓特巴巴图尔的人为欺哄僧格，提出给卓特巴巴图尔划分 50 户属民，保证今后保持和平安定时，哉务活佛南喀桑珠不察时势，打算要求僧格分给卓特巴巴图尔三分之一的部落，由哉务活佛担保和平，热振堪布说在这兄弟互不信任的浊世，不能在仇人之间当这样的但保人，而加以阻止。达赖喇嘛说，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如果照哉务活佛的主张办，那就会骗了各方施主，对不起地下的死者，在地上留下话柄，使得以后再不能派人到各个地方去办事了，所以哉务活佛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十九日，达赖汗及其王妃、儿子、达延汗的两个乌尔格的首领等从当雄来到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并做了广泛交谈。一个名叫热夏纳邬达雅的班智达前来，向达赖喇嘛献印度佛教圣地的泥

土做成的泥丸和菩提树叶，并献一首赞颂达赖喇嘛的梵文诗，由达尔巴译师译成藏文，众人都很喜欢，达赖喇嘛赠给他黄金等物品。二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和款待达扎济咙活佛、热振卸任堪布丹巴达吉、哲蚌寺的六位洛本、曼殊室利活佛、喀尔喀七部的使者以及达尔鼐索南伦珠多吉等人。以嘉央活佛和土谢图汗为首的喀尔喀各部首领捎来了书信和礼品，并由使者转达了口信。在三天之中，达赖喇嘛给661人授了沙弥戒，给305人授了比丘戒。二十九日，达赖喇嘛给喀尔喀部的使者传授随许法，为他们送行，并给喀尔喀各首领捎去了回信和礼品。

十一月一日，土尔扈特部的衮布伊勒登在与他哥哥和侄子的斗争中失败，丧失了权势，又年事已高，身体有病，独自前来西藏，担心会突然故去，所以一到拉萨就要求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会见了他，并和他做了详细交谈。月中，第穆活佛的温波从康区派人前来，请求达赖喇嘛帮助查认第穆活佛的转世灵童，达赖喇嘛在佛像前占卜、请求护法神指示后，确认在工布出生的转世灵童是第穆活佛的转世，为之命名为官却索南旺秋，将来人遣回。二十二日，喀尔喀部阿克岱青的儿子察罕前来，向达赖喇嘛献绸缎、茶叶、银两等，昆都仑乌巴什的夫人索南杰莫向达赖喇嘛献金银茶筒、银盘、绸缎、茶叶等百份礼品。厄鲁特部的王妃玛噶达献马50匹、骆驼36峰，噶丹热绛巴献马30匹。厄鲁特部的一位首领毕力克额尔克台吉因内乱而流落在白头人（信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地区，因该处没有佛法，台吉又从该地逃出，来到拉萨。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他，并给帮助台吉从白头人地区逃出的一位扎什伦布寺的翁则喇嘛赠予达尔罕曲杰的称号。达赖喇嘛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想为他们建立定时祭祀的法事，此时第巴又劝说鼓动，

达赖喇嘛遂决定进行。因父亲顿都热丹崇信的是宁玛派的教法，而母亲赤坚贡噶拉则只崇信萨迦派教法，所以达赖喇嘛规定每年四月在邬金敏珠林寺为顿都多吉做修供大悲观音菩萨的法事，在雅隆扎西孜曲德寺为赤坚贡噶拉则做修供喜金刚的法事。以后在木虎年（公元 1674 年）又为此规定在多吉扎、艾旺觉噶举行无量寿甘露漩和三身总集的修供法事。卸任甘丹赤巴洛桑坚赞圆寂、衮布伊勒登去世，呈献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说在火化衮布伊勒登的名牌时出现了往生天界的景象，按理蒙古人杀生食肉难以转生善趣，但是有许多蒙古人得以转生天神或人类，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虔诚信仰三宝的缘故。

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上半月，达赖喇嘛的脚病又稍微加重，由达摩哇曼仁巴敷药治疗，并由德顿仁波且做了除障驱魔法事，脚病平复，但左手指节又开始疼痛，由翁则和格隆嘉央扎巴二人服侍。年底，在森穷康松陈列了新年排座宴会上所用的 49 种装饰品，做了认真准备。

水牛年（公元 1673 年　康熙十二年）五世达赖喇嘛 57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因为手疼没有参加向三界之主献供的仪式，不过仍然参加了庆贺新年的排座宴会，参加宴会的有以达赖汗为首的厄鲁特部的一些首领，喀尔喀岱翁洪台吉、索特巴伊勒登、察罕，共有大首领 8 家、小首领 75 家，以及他们的夫人、宰桑等，还有各地来献新年贺礼的人们。元月二日，除嘉日哇、达孜、蔡巴三家外，其他西藏各地首领和囊索等都按规定的服饰穿戴，前来参加宴会。从三日起的几天中，达赖喇嘛手指节的病痛有发展之势，后经仲措哇拉桑和达摩哇二人治疗，有了很大的好转。喀尔喀杰康孜活佛在来西藏的途

中圆寂，十八日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并写了祈愿活佛迅速转世的祈请文。二十九日，喀尔喀岱翁洪台吉向达赖喇嘛献50两的银元宝9个、银茶筒、绸缎茶叶、骆驼58峰，索特巴伊勒登献60两黄金制的曼扎、银砖、茶筒、瓷碗、茶布、骡子104头、骆驼50峰，哉务诺门罕献银曼扎、马2匹、骆驼23峰，其他首领和僧人也献了礼品。达赖喇嘛会见了王妃索南曲宗及其儿子、达孜台吉父子、毕力克额尔克台吉、玛木特巴图尔台吉、玛赖墨尔根台吉等。

从二月二日起的3天中，达赖喇嘛用墨竹如托温泉泉水洗浴，以后又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额尔克岱青都尔格齐、都尔伯特却克图、王妃索南才旺、第巴彭多哇、贝康堪布、多巴囊索等人，为林多曲杰洛桑嘉措的转世剃度，起名为阿旺宣努。十三日，热振卸任堪布丹巴达吉向达赖喇嘛献50两的银元宝21个以及绸缎等，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五日，准噶尔噶尔丹洪台吉派使者措索热绛巴向达赖喇嘛献50两的银元宝14个、75两的银茶筒、大量的黄金、绸缎等，并出资在南杰扎仓举行修供坛城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热振卸任堪布丹巴达吉献金银、绸缎、皮张等万份礼品。喀尔喀索特巴伊勒登的儿子拉尊卓衮要在哲蚌寺入寺学经，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入寺礼品。丹巴达吉从厄鲁特带来的两位乐师表演了吹奏乐器（可能是口琴）和舞蹈。十八日，达赖喇嘛给岱翁洪台吉、察罕、乌克热台吉等100多人授了居士戒、沙弥戒或比丘戒，并给岱翁洪台吉起名为拉尊阿旺丹增。二十五日起的3天中，达赖喇嘛用卓甘扎的温泉水洗浴，以医治脚病。二十九日，达赖喇嘛给察罕等人传授随许法送行，并赠给玛久台吉之子推巴噶以卓哩克图额尔克岱青名号。三月十日，达赖喇嘛会见止贡和扎什伦布寺强佐、达波旺仁巴

等，命第巴负责建造缎绣大佛像，长25庹，宽17庹，至本年六月完成。二十五日，第巴罗桑图多生病，由仲措哇拉桑和达摩哇诊治，次日，达赖喇嘛前去探视第巴病情。为达赖喇嘛和第巴的健康，下令在前藏主要大寺院举行祈福法事和向僧众布施茶饭。给色拉哲蚌两寺每5名僧人一钱黄金，其他寺院每名僧人一两银子，共用黄金740钱、银2538两。又在前后藏各教派二级以上的寺院熬茶。给前藏僧尼每15人发银一两，给后藏僧尼每20人发银一两，共用银2234两。又给前后藏僧俗及政府、寺院、贵族的农奴每户发青稞1—3克（每克约28斤）。

四月一日，达赖喇嘛下令在各宗豁举经念诵甘珠尔等经咒的活动。并再次给僧众发放金银等布施，用黄金740钱、银子4772两，农奴差民每岗地给青稞3克，堆穷每一大户给青稞两克，每一小户给青稞一克。放生鱼43895条，给修缮佛塔、道路的乌拉发粮食182394克。

五月上半月雪顿节期间，达赖喇嘛用德卓崖涧之水洗浴7天。九日中午，岳地方降了以前未曾有过的大冰雹，连鸽子、老鹰等飞禽也被打死，一些人说这可能与噶玛巴两位活佛想要返藏有关。十四日，达赖喇嘛的侍从达如哇洛桑欧珠去世，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十六日，前世温萨活佛的森本额尔克曲杰圆寂，派人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十九日，按照清朝皇帝的命令，平西王（吴三桂）派人护送噶玛巴红帽活佛抵达拉萨，达赖喇嘛派人设灶郊迎。红帽活佛拜见达赖喇嘛后，又去拜见达赖汗，然后前往楚布寺。

六月四日，应喀尔喀拉尊阿旺丹增和索特巴伊勒登等人的请求，达赖喇嘛派德柱堪布洛桑达吉前去喀尔喀，协助调解喀

尔喀各部之间的关系。十二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汗等人传授长寿灌顶后，达赖汗前往当雄。卸任甘丹赤巴官却曲桑去世，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十四日，桑浦寺僧众前来向达赖喇嘛献曼扎等，并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会见达扎济咙活佛、色拉寺执事僧、新近从厄鲁特前来的刚坚堪布官却仁钦等。二十日，为防止疾病在藏区蔓延，达赖喇嘛下令在各个宗举行念诵永宁地母十二尊经咒的法事。

七月五日，以丹增喇嘛和山洛阿升额尔德尼热绛曲杰为首的清朝钦差到达拉萨，同来的还有辛达贝勒的上师阿里热绛巴、额尔克王的上师仲孜热绛巴等。钦差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书和礼品，转达了皇帝对达赖喇嘛的问候，并讲说双方各地的时事情形。六日，清朝使者和同来的香客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他们自己的绸缎、金银、茶叶等礼品，西藏上次派往北京的使者桑珠噶丹喇嘛和江洛坚也献了礼物。香客们还送上却典喇嘛、鄂尔多斯嘉木措公、才仁台吉、达尔吉台吉、额尔德尼台吉等去世的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超荐法事。汉藏各地还有许多人捎来了书信和礼品，花了几天时间接受登记。达赖喇嘛对乌克热台吉的儿子噶居洛桑丹增赠给额尔德尼达尔罕曲杰的名号，并赠送印度铜佛像、氆氇等送行。十一日，鲁本墨尔根曲杰献了他的施主和和他本人所赠的50两的银元宝7个以及金银、玉器、绸缎等汉地的物品。那仓才加布兄弟为其妹去世献回向礼黄金一百钱以及甲胄等，达赖喇嘛为她做了超荐法事。从三十日起，达赖喇嘛5天中到河中洗浴。

八月五日，达赖喇嘛前往桑珠颇章，参加达赖汗接受清朝皇帝赏赐的仪式，会见了达赖汗和清朝使者等。还会见了洛本阿旺扎西、止贡布龙喇嘛、古东彭措南杰等人。九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们和桑珠噶丹、桑阿绛曲林僧人传授长寿灌顶

及加持、随许法等。十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远道来的香客等授戒，给 99 人授了沙弥戒，给 104 人授了比丘戒。十四日，清朝使者一行前往后藏，行前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

九月二日，安多、哇秀等地的香客向达赖喇嘛献了马 400 匹、热振堪布阿里巴献带鞍具的马 40 匹。二十五日，在清朝使者离藏返京前，达赖喇嘛设宴款待他们，并派贝康堪布嘉周和吉朵巴二人与他们同行，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喜培活佛、甲域堪布、昂仁堪布、恰那、桑林、绒噶丹曲林、唐萨等寺院的洛本、色多托因、第巴伦波宗巴等人。噶玛巴红帽活佛要求从楚布寺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手下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不得不来，按噶玛巴以前的作为，不应当给以礼遇，达赖喇嘛还是决定派马队出迎，铺设与止贡、达垄首领等高的坐垫，给予适合的礼遇，并和噶玛巴进行了交谈。达赖喇嘛说噶玛巴在教法和世俗两方面见识不广，有其上辈却吉旺秋的遗风。

十月，因罕都在汉藏边界用兵，使得噶玛巴黑帽活佛在中甸无法居住，达赖洪台吉派协本卓盘、达尔吉扎西等带兵前去迎接护送。黑帽活佛到达拉萨前，达赖喇嘛按对待红帽活佛的规格，派人设灶郊迎。六日，黑帽活佛却英多吉到布达拉宫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设宴款待他和随行的巴俄、孜拉岗活佛，并互赠适当的见面礼品。十日，喀尔喀左翼达尔罕洪台吉去世，送来了金银等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十三日，虽然热振卸任堪布丹巴达吉要求留在西藏过静修僧人的生活，但达赖喇嘛考虑到尽快让他去蒙古对喀尔喀、厄鲁特各部都有利益，所以还是给他赠送物品，为他送行，并赠给他席力图诺门罕的名号。十五日，达赖喇嘛给夏鲁哇钦波、德顿仁增钦波、工布宁浦活佛等传授长寿灌顶和金刚灌顶等。十六

日，仲尼达尔达从厄鲁特返回拉萨，达赖喇嘛会见车臣汗的使者格勒格隆、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达尔果曲杰、阿勒塔尔台吉的使者、喀尔喀乌伦汗额尔克的使者。从二十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行，至出关前将外面的事务托付给仲麦巴·桑结嘉措办理。

十一月三日，由仲麦巴·桑结嘉措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从当晚起，达赖喇嘛又闭关修行。八日，第巴罗桑图多患了瘟热症，由强俄巴父子和达摩哇三人诊治，用了泻药，仍不见好转，反而愈加沉重，达赖喇嘛派人送去了护持物，并让夏鲁哇钦波为第巴做长寿灌顶，让德顿仁波且做赎死、驱魔等法事，又派人去桑耶寺请求护法降示预言，还在 53 座寺院斋僧布施，为拉萨地区 70 名乞丐施舍糌粑、褐布等，并由达摩哇继续用药治疗。九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厄鲁特的苏勒坦大师、昆都仑乌巴什的儿子额尔克岱青、达扎济咙、察米堪布等。仲巴达尔达从厄鲁特给达赖喇嘛送来了礼物。额尔克岱青有一对孪生儿子，将其中的一个留在西藏学佛。十日，喀尔喀达尔罕托因的儿子、诺木齐洪台吉、班智达曲杰等人的使者前来献礼。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王妃玛噶达索南才旺、鄂特欢父子、丹增和策旺拉布丹的夫人、喀尔喀二谢图汗的使者等。准噶尔卓哩克图和硕齐的儿子需要还俗掌管政务，达赖喇嘛准许其还俗，收回戒律，并为之起名为额尔德尼洪台吉。

十二月初，达赖喇嘛下令在一些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等经咒的法事，给前后藏二级以上的寺院的僧人发放布施，在拉萨放生羊 328 只。二十六日，达赖喇嘛给诺木齐洪台吉兄弟、都哇卸任堪布温都尔曲杰等人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等，并给诺木齐洪台吉的弟弟拉旺为首 15 人授了沙弥戒。本年年底达赖

洪台吉等青海蒙古首领因罕都在康区与噶尔巴联合，限制和反对格鲁派，造成战乱，故联合进兵康区，击杀罕都。战事结束后，大军返回青海，统帅达赖洪台吉等少数首领前来拉萨。达赖喇嘛于二十七日会见了达赖洪台吉。喀尔喀土谢图汗及其王妃、儿子、塔布囊、宰桑等大队人马也随后到达拉萨。浪卡子夏仲日伦旺杰多吉去世，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二十七日与第巴罗桑图多一起会见达赖洪台吉时，坐的时间过长而受了凉，旧病复发，故未参加达赖洪台吉与土谢图汗等人的会见。喀尔喀方面称土谢图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蒙古人中身份高贵，达赖洪台吉则称自己是固始汗的后代，统治卫藏康三区，是松赞干布的王位的继任者，双方互不服气。达赖喇嘛派人向双方说明保持友好的重要性，规定了双方见面时坐垫的高低等两边都能接受的安排办法。

木虎年（公元 1674 年　康熙十三年）五世达赖喇嘛 58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献供，并举行主要是喀尔喀、厄鲁特各部蒙古王公参加的庆贺宴会。

元月二日，举行由少数主要蒙古首领和多吉扎活佛、第巴伦波宗巴、吉雪各地方首领和囊索参加的排坐宴会。布达拉宫执事人员约 50 人也参加了宴会。三日，举行有上密院、色拉、哲蚌寺各堪布、洛本、温波、群则、执事僧以及南杰扎仓全体僧人参加的新年宴会。达尔巴译师和南木林班钦二人在集会上献吉祥颂词。四日，达赖喇嘛给诺木齐台吉兄弟赠礼送行，给色钦巴南杰才仁等 27 人授了比丘戒，给 12 人授了沙弥戒。拉东译师最后的后裔去世，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回向礼，其中有许多声明学诗词学方面的书籍。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同时慨叹以前求学时每本书都要设法赎取，自己手中仅有一本尼

泊尔的梵文声明学写本，如今自然而然地得到许多珍贵书籍，却没有时间去学习。达赖喇嘛又认为得到这批书也许是今后还能听闻学习的缘起，心中又感到宽慰。五日，达赖喇嘛会见了甘丹赤巴，为他传授了六臂观音除障法。第巴罗桑图多病愈，八日前去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十四日，曲科杰寺达波扎仓僧众400多人向达赖喇嘛献黄金、曼扎等物品，祈愿达赖喇嘛长寿。喀尔喀土谢图汗邀请达赖喇嘛去参加大昭寺的法会，达赖喇嘛考虑身体情况，没有前去，于是土谢图汗到布达拉宫的大殿向达赖喇嘛敬献哈达、大缎、金银、茶叶、马匹等万份礼品。随从他来的僧人、台吉、香客等也尽力贡献了各自的礼品，达赖喇嘛给2000多蒙藏僧俗人士摩顶赐福。达赖喇嘛还因喀尔喀洛桑赤列的劝请撰写了祝愿嘉央活佛和土谢图汗健康长寿的偈颂。二十五日起的3天中，达赖喇嘛用沃噶的温泉水洗浴，以帮助治疗手脚病痛。二十七日，尚察官却南杰去世，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

二月四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洪台吉传授了不死赐福长寿灌顶，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达赖洪台吉向达赖喇嘛献了黄金近一百两。达赖喇嘛还给达赖洪台吉的随从等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和长寿灌顶等，又给喀尔喀土谢图汗等人传授了无量寿灌顶等。十日，达赖喇嘛给土谢图汗及其王妃、儿子、臣僚等人、达扎济咙、上密院洛本等人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及长寿灌顶等。赛洪台吉的儿子和额尔德尼强佐送来了杰康孜活佛圆寂的回向礼，从厄鲁特送来了玛赖台吉的回向礼，达赖喇嘛为他们做了超荐法事。南色林蒴宣巴愿出家学佛，达赖喇嘛给他授了沙弥戒，并为他起名为官却曲扎。十五日，达赖喇嘛给土谢图汗父子及达扎济咙、茫拉堪布、帕邦喀住持、准噶尔活佛、喀尔喀活佛、哲蚌寺洛色林、德阳、阿巴三个扎仓的洛本

等人传授依止布画坛城的无量寿灌顶。都哇扎仓卸任堪布温都尔从喀尔喀返回，他在诺门额津的子孙那里传法并无多少效果。十五日，达赖喇嘛又给土谢图汗父子传授依怙寿命主四灌顶加持法。噶玛巴黑帽活佛却央多吉在扎地方圆寂，派人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从二十二日起，达赖喇嘛手部的病加剧，由达摩哇治疗，由翁则、却本、格隆嘉央扎巴三人服侍，还专门召来德顿仁波且做了驱魔、赎死、去除违碍的法事。上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中甸一带发生战乱，故达赖喇嘛下令在色拉、哲蚌、甘丹三寺举行念诵经咒的法事，并在格鲁派的30座大寺院及密法院熬茶斋僧，举行供施朵玛的法事。

三月一日，达赖喇嘛下令在前后藏三级以上的寺院熬茶斋僧，给前藏一级寺院每10人一两银子，二级寺院每15人一两银子，三级寺院每20人一两银子，后藏地区一级寺院每13人一钱黄金，二级寺院每18人一钱黄金，三级寺院每24人一钱黄金。共用银3845两、黄金2471钱。给一级寺院每人一克半粮食、二级寺院每人一克粮食，给耕种半岗地以上的农奴每户一克半粮食，给堆穷每户一克粮食，在拉萨放生羊100只。十日，由仲措哇拉桑和达摩哇二人多方治疗，达赖喇嘛的病情大为减轻，由却本昼夜服侍。三十日，达赖喇嘛派人给小昭寺等寺院酥油200克点灯，献敬神哈达23条，向护贝龙王献七百供，在大昭寺布施茶25包，给550名乞丐布施炒面47克，旧衣物140件，茶14克。

四月十七日，德顿仁增钦波举行空行除障法事。十九日，清朝为吴三桂反清之事，派呼和浩特的觉热齐喇嘛、拉图札尔固齐、古如笔帖式等人携诏书进藏，觉热齐喇嘛行至拉萨北面的澎域河谷时去世，札尔固齐拉图于本日到拉萨，向达赖喇嘛

递交了诏书和皇帝的礼品，并详谈双方各自的情况。达赖喇嘛认为，虽然轮回中的众生都有可能曾经是自己的父母，但是世人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不可能像佛陀一样对众生一律平等，从西藏和达赖喇嘛自己来说，从博克多皇帝（皇太极）时就遣使入藏慰问赠礼，从顺治皇帝即位以来，一直赐给西藏大批物品，达赖喇嘛自己也到京城见到皇帝的龙颜，得到封赏，按照谁对自己慈悲谁就是父母的谚语，达赖喇嘛应当对皇帝的国政的巩固和汉地的安乐忠心尽力。不过用西藏的兵力帮助平定汉蒙地区是不可能办到的，蒙古厄鲁特的军兵虽然勇悍，但不易管束，而且畏惧汉地的酷热和天花等疾病，因此也难以接受帮助朝廷的任务。不过达喇喇嘛还是和蒙古首领，特别是达赖洪台吉商议清朝要求尽快出兵助攻吴三桂的圣旨，考虑到中甸一带的桀傲难驯之人是依仗丽江的支持，故决定向中甸发兵。二十日，达赖喇嘛给王子达什传授长寿灌顶和六臂观音随许除障法，赠给他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名号，并赠给礼品，委任他为将军，率噶杰诺布、梅恰巴等人出征。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下令，为祈祷汉地战事平息、积聚善业，每月十五日在色拉、哲蚌两寺，每月八日在甘丹寺念诵伏魔咒语，命南杰扎仓僧人在大昭寺诵经念咒7天。

五月二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出资，在南杰扎仓举行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法事。达赖喇嘛赠给土谢图汗以达多丹巴土谢图汗的名号（具信仰力的土谢图汗），给其长子以班智达额尔德尼台吉名号，给其王妃以普颜达拉钟根的名号，本来达赖喇嘛想给土谢图汗赠给塔森阿拉坦的名字，但土谢图汗说这与其先祖的名字重复，故作罢。土谢图汗表示想尽快离藏返回喀尔喀，故达赖喇嘛赠给他佛舍利、佛像唐卡、衣物、水晶、氆氇等，为其送行。四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洪台吉、达扎济咙等人

传授了长寿灌顶及马头明王、六臂观音加持法等。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巴塘宗堆则宗巴等人。达赖喇嘛因青海地方汉蒙藏混杂，地方紧要，需要一位年长的首领掌管，因此赠给达赖洪台吉水晶、氆氇等物，为其送行，并赠给其子策旺拉布丹以额尔克岱青的名号和印章，赠给王妃的兄弟以土谢图诺颜和额尔德尼巴图尔的名号。五日，达赖喇嘛给清朝使者拉图札尔固齐、古如笔帖式及觉热齐喇嘛的温波等人传授观音菩萨随许法，设宴款待他们。并派康萨热丹和本塘索南旺杰为使者，进京呈献奏表。八日，达赖喇嘛给土谢图汗、额尔克岱青等人传授了八支戒律。十一日，达赖喇嘛给土谢图汗、达赖汗、达赖洪台吉等人传授智慧依怙、六臂观音随许除障法，要他们为了北方众生的安乐和格鲁派的教法团结一心。十二日，由第巴罗桑图多出面，以酒肉宴请喀尔喀和厄鲁特众人。在达赖洪台吉动身时，达赖喇嘛给予了详细的指示，达赖洪台吉把他自己掌管的馆觉的各部落赠给了达赖喇嘛。土谢图汗在聆听达赖喇嘛教诲后，也动身返回喀尔喀。达赖喇嘛还会见了甲林堪布、班智达额尔德尼台吉、工布扎西热丹喇嘛、桑林洛本等人，赠给赛洪台吉的儿子扎西以乌勒吉图哈坦巴图尔的名号及命其掌管离散的部落的文书，赠给氆氇等，为他和杰康孜活佛的强佐送行。

因吴三桂反清及进兵中甸等事务，本年达赖汗推迟到六月初才前去当雄，行前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和马头明王加持法，给近千随从人员摩顶赐福，赠给了“章噶”。达赖汗向达赖喇嘛献了一枚大如鸡卵的珍珠。土谢图汗之子班智达额尔德尼台吉在拉萨治好病后，于六月初动身返回喀尔喀。

六月六日，吴三桂派遣一个名叫李庆贵的官员到拉萨，送信给达赖喇嘛。当时众人为应否按使者的礼节接待他发生了争议，最后达赖喇嘛和第巴商议，认为按西藏的惯例对各方面的

使者都加以接待，因此决定接待他。达赖喇嘛让使者带了回信和口信给吴三桂，回信中说，你们君臣相争，成为属下众生遭受苦难之因由，甚为不祥。清朝三代皇帝与西藏建立了深广的供施关系，我自己亲往朝廷，得到无数助缘，这些情形大王你都清楚。因此背叛朝廷之心我在睡梦中也不曾想过。如果对朝廷存叛逆之心，就会不仅愧对三宝，而且也会愧对于你。我与大王从前并不熟识，如今只是初识，我回信给你，只是出于对所有信奉佛陀教法的众生的悲悯和对轮回众生的清净正见，此外绝无谋叛之意。十五日，达赖喇嘛给王妃彭措卓玛传授了居士戒。

七月四日，吴三桂的前一批使者尚未动身，第二批使者许其德及秦武贵又到达拉萨，给达赖喇嘛送来了信件和礼品。五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行3天。十日，吴三桂所派第三批使者潘雨龙和董明贵等人到达，向达赖喇嘛递交了书信和礼品，达赖喇嘛在赐茶时仔细听取了他们所说的各方面的情形，所来的这几批使者都是武职官员，达赖喇嘛给予了适当的接待。十五日，扎什伦布寺派人来问五世班禅今年来前藏是否合适，达赖喇嘛回答说五世班禅正在学经期间，前来拉萨无益，最好还是在寺中认真听闻修习。厄鲁特右翼的岱青囊索等人到达，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大量汉地和西部蒙古的物品。达赖喇嘛给平西亲王吴三桂的使者交给回信和礼品，送他们返回云南。吴三桂还请求给予西藏的面具和一些吉祥结，达赖喇嘛让其来使带去。十七日，达赖喇嘛给塔尔巴堪布、佐钦活佛、巴日活佛传授了喇嘛德钦旺秋的加持四灌顶，给参卓堪布、杰蔡堪布、塔尔巴堪布、襄甘丹曲科林的洛本等传授药师佛和十一面观音随许法等。二十四日，西印度罗那提婆地方的塞雅什雅穆格日和郭尔达那二人来献恒河水两瓶，达赖喇嘛回赠黄金五钱等物品。

八月八日，达赖喇嘛下令赐给噶玛巴红帽活佛以堆龙仁巴达卓庄园，属民26户，岁入粮食1387克。九日，达赖喇嘛会见赍送喀尔喀乌勒汗塔尔巴乌巴什、色拉寺杰扎仓赤列伦珠活佛去世的回向礼的卓哩克图洪台吉等人，并为他们做了回向祈愿。从本日起，达赖喇嘛用曲卧日的泉水洗浴5天。

九月一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和却本一起修习体验气脉修炼等。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察雅喇嘛桑结扎西的转世、王子索诺木达什及其夫人、平西亲王的使者、车臣汗属下的墨尔根曲杰、达赖汗属下的额尔克拔希等人，并赐茶交谈。十九日，阿力克桑结及温波顿月向达赖喇嘛献马78匹，哉务曲杰阿旺贝桑等献马117匹，骡子63头，申中囊索等安多地区的香客也奉献了金银等大批礼物。从二十一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十月十七日，乃东夏仲到达拉萨。二十日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会见和款待了他。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达赖洪台吉的使者曼都扎布、额尔德尼巴图尔台吉的使者奥勒木罕、车臣汗的女婿巴图尔台吉的使者居克图喇嘛和巴罕呼图克图、茫拉堪布、索特巴伊勒登的儿子拉尊等。

十一月五日，萨迦赤钦阿旺索南旺秋扎巴坚赞贝桑布及其子萨迦法座阿旺贡噶扎西、出身于朗拉色家族的夫人多吉尊摩扎西拉等人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并给予铺设坐垫等礼遇，萨迦赤钦等向达赖喇嘛献黄金100钱等礼品。六日，达赖喇嘛与萨迦赤钦父子、夏鲁堪钦等人在一起谈论教法方面的事务。十二日，由萨迦赤钦任施主，捐资黄金100钱等，在南杰扎仓举行修供坛城的法事，萨迦赤钦将一幅尊胜母画像交到达赖喇嘛手中，祈愿达赖喇嘛长寿。十四日，萨迦赤钦父子又向达赖喇嘛献黄金、玉器、茶叶、绸布等礼品。十九日，帕

巴拉活佛从昌都派人来请求决断曲杰阿旺赤勒桑波的转世，达赖喇嘛打卦卜算后认为是阿沛巴·丹增多吉的儿子，又经辨认前辈用品等，认定后，达赖喇嘛给灵童起名为阿旺丹增伦珠。二十四日，康萨热丹和本塘索南旺波二人进京呈送奏表后携带皇帝的敕谕和礼品返回拉萨，还带来呼和浩特和青海一些人的信件，达赖喇嘛奖给他们物品，特别给索南旺波金鞍一副。二十六日，达赖喇嘛因萨迦赤钦父子的请求写了直至证得菩提之前始终不离及长久住世的偈颂，以及巴日活佛请求的祈愿文。

十二月一日，夏鲁哇钦波离开拉萨返回后藏，厄鲁特噶尔丹洪台吉派遣使者卫征达尔罕囊索前来，捐赠资财，请南杰扎仓僧众供修坛城，丹增洪台吉的使者车臣曲杰、乌克热台吉属下热绛曲杰等人向达赖喇嘛献了大量物品。噶尔丹洪台吉、丹增洪台吉给达赖喇嘛捎来书信和礼品，其中有一种西蒙古的大缎，如果用火烧，大部分会变成黄金。从八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行 7 天。十八日，达赖喇嘛会见从厄鲁特到来的车臣汗的王妃多吉热丹、哈坦诺颜、额尔德尼曲杰等。

木兔年（公元 1675 年　康熙十四年）五世达赖喇嘛 59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献供和参加新年排座宴会。因达赖喇嘛腿脚稍有不便，而却康孜（供祀殿）的梯子不好走，所以供献施食改在日光殿进行。元旦时拉萨下了一场大雪，众人认为不吉利而感到担心。三日，达赖喇嘛会见仲孜鼐、南色林巴、喇嘛东嘎活佛、车臣汗的王妃等人。为消除第巴罗桑图多对元旦下雪的疑惧，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无量寿和吉祥天女随许法等。九日，为消除达赖汗对元旦降雪的疑惧，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和马头明王、金刚手随许法等。达赖喇嘛手部又略感不适，由达摩哇医治，由翁则、却

本、扎仓涅巴罗桑金巴等人服侍。十二日，达赖喇嘛为喀尔喀秉图台吉等人送行，又会见新到来的额尔克曲杰等人，还派人给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的近九千名僧人发放布施，给每个僧人哈达一条、银子一钱、葡萄干一升。十四日，达赖喇嘛派本塘索南旺波去达赖洪台吉处转达对中甸方面的安排，要他们不要急躁。平西亲王派人经打箭炉带来书信，赠给达赖喇嘛 20 两黄金，赠给达赖汗 10 两黄金，达赖喇嘛即让来人带去了回礼。十六日，车臣汗属下觉热齐等人到达，拜见了达赖喇嘛。十七日，阿巴车臣堪布（咱雅班智达）的转世和额尔克曲杰向达赖喇嘛献了以 50 两重的银元宝 21 个为主的大量礼品。二十日，哉务霍尔仓曲杰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主持祈愿大法会后准备回寺的甘丹赤巴。二十六日，传来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率领的蒙藏军队在中甸获胜的消息，拉萨盛张旗帜庆贺胜利，南杰扎仓 3 天中举行了酬谢护法神的仪轨。达赖喇嘛在送信使者返回时，指示将俘获的中甸首领贵族除年老者就地监管外，其余的分散到康区上下的各寺院和宗豁，以保持长期安定。

闰一月一日，达赖喇嘛下令给各寺院僧人布施，除色拉、哲蚌两寺以外的前藏地区的一级寺院，每 8 名僧人给银一两，后藏、羊卓、洛扎、娘布、工布地区的一级寺院，每 12 名僧人给银一两，前藏地区的二级寺院，每 12 名僧人给银一两，其他地区二级寺院僧尼每 18 名给银一两。并下令在各宗豁举行念诵甘珠尔、度母、佛名号经等经咒的活动。十四日，达赖喇嘛给车臣汗、噶尔丹洪台吉、丹增洪台吉等人的使者送行，让他们给各自的首领带去回信和礼品，在回信中达赖喇嘛要车臣汗、噶尔丹洪台吉、丹增洪台吉等专心利益佛法，承担重任。达赖喇嘛还因噶尔丹的请求，派遣拉萨下密院的热绛巴洛

桑强巴和墨竹仁钦林寺的医僧洛桑官却二人去准噶尔。并按洛桑强巴和洛桑官却的要求。给他们传授了依止无缘大悲赞的上师瑜伽的教诫。十七日，王妃多吉热丹捐资，由南杰扎仓僧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会，王妃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献黄金88两、白银1000多两，以及绸缎、茶叶、皮张等，并给僧人们发放了布施。二十日，达赖喇嘛会见新到拉萨的翁则曲杰、阿尔达车臣宰桑、达尔罕温波、卫征格楚、达尔罕囊索以及多杰台吉的使者等人。霍尔仓曲杰圆寂，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二十二日，第巴罗桑图多到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正式表示辞去第巴职务，经过午饭时详细交谈后，下午达赖喇嘛下令赐给罗桑图多各种佛像、法器、用品、衣物、珠宝等，共值白银20970两，折合粮食为356498克，并将桑日伦珠热丹宗城堡封赐给他，计有属民230户，岁入粮食11215克，另外在穹波朵、夏日、章达、涅莫隆、那玛尔等地封给属民219户，岁入9800克。在止尚那其如、贝仲等地封给属民50户，岁入7000多克，另外在拉萨、打箭炉、索拉、杰莫蔡等地封给属民28户，岁入1682克。二十三日，达赖喇嘛派扎仓涅巴、噶扎巴阿旺强巴、本周宗巴顿珠旺杰等人前去桑日帮助清点移交。

二月五日，第巴罗桑图多前往桑日。十八日，不丹方面准备在停战协议失效前偷袭边界地首领阿却，为阿却所知，集兵先行，一月底火焚丁东宗城堡，为防不丹报复，达赖喇嘛派德却官布前去巡视边哨，又派代本彭措从江孜前去巡视。

三月七日，清朝使者达垄活佛、乌尔多洛桑格隆、10名侍卫以及结伴同行的却克图曲杰、察哈尔曲杰、额木齐丹增等抵达拉萨，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礼品。八日，清朝使者交给达赖喇嘛朝廷因为驱逐侵扰汉藏交界地区的罕都的部

众而奖给的135两黄金制成的曼扎、重100两的金腰带、银茶筒、白银400两、库缎200匹、哈达500条等。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喜培活佛、杰蔡贡堪布、阿里扎仓洛本、拉堆类乌齐济仲、工布佐钦巴活佛等。九日，清朝的使者、却克图曲杰等人向达赖喇嘛献汉地所造的文殊经卷、金银、绸缎、茶叶、珍珠、驼马等。十五日，因土尔扈特阿玉奇首领的劝请，翁则曲杰捐黄金350两、白银700两，以及茶叶、绸缎、皮张等，在南杰扎仓举行无量寿佛仪轨，为达赖喇嘛祈寿。听说藏绒的甲温泉水对手脚病痛有益，达赖喇嘛命人取来数瓶，从本日起洗浴8天。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王妃多吉热丹、贡塘热绛巴喜年南杰、作木朗王的使者等。听说印度医生玛纳和到达约波地方，医术高明，特别长于治疗眼病，达赖喇嘛命甘布鼐负责，将他请到拉萨，并派达摩哇跟从他学习，为许多人治好了眼病。达赖喇嘛提供了玛纳和在拉萨期间的生活所需费用以及发放了返回印度的路引文书等。

四月十二日，达赖喇嘛给参卓堪布阿旺赤列额尔克曲杰、土尔扈特巴图尔的使者额尔克格隆、阿巴车臣夏仲的转世等人传授观音菩萨十三尊的随许法等，赠给额尔克曲杰僧衣、氆氇等，为其送行，并送给因他对车臣诺门罕公私方面的重大功绩，命其为管理僧人和部众的达尔罕的文书。十四日，清朝的使者、达垄活佛的随从等担任施主，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从本日起，达赖喇嘛用曲卧日药水泉的泉水洗浴7天。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夫人、子女、随从等人，并给达赖汗及其儿子传授长寿灌顶和马头明王随许法等。十六日，达赖喇嘛会见了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格隆格勒班觉、左翼阿克的使者格隆阿旺意希、车臣汗的属下楚臣格隆、驻守扎西迥的意云台吉、东嘎活佛、理塘活佛等人。颇拉·岗拉尼

夏任施主，在南杰扎仓结立法缘。十八日，达赖喇嘛会见类乌齐夏仲阿格旺秋、达孜台吉父子、洛岗托甲桑巴、卫林喇嘛、楚布强佐等，并给噶托都格尔喇嘛的转世剃度，为其起名为邬金却吉嘉措。二十五日，印度婆罗尼斯的婆罗门哈日达娑和查雅达娑二人来献恒河河水，达赖喇嘛赠给他们6钱黄金及粮食等物品。萨迦、扎什伦布、德庆巴的使者们去不丹后不久，派人来说此次若不派前藏代表，谈判难以进行，故达赖喇嘛又派察孜则波前去。达赖喇嘛又下令给一些寺院和贵族封赐土地和农奴，其中赐给清朝的副使帕摩洛桑格隆9户属民、岁入651克粮食的土地。给第巴罗桑图多增封农奴700户，岁入粮食11190克。

六月八日，达赖喇嘛派锵清巴洛桑钦则去向螺髻梵天呈献供品，请求授记。当时关于第巴的继任者众人推举建议的名单中以仲麦巴·桑结嘉措、翁则、却本、扎仓涅巴四人推荐者最多，受到部分人提名的有达孜台吉、第巴吞巴、达尔罕噶居、济咙达扎、代本策旺等人，还有人提议由本仓强俄鼐和卸任第巴共同担任，或由仲麦巴·桑结嘉措和卸任第巴共同担任。达赖喇嘛进行了占卜，结果仲麦巴·桑结嘉措卦象最好，扎仓涅巴卦象为中上，其他人的均为中下，加上授记也与此相符合，所以达赖喇嘛在十日下午供祭本尊神后，派代本策旺和达如哇才旦扎西二人前去告诉仲麦巴·桑结嘉措，请他出任第巴，桑结嘉措以从各方面来说都难以胜任为理由（当时桑结嘉措只有23岁），加以推辞。前往不丹谈判的代表到达帕里，不丹代表称阿却应划归不丹管辖，哲孟雄（锡金）划为双方共同管辖，故一时难以解决。

七月四日，由清朝的副使洛桑格隆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祈寿，建立法缘。五日，准噶尔的使者格勒班觉也同

样办理。七日，达赖喇嘛派达垄强佐和却本二人第二次去敦请桑结嘉措出任第巴，仍为桑结嘉措谢绝。因桑结嘉措拒绝出任，达赖喇嘛决定由扎仓涅巴出任第巴，并在八日派桑结嘉措和德庆康萨巴二人去哲蚌寺扎西康萨敦请。扎仓涅巴表示，自己除了心地忠诚外，学识不足，第巴是重要职务，请求再做一次占卜，如果落到自己身上，当不推辞，不违指令。因此达赖喇嘛再次做了详细的卜算，出现吉兆，而且三年后达赖喇嘛本人或在任的第巴会遇到违碍，故决定扎仓涅巴出任第巴三年。当天，清朝使者一行和香客等动身返回，达赖喇嘛派察米堪布和第巴乃萨哇与钦差一同去北京进奏表及方物，给他们传授了大悲观音和文殊随许法，又给察米堪布单独传授了无量寿和马头明王的灌顶加持法。十六日，以山洛阿升的温波坚赞顿珠和热绛巴金巴桑丹为首的另一批清朝使者抵达拉萨，达赖喇嘛在十九日会见了他们，并接受皇帝的敕谕和礼品。此次康熙帝的敕谕，当即《清实录》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公元 1675 年五月二十一日）条所载的："皇帝敕谕达赖喇嘛。吴三桂初叛，朕谕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续览喇嘛奏文：'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则缚之以献。吴三桂曾取结打木、扬打木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若欲征兵深入，惟候诏旨。'又言：'达赖台吉故居土伯特，今遣居青海，令其有事则相援，无事则钤辖其部属。'朕思自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至今，遣使往来，恩礼无间，喇嘛崇尚信义，必如所奏而行。故遂以达赖台吉等进兵滇蜀之故，晓谕两省。及达赖台吉辞以松潘路险，未进四川。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虽强，难以进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且西南地热，风土不宜。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

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所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今将军张勇等奏，达赖台吉诸部落入边侵掠，彼以王辅臣倡乱，内地亦皆骚动故也。今西陲晏然，内地无事，已下敕禁谕达赖喇嘛，宜恪守前言，令其统辖部属，毋得生事扰民。”这一敕谕，由清朝使者翻译传达给达赖喇嘛。从二十日起的5天中，达赖喇嘛到河中洗浴。

八月九日，达赖喇嘛给类乌齐夏仲阿格旺波、清朝的使者等传授了文殊、观音、金刚手的随许法，给墨尔根曲杰为首的18人授了比丘戒，给23人授了沙弥戒。十一日，达赖喇嘛派热绛巴洛桑顿珠和南东巴（向导）阿旺扎巴二人进京进呈奏表和贡礼，达赖喇嘛还款待清朝的两位使者，为他们送行。二十四日，新任第巴罗桑金巴的就职仪式在布达拉宫大殿举行，交接了印信、册簿、钥匙等，由王子索诺木拉布丹引导的达赖汗等蒙古首领首先献礼，以后是达扎济咙、色拉寺和哲蚌寺的洛本、执事僧、活佛、温波、群则等，再后是拉萨附近的僧俗首领等，楚布寺、羊八井寺的噶玛巴红帽和黑帽活佛的强佐等。下午由拉萨民众向新任第巴奉献国政七宝等礼品。二十九日，仲麦巴·桑结嘉措为第巴罗桑金巴就职宴请多吉扎活佛、德顿仁波且、南杰扎仓僧众和僧俗仲科尔等。

九月十四日，达赖喇嘛给噶玛噶举贾曹活佛扎巴却央的转世诺布桑布授了沙弥戒，起名为洛桑却央年扎噶玛雍都德。十七日，噶玛巴红帽活佛到拉萨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因其请求给他诵传了大悲观音菩萨的教诫。达赖喇嘛还应洛扎巴俄活佛的请求，给他授了具足戒，并给他起名为阿旺祖拉顿珠。

十月六日，楚布寺贾曹活佛举行坐床仪式，达赖喇嘛派第

巴达尔巴译师和扎西孜鼐宣巴前去参加，并赠给贾曹活佛大量礼品。第巴罗桑图多来到拉萨，达赖喇嘛率马队去迎接，住于噶丹康萨，达赖喇嘛和第巴互赠礼品，并一起会见各地前来拜见的人众。

十一月一日，喀尔喀拉布丹洪台吉去世，其夫人达格玛、儿子额尔克台吉及属下来拉萨，向达赖喇嘛献金银、茶叶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还给达格玛等人授了沙弥戒。四日起，达赖喇嘛实行不出三重门的严格闭关修行。十四日，第巴罗桑图多宴请达赖汗，并向达赖喇嘛献绸缎等礼品。二十日起，达赖喇嘛左手病痛又犯，由达摩哇用泻药治疗，但不久脚部又痛，40多天中由仲措哇拉桑、达摩哇二人治疗，由仲麦巴·桑结嘉措、翁则、格隆嘉央扎巴、贝仲热绛巴等人服侍。二十八日，噶丹彭措林的校订经籍者前来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和他们一起校阅了新刻印的各种经籍。为与不丹、尼泊尔纠纷和谈判之事，达赖喇嘛下令各寺院和密咒院举行念诵经咒的活动。

火龙年（公元1676年　康熙十五年）五世达赖喇嘛60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参加南杰扎仓举行的供祭三界之主的法事，按例举行新年排座宴会。精奇寺堪钦卓尼曲杰前去蒙古办事，行前请求达赖喇嘛为他撰写偈颂。九日，达赖喇嘛命人给参加祈愿大法会的6250名僧人发放茶叶、银两等布施。二十日，达赖喇嘛和达赖汗、第巴罗桑金巴一起在布达拉宫大殿会见和款待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候俊龙、梁朗苏及随从官员7人、仆役70人，喀尔喀昆都仑都尔格齐、岱青和硕齐、艾布肯、车臣汗、达赖洪台吉、噶丹达尔吉、土尔扈特策凌的使者等僧俗300余人。吴三桂的使者向达赖喇嘛转交用一万钱黄金

制成的金罐、金瓢、四个金茶筒、白银万两、云南茶一万克等吴三桂所赠礼品，以及夫人郭氏、王家全、巴延、鲁山等人所赠礼品，吴三桂还给达赖汗和第巴罗桑金巴各赠金茶筒一个、黄金5800钱、白银5000两、云南茶5000克。喀尔喀和厄鲁特各汗王、首领的使者也向达赖喇嘛呈交了礼品。二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了主持本年祈愿大法会的甘丹赤巴强巴扎西。二十八日，达赖喇嘛给噶丹彭措林寺校对经籍者、吴三桂的部分使者、卓尼曲杰、工布达尔罕安木齐、车臣汗的使者等传授了随许法等。给彭措林寺的校经者等13人授了比丘戒。

二月一日，达赖喇嘛会见王妃索南曲宗、噶丹热绛巴、乃宁活佛、色林喇嘛等。并为了给王妃治病，给她传授了六臂依怙的教诫。八日，萨迦赤钦给达赖喇嘛来信，说他派出调解人到不丹去，但帕日宗堆和军官不让使者通过，请求达赖喇嘛下令放行。达赖喇嘛即告诉第巴，与达赖汗等首领商议，认为不丹方面贪心很大，不可寄予希望，但也不妨试探寻求和好的办法，因此达赖喇嘛回信同意了萨迦赤钦的请求。十日，达赖喇嘛给精奇寺堪布、卓尼曲杰、鲁本曲杰、洛桑勒丹等人传授了长寿灌顶法。给医生阿旺拉桑等5人授了比丘戒。十三日，卓尼曲杰金巴达吉被蒙古人称为金刚持，所以其转世被称为鄂其尔达赖呼图克图，他与鄂其格曲杰、鄂其尔台吉等人向达赖喇嘛献银曼扎、金茶筒一个、银茶筒6个、银砖、银罐、茶叶、绸缎等千份礼品。十六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王妃、侍从等，并给他们传授马头明王随许法以清除违缘。达赖喇嘛赠给达赖汗一个用2540钱黄金制成的金茶筒，以及50两重的银元宝4个等物品，达赖喇嘛自嘲说，这说明喇嘛们出售教法的盈亏赔赚如同积雪的深度变化不定。

三月十三日中午，达赖喇嘛设宴为吴三桂的使者们送行，

席间正使侯俊龙讲了明朝灭亡的一种传说，说从前永乐皇帝造了一幅唐卡，将唐卡锁起来，并遗言说若有人开了此锁，就会丢失皇位，因此不可开锁。以后7代人中没有开锁，到崇祯皇帝时，开了此锁，满洲人得到此唐卡，招走了汉地的神，由于这一缘起，明朝的皇位落入满洲人手中。达赖喇嘛对此说感到惊奇。达赖喇嘛赠给正使一幅尊胜母唐卡画像，赠给副使一副自己的面具，并给他们诵传了弥勒的经教。同时还派热绛巴嘉措南杰和嘉央俄色为使者前往。同日，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善巴活佛、达垄伦珠宗巴、馆觉翁则、准噶尔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彭措嘉措、顿珠坚赞、达尔罕堪布等，馆觉翁则献马9匹、骡子13头。

三月十四日，由噶尔丹洪台吉出资，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在法会上向达赖喇嘛敬献的物品中，有派遣毕齐伊齐格隆新从汉地买来的价值3000两白银的用檀香木、金银、玉石等制成的建筑风景模型（或是西洋镜），达赖喇嘛称这种物品在西藏没有见到过。

四月二日，达扎济咙提供资具，在森穷为达赖喇嘛祈寿。达赖汗和各扎仓为达赖喇嘛长寿举行酬补法事，萨迦赤钦送来祈寿的真言偈颂并在扎仓斋僧布施。德庆曲科活佛圆寂，给达赖喇嘛送来了娘·尼玛沃色用过的铙钹作为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十五日起，达赖喇嘛用曲卧日药水泉泉水洗浴5天，五月中又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五月十一日，达赖汗离拉萨前去当雄住夏，达赖喇嘛给其随从500余人摩顶赐福，还给各首领官员赠送了护身吉祥结。十二日，素尔钦波曲央让卓的转世到布达拉宫，住于丹玛康，十四日举行修供本尊法事时，达赖喇嘛会见了典央让卓的转世。

六月，西藏派遣前藏的军队南征门域地区，达赖喇嘛会见了领兵的将军擦古尔哇、正代本策旺、副代本策松巴、孜巴阿旺等人。十七日，达赖喇嘛给前去南方军中的索诺木扎西台吉传授了依怙除障加持法等。

七月十三日，达赖喇嘛给达扎济咙活佛官却尼玛等4人授了比丘戒，给14人授了沙弥戒。达扎济咙活佛想在达赖喇嘛身边继续学习声明和诗词等，但是其涅巴由康区前来，声称活佛若不前去康区，愿将寺院交公，将僧众遣散。达赖喇嘛考虑达扎济咙活佛在康区的徒众，让达扎济咙活佛速去康区，并赠给他僧帽、袈裟、衣物、绸缎氆氇等，为其送行，还因他的请求，把八宿桑珠官巴寺及寺属庄园、佛像法器等都赐给他，共计封给农牧属民850户，每年收入折合粮食2730多克。用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留赠的资财在哲蚌寺建造黄金经幢、屋脊宝瓶6个，由强佐邬玛哇负责，由第巴彭多哇施工。

八月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车臣汗和喀尔喀左翼达赉的使臣，给他们传授了加持法。

九月三日，第穆活佛的转世首次到拉萨，向达赖喇嘛献哈达、黄金20两、锦缎7匹、甲胄10副、茶叶800包、马112匹、骡子124头、犏牛100头、牦牛50头等万份礼品，达赖喇嘛为第穆活佛的转世剃度，起名为阿旺南喀嘉央（《番僧源流考》记为阿旺拉木喀嘉绵，称其为第五辈第穆呼图克图）。达赖喇嘛还会见了昌都济咙的转世、察雅活佛、王妃玛噶达及卫征阿喀、达赖巴图尔、岱青和硕齐、墨尔根台吉的使者，尼泊尔叶楞王的使者噶席罗梅等。十三日，达赖喇嘛给第穆活佛、岱青和硕齐的儿子等人授了沙弥戒，给前来献马的30余人传授了加持。达赖喇嘛派往北京进呈奏表的热绛巴洛桑顿珠、拉东巴阿旺扎巴二人与清朝使者一起从北京到西宁后，作

为先行，返抵拉萨，拜见了达赖喇嘛。二十五日起，达赖喇嘛用羊八井达果温泉的泉水洗浴7天，没有多少疗效，也没有什么害处。

十月一日，喀尔喀的王妃玛噶达、卫征阿喀、达赖巴图尔等人向达赖喇嘛献金银、茶叶绸缎、皮张等千份礼品，喀尔喀鲁本诺门罕、伊勒登诺颜、王妃索南卓玛等献万份礼品。七日，由第穆活佛师徒出资，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二日，达赖喇嘛给第穆活佛传授了长寿灌顶和观世音、度母等随许法。清朝使者经过青海，乃赛哇钦绕南杰来到拉萨通报。十五、十六日两天，达赖喇嘛给321人授了比丘戒，给196人授了沙弥戒。本月中，达赖喇嘛下令在第穆活佛原有的封地和属民之上，新封给洛隆宗的沃巴堆巴、雪阿、尼垅、波夏、仲松等地及萨哇尔寺旧址，共计属民360户，岁入600克粮食。

十一月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夫人儿子、从喀尔喀来为卫征阿喀送回向礼的使者、从青海来的达赖洪台吉等首领的使者、从康区来的达什巴图尔台吉的使者、达孜台吉拉嘉热丹等人。十四日，达赖喇嘛给第穆活佛赠给僧帽、袈裟、金刚铃杵、铙钹、茶筒、金鞍、绸缎氆氇等，给其随行人员也赠送了礼品，为他们送行。达赖喇嘛还给第穆活佛、温波、波窝活佛三人传授了吉祥怙主教法，叮嘱了学习经典的事项。达赖洪台吉的使者送来了青海各首领为在西藏的蒙古首领举行长寿法事的资财，当时除噶丹达尔吉等几人在工布军中外，其余蒙古首领在南杰扎仓举行祈寿法会。达赖洪台吉给达赖喇嘛捎来银元宝6个、金银茶筒、茶叶绸缎等礼品，其他首领也送来了礼品。从本日起达赖喇嘛修习扎玛教法7天。二十二日，清朝的使者觉热齐喇嘛、克雅翁则，与其同行的从北京返回的达

赖喇嘛的使者孜措堪钦和乃赛蒲、达赖汗的使者等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会见和宴请他们，并接受了清朝使者递交的皇帝的敕谕。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清朝的使者，塔颜齐喇嘛，以及乌珠穆沁车臣亲王、嘉木措亲王、喀拉亲王等人的喇嘛，桑洛墨尔根曲杰和察哈尔达尔罕曲杰的温波、卓仓曲杰、安多达尔罕囊索的侄子等人。二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喀尔喀嘉央活佛的使者旺波南杰和丹增，土谢图汗的使者扎西南杰和巴音普库隆，喀尔喀七部落总的使者以及森底室利台吉、巴图尔台吉、墨尔根洪台吉、钱达玛呢托因、额尔克伊勒登、青喀洪台吉、温都尔噶居、都尔格齐等人各自的使者等，接受了使者们送来的礼品和书信。

火蛇年（公元1677年　康熙十六年）五世达赖喇嘛61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献供养。

一月一日举行有喀尔喀、厄鲁特部的各首领参加的新年宴会，二日举行西藏僧俗官员参加的新年宴会。十七日，清朝的副使洛桑金巴去后藏后转抵拉萨，达赖喇嘛会见了他。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夏孜曲杰和绛孜曲杰、绒绛钦洛本、本龙巴、涅多哇等人，乌珠穆沁的车臣亲王的乌勒吉图塔布囊愿意修梵净行，达赖喇嘛给他授了居士戒，并给他起名为阿旺仁钦，达赖喇嘛认为他对三宝有特别的信仰，是具有宿缘者。达赖喇嘛下令对巴塘寺的300名僧人从本年起每月供给1克粮食，每天加供一餐，在正月和四月法会时提供斋僧茶饭。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色拉、哲蚌寺各扎仓的洛本、格贵、翁则等执事僧。二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东嘎活佛、康区八宿喇嘛、达垄噶柱喇嘛等。二十七日，乌珠穆沁车臣亲王捎来金升、银升、茶叶、绸缎等，祈愿达赖喇嘛长寿。

二月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和款待清朝的使者及随来的香客等。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书写给清朝皇帝的奏表。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及随来的香客等人传授药师佛、观音菩萨的随许法等。二十八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副使洛桑金巴等 120 人授了比丘戒，给 144 人授了沙弥戒，给 6 人授了居士戒。三十日，达赖喇嘛宴请清朝的使者和达赖汗的使者塔颜宰桑等，并赠给他们吉祥结、全套衣服、氆氇等，为他们送别。

三月，由协噶尔曲德的僧人官却南杰任洛本，由绒塘泊巴任管事，在聂拉木新建了有 70 名僧人的噶丹培吉林寺，达赖喇嘛下令把拉齐的扎西岗、协噶尔的噶拉、岳东等地封给该寺，共有属民 118 户、堆穷 8 户，岁入 3829 克粮食。十五日，达赖喇嘛在清朝使者和随行香客等动身返回前给他们传授了加持法和教诫。一段时间以来，达赖喇嘛的眼睛亦出现病患，从 1673、1674 年起，先是左眼视物不清，后又发展到右眼亦看不清，前后由达摩哇用药治疗，在几个月中疗效较好，但未能除去病根。二十一日起，在仲麦巴·桑结嘉措和却本的帮助下，由达摩哇擦药物治疗，使眼疾痊愈。

四月和五月中，达赖喇嘛静休养病，并下令在前藏各寺院举行念诵经咒和斋僧布施的法事。

五月三十日中午，达赖喇嘛会见了吴三桂的使者胡江、王主司、江主司等人，以及达赖喇嘛派去吴三桂处返回的使者热绛巴嘉措南杰和嘉央俄色等，还有从工布军中返回的噶丹达尔吉、嘉色根敦、诺颜喀西卡、达尔东洛桑才旦等。达赖喇嘛说胡江能言善辩，但由于译者未能精通汉藏语言，许多话语未能准确译出。在午宴上，吴三桂的使者向达赖喇嘛递交了吴三桂的书信和汉地形制的银质国政七宝等礼品。

六月二日，由达赖汗出资，在布达拉宫森穷集合僧众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九日中午，达赖喇嘛会见吴三桂的使者胡江等人，交给他们给吴三桂的回信和礼品等，并派松曲热绛巴和嘉才仁为使者随胡江等去吴三桂处。二十二日，达赖喇嘛给噶丹达尔吉、塔西博罗特、娘热活佛等传授依怙随许除障法，赠给噶丹达尔吉衣物一套、印章等，并赠给他“噶丹岱青博硕克图济农”的名号，并让精通蒙藏语言的车臣温波高声宣布。达赖喇嘛还给塔颜齐等500多名噶丹岱青博硕克图济农的属下撒花祝福。

七月五日，达赖洪台吉专门派使者前来，向达赖喇嘛献黄金100两、银升、银砖、缎子5匹、衣物、茶叶等，并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六日，热振卸任堪布向达赖喇嘛献马60匹、白居寺卸任堪布献马160匹。十一日，达赖喇嘛赠给印度人阿扎雅赞玛格底黄金7钱、给玛努那和毕夏巴黄金各3钱，以及绸布等。十三日为消除违碍，达赖喇嘛出资在各宗豁举行白伞盖等念修仪轨。

八月三日，贾曹活佛将包括其座骑在内的15匹马赠给达赖喇嘛，红帽活佛亦赠马21匹。从十七日起的3天中，达赖喇嘛到河中洗浴。二十日，达赖喇嘛会见乌勒克图巴图尔台吉及其宰桑等人，杜尔伯特却克图的儿子丹增、额尔克曲杰，喀尔喀右翼岱青乌巴什及其夫人儿子，送噶丹哈坦巴图尔去世的回向礼品的使者，额尔德尼托因，秉图台吉，厄鲁特准噶尔的额尔德尼布木多吉、额尔德尼巴图尔台吉、鄂特欢等人的使者、第穆活佛的仲尼尔、库库木和古格的使者等。达什巴图尔台吉向达赖喇嘛献黄金100钱制成的金碗、金盘、茶叶113克以及银子、绸缎等千份礼品。

九月五日，达赖喇嘛会见印度婆罗尼斯的婆罗门支纳巴底

和噶尼夏德哇日，达赖喇嘛问他们什么是欲界天，有何功德学识，答称懂得历算学，达赖喇嘛认为他们大概是信奉遍入天的学者，达赖喇嘛赠给他们黄金各 4 钱及茶叶、褐布等。八日，达赖喇嘛会见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达赖汗的塔古斯额尔德尼宰桑、送班智达鲁易坚赞的回向礼的使者，色拉寺麦扎仓的洛本、察雅活佛穷哇、阳布王的使者等。十一日，达赖喇嘛给喀尔喀右翼的达赖乌巴什等 13 人授了比丘戒或沙弥戒。

十月四日起，为预防手脚病情复发，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7 天。六日，印度婆罗门提婆难陀来献海龟、歌舞鸟、石黄等方物，达赖喇嘛赠给他黄金 2 两、茶 3 包、缎子 7 方、红褐布、路引文书等，赠给迦迦罗摩室利黄金 3 钱、茶一袋、缎子 3 方等。十五日，因青海方向出现多种凶兆，达赖喇嘛下令在色拉、哲蚌寺熬茶，举行念诵白伞盖经咒的法事，并捐斋僧茶在西藏各密咒院举行诵咒法事。二十日，达赖喇嘛任命阿旺嘉央为打箭炉的噶丹演盘林寺的洛本，洛追诺布、诺布嘉措、阿旺格勒等人为翁则、格根等，达赖喇嘛还给以他们为首的 83 人授了比丘戒，给 42 人授了沙弥戒。

闰十月十七日，达赖喇嘛因自己是从四世班禅受的比丘戒，而四世班禅受比丘戒时正是三世达赖喇嘛因俺答汗的邀请前去蒙古之时，因此四世班禅是否是从三世达赖喇嘛那里受完了比丘戒存有一些疑问，这样从戒律传承上说，四世班禅的传戒可能只是西藏佛教后弘期中的下部戒律传承即喇钦贡巴饶色的戒律传承，而没有上部戒律传承即喀且班钦的戒律传统。为去除这一疑惑，达赖喇嘛在 61 岁时又在布达拉宫以戒律传承清楚明确的夏鲁堪钦仁钦索南却珠丹贝坚赞贝桑布为堪布和轨范师，以仁增旺波为密教师，以嘉央扎巴为屏教师，以却本阿旺喜饶和仁特那曼殊室利为圆教师，在足数的比丘之中再次接

受了具足比丘戒。达赖喇嘛再次受戒后，从次日起担任授戒堪布、由夏鲁堪钦任轨范师，在布达拉宫给许多僧人重新授了比丘戒，在一些天中每天给200来人授戒。

十一月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夫人、儿子、额尔德尼岱青博硕克图属下的巴图和硕齐、王子索诺木达什、土尔扈特衮布伊勒登的侄子、都尔格齐、杜尔伯特玛赖、噶居阿旺顿珠等人的使者、楚布寺强佐、森康夏喇嘛等。

十二月二日，达垄寺卸任堪布向达赖喇嘛献马73匹，并出资举行祈愿达赖喇嘛长寿的法事。四日，达赖喇嘛会见索尔钦波的转世、噶丹岱青博硕克图济农、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等。二十六日，达赖喇嘛会见从南方返回的前藏军队的将领和军官，达扎济咙活佛向达赖喇嘛献马61匹、阿玉奇献马21匹。

土马年（公元1678年　康熙十七年）五世达赖喇嘛62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欲界大自在奉献供养，举行元旦宴会。参加宴会的有达赖汗、第巴罗桑金巴、噶丹岱青博硕克图济农、达什巴图尔台吉、洛桑衮布拉布丹等蒙古首领40余人及其宰桑、属下共300多名蒙古人。还有觉丹卸任堪布、善巴活佛、乃宁活佛、上密院曲杰、色拉寺和哲蚌寺各扎仓的洛本、喀尔喀诺颜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的僧俗仲科尔等，由萨哇珠巴拉旺多吉在宴会上献吉祥祝辞，达赖喇嘛为参加宴会的人撒花祝福。二日的宴会有达赖汗和第巴、夏鲁堪钦索南却珠、觉热活佛、乃赛温仁波且、南杰扎仓僧众，西藏官员都按规定穿戴官服饰品，华贵艳丽。七日，达赖喇嘛会见了甘丹赤巴及仲科尔等50余人。十日，由桑阿绛曲林寺僧众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给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

的7800名僧人布施茶叶154包、马220匹、骡子59头，蔗糖348袋。十一日，由达赖喇嘛任堪布、夏鲁堪钦任轨范师、嘉央扎巴任报时师，给温仁波且、乃宁夏仲的转世、邦绒曲杰、翁则洛桑云丹、达摩曼仁巴洛桑曲扎、曲杰贡如哇旺杰多吉等传授了比丘戒，给温仁波且起名为阿旺洛色却丹。十五日，达赖喇嘛下令恢复各寺院在战乱时期废弛的传戒、修习等寺规章程及讲经修习制度，有犯戒行为的僧人要举行忏悔还净的法事。十六日开始达赖喇嘛在4天中连续给南杰扎仓的僧众重新传授比丘戒。十七日，达赖喇嘛给素尔钦波的转世等授了沙弥戒。二十八日，达赖喇嘛又给善巴活佛阿旺彭措、色拉、哲蚌、上下密院的执事僧等人重新传授了比丘戒。二十九日，夏鲁堪钦前往白居寺，达赖喇嘛赠给金银绸缎等供养，为其送行。因却本的请求，达赖喇嘛将扎浦曼仲豁卡的12岗差民封授给他，岁入粮食786克。

二月二日，达赖喇嘛会见达孜台吉拉嘉热丹、喇嘛根敦桑珠、墨尔格洛桑、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卫征达尔罕囊索、丹增洪台吉的使者车臣曲杰、楚琥尔乌巴什的使臣楚臣仁钦、阿塔尔台吉的使者阿旺扎西、乌克热台吉的使者丹巴仁钦，青海蒙古首领额尔德尼和硕齐的使者席拉巴图尔、墨尔根台吉的使者曲嘉措等300多人，并为他们撒花祝福。从五日起至三月七日之间，由达赖喇嘛任堪布、由勒雪林曲杰任轨范师、由嘉央扎巴任报时师，善巴活佛、乃宁活佛、勒巴顿珠等人任密教师，给喜培活佛、卓尼堪布、强林堪布、桑阿绛曲林、塔尔巴林、叶巴寺、德央扎仓、都哇、色拉杰扎仓、协噶曲德的洛本、堪布，喀尔喀夏仲、鲁本曲杰等677人重新授了比丘戒，给456人授了沙弥戒。二月十一日，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送来资财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

三月四日，达赖喇嘛会见从军中返回的毕力克额尔克台吉、热振堪布的使者、扎其墨龙寺的喇嘛等，还给台吉博罗特赠送印章和衣物，赠给他卓哩克图和硕齐台吉的名号，并为他赠礼送行。

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由噶丹岱青博硕克图济农和达赖汗分别出资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二日，曲隆措巴的堪钦和僧众向达赖喇嘛敬献以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为其母亲去世用150钱黄金建造的镶嵌珍宝的黄金坛城为主的大批礼品，由南杰扎仓僧众在布达拉宫森穷（达赖喇嘛寝殿）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将这一珍贵的坛城送给南杰扎仓作为供品。二十六日，达赖喇嘛给多吉扎活佛、顿尼林寺洛本、泽当勒钦巴等人重新传授了比丘戒。

五月一日，为了藏区的平安，由达赖喇嘛出资，由仁增德达林巴率僧众在大昭寺举行供修忿怒母的法事7天。五日，达赖喇嘛会见西藏军队的代本昂如哇、康玛哇、颇拉哇和达浦巴的儿子等。八日，达赖喇嘛给博硕克图济农及其子根敦（根特尔）等30余人传授了居士戒。会见了达赖汗、噶丹热绛巴、哉务首领等人。十一日，达赖洪台吉说自己的子孙中需要一个将来主管事物的人，因此想让噶丹热绛巴还俗回家，噶丹热绛巴本人想终生学佛，故请达赖喇嘛卜算，达赖喇嘛同意他还俗，收取了他的沙弥戒，给他起名为噶丹策旺贝桑，并赐给他蒙古俗人服装一套。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白居寺各扎仓的洛本、将返回厄鲁特的噶尔丹洪台吉和热振堪布的使者等。达赖喇嘛又派甲尔波哇多吉旺秋前去协助处理厄鲁特和喀尔喀的事务，赠给噶尔丹洪台吉以“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并带去印章、全套衣物等，并捎去书信、口信，叮嘱厄鲁特各施主保持平安。从十九日开始，达赖喇嘛命医生负责，用达赖

喇嘛到北京时获得的各种珍宝玉器、车臣汗鄂齐尔图的王妃多吉热丹玛所赠的西蒙古的各种宝石、吴三桂的使者所送的各种珍宝以及佛舍利、诃子、珍珠、珊瑚、海螺及各种药物，按可信的配方制成藏药“仁钦日乌”、“章觉”、“佐周”等药丸。

六月二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夫人和儿子、上密院热绛巴洛追桑培、热振墨尔根曲杰、工布佐钦温波、库库木王派来送药的两位使者、哲孟雄的使者等。三日，达赖喇嘛会见色拉寺的洛本、格贵、翁则等执事僧人。四日，达赖喇嘛会见噶尔丹洪台吉的使者温穷、诺门罕的使者赞巴拉等。噶尔丹洪台吉及其夫人给达赖喇嘛送来书信及礼品，礼品中有俄罗斯的机器（可能是钟表），内部显现出马、羊、狗等动物的水晶球（玻璃球），水晶匣和可以看见远处奇异景象的水晶筒（可能是望远镜），香料等。五日，本仓强俄巴夫妇及儿子等宴请达赖喇嘛。十七日，噶尔丹洪台吉和热振堪布的使者向达赖喇嘛献金银绸缎等礼品，并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八日，以甘丹赤巴强巴扎西为首的夏孜曲杰、洛本、执事僧及僧众等向达赖喇嘛献礼。甘丹赤巴请求达赖喇嘛答应长久住世，达赖喇嘛说人生寿数并不能自主，但是僧众出于一片至诚，因此只能应允，向三宝祈愿长寿。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为准噶尔噶尔丹洪台吉和热振卸任堪布的使者送行。二十二日，达赖喇嘛给拉尊洛桑曲迥等 9 人授了沙弥戒。二十四日，达赖喇嘛给甘丹赤巴强巴扎西、娘绒扎仓和色顶寺的洛本、达东鼐、格热哇洛桑钦则等人重新授了比丘戒，并给甘丹赤巴强巴扎西改名为洛桑丹增。二十五日，王妃古如去世，送来了银元宝、绸缎等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她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会见了喜尼洛本、旺仁曲德寺的管事、从吴三桂处返回的嘉才仁等。二十八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汗及其儿子、噶丹济农、

达什巴图尔台吉、毕力克额尔克台吉等。

七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王子丹增旺杰、拉藏鲁旺、恰那堪布、喜尼洛本、达垄桑阿曲科寺的格贵等人，以及鄂尔多斯东科尔活佛和额尔德尼岱青的使者等。达赖喇嘛还会见了从吴三桂处返回的使者松曲热绛巴、嘉才仁等，松曲热绛巴带来了吴三桂的信和送给达赖喇嘛的黄金 40 两等礼品。康区果洛官萨寺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因寺院香火地过小，达赖喇嘛下令给该寺增加 50 户属民，岁入粮食 250 克。达赖喇嘛又因中甸地区没有积聚福德的清净福田，故下令兴建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僧人 530 名，并任命琼结阿旺南杰为该寺洛本、嘉玛哇洛桑热杰为寺院涅巴，并拨给该寺 300 户差民。因地界划分不清，岁入粮食为 300 克。

八月一日，安多曲觉向达赖喇嘛献马 21 匹，那雪热达喇嘛献马 12 匹，恰者格隆献马 12 匹，松曲热绛巴洛桑楚臣献马 29 匹，鲁本桑波坚赞献马 51 匹，善巴温波献马 19 匹，土默特丹巴台吉献马 43 匹，色拉阿热贡麻献马 35 匹，强巴赤列献马 216 匹。三日到四日，达赖喇嘛给格隆顿珠、曲杰喀热巴、色拉翁则、甲尔波热绛巴等 48 人重新传授了比丘戒。王妃古如去世 49 天，她的两个儿子给达赖喇嘛送来了王妃所用的银桶、盆子等炊具，各种衣物，两顶蒙古包，马 318 匹，达赖喇嘛为王妃做了回向祈愿。二十三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大殿会见了清朝的使者诺摩馆（诺门罕）格隆、额尔德尼格隆，以及西藏派去北京后返回的使者都哇洛本和温穷。清朝使者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谕和礼品等，双方进行了交谈，都哇洛本向达赖喇嘛献了绸缎等物品。下午，达赖喇嘛单独会见噶丹策旺贝桑，进行了详细谈话。宁玛派的德达林巴按照《智慧明灯》中的授记，为达赖喇嘛从羊卓迎娶赤坚欧珠贝宗为明妃（密乘

活佛之妻），达赖喇嘛于二十四日派普隆·洛桑云丹送去礼品和达赖喇嘛的诗体信函。但赤坚欧珠贝宗是否来到拉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没有明确记载。当天，清朝的使者及同来的香客在布达拉宫大殿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他们各自的礼品。达赖喇嘛还会见了坚叶堪布、扎西曲林喇嘛、土默特丹巴台吉、鲁本曲杰等人。中午，索康巴阿旺贝桑为举行改装仪式（为求平息年灾月难等寿命灾障而改变装束服式或衣服颜色的一种禳解活动），宴请达赖喇嘛和桑结嘉措等，下午仪式完毕后，将索康巴阿旺贝桑列入达赖喇嘛的常随仲科尔之中。二十五日，当噶丹策旺贝桑动身去当雄前，达赖喇嘛再次会见了他。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给清朝的使者、诺颜呼图克图、都哇曲杰、仲达堪布金巴嘉措等藏蒙人士 300 多人传授了无量寿、马头明王、观世音的灌顶和修习法等。二十八日，清朝的副使额尔德尼格隆向达赖喇嘛转交了山洛阿升喇嘛阿旺金巴去世的回向礼品金质曼扎和绸缎等。三十日，达赖喇嘛给仲达堪布金巴嘉措、清朝的正使群觉贝桑（即诺摩馆格隆）、副使洛桑赤列（即额尔德尼格隆）、丹吉林喇嘛等人重新传授了比丘戒，还会见了热振堪布、白玛林巴活佛、进兵门域的将领南色林巴及其儿子扎西热丹、佐格首领洛桑、格隆扎西嘉措等，尚敦日楚巴献马 50 匹、热振寺献马 21 匹。达赖喇嘛下令给医生达摩哇、却本阿旺喜饶、格隆嘉央扎巴以及一些僧俗贵族、寺院新封或增封、改封土地和属民。

九月一日起的 11 天中，达赖喇嘛静修养息，供奉药师佛，清除违障及不洁。二十一日，止贡活佛、强佐、首领官却伦珠等向达赖喇嘛献马 50 匹，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二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梅惹喇嘛、代本乃赛巴，并派顿珠旺杰前去帕日办理事务。二十四、二十五日，达赖喇嘛给昂仁堪布、刚坚堪

布、那雪和木雅官赛寺的喇嘛、叶巴曲杰等70人重新授了比丘戒。二十八日，达赖喇嘛会见赛洪台吉的侄子拉尊、王妃才仁、达尔罕曲杰等，都哇扎仓卸任堪布厄鲁特曲杰派卫征温波等送来绸缎、玉石、金鞍及白银1600两等礼品。

十月五日起，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7天。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忌辰的灯火为中上，为消除达赖喇嘛可能遇到的违碍，达赖喇嘛下令在昂仁、协噶尔、拉孜、白朗、贡噶、琼结、曲科杰、墨竹、拉萨等地的寺院中举行念诵经咒的法事。

十一月五日，清朝使者及同来的香客等人出资，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六日中午，达赖喇嘛会见和款待清朝的使者以及派往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的使者纳塘堪布扎切活佛、安木齐塔阔、达赖汗派往北京的使者毕力克图等，并给他们赠送了礼物。八日，达赖喇嘛会见岗波活佛、羊八井京俄、定波且活佛、扎什伦布寺推桑扎仓的洛本及派往中甸噶丹松赞林寺任洛本的琼结巴阿旺南杰、阿力克热绛巴洛桑扎西、墨尔根贡杰等人，以及达赖洪台吉、作木朗王的使者。岗波活佛献马30匹、噶居班觉献马40匹。达扎济咙、温波等献马100匹、骡子30头以及金银、茶叶、皮张等千份礼品。达赖喇嘛还因清朝副使额尔德尼格隆的请求撰写了祈愿五世班禅洛桑意希长寿的祈愿文。九日，达赖喇嘛为清朝使者和西藏派往北京的使者们送行。

十二月二日，达扎济咙活佛出资为达赖喇嘛举行修供坛城祈寿的法事。

土羊年（公元1679年　康熙十八年）五世达赖喇嘛63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照惯例向欲界大自在奉献施食供

养。元月一日，达赖喇嘛举行有达赖汗、第巴罗桑金巴、巴图尔台吉、萨迥墨尔根台吉、索诺木洪台吉、额尔克济农、王子丹增旺杰、拉藏鲁旺、王子索诺木扎西、色拉寺和哲蚌寺的洛本、翁则、仲麦巴·桑结嘉措、却本夏孜曲杰以及作木朗、青海、厄鲁特、喀尔喀各部首领派来的使者等参加的新年宴会。二日举行的宴会有达扎济咙等僧俗首领和官员参加。五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等。八日，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由第巴罗桑金巴负责向大昭寺觉卧佛像献金刚橛、柱面幡、佛像衣裙等，并派格隆洛桑帕巴和阿旺嘉措向佛像献敬神哈达。十三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汗传授十一面观音随许法。十四日，王妃索南曲宗去世，送来了回向礼品马 80 匹、茶叶、绸缎等，达赖喇嘛为她做了超荐法事。十五日，达赖喇嘛向拉萨祈愿大法会布施僧帽、僧衣、钵盂、碗、坐垫、鞍具、茶叶等，给每名僧人白银 3 钱，合计 2860 两。

二月一日，克松巴和甲拉堪布分别出资，由南杰扎仓僧众在森穷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给萨迥墨尔根台吉及其夫人儿子、额尔克济农、哉务活佛、达赖洪台吉的使者，代本乃赛巴、顿珠旺杰、江洛金多吉、锵清巴等人传授随许法。萨迥墨尔根台吉献马 75 匹、额尔克济农献马 39 匹。三日，达赖喇嘛会见帕邦喀住持、绒巴活佛、卓尼达尔罕囊索等。六日，郭莽卸任堪布喇嘛赞布·阿旺赤列送来绸缎、坐垫、茶碗、铙钹、黄金 120 钱、白银 146 两、茶叶 37 包、哈达 50 条，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九日，萨迦夏仲坚白多吉贡噶索南旺秋前来布达拉宫，达赖喇嘛会见了他。十日，由颇拉哇出资，在森穷举行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十二日，达赖喇嘛给济咙活佛、萨迥墨尔根台吉等人传授长寿灌顶法和怙主随许除障法等。十三日萨迦夏仲献白银、布匹等，在南杰扎仓为达

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

三月五日，仲麦巴·桑结嘉措去桑耶寺向各佛殿献敬神哈达。桑结嘉措登记了桑耶寺所有内供佛像法器的目录。十五日，达赖喇嘛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僧众布施僧衣、僧裙、坐具、鞍具、食具等，给每名僧人白银2钱，共计1444两。二十六日，达赖喇嘛派阿旺钦则和顿珠嘉措二人前去修缮唐古拉山神的神殿并献供祈祷，以消除来自北方的违缘。二十八日，达赖喇嘛派格隆彭措嘉措、洛追嘉措前去哲孟雄山脚神殿献施食供养，献甲胄、弓箭、宝剑等。

四月六日，巴日活佛阿旺白玛圆寂，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十七日开始，达赖喇嘛用都孜温泉的泉水洗浴7天，帮助治疗手脚病痛。

五月一日，由萨迥墨尔根台吉、额尔克济农献金银、茶叶、绸缎等，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给他们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法，回赠给他们吉祥结、氆氇等。达赖喇嘛给喀尔喀夏仲以“咱雅班智达呼图克图”的名号和印章。六日，达赖喇嘛会见萨迥墨尔根台吉、哉务席力图活佛、咱雅班智达、固始汗的索本达赉等。八日，达赖喇嘛会见白居寺堪布、曲杰扎桑巴等，并给江洛金的儿子剃度，为其起名为彭措嘉措，并列入达赖喇嘛的仲科尔中。九日，白居寺堪布、12个扎仓的洛本、涅巴等献礼出资，在森穷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为珠旺活佛剃度，为其起名为阿旺丹增班觉。十一日，达赖喇嘛赠给阿旺丹增以“卓哩克图岱青”的称号，及印章、衣物、吉祥结、氆氇等。十三日，第巴罗桑金巴以原先说好任职三年，现在身体不好为由请求辞去第巴职务。达赖喇嘛遂派乃赛才旺和锵清巴洛桑钦则于本日下午去仲麦巴·桑结嘉措处，请桑结嘉措出任第巴。桑结嘉措几次推却，最后经达

赖喇嘛反复派人劝说，桑结嘉措终于同意担任第巴，达赖喇嘛的僧俗仲科尔和南杰扎仓的僧人首先向桑结嘉措献了祝贺的哈达。二十日，尼玛塘扎仓僧众向达赖喇嘛献礼并祈愿达赖喇嘛长寿。达赖喇嘛为咱雅班智达荐印新和卸任第巴罗桑图多写造甘珠尔的目录写了说明及祈愿文。达赖喇嘛考虑尽一切可能支持第悉桑结嘉措，应给他一个正式的委任，于是亲自书写了文告，文告中说现今自己年事已高，将政教事务委托给第悉桑结嘉措，因此第悉桑结嘉措与前几任第巴不同，桑结嘉措所做的即如达赖喇嘛自己所做的一样，并将此文告委托给各个护法神守护。这份文告中的一份写在布达拉宫三层阶梯的开端处，达赖喇嘛在这份文告上按了自己两双手的全手掌的印迹。第巴罗桑金巴卸任后前去噶丹康萨居住，桑结嘉措提出对其前任的忠诚业绩应给予褒奖，因此达赖喇嘛下令赐给罗桑金巴各种佛像、唐卡、法器、银器、玉器、黄金 1260 钱、白银 2500 两、大批绸缎、茶叶、马 31 匹、骡子 60 头等，并赐给他乃东、山南等地的庄园、土地，属民 923 户，堆穷 184 户，牧户 50 户，岁入粮食 36696 克。二十八日，噶丹策旺贝桑因阿里地区格鲁派力量十分衰落，因此愿率兵前往，支持阿里的格鲁派，第巴罗桑金巴等人以此事并无把握，因此不应派兵前往，进行劝阻，但噶丹策旺贝桑坚持己见，决意率兵前往，因此达赖喇嘛只好派第悉桑结嘉措给噶丹策旺贝桑提供物资费用等，派遣噶丹策旺贝桑去阿里。三十日，噶丹策旺贝桑动身前，达赖喇嘛因他的请求念诵了长寿偈颂，并赠给他护身结和礼品等。

六月二日，达赖喇嘛给第悉桑结嘉措传授无量寿、白度母、马头明王的灌顶法和随许法等，会见了从当雄前来的达赖汗、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等人。五日，第悉桑结嘉措向大昭寺觉卧像、布达拉宫观世音像以及退敌天女、吉祥天女、五部空

行母、唐古拉山神献盖有印章的敬神哈达，作为荐新。达赖喇嘛因桑浦内邬托寺僧众的请求，撰写了祝愿第悉桑结嘉措长寿的愿文。六日，举行第悉桑结嘉措的就职庆贺仪式。首先由桑结嘉措向达赖喇嘛献哈达、莲花生的九尖金刚杵、通人冠、僧衣、大缎21匹、马鞍、茶、布各21件及酸奶、酥油、蕨麻等吉祥食品，达赖喇嘛赐给钥匙、簿册、锦盒、印章等，宣布第巴就任。然后以名字吉祥的蔡寺夏仲扎巴才旺多吉为首，卸任第巴罗桑金巴的代表、达赖汗和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的代表、达赖巴图尔洪台吉等青海蒙古首领的代表、达扎济咙活佛、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堪布、洛本等向桑结嘉措献国政七宝、吉祥八徽等礼物，阳布王的代表扎辛提婆等克什米尔、尼泊尔的代表也献了礼品。在以后的几天中，前后藏各寺院和僧俗人士纷纷前来献礼祝贺。十三日，准噶尔的噶尔丹洪台吉、热振卸任堪布、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代表也向桑结嘉措献了金银、绸缎等礼品。三十日，作木朗王那热僧哈亲自抵达拉萨，其大臣萨玛博格、帕曼噶嘉巴底扎玛达等人向桑结嘉措献了门域所出的绸布、火枪、刀矛、蔗糖、马匹以及白银100两等物品。

七月一日，由准噶尔噶尔丹洪台吉出资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中午，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大殿会见了五世班禅及其随从，五世班禅献了金银、茶叶、绸缎等礼品。三日，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主仆等谈话。四日，达赖喇嘛会见了跟随五世班禅前来祝贺第悉桑结嘉措就职的后藏地区的僧俗人士。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见了动身去当雄的达赖汗一行。噶尔丹洪台吉所派的又一批使者抵达，向达赖喇嘛递交了书信和礼品。七日，达赖喇嘛给昂仁堪布、拉孜曲德卸任堪布、曲杰曲弥巴等人做了加持，八日，给达扎济咙、昂仁堪布、绛孜曲杰、喀尔喀咱雅班智达、墨尔根格隆阿旺洛追等人传授了随许法。十五

日，五世班禅向达赖喇嘛献银质曼扎、无量寿佛像等，并给南杰扎仓每名僧人一条哈达、一两银子、一方缎子，举行修供无量寿佛彩粉坛城法事，以建立法缘，作木朗王也参加了修供法事。从十八日到二十四日，达赖喇嘛给五世班禅和达扎济咙等人传授了二十一度母随许法及格鲁派的一些教法。二十五日，卸任第巴罗桑金巴动身去乃东居住，达赖喇嘛为他赠礼送行。吞巴济仲被任命为扎什伦布强佐，他向达赖喇嘛献了礼品，达赖喇嘛赠给他吉祥结、僧裙等，并给予教诫。中午，达赖喇嘛宴请五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并回赠五世班禅袈裟、银号、玉器、绸缎、氆氇等。二十六日，楚布寺贾曹活佛向达赖喇嘛献礼，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并为其传授沙弥戒，起名为阿旺贡扎嘉措。达赖喇嘛还会见茫拉、襄格培堪布和车臣热绛巴兄弟等。土默特达尔罕诺颜去世，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二十八日，五世班禅向达赖喇嘛献黄金曼扎，祈请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达赖喇嘛教导他年轻时要努力学习经典和教法，并赠给护身结，五世班禅即动身前往扎什伦布。

八月六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到河中洗浴。十四日，甘丹赤巴、夏孜曲杰、绛孜曲杰等甘丹寺的僧人500多人前来，举行供养十六罗汉的法事，祈愿达赖喇嘛长寿。十七日，达赖喇嘛会见蒙古首领色布腾，赠给他额尔德尼青台吉的名号，以及印章、佛舍利、衣物、水晶、氆氇等礼品。十八日，达赖喇嘛给作木朗王那热僧哈及其臣下回赠黄金60钱、缎子16匹、绸子35匹、水晶莲花碗、金鞍、银号、衣物、茶布、氆氇、葡萄干等，使作木朗王十分高兴恭敬。二十四日，达赖喇嘛给帕巴拉活佛、阿旺活佛、丹玛曲科活佛等人传授了加持法。帕巴拉活佛向达赖喇嘛献不动金刚像、黄金100钱、银55两、

绸子 18 匹、缎子 10 匹、甲胄 10 副、马 111 匹、骡子 18 头、犏牛 50 头、牦牛 100 头及虎皮、豹皮等。从本日起的 4 个 7 天中，达赖喇嘛严格闭关，和活佛仁增钦波依据新伏藏修习寿命法。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给喜培活佛、东嘎活佛、热振堪布、理塘寺卸任堪布、江达、梅拉、拉里等寺的喇嘛，土默特丹巴台吉的侄子、墨尔根曲杰等蒙藏数百人传授加持法并撒花祝福。二十四日，达赖喇嘛赠给索特巴伊勒登之子拉尊阿旺丹增赠给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名号，以及印章、衣物、氆氇等物品。二十五日，达赖喇嘛为哲蚌寺等寺院供礼佛像等法事赐给属民土地。二十六日，印度尼泊尔交界地区的国王那罗哈日古玛拉派婆罗门罗摩旃罗、雅夏曼达格日为使者，送来书信和礼物，达赖喇嘛回赠银元宝、黄金 30 钱等物品。达赖喇嘛给帕巴拉活佛、拉里喇嘛等人传授了比丘戒，给阿旺活佛等人授了沙弥戒。二十九日，达赖喇嘛会见率兵前去阿里支援噶丹策旺贝桑的噶丹丹增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拉旺贝拔、岱青和硕齐额尔德尼台吉及他们属下的宰桑等。从三十日起的 6 天中，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

十月十日，红帽活佛向达赖喇嘛献马 17 匹及衣物等，达赖喇嘛给他传授了长寿灌顶法。十七日，达赖喇嘛会见达什巴图尔台吉及其随从、达赖洪台吉和额尔克岱青的使者等。二十八日，帕巴拉活佛捐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

十二月一日，传来噶丹策旺贝桑在热拉康玛击败拉达克的大臣释迦坚赞率领的拉达克前锋军队的消息，拉萨僧俗民众向各护法神献了敬神哈达，达赖喇嘛在哈达上题了词。十三日，达赖喇嘛会见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的使者措索热绛巴以及达赖喇嘛派去噶尔丹处的使者车臣达吉，以及丹增和硕齐的使者

达吉格隆、达赖洪台吉的使者博科班第等。十七日，由鄂尔多斯喇嘛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派本顿巴伦珠嘉措前去噶丹策旺贝桑军中，行前达赖喇嘛对他做了护佑和详细的指示。

铁猴年（公元 1680 年　康熙十九年）五世达赖喇嘛 64 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奉献盛大供养。元月一日在布达拉宫大殿举行庆祝新年的宴会。参加的有达赖汗、第悉桑结嘉措、达扎济咙活佛、色拉寺和哲蚌寺、帕邦喀、墨如的堪布、洛本等，卸任第巴罗桑金巴的使者罗桑却丹、萨迦赤钦的仲尼、各宗豁前来献礼的代表等。二日的宴会有达赖汗、南杰扎仓的全体僧人、穿戴官服的官员 50 多人、各地首领及仲科尔 70 多人、作木朗王的使者等人参加。四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下密院翁则、东嘎活佛仓央周扎、日喀则宗堆乃赛旺杰、江孜宗堆朵官巴、昂仁宗堆郭喀哇、白朗宗堆察哇珠巴、孜拉岗宗堆岗巴、伦珠孜宗堆噶扎巴、仁蚌宗堆吉浦巴、江达宗堆德林巴、古热宗堆觉吉巴、甲措豁堆噶雪巴、拉布豁堆热玛哇、森格宗堆米仓墨巴、拉康豁堆昂如哇、曲水宗堆日苏巴等人，并与甘丹赤巴详细谈论教法。九日起达赖喇嘛闭关修习 7 天。十四日，达赖喇嘛给第悉桑结嘉措传授了长寿灌顶。十六日，达赖喇嘛给参加祈愿大法会的僧人每人布施白银一钱，共用银 769 两，另给每人茶叶两涅噶半，共用茶 391 包。并向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药王山的佛像献净水、哈达、银器等。

二月三日，由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捐赠资财，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二日，达赖喇嘛会见杜尔伯特却克图之子额尔克台吉及其夫人、阿巴赖的夫人、盘德曲杰

的转世、咱雅班智达的使者扎西南杰、中甸的献礼者诺尔布等。十七日起，在前后藏许多寺院和扎仓举行为达赖喇嘛和第悉桑结嘉措祝愿祈寿的法事活动。

三月二日，达赖喇嘛因门域梅拉喇嘛的请求，撰写了祝愿第悉桑结嘉措长寿的祈愿文，四臂依怙施食仪轨、向咱日山神施食的仪轨等。八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大殿主持向怙主奉献供养和施食的法事。

四月二日开始，因第悉桑结嘉措的一再请求，达赖喇嘛同意编写自己的传记，由古如多吉、赤列南杰、阿旺赤列、阿旺嘉措4人负责抄录整理等工作。五日，扎什伦布寺强佐丹增嘉措献银质曼扎、银号、绸缎、马8匹，达赖喇嘛给他传授加持。九日，扎什伦布寺派人来向达赖喇嘛献礼。

五月八日，尼泊尔工匠毕拉居去世，给达赖喇嘛送来了药师佛铜像及担任修造江孜白居寺十万佛塔的铜匠和金匠工作而得到的黄金99钱、白银120两作为回向礼品，达赖喇嘛为他做了超荐法事。达赖喇嘛上次派往清朝去的副使安木齐塔阔抵达拉萨。三十日，达赖喇嘛派山洛热绛巴楚臣南杰和洛桑才仁为使者去北京，向康熙帝进呈祝贺清朝战胜叛逆吴三桂的诗体奏表和给皇帝的礼品。

六月八日，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向布达拉宫大殿献银壶19把，并熬茶布施。二十三日，清朝的使者却典喇嘛丹增格隆、副使青城恰那多吉以及同来的香客近300人抵达拉萨，西藏上次派往北京的使者那塘堪布也一同到达。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清朝的使者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书和礼品。二十九日，清朝的使者及由北京返回的西藏使者向达赖喇嘛献他们自己的礼品，达赖喇嘛给他们摩顶，并给众人撒花祝福。

六月一日，达赖喇嘛和第悉桑结嘉措下令以后每年由拉萨

涅仓交付叶尔巴寺供祀所需的酥油、粮食、青油等。十日，达赖喇嘛给达赖汗、第悉桑结嘉措、清朝的使臣等上万僧俗人士传授了大悲观音随许法、上师瑜伽等教法。

七月十日，达赖喇嘛会见门域达旺噶丹拉孜寺新任命的喇嘛下密院翁则、梅拉喇嘛洛追嘉措、门巴阿真父子等，并给他们传授了加持法，本年中梅拉喇嘛受达赖喇嘛之命在门域建立达旺寺，西藏地方政府在门达旺地区行使行政管辖。十一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五日，达赖喇嘛会见博硕克图汗之弟、额尔德尼布木、贡本曲杰索南扎西、噶丹策旺贝桑等人。十八日，达赖喇嘛给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色康活佛和前去准噶尔的喇嘛等赠送大氅等礼物。从二十六日到八月十日，达赖喇嘛严格闭关修行。

八月十一日，达赖喇嘛给第悉桑结嘉措传授长寿灌顶。察罕诺门罕向达赖喇嘛献马 200 匹、骆驼 100 峰。十三日，由清朝使者捐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十九日起的几天中，达赖喇嘛给精奇寺堪布、拉哇堆堪布、清朝使者恰那多吉、康区林仓活佛等二百多人传授了比丘戒，给 114 人授了沙弥戒，并为那塘堪布新写造的甘珠尔开光。二十五日，噶丹策旺贝桑捐献资财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派精奇寺堪布、桑珠岗巴为进京使者，交给他们奏表，并带去了给皇帝的详细的口信。二十八日到三十日，达赖喇嘛给察罕诺门罕、安多阿嘉囊索贝丹嘉措、鄂尔多斯台吉、巴日曲隆曲杰班觉桑布等 146 人传授了比丘戒，给哉务曲杰等 18 人传授了沙弥戒。达赖喇嘛下令将曲科杰寺的噶尔巴扎仓迁移到玛尔巴家乡的洛扎卓窝隆，新建为一座密宗院，并命名为噶丹桑阿德庆寺，并为寺僧提供生活和举行法事活动所需的物品，并赐给属民 65 户，岁入粮食 2979 克，酥油 418 克。卓窝隆原

有的尼姑加上浦格和噶仓的尼姑共25人，每月举行修供仪轨所需法器、茶叶、粮食亦由政府提供。

九月八日，多吉扎活佛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从九日到月底，达赖喇嘛与多吉扎活佛、仁增活佛等一起修习宝帐依怙、无量寿等教法。

从十月五日起的9天中，从曼曲和桑衣两个温泉取来泉水，供达赖喇嘛洗浴。十七日，由萨噶地方头人多吉扎布出资，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会见泽当夏仲、阿旺仁增旺波、羊卓桑顶活佛、绛孜曲杰、桑丹堪布、色拉丹增活佛、第巴多喀哇等。官德囊欠巴献马50匹，丹玛扎乌喇嘛献马8匹，夏琼活佛献马33匹，阿力克彭措献马44匹。十八日由第巴多喀哇捐赠资财，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九日，达赖喇嘛给仲麦本萨布赤杰莫和玛索仓旺兄妹等人传授加持法和长寿灌顶。三十日，达赖喇嘛下令给一些僧俗人士封授属民和土地。其中对日喀则索日洛扎（医学学校）日常供奉药师佛和八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而赐给属民5户及空地等。岁入粮食690克。因第悉桑结嘉措做了恶梦，命日喀则等17个宗的格鲁派寺院举行念诵甘珠尔、般若十万颂、八千颂的活动，以遮止恶兆。

十二月三日，达赖喇嘛会见喀尔喀嘉央活佛的使者毕力克图达尔罕囊索、西迪巴图尔洪台吉的使者琼结巴洛桑群培、班智达夏仲的使者额尔德尼达尔罕安木齐、达尔罕洪台吉的使者达尔罕囊索、墨尔根洪台吉的宰桑囊索等，接受了各个使者带来的书信和礼品，并听取了他们所转达的口信。达赖喇嘛设宴款待他们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的使者热布丹、杜尔伯特色布腾、乌勒吉图巴图尔台吉的使者等。十三日，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返回时，达赖喇嘛给噶尔丹带了回信和口信，

并为使者送行。

铁鸡年（公元1681年　康熙二十年）五世达赖喇嘛65岁

藏历新年时，达赖喇嘛向三界之主呈献盛大供养。元月一日的庆贺新年宴会，参加的有丹增达赖汗等施主、喀尔喀左翼的使者、达扎济咙活佛、哲蚌寺和色拉寺各扎仓的洛本、翁则等，乃东和萨迦派来的献礼者等近千人。二日的宴会参加的有达赖汗、南杰扎仓全体僧人，穿戴官服饰品的官员30人等。在当天的宴会上，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宣布噶尔丹占领了白头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广大地区，统治以叶尔羌城为首的1500余座城镇乡村、居民近200万人，并由洛桑喜饶代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宣布把这些地区献给达赖喇嘛和佛法。宴会结束后，布达拉宫山上山下及拉萨城中广树旗幡，奏响器乐，以示庆祝。四日，达赖喇嘛会见甘丹赤巴、泽当强佐、哲蚌寺格贵等。五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向达赖喇嘛呈献各种礼品，其中有白头人的纯金制成的金冠，上面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红莲宝石、珍珠等，每颗宝石的价值在百钱黄金以上。此外还有金银、西蒙古的各种物品等。并给南杰扎仓的每个僧人一条织金丝哈达、黄金一钱、缎子一匹，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六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又给南杰扎仓僧人每人金丝哈达一条、普通哈达一条、缎子一匹，继续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八日（本月藏历无七日）又与六日同样布施，继续为达赖喇嘛祈寿。十一日，夏鲁堪钦嘉央丹增捐赠资财在布达拉宫森穷殿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九日，达赖喇嘛给达什巴图尔台吉等人传授加持法。

三月二日，为了给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依止供奉，建造一尊五世达赖喇嘛的等身像，像内装佛舍利，印度、尼泊尔和西藏

的有加持力的圣物，五世达赖喇嘛穿用过的衣物等。四日，达赖喇嘛为此等身像远去蒙古而写了祝愿长久住世的祈愿文。还为王子拉藏鲁旺写了向度母祈请的祈愿文。七日，达赖喇嘛给派往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那里去的夏果尔扎仓卸任堪布琼结热绛巴洛桑扎西、噶尔丹的使者洛桑喜饶、喀尔喀岱青洪台吉和车臣洪台吉的使者等50多人传授了六臂观音随许除障法，并赠给氆氇、衣物等，为他们送行。八日，达赖喇嘛将丽江温波之子班觉嘉措列入自己的常随仲科尔之中。从十日起的7天中，达赖喇嘛用德卓温泉的泉水洗浴。十九日，达赖喇嘛为达赖汗父子三人新写造的甘珠尔经开光，同行的有达孜台吉拉嘉热丹、云如活佛、扎塘堪布。

四月八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大殿会见从厄鲁特抵达的王妃扎西、席力图曲杰、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吉宰桑、达赖洪台吉的济农、额尔德尼巴图尔台吉和卓哩克图和硕齐台吉、额尔克济农的使者等，喀尔喀诺颜呼图克图、墨尔根洪台吉的使者等。十七日，格隆嘉央扎巴献阿弥陀佛玉石像、哈达、大氅、衣物、绸缎、茶叶等，在布达拉宫森穷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并宴请南杰扎仓僧人和仲科尔等。二十日，丹增达赖汗捐献衣物、绸缎、茶叶等，并熬茶布施，在南杰扎仓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噶丹策旺贝桑等也献了大量礼品。二十一日，哲蚌寺执事僧众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二十二日，色拉寺执事僧众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

五月十一日至十八日，达赖喇嘛给欠本（管理跳神活动的执事僧）阿旺官却、洛桑意希等336人授了比丘戒，给珠巴群则赤列贝桑等141人授了沙弥戒。十六日，热穷浦活佛圆寂，送来了回向礼。达赖喇嘛为其做了超荐法事。十八日，以甘丹赤巴和绛孜曲杰为首的300多名甘丹寺僧人到布达拉宫举行祈

愿达赖喇嘛长寿的法事。

七月九日，夏鲁哇钦波圆寂，送来了回向礼品，达赖喇嘛排列喜金刚、那若空行等殊胜神像，呈献供养，体验已身与上师无别的甚深道修法，并书写了祈愿文，连同绸缎、敬神哈达等，派专人送去。十一日，达赖喇嘛会见喀尔喀达赖呼图克图、安木齐强巴嘉措、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阿旺嘉措、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达赖洪台吉、车臣济农、土尔扈特阿玉奇等人的使者，以及达那图丹堪布、喀热活佛、洛扎扎西曲林、觉摩隆、秦浦、措麦等寺院的经师等。二十四日，达赖喇嘛会见达赖洪台吉的使者额尔克和玛赖、察罕诺门罕的使者尊追嘉措、车臣曲杰的使者达尔罕格隆等。从二十六日起的7天中，从河中取水供达赖喇嘛洗浴。

八月七日，拉萨墨如的僧众出资财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根据夏鲁哇钦波的意愿，桑丹堪布、强佐索南仁钦等人送来夏鲁哇钦波的袈裟等物品，达赖喇嘛为夏鲁哇钦波做了盛大的回向和祈愿法事。十日，达赖喇嘛将白银150两、玉石、珊瑚等交给桑丹堪布、夏鲁寺强佐和仲尼等，作为捐给为夏鲁哇钦波建造灵塔的基金，并为此拨给寺属庄园，在夏鲁寺和白居寺建立定期的供祭。

九月一日，叶尔巴寺僧众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会见夏康诺门罕和嘉央活佛等人的使者，以及额尔德尼台吉、达尔罕安木齐等人，达赖喇嘛赠给额尔德尼台吉以额尔德尼卓哩克图台吉的称号，并给印章、氆氇等。二日，多吉扎活佛师徒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会见帕邦喀住持、上密院、恰那、托日等寺院的洛本。此时清朝皇帝的使者章嘉热绛巴、厄鲁特曲杰洛桑才仁抵达，向达赖喇嘛递交了皇帝的敕书和礼品。六日，达赖喇嘛为策旺达吉写造贤劫经、方广大

庄严经、华严经、大悲白莲华经撰写了目录和祈愿文。又因唐萨寺僧众的请求，撰写了祈愿阿仁巴南喀桑波长久住世的祈愿文。

水狗年（公元1682年 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66岁

二月十日开始，达赖喇嘛进行依止作明母的闭关修习，至十七日出关进行念修。此时达赖喇嘛脚部的病痛又复发，由医生达摩哇用药治疗。十九日黎明时，用了措麦堪布配方的根泻疗法药“南甲司巴”（一种泻药），但疗效不很明显，因此又接连用了几剂这种药，疗效显著。这时第悉桑结嘉措正为在各寺院举行为达赖喇嘛祈寿的法事而在各地巡视，十八日，桑结嘉措得病发烧，病势较重，住在拉萨。二十二日，达赖喇嘛带口信给桑结嘉措说，你的病使人担心，我吃了根泻药后效果很好，不必为此烦扰。二十三日，桑结嘉措派人对达赖喇嘛说：自己做了一场恶梦，达赖喇嘛用泻药后，自己未能在达赖喇嘛身边服侍，甚至未能到达你的身边，很觉不安。当天，达赖喇嘛朝礼了布达拉宫的内供本尊神像，并取出一尊铜像命森穷噶巴旺丹给桑结嘉措带去，并带口信说，我的病不要紧，倒是你自己似乎遇到魔鬼做祟。二十五日早晨，医生达摩哇到第悉桑结嘉措处，说达赖喇嘛的脉相不好，吩咐说如果第巴能来，请传话让他前来。第巴说我当然可以前往，不过我和你一同前去，可能引起人们对达赖喇嘛的病情的猜疑，你可先去，我随后以阿里方面有使者前来，有要事禀告的名义前往。桑结嘉措到达赖喇嘛身边时，达赖喇嘛为其摩顶，并详细询问其病情。桑结嘉措发现达赖喇嘛呼吸急促，与却本商议为达赖喇嘛举行祈寿法事。达赖喇嘛吩咐其他人去用午饭，留下桑结嘉措在身

边，抚摩着第巴的头，对第巴讲了政教两方面需注意的事项以及对汉地蒙古为主的施主如何侍承的教诲。到却本阿旺喜饶和达摩哇返回达赖喇嘛身边，桑结嘉措去用午饭时，达赖喇嘛的病情突然加重。当桑结嘉措返回时，达赖喇嘛呼吸十分急促，桑结嘉措再次祈祷达赖喇嘛莲足久驻时，达赖喇嘛吩咐拿来佛舍利，接过佛舍利后，达赖喇嘛向佛舍利请求护持后，即于中午马时圆寂。

达赖喇嘛圆寂后，第悉桑结嘉措即对当时在场的人宣布，对达赖喇嘛圆寂实行匿丧，匿丧的期限不定。众人即立誓遵守。除在场的人外，其他只通知了锵清巴阿旺钦则。桑结嘉措对外宣布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严格闭关修行，不接见任何外人，所有事务由第悉桑结嘉措代为禀报和传达。匿丧的规定执行得很彻底认真，后来外间人士和清朝政府虽然对此产生怀疑，但始终无法证实。直至1697年，桑结嘉措才派使者尼玛塘呼图克图向康熙帝密奏达赖喇嘛去世已16年，其转世已15岁。1697年九月，第悉桑结嘉措向全藏及蒙古各部宣告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多年，并迎请六世达赖喇嘛到拉萨，于十月在布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登上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法座。

原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藏学研究论丛》第7辑、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

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

十年前，笔者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听到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据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同志在西山一带采风时，发现红旗村、正白旗村有些农民会唱一种与北京地区民歌迥异的歌曲，歌词亦非汉语，询问其词义，则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无人懂得。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有的说原是南方的苗族，与清朝打仗，战败被俘而来，有的人过年节要专门进宫表演民族歌舞，所以南方的民歌保留下来了，但现在都使用汉语了，所以无人知道歌词内容。煤矿文工团的同志将他们唱的歌曲录了音，到中央民族学院遍询从南方来的各族师生，期望能确定这种歌曲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的。正好有西南民族学院的赞拉·阿旺同志，是四川小金川地区（今小金县）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进修班攻读，他鉴别出这种歌曲应是四川金川地区藏族的歌曲。此后，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曾到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了解更多的情况，认为当地有一部分农民是从金川迁来的藏族人的后裔，大约是清代乾隆年间两次平定金川时有一部分藏族人被

俘，被迁来此处定居。从当地附近山上建有金川藏族风行的石碉房，可以得到佐证。但是由于没有找到直接的文字资料证明，当地的人又坚持认为其祖先是南方的苗族，所以这一问题未能最终解决，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探讨。

《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先生的《略述北京地区的西藏文物》一文，在介绍护国寺、白塔寺、五塔寺、嵩祝寺、雍和宫、黄寺、香山昭庙之后，指出："总之，北京地区有关藏族的文物古迹甚多，除去上述主要者外，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物古迹。例如，房山县上方山兜率寺及其所藏藏文佛经，西山红旗村实胜寺有关金川事件的四体文《御制实胜寺碑》；西山红旗村演武厅及正白旗村附近山上建有金川藏族所修的清代藏式石碉房为攻打金川练兵之用；故宫雨花阁供奉的西藏佛像及其藏式装饰；故宫明清档案馆所藏的历代达赖、班禅向清朝皇帝呈进的大量藏文书信奏折；中南海紫光阁所绘的金川战图及功臣像；颐和园后山香岩宗印之阁附近的藏式红台建筑及碉房、佛塔；顺治、乾隆两帝分别宴请过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的南苑德胜寺；朝阳门内禄米仓以刊印汉藏文对照的西藏密宗图书闻名的密宗院，等等。"近年来，他发表了研究南苑德胜寺、密云番字牌村、法海寺的文章。但研究实胜寺及藏式碉房的文章还未见发表。去年，西藏文献资料丛刊出版了张羽新先生编的《清代喇嘛教碑文》，在《实胜寺碑记》的注释中对香山藏族碉房的来历、健锐云梯营的训练及实胜寺的修建做了说明，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展开考证，加以这一问题本来就比较复杂，注释中的说明还有许多值得补充和探讨之处（详说见后）。笔者对香山藏族碉房这一问题也很有兴趣，近年来在工作中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对香山藏族人的来历问题形成了一些粗浅的看法，故在

张羽新先生的注释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整理成文，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清代喇嘛教碑文》所收乾隆御制《实胜寺碑记》及编者所加注释如下：

"去岁夏，视师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苦酋之恃其碉也，则创为以碉攻碉之说，将筑碉焉。朕谓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为之筑碉，是所谓借寇兵而资盗粮者，全无策矣，为之懑然。因忆敬观列朝实录，开国之初，我旗人蹑云梯、肉搏而登城者不可屈数，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之人犹昔之人也，则命于西山之麓，设为石碉也，而简佽飞之士以习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两千人，更命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统之以行，且厚集诸路之师，期必济厥事。赖天之佑，大功以成。此固经略智勇克兼，用扬我武，酋长畏威怀德，厥角请命。是以敌忾以往者，率中道而归，窃恨未施其长技，有余怒焉。记不云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云梯之习，犹是志也，而即以成功。则是地者，岂非绥靖之先声、继武之昭度哉？因命择向庀材，建寺于碉之侧，名之曰'实胜'。夫已习之艺不可废，已奏之绩不可忘。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健锐云梯营，并于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间亦依山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太宗皇帝尝以偏师破明十三万众于松山、杏山之间，归而建实胜寺于盛京，以纪其烈。夫金川蕞尔穷番，岂明师比。然略昆明而穿池，胜侨如而名子，其识弗忘一也。《汉书》训碉作雕。碉为石室，而雕则若雕鹗之栖云者，皆非是。盖西南夷语，彼中呼楼居，其音为碉云。

注：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 年）清高宗弘历撰。碑存于北京海淀区实胜寺。

在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斗中（即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凭借山高路险和石碉堡垒，大量杀伤清军。乾隆认为金川‘地险碉坚，骤难取胜’，因而参酌清朝入关前与明军作战的经验，‘因于京师香山（今北京西郊香山公园附近）设石碉，造云梯’，‘其筑碉者，即金川番兵也’（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 年）第一次金川之役虽然宣告暂停，清政府彻底平定大小金川的打算并未完全放弃。乾隆认为‘已习之艺不可废，已奏之绩不可忘’，乃命将俘获的一部分大金川士兵和工匠在香山附近旧有碉堡的基础上，仿大、小金川的地形和石碉，再筑石碉，组建‘健锐云梯营’，训练山地攻碉部队。为庆祝大金川之役的胜利，同时也考虑到俘获到北京筑碉的大金川士兵和工匠的宗教信仰，乾隆命仿清入关前皇太极在沈阳建实胜寺的先例，于香山石碉群旁建立了实胜寺，并亲制此碑文以为纪念”。

可见注释者认为：1. 在大金川之役进行过程中，乾隆帝即已在香山设碉练兵，筑碉者为金川番兵。2.1749 年大金川之役宣告暂停，乾隆帝命将俘获的部分金川士兵再筑石碉，组建健锐云梯营。3. 为庆祝大金川之役的胜利，同时考虑筑碉金川士兵的宗教信仰，建立实胜寺。对此几点须作如下补充：

清朝认识川西藏族的碉房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不始自大金川之役。乾隆十年至十一年（公元 1745—1746 年）清朝用兵瞻对，已知藏族战碉难攻，川陕总督庆复在疏陈瞻对善后事宜时就说：“西番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差土目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

建碉楼，毋得过三层以上，仍令每年年终出具印结存案。”在大金川之役中，金川的战碉更使清军损兵折将，寸步难进，清军将帅一筹莫展。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月川陕总督张广泗奏报：“上年因贼碉险固，一切攻碉之法，如穿凿墙孔以施火球，及积薪墙外围焚，贼皆防御严密，不能近前。彼时缺少大炮，惟掘地穿穴至碉底，多以火药轰放地雷，即可震塌碉墙。因拣调各厂矿夫，攻取曾达一碉，讵掘成，于穴中听闻碉内贼声，以为已到碉底，不意举发地雷，尚离碉二、三丈远，致未收功。复于木耳金冈之大碉，挖地道已成。令于穴中打通地上一小孔，看明已在碉内，即放火药轰击，乃系贼寨东北耳碉，虽经震塌碉顶，西南耳碉，亦冲破一孔，然正中大碉，止摇动而未倾倒。自此贼皆设防，各于碉外周掘深堑。此法不能再施。”外围战碉如此难破，使得清军无法迫近大金川首领莎罗奔等住守的勒乌围、刮耳崖。在此情况下，乾隆帝派往金川督师的大学士讷亲提出“以碉攻碉”的办法：“贼番因险砌碉，藏匿其内，故能以少御众，以逸待劳。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之意，且守碉无须多人，更可余出汉、土官兵分布攻击，似亦因险用险之术。”乾隆帝对讷亲的办法大不以为然，认为“但攻守异用，彼之筑碉以为自守也，我兵自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且用以破碉之人而令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碉不固，则不足恃，筑碉固，则徒劳众。若以此筑碉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碉，以夺其恃，不亦可乎？”讷亲提出的是长围久困的持久作战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如实行这样的方针，“师老财匮”，兵费至钜，难以负担，而且“大兵聚久，变患易生。在因原居于无事之时，尚有一夫夜呼，仓促四起之变，何况军中亲信仅百数十人，此外皆调发客兵及蛮司土卒，本非世受深恩为我心膂，浮

寄孤悬，孰无室家乡里之恋？而劳役不已，奏凯无期，版筑方殷，锋锐莫展，肘腋之虑，良可寒心”，因而断不可行。但是，乾隆帝也拿不出迅速破碉的办法，又不愿罢兵，最后想出用满洲兵云梯登城的办法来攻取战碉，正如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七月癸卯的上谕中说：“朕意示弱罢兵以逞贼意，断不可为，而又实无制胜万里之能，因思满洲旧有蚁附登城技艺，甚为便捷。因承平日久，未经演习。今已派大臣挑选八旗兵丁数百名，按期操练，务令纯熟，将来或可备攻击碉楼之用。”七月丁丑的上谕又说：“朕现在特派大臣，挑选精壮满兵三百演习云梯，即令伊等兼习鸟枪，俟其熟练，临期再挑选侍卫等于明春带领前往，以备率领官兵进攻之用。”由此可见，乾隆帝在香山设碉练兵实开始于乾隆十三年七八月间，所练之兵，全为满洲八旗的士兵，第一批为三百人，练习的是以云梯攻碉之法。至于当时筑碉的是否为被俘的“金川士兵”，没有明确的记载，尚难断定。七月癸卯的上谕中还说，总兵马良柱因作战失败被解送到京，乾隆帝面讯之后，“并暂留马良柱于京师，且不问其罪，令其量度贼碉情形，协同演习”。可见当时协助练兵、指示金川战碉情形的，其实是曾在金川作战的清军自己的将领。魏源《圣武记》所说：“其筑碉者，即金川番兵也”，是指后面的情形。同年九月己卯乾隆帝的上谕中又说：“朕思我朝满兵素称勇敢，身临行阵，惟有捐躯效命，奋勇先登，从无退缩。若续派满兵数千前往，必能速奏肤功。现今虽于八旗前锋护军内挑兵一千名，操演云梯，但为数尚少。著再择汉仗好者一千名，合为两千之数。”几天之后的十月壬午，“大金川所调满洲兵五千名，自京起程前赴军营”。可见乾隆十三年七月至九月香山设碉练兵，其实只训练了云梯兵一千名，并非乾隆帝《实胜寺碑记》中所说“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两千

人”。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十一月，乾隆帝新派的经略大学士傅恒离京出征，次年正月，金川首领莎罗奔、郎卡乞降。乾隆帝看到金川一时难以彻底征服，指示傅恒接受金川投降，班师回朝。此次大金川之役结束，莎罗奔、郎卡仍统大金川，免其赴阙谢恩，更无押解战俘回朝的记载。甚至莎罗奔、郎卡请求选送番童、番女各十名进京代其服役，也为乾隆帝所拒绝。当时被清军带回北京的，只能是个别投降清军后曾为清军效力而又不便在原地安置的金川士兵。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大小朗素等在清军占领美诺时投降，但良尔吉私下与大金川联络，暗通信息，泄露军情，被傅恒在军中处斩，大朗素及其徒众被清军安置在成都喇嘛寺内，不久病死。小朗素在良尔吉被诛后，带领士兵帮助清军，颇能出力，四川总督策楞请求将小朗素发往西藏，交与达赖喇嘛，令其仍作番僧，并咨驻藏大臣严加约束。乾隆帝认为小朗素是曾经出力之人，不应如此对待，“小朗素无可安插，不若令其来京。如伊愿作喇嘛，即令为扎萨克喇嘛。京中庙宇甚多，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不一其人，讲习经典，亦属便易。如愿还俗，当授予家室，给以二、三品职衔品级，以示优奖。此时策楞等已回成都，可令其传唤小朗素到省，即以大学士公傅恒之意，面加询问，并将已经奏明种种加恩之处，详悉晓谕。伊若必欲赴藏，则听其前往，如愿来京，着一面奏闻，一面委员护送前来。俾众土司知曾经出力之人，即蒙格外施恩，优加录用。庶人心皆思奋勉，是亦鼓励番众，永辑边疆之一策”。经询问后，小朗素表示愿意赴京，清朝派员护送，行至西安患痘症亡故。不过小朗素的随从，当有被送到北京的。

第一次大金川之役结束后，乾隆帝确实并未完全放弃彻底平定大小金川的打算。他下令在香山练兵的战碉之侧，建实胜寺，以纪念平定大金川的胜利，同时将从金川归来的习云梯的满族士兵组成“健锐云梯营”，在实胜寺的左右建屋居住，“间亦依山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也即是修建金川式的战碉，模拟金川首领居住的刮耳崖、勒乌围的自然环境，供兵士演练。此时，确实有投降的金川士兵及工匠参加筑碉工作，并依附于健锐云梯营居住。《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三录有《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御制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食，即席得句(有序)》一诗，其序言说：“朕于实胜寺旁造室庐，以居云梯军士。命之曰：健锐云梯营，室成居定。兹临香山之便，因赐以食。是营皆去岁金川成功之旅，适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习工筑者数人，令附居营侧，是日并列众末，俾予惠焉。”诗中说：“犹忆前冬月，云梯始习诸。功成事师古，戈止众宁居。实胜招提侧，华筵快霁初。馂余何必惜，可以逮豚鱼。”由此可见，实胜寺建成时附居于健锐云梯营的金川降人工匠数量并不多，说乾隆帝“同时也考虑到俘获到北京筑碉的大金川士兵和工匠的宗教信仰，乾隆命仿清入关前皇太极在沈阳建实胜寺的先例。于香山石碉群旁建立实胜寺”，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后人的误会。再从宗教方面看，根据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所撰的沈阳《实胜寺碑文》记载，“至大元世祖时，有喇嘛帕思八用千金铸护法嘛哈噶喇，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尔巴胡土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我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征破其国，人民咸归。时有喇嘛墨尔根载佛像而来，上闻之，乃命众喇嘛往迎，以礼异至盛京西郊。因曰：‘有护法不可无大圣，犹之乎有大圣不可无护法也’。乃命工部卜地建寺于城西三里许，

……名曰莲华净土实胜寺”。可见沈阳实胜寺并不是像乾隆帝所说是纪念大破明军十三万众于松山而修建的，而是纪念破林丹汗、获护法嘛哈噶喇像而修建的。但无论如何，实胜寺是佛教寺庙，无可怀疑。乾隆帝在香山所建的实胜寺，应当也是供有嘛哈噶喇的佛寺，故乾隆帝的诗中称为“招提”。而金川降人的宗教信仰与此不同，虽然金川亦有喇嘛、佛等用语，但其流行的宗教实为苯教，大金川之役时莎罗奔寄给绰斯甲布土司的信中说：“我促浸（即大金川）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是桑结灵巴楞则恩喇蔡衮珠尔佛爷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佛像都是一样，你想我们促浸要是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传这雍中奔布尔的教，就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中奔布尔教就完了。”对于金川奔布尔教与黄教的区别，乾隆帝也是清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后，乾隆帝即命将雍中喇嘛寺拆毁，将其木料、铜瓦、金顶等一并运回北京。乾隆帝还说：“若奔布喇嘛传习咒语，暗地诅人，本属邪术，为上天所不容。”所以难以想象乾隆帝是为了金川降人的信仰而建实胜寺，我们应该认为乾隆帝是为了让云梯营将士供奉佛像及护法嘛哈噶喇而建实胜寺的。

二

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第一次大金川之役结束后，在香山修筑战碉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虽然从事筑碉工作的金川降人数目不多，但是关于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在乾隆帝的诗歌中有生动的反映。《日下旧闻考》还录有《乾隆十五年御制番筑碉诗》一首，全诗如下：

番筑碉，筑碉不在桃关之外，乃在实胜寺侧西山椒。狼卡稽颡归王化，网开三面仁恩诏，叔孙名子不忘武，佽飞早已旋星轺。俘来丑虏习故业，邛笼令筑拔地高。昔也御我护其命。今也归我效其劳。

番筑碉，不惟效劳，尔乃忘其劳。魋结环耳面颓（颇），嗜酒喜肉甘膻臊。但得酒肉一醉饱，浑忘巴朗卡撒其故巢。其妇工作胜丈夫，粉不能白尫且么。不籍绳墨与规矩，能为百尺森苕峣。

番筑碉，侏离番语为番谣，扬声强半不可晓。大都慕义怀恩膏。亦不为汝慕义怀恩膏，我自两阶文德舞戚旄，偶肖汝制役汝曹，赉汝金钱为锦袍。

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些金川降人被带来北京后主要的职责就是修筑碉房，为清政府效劳。他们在服饰装束上依然保持着金川藏族的原貌，在生活习惯上爱饮酒、喜食牛羊肉，在劳动中伴以藏语歌谣，特别是他们修筑碉房的技艺高超，能不用绳墨规矩等器具就筑起高耸的石碉，这些都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并写进了诗歌。尤其重要的是，诗中写到藏族妇女的勤劳能干："其妇工作胜丈夫"，说明当时在香山的金川降人还带有家眷，举家定居于此。因此他们与那些派充苦役的战争俘虏还不完全相同。

这些金川藏族人修筑的碉房，自然不只我们现在还能够见到的这几座。《日下旧闻考》记载："健锐营衙门在静宜园东南，围墙四角有碉楼四座，共房二十二楹。皇上阅兵演武厅一座，后有看城及东西朝房，放马黄城"，"园城……内设碉楼七处"，"健锐营官兵营房在静宜园之左右翼，共三千五百三十二楹，碉楼六十八所"。除健锐营的衙门和营房建有碉楼外，八旗印房亦建有碉楼，"静宜园南楼门外有八旗印房"，"八旗印

房四隅皆有碉楼一座，乾隆十四年建。合之东四旗、西四旗各营碉楼，共计六十有七”，“静宜园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镶黄旗在佟峪村西，碉楼九座，正白旗在公车府西，碉楼九座，镶白旗在小府西，碉楼七座，正蓝旗在道公府西，碉楼七座。香山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乾隆十四年奉命建设，后四旗同”，“静宜园西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正黄旗在永安村西，碉楼九座，正红旗在梵香寺东，碉楼七座，镶红旗在宝相寺南，碉楼七座，镶蓝旗在镶红旗南，碉楼七座”。

以上记载证明，从乾隆十四年起，乾隆帝有计划地在香山一带兴建了一批金川藏族式样的碉楼，现今西山红旗村、正白旗村附近的碉楼即是其中一部分的遗存。

从第一次金川之役开始，乾隆帝充分注意到在配备火枪、火炮的条件下战碉在山地攻防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清军的战斗实践，乾隆帝看到掌握攻碉和守碉技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发挥的军事威力，所以清朝在西山设碉练兵也是清军战斗技术的一种新发展，它为清军后来彻底征服大小金川做了战术准备，同时也为清军的其他山地战斗提供了一种新的攻防手段。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说：“自金川削平，中国始知山碉设险之利，湖南师之以制苗，滇边师之以制猓夷，蜀边师之以制野番，而川陕剿教匪时亦师之坚壁清野而制流寇。”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因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其子僧格桑与沃日土司为仇械斗，占据沃日村寨，大金川首领索诺木等支持小金川，袭杀革布什咱土司，大小金川又联合攻占明正土司之地，并抗拒清朝官员的查办，乾隆帝遂决心派大兵前去征讨大小金川。清军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于乾隆三十七年年底占领小金川，小金川土司泽旺投降，被押送北京，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初，清军分路进攻

大金川，在木果木遇到顽强抵抗，大金川又派人鼓动已降的小金川番众“复叛”，截断清军后路。六月，清军在木果木大败，定边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战死，大营被焚烧，陷没文武官员及兵丁四千余名。乾隆皇帝大为震惊，为重振军威，彻底扫平大小金川，随即添派北京键锐、火器二营，以及吉林、黑龙江、伊犁、贵州、云南、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各省驻军总计七万多人，以阿桂为将军、明亮为副将军、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分路大举进攻。当年年底，清军重新攻占小金川全境。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正月起，清军分路大举进攻大金川，这一战役打得比第一次金川之役更加剧烈残酷。金川番兵凭藉层层战碉，步步防守。八月，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将小金川首领僧格桑毒死，差头人绰窝斯甲带僧格桑尸匣及僧格桑之妾侧累及大头人蒙固阿什咱阿拉至清军军营乞降，阿桂不允，拘留绰窝斯甲不放，同时又诱俘小金川大头人七图安堵尔，一并押解入京。十月，清军合围勒乌围、噶拉依官寨，昼夜猛攻。金川在多次乞降不得的情况下，乃拼死抗拒。又经过一年多苦战，至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初，大金川力量枯竭，难以坚持，陆续有头人带领番众投降。对这些战至最后才投降的金川藏族人，乾隆帝在如何处置他们的问题上颇费思虑。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丁丑的上谕中说：

至各路番人纷纷投出，其中大小头人俱复不少。此等番众，从前抗拒官兵，舍死固守，情罪均属可恶。直至兵临巢穴，计穷力竭，始行投降，非若大兵尚未深入以前陆续来投者可比。但番众皆系曾与官兵打仗之人，此时难以分其所犯轻重，且其抵抗官兵，固属可恨，而原其所以舍死坚守，尚知各为其主，亦复可矜。况为数过多，又系投降乞命，若尽与骈诛，实觉心有不忍。惟其中大小头人及其眷属，自不便仍留本

处，应照前此平定准部时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齐等概行移徙例，妥为办理。但须趁官兵未撤之时，即为查明，于八旗及吉林、索伦兵凯旋之便，令其分队携带，押至京城，再行酌量分别安插。伊等既系投降，与党恶要犯应行献俘者不同，途中不便加以锁扭，惟当留心照料，毋致脱逃，并不动声色，勿使惊畏，方为妥善。但各种头人及其眷属为数甚众，其如何分别押带之处，著阿桂妥为核定，一面奏闻。至各处降番若移于他处编管，未免人多费事，伊等俱系娴于耕作之人，两金川又有可耕之地，现在凯旋后，两金川地方立汛安营，添设提督总兵等官，足资弹压，其应办善后事宜内原有随处耕屯之议，莫若即用此等降番就所在垦耕安业，尽力农功，各有将弁管束，久之可消其桀骜不驯之气，而令其交粮，亦省川省运粮之劳。惟是编立营屯，必须安设头目，当于随营攻剿之他处土兵内，择其出力者充当，既足以示奖励，又令他处之人管理，更不虑其故智复萌。至此等降番，饿乏已久，既欲令其耕种，自难以枵腹从事，着将军等量为赏给籽种、口粮，俾口食有资，自更安心尽力。将军等宜及此时早为筹办。

对于金川的喇嘛（实际上主要是苯教僧人），乾隆帝在正月癸未的上谕中说：“至促浸喇嘛好用镇压，今所得舍齐、雍中两喇嘛寺，皆系喇嘛等念经之所，恐有密藏镇压物件，阿桂等应派细心诚妥之人，于寺内寺外及附近处所，凡有可疑之处，悉搜查刨挖，毋令存留。又攻得此两寺时，俱有喇嘛投出，此等皆曾为逆酋念经之人，断不可仍留该处，致番众等心存希冀，潜滋事端。况此辈在营非若壮夫之可以出力随攻，又毋庸藉其招致逆匪，留之亦属无益，应将所有喇嘛即用槛车拘解进京，并派妥员沿途严密管押，勿稍疏虞。”在正月乙酉的上谕中，乾隆帝又催促阿桂速办处理降众之事：“此等投降番

众，难以深信，断不宜留于番地，致滋事端。屡经传谕阿桂，将所有头人等概行解京，其余暂令安插，俟办理善后事宜时，再为酌量妥办。今富德已将南路投番遵照将军等商办事宜，查办完妥，何以阿桂处转未办及奏闻？该将军等此时自以围攻贼巢、筹擒逆酋为重，难于兼顾，然每日岂无片刻稍暇？亦应将此等事宜，随时带办。况降番在营，聚集人多，难保其不乘隙生心。即逆酋等，未尝不思若辈为援助，自宜即速遣散，以善周防。虽阿桂前经奏及将降番男妇分别安插于十二土司之地，但陆续投出之头人等尚多，自应视其情罪轻重酌办。除应行献俘之犯，俟擒获逆酋等一并槛解，其余亦当如富德所办，将各头人先解成都拘禁，使军营更觉清肃，尤为妥善。"由此可见，在金川之役将近结束时，乾隆帝拟定了处置降人的办法，对索诺木等为首之人押赴北京献俘处刑，对投降的头人喇嘛等，不准留在原地，解送北京安置。对一般降人，则在金川编立营屯，给予种子口粮，令其种地交粮，并设官管理，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大小金川两土司。战争进行至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大金川首领索诺木之母阿仓、姑阿青、大头人阿卜策妄、丹巴僧格等出寨投降，十二月二十八日，索诺木长兄莎罗奔冈达克出寨投降。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二月初四，索诺木跪捧印信，带领其兄弟莎罗奔（由此可知，清朝关于大小金川战役的文献中所记载的"莎罗奔"，并不是专指一人，而应该是藏文 slob dpon 的音译，意为上师、导师，应是金川苯教首领的一种称号，而拥有此种称号的金川首领不只一人）甲尔瓦沃杂尔、斯丹巴及头人喇嘛等男女老幼两千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金川之役全部结束。二月初六日，由户部侍郎福康安率火器营及健锐营兵士押解索诺木兄弟等人京。二月初七日由副都统德赫布押送索诺木幼弟斯丹巴及其母、姑等进京。四

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举行献俘礼，下令将索诺木兄弟等重犯凌迟处死，其家口年未及岁者永远监禁，其余妇女分赏厄鲁特、索伦三姓功臣之家为奴。

由于第二次金川之役以大小金川彻底失败告终，在战争中及办理善后时，遵照乾隆帝之命有不少金川的头人及其家属被押解到北京，使在北京的金川藏人的数目增加不少，以致在乾隆四十一年出现了将他们编为佐领的事。

三

两次金川之役中被强迫迁移到北京及内地的金川藏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到京后居住和生活情形如何，当时应有详细的档册记载，但是现在已难以见到。不过，从一些诗文中仍有线索可寻。乾隆帝在香山所作《番筑碉》诗说明，第一次金川之役后在健锐云梯营有附居的专门修筑战碉的金川藏人，已如前述。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即是举行金川之役献俘礼、处死索诺木等人的次日，乾隆帝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阿桂等征讨金川有功的将领，乾隆帝写了一首长诗《四月廿八日紫光阁凯宴成功诸将士（有序）》：

绩宣西焚，洗兵波靖金川；凯叶南薰，锡宴筵开紫阁。旋跸举劳还之典，昨朝终解征衣；御楼受俘获之仪，诘旦全陈系组。念缴外栈穿冰雪，瘁以五年；指壁间米聚山川，成于百战。功宜懋赏，允兹晋爵加章；实称循名，遂尔图形系赞。繄此日同堂之恺乐，酬诸臣历岁之荩诚，酌酒亲颁，一酹露珠非易；承筐共拜，千缗赉亦奚多？抚陈迹以增怀，难忘视昔；幸后来之继踵，益勉从今。六章讵曰侈文？亿载愿言偃武。己巳班师原赦罪（己巳之奏凯，非受降，乃赦罪。彼乃所属土司，

逆命则讨之，服罪而赦之，安得与外夷相提并论，谓之受降哉?)，丙申宴凯信成功。樊崇甫以十年叛（郎卡自赦罪之后，未及十年，即侵扰邻境，念番俗构争乃其常事，遂置不问)，莽布奚当六战雄？蚕食狼贪终弗改，鸡连鲵取孰矜穷？五年宵旰劳西顾，幸睹酬勋礼乐融。郊劳昨还晓受俘，礼应凯宴答功肤。修仪偃伯斯宜矣，夜雨朝晴有是乎（廿七夜半后快澍渥霑，未晓而霁。夜雨朝晴最为难得，于盛典尤觉相宜)！紫阁貌图俾绩显，金卮手赐按名呼（宴间，召将军阿桂、丰昇额，参赞海兰察、额森特，领队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尔普，并择其余劳绩茂著之人及军机大臣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等至坐前，亲赐卮酒，以示优眷)。疡瘢著处恫关切，念此何敢耀武吾？美诺重征得重易，勒围多战信多劳（初攻赞拉，虽经岁始平，及收复美诺诸境，则未旬日而蒇事。至促浸则层层险阻，赖阿桂不惮艰瘁，将士奋勇宣劳，每因难以奏绩，前后不啻百战)。讵予陇蜀无已望，念彼孽芽有籍薅。资哩卡了消雪窟，木思西里化冰嶆。而今都是光明境，屯戍相将事桔槔。上将归来是近臣（阿桂、丰昇额俱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其余亦在御前乾清门行走者多)，国朝家法万年循。解兵笑彼一杯酒，示译欣兹满座春。夷乐宁须辟禁佅？俘歌合此奏童侲（阿桂等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斯甲鲁者，即番中傩戏也，亦命陈之宴次)。鸿勋集矣雨旸若，祇恐骄生志倍寅。紫光阁峙液池边，为写战图廊展前（紫光阁壁间旧列西师战图已满，昨岁展拓前楹以备绘金川战绩，命将军等具稿以进，择其事最大战最伟者绘之)。幸矣竟如操左券，嘉哉所赖掌中权。扬威捣险重无藉，櫜剑弢弓合有然。五载劬劳信不易，一为欢喜一为怜。伊犁回部早成勋，又勒画图新旧分。讵我佳兵不知戢？柰其伏莽敢忘勤（索诺木济其父恶，蚕食邻封，与僧格桑狼狈

为奸，背恩反噬，不得不声罪致讨。今幸成功，而追忆艰险，不啻痛定之思矣)。频思旧绩翻因戚，多出翘才继以欣（平定伊犁回部时所绘一百功臣，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抚念慨然。今所绘功臣中世家子弟及新进之人颇不乏翘材，则又为之欣幸云)。湛露采薇重赋罢，益钦保泰敢云云。

此诗亦由乾隆帝亲笔题于《紫光阁凯宴将士图》上，但是略去了诗中的注释。从这首诗的注释中可以看出，阿桂等回军之时，不仅遵旨将大小金川的头人及其家属解送北京安插，而且带回了专习歌舞的“番童”，在紫光阁的庆功宴上就表演过川西藏族的“锅庄”舞及“斯甲鲁”（歌曲)，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锅庄和斯甲鲁进入了清朝宫廷。香山金川藏人的后裔相传祖上过年节要专门进宫表演歌舞，显然是有根据的，表演的歌舞自然也就是这锅庄和斯甲鲁了。

随着第二次金川之役后住在北京的金川藏族人的增加，清朝政府感到有必要对他们单独编组，以便管理。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的档册《钦定回疆则例》第五卷中，有如下记载：

原例

驻京番子等编为佐领入旗学习当差

一、乾隆四十一年大学士等议定，现在驻京之两金川番子共计男妇一百八十九名口，照依乾隆二十五年将驻京之回子编为佐领之例，编为一佐领，入于内务府正白旗，为内务府及理藩院所属，与包衣管领一体，定为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马甲额缺七十名。由包衣佐领下马甲内令占三十五缺，俟有缺出裁汰外，另添设三十五。暂于包衣佐领下拣派骁骑校一员、领催二名、写档传事马甲三名带预番子佐领下之骁骑校、领催等，教办佐领事务。此七十名马甲钱粮米石，暂行不必分给，

贮于公所，另派信实妥善包衣官一员，将伊等银米撙节办理，养赡伊等，于每年年终报销，内务府查核。俟过数年，伊等晓事之时，再将此项包衣官员、骁骑校等兼摄代办之处停止。伊等内有银匠、木匠、写字人四名，刻字画佛像喇嘛二名，共番子六名，交中正殿造办处，与京城匠役等一同学习行走。仍交内务府大臣等，于伊等内酌其明白去得者，拣派同本处马甲学习当差。伊等住房交管理健锐营大臣，于香山附近地方令其自行建造碉楼，其工食动用健锐营公项支给。伊等内既暂不得可用之人，于包衣官员内拣选妥善者带领引见补放佐领，俟伊等内有能办事者，再以番子等补放。其佐领图记，交礼部照例铸给。再现有留京能唱番曲、跳郭庄之番子二十八名。与前次留京番子杨苏等十一名，亦皆入于此佐领下，将现在杨苏等所食马甲钱粮十一副，亦作为此佐领之缺。

原例

香山居住番子等由健锐营约束管理

一、乾隆四十一年奉

上谕：香山安插之两金川番子，自应令健锐营就近约束管理，所有新设之番子佐领一缺，已令该营前锋章京书臣补授。其旧有之番于所占内务府甲缺十一副及应得饷米，俱著统归该佐领办理，以昭画一。

钦此。

以上两处记载说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清朝将被押送到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 189 人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加上唱番曲跳锅庄的 28 人以及第一次金川之役后留京的修筑碉房的 11 人，该佐领共辖金川藏族 228 人。他们归入旗籍，成为内务府三旗中的旗人。“佐领”满语为“牛录额真”，为清朝八旗的基本行政单位，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曾

规定300人编为一个佐领，佐领负责管理属下的户籍、田宅、兵役、诉讼等。乾隆二十五年将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乱时投降的回众（维吾尔人）编为一个回人佐领，在西长安街路南设回营一所以居之，回营之西建礼拜寺，金川藏族佐领即是仿其编设。不过金川藏族佐领的住房是在香山附近，由管理健锐营大臣指定地方，由健锐营公项支给费用，令其自行建造碉楼，实际上就是在香山形成了一个金川藏族村，这大约是因为香山的地形气候比较适合这些迁来北京的金川藏族人居住的缘故。

香山的金川藏族佐领设骁骑校一员，催领四员，应在藏人中择人担任，由于暂时没有适宜的人选，所以先由健锐营前锋章京书臣担任。在初建阶段，还由内务府包衣佐领下拣派骁骑校一员、领催二名、写档传事马甲三名教办藏族佐领事务。另外还派包衣官一名管理藏族佐领的粮饷银米。这大概是因为藏族佐领的原先的十一副马甲钱粮名额及后加的七十副马甲钱粮名额都是从内务府拨出的，所以藏族佐领在财务及人事上由内务府包衣佐领代管，又由于金川藏族建筑碉房及居住在香山，与健锐营关系较近，所以乾隆帝又命健锐营就近约束管理。

既然金川藏族佐领由内务府提供马甲钱粮，所以同时也必须在内务府当差，从档册看，当时当差的种类有：唱曲跳锅庄的28人，健锐营修筑碉房的杨苏等11人，中正殿造办处与京城匠役一同服役的银匠、木匠、写字人四名，画佛像刻字喇嘛二人。这是有专门技艺特长的，其他人则由内务府大臣分派学习当差，具体干什么活则不清楚。

除此之外，金川藏族佐领似乎还有担任口语翻译的职责。《回疆则例》还记载：

番子朝觐来京传用通事

一、各省番子土司官员等袭职等事照旧由兵部办理外，至

土司官员等进贡请安轮班朝觐各事宜，均归理藩院照回子例办理。遇有翻译番子字，即责成唐古忒学生出身之笔帖式二员承办，所需通事，行文健锐营在于驻京番子内择其明白晓事、汉语好者，咨调二人充当通事。

以上所记的香山金川藏族佐领是不是包括当时在京的全部藏族人呢，大约也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零散人员编入了其他旗分或部门。《回疆则例》中就有将藏族通事札克塔尔阿斋、阿甲之家口入于内务府镶黄旗的记载：

原例：

番子通事札克塔尔阿斋、阿甲之家口入旗

乾隆四十二年奉

旨将番子通事札克塔尔阿斋等作为蓝翎侍卫交内务府，将札克塔尔阿斋等家口并前次所来以千总用之番子通事阿甲等家口俱入于该衙门镶黄旗管领下管理。

四

通过对以上史料记载的考查，使我们清楚了清朝在两次金川之役的战争中都曾经将部分投降的金川藏族迁移到北京，特别是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迁来的人较多，以致清朝专门将他们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并指定他们在香山建筑碉楼居住，由健锐营就近约束管理。这些金川藏族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歌舞、建筑碉楼的技艺等，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点。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 200 多年，但香山的藏式碉楼依然有遗存，香山藏族人的后裔中还流传藏族的歌曲，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民族文化现象。

至于有的专家依据解放初期这些香山藏族人的后裔曾自己

说是苗族的后代，因而肯定他们是苗族的后裔，自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史料来判断是非。不过需要附带提及的是，将金川藏族误为苗族者，以往并不罕见。例如，流传很广的印鸾章编的《清鉴纲目》即称大小金川“番民居焉，亦苗种也”。现在不应用这些推测来判断，而应依据仔细的调查和大量的史料来研究问题，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符合历史实际。

香山藏族编设佐领定居之后的情形，应该在内务府的档册中有所反映，对现今香山藏族的后裔的调查访问也进行得很不深入。这两方面笔者都没有条件继续探究，因此只能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一点引玉之砖的作用。希望有条件的同志继续深入研究，更好地弄清有关香山藏族人的问题。

原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章嘉·若必多吉年谱

章嘉活佛是清代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正如乾隆帝在《御制喇嘛碑》中所说："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从康熙帝开始，历辈章嘉活佛在清朝宫廷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历辈章嘉活佛中以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和三世若必多吉最为重要，对康雍乾三朝清廷与西藏和蒙古的关系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在清代藏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章嘉·若必多吉的亲传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为主，参考有关的藏文和汉文资料，按年代的顺序对章嘉·若必多吉一生的事迹作一综述，供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参考。文中所有的年代换算为公元纪年，但月份按原资料或为藏历或为汉历，故年初或年底的月日可能有跨年的情形，因条件所限，未能换算为公历，请读者鉴查。

1717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鸡年丁酉）

正月初十日，章嘉·若必多吉出生于甘肃省凉州（今武威）的西莲花寺附近。其父名古茹丹增，土族人，原籍青海湟水流

域祁土司（据传是元初最早领兵入藏的蒙古将领多达那波的后裔）的辖地，后举家迁居凉州放牧，是部落中的一名咒师，因当地人称咒师为仓巴，故得名为祁家仓巴古茹丹增，母名布吉。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　土猪年　己亥）

1715年五月二世章嘉活佛圆寂后，由五世班禅主持西藏的护法神降神，指示前世章嘉活佛将在安多地区转世。此年凉州当地僧人马喇嘛、丹玛曲杰等人因古茹丹增的幼儿灵异，宣扬此子是章嘉喇嘛的转世灵童，佑宁寺先派僧人前来查看，一时难以确定。又由佑宁寺却藏活佛和拉卜楞寺一世嘉木样活佛根据护法神的预言派人到佑宁寺西北方向寻找，认为祁家仓巴古茹丹增之子确系前世章嘉活佛的转世，于是向驻京的佑宁寺二世土观活佛却吉嘉措等人报告。当时清廷理藩院本来准备认定某一蒙古王公之子为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阻挠将古茹丹增之子奏报。由于二世土观活佛的坚持，才终于将凉州的转世灵童奏报康熙帝，康熙帝下令将古茹丹增之子迎到佑宁寺照护。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　铁鼠年　庚子）

五月，佑宁寺派前世章嘉活佛的侍从噶钦·喜饶达杰等人去凉州迎请转世灵童。六月初三日，若必多吉离家前往佑宁寺，一路上受到各寺院僧俗的热烈迎送。初十日，抵达佑宁寺，由却藏活佛洛桑丹贝坚赞为灵童剃发，起名为阿旺却吉扎巴丹贝坚赞，迎入前世章嘉活佛的拉章中居住。

1721年（康熙六十年　铁牛年　辛丑）

章嘉·若必多吉跟从前世章嘉活佛的弟子洛桑却增学习藏文读写。

1723年（清世宗雍正元年　水兔年　癸卯）

章嘉·若必多吉八岁，从却藏活佛洛桑丹贝坚赞受居世戒

和沙弥戒。当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西宁附近各藏族部落和寺院纷纷响应。罗卜藏丹津率部围攻西宁，清朝派川陕总督年羹尧、提督岳钟琪率兵到青海镇压。

1724年（雍正二年 木龙年 甲辰）

年初，清军攻破佑宁寺，章嘉·若必多吉被寺僧事先携往佑宁寺以北的森林中隐藏。因前世章嘉活佛与雍正帝关系密切，雍正帝以五昼夜由北京传至西宁的紧急诏书命令年羹尧将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送往京师，不得有分毫伤害。年羹尧接旨后，立即下令对15岁以下的儿童不准杀害，一律擒送大将军处。后又访查到章嘉·若必多吉躲藏在浩门河一带，就威迫佑宁寺派人接回章嘉·若必多吉。章嘉·若必多吉主仆11人至清军岳钟琪军营降顺，并随清军到达西宁。因雍正帝之旨令，年羹尧等将章嘉·若必多吉奉为上宾，优礼有加。当年章嘉·若必多吉在西宁出痘，清军官员为他延请老中医治疗而获痊愈，年羹尧为此举行宴会祝贺。此时，章嘉·若必多吉接到圣旨，命他进京，他行前由西宁上奏章给雍正帝。雍正帝令土观·却吉嘉措负责接待，教以站跪行步等朝觐礼仪。章嘉·若必多吉抵京后，先住在旃檀觉卧寺，不久，雍正帝驾临该寺，章嘉·若必多吉出院外跪迎，被雍正帝抱起，一同进屋，坐于同一坐垫上。当时雍正帝对扈从的年羹尧说："你将青海蒙古收归治下，朕并不怎么高兴，而你把朕之喇嘛的真正转世延请至京，与朕会面，却使朕高兴之至。"当年十一月，雍正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移至前世章嘉活佛驻锡之嵩祝寺（系雍正帝即位前居藩邸时购置整修赠送给二世章嘉活佛的寺院，其地在今北京景山公园以东沙滩北面）坐床，准许他按前世章嘉活佛所受封赐乘坐黄幢马车，坐九龙褥，由土观·洛桑却吉嘉措主持坐床典礼。据当时人记载，章嘉·若必多吉在京时，"黄幢车过处，都人仕

女，争取手帕铺途，以轮毂压过，即为有福，其车可出入东华门，盖所以尊宠之者备至”。

1725 年（雍正三年　木蛇年　乙巳）

章嘉·若必多吉以土观·洛桑却吉嘉措、噶钦·喜饶达杰等人为师，学习佛教经典，直至1735年。在此期间，他与土观·洛桑却吉嘉措一起向雍正帝请求准许佑宁寺、广惠寺的僧人返回寺院，得雍正帝同意，雍正帝还拨款重建佑宁寺和广惠寺，使青海地区毁于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寺院陆续恢复发展。章嘉·若必多吉从11岁时开始写作，15岁时已能写作长篇的佛教方面的文章。雍正帝还命章嘉·若必多吉与皇二子弘昀、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一同读书，因此章嘉·若必多吉学会了汉、蒙古、满、藏等语文，在佛学方面也很有造诣。雍正帝还经常召章嘉·若必多吉与土观·洛桑却吉嘉措进宫，与雍正帝尊信的汉僧一起交流修法体验等。夏季炎热时，雍正帝还命土观活佛与章嘉·若必多吉移住皇家园林之中，准许他们随意在园中游玩散心。

1727 年（雍正五年　火羊年　丁未）

雍正帝发十万两白银，遣官于多伦诺尔汇宗寺西南建善因寺，又发十万两白银在库伦为哲布尊丹巴建寺。此年清朝开始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六月，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噶伦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人杀害首席噶伦康济鼐。

1728 年（雍正六年　土猴年　戊申）

清朝为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派兵入藏，颇罗鼐在清军抵达前击败阿尔布巴等。遵雍正帝之命，七世达赖喇嘛年底从西藏起程，移居四川泰宁庙。

1731 年（雍正九年　铁猪年　辛亥）

善因寺建成，雍正帝将此寺赐给章嘉·若必多吉，并撰写

碑文，碑文中说："曩岁厄鲁特噶尔丹跳梁朔漠，扰乱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七旗数十万众，怀德慕义，稽首内附。皇考躬率六军，远行天讨，驻跸多伦诺尔之地，受喀尔喀诸部君长朝谒，锡之封爵，为我屏垣。既翦凶渠，藩定朔漠，抚安藩服，允从诸部所请，爰於斯地创建汇宗寺，俾大喇嘛章嘉呼图克图居之。章嘉呼图克图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藏诸部，蒙古咸所尊仰。今其后身，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朕特行遣官，发帑金十万两，于汇宗寺之西南里许，复建寺宇，赐额曰善因，俾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主持兹寺，集会喇嘛，讲习经典，广行妙法。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同为檀越主人，前身后身，敬信无二，自必率其部众，听从诲导，胥登善域。稽古圣王之治天下，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缵承先志，护持黄教之意也。况此地为我，皇考驻跸之所，灵迹斯存，惟兹两寺，当与漠野山川，并随无极。诸部蒙古台吉属下，永远崇奉，欢喜信受，熏蒸道化，以享我国家亿万年太平之福，朕深有望焉。"

1734 年（雍正十二年　木虎年　甲寅）

雍正帝依照康熙帝封赐前世章嘉活佛之例，封章嘉·若必多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给用八十两黄金铸成的金印以及诰命敕书、金册等。当年八月，雍正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与果亲王允礼同去泰宁，由果亲王允礼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筵宴，章嘉·若必多吉与副都统福寿等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拉萨，并允许章嘉·若必多吉在西藏停留，从七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学法。该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章嘉·若必多吉与果亲王允礼一行抵达泰宁，受到七世达赖喇嘛及其徒众的热烈欢迎。

1735年（雍正十三年　木兔年　乙卯）

三月二十一日，七世达赖喇嘛和章嘉·若必多吉一行由泰宁起程，沿途瞻拜各佛教寺宇，受到僧俗各界的隆重迎送。七月三十一日，七世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布达拉宫。在泰宁期间和路途中，章嘉·若必多吉都向七世达赖喇嘛和堪钦多杰强学习佛法，抵拉萨后，他朝拜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大昭寺等寺院，并去山南朝拜了桑耶寺和昌珠寺。十月八日，章嘉·若必多吉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受到五世班禅的欢迎。十月十三日，73岁高龄的五世班禅为章嘉·若必多吉传授了近事戒和沙弥戒，起法名为“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十七日，又由五世班禅担任授戒堪布，为章嘉·若必多吉传授了比丘戒。此时，传来了雍正帝驾崩的消息（雍正帝于当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章嘉·若必多吉即于十月二十六日离扎什伦布寺返回拉萨，准备回朝。

1736年（清高宗乾隆元年　火龙年　丙辰）

年初，章嘉·若必多吉离拉萨回朝，行前亲向七世达赖喇嘛辞行。出发时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代表及驻藏大臣和噶伦等都赶来送行。章嘉·若必多吉返抵北京后，朝觐乾隆帝，因当时土观·洛桑却吉嘉措已返回青海，并在青海去世，乾隆帝下令将掌管京城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章嘉·若必多吉，封章嘉·若必多吉为掌印喇嘛。

1737年（乾隆二年　火蛇年　丁巳）

当年，五世班禅在日喀则去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凉州出生。

1738年（乾隆三年　土马年　戊午）

乾隆帝下令说：“如今佛教盛行于蒙古，先前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已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全本《丹

珠尔》前所未见，章嘉呼图克图宜主此事，将所有诠释佛语之论疏翻译成蒙文。”章嘉·若必多吉遵此旨意，在进行翻译之前先将经籍中的名词术语等的译法统一汇集，加以厘订，编成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佛学词典，题名为《正字贤者之源》刊布流行。此年六世班禅洛桑贝丹意希在后藏襄地区的扎西孜出生。

1741 年（乾隆六年　铁鸡年　辛酉）

十月十五日，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开始将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文的工作。

1742 年（乾隆七年　水狗年　壬戌）

至十一月十五日，全部完成蒙译《丹珠尔》，由章嘉·若必多吉进呈乾隆裁定，乾隆帝大喜，命御府付梓刊行，流布蒙古各地。此年，六世班禅贝丹意希被迎至扎什伦布寺坐床，章嘉·若必多吉寄信及礼品祝贺。

1744 年（乾隆九年　木鼠年　甲子）

乾隆帝谕示章嘉·若必多吉：“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院，若兴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的传布大有利益。过去怙主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大师等在此方建有讲习佛法的寺院，而今徒余其名。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宗的扎仓，但在京城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全部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章嘉·若必多吉说：“皇帝陛下发心与众不同，若下令建立寺院，使佛教在此方如日普照，小僧唯有竭尽全力，充当仆役。”于是乾隆帝下令将雍正帝在藩邸时居住的雍亲王府（即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寺院，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由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当时的主要工程是在王府外围筑一道宽大的围墙，内部修建大经

堂、依怙殿、三世佛殿、授戒殿、白伞盖佛殿、药师殿、印度佛堂、法轮殿、天王殿等，并建置佛像及供器等。

1745年（乾隆十年　木牛年　乙丑）

八月，雍和宫改建为寺院的工程完工，乾隆帝赐寺名为“噶丹敬恰林”，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举行了三天的开光仪式。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从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七部以及汉藏地区集中了五百名年轻僧人，创设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医宗扎仓以及学习各门知识的杂明扎仓等四大经院，各扎仓的堪布和教师由西藏拉萨三大寺、上下密院、日喀则色派密院派遣有学识的僧人担任。七世达赖喇嘛专门派人从西藏为雍和宫送来了佛陀本生故事卷轴画及佛像、佛经等。雍和宫各佛殿的供佛基金和僧人们的生活给养都由清朝府库按月供给，甚至连僧人的手巾等日常用品也都由府库配备。有清一代，雍和宫始终是清朝皇室最重视的喇嘛寺院，雍和宫的僧人历年按时入宫为皇室诵经祈福，举行佛教法事。七世达赖喇嘛还致书章嘉·若必多吉，赞扬他将《丹珠尔》翻译成蒙文以及创建雍和宫寺院的功绩。当年，章嘉·若必多吉撰写了两种文字对照的题为《政教吉祥增盛》的吉祥祝辞，呈献给乾隆帝，乾隆帝下令付梓刊行。同年，章嘉·若必多吉为乾隆帝传授了“胜乐”灌顶，乾隆帝跪受灌顶，并向章嘉·若必多吉奉献一百两重的金质曼遮，作为供养。

1746年（乾隆十一年　火虎年　丙寅）

二月，奉乾隆帝之命，在雍和宫仿照拉萨祈愿大法会（俗称传大召）之例创立了祈愿法会，乾隆帝亲临会场，听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呼图（即色赤）活佛讲经说法。约于此时，章嘉·若必多吉奉乾隆帝之命，将皇宫中从元朝以来历代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等辨认登记，用蒙藏两种文字标出名

号，具册进呈。当年秋天，章嘉·若必多吉奉乾隆帝之命前往多伦诺尔，安排迎接乾隆帝驾临的各种事务，并在乾隆帝到达多伦诺尔之后与二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地区最大的活佛）一起在乾隆帝面前讲论佛法，在从多伦诺尔返回北京的途中，章嘉·若必多吉受翁牛特部、科尔沁部王公的迎请，到内蒙古东部各旗讲经传法。回到北京后，章嘉·若必多吉突然患了痛风病，手足麻木，又患了眼疾，于是请求乾隆帝赦免了一名死囚（据说是一名犯罪的汉人官员），以祈福延寿。

1747 年（乾隆十二年　藏历第十三饶迴火兔年　丁卯）

二月，清朝所封的西藏郡王颇罗鼐去世，因颇罗鼐与七世达赖喇嘛暗中矛盾颇深，而章嘉·若必多吉与七世达赖喇嘛友善，故章嘉·若必多吉对颇罗鼐颇怀嫉恨，据说他曾私下诅咒颇罗鼐，称颇罗鼐发背疮而死是现世报应。约在此时期，因夏季炎热，乾隆帝在北京香山修建了一座小禅寺，赐名为“佛法乐园”，供章嘉·若必多吉夏季居住。章嘉·若必多吉在该寺完成了论述佛教各派学说的起源及发展、教理特点的著作《宗派建立论·佛法须弥妙庄严》。后来章嘉·若必多吉的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宗派源流水晶鉴》，成为研究西藏佛教史的主要资料。

1748 年（乾隆十三年　土龙年　戊辰）

由于佑宁寺多次派人进京请求章嘉·若必多吉返寺，于是章嘉·若必多吉以为母亲做超荐法事及探望年迈的父亲为理由，向乾隆帝请求准许返乡，乾隆帝准假两个月。章嘉·若必多吉还为了保护青海地区的佛教寺院，请求乾隆帝给塔尔寺、佑宁寺、广惠寺颁赐匾额，得到乾隆帝的同意。此年，乾隆帝派画工入藏，测量和绘制布达拉宫、桑耶寺等建筑图样，为在北京等处仿照西藏寺院兴建佛寺做准备。

1749年（乾隆十四年　土蛇年　己巳）

章嘉·若必多吉离北京回青海，乾隆帝命理藩院遣官随行，并命甘肃巡抚将赐给塔尔寺、佑宁寺、广惠寺的匾额送往西宁，待章嘉·若必多吉到达后颁发。章嘉·若必多吉一行经多伦诺尔、察哈尔、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抵达青海，沿途受到各地僧俗及官员热烈迎送。青海各寺院僧众都列队出寺迎接，甘肃巡抚和西宁办事大臣在西宁迎接。章嘉·若必多吉到达西宁后，立即通过驿使上奏报告平安到达，并感谢乾隆帝赏赐物品。章嘉·若必多吉回到佑宁寺时，受到其弟三世却藏活佛阿旺土丹旺秋及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及寺僧的热烈欢迎。他在佑宁寺升座说法，为僧俗摸顶赐福，剃度传戒。甘肃拉卜楞寺的寺主二世嘉木样活佛专程前来拜见，章嘉·若必多吉为他传授比丘戒，起法名为官却晋美旺布。章嘉·若必多吉还命人在佑宁寺附近修建一静修禅院，命名为“密乘大乐殿”。此后，章嘉·若必多吉又去塔尔寺、广惠寺巡礼，颁发御赐匾额（乾隆帝赐给塔尔寺的匾额至今还悬挂在大金瓦殿），并剃度三世敏珠尔活佛，起法名为阿旺赤列嘉措。当年八月初五日，章嘉·若必多吉离佑宁寺回京，顺路还去朝拜了宗喀巴幼年出家学经的夏琼寺。

1750年（乾隆十五年　铁马年　庚午）

该年十月，西藏发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颇罗鼐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后，权势过重，骄纵日甚，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执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党羽又杀害傅清、拉布敦。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帝在震怒之下，认为这是对藏人加恩过重所造成的，今后对于藏人不能授以权柄，决心在拉萨建一座汉式大城，设置总督，派一名提督领兵一万驻扎，并在西藏各地设道、府、知县等官，将西藏一切事务交由

清朝官员处理。章嘉·若必多吉为此长跪不起，恳切祈求："陛下父祖竭力尊崇佛教，尤其陛下是最为关心佛法事务的大法王，西藏乃教法发源之地，如果按圣上所下的旨令，西藏地方的佛教必将衰微，万望陛下无论如何以恩德护持佛教。"在章嘉·若必多吉的请求下，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乾隆帝最后收回成命，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掌管西藏事务，由此确定了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

1751年（乾隆十六年　铁羊年　辛未）

乾隆帝批准四川总督策楞等人所奏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嘉·若必多吉将自己写的《宗派建立论·佛教须弥妙庄严》寄呈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回信赞扬。在此时期，乾隆帝为了庆祝其母孝圣皇太后的六十大寿，改北京西郊瓮山为万寿山，在山下营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在西苑太液池以北兴建阐福寺。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在万寿山后山仿照西藏托林寺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寺院（即今北京颐和园后山香岩宗印之阁的一组寺庙建筑群，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慈禧太后修复颐和园时改建了一部分）。此外，章嘉·若必多吉还参加了今北海公园西北的阐福寺的兴建工作。当年，乾隆奉孝圣皇太后巡游江南，回北京后仿南京报恩寺塔和杭州六和塔分别在万寿山和太液池边建塔，不久，一座坍塌（一说是乾隆帝下令拆毁），改建为佛香阁，一座被天火烧毁，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在废墟上兴建了一座印度式佛堂，称为"大西天"。

1752年（乾隆十七年　水猴年　壬申）

为庆贺拉萨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全部建成，章嘉·若必多吉派德觉洛本去拉萨，为七世达赖喇嘛举行祈寿仪式，并向两尊释迦牟尼像和甘丹寺宗喀巴大灵塔奉献银灯。

1753年（乾隆十八年　水鸡年　癸酉）

春天，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击杀准噶尔汗喇嘛达尔扎，立达瓦齐为准噶尔汗。夏天，达瓦齐攻击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部众投奔清朝。达瓦齐随即与阿睦尔撒纳发生内争，阿睦尔撒纳不敌，也投奔清朝，请求乾隆出兵讨伐达瓦齐。

1755年（乾隆二十年　木猪年　乙亥）

二月，清军分两路进兵伊犁，平定达瓦齐之乱。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呼图、济隆活佛等奉乾隆帝之命举行吉祥大威德金刚威猛烧施法事，祈祷清军胜利。五月，清军生擒达瓦齐，伊犁平定。由于阿睦尔撒纳想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的目的没有达到，心怀不满。乾隆帝召他到热河朝觐，八月，阿睦尔撒纳从同行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达尔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为二世哲布尊丹巴之兄）处探听到清朝的机密，利用额琳沁多尔济疏忽大意，从途中逃脱，重新掀起叛乱。乾隆帝在震怒之下，将达尔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赐死。此年十月，乾隆帝仍按原计划在热河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上层贵族，分别赐给封爵。乾隆帝又依蒙古各部王公的请求，决定在热河避暑山庄之北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动工兴建普宁寺。该寺建成后，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亲临其地，举行庆祝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该寺学习，后来来自准噶尔的僧人也被安置在该寺中。普宁寺分显宗扎仓和密宗扎仓，堪布和教师的选任办法与雍和宫相同。在这一时期，清朝政府还在北京设立了一所藏文学校，招收官宦子弟入学，学习西藏佛教，并派学生中学识出众者赴西藏、甘青藏区学习。这所藏文学校由章嘉·若必多吉和一名大臣负责管理。遵照乾隆帝之命，还从西藏召来舞蹈教习，由章嘉·若必多吉负责，在宫廷中表演西藏的宗教舞蹈

“噶尔”和“羌姆”。

1756 年（乾隆二十一年　火鼠年　丙子）

二月，清军再次攻占伊犁，阿睦尔撒纳逃脱。五月，正当清朝在新疆用兵紧急之时，因达尔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被赐死一事引起二世哲布尊丹巴和各部王公的强烈不满，喀尔喀人心浮动，扎萨克汗部郡王青衮咱卜发动“撤驿之变”，阻断清军后勤通信，以二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各部积极准备举兵反清。在这紧急时刻，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迅速前往喀尔喀谈判。章嘉·若必多吉在动身前往时，写信给二世哲布尊丹巴，说明绝对不能作乱的道理，派自己的侍从南杰坚星夜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二世哲布尊丹巴接信后，听从章嘉·若必多吉的规劝，命喀尔喀首领罢兵，变乱遂告平息。此时章嘉·若必多吉已离多伦诺尔前进数日程，得哲布尊丹巴回信，知道事变已经平息，即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不必赴喀尔喀，返回北京。有的资料说乾隆帝还派章嘉·若必多吉率同清朝大臣及内蒙古各王公前往鄂尔坤、塔密尔等地，齐集喀尔喀王公会盟，宣谕清朝旨意。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　火牛年　丁丑）

二月初三日，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去世。消息传到北京，章嘉·若必多吉立即在北京为七世达赖喇嘛广做超荐法事。乾隆帝因西藏地方紧要，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立即遣章嘉·若必多吉前往西藏，办理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等事务，并派一名大臣和两名御医同行。章嘉·若必多吉动身后，西藏地方政府众噶伦和大寺堪布通过驻藏大臣伍弥泰上奏乾隆帝，推举第穆呼图克图德勒嘉措掌办喇嘛事务，故乾隆帝曾一度停止章嘉·若必多吉入藏。后来乾隆帝考虑到“噶隆等请将第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等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隆

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所以一方面赏给第穆呼图克图以诺门汗名号，令他如达赖喇嘛在世时一体掌办喇嘛事务，一面令章嘉·若必多吉继续进藏。当年十二月，章嘉·若必多吉一行抵达拉萨，第穆呼图克图、驻藏大臣伍弥泰、官保以及各大寺院的活佛、堪布、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等出城热烈欢迎，噶厦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宴会。章嘉·若必多吉在拉萨与三大寺的活佛、僧人及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尤其是对第穆呼图克图特别尊重。因第穆呼图克图原是西藏工布地区的一个普通活佛，虽然是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弟子，富有学识、但由于是骤登高位，威望还不足以服众。在章嘉·若必多吉到达拉萨以前，第穆呼图克图的座位低于两位驻藏大臣，被安排在一个低小的座位上。章嘉·若必多吉按乾隆帝的旨意，在首次会面时就在大庭广众中下马与第穆呼图克图执手为礼，互换哈达，提高了第穆呼图克图的地位，对安定当时西藏的局势起了良好的作用。章嘉·若必多吉还在布达拉宫的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前献盛大供养，吟唱自己所作的悲歌悼念七世达赖喇嘛，使在场的人士大为感动。据当时正在拉萨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记载，章嘉·若必多吉在拉萨时曾多次聚集数千僧众，为他们说法，传授灌顶，深受各寺僧众尊崇。当年十二月，二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去世。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　土虎年　戊寅）

四月，章嘉·若必多吉由拉萨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拜会了六世班禅大师，受到扎什伦布寺僧众热烈欢迎。在与六世班禅会见时，先由班禅大师向皇帝请安，然后由章嘉·若必多吉向班禅大师敬献礼品。班禅大师请章嘉·若必多吉务必关怀达赖喇嘛转世的事务。当时，有三个待认定的转世灵童出现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护法神降神时各执一词，所以章嘉·若

必多吉于九月间上奏乾隆帝，说要等认明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才能动身回京。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　土兔年　己卯）

年初，为了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和为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开光，章嘉·若必多吉将六世班禅迎请到拉萨。在举行四月法会时，由六世班禅主持，有章嘉·若必多吉等参加，为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举行了开光仪式。章嘉·若必多吉应第穆呼图克图为首的西藏各界人士的请求，在拉萨撰写了《七世达赖喇嘛传——如意宝穗》，详细记述了七世达赖喇嘛一生的事迹，反映了这50年中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此外，章嘉·若必多吉还撰写了七世达赖喇嘛的诗体秘传《引来慈悲太阳的黎明》。这两部传记，后来都收入《章嘉·若必多吉全集》中。此后，以六世班禅和章嘉·若必多吉、第穆呼图克图、驻藏大臣、噶伦等为首，召集拉穆、乃穷、桑耶、噶哇栋、昌珠等寺的护法到布达拉宫降神，以确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于桑耶寺的护法抢先指认前藏出生的灵童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而各护法仍说法不一，相持不下，故章嘉·若必多吉提出请六世班禅认定，六世班禅遂确定后藏托卜嘉地方出生的灵童（其家族与六世班禅有亲戚关系）为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铁龙年　庚辰）

年初，章嘉·若必多吉离拉萨回北京。抵达北京时，乾隆帝出寝宫院门迎接，并按满族的礼节，与章嘉·若必多吉行抱见礼，互致问候，并献哈达。章嘉·若必多吉向乾隆帝详细奏报西藏情形，乾隆帝大加赞赏。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　铁蛇年　辛巳）

春天，乾隆帝与其母孝圣皇太后去五台山进香，瞻礼殊象寺，皇太后默记寺中文殊菩萨容貌。回到北京后，乾隆帝对章

嘉·若必多吉说:“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指清太宗皇太极)居住莫顿(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的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若必多吉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团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当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之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于是乾隆帝下令拨款,在香山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寺院(据乾隆帝所书承德《殊象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的序言说,是按皇太后所记文殊容貌刻石,在香山建寺,题名宝相寺),内有佛殿和僧舍,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开光仪式,并担任堪布给新出家的满族僧人传授居士戒和沙弥戒。乾隆帝还下令说:“在此寺聚诵时必须全部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若必多吉遵此旨意,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经籍,并因为西藏诵经的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专门为用满语诵经的僧人制定了新的诵经语调。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　水马年　壬午)

乾隆帝下令,将在理塘出生的二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送到多伦诺尔,从章嘉·若必多吉受戒,然后到喀尔喀坐床。所以章嘉·若必多吉夏天去热河居住,然后转赴多伦诺尔,为多伦诺尔僧众传法。当二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到达后,章嘉·若必多吉为转世灵童剃度,传授居士戒,起法名为意希丹贝尼玛,是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章嘉·若必多吉还为哲布尊丹巴的随从传授了四部灌顶。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　水羊年　癸未）

九月，章嘉·若必多吉之父在安多去世，章嘉·若必多吉即向乾隆帝请假，返回家乡为父治丧。章嘉·若必多吉抵青海后，乾隆帝通过驿使命西宁办事大臣送来治丧费300两白银及慰问诏书。此后，章嘉·若必多吉至佑宁寺，为前来朝拜的蒙古、藏、土各族僧俗人士说法，摸顶赐福。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木猴年　甲申）

二月，章嘉·若必多吉在佑宁寺为塔尔寺、夏琼寺、隆务寺、拉卜楞寺的僧人2500多人说法。当时二世嘉木样活佛正要辞去佑宁寺法台的职务，于是众僧请求章嘉·若必多吉担任佑宁寺的法台，章嘉·若必多吉推辞不过，就任法台职务，为僧众讲说《释量论》。接着又应邀去却藏寺、广惠寺、塔尔寺巡礼，然后返回佑宁寺。五月，章嘉·若必多吉委任格桑拉旺代理佑宁寺法台，动身回京。当时，西藏格仓静修寺的扎德格西仍认为前藏出生的灵童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将灵童接至本寺，许多人宣称这个灵童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将此事奏报后，乾隆帝大怒，下令将格西和灵童押送北京治罪。章嘉·若必多吉劝谏说。"这样做对佛教不利，不如将那个灵童送往后藏扎什伦布寺，让他做班禅大师的侍从，不仅对眼下有利，事情也会如泉水自干，对达赖喇嘛的事业也不会带来危害。"这一意见为乾隆帝采纳，命驻藏大臣照此办理，赦免了扎德格西和灵童的死罪。同样，当时在喀尔喀也有一个僧人宣称自己的侄子是二世哲布尊丹巴真正的转世，乾隆帝也采纳章嘉·若必多吉的建议，将其迁至热河居住。

1765年（乾隆三十年　木鸡年　乙酉）

夏天，章嘉·若必多吉至多伦诺尔住夏，为少数弟子讲授《菩提道次第论》和密宗修行法，并闭关坐静一个月。因次年章嘉·

若必多吉年届五十，乾隆帝于年底驾临章嘉·若必多吉驻锡的嵩祝寺，赏赐物品，并下令为章嘉·若必多吉举行祝寿宴会。

1766 年（乾隆三十一年　火狗年　丙戌）

正月初十为章嘉·若必多吉五十寿辰，由府库拨给举行寿宴的物品，乾隆帝还派宫廷乐队前来表演歌舞。北京各寺院的堪布、活佛、僧人以及内蒙古各旗的王公、贝勒、贝子、扎萨克等也纷纷前来祝寿。此年，乾隆帝因蒙古各部和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来热河朝觐的人员日渐增多，而热河磬锤峰下普宁寺以东尚有空旷之地，就打算在该处建寺。在询问章嘉·若必多吉时，章嘉·若必多吉说："大藏所载，有上乐王佛，乃持轮王化身，居常向东，洪济群品，必若外辟重闉，疏三涂，中翼广殿，后规阇城，迭磴悬折，而上置龛，正与峰对者，则人天咸遂皈依。"于是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于此年正月动工建寺，此即热河外八庙中的普乐寺。当年夏天，章嘉·若必多吉赴多伦诺尔，为住夏的僧众说法。并因该地区大旱，章嘉·若必多吉在多伦诺尔湖畔埋藏宝瓶，投掷祭龙食子祈雨。三世敏珠尔活佛阿旺赤列嘉措从青海来多伦诺尔向章嘉·若必多吉敬献礼品，章嘉·若必多吉代他向乾隆帝请安，并推荐敏珠尔活佛驻京任职。因达浦多杰强预言章嘉·若必多吉 53 岁时将有一场大难，故章嘉·若必多吉出资在西藏、青海的许多寺院中广作法事，祈福消灾。

1767 年（乾隆三十二年　火猪年　丁亥）

夏初，章嘉·若必多吉到五台山闭关坐静，历时数月。五月，因缅甸军队侵入云南盏达、陇川等地，中缅发生战争，乾隆帝派兵出征，并降旨召回章嘉·若必多吉，命章嘉·若必多吉在皇宫中的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岛白塔下的寺院）做了为期七天的"色界大自在吉祥驱敌天女威猛施食"法事，以护

佑清军战胜。八月，热河普乐寺建成，该寺平面成规则的长方形，分前后两部分，前为汉族寺庙形式，供有三世佛，后为碑亭与藏式坛城，坛城是用砖石砌成的三层方形高台，台上四角和四边中间各置琉璃塔一座，再上为旭光阁，阁中央建有大型立体坛城，中间供奉上乐王佛铜像一尊。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为该寺举行了开光仪式，乾隆帝撰文刻碑记事。同时，章嘉·若必多吉还负责在北京西山脚下创建了一座内供大型文殊菩萨骑狮塑像的寺院，在举行开光仪式时，乾隆帝驾临其地，奉献供品，当年，乾隆帝在五台山建普乐院，赐给章嘉·若必多吉修行，章嘉·若必多吉为该寺的修行室起藏语名为“艾温噶齐”（意为显密喜旋），此后章嘉·若必多吉常在夏天到该处居住静修。在五台山住夏时，章嘉·若必多吉还应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等人的请求，用藏文写作了一部记述五台山历史和宗教传说的《五台山志》。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　土鼠年　戊子）

因有预言说章嘉·若必多吉次年将有大难，故章嘉·若必多吉给西藏各大寺和佑宁寺捎去大量财物，请各寺广做祈寿法事。此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北京患重病，章嘉·若必多吉亲自为他治病，并代他向乾隆帝请假，准许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返回青海。

1769 年（乾隆三十四年　土牛年　己丑）

正月，章嘉·若必多吉特派管家洛桑坚参加佑宁寺的祈愿法会，献银 2500 两，并请求佑宁寺僧众准许他辞去法台职务。当年春天，章嘉·若必多吉突患重病，但不久即康复。夏天，章嘉·若必多吉去五台山，二世嘉木样活佛和阿拉善托音诺门罕前来拜见。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　铁虎年　庚寅）

夏天，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闭关静修。七月末，章嘉·若必多吉返回北京，朝觐乾隆帝。当年八月十三日为乾隆帝六十寿辰，乾隆帝为了给自己祈寿，在北京兴建了内供一万尊无量寿佛的万寿寺（似即阐福寺边的万佛楼，地在今北海公园内西北角，楼右立有石幢，刻乾隆帝庚寅年御制万佛楼瞻礼诗），由章嘉·若必多吉为首的驻京喇嘛为之开光祝赞。八月一日，章嘉·若必多吉为乾隆帝的寿辰献无量寿佛铜像、金汁书写的《胜乐本续》、金质佛塔、金质曼遮、银质国政七宝、巨幅无量寿佛像、金汁书写的《长寿经》九部、鎏金铜塔八座、金念珠九串、白马九匹等，并为乾隆帝广做祈寿法事。同年，在北京的章嘉·若必多吉的侄子丹麻活佛突然亡故，章嘉·若必多吉上奏乾隆帝，从青海召来章嘉·若必多吉的另一个侄子三世拉科活佛阿旺图丹旺秋，代替丹麻活佛担任他的侍从。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　铁兔年　辛卯）

此年逢乾隆帝之母孝圣皇太后八十寿辰，蒙古各部首领争相前来祝贺献礼，乾隆帝为接见蒙古各部首领，于1768年开始在热河仿照拉萨布达拉宫兴建普陀宗乘之庙，至此时已接近完工。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前往多伦诺尔，先为三世哲布尊丹巴传授沙弥戒，然后在秋天与哲布尊丹巴一同前往热河朝觐。九月，三世哲布尊丹巴、章嘉·若必多吉、二世嘉木样活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以及内外蒙古各呼图克图和各部王公云集热河，此时由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归来的蒙古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等人也来到热河朝觐，形成清朝皇室与蒙古各部僧俗间的一次空前盛会。由三世哲布尊丹巴和章嘉·若必多吉共同主持，举行了有一千余名僧人参加的普陀宗乘之庙竣工典礼和祈愿法会，乾隆帝也亲自参加。蒙古各部王公向乾隆帝进献

千佛，置于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西面的千佛阁供奉。乾隆帝为此撰写了《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千佛阁碑记》以记其事。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诸首领也向章嘉·若必多吉奉献了礼品，还有一个名叫雅尔培力的土尔扈特台吉奏请乾隆帝，情愿舍弃妻子、财产和属民，跟从章嘉·若必多吉受戒出家，并决意不回本部，依止于章嘉·若必多吉身前。经乾隆帝同意，雅尔培力成为章嘉·若必多吉的近侍弟子。约从此年开始，乾隆帝因满族中有不少人信仰佛教，但是以前没有译成满文的佛教大藏经，遂命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译成满文的工作。章嘉·若必多吉从学府中选择成绩优异的人员以及在京的通晓语言文字的喇嘛，还有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参加，组成译馆，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若必多吉详加校审，逐卷进呈乾隆帝审阅。乾隆帝在审阅中又推敲句意，加以订正，更正一些有疑惑及不当之处，并写作译记。

1772 年（乾隆三十六年　水龙年　壬辰）

夏天，章嘉·若必多吉去五台山闭关坐静，秋天，朝觐乾隆帝于围场，然后至热河普陀宗乘之庙，为僧众宣讲《菩提道次第论》。当时清军正在嘉绒地区与金川土司激战，章嘉·若必多吉在这几年中多次奉乾隆帝之命举行抛掷食子法事，祈祷清军战胜。

1773 年（乾隆三十七年　水蛇年　癸巳）

二世嘉木样活佛返回安多地区后编定卓尼版藏文大藏经目录。

1774 年（乾隆三十九年　木马午　甲午）

夏天，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以北普陀宗乘之庙以西动工兴建殊象寺，其殿堂规模形式大体仿照五台山的殊象寺。

1775年（乾隆四十年　木羊年　乙未）

热河殊象寺建成，庙内喇嘛全用满族人，按乾隆帝之命，此庙喇嘛用了18年时间，将译成满文的大藏经《甘珠尔》二十一卷，抄成三部，由章嘉·若必多吉负责此项工作。年底，因次年正月初十是章嘉·若必多吉六十寿辰，乾隆帝驾临章嘉·若必多吉的寝室，为他祝寿，并赐无量寿佛像、金汁书写的《长寿经》、景泰蓝佛塔等，还演戏庆贺。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火猴年　丙申）

正月，以敏珠尔活佛、拉科活佛为首的京城内外各寺院、五台山、多伦诺尔、内蒙古各旗的王公和僧众的代表为章嘉·若必多吉举行祝寿宴会，奉献了大量礼物。清朝的亲王、贝勒、大臣等也按汉地的习惯敬献“如意”，祝贺寿辰。此时清军平定金川，拆毁当地最大的苯教寺院雍仲拉顶寺，改建成格鲁派寺院，更名噶丹林。达赖喇嘛派驻泰宁惠远庙的堪布请求分派其徒住金川传教，遭乾隆帝批驳。章嘉·若必多吉奉乾隆帝之命，指派班智达堪布桑吉俄色前去噶丹林主持。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火鸡年　丁酉）

此年，章嘉·若必多吉身患重病，乾隆帝多次特派大臣前往探视，还选派了一位汉地的名医为他治疗，侍从们向各寺院僧众熬茶布施，广做祈寿经忏法事。章嘉·若必多吉最后得以康复。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　土狗年　戊戌）

乾隆帝之母孝圣皇太后去世，奉乾隆帝之命，以章嘉·若必多吉为首的驻京喇嘛诵经七天，为皇太后做超荐法事。同年，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去世，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商议派人入藏主持有关事务，章嘉·若必多吉提议派三世敏珠尔活佛，乾隆帝不同意，章嘉·若必多吉说自己虽已老迈，但为了皇上的大事，

可以前往,乾隆帝又不愿章嘉·若必多吉远离,故决定派卓尼诺门罕阿旺楚臣前去,同时办理在西藏为皇太后做超荐法事及西藏有关事务。同年十二月,章嘉·若必多吉向乾隆帝奏报,六世班禅愿于1780年入京朝觐,恭祝乾隆帝七十大寿,乾隆帝立即表示允许。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说,是章嘉·若必多吉在乾隆帝和六世班禅之间充当了介绍人,乾隆帝邀请六世班禅在1780年入京朝觐,班禅大师接受了邀请。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土猪年　己亥)

年初,乾隆帝令驻藏大臣留保柱和堪布诺门罕阿旺楚臣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会见六世班禅,宣布允许六世班禅1780年入京,商定六世班禅当年六月十七日由后藏起程,章嘉·若必多吉随诏书附寄六世班禅书信一封、珍珠手串一副。乾隆帝为接待六世班禅,在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西黄寺,以供六世班禅驻锡。六世班禅自西藏动身后,章嘉·若必多吉派若干名侍从携带书信前往青海迎接。当年冬天,六世班禅驻锡青海塔尔寺。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铁鼠年　庚子)

春天,六世班禅从塔尔寺起程,经蒙古地方向热河进发。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前往多伦诺尔迎候六世班禅,抵多伦诺尔后,接见来自各地的人众,摸顶赐福,并派扎萨克喇嘛格勒南喀前往途中向六世班禅问安,格勒南喀在察哈尔的乌素图见到六世班禅,六世班禅遂派索本岗坚堪布至多伦诺尔回拜。接着,章嘉·若必多吉遵乾隆帝之命移住岱汉寺,不久乾隆帝第六子也到达岱汉寺。五月二十六日,六世班禅到达岱汉,皇六子和章嘉·若必多吉一起迎接六世班禅,并颁赐乾隆帝的诏书和赏赐物品。皇六子又和章嘉·若必多吉同至六世班禅下榻处奉献礼品,请六世班禅摸顶赐福。次日,皇六子和章嘉·若必多吉宴请六世班

禅,并一同观看歌舞、赛马等。接着,章嘉·若必多吉先往多伦诺尔,在六月二十日六世班禅抵达多伦诺尔时再次迎接。次日,六世班禅巡礼多伦诺尔汇宗、善因两寺,为僧众讲经说法。六世班禅和皇六子一起到章嘉·若必多吉居住的拉章拜访,六世班禅还亲自到章嘉·若必多吉的寝室,洒花祝赞。六月二十三日,以章嘉·若必多吉为首的多伦诺尔僧众向六世班禅献佛像、佛经、袈裟、白银一千两等礼品,祝愿六世班禅长寿健康。六月二十六日,皇六子与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先赴热河,向乾隆帝报告六世班禅在途中的情形。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抵热河避暑山庄,章嘉·若必多吉与朝廷大臣们一起出迎,与六世班禅一起朝觐乾隆帝,然后章嘉·若必多吉遵乾隆帝旨意,陪同六世班禅至避暑山庄各处巡礼祝赞,至六世班禅下榻的须弥福寿之庙的寝殿,皇六子、六世班禅、章嘉·若必多吉等饮茶畅谈。次日,乾隆帝驾临须弥福寿之庙看望六世班禅,由章嘉·若必多吉领诵他自己写作的“万寿无疆”、“睿智殊胜”等祝辞。在用茶点时,乾隆帝对六世班禅说:“在朕七十寿辰庆典之际,班禅额尔德尼佛驾光临,对此方众生大有利益。朕多年来虽从章嘉呼图克图学习若干佛法,然而佛法无边,深似大海,朕须料理全部国事,不得闲暇,未能参究呼图克图所授佛法,只是时常勉力而已。今日福田施主相会,可谓前生誓愿及祝祷,得以如愿实现,朕要向上师请教佛法。朕以前不会说藏语,为了上师之来,朕临时向呼图克图努力学习了日常用语,但是不够熟练,有关教法的词语,可请呼图克图担任翻译。”八月初三,乾隆帝赐给六世班禅金印等物品,章嘉·若必多吉在场,并献喜庆哈达。八月初六,乾隆帝、六世班禅和章嘉·若必多吉一起参加在须弥福寿之庙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乾隆帝指示章嘉·若必多吉说:“此须弥福寿之庙必须按西藏扎什伦布寺的规矩建立显密教律,应从班禅大师的徒众中选择一名好的

堪布以及领经师、格贵等。”章嘉·若必多吉遵旨请示班禅大师，委派了堪布等职。八月初七，六世班禅为乾隆帝七十大寿献礼，章嘉·若必多吉陪同六世班禅前往乾隆帝的住所，乾隆帝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寝殿内、章嘉·若必多吉乘轿至寝殿门外。六世班禅致祝寿辞，乾隆帝致答辞，都由章嘉·若必多吉逐句翻译。八月初八，乾隆帝、六世班禅与章嘉·若必多吉在普陀宗乘之庙参加祈愿大法会。八月十三日为乾隆帝生辰，章嘉·若必多吉陪同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帝，做长寿仪轨等法事，讽经祝寿。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听六世班禅讲“白胜乐长寿灌顶法”，章嘉·若必多吉将其教言和仪轨程序等译成蒙语，向乾隆帝讲解。此后，章嘉·若必多吉先回北京，于九月初一日六世班禅到达北京时在黄寺迎接。九月初三，六世班禅到满族佛寺，乾隆帝命皇六子将准备颁给八世达赖喇嘛的封册文书交给六世班禅过目，章嘉·若必多吉用藏语向六世班禅解释册文内容。然后，章嘉·若必多吉陪同六世班禅游览圆明园，并对六世班禅说：“圣上因前世所发殊胜心愿，为表示对佛教首领尤其是对你的崇敬，才请你到此为园林内外祝福加持，而此园是不许其他大臣进入的御花园。”从圆明园返回的途中，六世班禅至和尚庙觉醒寺，与该寺御任方丈讲论教法，由章嘉·若必多吉担任翻译，皇六子和章嘉·若必多吉将此事奏报后，乾隆帝封此汉僧为“禅师”。九月初九，章嘉·若必多吉陪同六世班禅在谐趣园朝觐乾隆帝。从九月初十日开始，章嘉·若必多吉陪同六世班禅参观北京各处宫殿和旃檀觉寺等寺院，乘船去万寿山，又到香山各佛寺巡礼，章嘉·若必多吉向六世班禅介绍了各寺院的历史和各处园林的奇特之处。同时，章嘉·若必多吉还向六世班禅求教许多佛法。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在皇宫中清朝诸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太和殿会见和宴请六世班禅，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殿前第三层台阶，章嘉·若必多吉乘轿至第

二层台阶。十月初八日，乾隆帝、六世班禅和章嘉·若必多吉在旃檀觉卧寺举行迎佛献浴等佛事，二十二日又在雍和宫举行祈愿大法会。十月二十六日，章嘉·若必多吉迎请六世班禅至嵩祝寺传授教法，六世班禅还到寺内大慈法王住过的寝室及各殿堂献供发愿，祝赞吉祥，并与章嘉·若必多吉互赠礼品。当晚，六世班禅留宿嵩祝寺。十月二十七日，六世班禅赠给章嘉·若必多吉印度的刀剑和火枪等武器，然后与章嘉·若必多吉同去雍和宫，为乾隆帝讲经传法，由章嘉·若必多吉担任翻译。六世班禅又向乾隆帝进献印度火枪及刀剑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解释说，这预示着后来击退廓尔喀进犯后藏扎什伦布寺的战争。十月二十八日，六世班禅在驻锡地西黄寺突染重病，即请章嘉·若必多吉到身边诊脉治疗。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亲至西黄寺看望，命章嘉·若必多吉在六世班禅身边陪护。十一月一日，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3岁，章嘉·若必多吉即主持后事，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六世班禅遗体前讲说上师供养，并献供礼。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铁牛年　辛丑）

二月十二日，六世班禅的灵塔被迎往西藏，章嘉·若必多吉护送至清化府地方，向灵塔献礼，然后回京。当年夏天，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同去北京西面的潭柘寺，章嘉·若必多吉奉旨为该寺佛殿佛像祝赞。此后，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从潭柘寺至五台山，在菩萨顶举行祈愿法会，乾隆帝让章嘉·若必多吉与他同坐一个坐垫上，说："与呼图克图同坐在朕之座位上，朕便觉安乐。"说毕，乾隆帝拉着章嘉·若必多吉之手坐在同一个宝座上。乾隆帝赐银一万两，让章嘉·若必多吉扩建寝殿，并将自己的一座寝宫赐给章嘉·若必多吉长期居住。当年，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到多伦诺尔迎接在后藏出生的第四世哲布尊丹巴洛桑图丹旺秋（为八世达赖喇嘛索诺木达什之子，1774年生，由八世达

赖喇嘛认定,1778年在布达拉宫从八世达赖喇嘛受戒),为其剃度并授沙弥戒,然后与哲布尊丹巴一同前往热河朝觐,并为乾隆帝做祈祷法事。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水虎年　壬寅)

二月,因黄河多年泛滥成灾,河南龙冈决口,难以合拢,河堤工程紧急,乾隆帝询问章嘉·若必多吉,章嘉·若必多吉说:"河神素来灵应,从前康熙、雍正年间,曾因堵筑工程,差官至西宁,虔申祈吁,得以蒇工。"又说:"黄河主流发源于玛沁雪山,如果隆重祭祀玛沁蚌拉山神,或许有益。"于是乾隆帝派遣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当时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之子)驰往西宁,会同西宁办事大臣留保柱、章嘉·若必多吉之弟却藏呼图克图前往河源致祭,由此引出清代对黄河河源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察。八月,阿弥达回京奏报,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源出于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为真黄河之上源。这比历代考察河源认为发源于星宿海前进了一步,乾隆帝即命馆臣编辑《河源纪略》,颁布刊刻,并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传信。乾隆帝还因此写了《御制河源诗》及按语、《御制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河源简明语》等。乾隆帝又传谕西宁办事大臣,每年拨款在玛沁雪山附近祭祀山神,创立了祭祀玛沁蚌拉雪山之例。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水兔年　癸卯)

七月,西宁办事大臣留保柱奏称,五世东科尔呼图克图于1753年圆寂后,"在西川出有一名呼毕勒罕,因不明确,其徒俱未往迎。后来青海隆务地方出有一呼毕勒罕,能认识前辈的法器经卷,并能呼各徒名字,业经迎到寺中坐床,现今在藏学艺。但六世班禅进京时,又称四川所出呼毕勒罕属真。"乾隆帝即命章嘉·若必多吉查明,并将二人所学孰胜之处,遇便奏闻。经章嘉·若必多吉查验,确定隆务出生的嘉央丹增嘉措(公元1754—

1798年)为六世东科尔呼图克图。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木龙年　甲辰)

约于此年,乾隆帝将自己身着僧装的一幅画像和御笔题诗的具吉祥天女刺绣像赐给章嘉·若必多吉,并恩准章嘉·若必多吉在住房上树立金顶。

1785年(乾隆五十年　木蛇年　乙巳)

夏天,章嘉·若必多吉至五台山闭关静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进京朝觐,与章嘉·若必多吉在京相会。冬天,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康区各地的寺院和地方首领纷纷派代表前来祝贺章嘉·若必多吉七十寿辰,敬献大量礼品。十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派内务府大臣向章嘉·若必多吉颁赐祝寿礼品,有乾隆御笔所题的"广觉慧宗"匾额、金质无量寿佛九尊、银塔一座、内供九十尊金质无量寿佛的旃檀木塔画座、八吉祥徽、七政宝等。十二月二十三日,乾隆帝驾临章嘉·若必多吉寝室,赐给章嘉·若必多吉珍珠念珠一串、祝寿的诏书,章嘉·若必多吉以吉祥颂词作答,并献礼物。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　火马年　丙午)

元旦,章嘉·若必多吉在旃檀佛像前向乾隆帝献新年哈达。正月初十,京城内外各寺僧众为章嘉·若必多吉祝寿。正月十一日,内外蒙古察哈尔、青海各旗王公向章嘉·若必多吉献礼祝寿。同时,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帕巴拉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也派人前来献礼祝寿。三月,乾隆帝去五台山,并命章嘉·若必多吉也于三月至五台山。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文殊菩萨像前举行祈愿法会,广做佛事。乾隆帝离五台山时,章嘉·若必多吉已觉身体不适,但仍如以往那样送行。此后章嘉·若必多吉病情日益加重,遂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即派一名大臣和汉、藏医各一人赶往五台山治疗。章嘉·若必多吉说:"如能见到皇上的一

名亲近侍卫,有话要启奏皇上。"于是乾隆帝派大臣巴忠去五台山,并令其将章嘉·若必多吉延请到北京治病。章嘉·若必多吉书写遗书,请求将自己的骨灰装进铜塔,安放于镇海寺,请巴忠带回。四月初二日下午,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

虽然章嘉·若必多吉临终遗嘱,不要保存他的遗体,火化后将骨灰装入铜塔存放在五台山镇海寺,但乾隆帝说他这是害怕人们将他和六世班禅的肉身灵塔相提并论,其实只要在颜色上稍加区别就可以了。于是乾隆帝下令用七千两黄金造了一座大塔,于六月二十四日特派大臣送到五台山,将章嘉·若必多吉的遗体安放到塔瓶内,在章嘉·若必多吉指示的地点向下挖到岩层,在岩石中掘一四方石窟,将灵塔安放在石窟中,然后在上面建佛堂和用保存章嘉·若必多吉遗体时用过的尸盐等装藏的大石塔。并派章嘉·若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图克图去西藏,发放布施,为章嘉·若必多吉做超荐法事。乾隆帝并下诏说:"章嘉呼图克图掌印多年,阐扬黄教,安抚众生,留心经律。昨据佛尔卿额奏称,呼图克图于四月初二日圆寂等语,朕心深为悼惜。著制造金塔一座,从其夙愿,永于镇海寺供设。一切事宜,妥为照料。并于前藏施银一千两,后藏施银五百两,交留保柱、阿旺簇勒提木(按即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当时在拉萨担任摄政),令为熬茶诵经费用。此项银两,即动用该处库项。至所管印信,亦从其遗言,令阿旺簇勒提木掌管。闻阿旺簇勒提木每有欲来京师之愿,前因彼处事关紧要,未从其请,今值呼图克图之事,留保柱奉到此旨,即令其急速前来,并将此旨谕令阅看。"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第2期

雍和宫的佛仓简说

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雍和宫密切清朝朝廷与蒙古和藏族地区的佛教界人士的关系，扩大清朝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力，逐步强化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到雍和宫改庙时期，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内部早已形成一整套等级制度，特别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广泛实行使得格鲁派内部早已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的转世活佛，遍布蒙藏各地，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僧侣集团。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对某些寺院的兴盛、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力量雄厚的寺院或扎仓可以培育出一批著名的转世活佛，而一个著名的转世活佛驻锡或主持某个寺院或扎仓，往往又是该寺院兴盛发达的重要因素。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把活佛转世制度与寺院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活佛转世形成一套严密而系统的例规。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一座寺院与某个著名活佛的固定关系的建立，往往都需要几辈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固定下来。不过同时格鲁派在转世活佛与寺院的关系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得像雍和宫这样的新兴的寺院也有可能直接吸

收蒙藏地区的大活佛为自己寺院的活佛，同时也可以从自己寺院培育出能影响蒙藏各地的著名活佛。乾隆皇帝总结清朝开国以来与藏传佛教交往的经验，更是深深懂得培养一批与朝廷有密切关系、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在蒙藏地区有重要号召力的转世活佛的必要。从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开始，乾隆帝就在他的大国师章嘉·若必多吉的帮助下有计划地使一批蒙藏地区的转世活佛与雍和宫联系起来，使他们成为雍和宫的活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对蒙藏事务起过重要作用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雍和宫的活佛中，有的本来就是蒙藏地区的重要转世活佛，有的是由于在雍和宫担任过僧职受到清廷的信用而发展起来、然后在蒙藏地区确立其重要地位的转世活佛。因此，这些转世活佛系统与雍和宫的关系构成了雍和宫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研究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各个转世活佛的历史，应当与研究雍和宫的建筑、文物、寺院组织一样，成为研究雍和宫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

"佛仓"是一个汉藏合璧的名词，"仓"（tshang）是藏文"家"、"住宅"、"府邸"之意，"佛仓"即是转世活佛的住所、公馆之意。在西藏、甘青川藏区称这种附着于某个寺院并往往成为该寺院的组成部分的活佛公馆为"拉章"（bla brang）、"噶尔哇"（sgar ba）、"昂"（nang），在蒙古地区则多称为"仓"。后来在甘青和蒙古地区常将转世活佛系统的称号与"仓"结合起来，既指活佛，也可指活佛的住所，"阿嘉仓"就既可指阿嘉活佛，也可指阿嘉活佛的住所。

在格鲁派的大寺院中，一个活佛在该寺是不是建有拉章（仓），往往表明这一活佛系统与该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每一个活佛的拉章都有一批管事人员和房屋、经堂、土地、财产以

及属民和佃户，因此一个活佛在某寺院拥有拉章就必然与该寺有密切的宗教和经济联系，并因此被该寺接纳或承认为自己寺院的活佛，取得该寺的僧籍。在蒙藏地区，也有一些大活佛除了在其本寺拥有拉章外，还在其他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寺院建有拉章，因此他除了被看成是其本寺的活佛外，也被其他的这些寺院承认为自己寺院的活佛。例如土观活佛的根本寺院是青海省互助县的佑宁寺，但是他又在塔尔寺建有拉章，并出任过塔尔寺的法台，因此他也被塔尔寺认为是自己寺院的活佛。却藏活佛是却藏寺的寺主，但是他在佑宁寺、塔尔寺也建有拉章，因此却藏活佛也被认为是佑宁寺、塔尔寺的活佛。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活佛与寺院的关系上的这种灵活变通的惯例为清朝使一些格鲁派的活佛既在雍和宫担任职务，建立佛仓，同时又与蒙藏地区自己的本寺保持密切关系提供了便利。

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时，协助乾隆皇帝主持其事的格鲁派活佛为章嘉·若必多吉和色赤·洛桑丹贝尼玛，后来经章嘉·若必多吉推荐和乾隆皇帝选拔，陆续有一些格鲁派的活佛和高僧参与了雍和宫寺院的管理事务，清朝皇帝还把雍和宫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这样形成了雍和宫内的各个佛仓。妙舟《蒙藏佛教史》记载雍和宫内的佛仓说："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门罕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年改为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驻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北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仓。"① 《雍和

① 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第七篇第三章第二节北平之寺院。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有该书影印本。

宫漫录》一书说："蒙、藏两族各大喇嘛来到北京，他们每人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这行馆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名叫'城内本庙佛仓'，就是在北京城内有他本人的一座庙宇作为他的行馆，地安门内三眼井东口外的嵩祝寺，就是章嘉呼图克图的本庙佛仓。嵩祝寺东边的法渊寺和西边的智珠寺，则是章嘉随从人员的宿舍。……地安门外以东的福祥寺，则是青海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即色赤活佛）的本庙佛仓。……第三种是'赐居佛仓'。本人在北京没有庙宇，因为职务关系需要长期留住北京，而且他的职务又与雍和宫有关，于是就在雍和宫内或雍和宫附近另辟院落给他建造佛仓，名叫'赐居佛仓'。就是赏赐一所宅院的意思。"该书接着介绍雍和宫的佛仓的位置说："在昭泰门外辇道路西，有两个小门，门里分成三个院落，由南往北，第一个院落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佛仓，前后五排，共有瓦房三十八间，其中佛堂五间，其余为洞阔尔的卧室、客厅、厨房等。由洞阔尔佛仓往北是第二个院落，即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间。由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往北是第三个院落，即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二十五间。在昭泰门外辇道的路东，也有两座小门，门内是阿嘉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六十六间，其中佛堂三间，而且全部都有走廊互相通连着，另外还有十二间游廊。这阿嘉佛仓，在雍和宫所有各佛仓中，规模最大，气势最为阔绰。以上四座佛仓，全都在雍和宫昭泰门外，俗称'内围子佛仓'，就是雍和宫内佛仓的意思。除了'内围子佛仓'外，还有'外围子佛仓'，一共三处：第一处在雍和宫东花园内，名叫'土观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四十五间，厨房五间，内有五间瓦房用作佛堂。第二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东边，为西藏'济隆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五间。这座佛仓，在 1929 年（民国十八年）曾一度改

为‘西藏驻北平办事处’。第三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后面，是‘果蟒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三十间。在这里还必须介绍的是，藏经馆原为北大门，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以前喇嘛印务处办公的地点还没设在这里的时候，乃是‘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在藏经馆旁边的东板子门内，则是‘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这两座佛仓的历史，后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①

从以上的记述看，主持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章嘉活佛和色赤活佛虽然是历辈参与雍和宫管理事务的最重要的驻京呼图克图，他们理所当然地应是雍和宫寺院的活佛，但是由于他们在雍和宫建寺前就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本庙佛仓”，而且章嘉活佛驻锡的嵩祝寺即是管理北京、热河、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和僧人的“喇嘛印务处”所在地，所以清朝皇帝没有在雍和宫内赐给他们佛仓。当然，按章嘉和色赤活佛的财力和地位，在雍和宫内再建一座佛仓也非难事，但是雍和宫是清朝皇室直接掌握的皇家寺院，没有皇帝的赐予，即使是作为大国师的章嘉活佛也不能在其中建立佛仓，这正是雍和宫与其他藏传佛教的大寺院的不同之处。不过并不能因为章嘉和色赤活佛在雍和宫内没有佛仓就认为他们不是雍和宫寺院的活佛，实际上他们在北京的驻锡之地嵩祝寺和福祥寺也可以算作是雍和宫寺院的“外佛仓”。

这样，《雍和宫漫录》中记述了“内围子佛仓”四座、“外围子佛仓”三座、原在藏经馆及其附近的两座佛仓，总共在雍和宫有过九座佛仓。但是这并不表示雍和宫除章嘉和色赤活佛之外还有九位活佛，因为对这九座佛仓还应考虑到可能发生过

---

① 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9页。

变迁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九座佛仓中的“诺门罕佛仓”和“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应当是同一个活佛的佛仓，原在藏经馆旁的东板子门内，后来迁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与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相连，只是这个佛仓的名称从“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变成了“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那木喀呼图克图应即是萨木萨呼图克图（理由见后）。产生这次变迁的原因，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设在嵩祝寺的“喇嘛印务处”的房屋被炮火焚毁。喇嘛印务处一度移至雍和宫，后又移至西城护国寺东廊下的五台山下院（俗名五门庙），1908年喇嘛印务处又迁到雍和宫东花园北大门，看来是因为喇嘛印务处占用了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和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所以才将这两个佛仓搬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

去掉这两处重复，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共七位活佛，即是：阿嘉、洞阔尔、萨木萨、诺门罕、土观、济隆、果蟒，再加上章嘉和色赤，可以说雍和宫共有九个活佛转世系统。下面我们对这九个活佛系统及其与雍和宫有关的事迹作一简要介绍，并对其中几点难于肯定之处，略作辨析。

1. 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的本寺是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公元1642—1714年）受康熙帝尊奉，1693年奉召进京。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康熙帝委派二世章嘉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务。1706年康熙帝封二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印，管理北京地区的喇嘛事务。雍正帝在即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二世章嘉常到雍正的潜邸（即雍和宫）与雍正讲论佛法，因此他可能是最早与雍和宫有关系的藏传佛教僧人。1711年，

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帝扩建法源寺赠给二世章嘉，改寺名为嵩祝寺。从此嵩祝寺成为章嘉活佛在京的驻锡之所。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公元1717—1786年），1724年雍正帝召他进京，从二世土观学佛，还曾与四皇子（即后来的乾隆帝）同窗读书。1784年受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奉命去四川泰宁看视七世达赖喇嘛，并送达赖喇嘛回拉萨。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回京，乾隆赐给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扎萨克达喇嘛之印。1744年协助乾隆皇帝，主持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乾隆时期在北京、热河、五台山兴建的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他都参与其事，是乾隆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重要助手及顾问。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他奉命入藏主持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事务。1780年六世班禅到热河和北京朝觐乾隆帝，他是负责接待六世班禅的主持者之一，并在六世班禅到雍和宫为乾隆帝说法和传授灌顶时担任翻译，他还主持译馆，蒙译《丹珠尔》，满译《甘珠尔》，编定《四体合璧清文》、《喇嘛神像集》等，对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对雍和宫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不少活佛是因他的推荐被召来北京并参与雍和宫的管理工作的。[①] 四世章嘉意希丹贝坚赞（公元1787—1846年），1794年奉召进京，1800年入藏学佛，1806年回京，1819年起任管理京师喇嘛班第扎萨克达喇嘛，1841年奉命入藏看视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1846年二世策墨林诺门罕被撤销西藏摄政职务时，道光帝下令将策墨林活佛在察哈尔的牧场寺产交章嘉活佛管理。五世章嘉洛桑图丹达吉（公元1847—1874年），1856年到京，1862年入藏学佛，1870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11月藏文版，陈庆英、马连龙据木刻版汉译本由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年回京任职。六世章嘉洛桑丹增坚赞（公元 1875—1888 年），1886 年到京，1888 年在多伦诺尔去世。七世章嘉洛桑贝丹丹贝准美（公元 1892—1958 年），1899 年进京，受封为扎萨克达喇嘛，赐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金印。1912 年因赞助共和，劝导内蒙各旗拥护民国，民国政府加封宏济光明大国师名号。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总统高等顾问。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蒙旗宣化使，1949 年去台湾，1958 年在台湾去世。

2. 色赤活佛（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

色赤活佛的本寺是青海省尖扎县的拉穆德钦寺。同时在塔尔寺也建有色赤噶尔哇，因此也被算作塔尔寺的活佛。一世色赤活佛洛桑丹贝尼玛（公元 1689—1762 年）是青海蒙古卫津台吉之子，其叔父三世察罕诺门罕（亦称夏茸尕布活佛、白佛）曾任七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是拉穆德钦寺的创建者。1691 年三世察罕诺门罕和二世章嘉认定他为曾任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的洛追嘉措（公元 1635—1688 年）转世[①]，因此这一活佛系统被称为色赤（意为金座，是对曾任甘丹赤巴职务的僧人的尊称，蒙古语称噶勒丹锡呼图），由于不少寺院有被称为色赤的活佛，为了区别，他们这一活佛转世系统又被称为拉穆色赤、拉穆德钦色赤。一世色赤 1722 年入藏，1726 年回拉穆德钦寺任法台。1734 年因章嘉·若必多吉想跟他学习教法，向雍正帝

---

① 洛追嘉措为青海贵德人，早年入藏学经，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1686 年第悉桑结嘉措按清朝命令以五世达赖的名义派他去喀尔喀调解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的冲突，他途经青海时约请二世章嘉一起前往，事毕进京朝觐康熙帝，受康熙帝奖赏。此事成为二世章嘉与清朝联系的开始。

奏请，雍正帝征召他进京担任章嘉·若必多吉的经师①，并封他为慧悟禅师，还敕建仁寿寺作为他的驻锡之所。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时，他也是主持者之一，他对雍和宫各项制度的建立及举行法事活动等，做出过重要贡献。二世色赤加央丹增赤列嘉措（公元1763—1772年）也是青海蒙古族人。三世色赤阿旺图丹旺秋贝丹赤列嘉措（公元1773—?），青海互助人，1784年进京朝觐，1787年回青海学经，1796年进京供职，奉旨署理京城喇嘛扎萨克达喇嘛印务，1809年奉旨进藏看视九世达赖喇嘛坐床，约在回京后不久圆寂。四世色赤阿旺图登丹贝尼玛，1826年被迎入塔尔寺，1829年进京供职，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1836年任管理京师喇嘛班第副扎萨克达喇嘛。五世色赤洛桑图登嘉措（公元1847—1902年），1858年进京朝觐，1861年返回拉穆德钦寺学经，1874年进京供职，奉旨管理京师二十八寺，补授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1879年告假回拉穆德钦寺，1882年出任塔尔寺法台，在塔尔寺长住。六世色赤根敦隆多尼玛（公元1904—1932年），1907年由西宁办事大臣在塔尔寺掣签认定，1912年代表青海蒙藏两族拥护共和，民国政府加封妙语安仁名号，1916年到北京供职，不久返回青海，1929年到南京代表青海蒙藏两族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西藏会议，于返回青海途中在宁夏磴口遭遇土匪被害。七世色赤隆多协珠丹贝坚赞（公元1933—1958年），解放后曾任全国青联委员、塔尔寺法台。1958年去世。八世色赤于1993年初在塔尔寺坐床。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藏文版，第144—146页。

3. 阿嘉呼图克图

阿嘉活佛是塔尔寺的寺主活佛。该活佛系统从乾隆晚期开始驻京，在雍和宫拥有佛仓，与雍和宫的关系非常密切。二世阿嘉喜饶桑布（公元 1642—1707 年）生于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被认定为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高僧楚臣迥乃的转世，后入塔尔寺学经，曾任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后改称为阿嘉。二世阿嘉 1689 年主持扩建塔尔寺大经堂，被尊为塔尔寺寺主。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公元 1708—1768 年），青海大通阿家庄人，1746 年奉命进京，受封“述道伯勒各图诺门罕”，留京供职，驻锡雍和宫，任副扎萨克达喇嘛，阿嘉仓是在雍和宫内最早建立的佛仓。四世阿嘉洛桑嘉央嘉措（公元 1768—1816 年），1786 年进京朝觐，1794 年任扎萨克达喇嘛，曾奉命去库伦哲布尊丹巴处传经数年，加封“述道贤能禅师”名号。五世阿嘉意希格桑克珠嘉措（公元 1817—1869 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27 年进京供职，1833 年奉旨入藏考察经典，赐“阿嘉呼图克图禅师”银印一方，1836 年回京复命，任扎萨克达喇嘛，1843 年奉旨去库伦致祭哲布尊丹巴，1847 年受命管理京城喇嘛印务处和唐古忒学（理藩院教习藏文的机构）事务。1856 年请假回青海，在西北回民反清起义时，他组织团练僧兵守卫塔尔寺，并协助西宁办事大臣解西宁之围，同治帝曾赐匾奖励。六世阿嘉洛桑丹贝旺秋索南嘉措（公元 1870—1909 年），1874 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88 年进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1894 年为慈禧太后祝寿诵经，钦赐黄蟒袍、黑地绣花蟒袍、朝车等，授扎萨克达喇嘛。七世阿嘉洛桑隆多久迈丹贝坚赞（公元 1910—1948 年），1916 年由民国政府蒙藏院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925 年到北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曾任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青海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职。八世阿嘉洛桑图丹久迈嘉措，1950年生于青海省海晏县哈日锦乡，蒙古族，1952年经十世班禅认定为七世阿嘉的转世。①

4. 敏珠尔呼图克图

敏珠尔活佛的本寺是青海大通县广惠寺。广惠寺的创建者为西藏高僧赞布·敦珠嘉措（公元1613—1668年），故又名赞布寺。一世敏珠尔赤列伦珠（公元1622—1699年）是青海蒙古族人，曾任拉萨哲蚌寺果莽扎仓堪布13年，1665年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敏珠尔诺门罕”称号，返回青海后继任广惠寺法台，成为寺主活佛，因此敏珠尔活佛又称赞布诺门罕、果莽呼图克图，雍和宫的果蟒呼图克图佛仓即是敏珠尔活佛的佛仓。二世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公元1700—1738年），1734年奉雍正帝之命进京供职，任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曾驻锡东黄寺。三世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公元1737—1785年），青海蒙古族人，1766年到多伦诺尔拜见章嘉·若必多吉，请章嘉活佛引荐，愿驻京效力，1767年获乾隆帝批准进京供职，1781年赐净照禅师名号及银印。四世敏珠尔坚白丹增尼玛（公元1789—1838年），青海蒙古族人，1799年进京，曾去西藏学经，回京后驻锡雍和宫，曾接触俄罗斯在京人员，用藏文写成包括世界各大洲情况的地理书《瞻部洲广论》，是中国最早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之一，书中介绍藏区地理部分受到许多学者重视，有英、俄、法文译注本。五世敏珠尔格桑图丹赤列嘉措（公元1839—1881年），六世敏珠尔俄科（公元1883—1904年）

---

① 历辈色赤和阿嘉活佛事迹见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塔尔寺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21页。

都曾到京，在雍和宫和多伦诺尔供职。七世敏珠尔多杰扎布（公元1905—1937年），青海蒙古和硕特西右前旗人，1909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913年民国政府加封“广慈弘教净照禅师”名号，1925年到京供职，1932年作为青海各大活佛代表到南京筹建青海七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担任处长。

5. 土观呼图克图

土观活佛是青海互助县佑宁寺主要活佛之一。二世土观洛桑却吉嘉措（公元1680—1736年）是二世章嘉的弟子，1715年奉命进京，受封为净修禅师，1720年奉旨到青海，伴送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军的护送下入藏。回京后奉命驻锡弘仁寺，他是章嘉·若必多吉幼年进京后的主要经师。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公元1737—1802年），1763年奉命进京供职，著有《宗派源流晶镜史》、《章嘉·若必多吉传》、《佑宁寺志》等，是著名的学者。四世土观洛桑图丹却吉坚赞（公元1803—1826年），1824年奉命进京供职。五世土观幼年夭逝。六世土观洛桑协珠旺秋（公元1839—1894年），1853年奉命进京供职，曾掌管喇嘛印务处事务。七世土观格桑丹曲尼玛（公元1898—1959年），1905年进京朝觐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命留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曾任雍和宫扎萨克喇嘛，1925年奉命到甘肃迎接九世班禅，陪同九世班禅进京。1948年任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6. 东科尔呼图克图

雍和宫的东科尔活佛的本寺是青海湟源县日月山乡的东科尔寺，四世东科尔1648年在固始汗的资助下建东科尔寺，成为该寺寺主，1665年奉命进京，受封为曼殊室利禅师。此后

六世东科尔加央丹增嘉措（公元1754—1798年）曾任色拉寺麦扎仓堪布，1787年进京，受封为呼图克图，命驻锡雍和宫任扎萨克达喇嘛。七世和八世东科尔都在少年时去世。九世东科尔图丹晋美嘉措1832年进京供职，1851年任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后又掌管京城喇嘛印务处。十世东科尔噶居嘉措1893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99年进京供职。十一世东科尔幼年去世。十二世东科尔洛桑绛曲丹增嘉措（公元1920—1983年），甘肃天祝人，解放后曾任塔尔寺法台，甘肃省佛协副会长、天祝县政协主席等，1957年去印度。

7. 萨木察呼图克图

萨木察活佛是甘肃拉卜楞寺的四大色赤活佛之一。一世萨木察南喀桑波洛桑贝丹（公元1690—1749年）是甘肃碌曲县萨木察地方（今作双岔）人，1746年任第五十五任甘丹赤巴。其转世称萨木察活佛。二世萨木察晋美南喀（公元1768—1821年），青海蒙古族人，1787年因二世嘉木样活佛举荐（当时章嘉·若必多吉新去世）奉命进京供职，乾隆帝命他为雍和宫堪布和扎萨克达喇嘛，嘉庆帝封他为呼图克图。因一、二两世萨木察活佛的名字中都有南喀两字，所以这一活佛系统又称南喀活佛，清代文书中写作那木喀呼图克图。又因晋美南喀为蒙古族人，并曾到内蒙古传法，所以一些书中称那木喀活佛为蒙古活佛，而不知即是拉卜楞寺的萨木察活佛。晋美南喀曾命其弟子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藏文写成《蒙古佛教史》，此书1894年即有德译本，1940年又出日译本，故晋美南喀的名字早为国外藏学界、蒙古学界熟知。三世萨木察洛桑赤列嘉措（公元1821—1832年），青海蒙古族人，幼年去世。四世萨木察晋美桑珠嘉措（公元1833—1879年），1852年奉命进京，任扎萨克

喇嘛，此时太平军北伐至北京附近，他率雍和宫喇嘛作法事祈神护佑清朝。不久太平军北伐失败，故咸丰帝对他多次奖赏，1856年升为扎萨克达喇嘛。五世萨木察格桑晋美南喀（公元1880—1899年），1897年奉命进京，不久去世。六世萨木察格桑隆日嘉措，事迹不详。①

8. 济隆呼图克图

济隆活佛是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活佛，是格鲁派中起源最早、变化最复杂的与清代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转世系统。据1814年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向驻藏大臣呈报的转世活佛底册②，达擦济隆活佛的第一世是宗喀巴大师晚年所收的弟子巴索·却吉坚赞（公元1402—1473年），他是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大师的克珠杰的弟弟，他从1463年至1473年任第六任甘丹赤巴，对格鲁派早期的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巴索·却吉坚赞去世后格鲁派即为他寻找转世灵童，建立起活佛转世系统。二世济隆拉扎布是一世帕巴拉活佛的侄子，从他开始，济隆活佛主要在昌都地区活动。五世济隆阿旺却吉旺秋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亲传弟子，五世达赖喇嘛将昌都南部的八宿寺及其属寺、属民拨给济隆活佛管辖，从此八宿寺（在今昌都八宿县）成为济隆活佛的本寺，济隆活佛成为管辖一片地区的兼有政教权力的大活佛。济隆活佛中最早到北京的是六世阿旺官却尼玛（公元1653—1705年），他年轻时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

① 关于萨木察呼图克图，详见扎扎《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世系述略》，载《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

② 关于济隆呼图克图，参阅喜饶尼玛《西藏地方摄政官职研究》，载《藏学研究》第七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房建昌、张国英：《西藏八宿县小史及寺院与活佛》，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4期。

到青海蒙古族中传教。1688年准噶尔部噶尔丹攻打喀尔喀部，清朝派使者到拉萨，让五世达赖喇嘛（当时已圆寂六年，第悉桑结嘉措匿不发丧）派人去噶尔丹处劝谕罢兵，第悉桑结嘉措即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派六世济隆前往。济隆活佛到噶尔丹军中以后，在噶尔丹与清军发生战争时，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并登上高岗观战，当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被清军击败后，济隆活佛出面阻滞清军乘胜追击，使清军失去歼灭噶尔丹军主力的战机。战后康熙帝为此多次责问第悉桑结嘉措，并责令把已从噶尔丹处返回西藏的六世济隆送来北京。第悉桑结嘉措一再拖延，反复恳求康熙帝保全济隆活佛法体（另一个曾同情帮助噶尔丹的伊拉古克三活佛被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剥黄处死），最后在1698年将济隆活佛送到北京。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1694年败亡和济隆活佛在格鲁派中的地位，没有处死他，只下令将济隆活佛监禁在正阳门东面的龙泉庵，不过后来有一些六世济隆在北京和多伦诺尔参加宗教活动的记载，说明康熙帝已进一步宽待他，六世济隆于1705年在北京去世。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公元1708—1758年）是最先与雍和宫有关的济隆活佛。雍和宫改寺时，乾隆帝除下令让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派来扎仓堪布和经师外，还考虑从西藏请一位地位较高的活佛来参加对雍和宫寺院的管理，章嘉·若必多吉遂举荐七世济隆，因此七世济隆约在1750年奉命进京，1753年受封为慧通禅师，并给敕印。济隆活佛在雍和宫建立佛仓，当在此时。1756年准噶尔部发生阿睦尔撒纳之乱，七世济隆奉旨前去伊犁，回京后加封扎萨克达喇嘛名号。八世济隆意希洛桑丹贝衮波（公元1760—1811年），1771年进京，乾隆帝赐给其强佐以扎萨克喇嘛名号，以掌管昌都八宿等处僧人百姓。八世济隆在京随章嘉·若必多吉学佛，并参与雍和宫寺院的管理。他于1781年进

藏，进哲蚌寺果莽扎仓学经，1789年在回京的路上接到圣旨，命他去拉萨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事务，并赏给毕力克图名号。1790年乾隆帝命策墨林阿旺楚臣再次进藏任摄政，召八世济隆回京。八世济隆行至青海阿拉坦鄂博时，西宁办事大臣传旨，因策墨林阿旺楚臣入藏不久在拉萨去世，命他不必来京请旨，即回拉萨接任摄政，1792年乾隆帝又命将没收的噶玛巴红帽活佛的羊八井寺交济隆活佛管理。1794年八世济隆在拉萨建一寺庙，请乾隆帝赐寺名为永安寺，即拉萨的功德林，从此济隆活佛又被称为功德林活佛。他任摄政多年，1811年在拉萨去世。九世济隆阿旺洛桑丹贝坚赞（公元1811—1854年），1844年奉旨担任十一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十世济隆阿旺贝丹却吉坚赞，在1875年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被任命为西藏摄政，同治帝赐给“通善禅师”名号，命他主持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务，1886年因病在拉萨去世。[①]

9. 诺门罕佛仓

雍和宫的佛仓中惟一难以判定其主人的即是所谓“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雍和宫的两处“诺门罕呼图克图佛仓”应当是同一活佛系统的佛仓，其佛仓先在北大门旁边的东板子门内，后移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不过在雍和宫的佛仓中只有这一佛仓没有指明其活佛的佛号，而以“诺门罕”这一笼统的称号代替。“诺门罕”是蒙古语，是藏语“曲杰”（经教之主）的意译，清代通常用来指精通教法的高僧或比呼图克图地位低的转世活佛，所以有些被称为曲杰的人并不

① 参阅洛桑群觉：《策墨林继任摄政王之经过》，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张庆有《琦善与策墨林诺门罕》，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

一定即是转世活佛。从这一座佛仓的主人在宗教地位上比前述八位活佛稍低，但是又与雍和宫有密切关系，受到清朝皇帝在雍和宫赐给佛仓的礼遇等特点看，或者从这位活佛本来是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地位重要的活佛，后来因某种原因而被贬斥以至雍和宫内避免拉起其佛号来考虑，我们认为这位活佛很可能即是从雍和宫发迹的与济隆活佛一样列为有资格出任西藏摄政的“四大林活佛”之一的策墨林活佛，而二世策墨林在道光年间被放逐，不准转世，所以雍和宫内的策墨林佛仓后来被含混地称为“诺门罕佛仓”。一世策墨林名阿旺楚臣，1721 年生于甘南卓尼的察多尔地方，幼年时在察多尔寺出家，青年时步行入藏学经，入色拉寺麦扎仓，因博学多才，刻苦努力，从普通僧人升为翁则、堪布，后来又入上密院学密宗，渐有声名。1766 年，章嘉·若必多吉想学习密宗行部的大日如来灌顶法，听说阿旺楚臣精通这种教法，就奏请乾隆帝把他召到北京，为章嘉·若必多吉传授此法。阿旺楚臣因此进入雍和宫，逐渐升任达喇嘛和堪布之职，受到乾隆皇帝赏识。1777 年西藏摄政第穆活佛圆寂，乾隆帝决定从在京的喇嘛中选派一名入藏接任，章嘉·若必多吉推荐三世敏珠尔，乾隆可能考虑三世敏珠尔还较年轻（刚 40 岁），又是蒙古族出身，没有同意。章嘉·若必多吉又表示自己尽管年已 60，愿意进藏任职，乾隆帝也没有同意，而是决定派阿旺楚臣前往，执掌前任摄政的“掌办西藏事务广衍黄法诺门罕之印”，并赐给他“阐明圣教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也即是在任命他为西藏摄政的同时封他为诺门罕。1777 年 8 月他抵拉萨就任，并兼任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1778 年阿旺楚臣又兼任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大约因为他是从上密院出任甘丹赤巴的，所以在藏文史料中他又被称为夏孜诺门罕。1783 年他在色拉寺附近建一小寺院，为乾隆皇

帝祈寿，请乾隆皇帝赐寺名为“寿宁寺”，藏语称为 tshe smon gling，译音为“策墨林”。由于担任甘丹赤巴，他具有了转世活佛的资格，由他开始的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策墨林活佛，还有的因为他出家于察多尔寺，称他为察多尔诺门罕或察多尔活佛。阿旺楚臣在藏办理六世班禅进京入觐等事务，深受乾隆帝赞许，西藏各方面也对他心悦诚服。1786 年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乾隆帝命他回京接管章嘉·若必多吉的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入雍和宫代行章嘉·若必多吉职责，雍和宫中建立策墨林诺门罕的佛仓应即是在此时。1788 年廓尔喀与西藏发生纠纷，拉萨僧俗官员等办事不力，乾隆帝不能放心，于是在 1790 年 8 月派遣阿旺楚臣再次入藏担任西藏摄政，此时乾隆帝的上谕中称他为“噶勒丹锡呼图禅师”或“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噶勒丹锡呼图”即甘丹赤巴，这是他担任甘丹赤巴后获得的称号，“萨玛第”为梵语，亦译为“三摩地”，意为“禅定”，“巴克什”为蒙语，意为“上师”，因此“萨玛第巴克什”即是禅师之意，可见当时策墨林阿旺楚臣已被封为禅师。有的文章把“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与色赤活佛的称号“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二者是不同的，清朝的公文中强调策墨林活佛的称号是“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正说明清朝并不认为策墨林阿旺楚臣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这次进藏后约半年，即于 1791 年在拉萨去世。

二世策墨林阿旺坚白楚臣嘉措（公元 1792—1876 年），也是甘南卓尼人，年轻时入色拉寺麦扎仓学经，获格西学位。1819 年奉嘉庆帝之命接替去世的第穆活佛办理布达拉“商上”事务，也即是继任摄政。他随即主持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并兼任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道光帝于 1822 年赐给他们“衍宗禅师”银印。1825 年查出策墨林活佛并未封过呼图克

图，下令不准其使用呼图克图字样。1826 年驻藏大臣松廷请求赏给摄政策墨林"呼图克图"虚衔，道光帝未允准。1829 年驻藏大臣惠显又奏请给策墨林活佛定名为"札多尔（即察多尔）呼图克图"，又被道光帝以"呼图克图名号向无奏请赏加这事"为由驳回。看来当时二世策墨林虽然出任西藏摄政和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且已有"衍宗禅师"封号，但道光帝并不认为他是呼图克图。1837 年二世策墨林又兼任第七十三任甘丹赤巴，1837 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二世策墨林又参与寻访认定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事务。1842 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清朝派四世章嘉入藏看视，颁发金册，大约是四世章嘉在拉萨时，二世策墨林与四世章嘉、七世班禅发生矛盾，加上新任驻藏大臣琦善也对二世策墨林不满，所以四世章嘉回京后，1844 年琦善、七世班禅等参奏二世策墨林，道光帝命琦善、七世班禅率第穆、济隆、热振等活佛审理此案，先将二世策墨林的摄政印信交七世班禅掌管，并查封其财产，后经道光帝批准将二世策墨林免去摄政等职，革去萨玛第巴克什等名号，发往黑龙江安置。但是二世策墨林在藏任摄政多年，徒众亲朋众多，加以琦善所参条条罪过也不完全落实，所以策墨林一派并不心服，还在审理过程中就有色拉寺麦扎仓堪布和僧众等将二世策墨林抢出的事件，只是二世策墨林次日自行投回，才未发生大乱，但是定案后二世策墨林等又反控琦善和四世章嘉等，引发一系列矛盾，所以最后二世策墨林虽被撤职和革去名号、不准转世，但是也没有去黑龙江流放。1850 年二世策墨林被准许返回卓尼居住，直到 1874 年去世。由于这些原因，后来清朝的公文中提到他时都称为"被革诺门罕"。据《清实录》记载，策墨林在察哈尔的牧场寺产交四世章嘉管理，但策墨林在雍和宫的房产如何处理未见记载，很可能是由于此案始终未能全部

完结，钦赐给策墨林活佛的雍和宫中的策墨林佛仓就以诺门罕佛仓这一含混的名义保留下来，以致其历史确实很少有人知道了。另外是不是二世策墨林被解来北京时还在该佛仓住过，因此而被称为诺门罕佛仓，这还需要发掘资料进一步探讨。

策墨林的转世似乎也并未“二世为止”，后来三世策墨林也在卓尼出生，而且驻藏大臣松桂 1877 年上奏请求准许接三世策墨林到西藏学经，当时清廷没有同意。1879 年，由于也是出身于甘南卓尼的僧人但在新疆为清朝带兵打仗，战功卓著而被清廷封为呼图克图的棍噶扎拉参和新疆土尔扈特部王公的请求，清朝同意三世策墨林出家和赴藏学习经典，但不得称为转世呼毕勒罕。不管怎样，策墨林活佛还是延续下来了。1910 年至 1912 年又有策墨林·罗桑丹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为摄政，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期间代理政务，这与一世和二世策墨林担任的摄政职务当然完全不同。

总之，雍和宫的佛仓涉及清代藏传佛教和蒙藏地区的许多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如果能深入发掘这些与雍和宫有密切关系的活佛转世系统的资料，如这些活佛的传记和文集等，相信会对雍和宫的研究提供很多具体而生动的历史资料。

原载《中国西藏》1994 年增刊

雍和宫杂论

一、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

自清朝乾隆年间起，雍和宫就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一方面是清朝皇室直接控制和管理、直接参加清朝宫廷的日常宗教活动的皇家寺院，另一方面它又是完全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组织制度建立的一所正规的格鲁派寺院。由于这一特点，雍和宫自改寺之日起，就成为清朝皇室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沟通关系的一座重要桥梁，曾经对清朝和民国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关系和蒙藏满汉等民族的宗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雍和宫一直作为皇家禁地，使外界对其内部情形了解甚少，因此给学术界留下不少至今仍需进行探讨的课题。

尽管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是乾隆初年的一件大事，但是在《清实录》等汉文史料中却没有关于雍和宫建寺的直接记载。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写并经乾隆皇帝亲自审定的《钦

定日下旧闻考》的卷二十是专门讲雍和宫的，也没有明说雍和宫是从哪一年开始改建为寺院，只是指明雍和宫的戒坛改建的时间："法轮殿左右山殿，西为戒坛，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命照热河广安寺戒坛之式改建。方坛三层，每层各围以石栏。用列佛像。东为药师坛。是年并改建重楼上下各五楹，与戒坛相配。四十五年八月落成。"这里显然是指乾隆帝为六世班禅1780年进京朝觐而在雍和宫增建戒坛一事。同卷还收有《乾隆九年御制谒雍和宫作》一诗。其中有"翠华来旧地，宝相写新莲。兴庆当年邸，无生曩日禅"等句，隐约说明在乾隆九年雍和宫已建有佛像等。①

汉文史料中能据以判定雍和宫改建寺院的年代的记载是至今仍存于雍和宫的乾隆帝《御制雍和宫碑》，碑文中说："洎山陵礼成，于此敬安神御，岁时展礼，至于今十稔。……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是用写境祇林，庄严法相，香幢宝网，夕呗晨钟，选高行梵僧居焉。"这就点明雍和宫是在雍正帝去世十周年时（公元1744年），改建为有藏传佛教僧人住寺诵经学佛的寺院。

藏文史料中对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有更加明确的记载，主要见于主持雍和宫改建寺院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的两种传记。一种是章嘉·若必多吉的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上师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章嘉·若必多吉的显宗名字）传——具善教法严饰》（成书于公元1798年），该书说："阳木鼠年（甲子，公元1744年），大皇帝向章嘉活佛详细询问：'佛教在雪域是如何弘传的？出现过哪些佛教大师？讲论佛法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263—269页。

的寺院是如何建立的?'章嘉活佛都一一做了陈述。皇帝谕示:'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院，若兴建闻修显密教诫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的传习大有利益。过去怙主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大师等在此方（指汉地和北京）建有讲习佛法的寺院，而今徒余其名。皇祖先帝在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宗的扎仓，但在京城未建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皇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全部显密知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复兴。'章嘉活佛说：'皇帝陛下发心与众不同，若下令建立寺院，使佛教在此方如日普照，小僧唯有竭尽全力，充当仆役。'大皇帝十分欢喜，不久皇帝的御库敞开供施大门，拨出大量经费，把先帝（雍正帝）受封为亲王时居住过的王府改建为一座寺院，外筑一道宽大的围墙，内部建有大经堂，右有佛堂、左有依怙殿，还有受戒殿、白伞盖佛殿、药师殿、印度佛殿、甘丹佛殿、法轮佛殿、天王殿、门楼、鼓楼、钟楼，以及高耸的牌坊，建筑宏大壮丽。各扎仓有经堂、净厨、上师府邸、僧舍等大小房屋，一应俱全。房舍众多，规模宏大，材料和设计都十分殊胜，如第二座祇陀林寺（古印度给孤独长者和祇陀太子献给释迦牟尼的花园，在舍卫城南，释迦牟尼在此居住说法 25 年）一般。各佛殿内供有无数的经、像、塔三所依处和各种各样的供品，使人目不暇接。经堂和喇嘛僧舍中连手巾等日用品都由府库配备，无不齐全。皇帝赐寺名为'噶丹敬恰林'(dgav ldan byin chags gling，意为兜率壮丽洲)。章嘉活佛和赤钦活佛（指青海的拉莫色赤活佛洛桑丹贝尼玛）为首的僧众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迎神降福。皇

帝作为施主赐给了大量赏赐物品。”[1]

按这一记载，雍和宫改建寺院从提出设想到设计、施工、开光落成都是在1744年。紧接着该书又说：“同年，又集中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的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创建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学习各种知识的杂明扎仓和医宗扎仓等四大经院。各佛殿的供佛基金和僧人们的给养由府库按月拨发。遵照‘担任各扎仓喇嘛和教师的格西须由西藏派遣’的谕令，显宗扎仓的喇嘛由哲蚌寺的哈东热绛巴·阿旺群培担任，密宗扎仓的喇嘛由日喀则色派密院的上师官却丹达担任，杂明扎仓的喇嘛由摩觉夏仲担任，医宗扎仓的喇嘛由彭措扎林担任，聪慧僧众的教师则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十八名格西担任，他们各自与随从一起陆续到京就任。寺院建成后，大皇帝经常前来视察，让从西藏来的格西们给他讲经说法，非常高兴地给上师们分别赏赐绸缎等物品，给僧人们赏赐僧帽袈裟、银两等大量用品。给章嘉国师不仅赐给了建成寺院的奖赏，还颁给利益久暂的敕书。达赖喇嘛为庆祝在北京建成了佛教大寺院，献上按五世达赖喇嘛的吩咐建造的一套题名为如意宝树的佛本生故事卷轴画，并在首幅画像背面题写了殊胜祝愿词，此外还有经像塔等许多贡品。皇帝也祝愿说：‘愿达赖喇嘛给我的佛像饶益佛教与众生！’并从中取出一幅画像，看见上面写有题词，高兴极了，便在新建扎仓的经堂展出，当时挤满了围观者，大家都说这是好的缘起加以赞

---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上师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亦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220页。本书有陈庆英、马连龙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颂。"[①] 这又表明，征集僧人建立扎仓和命西藏派遣格西来雍和宫担任各扎仓的堪布和教师等，也是在1744年完成的。

另一部章嘉·若必多吉的藏文传记是他的弟弟三世却藏活佛阿旺图丹旺秋在章嘉·若必多吉去世的次年即公元1787年写成的《金刚持章嘉·若必多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使具信莲花开放之阳光》，该书说："水猪年（癸亥，公元1743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文殊大皇帝赐给这位上师（指章嘉·若必多吉）以从前从未赐给过任何人的有金龙图案的黄缎伞盖。在该年冬天，皇帝派内大臣（掌管内务府的大臣）公爷和巴剌阿里哈安班、讷阿里合安班等到这位上师处传达皇帝的殊胜旨意，说：'京城北京地面广大，父皇先祖之时都大力弘扬佛法，但是没有广传闻习所有内外学处的例规。现今，朕为了弘扬佛法尤其是黄帽派的教法，圆满实现先帝列祖的心愿，为了增益众生的利乐，供奉三宝和上师，故决定在父皇受封为王时所住的寝宫处，兴建佛殿、经堂、僧舍等，建立一座大寺院，并新建讲习五明知识的扎仓。'当时两位上师（指章嘉和色赤活佛）同声回答：'至尊文殊菩萨为利乐宗喀巴大师教法及所有众生，在金銮宝座上转动大力法轮，又生如此愿心，我等心中喜悦，生起无量信仰。以前西藏佛法未弘传时，曾从印度迎请许多贤明大德及成就者，建立佛法的例规，使得佛教极为兴盛，至今依然。人主大皇帝陛下若从西藏召请贤哲，建立讲习显密学处的善规，将会因大皇帝的与众不同的发心的愿力，使佛法在京城建立弘传的根基。'接受上师的意见，向西藏的三世诸佛的共相达赖喇嘛发出了命其派来各扎仓讲习佛法的上师、格贵、

① 《上师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第220—221页。

领诵师等人的诏命。”① 按这一记载，乾隆帝决定把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以及为此征询章嘉活佛的意见、命七世达赖喇嘛给新建寺院各扎仓派来堪布、经师等，实际上是在1743年。也就是说，雍和宫建寺的计划和准备，从1743年冬天即已开始。该书又说：“此后，阳木鼠年（甲子，公元1744年）开始兴建新寺院后不久，即建成了佛殿，随即打开供云的巨大门扇（即投入大量资财），设立新建大寺院的作坊，不久即完成。修建了围墙坚固、周围宽广的大经堂，大经堂的右面是佛堂，左面是依怙殿，此外还有传授比丘戒的传戒堂、白伞盖佛殿、药师佛殿、供奉印度贤哲大德影像的神殿，供奉宗喀巴师徒影像的神殿，曲科热杰林（法轮广被洲）的佛殿（即法轮殿）等许多有身语意三所依处的殿堂，还有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声明诗律扎仓、医学扎仓等四个扎仓的经堂，供各个僧人居住的大小不等的僧舍等。寺院殿堂众多、规模宏大、设计和工艺巧妙，犹如将祇陀林寺搬到了中国大地上一般。由赤钦活佛（色赤活佛）担任金刚阿阇黎，和京城中的兼通显密教法的僧众一起，为新建成的佛殿、佛像、佛塔等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进行盛大的智慧加持。皇帝为开光仪式奉献了大量物品，作为供养。从西藏来的喇嘛、格西等到达京城后，在朝觐皇帝时，皇帝高兴地让显宗扎仓的堪布阿旺群培和密宗扎仓的堪布官却丹达二人在驾前举行了辩论。”由此可见，该书也认为雍和宫改建寺院的工程是在1744年开工的，而且很快完成了佛殿、佛像的建造工程。两种章嘉·若必多吉的传记都提到，木牛年（公元1745年）或火虎年（公元1746年）二月，

① 却藏·阿旺图丹旺秋：《章嘉·若必多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藏文木刻本，47页上至48页上。

按乾隆皇帝的旨意在新建的雍和宫寺院举行了祈愿法会，创立了像拉萨祈愿法会（传大召）上那样的授予格西学位的规矩。乾隆皇帝驾临会场，听章嘉活佛和色赤活佛（亦称噶勒丹锡勒图活佛）讲经说法，乾隆皇帝给僧众赏赐了大量物品。当年三月三日，又举行了显宗扎仓三百名僧人、密宗扎仓一百名僧人、医学扎仓和声明诗律扎仓各五十名僧人参加的法会，乾隆皇帝下令法会从召集的方式、讲说听闻佛法的制度到日常的规章都要符合清净教法的规则，乾隆皇帝还一再高兴地前来察看。① 从却藏活佛和土观活佛的角度看，一座拥有众多殿堂僧舍、有佛法僧三宝、有讲经学法的制度和僧伽组织的正规的藏传佛教大寺院，至此才算圆满建成。

以上关于雍和宫改建寺院的年代的记载，还得到章嘉·若必多吉本人的著作的证实，他在《七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当年（木鼠年，公元1744年）中，大皇帝在其父皇原来的住所新建大经堂等，聚集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等聪颖的学经僧人五百名，成立显宗、密宗、杂明、医学四个扎仓，大皇帝命令从西藏派遣各扎仓的喇嘛和经师，圣旨经驿递送到后，遂派哈东热绛巴阿旺群培为显宗扎仓的喇嘛，色居上师官却丹达为密宗扎仓的喇嘛，摩觉夏仲为杂明扎仓的喇嘛，彭措扎林为医学扎仓的喇嘛，并从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处选派十八名格西前往协助。达赖喇嘛为彼等送行，并谆谆教诲说：'汝等俱是为佛法出家并很好地闻思了经论的格西，一般地说如有人在佛法尚未广弘的地方连日奉行佛教事业，即有非同一般的

① 《章嘉·若必多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50页上至50页下；《上师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传》，第222—223页。前者记为木牛年（公元1745年），后者记为火虎年（公元1747年）。

能耐和功德，特别是汉地历代的皇帝们都是佛教的大施主，现今皇上之父祖之时起就与遍知一切五世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结为施主与福田关系，成为格鲁派的大施主，尤其是当今的文殊大皇帝对于我等具有大恩德，我们本派的两位化身活佛（指章嘉和色赤活佛）亦驻锡在彼方，你等关于各方面如何取舍之事可以请问他们，你们务必与大皇帝的心愿相符合，做讲说闻思修持佛法的典范，不存寺院之间的偏见，以正直之心尽力侍奉，为对各方俱有利益之重大事业勤奋努力！’奉大皇帝之命，还向北京送去五百顶尖顶僧帽。”①

综合以上记载，我们认为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是乾隆皇帝在1743年冬天提出和决定的。由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勒图两位活佛负责，并得到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的支持和帮助，从1744年开工兴建，到1744年底即完成大部分工程，并为部分殿堂佛像举行开光，1745年2月和1746年2月在雍和宫举行祈愿法会，佛学知识的讲授学习和寺院的法事活动都已开展起来，可以说到1746年2月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工作圆满完成。魏开肇在《雍和宫漫录》一书中说："到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决定将雍和宫‘神御殿’的全部正院改为喇嘛庙，仍名雍和宫。其东部花园改为‘东书院行宫’，简称‘东书院’或‘太和斋’，俗名‘东花园’。这‘东书院行宫’仍归清宫管理，作为历代清帝到雍和宫礼佛之后的休息处所。雍和宫正院改为喇嘛庙的工程，由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开工，到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八月落成。寺庙规划仍以旧雍和宫为轮廓，而

① 章嘉·若必多吉：《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601—603页。

门窗殿饰，则参考唐古忒（西藏）式。庙宇落成后，派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济·耶喜忒皮嘞钠曼伯拉森波担任主持”。[①] 妙舟《蒙藏佛教史》说雍和宫门前“东西各有八角碑亭一座，内储乾隆九年冬十月碑”[②]。都与藏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

二、雍和宫四个扎仓及其名称

改建为佛教寺院的雍和宫，是以正规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为标准来规划和组织的，因此雍和宫的组织与格鲁派的大寺院一样，寺内又分若干个扎仓。从上面所引的章嘉·若必多吉的传记中的记载，可以说明雍和宫的四个扎仓是建寺时同时组织规划，同时成立的。从建立之初开始，各扎仓的学经僧人就是从内蒙古、外蒙古等地选送来的，扎仓的堪布和讲经师、格贵、翁则等执事僧人则是西藏选派来京的。还在建寺之初，四个扎仓的规模就不相同，显宗扎仓有三百人，密宗扎仓有一百人，而医学扎仓和声明诗律扎仓各有五十人。从各扎仓人数比例及将医学历算单列一个扎仓看，雍和宫的四个扎仓合为一寺的组织形式与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相同，而与拉萨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有所不同。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雍和宫改建寺院时仿照塔尔寺、拉卜楞寺设置四个扎仓？经查对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的资料，我们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不是雍和宫仿照塔尔寺、拉卜楞寺设置四个扎仓，倒很可能是拉卜楞寺、塔尔寺仿照雍和宫设

① 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② 妙舟：《蒙藏佛教史》，第七编寺院第二节北平之寺院，雍和宫条。

置了自己的医学扎仓和丁科尔扎仓（时轮学院）。根据塔尔寺志和拉卜楞寺志中的记载，在1744年时，这两寺都没有医学扎仓和丁科尔扎仓。塔尔寺的医学扎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1711年铁兔年二世却藏·洛桑丹贝坚赞从居巴扎仓中分出部分僧人，任命西纳夏茸为堪布，成立了阿巴扎仓（学习诵咒作法的扎仓），并修了经堂。1724年却藏·洛桑丹贝坚赞在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中被清军处死，所以到1729年西宁办事大臣下令把却藏·洛桑丹贝坚赞创建的塔尔寺阿巴扎仓改为'安木齐扎仓'，学习藏医学，但是当时只有老幼十来名僧人，很不正规。到乾隆二十二年（火牛年，公元1757年），章嘉·若必多吉的弟弟三世却藏·阿旺图丹旺秋才在安木齐扎仓（安木齐为蒙古语，意为医生）的基础上组建曼巴扎仓，任命卓仓班智达为堪布，因此塔尔寺志称卓仓班智达洛桑丹贝坚赞为曼巴扎仓的第一任堪布，认为曼巴扎仓创建于1757年。塔尔寺的时轮学院（丁科尔扎仓）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由却西·阿旺协珠丹贝尼玛创建的。① 而《拉卜楞寺志》记载，拉卜楞寺的曼巴扎仓和丁科尔扎仓都是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从1769年到1772年游历内蒙古、北京、五台山等地回到拉卜楞后在十来年中创建的，因此拉卜楞寺曼巴扎仓和丁科尔扎仓的第一任堪布都是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②

据《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传》记载，1770年2月到4月，二世嘉木样活佛在北京停留两个多月，他住在章嘉·若必

① 色多·罗桑崔臣嘉措：《塔尔寺志》，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307页，第346—347页。

② 阿芒班智达：《拉卜楞寺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22页、541页。

多吉的住所嵩祝寺附近的土默特贝子的宅院内。章嘉·若必多吉在嵩祝寺内为他和敏珠尔诺门罕阿旺赤列嘉措、察多尔诺门罕阿旺楚臣（即一世策墨林活佛）等百余人讲授关于密宗要义的《五次第明灯》，历时十五天。四月初一，乾隆皇帝到嵩祝寺朝礼旃檀觉卧佛像，二世嘉木样还混在章嘉·若必多吉的侍从僧人队列中，从远处目睹了皇帝的“金颜”（因二世嘉木样到内蒙古、北京前没有奏报皇帝，所以不愿正式朝觐皇帝）。敏珠尔诺门罕、察多尔诺门罕还邀请二世嘉木样到他们的住所，设宴招待他并和他讨论佛法。察多尔诺门罕即后来的西藏摄政活佛策墨林一世，当时任雍和宫的堪布，敏珠尔诺门罕在雍和宫也有自己的佛仓，因此二世嘉木样活佛正是在此时亲身到过雍和宫，对于雍和宫的情况有实际的认识，所以我们说拉卜楞寺的曼巴扎仓和丁科尔扎仓很可能是二世嘉木样活佛仿照雍和宫的曼巴扎仓和杂明扎仓的形式而创建的。①

关于雍和宫四个扎仓的组织情况、课程设置等，魏开肇的《雍和宫漫录》中已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四个扎仓的名称，是用汉字记的蒙古人读藏语的音，其用字已基本固定，亦见于雍和宫内为游客展示介绍的木牌上。将这四个用汉字记音的扎仓的名称和甘青、西藏寺院的扎仓的名称对比，可以还原出它的藏文原文来。

---

① 请参阅拙文:《二世嘉木样·官却晋美旺波东行评介》，载《安多研究》1993年创刊号。有的学者认为拉卜楞寺的时轮学院是二世嘉木样在1763年创建的，是仿照扎什伦布寺的时轮学院创建的，并说最初时轮学院中有一个班专门学习医学，由七世达赖喇嘛和藏王颇罗鼐委派给河南亲王的藏医传授医理，到1782年二世嘉木样把医学班分出来仿照拉萨药王山医药学校的形式在拉卜楞寺创建曼巴扎仓。但是扎什伦布寺并没有设立过时轮学院，所以这一问题还需继续探讨。(见丹曲《拉卜楞寺医药学院概述》，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擦尼特扎桑”，即是藏文 mtshan nyid grwa tshang，《藏汉大辞典》解释为“法相院，佛教徒辩论显教佛学的经院”。通常亦译为“显宗扎仓”、“参尼扎仓”等。《雍和宫漫录》说擦尼特扎桑的经堂“就是雍和宫正殿前面的十四间西配殿。‘擦尼特’三个字译成汉文，就是‘显乘’、‘显教’、‘显宗’、‘显派’的‘显’字。所以，这‘擦尼特扎桑’又叫‘显乘殿’，是专门学习显乘经典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最高首领，也是西藏籍的‘教习堪布喇嘛’，教员五名（‘教习苏拉喇嘛’二名、‘额外教习苏拉喇嘛’三名），管理员一名，名叫‘格斯贵喇嘛’，他除去管理庶务和杂务外，还兼着讲经、教授经典和督察学生执行戒律。学生二十名，也叫‘学艺喇嘛’，是由内蒙和外蒙各旗选送来京的官费生。在清朝中叶，学生的数额不只二十名，全庙喇嘛中几乎近一百人参加学习。清朝末年，学员人数逐渐减少。这个学殿对学生的要求，不只是能够认识藏文和能够熟练地吟诵经典就算了事，而是要求学生既能念经，又能讲经，并且还能主动地阐发经义。这所学校不只是单纯学习显乘经典的学校，还是深入研究佛教显乘哲学的研究院。因此，如果藏文、藏经不熟练，没有刻苦研究的精神，就得中途退学。这并不是经义深奥难学，而是因为按照这个学殿的要求，学制分为十三班，每班修业三年，共需修业 39 年，方能期满毕业。假若由 16 岁入学，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成了 56 岁的老喇嘛了。”① 这一段话与塔尔寺、拉卜楞寺等格鲁派的大寺院相比较，大部分相类似，也容易理解，但是说显宗扎仓规定修业期为 39 年，则显得过长，与该书所说密宗扎仓修业期 15 年、曼巴扎仓修业期 12 年、时轮扎仓修业期 15 年也显得不

① 《雍和宫漫录》，第 141—142 页。

相称。塔尔寺的显宗扎仓也是分十三个班级，一般情况下修业期为15年。下面我们将塔尔寺和雍和宫显宗扎仓的班级和课程、年限做一对比[①]：

塔尔寺显宗扎仓班级	雍和宫显宗扎仓班级
1. 卡多(kha dog)	1. 辨色学级
2. 堆仲(bsdus vbring)	2. 集中庸学级
3. 堆钦(bsdus chen)	3. 具境学级
4. 达柔(rtags rigs)	4. 慧明学级
5. 洛柔(blo rigs)	5. 七十义学级
6. 央萨(gzhung gsar)	6. 下新契学级
7. 杰宗噶当布(rje btsun skabs dang po)	7. 上新契学级
8. 果莽噶当布(sgo mang skabs dang po)	8. 初分学级
9. 噶玉哇(skabs bzhi ba)	9. 四分学级
10. 吾玛(dbu ma)	10. 圆满六度学级和新中观学级
11. 佐(mdzod)	11. 旧中观学级
12. 都哇(vdul ba)	12. 下耆士学级和上耆士学级
13. 噶仁巴(bkav rams pa)	13. 学习《法堂五部》的文义

塔尔寺的卡多、堆仲、堆钦、达柔、洛柔五个班级又合称为五个"堆穷增扎"，是主学因明学的五个班级。而雍和宫主学因明学的是辨色、集中庸、具境、慧明等四个班级。塔尔寺的第六班级央萨班级选用一世嘉木样活佛的《八种共道成就事师七十事善言不败上师语》作为学习《现观庄严论》的主要参

① 塔尔寺资料依据色多·罗桑崔臣嘉措：《塔尔寺志》，第235—236页，雍和宫资料据魏开肇《雍和宫漫录》，第142—143页。

考书，所以雍和宫的七十义学级即相当于塔尔寺的央萨班级。塔尔寺的杰宗噶当布、果莽噶当布班级的“噶当布”即是初分之意。所以这两个班级相当于雍和宫的第八班初分学级。塔尔寺的“噶玉哇”即相当于雍和宫的“四分学级”。塔尔寺的“吾玛”（即中观）相当于雍和宫第十和十一两个班级中的新旧中观学级。塔尔寺的“佐”（俱舍论）和“都哇”两个班级相当于雍和宫的第十二班级“下耆士学级和上耆士学级”。总之塔尔寺和雍和宫在学习内容和先后顺序上是一致的，但是学习年限和班级则有所不同，其情形如下列所示：

学习内容	塔尔寺	雍和宫
因明学初阶	五个班级每级一年 共计五年	四个班级每级三年 共计十二年
般若（六度）	四个班级每级一年 共计四年	五个半班级每级三年 共计十六年半
中观	一个班级学习两年	一个半班级学习四年半
俱舍	一个班级学习两年	半个班级学习一年半
戒律	一个班级学习一年	半个班级学习一年半
菩提道次第论	一个班级学习一年	一个班级学习三年

从这一对比可以看出，雍和宫显宗扎仓在中观、俱舍、戒律方面比塔尔寺显宗扎仓学习年限要稍长一些，而因明和般若学习年限则要长得多。如果说在学习因明学初阶时因雍和宫的僧人大多来自内外蒙古、需要从头学习藏语藏文，所以比塔尔寺僧人要多用一倍多时间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般若一门雍和宫的学习年限是塔尔寺的四倍就显得有些难以想象。因此我们认为《雍和宫漫录》所说的“学制分为十三班每班修业三年”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可能最长的班是三年，其他班有一年或两年的，正如塔尔寺显宗扎仓的班有一年和两年的，年限长短

不等。究竟如何，需要见到雍和宫的直接记载才好判定。

雍和宫的密宗学院汉字记音为“巨特巴扎桑”，显然是藏文 rgyud pa grwa tshang 的对音。《雍和宫漫录》说巨特巴扎桑的经堂“就是雍和宫正殿前面的十四间东配殿。‘巨特巴’就是汉文中的‘密乘’、‘密教’、‘密派’的‘密’字，所以这‘巨特巴扎桑’又叫‘密乘殿’，是专门学习密乘经典的学校”。实际上“巨特巴”（rgyud pa）的本意为“续”，佛教密宗的经咒称为“续部”，所以“巨特巴”又成为密宗的代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中，学习密宗的扎仓有两类，一类是居巴（巨特巴）扎仓，其僧人大多是在显宗扎仓修业期满、获得了格西等学位后，按宗喀巴大师的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进入密宗扎仓学习密法的，这些人经过考试后可以获得密宗的“阿仁巴”学位；还有一类称为阿巴扎仓，其僧人不经显宗扎仓直接学习密法，主要是学习本尊和护法的修供仪轨、建立坛城、诵经念咒、降神驱魔等；他们学成后主要充当咒师和法师等。拉萨的上下密院、塔尔寺、拉卜楞寺的居巴扎仓属于前一类，哲蚌寺、扎什伦布寺有过的阿巴扎仓属于后一类。雍和宫的“巨特巴扎桑”，据《雍和宫漫录》说：“（巨特巴扎桑）学制分为五班，每班修业三年。第一班初入学时，首先学习藏文字母和拼音法。之后，依次学习皈依经、兜率师岳噶经、白伞盖经、心经、绿相佛母经、白相佛母经、普贤愿文、弥勒愿文、极乐愿文、秘密佛根本经、秘密金刚经、上乐金刚经、威德金刚经等经典。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升入第二班，主要课程是学念各种经典的声音和音谱。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升入第三班，在这第三班不是学念经典，而是学习做工，即学习制造佛像面前所陈列的供器。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升入第四班，主要课程是学习秘密威德上乐金刚坛城。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及

格，升入第五班，主要任务是学习灌顶经。三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后，则可参加‘阿林巴’名号的考试”。这表明雍和宫的“巨特巴扎桑”的僧人并不是学完显宗再来学习密宗的，学习的主要课程也是诵咒、供养仪轨、制作坛城等，因此类似于格鲁派大寺院中的阿巴扎仓。

雍和宫的“曼巴扎桑”的经堂为永佑殿的东配殿，“曼巴扎桑”即是藏文的 sman pa grwa tshang，意为医学扎仓。雍和宫曼巴扎桑主要学习药师经和藏医的主要理论著作《四部医典》，与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的曼巴扎仓类似。

雍和宫的另一个扎仓叫“扎宁阿扎桑”，《雍和宫漫录》说它的经堂“就是雍和宫永佑殿前的西配殿。‘扎宁阿’译成汉语就是历数或历法。‘扎宁阿扎桑’就是专门学习历法的学校，所以又叫‘数学殿’。……‘扎宁阿扎桑”的课程设置如下：第一班学艺喇嘛初入学时，先学习藏文的三十二个字母和拼音法（实际上藏文只有三十个字母），念熟之后，就打开经卷，首先学习皈依经，再念兜率师岳噶经，其他如白伞盖经、心经、绿相佛母经、白相佛母经、三十二种法行妙明经等，全部必须在这三年以内背得纯熟，才能毕业升入第二班。如果成绩不良，考试不及格，就得再行补习三年，……升到第二班以后，学习念诵《十一种护法经》、《时轮金刚根本经》，……升入第三班以后，学习念诵《时轮金刚佛经》、《时轮金刚坛城经》，……升入第四班以后，方才开始学习《历书》，六年毕业后，才能准许参加‘资林巴’名号的考试”[1]。从这段记述看，雍和宫的“扎宁阿扎桑”实际上就是与塔尔寺、拉卜楞寺的丁科尔扎仓相同的时轮扎仓。时轮扎仓的僧人学习的内容，一是

---

① 魏开肇：《雍和宫漫录》，第 138—140 页。

关于佛教时轮金刚香巴拉理想国（香巴拉是佛教所说位于印度北方极远处的一个理想的国名，亦译为香格里拉）的道理，并发愿转生到那个国度去，二是外、内、别三种时轮的道理，以及修供本尊时轮金刚和时轮坛城的仪轨等，三是藏族历法中的时轮历体系，其主要教本为《时轮金刚本续》、《时轮金刚坛城仪轨》及各种注释。时轮扎仓的僧人毕业后经过考试可以获得"孜仁巴"（算师）的名号。"时轮"藏文为 dus vkhor，所以塔尔寺、拉卜楞寺的时轮扎仓都称为丁科尔扎仓。雍和宫的时轮扎仓称为"扎宁阿扎桑"，"扎宁阿"显然不是 dus vkhor 的对音。一般认为"扎宁阿"的意思是数学或历算，但藏文的数学历算为 rtsis rig，rtsis 即"孜仁巴"的"孜"，与"扎宁阿"也不符合，"扎宁阿"也不是蒙古语或满语的"数学历算"的对音，因此对"扎宁阿"的语源还有进行分析的必要。

上面提到的两种章嘉·若必多吉传和七世达赖喇嘛传对雍和宫的除显宗、密宗、医学扎仓以外的第四个扎仓的称呼也不相同，《七世达赖喇嘛传》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的章嘉·若必多吉传称之为 rig gnas 扎仓，rig gnas 这一藏文词是指学科、学问，佛典中译为明处，在现代又相当于"文化"。藏传佛教把各类学问总称为大小五明，大五明（rig gnas che ba lnga）包括佛学、因明、声明、医学、工巧明；小五明（rig gnas chung ba lnga）包括历算、戏剧、韵律、辞藻、诗歌等。章嘉·若必多吉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把这一扎仓称为 rig gnas 扎仓，说明最初建立这一扎仓时可能是计划以学习大小五明各科知识为主的扎仓，并不是专门学习某一学科，故可称为五明扎仓或杂明扎仓。但是 rig gnas 与"扎宁阿"的音也相去甚远，因此"扎宁阿"不可能是 rig gnas 的对音。却藏·阿旺图丹旺秋所著的章嘉·若必多吉传称这一扎仓为 sgra snyan ngag 扎仓，sgra 是

sgra rig pa，即是声明学（语言学）之意，snyan ngag是修辞学、诗词学之意，因此sgra snyan ngag是包括大小五明中的声明和修辞两个学科，而sgra snyan ngag与“扎宁阿”的读音相符，“扎宁阿扎桑”应当是藏文sgra snyan ngag grwa tshang的对音。虽然字义上只是指声明和修辞，实际上应当是泛指大小五明的各个学科。

却藏·阿旺图丹旺秋的记载不仅解决了“扎宁阿扎桑”的语源问题，而且透出雍和宫的时轮扎仓的演变情况。看来，在计划雍和宫改建藏传佛教寺院时，曾计划把这一扎仓建为学习大小五明各学科的扎仓，后来因为大小五明的内容太广，才改为以某些学科为主。看来开始并不是计划以时轮和历算为主，而是以声明学和修辞学为主。主持雍和宫改寺事务的章嘉·若必多吉精通藏、汉、满、蒙等多种语文，并且从1741年起主持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蒙译工作，后来又主持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满译工作，同时他还是一个有大量著作的杰出学者，因此他特别重视声明学和修辞学，计划在雍和宫建立专门学习这两科的扎仓，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很可能雍和宫改寺后，开初有一个时期“扎宁阿扎桑”确实是以讲授声明和修辞为主，所以不仅有蒙古喇嘛在此学习，还有清宫中的喇嘛太监、内务府管辖的清东陵和清西陵的满族喇嘛及甘青等地藏族僧人前来学习。后来“扎宁阿扎桑”虽然改为以学习时轮教法为主的扎仓，但是扎仓的名称并没有改为“丁科尔扎仓”，“扎宁阿扎桑”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由于其他藏传佛教寺院中没有设立过叫做“扎宁阿扎桑”的扎仓，所以后来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该扎仓的僧人和研究雍和宫的学者都不了解“扎宁阿”一词的来历，以为“扎宁阿”源于梵语或某种未知语言，就是历算、数学或时轮的意思。

三、关于乾隆《御制喇嘛说》

雍和宫中为数众多的文物碑刻中，最受学术界重视的自然还是乾隆皇帝的《御制喇嘛说》碑。碑文中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一句，以及“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之说，是已为学术界所熟知，并在许多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来作为分析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乾隆皇帝本人对藏传佛教的态度的基础。尽管如此，由于《御制喇嘛说》碑文本身所具有的十分突出的重要性，现今仍然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一步的探讨，尤其是我们假如要从这篇碑文分析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及乾隆皇帝本人的宗教思想，就更必须从各方面对《御制喇嘛说》做综合的分析探讨。

《御制喇嘛说》汉满蒙藏四体碑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雍和宫中，并且有多件汉文录文流传于世。清代松筠撰《卫藏通志》即将此碑汉文部分录入卷首，并加标题为《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① 民国时妙舟编《蒙藏佛教史》，又将此碑汉文部分录入，但略去了乾隆的小字自注部分。② 解放以后，1953年金梁编《雍和宫志略》，收录了此碑，并有评说。③ 近年则有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一书的附录中收有《喇嘛说》④，

---

① 《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1页。

② 妙舟：《蒙藏佛教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93年影印本，第五篇，第51—53页。

③ 金梁：《雍和宫志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323页。

④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2页。

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收有《喇嘛说》的藏文部分[①]，周润年对御制《喇嘛说》碑文藏文和汉文部分进行了认真的校录，写成《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一文。[②] 以上这些工作，为学术界研究《喇嘛说》碑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关于乾隆《喇嘛说》一文的写作时间，《卫藏通志》的录文篇末未写明年月，《清实录》则在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公元1793年）四月辛巳条中收入《御制喇嘛说》，只有正文，没有注文，篇末也未写明写作年月。《蒙藏佛教史》、《雍和宫志略》、《清政府与喇嘛教》的录文在篇末都注明"乾隆五十有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瀚御笔"。周润年的录文除汉文篇末有与此相同的年月外，藏文录文篇末为 gnam skyong dgung lo lng bdun pavi chu pho byi ba lovi dgun zla dang povi yar tshes gnyis la rgyal pos bris pavo，译成汉文就是"乾隆五十七年阳水鼠年孟冬月（十月）二日皇帝所书"。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的这一篇御制《喇嘛说》应是写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的十月二日，汉文的"孟冬月之上瀚"即"孟冬月之上浣"，即"十月上旬"，因此藏、汉碑文所写的写作年月日应是一致的。《清实录》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条录有《御制十全记》，可见《喇嘛说》与《御制十全记》实为同时写作的姊妹篇。《御制十全记》是讲乾隆帝即位以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历次用兵的"十全武功"，《喇嘛说》是讲乾隆皇帝本人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和策略，因此可以说这两篇文章一个是讲乾隆对边疆民族地区

① 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109页。

② 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87—93页。

的军事策略，一个是讲乾隆对藏传佛教的策略，应该说这是乾隆皇帝对他即位以来的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的应对策略的基本总结。

乾隆皇帝在《御制十全记》中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可见乾隆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深知强大的武备是统治国家、保守疆土的根本，他是把保有强大的武力，为维护统一和保卫疆土必要时不惜一战作为帝王的第一要事来看待的，因此他在书写《御制十全记》的同一天的上谕中说："再，此事（指第二次廓尔喀之战）蕆功完善，御制十全记一篇，以志武成十告。现令翻译四体字，俟缮写完竣再行发交和琳，酌量于圣祖御碑之旁竖立，或另相地势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此碑原立于拉萨布达拉宫前，后移至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潭公园内，有的资料将其记为《清乾隆帝击退廓尔喀侵藏的记功碑》，此外乾隆帝还在北京、承德等地多处竖立《御制十全记》碑，可见乾隆皇帝在他即位已57年、准备传位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之时，认为应该训诫子孙、昭告朝野及各族僧俗的最重要的文字是《御制十全记》，其次才是《御制喇嘛说》。因此我们在分析《御制喇嘛说》碑文时，不应当忽略乾隆皇帝同时还写有《御制十全记》这一历史背景。

对于乾隆皇帝写作《御制喇嘛说》的目的，也有一些学者作过探讨。金梁的《雍和宫志略》中说："这座碑上的文字，是弘历所作的一篇文章，题目名叫《喇嘛说》。文章中的意思，既不是宣扬黄教，也不是说创建喇嘛庙的原因，乃是弘历表明自己不因迷信佛教而崇敬喇嘛，并且劝别人不迷信黄教。最奇

怪的是，他把利用喇嘛为怀柔蒙藏人民工具的内幕，也写在文章之内，并且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以便汉满蒙藏四族的人民，普遍的了解弘历他自己是怎么个心理，这实在是莫明其妙了。假使蒙藏的人民全都了解了他的用心，则他的怀柔手段，岂不是自己给自己破坏了呢?”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解释：“把这一大段碑文，细细的研究一下，这才明白弘历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乃是在他这篇文章的年月，是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那时弘历已然 78 岁了，他知道自己已到暮年，如果死了之后，他的子孙不明白他利用黄教的用意，惑于喇嘛的引诱，演出元明时代纵任喇嘛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来，或竟效法元顺帝妥欢贴木儿而在宫内的‘演揲儿’和‘吐吉兀该’等丑剧来，以致把清朝的皇位搞没有了。弘历对这事甚不放心，故此把‘喇嘛说’这篇文章，译成四种文字，并且把碑石立在雍和宫正殿前面甬道上，凡是出入雍和宫的人全都看得见，弘历的子孙和蒙藏的喇嘛，必然怵目惊心地不敢胡作非为了。有清一代，没有喇嘛滋生事故的事件发生，就是这第一个原因的效力。其第二个原因，则是弘历用‘十全武功’骄傲的余焰，再藉这篇‘喇嘛说’，单独地向蒙藏示威一下，以便他的子孙，安享‘太平天子’之福。”这可以称之为“训诫及威慑说”，即乾隆写《喇嘛说》的目的是为了训诫子孙，威慑蒙藏佛教人士，以达到“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目的。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中也持“训诫说”，认为“《喇嘛说》是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撰写的，是时，乾隆皇帝已经到了‘耄近归政之年’，立此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阐明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乾隆在

《喇嘛说》碑文中首先讲了西藏佛教的来源和发展，接着阐述了大清皇帝不信藏传佛教而又保护藏传佛教的道理，总结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他的子孙对黄教决不可曲庇谄敬，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其次讲述了他用封建法律制裁上层喇嘛搞分裂危害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再次着重说明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和弊病，并提出整顿和改革的办法。最后简述了他成功的妙诀，并洋洋得意地说：'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所有这些妙诀都是乾隆传授后代皇帝使'新旧蒙古，畏威怀德'，辑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认为乾隆撰《喇嘛说》是为了训诫子孙，从碑文的内容看是有道理的，同时从乾隆之子嘉庆帝写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普陀宗乘之庙瞻礼纪事》诗文及自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不过嘉庆认为乾隆帝最主要的是讲金瓶掣签。他在诗中说："转世相沿多诡谲，除弊特命金瓶掣，决疑定众顺其情，鸿文巍焕喇嘛说。"在此处的自注中，嘉庆帝沿引了《喇嘛说》中关于喇嘛及转世的来历，接着又说："我朝抚有方夏，遐迩归心，因众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黄教，因而加以保护，用示怀柔，俾之遵守旧规，递演其传。乃行之既久，遂有影射牟利者，从中舞弊，任意妄指呼必勒罕，居为奇货，以致转生之人，率出一族，竟与世袭爵禄无异，而信奉其教之人，变生疑虑。我皇考于平定廓尔喀宁辑藏地之后，曾制《喇嘛说》，详述黄教原委，与我朝所以振兴之故，并究悉其煽乱之由，将彼教坏法之人，置之重辟。因思息纷定众之道，必须遏其弊端，特命制金奔巴瓶，送往藏中供奉。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所供金瓶，对众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又，各蒙古

之大呼必勒罕，亦令如所定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贮于雍和宫所供金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等公掣。我皇考圣谟广运，虽遐方殊俗亦必筹其经久安全，正合《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治法昭重，允宜遵守毋忽者也。"

虽然嘉庆帝认为《喇嘛说》"治法昭垂，允宜遵守毋忽"，但是在当时认定第九世达赖喇嘛也即是乾隆立《喇嘛说》碑以后，首次确定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这样的大活佛的转世的过程中，嘉庆帝却没有完全按《喇嘛说》碑文中的规定办，他自己在诗中说："宗喀巴派二徒传，一曰达赖一曰班禅。达赖示寂已数载，今春显应西藏边。生甫四龄性敏悟，昔年衣钵识无误。乃知真者幻难欺，不住色相心常住。"在此处的自注文中说："其八辈达赖喇嘛于嘉庆九年示寂，已阅数载。其呼必勒罕尚未出世，曾令济咙呼图克图及堪布喇嘛等于前诵经，虔诚祈祷，以期早征灵应。本年正月，据驻藏大臣玉宁等奏称，藏内各处具报幼孩九人，经济咙呼图克图驳去六人，只余三人。内惟西藏甸麻地方居住之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于乙丑十二月朔日降生，迄今年甫四龄，聪慧异常，早能持诵经咒，自知前身系八辈达赖喇嘛，试以前辈喇嘛所用铃杵等物，均能辨识，大众无不倾心信奉。而后藏班禅额尔德尼闻知，即亲至前藏，睹诸殊异，同深欢喜。并经玉宁等详加察验，信而有征。盖化身虽幻，而真性常存，似此灵异显然，不特化外波旬无由伪托，去来因果了了不迷，益征此心常住，有超乎色相之外者。"乾隆《喇嘛说》中明确指出："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

述。”又说：“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可见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中的灵异征应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活佛转世是一种“权巧方便”，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解决大喇嘛的继承人的办法。正因为他是这样认识的，他才决定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参与管理。但是嘉庆帝就与乃父不同，他认为“盖化身虽幻，而真性常存”，“有超乎色相之外者”，也即是他相信呼图克图转世中的灵异征应有许多是真实的，对这些真实的就不必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决定，只有当灵异征应不够显著之时才应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息纷定众。所以嘉庆帝不仅下令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无须金瓶掣签，而且把这个意思解释为符合乾隆皇帝的想法。他在自注文中说：“我皇考颁发金奔巴瓶之圣意，原以维持正教，遏抑邪趋。在天之灵，所以照临而呵护之者，非言思拟议之所能悉。今丹怎吹忠之子，聪明颖异，其征应如此，大众之欢欣敬信又如此，设当我皇考时，遇有此奏，必立时加恩，无须于金瓶掣签。盖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其作达赖喇嘛呼必勒罕，著班禅额尔德尼等恭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虔诚诵经奏闻，用昭恩贶。”在讲述派官进藏颁礼看视坐床、颁赐敕书后，嘉庆帝又说：“敬思我皇考绥远鸿猷，为万世法。前此金奔巴瓶之赐，实虑彼教之中有假托者，藉以去伪存真。兹既真者现前，则一切杜弊之法，原可不设。即此权衡措置，心心相印，默默同符，实理之必然者，然事期可久，法不厌详，此后设遇呼必勒罕出世，未必能如此次之灵验无疑，仍当恪守前规，书名签掣，方可以绝诈而泯觊

觎。”[①] 这也就是说，嘉庆认为乾隆《喇嘛说》中规定的金瓶掣签的办法，是一个杜绝弊端的办法，在转世灵验无疑时，可以不用金瓶掣签，但是不能因此完全不用金瓶掣签，在不能达到灵验无疑时，则应实行金瓶掣签。而如何才算灵验无疑，只有皇帝才能做出决断。正是在这一界限不明的情况下，嘉庆二十四年驻藏大臣玉麟上奏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等人请求不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世达赖喇嘛时，即遭到嘉庆帝的斥责。《清实录》记载嘉庆二十四年三月戊申的上谕说：“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设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今理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若遂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玉麟等不严行驳饬，实为错误，著传旨申饬。此次理塘幼孩，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照定制对众讽经掣签。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渎请，若来求请，即查拿治罪。将此传谕知之。”

仔细体味嘉庆帝对乾隆《喇嘛说》关于金瓶掣签的认识和运用的实例,可以看出清朝历代皇帝对藏传佛教有一个一贯的态度:在清朝皇室觉得需要佛法的护佑,需要凭借佛教来获得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精神力量,需要佛教的宗教仪轨和修行来解决皇室成员个人的信仰和精神依托的时候,皇帝很乐于以佛教的法王、佛法的信仰者和保护者的面貌出现,然而在涉及统治国家、管理藏蒙事务和藏传佛教的具体事务时,皇帝又侧重于以国

①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所附《普陀宗乘之庙瞻礼纪事诗刻石》，第503—507页。

家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强调信仰佛法并不影响作为君主的皇帝对藏传佛教有管理的权力。对于前者,清朝在入关之前在沈阳修建法轮寺、永光寺、广慈寺、延寿寺寺塔,并传布喇嘛僧的"四塔全,当一统"的预言①,将嘛哈噶喇护法奉为清军的保护神,为之建实胜寺。② 入关以后,虽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封建君主,但是他们也都崇信佛法,包括崇信藏传佛教。顺治帝酷好参禅,在宠妃董鄂妃去世后,甚至一度祝发,意欲遁入空门,派喇嘛阿王老藏主持五台山,总理番汉事务,享山西财赋,并常赴朝廷,为顺治讲解藏传佛教经典。康熙帝在北京、承德、五台山广修佛寺,封二世章嘉为国师。雍正帝在即位之前就"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认二世章嘉为恩师,深究禅理,即位后也广建寺庙,多刻佛经,并自选"历代禅师语录",常与一些亲贵大臣和僧徒讲论佛法。乾隆皇帝在崇信佛法、追求藏传佛教的神佛保佑方面与其父祖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为其父母求福,改雍和宫为藏传佛教寺院,为其母建寺、写经、造金塔、金佛像,其规模在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他在清宫中修建佛殿,专供自己供佛修法,甚至把自己的陵寝建成一座陵墓化的藏传佛教寺庙,其地宫浮雕五方佛及菩萨像,刻满梵藏文经咒。尤为突出的是,乾隆为习佛法,尊三世章嘉和六世班禅为师,接受灌顶,以皇帝之尊跪受经咒、接受戒条。从顺治到乾隆,清宫中的各种藏传佛教的诵经、作法事、祈福的活动常川不断,在形式上与元朝及明朝前期宫廷中的法事活动并没有多少区别。但是,乾隆在《喇嘛说》中对自己皈依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这些活动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反而竭力声明清朝在对

① 乾隆帝:《法轮寺诗碑》,见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第335页。

② 刚林撰:《实胜寺碑文》,见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第209—211页。

待藏传佛教的态度上绝无元朝的过宠喇嘛之弊端。比照《喇嘛说》碑文的写法，清朝的官方文书如《清实录》也回避(或是删去)了有关清朝诸帝崇信藏传佛教、举行法事活动的各种记载。

对照藏文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六世班禅传》中有关他们为乾隆帝传法的记载，可知乾隆帝在《喇嘛说》中是有意规避了他个人在思想上信仰藏传佛教、在行动上躬自修行的重要内容。乾隆为什么要这样写，自然会使人们想到他写《喇嘛说》除了训诫子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自辩。乾隆为了自己的七十大寿和接受佛法，迎请六世班禅到热河和北京，固然对增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六世班禅在北京去世后，乾隆自己(并由此带动王公大臣等)赠给大量财物，以致引起乾隆晚年的两次廓尔喀侵扰西藏，清朝不得不两次用兵，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由此引得朝野议论纷纷。乾隆大概自己也听到了对他过于尊礼喇嘛上师的批评，所以在取得对廓尔喀战争的胜利、自己准备传位给嘉庆帝时，觉得有必要做出一番辩解，以平息臣民私下的责难，这大概也是乾隆帝撰写《喇嘛说》的直接原因。

总之，乾隆帝作为一个封建君王，对宗教的态度和认识是复杂的，他写《喇嘛说》的目的应是自辩和训诫兼而有之。嘉庆帝对《喇嘛说》的认识和执行，就表现了《喇嘛说》碑文本身包含的这两个不同侧面。我们今天来分析和研究《喇嘛说》，更不应拘泥于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应当结合乾隆一生中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和实践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了解乾隆写作《喇嘛说》的意图，并进而准确分析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多方面的关系。

原载《藏族历史宗教研究》第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封建君王关系密切的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他们在宫廷的传法活动，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这些高僧又往往要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如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尊为国师，大量翻译佛经。佛驮跋陀罗受南朝宋武帝刘裕敬重，传播禅法于江南，又如玄奘与唐太宗，法藏、神秀、义净与武则天，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受到元、明、清三朝皇室的尊崇，一大批喇嘛相继涉足于皇家宫廷，朝廷通过这些高僧影响和统治藏族、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又依靠朝廷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十分显眼的政治、宗教文化现象。在这些活动于宫廷的高僧之中，无论从交往时间之长久、尊信之专一、影响之广大、关系之密切的哪一个方面来说，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的关系都是十分突出的。如果我们对他们二者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探讨，就可以从中了解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掌握藏传佛教的高僧在宫廷活动的大致情形。

一、先辈奠定的坚实基础

章嘉·若必多吉又名章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正月初十诞生在甘肃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中。其父名古茹丹增，土族人，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属民，后举家迁往凉州放牧，落籍于当地的藏族部落。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古茹丹增除放牧外，还为人念经诵咒，是部落中的一名咒师，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算高。按家庭出身，章嘉·若必多吉是不可能与生长于皇宫的乾隆皇帝结识的。但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在他出生的时候，青海藏传佛教的大寺院佑宁寺向西北方向寻找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发现了他这个灵异婴儿，并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经过理藩院奏准，认定他为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次年六月，佑宁寺僧众以隆重的礼仪将他迎入佑宁寺坐床。这样，年仅四岁的若必多吉就成为第三世章嘉活佛，继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关系，具备了与清朝皇室建立联系的条件。

二世章嘉活佛名阿旺洛桑却丹，生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幼年入佑宁寺为僧，11岁时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路过青海，为他传授沙弥戒。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他去西藏继续学经，又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在拉萨哲蚌寺获得“林塞”学位。他在西藏学佛20多年，不仅佛学造诣很深，而且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藏传佛教的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他返回青海，在佑宁寺讲经传法。此时，因蒙古喀尔喀部的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为争夺属民长期纠纷，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也插手其间，所以

清朝派人入藏，要达赖喇嘛派人与清朝大臣一起去漠北调解喀尔喀部的纠纷。达赖喇嘛（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已去世，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发，仍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处理各项事务）派遣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罗追嘉措前往。罗追嘉措是青海塔尔寺所辖米纳部落人，在西藏学佛时与二世章嘉活佛关系密切，所以在途经青海时又邀请二世章嘉活佛与他一起前往。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在库仑伯勒齐尔举行了会盟，由于罗追嘉措和清朝派出的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的努力，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不顾噶尔丹派来的代表的挑剔指责，达成了和平协议。次年，二世章嘉活佛与罗追嘉措一起到北京向康熙帝奏报，深受康熙帝器重。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罗追嘉措与二世章嘉活佛一起返回青海，罗追嘉措于当年去世。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二世章嘉活佛奉召进京，驻锡法渊寺，被任命为扎萨克达喇嘛，连随从的15人也由清朝供给生活口粮，这是历辈章嘉活佛担任清朝朝廷职务的开端。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第悉桑结嘉措公布五世达赖喇嘛之丧，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二世章嘉活佛奉康熙帝之命，带赐给六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入藏，参加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途经青海时，他与额驸阿拉布坦劝谕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正式归附清朝，进京朝觐康熙帝，为康熙帝乘战胜准噶尔噶尔丹之威收服青海蒙古各部立下了功劳。但是，在次年中，二世章嘉活佛却因在拉萨时违旨叩见第悉桑结嘉措，被理藩院题奏，拟处绞刑，最后还是康熙帝下令从宽，才只是革除其呼图克图名号，免予惩处。[1] 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风险，使二世章嘉活佛认识到作为一名皇室封赐品级的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申条。

喇嘛，不能涉足清朝皇室与第悉桑结嘉措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之中，开罪康熙皇帝，于是专心于在蒙古各部中传教弘法。他在回京途中于多伦诺尔及长城沿线创修寺院，组织内蒙古各处僧人学佛，在内外蒙古各部中树立起影响。当时正值哲布尊丹巴与喀尔喀部从内蒙古返回漠北，使内蒙古广大地区缺乏一位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领袖，所以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任命他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事务的扎萨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到多伦诺尔避暑传法。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又进一步封他为灌顶普慈广慧大国师，赐给金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帝巡幸多伦诺尔，二世章嘉活佛随行，康熙帝看到内蒙古各地的僧人都到汇宗寺学法，十分高兴，对二世章嘉活佛说："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这就将章嘉活佛提升到与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相似的掌管一方格鲁派教务的教主的地位。

二世章嘉活佛不仅受到康熙皇帝的尊崇，而且与当时还在藩邸的皇四子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关系十分密切。雍正帝即位后编了一本《御制语录》，在后序中详细叙述了他向二世章嘉活佛学法的情形。其中说："圣祖敕封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权善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又说："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①] 雍亲王还自己出资购买法渊寺加以整修，献给二世章嘉活佛居住，并请康熙帝赐寺名为嵩祝寺。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为争夺继位权而激烈争斗之时，二世章嘉活佛与雍亲王结下密不可分之缘，可以说他是独具慧眼，颇有

---

① 《卫藏通志》卷一，《御制语录后序》。

政治远见的一位佛教上层人士。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 1715 年）五月，二世章嘉活佛在多伦诺尔圆寂。他在朝廷活动二十多年，为章嘉活佛系统与清朝皇室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直接为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二、少年时代与皇子的同窗之谊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次年，青海发生了波及青海各部的罗卜藏丹津反清之乱，章嘉·若必多吉驻锡的佑宁寺当时是主要的反清据点之一。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正月，清军在年羹尧、岳钟琪率领下攻打佑宁寺，杀僧俗六千余人，烧毁全部寺院建筑。章嘉·若必多吉在战斗发生之前即被僧人带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躲藏起来，雍正帝想起与前世章嘉活佛的关系，以五昼夜由北京传至西宁的急诏命令年羹尧将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送往京城，不得有分毫伤害。[①] 年羹尧威迫佑宁寺派人接回章嘉·若必多吉，至岳钟琪军营降顺，并随清军到达西宁。因有雍正帝之命，年羹尧将章嘉·若必多吉奉为上宾，优礼有加。章嘉·若必多吉在西宁出痘，清军为他招请名医治疗，康复后还设宴唱戏祝贺。当年，遵雍正帝之命清军将章嘉·若必多吉护送到北京，此时他年仅八岁。

对于章嘉·若必多吉进京后的生活，雍正帝亲自做了周到的安排，命令当时在朝廷的二世土观活佛却吉嘉措负责照料，教给他站、跪、行步等朝觐礼仪。当雍正帝驾临土观活佛居住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

的旃檀觉卧寺时，章嘉·若必多吉出院门跪迎，雍正帝将他抱起，进入屋中坐在同一坐垫之上。① 不久，雍正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移居嵩祝寺，准他按前世所受封赏乘坐黄幛马车，坐九龙褥。雍正帝这样做，自然不仅是怀念前世章嘉活佛，还因为他看到在罗卜藏丹津之乱中青海各寺庙和僧人纷纷响应，有的还聚集数千僧俗手持兵器与清军对抗，力量不可轻视，因此决心对章嘉·若必多吉从小加以培养，使他能够在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中成为重要的桥梁。

雍正帝不仅让章嘉·若必多吉跟随土观活佛学习藏传佛教，并且命他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等皇子一同读书多年，因此章嘉·若必多吉不仅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还学会了汉、蒙古、满等民族的语文。② 特别是他与比他大六岁的乾隆皇帝有了同窗之谊，自幼相知，这在历史上的高僧和帝王的交往中也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特例。

据《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在这期间，每当夏季苦热时，雍正帝命他与土观活佛一起到京城西郊的皇家园林居住，饮食用品也由皇室供给，另外还经常召请他们进宫，与雍正帝尊信的汉僧一起交流修法体验等。③ 在雍正帝于皇宫内举行的这些御前法会上，经常有亲王、重臣参加，受封为宝亲王的弘历也是其中之一，他还有一个法号叫长春居士，因此，虽然缺乏直接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弘历与章嘉·若必多吉在青少年时的交往应当是很频繁的，这种交往对他们各自一生的思想和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

②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五章。

③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五章。

三、备受尊崇的国师喇嘛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雍正帝依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章嘉·若必多吉为“灌顶普慈广慧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当年八月，章嘉·若必多吉奉命与果亲王一起去泰宁会见七世达赖喇嘛，并与副都统福寿一起护送七世达赖喇嘛从泰宁返回拉萨。次年十月，当章嘉·若必多吉在日喀则从五世班禅受沙弥戒和比丘戒时，传来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于是章嘉·若必多吉匆忙从西藏返回北京，朝觐新继位的乾隆帝。乾隆帝立即下令将掌管京城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章嘉·若必多吉，封他为掌印喇嘛。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又赐御用金龙黄伞，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钦定驻京喇嘛的班次时，以章嘉活佛为左翼头班。在清代的受封的佛教僧人中，只有章嘉活佛被封为大国师，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按清朝的制度，驻京的扎萨克达喇嘛可带随从噶布楚、兰占巴20人、格隆6人、班第6人，这些人的生活口粮等都由政府发给[①]，章嘉·若必多吉地位高于扎萨克达喇嘛，其随从当不止此数。此外，章嘉·若必多吉在多伦诺尔和五台山还有自己的寺庙，另有一批徒众，为数也不少。

除了按规定发给口粮俸银之外，每逢年节，以及传法、诞辰之日，乾隆帝还要赐给章嘉·若必多吉大量财物。《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当他五十、六十、七十寿辰时，乾隆帝都提前于上一月的二十二日派内务府大臣到嵩祝寺献礼。礼品中除

① 妙舟：《蒙藏佛教史》，第六篇，第二节《喇嘛之种类》。

了众多的金佛、银塔、玉器之外，哈达、绸缎、鼻烟壶、马蹄金、马蹄银等都以“九”为单位。次日，乾隆帝还要亲临章嘉·若必多吉的居室，颁给祝寿的诏书，并命内务府为章嘉·若必多吉举行寿宴，演出歌舞戏剧，以示庆贺。在乾隆帝的带动下，蒙古各旗王公及朝中大臣权贵也纷纷向章嘉·若必多吉献礼祝寿。有一次在五台山上，乾隆帝见章嘉·若必多吉的寝室不够宽敞，立即赐银一万两让他扩建，接着又将大臣们为乾隆帝在五台山修建的一座寝宫赐给章嘉·若必多吉。① 乾隆十年（公元 1745 年），当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后，章嘉·若必多吉向乾隆帝传授了“胜乐”灌顶，乾隆帝跪受灌顶，并向章嘉·若必多吉奉献了以一百两重的金质曼遮为主的各种供养品。②

在日常的礼仪方面，乾隆帝和章嘉·若必多吉之间自然要严守君臣之礼。但是，乾隆帝也多次突破这种礼节规定，对章嘉·若必多吉表示特别的尊崇。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年初，章嘉·若必多吉在进藏办理七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委任摄政、认定转世灵童等事宜后返抵北京，乾隆帝出寝宫院门迎接，并按满族的礼节与章嘉·若必多吉行抱见礼，相互问候，并互献哈达。③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六世班禅到热河、北京朝觐时，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帝的第六子是最主要的陪同者，乾隆帝曾特别传令准许六世班禅乘轿至避暑山庄的寝殿内，章嘉·若必多吉乘轿至寝殿门外。乾隆帝在太和殿会见和宴请六世班禅时，特许六世班禅乘至殿前第三层台阶，章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二章。

②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一章。

③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六章。

嘉·若必多吉乘轿至第二层台阶。[①] 平时，章嘉·若必多吉乘黄幃马车可出入东华门，以致“都人士女，争取帕铺途，以轱毂压过，即为有福”[②]。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夏天，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一起上五台山，在菩萨顶举行祈愿法会，乾隆帝让章嘉·若必多吉与他同坐在一个坐垫上，并说：“与呼图克图坐在一个坐垫上，朕便觉得安乐”。[③] 乾隆帝有时甚至不惜违背朝廷的规章，以满足章嘉·若必多吉的愿望。有一次章嘉·若必多吉患了手脚麻木、视力衰退的重病，久治不愈，对乾隆帝说如果能救人一命，或者可以得福而治愈，于是乾隆帝下令赦免一名正要执行死刑的囚犯，为章嘉·若必多吉求福。[④] 乾隆帝明知为了喇嘛而赦免死囚是史家所痛斥的元朝的弊政之一，却也偶尔行之，这正表明了他对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之隆。

尤其难得的是乾隆帝对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真正是做到贯彻始终，至章嘉·若必多吉去世后，无有改易。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三月，乾隆帝去五台山进香，命章嘉·若必多吉也于三月至五台山接驾。乾隆帝所题《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说：“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是日章嘉国师率众喇嘛诵经迎驾）。”乾隆帝离五台山时，章嘉·若必多吉已患病，仍坚持送行。四月初二日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遗言不要保存遗体，火化后装入铜塔存放五台山镇海寺。乾隆帝听到章嘉·若必多吉去世的消息后大为悲恸，以七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一章。

② 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见《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③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二章。

④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九章。

千两黄金造金塔安置章嘉·若必多吉的遗体。在五台山掘石窟安藏，又建大石塔于镇海寺纪念，还派章嘉·若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图克图去西藏各大寺院发放布施，做超荐法事。①

四、皇室兴建佛寺的顾问

在乾隆帝兴建皇室喇嘛寺院的各项工程中，章嘉·若必多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帝在与章嘉·若必多吉商议之后，决定在京城之内建立一座正规的喇嘛寺院。于是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改建雍正帝即位前居住过的雍王府（雍和宫）为喇嘛寺院，修建了大经堂、三世佛殿、戒坛、药师殿、法轮殿、天王殿等，并从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七部以及藏汉地区集中五百名年轻僧人，按照藏传佛教的制度设立显宗、密宗、医宗等扎仓。雍和宫各佛殿的供佛基金和僧人们的生活给养都由清朝政府按月发给。各扎仓的堪布和教师等则由西藏各大寺院派遣有学识的僧人担任，而雍和宫的所有宗教事务都由章嘉·若必多吉掌管。

建雍和宫之后，章嘉·若必多吉还参与了乾隆帝在北京、热河兴建喇嘛寺院的许多工程。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帝为了给母亲祝寿，改北京西郊瓮山为万寿山，在山前营建大报恩延寿寺，在山后修建喇嘛寺院。章嘉·若必多吉负责山后香岩宗印之阁的四层金顶佛殿的修建及殿内密宗佛像的塑造，并依照雍和宫的制度，征集内蒙古各旗的僧人来此诵经学法。② 乾隆二十年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三章。

②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八章。

(公元1755年)，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之乱后，依蒙古各部王公的请求，在热河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普宁寺。该寺建成后，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一起到该寺举行开光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该寺学经。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时逢孝圣皇太后八十寿辰，蒙古各部王公纷纷要求到热河祝寿，乾隆帝又在热河仿照拉萨布达拉宫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以后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又仿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在热河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供六世班禅来热河朝觐时驻锡之用。关于章嘉·若必多吉在这些工程中的作用，从乾隆帝自己撰写的《普乐寺碑记》中可见一斑。按该碑记载，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乾隆帝因为平定新疆之后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等族首领来热河朝觐日益增多，需要增建新的寺庙供他们瞻礼，恰好热河避暑山庄东北面磬锤峰下普宁寺和安远庙之间地势空旷，于是决定在该处建寺。在征询章嘉·若必多吉的意见时，他说：“大藏所戴，有上乐王佛，乃持轮王化身，居常向东，洪济群品。必若外辟重，疏三涂，中翼广殿，后规阁城，迭磴悬折，而上置龛，正与峰对者，则人天咸遂皈依。”[1] 于是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于该年正月动工建寺，到次年八月完工，此即承德外八庙中形制独特的普乐寺。

尤其重要的是，章嘉·若必多吉还参与了乾隆帝兴建满族的喇嘛寺院的工程。《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说：“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即清太宗皇太极）居住莫顿（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的习惯。如今想在京城西面的山脚下

① 乾隆帝：《普乐寺碑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八章。

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伽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如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的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于是，按照皇上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伊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为他们传授近事戒和沙弥戒。皇帝下令说：‘在此寺聚诵时，必须全部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经籍，并因西藏诵经的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还专门为用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语调。”① 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修建的这座满族僧人的喇嘛寺院，即是位于北京香山的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兴建的供奉文殊菩萨的宝相寺，现已不存。此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又在热河兴建了殊象寺，其规模形式以及喇嘛全用满人等，都与香山宝相寺相同。

五、皇室翻译佛经的组织者

清朝从康熙帝开始就十分重视佛经的翻译对勘工作，康熙帝曾组织大量人力对勘藏文大藏经，二世章嘉活佛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康熙帝还命二世章嘉活佛等人在元、明两朝翻译佛经的基础上，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全部译成蒙文。乾隆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帝即位之后，更为重视这一工作。章嘉·若必多吉精通多种语文。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精深的佛学知识，自然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乾隆帝下令说："如今佛教盛行于蒙古，先前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已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全本《丹珠尔》前所未见，章嘉呼图克图宜主此事，将所有疏释佛语之论疏翻译成蒙文。"接到乾隆帝的命令后，章嘉·若必多吉在进行翻译之前，先将经籍中的名词术语的译法统一汇集，加以厘定，编成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佛学词汇，题名为《正字——贤者之源》，刊布流行。经过三年的准备，于乾隆六年（公元 1741 年）十月开始翻译，到次年十一月全部完成蒙译《丹珠尔》的工作，将译稿进呈乾隆帝裁定。乾隆帝大喜，立即命内府刻印发行，传布蒙古各地。此时章嘉·若必多吉不过 35 岁，即完成了如此艰巨的翻译工作，故深受蒙藏佛教界人士赞许，七世达赖喇嘛还专门从拉萨写信给他表示祝贺。

约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开始，配合修建满族僧人的寺院，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负责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的论疏翻译成满文，乾隆帝还亲自参加了校审的工作。《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说："文殊大皇帝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对佛教获得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成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于是从学府成绩优异的人员和在京的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的人员，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了一些有疑问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做译后记，因此经过

多年，始告全部译成。”[①] 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中也说：“乾隆壬辰（公元 1772 年），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语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密旨。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文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②] 在翻译过程中，还由章嘉·若必多吉奏定条例清单，规定哪些应该翻译，哪些后人的著述不必翻译。还有一些乾隆帝认为不利于清朝的著述，如钱谦益的《楞严蒙抄》，则下令撤毁。这样一来，经过翻译佛经也同时进行了一番整理选择，将不合乾隆帝口味的一些学者著作从佛教论著中清理出去。

六、处理蒙藏事务的参谋和助手

章嘉·若必多吉受到乾隆帝的尊崇和封赏，自然与清朝的命运紧密相连。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章嘉·若必多吉都要以佛教高僧的身份祈祷佛法护佑清朝。乾隆三十二年（公元 1767 年）五月，缅甸军队进攻云南的盏达、陇川等地，中缅发生战争。乾隆帝派兵出征，并降旨召回在五台山坐静的章嘉·若必多吉，命他在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岛白塔下的寺院，寺名仍然叫永安寺）作为期七天的法事，供奉吉祥驱敌天女，护佑清军战胜。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清军攻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章。

② 转引自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参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甲戌上谕，《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92 页。

打金川的战事激烈进行，章嘉·若必多吉又多次奉乾隆帝之命举行抛掷食子供神的法事，祈祷清军战胜。这些都是乾隆帝要章嘉·若必多吉以佛教的法力（无论乾隆皇帝自己是真的相信还是仅仅把这作为鼓舞军心民心的一种方法）来帮助朝廷。但是，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自然不会仅限于宗教事务方面，由于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领袖的身份以及他两次入藏、多次到多伦诺尔居住，使他对蒙藏上层首领及宗教人士的实际状况和心理活动有深刻的了解，并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又长期生活在朝廷，对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大政方针也很清楚，因此他对乾隆帝处理有关西藏及蒙古的一些事务能提出意见，协助实施，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甚至有时还能犯颜直谏，纠正乾隆帝的某些错失。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西藏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长期受雍正、乾隆帝重用的颇罗鼐病故后，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权势过重，骄纵日甚，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执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又聚众数千，烧毁驻藏大臣官署，杀死傅清和拉布敦。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帝在震怒之余，认为这是对藏人加恩过重所造成的，今后对于藏人不能授以权柄，决心在拉萨建一座汉式大城，设置总督，派一名提督领兵一万驻扎，并在西藏各地设道、府、知县等官，将西藏一切事务交由清朝官员处理。[1] 正如乾隆帝在该年十一月丙寅的上谕中所说："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资产，岁入必极丰富，若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是供驻兵千人而有余。……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1] 在这种情况下，章嘉·若必多吉长跪不起，向乾隆帝恳切祈求：“陛下父祖竭力尊崇佛教，尤其陛下是最为关心佛法事务的大法王，西藏乃教法发源之地，如果按圣上所下的旨令，西藏地方的佛教必将衰微，万望陛下无论如何以恩德护持佛教。”这实际是提醒乾隆帝注意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照顾藏传佛教固有的地位和利益，不要在西藏采用与统治内地相同的办法。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劝阻下，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乾隆帝最后收回成命，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由此确定了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2]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 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去世，乾隆帝派章嘉·若必多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当时西藏的几个护法降神指认不同，长期争执不下。章嘉·若必多吉请六世班禅指认后藏托卜加地方出生的坚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同时，乾隆帝还任命第穆活佛阿旺坚白德勒嘉措为摄政，在八世达赖喇嘛成年之前掌办政教事务，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章嘉·若必多吉在拉萨对本来地位并不太高的第穆活佛表示非常敬重和支持，使得西藏地方政权的摄政制度顺利确立下来。但是，直到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西藏格仓静修寺的僧人扎德格西仍然认为前藏出生的一个儿童才是七世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将灵童接至本寺，以致有许多人宣称这个灵童才是真正的第八世达赖喇嘛，在僧俗人士中造成混乱，影响到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驻藏

---

① 《清代藏事辑要》，第 169 页。

②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大臣将此事奏报后，乾隆帝大怒，下令将扎德格西和灵童押送北京治罪。章嘉·若必多吉深知认定活佛的转世是藏传佛教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压制和杀戮的办法去解决会引起长期的争端，于是向乾隆帝劝谏说："这样做对佛教不利，不如将那个灵童送往后藏扎什伦布寺，让他做班禅大师的侍从，不仅对眼下有利，事情也会如泉水自干，对达赖喇嘛的事业也不会带来危害。"这一意见为乾隆帝所采纳，赦免了扎德格西和灵童的死罪，平息了一场风波。①

章嘉·若必多吉还利用他在蒙古各部中的巨大影响来帮助乾隆帝巩固对蒙古族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正当清朝为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之乱在新疆用兵的紧急时刻，因喀尔喀部的达尔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在陪同阿睦尔撒纳进京朝觐的途中放阿睦尔撒纳逃脱，被乾隆帝赐死，引起其弟二世哲布尊丹巴和各部王公的强烈不满，喀尔喀人心浮动，图谋反清。此时扎萨克图汗部郡王青衮咱卜发动"撤驿之变"，阻断清军的后勤通讯，以二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各部也准备起兵反清。在这紧急时刻，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迅速前往喀尔喀谈判。章嘉·若必多吉在动身前往时，先写信给二世哲卜尊丹巴，说明不能作乱的道理，派自己的侍从星夜送去。二世哲布尊丹巴接信后，听从章嘉·若必多吉的规劝，命诸部首领罢兵，变乱遂告平息，使乾隆帝在处理喀尔喀的问题上度过了一大难关。

喀尔喀部的哲布尊丹巴的转世问题，在乾隆年间也是一大难题。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出自土谢图部汗王家族中，二世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部达尔汉亲王敦多布多尔济之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子，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十二月去世。乾隆帝因哲布尊丹巴转生于喀尔喀部王公家中，政教权力集中于一家，权力过重，不便控制，于是遣使西藏，指令让三世哲布尊丹巴出生于藏族地区，于是认定理塘出生的意希丹贝尼玛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乾隆帝的这一做法引起喀尔喀部王公和僧人们的强烈反感，开会集议，由库伦办事大臣桑齐多尔济转奏，要求让三世哲布尊丹巴居住在多伦诺尔，不要到喀尔喀部，遭到乾隆帝的斥责。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乾隆帝下令第三世哲布尊丹巴送往库伦，途经多伦诺尔时，由章嘉·若必多吉给他剃发授戒，并陪同他到热河朝觐乾隆帝，但是三世哲布尊丹巴抵库伦坐床后，一些喀尔喀部的蒙古僧人仍对藏族出身的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不予承认。到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有一个喀尔喀僧人宣称自己的侄子是二世哲布尊丹巴的真正转世，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忿怒，准备从严治罪。后来也是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建议下，将那个喀尔喀僧人及其侄子迁到热河的寺院中居住，避免了事态扩大。正因为章嘉·若必多吉在处理喀尔喀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四世哲布尊丹巴洛桑图丹旺秋（为八世达赖喇嘛的伯父之子）从西藏去喀尔喀部时，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到多伦诺尔为四世哲布尊丹巴剃度并授沙弥戒，然后与哲布尊丹巴一同到热河朝觐。

由于乾隆帝倚重章嘉·若必多吉协助处理蒙古事务，所以章嘉·若必多吉的影响不仅及于内外蒙古及新疆、青海，就是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也对他十分崇信。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等人到热河朝觐，土尔扈特部诸首领除向乾隆献礼外，还专门向章嘉·若必多吉献礼。回归的土尔扈特部的主要首领之

一台吉雅兰丕尔还向乾隆帝请求，情愿舍弃妻子、财产和属民，跟从章嘉·若必多吉受戒出家，经乾隆帝同意，雅兰丕尔成了章嘉·若必多吉的近侍弟子，不再返回本部。[1]

总之，章嘉·若必多吉通过与乾隆帝的密切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种关系，为后来清朝诸帝和历辈章嘉活佛所继承。历代章嘉活佛与清朝皇室的关系，是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原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

①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九章。

二世嘉木样·贡却乎久美昂吾东行评介

清朝前期，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年间，是安多藏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阶段。由于清朝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西宁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统一管理甘青地区蒙古各旗和藏族各部落、寺院，划定牧地，制定盟会制度，并在交通要地驻兵镇摄，因而民族间和部落间的冲突较少。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到乾隆年间，安多藏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在清朝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以控制蒙藏地区的政策的影响下，安多藏族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阶段。青海塔尔寺、佑宁寺、甘肃拉卜楞寺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大寺院，寺院学经修行风气很盛，名僧辈出，关于安多地区藏族的宗教、文化、历史的著作，大多写成于这一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一些高僧的讲学传经和政治活动，这一时期安多地区出现了一批在整个蒙藏地区乃至清朝朝廷都有相当影响的转世活佛系统。由于安多地区处在从内地到西藏和从蒙古到西藏的中间地段，安多地区格鲁派的大活佛通过到拉萨三大寺学经及与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师徒关系与西藏的格鲁派上层有着密切的联

系，而他们在安多地区的母寺又在清朝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和支持清朝，因而他们在这一时期在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蒙古地区与西藏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受到清朝的特别重视。在乾隆时确定的驻京呼图克图中，来自安多地区的就有佑宁寺的章嘉、土观，塔尔寺的阿嘉、拉科，拉莫德庆寺和塔尔寺的色赤、广惠寺的敏珠尔、东科尔寺的东科尔、拉卜楞寺的贡塘活佛等，而且以章嘉、敏珠尔活佛为驻京呼图克图之首，可见他们的地位之重要。就是在此之外的一些安多地区的重要活佛，如青海拉莫德庆寺的察罕诺门罕（夏茸尕布）、佑宁寺的松巴堪布、甘南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等，也在清朝和西藏、蒙古的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历辈嘉木样活佛中，二世嘉木样是对拉卜楞寺的巩固和发展并将其影响扩大到安多各地和西藏、内蒙古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近年来随着藏文二世嘉木样传的出版，已有几篇研究二世嘉木样的很好的学术论文发表。不过对于二世嘉木样1769年到1771年前往五台山、北京、热河、内蒙古等活动一事，文章或者没有提及，或者语焉不详，因此本文拟对二世嘉木样一生中的这惟一的一次东行作一概述和分析，希望对于研究二世嘉木样能起到一些拾遗补阙的作用。

二世嘉木样于土猴年（公元1728年）藏历三月八日生于青海尖扎县囊拉色康，其家族为囊拉部落的世袭头人（后来成为囊拉千户），其父亲阿旺南杰承袭头人权位，其大伯父为第五世东科尔活佛。他自幼就接受佛教教育，13岁时从五世东科尔活佛受沙弥戒，经过拉卜楞寺的施主黄河南蒙古亲王的王妃南杰卓玛和拉卜楞寺德哇仓·洛桑顿珠的多年努力，他16岁时（公元1743年）被迎入拉卜楞寺，成为一世嘉木样活佛的

转世。1749 年他到青海佑宁寺拜见从北京返回的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从章嘉国师受比丘戒。1752 年他前往拉萨，在西藏拜见了七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1757 年会见奉乾隆之命进藏办理西藏政务和选认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章嘉·若必多吉。1759 年他从西藏返回安多，就任拉卜楞寺第十一任法台。1761 年卸去法台职务，担任夏琼寺法台。1763 年出任佑宁寺法台。1764 年章嘉·若必多吉因父亲去世再次返回佑宁寺时，他负责迎接接待，并和佑宁寺僧众一起敦请章嘉国师担任佑宁寺法台。1765 年二世嘉木样出任塔尔寺法台，至 1768 年卸职。由于连续担任安多地区几座大寺院的法台，使得二世嘉木样的声望大为增高，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发东行的。

1769 年 3 月，二世嘉木样为请求密多罗灌顶的教法并向章嘉活佛请教五次第的教诫和朝礼五台山，向僧众宣布自己要前往东方。当时拉卜楞寺许多僧人力图劝阻二世嘉木样东行，他都没有接受。在那个时代医学还不够发达，青藏高原上的人到人口稠密、气候炎热的内地，容易染上天花等传染病，所以东行被一些僧人看作是要冒性命危险的大事。拉卜楞寺的僧众为二世嘉木样举行了祈祷寿命绵长的法会，二世嘉木样说："我也是受各种缠缚的凡夫之身，生死岂能自己做主，不过按照神和上师的教导，我还能活上一些年。"以此表示了他东行的坚定决心。在巡礼拉卜楞各佛殿并献供祈愿后，二世嘉木样于 4 月 22 日离拉卜楞寺向五台山进发。法台贝丹扎巴、卸任法台洛桑年扎及各扎仓经师、僧众等数百骑送行到色钦曲喀。协敖、翁则、干巴和各个昂欠的代表等一直送行到黄河边。途中二世嘉木样受到曲玛尔协贡、文都、叶尔雄、甘都、嘉加等寺院僧众的迎送。夏琼寺、塔尔寺僧人在路途设灶迎送，塔尔寺居巴扎仓的僧人还请求他前去塔尔寺，他急于赶路而谢绝。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从佑宁寺赶到白马寺（今青海平安县）搭帐迎送，并赠给二世嘉木样汉地形制的全套冬、夏穿着的袈裟和骡马等。此时，贝子巴图尔岱青及其夫人诺真旺莫、察罕诺门罕的代表和黄河南蒙古亲王的额勒齐（传达命令及对外联络的使者和代表）也赶到白马寺送行。二世嘉木样在白马寺停留两天后，向东北方向趋庄浪，在大通河边受到大通寺僧众的欢迎献礼，他为僧众传授了上师瑜伽等教法，并为七名僧人授了比丘戒，当地首领鲁加也向他献了礼品。此后渡大通河经庄浪到达松山堡附近的达垄寺，达垄寺僧众设灶郊迎并献礼，华热地区（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一带，松山堡即在该县境内）的许多僧俗信徒聚集在此迎候，二世嘉木样为他们摩顶赐福。此后二世嘉木样一行经三眼井进入阿拉善旗的牧地，通格图萨拉克齐（图萨拉克齐为蒙旗官职名，意为副王，为协助王公处理事务的高级助手）奉献了大批物品，并派遣差役为二世嘉木样运送物资，达尔济诺门罕在途中设灶迎接并献大量礼品，阿拉善王（当时的阿拉善王为罗卜藏多尔济，为阿宝次子，乾隆二十二年晋封郡王，乾隆三十年晋封为亲王）派人前来问候并请二世嘉木样在返回时到阿拉善王府。此后二世嘉木样穿过阿拉善南部和宁夏，渡黄河到达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境内，梅林才仁加布等前来迎接供奉，由鄂托克王派乌拉服侍到达鄂托克王的寺庙乌勒祖图苏木，鄂托克王敦罗布扎木素（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三十一年赐郡王品级）和察汉夏茸骑马出迎，寺僧摆队欢迎。二世嘉木样给郡王和僧众传授了教法。鄂托克王先后向二世嘉木样赠银三百两、马九匹、骆驼九峰，并派乌拉送行到准格尔贝子旗。准格尔贝子及寺庙僧人等骑出迎。二世嘉木样在准格尔旗停留四天，传授教法，此时鄂尔多斯郡王旗的车凌王（名车凌多尔济，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

罗郡王)、固山贝子也前来拜见献礼，并建立法缘。准格尔贝子提供途中所需差役，并亲自陪同二世嘉木样前往五台山。以上二世嘉木样从青海白马寺到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行经路线，大致与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进京时的路线相同。

7月，二世嘉木样到达山西原平县的崞阳镇时，受到章嘉·若必多吉的卓尼尔（掌管接待礼宾的侍从）嘉措等人的欢迎。第二天到达五台山时，受到章嘉的侄子丹麻活佛和五台山扎萨克喇嘛为首的马队的迎接，菩萨顶寺的僧人列队把二世嘉木样接入寺中。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当年春天章嘉·若必多吉突然身患一种急性病，虽不久即病愈，但因此决定夏天到五台山严格闭关静修。因此二世嘉木样到达后，章嘉·若必多吉仅单独会见他一人，他祈愿章嘉·若必多吉健康长寿，并献白银五百两和氆氇哔叽等作为见面礼品。7月间二世嘉木样巡礼五台山的各个寺庙，并在七世佛佛殿中闭关静修十四天。他还因章嘉·若必多吉的索本南喀等人的请求，为章嘉·若必多吉的说明佛教各宗派的见地的道歌做了注释。8月间，章嘉·若必多吉结束闭关，按照二世嘉木样的请求，章嘉·若必多吉给二世嘉木样和他的随从传授了多种教法。当时章嘉在五台山的静修地普乐院（似在镇海寺内）的经堂中新建的佛像刚刚完工，章嘉·若必多吉和二世嘉木样一起为佛像举行了开光仪式。在他们二人交谈时，章嘉·若必多吉说："你这次一定要去向皇帝请安。"二世嘉木样回答说："从身体等各方面说，我都还办不到这点。请你设法不让皇帝知道我已经在这里。"章嘉·若必多吉说："你不考虑我现在已是这个岁数了（当年章嘉53岁），对我这个要求也不答应，只怕今后我找你要一本书你也不肯给我吧！"二世嘉木样说："只要您答应不让皇帝知道，我可以按您的心意当您的侍从。"章嘉·若

必多吉显得有些不高兴，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当二世嘉木样请求传授五次第教诫时，章嘉·若必多吉说："等以后到了京城再传授。"二世嘉木样对五台山的各个黄庙（藏传佛教寺院）及和尚庙（汉传佛教寺院）按其大小分别赠送了礼品，还给一些汉族僧人传授了灌顶方面的教诫。

二世嘉木样当时不愿按章嘉·若必多吉的指示去朝觐乾隆皇帝的原因，在《二世嘉木样传》中并没有说清楚，他说的"从身体等各方面说，我都还办不到这点"，有些含糊其辞的意味，所以章嘉·若必多吉也没有接受这一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设想，或者是因为他初到内地，怕身体不适应而不愿立即进京，或者是因为朝觐皇帝需要一份重礼而一时筹办不及，有"囊中羞涩"的苦衷，或者是担心被留在京城而打乱游历蒙古地区的计划，或者是担心留驻京城长期远离拉卜楞寺，寺院内部会出现问题，总之这里留下了一个供研究者猜测的问题。不过，从后来二世嘉木样在1780年积极支持六世班禅到热河朝觐和他自己在1783年上奏乾隆帝请求允许进京觐见而乾隆帝因六世班禅在京患天花逝世之故未予批准等事实看，1769年二世嘉木样不愿去朝觐乾隆帝，并非是对皇帝反感或是对清朝消极抵制，其中的真正原因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离开五台山以后，二世嘉木样因为曲扎布第彦齐以前对他发出的邀请，前往曲扎布第彦齐的寺院，住了一些日子，为以第彦齐为首的学经僧人传授了教法。此后他又到了察罕第彦齐的寺院。后来在该寺院附近的察汉拜新（白房子）遇到了土尔扈特拉仁巴格西洛桑年扎和达尔汉贝勒那木扎勒拉布丹，他们邀请二世嘉木样前去他们的地方，二世嘉木样答应在以后返回的途中前去，达尔汉贝勒提供了乌拉差役送二世嘉木样到多伦

诺尔。此后，又因杜尔伯特王（内蒙古杜尔伯特仅一旗，附于科尔沁部，其封爵为固山贝子，故疑此杜尔伯特王为1753年东迁的西蒙古杜尔伯特部，乾隆帝封其首领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的邀请，前往该王的“兀尔格”（指王公的蒙古包或住所），举行法事活动，传授佛法，得到大批礼品。此时土默特贝子派遣多仁巴阿旺喜饶和一名佐领前来迎请，二世嘉木样答应前往。途中因苏尼特右旗王的邀请，前往苏尼特右旗，苏尼特王（当指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车凌多尔济，乾隆十六年袭爵，但在此年即乾隆三十四年因罪削爵，由其子车凌衮布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不知此处是指他们父子中的哪一位）率数百骑出迎，盛宴款待，献马牛九十、骆驼七十，二世嘉木样按其所求传授了教法。此后途经苏尼特左旗，该旗的托因曲杰准备帐幕迎接，设宴款待，并献白银三百两等物品。途中各王公贵族都按途站派遣差役服侍。到达多伦诺尔后，章嘉·若必多吉的拉章盛情款待，并派人役马匹护送二世嘉木样于11月到热河。当时参卓堪钦为首的热河的喇嘛、执事僧人等骑马到一天路程处设灶郊迎。二世嘉木样到热河后下榻于参卓堪钦所住的大佛寺（应指热河普宁寺，1755年建，仿西藏桑耶寺形制，寺内大乘之阁中有高达28米的木雕千手观世音菩萨像，故俗称大佛寺），为热河各寺庙僧众传授了十一面观世音灌顶法等，为僧人剃度及传授比丘戒，为前来拜见的准噶尔、厄鲁特的僧俗信徒摩顶祝福。此时，二世嘉木样的根本施主土默特哈穆噶贝子（此指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右翼旗，地在今辽宁省朝阳地区到阜新市一带，此贝子全名为哈穆噶巴雅斯呼郎图，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卒）派遣使者和乌拉前来迎请，因此二世嘉木样在12月里前往土默特旗，途中受到喀喇沁曼兰木喇嘛扎西达尔吉的迎

送。抵达土默特旗时，贝子及其属下官员、寺院执事僧人等都骑马出迎，奉献礼品，僧众列队将二世嘉木样迎入寺中驻锡。二世嘉木样及其随从在土默特旗期间的生活等都由喀宁阿贝子(喀喇沁中旗扎萨克多罗贝子）供应。年底，二世嘉木样在贝子专为他的到来修建的寝殿“其美宣努顶康”中闭关静修白度母法七天。

铁虎年（公元1770年）新年时，贝子为二世嘉木样举行了盛大宴会，并演戏助兴。正月祈愿法会期间二世嘉木样数次前往寺院讲经，通常则派随从前来的格西索南旺杰代表自己前去讲经。二世嘉木样为贝子等人传授了总摄轮、大威德等教法，为僧俗多人传授了居士戒和沙弥戒等。这期间每天前来拜见和献礼者达到数千人之多，他都一一为他们摩顶赐福，满足他们的心愿，而这期间二世嘉木样收到的布施有白银三万多两以及无计其数的物品。二月间，二世嘉木样在贝子的两个儿子贡桑阿格和策衣的陪送下前往北京，途中还受到一些王公贵族的迎送。

二世嘉木样抵达北京时，章嘉·若必多吉正住在离北京六十里的香山，于是直接前往香山拜见交谈。章嘉·若必多吉领二世嘉木样及其随从参观了皇帝的寝宫和有各种动物的园林(万牲园)，然后一起进入北京城。二世嘉木样住宿在章嘉·若必多吉的住所嵩祝寺（在今北京故宫东北的沙滩的北面）附近的土默特贝子的宅院内，并到嵩祝寺的旃檀觉卧像前奉献供品和五色哈达，祈愿格鲁派的教法在各方弘扬。在北京的敏珠尔诺门罕、察多尔诺门罕等驻京大喇嘛也各自邀请二世嘉木样到他们的住所，设宴招待并谈论佛法。在三月里，因二世嘉木样的请求，章嘉·若必多吉在嵩祝寺的拉章中为二世嘉木样、敏珠尔诺门罕阿旺赤列嘉措、夏孜诺门罕阿旺楚臣、参卓堪钦洛

桑达杰等百余名学经僧人讲授了关于密法要义的《五次第明灯》，历时十五天。为酬谢恩师章嘉·若必多吉传授佛法，二世嘉木样向他奉献了曼荼罗、佛像、佛塔、黄金三十两、白银一千一百两、缎子二十匹。四月初一，乾隆皇帝到嵩祝寺朝礼旃檀觉卧佛像（当年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他的礼佛可能与祝寿有关），二世嘉木样混在章嘉·若必多吉的侍从僧人队列中，从远处目睹了乾隆皇帝的“金颜”。有时二世嘉木样还换上旧袈裟，扮做一个贫寒僧人到北京街市上漫游，遇到的汉人都起立向他表示敬意。此后二世嘉木样离京时，章嘉·若必多吉设宴为他送行，赠给他三十幅传法上师的唐卡画像、九尊铜佛、白银七百两、库缎及内库哈达等。

二世嘉木样离京后前往热河，受到参卓堪钦和热河僧众的欢迎慰问。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参卓堪钦按二世嘉木样以前的请求，给他传授密多罗百法。在传法的间隙，二世嘉木样还会见了前来拜见的各寺院僧人和准噶尔部的人众，为他们说法传经。此时喀喇沁王喇特纳锡第（喀喇沁右旗，乾隆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四十八年赐亲王品级）母子前来会见赠礼，喀喇沁王还和二世嘉木样一起听受密多罗百法。传法结束时二世嘉木样向参卓堪钦奉献了银质曼荼罗、佛像、袈裟僧具、白银五百两、氆氇哔叽等作为酬谢。此后二世嘉木样巡礼热河的布达拉（普陀宗乘之庙）、伊犁苏木（安远庙）、大佛寺、胜乐颇章（普乐寺）、青庙（溥仁寺）等寺院的佛像，奉献供品，并发利乐佛法及众生的广大誓愿。

这时喀喇沁王喇特纳锡第准备好了乌拉等，迎请二世嘉木样前往。二世嘉木样抵达喀喇沁右旗时受到郡王父子、官员、寺院执事僧人等近千骑迎接，郡王在衙门（王府）举行盛宴款待。二世嘉木样在土观活佛在喀喇沁右旗寺院中的寝舍里住了

十五天，为喀喇沁王等人传授了白度母随许法、大威德十三尊灌顶等教法，喀喇沁王向他奉献了银质曼荼罗、坐垫、靠背、银制八吉祥物、国政七宝、库缎二十匹、白银五百两等礼品。每天有各地前来的数千人请求摩顶赐福，并奉献大量财物。此时拉卜楞寺和黄河南蒙古亲王多吉帕兰木派兰占巴阿旺达尔吉等人携书信礼品前来，他一一写了回信，并给拉卜楞寺僧众写了一封诗体信。此后二世嘉木样应喀喇沁镇国公开丹津达尔扎的邀请前往其住地，住了三天，传授了白伞盖灌顶等教法，还到喀喇沁的图萨拉克齐的住地传法，收到了大量的献礼。此后又应喀喇沁甘珠尔庙的呼毕勒罕喇嘛的邀请到甘珠尔讲经传法，此时前来甘珠尔庙拜见的有将近十万人，因二世嘉木样不能一一为他们摩顶，就用向人群抛洒青稞麦粒的办法为众人祝福。他还为那些请求为在世的和已去世的亲属献礼求福的人做回向和祈愿，僧俗信徒奉献了大量的财物。此后二世嘉木样又应喀喇沁扎萨克公齐齐克的邀请前往其衙门，受到齐齐克及其属官、鼓乐仪仗队列、手执武器的兵队的迎接，他为齐齐克等人传授了白伞盖灌顶、大威德灌顶等，齐齐克等奉献了五十两重的银制曼荼罗、各种银器、上等缎子、有围幛的轿子、白银三百两等。在此居住的十来天当中，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前来拜见。此时喀喇沁左旗的瑚图灵阿贝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四年以旷职降为镇国公，二十年复为贝子）因受皇帝差遣公干不在旗内，但是其属下各和硕的章京等仍派人前来迎请，二世嘉木样应邀前往，受到章京官布扎布等的迎接。二世嘉木样在旗衙门居住了十天左右，传布佛法，得到了大量物品和上千两白银的布施。

当二世嘉木样住在喀喇沁中旗扎萨克齐齐克处时，阿鲁科尔沁旗的达克丹贝勒（雍正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的儿子阿

尔达什第前来拜见，并说："父亲贝勒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请念及以前的旋主与福田关系，务必动身前来。"二世嘉木样说："说得很对，我以前在西藏时差不多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学经僧人时，你父亲让人给我捎来了将近千两银子，对我帮助很大，老贝勒以前就和我有法缘，无论如何我要将去。"因此二世嘉木样在喀喇沁左旗停留后，即在阿鲁科沁派来的图萨拉克齐伯颜觉拉等官员和四十余名乌拉差役的陪同下前往阿鲁科尔沁。途中还应奈曼王（奈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拉旺喇布坦）的邀请前往其乌尔格，传授了随许法等教法，奈曼王奉献了马、牛、白银等大量物品。奈曼夏茸官却坚赞新建了一座寺院，迎请二世嘉木样前去传法两天，二世嘉木样指示奈曼夏茸到拉卜楞寺学经，奈曼夏茸接受，并献银一百两及马、牛三十等物。奈曼地方主要靠饮用井水，因此二世嘉木样指示专门为前来拜见的人打了四眼井，仍然不够使用。他还给前来拜见的察汉寺的僧众传法，还应邀给加布图萨拉克齐、才居克哈屯等人传授佛法。阿鲁科尔沁贝勒又派遣百余人前来迎接，于是从奈曼旗动身前往，当时已是冬天，沿途荒凉，但是仍有许多人聚集在路边等候拜见，仅靠早晚时间接见不过来，因此二世嘉木样在白天歇息时甚至在马上和轿子里也为人摩顶祝福，满足众人的愿望。德唐堪布率五百余骑在途中迎请二世嘉木样到其寺院传法，锡里图喇嘛喜饶顿珠也请求传法，伯颜觉拉献银五百五十两请求传授教法。当二世嘉木样到达阿鲁科尔沁时，受到贝勒、喇嘛夏茸为首的一千余骑以及无数信徒的欢迎。贝勒在府中为二世嘉木样举行盛大宴会。二世嘉木样在贝勒专为他的光临而新修的寝室中住了一个来月，给贝勒、贵族等传授了大威德、普明、观世音的灌顶法、二十一度母随许法等，贝勒等人献银五百两、马牛八百五十、羊六百，各和硕献马、牛三

百五十。他为贝勒作消灾的烧施法事，贝勒又献银百两、蒙古包、马车、带鞍具的乘马四匹等。二世嘉木样以前在阿鲁科尔沁寺院就派有代表格西丹增嘉措，并按拉卜楞寺的规章制定了寺规，二世嘉木样指示要继续保持，并为寺院僧众说法，寺院献银百两、马牛二百。此后二世嘉木样应扎鲁特左旗扎萨克多罗勒锡勒塔剌（乾隆二十五年袭爵）和扎鲁特右旗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衮克扎布的邀请，前往扎鲁特左右旗传法，锡勒塔喇献银三百两、马三十，属下和硕献银百两、马牛三百，衮楚克扎布献马牛数百。从扎鲁特返回阿鲁科尔沁后，达克丹贝勒献给二世嘉木样一处苏鲁克（牧场），并拨给了管理人和牧民。此时，担任乾隆皇帝的内大臣的巴林王（巴林右旗的巴图，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派图萨拉克齐所什彭措克等前来迎请，二世嘉木样说天气太冷，等以后再去。但巴林王随即亲自前来迎请，故动身前往。途中服侍都由巴林王派乌拉承担，巴林扎萨克贝勒、苏拉贝子、噶居玛喇嘛等纷纷邀请到其住处款待献礼。到达巴林王府时，巴林王为首的数百骑出迎，并为二世嘉木样举行了盛大的赛马表演，僧众列队将他接入王府，巴林王设宴款待，各地来拜见的人无计其数。他为巴林王等传授了白伞盖灌顶等教法，还到席力喇嘛的寺院说法，巴林王献大量物品，寺院献银三百两、马三十匹。从巴林返回阿鲁科尔沁后，二世嘉木样又应蒙古尔津寺的察罕第彦齐活佛的邀请前往蒙古尔津寺（该寺在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西南佛寺乡，1669 年建，康熙帝赐名为瑞应寺，素有东藏之称，二世嘉木样在该寺传法的情况，详见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的《蒙古佛教史》），受到活佛和蒙古尔津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的欢迎，活佛向他献银九百五十两。火兔年（公元 1771 年）新年二世嘉木样在蒙古尔津寺度过，按当地习俗

为他举行了“唱戏”等演出，各地前来拜见的超过十万人，以致几天中只能用抛洒青稞麦粒的办法为众人祝福，信徒奉献的财物仅白银一项即超过万两。他因察罕第彦齐的请求撰写了供僧众学习的《七十论摄要》，为僧众说法，并传授白伞盖灌顶及随许法等。二月份二世嘉木样患病，该寺院僧众为他举行了许多法事祈福消灾。病愈后他应邀到该旗贝勒的住所传法，贝勒献银一千两，参领坚赞也因听法献银一千两。阿鲁科尔沁贝勒听说二世嘉木样身体欠安，迅即赶来慰问。三月份土默特贝子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去世，二世嘉木样为他诵经超度，并因其哈吨和儿子的请求到土默特贝子的寺院主持其遗体火化，满足了其亲属的愿望。此后二世嘉木样应翁牛特右旗扎萨克多罗达尔汗岱青贝勒诺尔布扎木素和旺钦托因的邀请前往翁牛特，住于贝勒的寺院中，为贝勒及僧众传授灌顶和教法等，贝勒献银六百两、大缎三十匹、马一百匹。

当时，二世嘉木样已准备启程返回拉卜楞寺，喀喇沁中旗扎萨克公齐齐克带领随从前来翁牛特设宴饯别，并献长九尺、宽七尺的弥勒佛唐卡像、带锦缎华盖的新制蒙古包一座、房屋形式的布帐房一顶、带银辔银缰的白骆驼、白银二百两等送行。二世嘉木样动身后，又应乌珠穆沁左旗贝勒的邀请前往该旗，途中巴林王又邀请到该旗住了几天，仍像前次一样供奉，阿鲁科尔沁贝勒前来赠礼送行。二世嘉木样在巴林王和阿鲁科尔沁贝勒陪同下到达乌珠穆沁左旗，受到贝勒（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勒达什衮布）等人的欢迎，他在此住了十天，为贝勒等传授灌顶和随许法等，贝勒献银五百两、马一百匹、羊千只。由此又应邀前往乌珠穆沁右旗，为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朋素克喇布坦传法数天，亲王献白银千两、骆驼五十、马百匹、羊两千只。他还到该旗呼毕勒罕喇嘛的寺院传法。六月间，他应阿

巴嘎左旗达尔汉贝子的邀请前往该旗传法，贝子等献银五百两、马二十匹。

此时，二世嘉木样听到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此为三世哲布尊丹巴，1758年生）和章嘉·若必多吉住在多伦诺尔的消息，就在7月前去会见。他住在多伦诺尔东寺，每天到章嘉活佛身前听受佛法。有一天他向章嘉活佛献银一千两，请求说："我得到的任何财物，从未为自己用过一星半点，但是想到这些都是别人为了请求保护生死而送的，我也（对生死）感到害怕，因此我这一辈子的生死之事都请您给予护佑。"章嘉活佛大笑着说："你感到害怕，难道我就不害怕吗？"二世嘉木样去拜见哲布尊丹巴时，坚白多吉诺门罕、格根诺门罕、墨尔根诺门罕都在门外迎候，进入屋内后给他铺设坐垫，给予很高礼遇。他向哲布尊丹巴献了坐垫、靠背、白银三百两等物品。三位诺门罕分别在自己的寝帐中宴请了他。当时传来拉卜楞寺的根本施主黄河南蒙古亲王多吉帕兰木去世、承袭爵位的人选难定的消息，二世嘉木样即给任清朝内大臣的巴林王等人写信，说应由多吉帕兰木的堂弟南左中旗扎萨克阿达尔吉（汉文史料记为纳罕达尔吉）袭爵，请他们给予协助。不久后阿旺达尔吉袭爵为多罗郡王。哲布尊丹巴赐给二世嘉木样银一百两、马九匹、骆驼九峰、狐皮等物品。

8月份，二世嘉木样离多伦诺尔，因苏尼特左旗郡王和托因曲杰以前的邀请前往该旗，郡王献骆驼十峰、马牛八十、羊三百，属下和硕献骆驼六十，托因曲杰献银五百两、骆驼八十。此后经苏尼特右旗，勒扎布台吉献银五百两、马、驼二十。由此前往杜尔伯特拉布吉拉仁巴的寺院传法，寺院献银三百两、马、骆驼七十。由此前往喀尔喀右翼旗传法，该旗的贝勒庙（即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百灵庙）向他献银曼荼罗、坐

垫、靠背、骆驼十二、马牛六十、羊五百，各和硕献马一百五十、骆驼十六。9月份，二世嘉木样经过青城（呼和浩特）到达察罕第颜齐的寺院传法，在此居住时黄河南蒙古亲王旗的阿旺达尔吉到北京得到准许承袭郡王爵位后返回，与二世嘉木样在此会见，设宴款待二世嘉木样后，阿旺达尔吉先期返回青海。此后二世嘉木样又到曲扎布第颜齐的寺院传法，11月时乘黄河结冰过黄河到达准格尔旗，住于巴嘎召庙，准格尔贝子献银五百两、马八十、牛七十等物品。此后经过杭锦旗、鄂托克旗时，受到杭锦贝勒、鄂托克贝勒的宴请和迎送。二世嘉木样由鄂托克旗过黄河前往阿拉善，到达王府附近时应达布根卓诺门罕（阿拉善广法寺活佛）的邀请前往他的寺院传法。由阿拉善王派遣乌拉人役，护送二世嘉木样到三眼井。到达松山堡附近时，二世嘉木样受到达垄寺僧众的欢迎，前往该寺供斋僧茶、发放布施。此后在途中名叫新店的地方过水龙年（公元1772年）新年，当时二世嘉木样听到西藏的达擦济咙活佛前往汉地正住在塔尔寺的消息后，派人送去白银五十两及绸缎等礼品。二世嘉木样到达平戎驿（今青海平安县）时，受到东科尔活佛、黄河南蒙古郡王阿旺达尔吉、塔尔寺僧人的欢迎，到达巴燕城（今青海化隆县）时受到拉卜楞寺的代表的欢迎。到达色钦曲喀时，拉卜楞寺各扎仓的堪布、活佛、执事僧人等前来迎接，拉卜楞寺及各属寺献牲畜近千只接风。一月十一日，二世嘉木样在两千僧众列队及上万僧俗信徒簇拥下回到了拉卜楞寺。

综观二世嘉木样东行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他的这次出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间长，从1769年初到1772年初，差不多整整历时三年。二是范围广，先后到了阿拉善、鄂尔多斯、五台山、北京、热河、土默特、喀喇沁、巴林、阿鲁科尔

沁、扎鲁特、苏尼特、乌珠穆沁、多伦诺尔、呼和浩特、百灵庙等地，足迹遍及内蒙古大部。不过从地域上看，他的重点是在内蒙古东部的卓索图盟和巴林、阿鲁科尔沁一带。可能因为他的东行并未经清朝批准，所以与清朝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尔沁、敖汉各旗以及受清朝直接管理的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各旗都没有邀请他，他也未能前往，因此还不能说他是“遍游内蒙古四十九旗”。三是接触人物多，除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外，他还结交了许多内蒙古寺院的蒙古族活佛和僧人，与许多蒙古王公有了较深的交往。四是活动多样，有学经、传法、朝礼佛教圣地、游览皇家园林等，甚至还有为人超度火化、为黄河南蒙古郡王争取承袭爵位等。五是在这次东行中获得了大量的布施，仅据有记载的数字测算，所得银两当在二十万两左右。由于他的这次东行，使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也为他在拉卜楞寺的寺主地位的巩固和拉卜楞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二世嘉木样的这次东行还扩大了拉卜楞寺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增强了拉卜楞寺和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和经济关系，因此对其重要意义还应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原载《安多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历史文化篇

简论青藏高原文化

在中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当中,完全未曾注意到青藏高原这一广大区域的,恐怕为数很少。把青藏高原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地域文化研究课题,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一方面,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深刻地影响着高原的经济生产活动和高原居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它的文化具有许多与高原以外的其他地域明显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青藏高原虽然地域十分广大而且交通十分不便,但是研究者通过对比仍然可以发现,青藏高原各个地区的居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存在着许多作为基础文化的共通的内容。与此同时,青藏高原的文化又以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征地区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使自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此外,人们还很容易注意到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农业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亚沙漠绿洲文化、南亚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由此青藏高原文化又具有了若干综合性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研究中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把青藏高原的文化作为一个类型,将其命名为青藏文化其实应该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怀有深厚的偏爱之情,许多次社会的重大变动是以“文化运动”为其先导而发动的,从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运动”到近年的“文化热”,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是,对于“文化”的界定和内涵,文化的宣传者和研究者们却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理解。本书是讲述作为中华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的青藏文化,首先需要对我们理解的“文化”的含义和与之联系的“青藏文化”作一简要的说明,以便求得读者和本书的作者在许多基本的出发点上的认同。

对于“文化”的定义,现今中国最权威的两部汉语词典即有不同的解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解释说:“文化 1.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2.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例如‘学文化’就指的是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也是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3.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则说:“文化 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 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 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正因为“文化”在范围上可以大到“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又可以泛指一般知识，所以在实际的运用上，文化在具体的场合中往往有其一定的含义。同时，“文化”又是一个亲和力极强的名词，它可以与许多词语结合起来表达与文化有关的各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概念涵盖的广泛性和使用“文化”一词的人们往往带有自己的主观的某种设定，就造成“文化”在使用时的含义的多样性。“文化”与历史的各个时期结合，就有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之分；“文化”与国家结合，就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之分；“文化”与民族结合，就有汉族文化、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回族文化、满族文化之分；“文化”与宗教结合，就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萨满教文化之分；“文化”与经济产业结合，就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狩猎文化、渔业文化之分；“文化”与阶级的划分结合，就有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小资产阶级文化、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之分；“文化”与国家的性质相结合，就有帝国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殖民地文化之分。在当今的时代，“文化”有了更多的类别，新的与文化有关的名称不断地涌现出来，例如“都市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企业文化”、“影视文化”、“餐饮文化”、“商业文化”、“节日文化”、“礼仪文化”、“休闲文化”等等。甚至近年来出现了“酒文化”、“茶文化”、“雅文化”、“俗文化”、“巫文化”等令局外人不易掌握其准确含义的专门名称。

审视了各方面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对于“文化”的各种划分方法以后，我们再来看与青藏高原这一片特定的地域相联系的“青藏文化”。从广义上说，青藏文化应当是古往今来的青藏高原的居民在高原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到本书中，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且可以大致规定其范围的青藏文化，是指历史上活动在青藏高原上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综合，是这些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说的物质财富，包括高原的居民所创造或加工的各种物品，即各种地下发掘的文物和地上遗存的建筑物、水利工程、石刻造像、堆砌物、各种艺术品、神像、法器、生活用具、装饰物品以及书籍写本等，这里所说的精神财富，包括高原居民所创造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制度以及他们原有的和接受发展了的宗教信仰等。当然，要对这样一种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介绍，任何一部巨著也是难以胜任的，更何况本书的作者本身也正处在逐步积累对青藏文化的知识的阶段，因此，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将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青藏文化的各个主要部分的知识，对读者们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帮助读者了解青藏高原，了解青藏高原的悠久历史，认识青藏高原绚丽的文化。

在分章介绍青藏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前，有必要对青藏文化的总的特征作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便读者对青藏文化有一个大致的总印象，在阅读各个章节时能够基本了解各章叙述的文化现象的大背景，把青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

一

首先,青藏文化在地域上是依托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它是一种真正的高原文化,带有明显而又深刻的青藏高原的烙印,因此认识青藏文化首先需要认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将近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同周边的外围地区相比,它们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高度。海拔这样高、面积这样大的高原,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地形上看,青藏高原是西面和南面较高,逐渐向东、向北倾斜,山脉和河流多数是东西走向,只是在川西地区横断山脉和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是南北走向。高原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陡降,很快与印度炎热潮湿的恒河平原相接,气候和自然景观相差悬殊。而在西面、北面和东面,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相连接,气候和自然景观逐步过渡。由于海拔高,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所以青藏高原气候寒冷而且干燥。拉萨一月平均气温为-2.2℃,七月平均气温为15.1℃,那曲一月平均气温为-13.9℃,七月平均气温为8.9℃,绝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10℃以下,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都比同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10℃~15℃。整个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无霜期短,拉萨和日喀则为120~180天,那曲地区仅有60~80天,没有严格意义的夏季。年平均最低气温低于0℃的天数,西藏拉萨为173.3天,日喀则为189.7天,那曲为276.9天,青海果洛大武镇为266.4天,四川甘孜康定为184.2天,阿坝马尔康为209.6天,而年平均最高气温高于10℃的天数,大部分地

区在50天以下，最高的也不到180天。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7、8两个月，年降水量拉萨为453.9毫米，阿里噶尔镇为60.4毫米，那曲为406.2毫米，青海海西德令哈为119.2毫米，柴达木盆地西部在60毫米以下。冬春多暴风雪，夏秋多雷暴、冰雹，那曲年平均雷暴日在85天以上，雹日在35天以上。青藏高原又是多风的地区，年平均大风（8级以上）日数拉萨为32.4天，日喀则为59.3天，而那曲和阿里的牧业区为100—150天，最多的地方可达200天。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青藏高原的植被呈垂直分布，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有森林，再往上依次是灌丛草甸、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雪线以上的高峰峻岭，终年冰雪覆盖，为大片的雪山冰川，类似地球南北两极的景观。从整体来看，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不适宜农耕，只有少部分气候比较温暖的河谷可以发展高原灌溉农业，大部分地区为牧业区。青藏文化正是建立在高原游牧业和高原河谷地带的灌溉农业的基础之上的。

从地理环境看，青藏高原的农牧业分布地域辽阔，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积有限。广大草原牧草生长季节短，产草量低，载畜量低，而且多风雪灾害，生产很不稳定。农田必须有水利灌溉，庄稼才能生长成熟，因此耕地分散，而且一年只能一熟。因此高原的农牧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农牧民在高寒缺氧的荒野中必须用加倍的辛勤劳作乃至生命的付出来取得并不丰裕的食物和衣物，维持自己非常简单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每一年的农牧业生产都是高原居民与大自然的一场严酷的斗争。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的各个民族，正是在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与严酷的自然条件不断地艰苦拼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年复一年的从不间断的艰苦拼搏，养成了高原居民勇敢勤劳、粗犷豪迈的性格和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每一点赐予、适应

严酷的自然条件的生存智慧,发展了适应高原自然特点的多种农牧业生产技能,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培养了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爱惜每一件有用的物品、爱护动植物生命的精神。每一个初到青藏高原的外地人,除了对高原大自然雄奇的风光的由衷赞叹之外,都会对高原居民生活的艰苦和他们乐观豪放的生活态度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简单粗放的农牧业生产,又决定了高原居民的生存依赖社会的集体组织。单个的家庭和个人,在高原的农牧业生产中难以立足。牧业生产虽然必须定期轮换草场,具有游牧的形式,但是草场由各个部落分割占有,牧民只能是某一个部落的成员,使用部落的草场,同时对部落尽成员的义务,接受部落首领的严格统治。农业生产的基础是耕地和水利灌溉设施,而耕地和水源由部落或封建领主所占有,农民成为领种土地并对领主承担封建义务的农奴。青藏高原上的游牧部落起源很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的羌人部落,还在商、周时期就已发展到关中、陇西,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十分关注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唐代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兴起,与唐朝争雄达200多年。唐朝以后,青藏高原大大小小的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各种地方政权延续了1000多年。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青藏高原的居民创建了丰富多彩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氏族部落制度、封建农奴庄园制,各种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有序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法律法规,以及对祖先的崇拜祭典和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仪式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的礼仪道德、风俗习惯等。佛教的传入和上千年的广泛传播,更使得青藏高原的社会制度文化具有了十分独特的内容,例如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

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并没有阻止高原居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和创造，恰恰相反，物质财富的不足和生活的艰难沉重，使高原居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在高原，社会文化活动很容易得到各阶层男女老少的热情参与，部落的祭典、寺院的法会、名人的光临乃至一个家庭的婚礼，都可以成为社会盛大的节日，成为社会各阶层成员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文艺才能的场合。与大自然充分融合和依傍着雪山蓝天，又使高原居民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灵性，使他们相信在自己身边有一个真实的神灵的世界存在。神山圣湖固然是神灵居住的场所，天上地下和河流、森林、草原，也有着自己的神奇世界，就是在普通的百姓家中，也有自己的神灵(家神、灶神)相伴。一个人的一生中有生命神、父神、母神、家神、舅神等五守护神陪伴和护佑他，离开了这些神灵，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佛教的传入并在青藏高原上形成藏传佛教，又把佛教的神灵系统和青藏高原原有的神灵世界结合起来，发展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神灵体系。高原居民精神文化的创造，在后来无不与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笼罩上一层宗教的外衣。文学故事、诗歌、格言、绘画、雕塑、戏剧都以宣扬佛法作为主题，而这种文化创作的本身，被看作是佛法修行之一种。宗教使得精神文化作品能够最广泛地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同时也给精神文化作品造成了格式化和类同。文学作品多取法于佛经的佛传故事和菩萨本生故事，绘画雕塑则严格遵照佛教的造像量度经，而寺院中年复一年地进行思辨讨论的是佛陀所说的真谛和哲理。遍布青藏高原的佛寺，随处可见的佛像、佛塔，难以数计的经籍，一个又一个世代传承的转世活佛，还有僧众、施主、信众，造成了雪域高原巨大的佛教氛围。可以说，佛教这样深入地控制和影响一片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又这样延续达千年之久，就是在佛

教的发源地印度也是十分罕见的。

二

今天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藏、汉、羌、回、土、撒拉、蒙古、门巴、珞巴等民族，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青藏文化包含了这些高原居民各自的民族文化。在这些民族中，藏、羌、门巴、珞巴等民族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一直在高原繁衍生息的民族，撒拉族和土族是从外地迁入后在青藏高原形成的民族，汉族和蒙古族是从外地迁入而其民族主体不在青藏高原的民族。这些民族无论是世居高原的民族还是迁入高原的民族，都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从历史看，藏族文化显然是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在一般情况下，本书所说的青藏文化指的就是藏族文化。

我们说藏族文化是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是基于以下的几点理由：

1. 无论从人口和居住地域面积看，藏族都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和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而门巴族、珞巴族始终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今天的羌族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则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2. 从历史的角度看，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最悠久。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各个民族中，藏族的传说和古籍中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

的。还有的传说认为是由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传出西藏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附近。藏文《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说,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 khams)之地,而"博巴"(bod)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最初活动的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使用火的出现,增强了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增加了人类食物的种类,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养成畜群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才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以奶酪肉食为主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草场,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汉文史料解释为西方牧羊人)和西羌部落。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有许多前后加入到黄河中下游的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为藏族。从各种文字的史料记载看,一直到 13 世纪中叶蒙古汗

国的骑兵进到拉萨以前,以雅鲁藏布江流域和江河源为中心的青藏高原的主要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都是藏族世代居住的区域,外民族没有大规模进入过这些地区。而是不断有青藏高原的部落群东进南下北上,向各个方向发展。

3. 从文化的角度看,正是藏族人民创造和发展了青藏高原的文化,并向东、向北、向东南传播这一文化,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族文化从汉代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东部,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代以来蒙古族的文化对青藏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进入青藏高原的汉、土、蒙古等民族受到藏文化的强烈的影响,甚至蒙古族、土族接受了藏传佛教,在文化上与藏族有了许多共同的内容。而从元代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回族、撒拉族,虽然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在几百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文化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农牧业生产和物质文化方面具有青藏高原文化的色彩。

当然,我们说藏族文化是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并不是说青藏文化就完全等同于藏族文化。青藏文化是青藏高原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各个民族都为青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考虑到青藏文化的民族构成的特点,本书以主要的篇幅论述藏族的历史文化,以其作为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同时以专章介绍青藏高原南沿的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文化以及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土族和撒拉族文化。

三

青藏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青藏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交流史。如上所述，青藏文化是在青藏高原上产生和发展的具有自己的强烈的地域特点的高原文化，但是在强调青藏文化的地域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青藏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与外部隔绝的封闭的文化，而是一种开放的与周边地域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外向型文化。青藏文化的外向性，是由青藏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高原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决定的。青藏高原的农业起源很早，在有水利灌溉的条件下，可以旱涝保收，是古代青藏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高原农业也存在一年只能一熟、作物品种少的缺陷，而高原畜牧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产品的交换，牧民需要以多余的畜牧业产品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除了在高原内部的农牧产品交换以外，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青藏高原地区以马牛羊、皮毛和土特产与中原地区交换茶叶、丝绸、铁制品的贸易，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的经济贸易也在不断地发展。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就有了“互市”和“贡赐”的形式，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以后，以其全力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就是为了控制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利益。宋代开始“茶马贸易”成为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经济交往的集中表现，由中央王朝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

在经济交往密切发展的同时，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国外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印度的佛教文化对青藏地区的影响，甚至把藏族文化描写为印度佛教文化的一个分支，这种说法是很不

准确的。我们知道佛教传入吐蕃最初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在世的时期,而在此之前青藏高原的居民早已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古代文化。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于喜马拉雅山南面的印度次大陆的气候与青藏高原有很大的差异,在古代印度和青藏高原之间的交往是很少的。印度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从阿富汗、克什米尔进入印度的入侵,记载了佛教向锡兰等海岛的传播,但是极少提到在它北面的雪山之中的青藏高原。本世纪以来在青藏高原多处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丘墓葬,与印度恒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相差甚远,而与祖国黄河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古文化遗址接近。藏文苯教古籍《塞米》、史籍《汉藏史集》、《智者喜宴》关于青藏高原的远古传说都提到高原古人类和东方汉地的交往,而没有与远古印度交往的记载。据藏传佛教宗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从一开始就有从汉地传入和从尼泊尔印度传入两个方向,汉地佛教的禅宗在吐蕃王朝的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经过吐蕃王朝朗达玛赞普灭佛,10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的过程中,同样有受到汉地佛教重要影响的"下路弘法"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又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中原王朝的扶植下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为藏传佛教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而与此同时的印度,佛教从8世纪开始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打击下就走向衰落,在12世纪印度出现伊斯兰化以后,能够与伊斯兰教抗争的只有印度教,佛教在印度已经接近绝迹。因此很难说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完全是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认为,印度佛教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对藏族文化的发展确实在宗教教义和宗教艺术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连带地对藏族的语言学、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

响。这一影响从10世纪末到13世纪中叶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两个时期,印度有一些佛教高僧到西藏地区传播佛教,西藏也有一些高僧到印度和尼泊尔去学习梵文和佛教,但是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以后,由于印度佛教衰落,不再有印度的佛教僧人入藏,也没有著名的西藏高僧到印度去求法和学习。从11世纪西藏地区佛教再度弘传开始,藏传佛教出现了教派,各个教派把对佛陀的崇拜和对本教派的祖师的崇拜结合起来,并吸收了许多青藏高原的民间神灵崇拜的形式,发展成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出现,可以说是藏族僧俗各个阶层人士在宗教文化上的重大创造。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还发展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对于13世纪以后的印度次大陆来说,藏传佛教对于印度佛教是学生远远超过了昔日的老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古代的文化交流史,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需要进行深入地探讨。不过从青藏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有这样几个重要的阶段。从远古到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群向东、向北、向东南的迁徙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与祖国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云贵高原的滇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进行过长达几千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单位分散地进行的,而且以物质的交换为主要形式,并与古代部落的迁徙、分化、融合交织在一起。这一时期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物质生产水平与周边地区相比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高于周边地区,例如麦类作物的种植和麦种的培育、动物的驯化和畜群的牧养(特别是羊群的牧养和牦牛的驯化、牧犬的培育等)、引河水灌溉农田的技术以及砌石建筑技术等,还有高原特产的玉石、麝香、大黄等产品,成为青藏文

化向周边地区传播并与这些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可以说这一阶段青藏高原的对外文化交流输出大于输入,是青藏高原在文化上贡献于中华文化的时期。从汉文文献记载看,这一阶段虽然由于青藏高原部落分散没有形成较大的政权而影响了这种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但是从中国治水的圣人大禹生长于西羌的传说以及《山海经》所记载的周穆王西行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故事和春秋时期秦国拓地西羌而富强的记载看,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对中华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的。

从公元7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的吐蕃王朝时代是青藏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青藏高原与外部文化交流飞速发展的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的联姻、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的联姻,以及吐蕃王朝与吐谷浑、突厥汗廷的通婚、吐蕃王朝与南诏的结盟和争战、吐蕃王朝与唐朝之间长达200多年和好与大规模的战争,表明青藏高原地区以一支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加入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青藏高原上统一政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而且使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双向性的,即青藏高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吐蕃王朝的扩张继续向周边地区传播,同时汉地的中原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能够突破部落群的壁垒而传播到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深刻影响青藏高原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最丰富多彩的一章。吐蕃王朝与唐朝的经济往来的规模是以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汉地出产的绸缎和茶叶受到吐蕃君臣上下的普遍喜爱,而吐蕃的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不断流入唐朝都城长安。在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方面,吐蕃与唐朝的相互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吐蕃

王朝的官职制度受到唐朝的影响，而吐蕃妇女的服饰和吐蕃盛行的体育运动马球也传到了唐朝都城长安。安史之乱以后吐蕃王朝占领陇右、河西、安西四镇100年左右，统治了上百万的汉族人民，这又极大地增进了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可以说是当时汉藏文化和中亚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震惊世界的古代文物瑰宝中，汉、藏两种文字的写卷数量最多，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敦煌文化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而这个巨大的古代文化宝库就是青藏高原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中亚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特别是汉、藏两大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此外，吐蕃王朝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吸收佛教，也是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佛教受到吐蕃王室的尊崇，以其庞大的神佛体系和严密的教理思想出现于吐蕃社会，适应了吐蕃王室建立统一的政权体制、将分散的长期互不统属的部落群熔铸为同一个民族的政治需要和迅速扩张的国势，对于打破部落分散的神灵崇拜和部落贵族的传统势力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在佛教和苯教的反复激烈的竞争中，吐蕃王室总是作为佛教的支持者出现，并以行政的力量强行推行佛教。特别是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寺院和剃度僧人，推进了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文的规范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藏族的建筑艺术和绘画雕塑、文学的发展。吐蕃王朝的政治统一和佛教的传入并战胜苯教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广泛的宗教信仰，确定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以后的上千年的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由于吐蕃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赞普朗达玛的灭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吐蕃王朝9世纪中叶彻底瓦解，接着而来的青藏

高原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时期长达400年之久。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这一时期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通过在甘青河湟地区建立藏族的地方政权——唃厮啰政权以及唐朝时从青藏高原北迁的党项部落建立的西夏王朝，青藏高原和宋朝仍然保持着相当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唃厮啰政权的文化直接继承了吐蕃王朝的文化，西夏王朝的文化则具有青藏高原游牧部落群的文化的鲜明特征，同时由于地域更接近汉族地区，这两个政权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比吐蕃王朝更加深入。特别是西夏王朝幅员万里，控弦数十万，与宋、辽、金成为鼎立之势，为时近200年。比较西夏王朝和吐蕃王朝的经济文化，可以说西夏王朝的文化是青藏高原文化在与中原汉文化更密切交流的基础上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展现了青藏高原文化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西夏王朝的文化又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青藏高原文化的发展，西夏王朝接纳了西藏佛教复兴后出现的藏传佛教的一些重要教派的高僧到西夏传教，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这些教派的发展，使得西夏王朝和唃厮啰政权一样，不仅在它们活跃于祖国西北地区的二百年间成为青藏高原保持与祖国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成为使吐蕃王朝文化与元代以来的青藏高原文化相联系的桥梁。此外，在这一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致力于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联系，迎请阿底峡大师入藏，维系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表现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从公元13世纪40年代开始，蒙古汗国(即后来的元朝)统一了青藏高原，这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此后的700多年中，青藏高原在中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国家的统一使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藏、汉、蒙古、满文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地方政权,包括西藏地区的萨迦政权、帕竹政权、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藏族地区的土司政权,或者是在中央王朝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或者是掌握一片地区的政教权力以后取得中央王朝的承认和支持的。这些地方政权的首领都得到中央王朝的封赐和印章,作为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凭据,这些首领的继承还要得到中央王朝的批准和承认,才算合法。在这一时期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青藏高原上生息繁衍的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也都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青藏高原和全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经济文化的扶植,使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在深厚牢固的基础之上,其范围和深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要论述这一问题,需要专门的著作才能承担。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突出的方面:

1. 从元朝到清朝中期是青藏高原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时期,在翻译佛教经典为藏文的基础上,藏族学者写作了大量的自己的著作,从萨迦派的萨迦五祖开始,保留下来的藏族学者的个人著作文集达 200 余种,包括了宗教哲学、佛学、语言学、诗词学、文学、历史学、工艺学、藏医药学、宗教图像学、历算学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学科中都可以看到青藏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其对青藏高原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2. 人员交流的规模和规格也是此前的时期难以比拟的。这一时期中从青藏高原到过中原内地的藏族政教领袖,元代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恰那多吉、达玛巴拉以及历任帝师等,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噶玛巴·攘迥多吉、噶玛巴·乳必多吉、

蔡巴·贡噶多吉;明代有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噶玛巴·得银协巴、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等;清代有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等。除此之外的官员、高僧、商队、贡使、使臣、工匠等难以计数。据文献记载,元代在京城大都的藏族僧人,常有上千人之多,明朝曾几次清查在北京的藏族僧人,结果统计人数达 3000 人,清代住在北京的藏族僧人也约有此数,还有八大住京呼图克图之说,而西藏、青海、四川藏族地方首领的贡使有时也一次就达上千人之多。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到呼和浩特时其随从有 3000 人之众。而前后从中原王朝到过青藏高原的著名人物有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儿子真金皇太子、西平王奥鲁赤,清朝康熙皇帝的儿子允祯、果亲王允礼、乾隆皇帝的亲信大臣福康安,还有历任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等。元、明、清三朝都在青藏高原上驻兵屯守,元朝和清朝在西藏地区也有常驻军队。而在同一时期,西藏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人物去过印度,印度也没有重要的佛教高僧到西藏传教。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有一些印度人先后到过西藏,他们或者是带来恒河水的印度教徒,或者是带来梵文语言学著作的语言学者。两相比较,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血肉联系是十分突出和明显的。

3.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和来往人员的频繁,在唐代"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元、明、清三朝都十分重视建立青藏高原上的驿道,设置驿站,并为驿站建立了差役征发制度。在高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克服各种困难,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交通通道维持下来,而且规模逐步扩大。

4. 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前期,蒙古族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蒙古皇室将西藏地方统一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的同时,从元世祖忽必烈

开始的元朝皇帝都崇信藏传佛教，努力接受藏传佛教文化。明朝前期皇室也崇信藏传佛教，清朝满族皇室也崇信藏传佛教。而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和硕特部固始汗、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策妄阿拉布坦、土尔扈特部阿玉锡汗等人更是崇信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会见，并与之互赠尊号，传出“达赖喇嘛”的名号，使藏传佛教格鲁派广泛传入蒙古各部。固始汗率兵进入青藏高原，在明末清初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西藏地方的格鲁派和蒙古和硕特部联合掌权的甘丹颇章政权，而甘青川藏族地区的大部分则由和硕特部统治。到清朝统治青藏高原以后，留驻青藏高原的蒙古族有一部分融合到藏族和汉族之中，剩下的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文化上与藏族有许多共同之处。

5. 随着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青藏高原的文化有几次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元代蒙古皇室崇信藏传佛教，在都城大都和上都、五台山，甚至江南的杭州都建立过藏传佛教的寺院，使藏传佛教宗教仪式和造像艺术等传播到这些地区，而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使藏族的文字学影响到全国，这是青藏文化一次大规模的向外传播。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由于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青藏高原的文化再次向外传播，在内外蒙古、新疆甚至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藏传佛教成为占首要地位的宗教，藏族的文字经典、造像艺术、绘画、音乐舞蹈等也影响到这些地区。而满族皇室的崇信藏传佛教，则使北京的香山、圆明园、颐和园乃至皇宫中都有藏传佛教的寺庙和佛像、佛塔等。西四白塔寺的白塔、北海公园的白塔、颐和园的佛香阁，常常被人们作为北京古代建筑的象征，但是这些建筑恰恰都与藏传佛教有关。乾隆皇帝将其父亲的雍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的正规寺院，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雍和宫。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随着青藏高原本身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一时一事来看,这些交流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全面来看,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交流向东向北倾斜的特点。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和祖国各民族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了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

四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青藏高原的文化是建立在高原的灌溉农业和草原畜牧业的基础之上的,依靠这样的经济基础,青藏高原的古代居民创造过十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并且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清朝的逐渐衰落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农业生产凋敝,而且相比之下青藏高原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又落后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并且这种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清代中期以来青藏高原经济文化落后的原因,学术界进行过一些探讨,归纳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青藏高原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和畜牧业,但是青藏高原的高寒干燥的自然地理条件又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限制极大。在农业方面,由于无霜期短、降水少、依赖人工灌溉,同时耕地集中在地势不平的河谷地带,因此耕地难以扩大,以西藏为例,总面积达 120 万平方公里,而

1952年耕地总面积只有245万亩,仅相当于内地一个专区的耕地面积。农作物品种单调,只能种植青稞、燕麦、豌豆、马铃薯、春小麦等作物,而清代对于内地农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引进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不能种植。由于高原农业生产规模小而且分散,新的种植技术难以推广。在畜牧业方面,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养羊业和纺织业,青藏高原的养羊业历史悠久,羊毛产量大,羊毛的输出曾经给青藏高原的畜牧业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是由于没有毛纺工业的结合,加上高山草原产草量低,人工种植牧草困难、交通不便等原因、青藏高原的畜牧业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青藏高原虽然有丰富的盐、芒硝、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铅、锌、铜、黄金等矿藏,但是缺少煤炭资源,石油集中在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开采运输困难,西藏、青海、川西藏区虽然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但是需要很大的投资和重型设备才能开发。青藏高原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内部交通不便,又地处内陆,距离出海口数千公里,需要经过长途陆路运输,而青藏高原的农牧业、工业生产规模小,运输成本高,公路、铁路建设都困难极大。这种自然地理条件造成的缺乏工业能源和内外交通运输的困难,使得青藏高原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严重阻碍着青藏高原近代工业、农牧业经济的发展。

2. 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制度的落后也极大地妨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清朝的封赐下成为西藏土地和牧场的所有者,并把土地和牧场封授给贵族和寺院,西藏地方政府和贵族、寺院被称为三大领主,贵族和寺院各占有耕地的30%,西藏地方政府占有耕地的40%,农奴没有土地,只能领种三大领主的土地(称为差地),并

为此向三大领主承担繁重的地租和劳役。在甘青川牧业区,牧场虽然在名义上属于部落所有,但是由于部落头人和牧主占有大部分牲畜,牧民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牲畜,所以牧场使用权实际上归头人和牧主所有。除此之外,农牧民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和部落头人,没有迁徙、择业的自由,被领主牢固束缚在庄园和部落中,被迫支应差役,缴纳人头税,受地租高利贷的盘剥,生活贫困,生产积极性很低。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的上层僧人和大寺院在社会上拥有极大的权势,政府的许多关键职位由佛教僧人担任,控制着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除一部分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外,大部分供给贵族统治者消费和供养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出家僧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宗教法事活动和建筑寺庙、塑造佛像等,极少投入社会再生产,因此几个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只能艰难地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社会生产难以发展。

3. 宗教影响的深厚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造成社会思想的禁锢,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保守思想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佛教僧人把宗教的追求和佛法的修行作为全社会的追求目标,禁止一切非佛教思想的传播。在藏传佛教严密的思想统治下,被佛教僧人视为异端的近现代的科学思想、民主思想、经济思想都很难在青藏高原扎根生长。追求解脱尘世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把自己生活的改善的希望寄托于佛和菩萨的慈悲和法力,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近代的学校教育在青藏高原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各种原因儿童入学率极低,而成年人中识字的极少,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用各种办法兴办学校,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学校教育的落后,成为阻碍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长久性因素。

4.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青藏高原经济文化落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入青藏高原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天主教教士向西藏传教的活动,这是西方列强图谋控制青藏高原的先兆。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平原后,就力图打开通往青藏高原的贸易渠道。在英国统治印度并把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纳入其势力范围后,为巩固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从西南打开中国的门户,与俄国争霸东亚,加紧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在遇到清朝政府的反对和西藏僧俗大众的坚决抵抗后,英国帝国主义在1888年和1904年两次发动侵略我国西藏的战争。而俄国为侵略蚕食我国北部边疆,也图谋进入青藏高原。帝国主义的侵略对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除了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直接破坏之外,还在几个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在经济上英、俄的工业产品和枪械军火输入青藏高原,而青藏高原的羊毛、皮张、沙金、麝香、药材等大量外流,破坏了青藏高原固有的农牧交换渠道和手工业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内地军阀混战,经济遭到破坏,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造成中国国内民族之间的不团结,在青藏高原,军阀的割据混战也是连年不断,英帝国主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它培植的西藏少数亲英分子控制西藏地方政权,使西藏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西藏地方政府大力扩军备战,青壮年除大批到寺院出家为僧之外,还有许多人被迫从军,脱离农牧业生产,沉重的军费加重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使得农村牧区经济凋敝,文化教育事业很难得到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从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青海省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到10亿斤,1957年达到13亿斤,1970年达到18亿斤,1995年达到24亿斤以上;西藏自治区粮食总产量1959年不到4亿斤,1966年增加到6亿斤,1977年达到10亿斤,1993年达到13.5亿斤;青海省1957年牲畜存栏总数为1974万头(只),1970年达到2200万头(只),1980年达到2500万头(只);西藏自治区1959年牲畜存栏总数为956万头(只),1965年达到1700万头(只),1973年达到2000万头(只),1983年达到2300万头(只)。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到拉萨,初步改变了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奠定了有力的基础。1959年青藏铁路通车到西宁,1979年铺轨到格尔木。除了少数边远县份外,青藏高原实现了县、乡都通公路。在青藏高原上兴建了龙羊峡、李家峡等大型电站,以及一批纺织、化工、机械、冶金、石油工业企业。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青藏高原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各个交通沿线的城镇已经初步奠定了现代经济的基础。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各地普遍建立了小学、中学,而且在西宁、拉萨、康定等地建立了一批大专院校。说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尽管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在几十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和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相比,青藏高原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而且在近年来由于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现象,青藏高原在西部地区中又处于更加落后的地位,因而青藏高原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由于这一明显

的事实，学者们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途进行了许多思考和探讨，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种关于青藏高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说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种说法认为青藏高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因而是没有前途的文化，应当加以抛弃，在全新的文化条件下实现青藏高原的现代化；另一种说法认为，青藏高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藏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没有受到外界污染的文化，不应当让它受到现代化的触动，应当把它原样保存下来，以供人们观赏和研究。当然，从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是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的空洞议论，实际的情形要比它们复杂得多。

实际上，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角度来看，本世纪中国历史的演变给青藏高原带来了文化更新的机遇和历史必然。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给青藏高原以政教合一统治为特点的封建统治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1959 年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都带来了青藏高原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制度文化的根本变革，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藏高原经济的发展，改变着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物质文化，因此，想让青藏高原的传统文化原样保存下来的想法是根本不切合实际的空想。但是，认为青藏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是没有前途的落后的文化因而应当加以抛弃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无数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采用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移植一种全新的文化，适应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只能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通过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在青藏高原这样广大的地域上经过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青藏传统文化仍然具有自己顽强的

生命力，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艰难的适应和更新，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光辉灿烂。对高原壮丽的山川和自然景色的赞美和热爱，对高原的自然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适应和体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还有高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特征，这些依然构成了青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保证了高原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权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来促进青藏高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使青藏高原的各个民族有了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先进内容，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有了可能使国内外各民族了解和认识青藏高原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得青藏高原的文化走向世界。所以，我们认为青藏文化的前途与整个中国的文化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藏文化作为中国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地域文化，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必定会以其绚丽多彩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98 年第 4 期

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

今天，汉文中的“西藏”（藏文为 bod ljong）一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藏文为 bod rang skyong ljong），有时简称为西藏（bod ljong）。西藏自治区的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人口228.88万，全自治区划分为1个地级市即拉萨市和日喀则、阿里、那曲、林芝、昌都、山南等6个专区，下辖1个县级市即日喀则市，71个县、1个县级城关区、899个乡、31个镇。自治区首府设在拉萨市。①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区域间交往的频繁，“西藏”这一名词在汉文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新闻广播中经常出现，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它的来历和意义进行过研究，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不仅是在社会大众之中，甚至在专门研究藏学的学者当中，能够解说清楚的人也并不很多。而且

---

①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在现今已经提出的一些说法中，仍存在不少疑难之处，这是由于历史上藏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对青藏高原各部分的地域名称和对藏族的族称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而且这些历史上的名称互相交叉和影响，使得至今对西藏和藏民族的称呼及其含义仍然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

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为族称，“吐蕃”一词的含义和来历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呼，仍然难以得出结论。[①] 不过从敦煌出土的藏汉对照的词语文书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 bod 的对应词，是 bod 的音译。实际上，bod 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其中有两次是用 bod khams 来称呼其统治的地域。[②] 吐蕃王朝兴起后，用 bod 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 bod chen 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

① 安才旦：《“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4期。

② 第吴贤者著：《第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224页；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151—152页。这段记载说：“……第七由玛桑九部（九姓）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六福之地，此时出现了箭袋、刀剑、盾牌等武器；第八由龙族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岭古（九州）。”

称“大唐”。[①] 由于吐蕃王朝统一了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 bod 遂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

吐蕃王朝虽然对外将其所占有的地域总称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内部区别各个地区时，另有习用的名称。吐蕃王朝最早将其本部划分为四个“茹（ru)”，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习惯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发祥之地，拉萨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称其中拉萨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 dbu ru”和“约茹 gyo ru”为“卫”（dbus)，意为中心部分，将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叶茹 gyas ru”、“茹拉 ru lag”合称为“藏”(gtsang)，意为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区。“卫”和“藏”合称为“卫藏 dbus gtsang”，即表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区。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 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 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 myes rma 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 la ring bo 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 mdo)地区。“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

①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所收录的《唐蕃会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0页。

这三大片地域的军政首领分别举行盟会的记载，这样，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 dbus gtsang ru bzhi”、“多康 mdo khams”、“朵思麻 mdo smad”等三大部分。

元朝统一藏族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作为管理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地面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这样，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由于元代藏族地区又被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

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①（《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

---

① 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第1086—1087页；第1098—1099页。柳升祺、常凤玄教授最早注意到这一记载并进行了分析，见《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2期发表的他们的论文《西藏名义辨析》。

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① 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 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西藏”一词在《清实录》最早出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

① 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二册，第 1086—1087 页；第 1098—1099 页。柳升祺、常凤玄教授最早注意到这一记载并进行了分析，见《中国藏学》汉文版 1988 年第 2 期发表的他们的论文《西藏名义辨析》。

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① 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第悉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悉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封第悉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悉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悉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

① 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第34页、第186—187页。

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藉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嘱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

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正月已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

郎赫寿去。'"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① 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②。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迄今还未见深入探讨。"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③ 大概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坚持。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区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

① 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第34页、第186—187页。

② 此碑至今仍立于拉萨布达拉宫山下，《清实录》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条录有碑文全文。

③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谕，《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册，第259页。

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达赖喇嘛、第悉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朱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①]《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公元 1702 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壮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区都称作“西地”。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 wargi 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 wargi 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 wargi ba，意为“西面的地方”[②]。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帮助将《清实录》康熙四十九年（公元 1710 年）三月戊寅条中的“得旨：‘依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一段的满文查出，此处的满文为：

suwayan tasha inenggi hebai gisurehengge ladzang jai bancan hutuktu wargi dzang ni geren miyao lamasa wargi dzang n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shan amban heseo emgi acafi wesimbuhe bade……seme wesimbuhede yabubuha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31 页。

② 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82—1083 页。

这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 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雍正初年，随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 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当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后来“西藏”的范围还有过一些变动，但是大体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基础。

不过，尽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广泛使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划一过。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 1757 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达赖喇嘛成年以前代理达赖喇嘛职权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罕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时期满文对于“西藏”已经可以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由于清朝将“卫藏”地区定名为“西藏”，“藏”成为“乌

思藏"、"卫藏"、"西藏"称谓中的主体字，"藏"从本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专用地名变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区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区为"后藏"的习称。而且这一名词的制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呼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朝没有以"西藏"代替"乌思藏"、"卫藏"的称呼，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呼，在民国时期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则，就有可能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在与其他省市并列时，有时又简称为"藏"。

英文Tibet一词，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也即是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在民族称谓上，Tibet对应于"藏族"；但是在地域称谓上，Tibet有时对应于"西藏"，有时又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与"西藏"的含义有重大差异。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这是翻译外文资料和将有关西藏的资料译成外文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邓锐龄研究员的热心指教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历史上的塔尔寺

一、一代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

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上各个分散的部落，建立起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存在的200多年，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飞跃发展时期。松赞干布时期制定了一套行政军事制度，创制了通用至今的藏文，又从唐朝迎娶了文成公主，推动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松赞干布的时代开始，吐蕃王室从汉地和尼泊尔、印度、于阗引进了佛教。赞普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佛教典籍再次传入吐蕃，但当时吐蕃还没有正规的佛教寺院和僧人。到赞普赤松德赞时（公元755—797年在位），在西藏兴建了桑耶寺，剃度了藏族中的第一批僧人，并召集吐蕃王臣盟誓，世代信奉佛教，这就使佛教在藏族社会站稳了脚跟。赤松德赞以后，吐蕃王室极力扶植佛教，尊崇僧人，让僧人在王廷担任官职，参与朝政，并赐给佛教寺院以土地和属

民，使佛教成为吐蕃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大势力。公元838年，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虔诚奉佛的赞普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扶植反对佛教的王子朗达玛继赞普位，下令在全吐蕃灭佛，佛教在西藏一度濒于灭绝的地步。不久以后，吐蕃王朝崩溃，藏族地区处于各地方势力割据混战之中。10世纪下半叶，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下，佛教又在西藏地区复兴起来。由于在教义、仪轨和师法传承上的区别和传播地域的不同，复兴后的藏族地区的佛教出现了教派的区别。前后出现的主要教派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而噶举派又分为许多小的支派。各个教派一般都有由本派的主寺、属寺组成的寺庙系统，有由师徒关系继承的僧团组织，有属于本教派的土地和属民，有与之固定联系的世俗封建统治者作为施主。因此，这些教派既是宗教力量又是政治经济力量，在当时的藏族社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13世纪初，蒙古族军事力量在北方草原崛起，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蒙古皇室在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扶植利用萨迦派的办法，将藏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治理之下。元朝皇室尊崇和信奉藏传佛教，封萨迦派僧人为帝师，给许多藏传佛教僧人以国师、国公、司徒等爵位，还任命藏族僧人为中央和藏族地区的官员，并给予藏族僧人免差免税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元朝皇室还赐给藏传佛教僧人大量财宝，用于兴建寺院，印经造像。从元朝开始，一些藏族上层僧人在封建王朝的扶植下掌握宗教和世俗统治权，成为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元朝末年，帕竹噶举派的势力兴起，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继萨迦派之后建立起帕竹政权。明朝继承元朝，对藏族佛教僧人也采取尊崇的办法，封他们的领袖为法王、大国师、国师等，准许他们定期分批朝贡，并给予许多赏

赐。由于佛教僧人直接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权力，养尊处优，生活豪华，使得许多僧徒醉心于追求权势和财富，因而戒律松弛，僧俗不分，藏传佛教在藏族群众中的声望大为下降，出现了颓废之势。针对元末明初西藏佛教界的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和地方领袖提出整顿佛教戒律和保持寺院清净的要求。帕竹政权的建立者大司徒绛曲坚赞就是一个注重教规的僧人。他9岁出家，14岁到萨迦去学习宗教和行政事务，20岁时任帕竹万户。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到1354年前后终于削平群雄，统一西藏大部分地区。就是在掌权以后，他本人居住的宫廷仍设三重门，禁止妇女入内，戒饮醇酒，过午不食，持戒甚严。可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帕竹政权又陷入分裂。在西藏重振佛教的任务落到了一位出身于青海地区的藏族僧人宗喀巴大师的身上。

宗喀巴大师于藏历第六饶迴阴火鸡年（丁酉，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今天塔尔寺所在的地方。他的父亲名叫鲁本格，母亲名叫香萨阿切，生有子女六人，宗喀巴排行第四。有的书上说宗喀巴的父亲当过元朝的达鲁花赤（元朝在各级官署中设达鲁花赤，负责监督，称为监临官，通常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担任此职），属藏族内的默氏家族，大概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相传宗喀巴三岁时，跟父亲到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的夏宗寺拜见过受元顺帝召请而路过青海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乳必多吉，并从乳必多吉受近事戒。宗喀巴7岁时又被家庭送到化隆县境内的夏琼寺，跟从噶当派高僧敦珠仁钦受沙弥戒出家，起法名为罗桑扎巴（blo bzang grags pa，安多方言念罗桑智华）。宗喀巴在夏琼寺学习九年，在佛学和藏族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了在佛学方面进一步深造，他16岁时离开青海前往西藏学

法。宗喀巴到西藏后，先后在止贡、涅塘、萨迦等著名佛教寺院研习显密经论，并拜各派著名高僧多人为师，对佛教的重要理论和各教派的教法都反复钻研，融会贯通。宗喀巴学成后，一方面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一方面收徒传法，在自己身边集合起一大批有志于振兴佛教的僧人。从1388年起，他改戴黄色桃形僧帽，表示他继承喀且班钦释迦室利所传戒律并严格遵行的决心。由于这个原因，宗喀巴所创立的教派后来被人俗称为黄帽派或黄教。宗喀巴和他的弟子们大力提倡僧人严守戒律，注重修行次第，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反对以修密法为借口破坏戒律，要求僧人们过严格的宗救生活。由于他的这些主张切中当时西藏佛教界的积弊，因而得到藏族社会上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帕竹政权统治者的支持下，在拉萨发起有近万名僧人参加的祈愿大法会（即后世所说的传召大会），并于同年在拉萨东郊兴建甘丹寺，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法台。由于宗喀巴的这些活动，在藏传佛教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宗喀巴成为这个后来在藏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的始祖。宗喀巴成名以后，追随他的佛教信徒们不再直呼他的名字，而以他的出生地区——“宗喀”（湟水流域在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中即被称为宗喀，这一名词在藏语中沿用至今）加上藏语人称词尾“巴”来称呼他，故通称为宗喀巴。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又常称他为“第二佛陀”或“杰仁波且”（意为宝贝佛爷）。

格鲁派创立以后，其影响迅速增长。1409年年底，宗喀巴写了一首隐语诗，宣布他在教法上的传承是直接继承噶当派的祖师阿底峡（公元982—1054年，孟加拉国人，出身于王族，29岁出家，曾任印度超岩寺等佛寺住持，1042年应古格王邀请入藏传教，他在阿里和前后藏居留达13年，门徒众多，

后来发展成噶当派，他于1054年在拉萨附近的涅塘去世），而且宗喀巴也确实与当时噶当派的许多著名人士有密切关系，因此当时组织涣散但数量众多的噶当派寺院先后改宗为格鲁派。这就壮大了新创建的格鲁派的力量。由于这一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鲁派又被人们称作新噶当派。在这一时期，宗喀巴的声名还传到远在北京的明朝朝廷，1408年和1414年明朝永乐皇帝两次遣使携带诏书礼品到西藏迎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忙于宗教事务，又身体有病，上表婉辞，并于1415年派遣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永乐皇帝先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又加封为大慈法王，这就使格鲁派与明朝建立起密切关系。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扎西贝敦在拉萨西郊兴建哲蚌寺，1418—1419年释迦也失用从明朝带回的大批赏赐财物在拉萨北郊兴建色拉寺。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它们的建立使格鲁派在拉萨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后来格鲁派控制的西藏地方政权建立后，拉萨三大寺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都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宗喀巴的一些弟子还回到藏族各地区建寺收徒，使格鲁派的影响迅速遍及西藏和青海等地。

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逝世。他作为一个真诚虔信的佛教徒，认真学习佛教显密教义，深研佛教哲学，形成了自己的佛学体系。他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宗教理论和实践，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到他逝世时，格鲁派已拥有众多的信徒和一批寺院，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宗喀巴一生门徒众多，其中杰出的宗教宣传家和活动家不乏其人，最为著名的是贾曹杰与克主杰二人，他们与宗喀巴合称为“师徒三尊”。宗喀巴逝世后，他创建的格鲁派继续迅速发展，最后超越藏传佛教的其

他教派，在藏族、蒙古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受到清朝政府的扶植。因此，我们可以说宗喀巴的确不愧为西藏佛教的一代宗师。

虽然宗喀巴自16岁入藏学佛以后再未回过青海，但是由于他在藏族社会上的巨大声望和影响，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在当时藏族社会上受到普遍信仰的佛教的大师，在他出生的地区产生许多有关他的灵迹的传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说，他诞生以后，从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白旃檀树，树上十万片叶子，每一片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迦牟尼身像的一种），人们称之为“衮本”（意为十万身像）。又说当宗喀巴22岁时，他的母亲思念已去西藏六年的儿子，让人捎去一束自己的白发和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年迈体衰，盼望孩儿务必回家见一次面。”宗喀巴收到信后，为了学习佛教而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用自己刺破鼻子流出的血绘成的自画像一幅，狮子吼佛像一幅。并在给她们的信上说：“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指宗喀巴出生处的那株白旃檀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与我见面了一样。”第二年，也就是宗喀巴23岁那年（公元1379年），宗喀巴的母亲在一些佛教信徒的帮助下，将那株白旃檀树用绸缎包扎起来，与印成的十万张狮子吼佛像一起作为胎藏，在该处砌石建塔，以纪念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诞生。这座佛塔可以说是塔尔寺最早出现的宗教建筑，汉语称呼该寺为塔尔寺，即由此塔而来。

相传这座纪念宗喀巴大师诞生的佛塔，还在宗喀巴在世时就随着他在西藏的宗教活动的进展而改建过几次，这说明宗喀巴始终和自己的故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该塔修建后过了180年，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在当地的一位禅

师仁钦宗哲的倡议下，在塔的旁边修了一座小庙，可供七位僧人坐禅。这座小庙的地点，一说是今天塔尔寺大金瓦殿南面的弥勒殿的地方，一说在塔尔寺西面山后的某处，总之距纪念宗喀巴大师诞生的佛塔不远。后来，这座小庙的僧人逐渐发展到50余人，原来的庙已不能满足宗教活动的需要，因而在明神宗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在此小庙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佛殿，并由仁钦宗哲出资塑造了一尊弥勒佛十二岁身量像，命名这座佛殿为“衮本贤巴林”（即“十万身像慈氏洲”，慈氏即弥勒），现在藏语中将整个塔尔寺统称为“衮本贤巴林”，即源于此。若以此年为塔尔寺建寺的开始，则塔尔寺创建至今已有408年了。

二、汉藏金桥的中间站

这里所说的“汉藏金桥”，是明清以来藏族人士对联系藏汉两个民族的历史通道（实际上是沟通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兄弟民族的交通干线）的美称。它从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开始，经藏北草地、昌都、四川的甘孜、青海的玉树、黄河源、日月山到西宁地区，再经甘肃、宁夏、内蒙古到北京，或经甘肃、陕西到西安。历史上，这条通道上有过唐代的唐蕃古道，宋代的茶马交易之路，元代的从大都到萨迦的驿路，明清时代的北京到西藏的驿路。唐朝的文成、金城两公主出嫁吐蕃，元代的八思巴来往于萨迦和大都，都是经过这条通道。正是由于这条通道对藏区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所起的重大作用，藏族人士才用“金桥”一词来赞美它的牢固和珍贵。在这条通道上，塔尔寺所在的宗喀地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站。格鲁派兴起以后，也利用这一通道与汉地和蒙古联

系，并以塔尔寺为重要的交通基地。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对塔尔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简述塔尔寺作为格鲁派与中央王朝和蒙古各部的交往中的中间站的情况。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不致分散和解决本派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就仿效噶玛噶举派的办法而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格鲁派中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按照宗教史籍的算法，第一世达赖喇嘛是宗喀巴在 1415 年所收的一个弟子，名叫根敦朱巴（公元 1391—1474 年）。他于 1447 年在日喀则地方官员的资助下在日喀则西南近郊兴建了扎什伦布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法台。第二世达赖喇嘛是曾任扎什伦布寺和哲蚌寺法台的根敦嘉措（公元 1475—1542 年）。他去世后，格鲁派正式为他寻找转世灵童。第三世达赖喇嘛名索南嘉措（公元 1543—1588 年），出身于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一个小贵族家庭，4 岁时被认定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由哲蚌寺僧众迎到哲蚌寺供养，11 岁起担任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当时虽然已是格鲁派的领袖，具有转世活佛的身份，但是还未具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达赖喇嘛的称号是后来在青海地区由蒙古汗王赠送给他的。

元朝灭亡以后，退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仍保持有强大的实力，与明朝相对峙。明朝初年蒙古分为漠北、漠南、漠西三大部分。1407 年达延汗被立为蒙古大汗以后，统一了漠南漠北（即后来的内、外蒙古地区）广大地区，分蒙古为喀尔喀（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刺沁等六个万户，以自己的子弟统率。达延汗死后，蒙古很快又陷于分裂。达延汗之孙俺答汗（亦称阿拉坦汗，公元 1507—1582 年）成为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领袖，在蒙

古诸部中实力最强。俺答汗早年曾多次侵扰明朝，曾于1550年打到过北京郊区一带，后来俺答汗又与明朝修好。于1571年接受了明朝赐给的顺义王的封号。在与明朝和好互市之后，俺答汗集中力量对付漠西蒙古，青海就成为他全力争取的地区。还在1559年，俺答汗就曾经领兵到过青海，驱逐先已在青海草原活动的蒙古卜儿孩部，并留其子丙兔（亦作秉图）在青海驻守。1573年，俺答汗在西征漠西蒙古失利之后，又一次率军到青海。明朝对俺答汗在青海的活动一直持怀疑态度，担心他长期占据青海，故力促其返回土默特。俺答汗为了在青海立脚，转而与青海藏族部落加强联系，所以极力争取与在藏族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西藏佛教界建立关系。1575年丙兔以焚香修佛为名，在青海湖附近动工建寺，明朝虽然不愿蒙古在青海扎根，但又不便阻止建寺，就于1577年赐名该寺为仰华寺。1576年俺答汗派人进藏，邀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来青海会见。当时的格鲁派虽然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在西藏已经遇到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抵制，地位很不稳定。格鲁派为求得自身的发展，除了依靠当时已衰落的帕竹政权的支持外，也想与北方的蒙古族军事力量建立关系，取得后援。因此，索南嘉措欣然接受俺答汗的邀请，于1578年五月间到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俺答汗等蒙古王公会见。有人根据蒙古方面的史料考证，会见索南嘉措的还有俺答汗的爱妃、后来对明代蒙、汉和好做出重大贡献的三娘子（公元1587年被明朝封为‘忠顺夫人”)。通过这次会见，俺答汗及其部众信奉了格鲁派，并下令禁止崇拜萨满教的“翁古”神，禁止举行萨满教的仪式和废除当时蒙古部落中的夫死妻殉、杀牲祭奠等陋俗。俺答汗还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是对在佛教

显宗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音译，意为“金刚持”，是对在佛教密宗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达赖喇嘛”是说索南嘉措是一位法力广大犹如大海的上师。索南嘉措赠给俺答汗的尊号是“法王梵天”（蒙文资料说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转轮王”，是对依照佛法治理国家的贤明君王的尊称）。从索南嘉措得到“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后，他的历辈转世都被称为“达赖喇嘛”，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的来源。格鲁派上层集团把索南嘉措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追认根敦朱巴和根敦嘉措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这样就使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与宗喀巴大师直接联系起来。俺答汗在与索南嘉措会见之后，还在青海湖边的察卜齐雅勒地方修建了一座大乘法轮寺，以表示自己皈依佛教的决心。

三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一位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使格鲁派突破了民族的界限传播到蒙古族之中。同时他也认识到不能光依靠俺答汗的土默特一部的力量，依据格鲁派对世俗封建统治者广为接纳、不受制于一家的方针，他懂得还必须与明朝政府取得联系，争取明朝的支持。他力劝俺答汗按照明朝的要求返回土默特，同时派自己的弟子康区人云丹嘉措随俺答汗去土默特，作为格鲁派在土默特部的代表，并与蒙古诸部联系。这位云丹嘉措后来成为联系蒙藏统治阶级的重要桥梁的青海东科尔活佛系统的第一世。三世达赖喇嘛还在蒙古王族青年和甘、青一带藏族人士中剃度了一批僧人，收到自己门下作弟子，这就扩大了格鲁派在青海和蒙古地区的影响。他又在接到明朝的甘肃巡抚的邀请后到甘州会见明朝的官员，并写信给明朝的宰相张居正，说：“我为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并表示愿意按明朝的要求劝说俺答汗返回土默

特，还要求明朝准许他进贡，得到了明朝的同意。按明朝的制度，西藏佛教僧人只有法王、国师才有资格轮班进贡，明朝准许三世达赖喇嘛进贡，说明明朝虽然没有正式加封他，但是已按法王或国师的规格来对待他。正因为如此，《明史》中有索南嘉措的小传。这说明达赖喇嘛活佛系统从建立伊始就和中央王朝有了直接的联系。

1579年俺答汗率部东返，三世达赖喇嘛没有同行，而是到了甘青藏区南部的丙兔的营地，后来又去四川甘孜一带传教，还与云南丽江纳西族的木土司建立了联系。1582年俺答汗在土默特病逝，临终前嘱咐他的子孙派人请三世达赖喇嘛到土默特参加他的葬礼。此时三世达赖喇嘛在回藏途中已到达昌都地区，接到邀请后即行折回，经过青海前往土默特。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青海湟中一带的申中部落的昂索(元代萨迦派开始，教主在归附于该教派的部落中派驻昂索，负责征集该部落给教主的布施、贡赋等，成为部落的首领之一)，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到塔尔寺地方，并为他修建了一座称为“森康贡玛”的寝宫，供他住宿。三世达赖喇嘛按照格鲁派的惯例，于此年正月在塔尔寺召开了祈愿大法会，并登坛说法，还嘱咐当时主持塔尔寺的仁钦宗哲和塔尔寺附近的藏族五个部落的首领把塔尔寺扩建为一座大型的格鲁派寺院。这五个藏族部落即汉文文献上所说的塔尔寺五族：西纳族、申中族、龙本族、祁家族、米纳族，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河坝族，合称为塔尔寺六族，实际是六个藏族部落。塔尔寺六部落的名称及分布地在各种资料中说法不一，我们在湟中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申中部落，分布在现在的大小南川，即湟中县的上新庄、倾家、土木关、洪水川及西宁市南郊；西纳部落，分布在塔尔寺西北的西纳川，即现今湟中县的哆巴、拦隆口等地；龙本部

落，分布在西纳川以南及以西，即湟中县的李家山、盘道、共和等地；米纳部落，分布在湟中县的汉东川、拉布尔、大小康城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米纳川；祁家部落，分布在祁家川，即今平安县三河一带，为西祁土司辖地；西河坝部落，又称塔尔寺部落，民国时代称金塔乡，地在今湟中县红崖沟、海马沟、马厂滩、上下帐房台一带，相传是由清朝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划给塔尔寺管辖的一部分寺属民户组成的部落。三世达赖喇嘛要求五个部落把塔尔寺建成格鲁派的大寺，是因为他认识到要使格鲁派在甘青藏族地区立脚，就需要建立自己的大寺院作为据点，而建寺的地点自然以格鲁派的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最为合适。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安排，推动了塔尔寺的发展，五个部落集资合力，加快了塔尔寺的兴建。接着，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内蒙古土默特地方，于1587年为俺答汗举行了葬礼，并向来土默特会见他的喀尔喀部、察哈尔部的蒙古王公传教。据《明实录》记载，三世达赖喇嘛1586年与俺答汗之子乞庆哈一起向明朝上表纳贡，1587年明朝决定，“番僧达赖准升‘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名号，仍给敕命诏书”。明朝还派人邀请他到北京朝觐。1588年三月，三世达赖喇嘛于赴北京途中在一个叫做卡欧吐密的地方去世，他要在宗喀巴的诞生地建成一座格鲁派大寺院的志愿未能亲自完成。不过，由于三世达赖喇嘛对塔尔寺的建立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塔尔寺僧众为纪念他，在寺内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灵塔殿，供有他的灵塔，还把他住过的森康贡玛视为宝地，以后还传出一个森康贡玛转世活佛。

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589年，俺答汗的孙子苏密尔岱青洪台吉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孩，被蒙古王公和在土默特的格鲁派僧人们认为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这就是

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接着，西藏的格鲁派上层集团经过派人去内蒙古查访后也承认了这一认定，并派出代表到内蒙古去迎请四世达赖喇嘛到西藏坐床，主持教务。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在入藏途中经过青海，互助县一带的土族和藏族上层人士以三世达赖喇嘛路过互助县时曾嘱咐在当地建寺为由，请求兴建一座寺院，得到四世达赖喇嘛的同意。后来四世达赖喇嘛从西藏派人到互助县主持建寺，这就是著名的互助县佑宁寺。四世达赖喇嘛到达塔尔寺时，见寺院与村庄混杂，僧俗难分，影响宗教活动，于是任命俄色嘉措为塔尔寺的法台，要他将僧俗隔开，将寺院周围的俗人民户迁出，整顿僧侣戒律，使寺院保持清净，并要求他建立一座法规严整的讲经院。四世达赖喇嘛对俄色嘉措的要求实际上是要他把塔尔寺建成一座正规的格鲁派寺院。当时四世达赖喇嘛年仅13岁，这些主意很可能出自他的那些侍从堪布们。俄色嘉措从四世达赖喇嘛那里领命之后，与塔尔寺五部落的首领们一起经过十年的筹备和修建，到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举行正月法会时，建成了一座汉族宫殿式的大殿。俄色嘉措登上塔尔寺法台的狮子宝座，正式就任塔尔寺第一任法台。俄色嘉措还建立了被称为“吉祥讲修院”的“参尼扎仓”（显宗学院），制定了学经、辩难、修习等学习佛法的制度。至此，塔尔寺已发展成为一座拥有佛、法、僧三宝及佛学传授的正规佛寺，用佛教徒的话来说，就是“树立了弘扬佛法的旗幡”。

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北面的热振寺坐床时，格鲁派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1605年，支持噶玛噶举教派的第悉藏巴政权击败了支持格鲁派的拉萨地区的领主吉雪巴，控制了拉萨地区。接着，第悉藏巴汗又击败西藏山南等地支持格鲁派的地方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全藏。第悉藏巴汗对格鲁派是公

开敌视的，只是由于四世达赖喇嘛有蒙古军队护卫，并且陆续有蒙古王公带兵入藏朝拜，才使第悉藏巴汗没有直接对格鲁派动手，但是双方的冲突仍有一触即发之势。1616 年，明朝万历皇帝派人进藏，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就在当年年底，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去世，享年 27 岁。有的资料说他是被第悉藏巴汗派人害死的，虽无确切证据，但这一说法也反映了第悉藏巴汗与格鲁派的紧张关系。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第悉藏巴汗下令禁止寻找他的转世灵童。为了对付第悉藏巴汗的威逼，格鲁派转而向不久前皈依了格鲁派的蒙古各部汗王求援。由于蒙古军队入藏干预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第悉藏巴汗治好了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公元 1617—1682 年）才被认定并于 1622 年进入哲蚌寺坐床。

五世达赖喇嘛坐床后不久，格鲁派又遇到严重的危机。1632 年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一个封建主却图汗率兵南下青海，击败留在青海的土默特部众，控制了青海。却图汗在宗教上支持噶玛噶举派，与第悉藏巴汗联合起来反对格鲁派，还有在康区的白利土司信奉苯教，反对佛教，特别是反对格鲁派，这种形势使格鲁派完全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久，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因受到在东北兴起的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的攻击，也率部西逃，准备前来青海。林丹汗也宣称反对格鲁派，这给格鲁派又增加了一层威胁。尽管林丹汗在途中于 1635 年病死在大草滩，但是格鲁派所受到的威胁并没有减轻。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格鲁派上层当权者派人化装通过青海，到新疆去向当时格鲁派惟一可以指望的救星——蒙古卫拉特四部求救。

卫拉特（亦称厄鲁特）四部即漠西蒙古，明初又称瓦剌，曾经兴盛一时。明英宗时瓦剌部领袖也先曾征服东蒙古各部，

自称大元田盛可汗。明英宗御驾亲征，反被瓦剌部的骑兵俘获，瓦剌军队曾直逼北京城下。后来瓦剌势力衰落，被东蒙古各部逼回到新疆一带游牧。卫拉特四部从明代以来长期与漠南漠北蒙古各部作战，互不相属。约从1610年开始，卫拉特四部信奉了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当时格鲁派派出察罕诺门罕及东科尔活佛到新疆去传教，卫拉特四部各王公也各派一个儿子到西藏出家学佛。卫拉特四部是由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组成的部落联盟，其中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的实力较强，先是和硕特部任卫拉特四部的盟主，后来准噶尔部兴起，压迫其余各部，土尔扈特部于1628年西迁到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草原游牧，和硕特部也很想离开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带的牧地另谋发展，所以，当格鲁派的使者前来求救时，和硕特部的领袖固始汗即表示愿意率部众南下青海以援助格鲁派。

固始汗是和硕特部汗王哈尼诺颜洪果尔的第四子，为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尔（亦称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八代孙，生于1582年，年轻时以勇武和善辩知名，因为曾调解卫拉特四部与喀尔喀部的纠纷，由喀尔喀部汗王和东科尔活佛共同赠给他“国师汗”的称号，语讹为固始汗，亦作顾实汗。1636年他和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化装成商人到拉萨与格鲁派联系。该年秋天，固始汗从新疆起兵，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军队的支援下进兵青海，在柴达木盆地过冬。1637年春天，固始汗以一万军队在青海湖北面的哈尔盖一带击溃却图汗的三万军队，却图汗兵败被俘，固始汗很快占据了青海。接着，固始汗于1640年攻灭白利土司，又率兵入藏，于1642年在格鲁派的配合下攻下日喀则，消灭了第悉藏巴政权，成为统一青藏高原的蒙古汗王。

固始汗统治全国的藏族地区后，在拉萨建立起自己的地方政权，并将自己的十个儿子留在青海以及河西走廊、甘南等地驻守。在宗教上固始汗极力尊崇格鲁派，他把第五世达赖喇嘛奉为西藏佛教界的最高教主，并用前后藏地区每年的税赋收入来供养格鲁派僧人，他还与五世达赖喇嘛一起给格鲁派的大小寺院和支持格鲁派的蒙藏世俗贵族封赐庄园和农奴，强化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固始汗还以康区（今天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专区）的税赋供给他在青海的部众，使青海蒙古成为西藏格鲁派的屏障。在政治上，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到盛京向当时尚未进关的清朝表示归顺，争取清朝的支持，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奖赏。另外，固始汗还尊当时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是为第四世班禅，这样就在格鲁派中建立起另一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系统。

清军入关后，清朝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了争取蒙古各部的支持和归附，也利用蒙古和藏族首领及群众崇奉格鲁派的宗教心理，对格鲁派表示尊崇。从 1648 年开始，清朝顺治皇帝多次遣使入藏，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会见。五世达赖喇嘛在与固始汗和蒙古各部首领磋商后，决定接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朝清，对当时的清朝和蒙藏各部都是一件大事，因此双方都做了周密的准备。1650 年卫拉特蒙古首领才旺丹津捐资在塔尔寺兴建了一座汉式宫殿，以备五世达赖喇嘛在朝清途中莅临塔尔寺时住宿。顺治九年（公元 1652 年）藏历三月十六日，五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出发，据记载他的蒙藏随从及武装警卫人员多达 3000 人。当年八月十八日，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塔尔寺，受到僧俗群众欢迎。次日，五世达赖喇嘛朝拜了寺内各个佛像，并登上三世达赖喇嘛曾升座说法的宝座，为汉、藏、蒙古等族 5000 余人众讲解菩提道次第，并散花加持，还

为丹津和岱钦二人所写造的甘珠尔经赞颂吉祥。五世达赖喇嘛还出资为塔尔寺全寺僧众滚“茫加”（僧众诵经时的茶饭），并发放布施。五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居住了两天，清朝驻西宁的官员率一百骑兵来迎，他才离开塔尔寺去西宁。1653年元月，五世达赖喇嘛经宁夏、内蒙古到达北京，朝觐顺治皇帝，受到顺治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隆重接待。二月，五世达赖喇嘛离京回藏，五月，顺治帝派官到代噶地方颁赐给他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是清朝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以后历辈达赖喇嘛继立，都要由清朝加以册封。当年七月十一日，五世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到达青海湖东岸的察罕托罗海，受到青海蒙藏各部首领及塔尔寺、佑宁寺僧众的迎送。当时，清军虽已平定甘肃，驻兵西宁，但南方仍有反清力量活动，蒙古准噶尔部和喀尔喀部也还未归附，所以清朝在处理西藏、青海事务时采取了利用和硕特部汗王和格鲁派上层领袖的方针，几十年中清朝与青海西藏的蒙藏统治阶级基本上做到了相安无事。

1697年，清朝彻底击败反清的准噶尔部汗王噶尔丹，当时康熙皇帝亲自督师到达宁夏，乘着战胜准噶尔部的声威派遣章嘉呼图克图和额驸阿喇布坦到青海召谕青海和硕特部各首领归附。当时固始汗诸子中只有最小的达什巴图尔一人在世，他与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罕召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台吉为汉语“太子”一词的蒙语音译，指汗王的儿子，清代成为一种爵位）在察罕托罗海盟会，一致议定归附清朝。当年十一月，达什巴图尔率领青海诸台吉到北京朝觐，十二月，康熙皇帝在北京西山玉泉山举行大规模阅兵，邀请达什巴图尔等人同观。次年正月，康熙皇帝在北京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对其他诸台吉分别封给多罗贝勒、贝子、辅国公等爵位，青海和硕特

部由此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

达什巴图尔本来就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与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很深，五世达赖喇嘛曾写文告要求青海诸台吉接受达什巴图尔的管辖。因此，达什巴图尔受封亲王以后，对塔尔寺等青海的格鲁派寺院大加修缮。1708年，达什巴图尔等人出资扩建塔尔寺大金瓦殿。1711年，郡王额尔德尼济农捐资黄金1200两，白银22000多两，再次扩建大金瓦殿，并将殿顶改装成铜质鎏金瓦。1712年，达什巴图尔又用黄金数百两、白银数万两扩建大金瓦殿内的宗喀巴纪念塔。正是由于蒙藏统治阶级不惜倾注巨资，加上各族人民的勤劳和技艺，才使得塔尔寺成为金光灿烂、蔚为壮观的宏伟建筑。

固始汗1655年元月在拉萨病逝后，1658年由其长子达延鄂齐尔汗继承汗位。1668年达延鄂齐尔汗卒，1671年由达赖汗继承汗位。此时，在西藏的蒙藏统治阶级之间已经产生矛盾，五世达赖喇嘛尽力扩大自已的权势，削弱蒙古汗王在西藏的影响。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自己精心培养的桑结嘉措为西藏地方政府的第巴（行政负责人），控制地方行政权力。1682年4月，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第悉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伪称达赖喇嘛修行入定，不见旁人，凡事俱由第巴传达。这样，第悉桑结嘉措仍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继续长期执政，因而更加激化了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第悉桑结嘉措又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幼年同受五世达赖喇嘛教育，他掌权以后用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同情和袒护噶尔丹，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满。1701年达赖汗卒，拉藏汗在拉萨继立为和硕特部的汗王，蒙藏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剧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武装冲突。1705年拉藏汗以驻牧藏北当雄的和硕特蒙古骑兵击杀第悉桑结嘉措，废黜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另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从而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

拉藏汗在西藏得势，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奖励和支持，却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的不满，特别是他自行废立达赖喇嘛，更引起青海诸台吉和格鲁派上层僧人的疑忌。在仓央嘉措于解送北京的途中逝于青海湖边以后，青海诸台吉和一些格鲁派僧人依据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把四川理塘出生的格桑嘉措（公元 1708—1757 年）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不承认在拉萨的意希嘉措是达赖喇嘛。在这种情况下，拉藏汗派人到理塘查看，青海诸台吉派人将格桑嘉措迎来青海供养，并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察觉到拉藏汗在西藏的地位并不稳固，为缓和拉藏汗与青海诸台吉的矛盾，下令将格桑嘉措移到塔尔寺居住。1716 年 3 月，格桑嘉措被青海诸台吉和东科尔活佛、塔尔寺僧众迎请到塔尔寺，他就是后来的第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塔尔寺期间，常在塔尔寺的大经堂和密宗学院（居巴扎仓）从事宗教活动，向青海的格鲁派寺院如塔尔寺、佑宁寺、却藏寺、广惠寺、夏琼寺的僧众发放布施。清朝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到塔尔寺看望格桑嘉措，并且出资扩建五世达赖喇嘛住过的寝宫，供格桑嘉措居住。1717 年，李家红塔喇嘛为祈愿格桑嘉措长寿，在征得格桑嘉措同意后在塔尔寺修建了一座祈寿殿，即现在俗称的花寺。该年正月初一，格桑嘉措在塔尔寺宴请青海蒙藏僧俗首领及清朝官员，与会的共计 300 多人。三月十八日为康熙皇帝寿辰，格桑嘉措为此在大金瓦殿前向僧众发放布施，清朝官员也来塔尔寺向格桑嘉措献礼。十月二十五日为宗喀巴大师诞辰，清廷派国公才旺诺布、钦差阿萨肯等人来塔尔寺看视格桑嘉措，其后，格桑嘉措两次派人进京向康熙皇帝献礼请安。就在 1717 年的夏天，发生了准噶尔

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扰西藏的事件。策妄阿拉布坦先是与拉藏汗结为儿女亲家，要拉藏汗的儿子到准噶尔去入赘为婿，然后以护送他们夫妻入藏为名派遣精兵6000人从叶尔羌翻越昆仑山突袭西藏，另派一小股部队长途偷袭塔尔寺，打算劫持格桑嘉措。准噶尔偷袭塔尔寺的一支被清军发觉，遭到失败，而进攻西藏的一支却取得了胜利。1717年冬天，准噶尔军攻下拉萨，拉藏汗兵败被杀，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被废黜。准噶尔军的入藏和拉藏汗的败亡使得清朝决心对西藏用兵，这就使得格桑嘉措的重要性大增，也使塔尔寺一时成为清廷上下注目的地方。

1718年春节，格桑嘉措又在塔尔寺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僧俗首领和清朝官员，并连续十天接见前来朝拜的僧俗群众。当年春天，清朝派将军额伦特等率满汉官兵从西宁入藏，行至藏北黑河地方被准噶尔军截断后路，粮草断绝，结果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清廷朝野震动，康熙皇帝力排众议，组织清军再次进兵西藏。当年五月，康熙皇帝派人到塔尔寺，并视察青海蒙古军队。接着又派皇子率侍从2500人到塔尔寺会见格桑嘉措，向格桑嘉措献哈达、布匹等物品。从1718年到1720年，清朝为进军西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清朝官员多次到塔尔寺会见格桑嘉措，青海和内蒙古各部王公也纷纷来塔尔寺朝拜格桑嘉措，表示愿领兵护送格桑嘉措入藏坐床。1719年初，康熙皇帝派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军离北京前来青海，主持各路进兵西藏的事务。1720年正月，允禵带领皇孙宁亲王、六位大臣和三千骑兵到塔尔寺向格桑嘉措传达圣旨，格桑嘉措亲自出寺至扎西塘迎接。允禵向格桑嘉措和聚集在塔尔寺的蒙藏首领和僧俗群众宣布了派兵护送格桑嘉措入藏的决定，格桑嘉措当时年仅13岁，也在大会上讲演，说："佛教的

兴盛和蒙古、汉、藏人民的幸福全寄托于文殊菩萨大皇帝（西藏佛教僧人对清朝皇帝的尊称），我虽年幼，当为众生幸福而诚心求佛。”此后，允禵又从西宁派人给格桑嘉措送来黄色帐篷、十二人抬的大轿，以及上万两银子，以供格桑嘉措路上使用。藏历三月二十日，允禵再次到塔尔寺，给格桑嘉措送去康熙皇帝册封他为达赖喇嘛的刻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据清实录记载，当时康熙皇帝给格桑嘉措的封号是“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这是因为康熙皇帝不承认仓央嘉措为达赖喇嘛，认为格桑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而不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因此封格桑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但是在蒙藏僧俗百姓的心目中始终认为格桑嘉措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因此是第七世达赖喇嘛，后来清朝政府也默认格桑嘉措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允禵抵塔尔寺，塔尔寺僧众列队夹道欢迎，格桑嘉措出经堂迎接。允禵将金册金印交给格桑嘉措，接着蒙藏官员百姓向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献哈达致敬。然后七世达赖喇嘛和允禵就坐，设宴款待蒙藏王公及达赖喇嘛的侍从人员，七世达赖喇嘛向允禵献礼致谢。四月二十二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离开塔尔寺，在僧众和官员百姓的欢送下踏上进藏的旅程。当天，格桑嘉措行至嘉牙滩，与抚远大将军允禵率领的进藏清军和青海蒙古各王公的军队会合，向西藏进发。大军走到木鲁乌苏（即通天河）河边时，按原先的计划允禵在此驻扎指挥，格桑嘉措由平逆将军延信率兵护送前往拉萨。

当时，清军兵分三路，延信率领的从青海进藏的为中路，由征西将军噶尔弼率领的从四川进藏的为南路，由靖逆将军富宁安率领的驻巴里坤的军队为西路。西路清军主要是牵制准噶尔部，不让它增兵西藏。中路清军在黑河地区击溃前来阻击的准噶尔军，南路清军在由西藏起兵的反对准噶尔的康济鼐、颇

罗鼐等人配合下，先进入拉萨，残余的准噶尔侵藏军队从藏北翻越昆仑山逃回伊犁，准噶尔侵扰西藏的动乱经过三年才告平息。1720 年 9 月，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军护送下抵达拉萨，进入布达拉宫坐床。

三、甘青藏区的主要佛寺

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塔尔寺期间，是塔尔寺在政治上最为兴盛的时期，紧接着，由于青海蒙古的罗卜藏丹津之乱，塔尔寺在政治上走上了下坡路。

清军将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驱逐之后，曾由清军将领与青海蒙古亲王代管西藏行政一年，但是，康熙皇帝看到青海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已告完结，因而将西藏纳入中央的直接治理之下，没有立罗卜藏丹津为统治青海西藏的汗王。这事引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强烈不满，还在拉萨时他就与青海诸台吉密谋反清自立，恢复先辈在青海、西藏的霸业。清军主力撤回以后，罗卜藏丹津回到青海，加紧进行反清的准备。康熙皇帝察觉到罗卜藏丹津的企图，事先采取了防范措施，除增强驻西宁清军兵力外，于 1723 年 2 月以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之功，给罗卜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同时加封郡王岱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为亲王，加封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为郡王，并以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同领青海蒙古右翼，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领青海左翼。原先，青海诸台吉中只有罗卜藏丹津的爵位为亲王，现在察罕丹津也晋爵为亲王，并与罗卜藏丹津同领右翼，这就减少了罗卜藏丹津的号召力，同时在青海诸台吉中起到分化和离心的作用。罗卜藏丹津本来就心怀不满，又看到自己权势日削，因而于 1723 年 5 月乘康熙皇帝去

世雍正皇帝新即位的时机，在察罕托罗海召集和硕特部诸首领会盟，规定不准使用清朝封给的亲王、郡王、贝勒、国公等封号，恢复蒙古旧称号，脱离清朝管辖，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由此举起反叛清朝的旗帜。接着，罗卜藏丹津发兵攻击不愿跟随他反清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败走甘州，请求清军保护。罗卜藏丹津又不顾清朝官员的劝阻，率兵渡黄河攻击察罕丹津，察罕丹津兵败，走避河州，罗卜藏丹津又围攻河州，迫使察罕丹津逃奔兰州，躲入清军保护之下。清朝在数路报警的情况下，仍派侍郎常寿赴罗卜藏丹津军中，规劝罗卜藏丹津息兵罢战，听候朝廷解决。但罗卜藏丹津为初战获胜冲昏头脑，扣留常寿，又通过塔尔寺大喇嘛等格鲁派上层僧人号召西宁附近各藏族部落起兵反清。十月，罗卜藏丹津命响应他反清的蒙藏各部分路猛攻西宁，包围了西川镇海堡，攻占北川新城、南川申中堡等地，一时声势甚盛。当年十月，清廷以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平乱。年羹尧奏请雍正皇帝，调集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巴尔库尔、吐鲁番等处兵丁，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进兵，又调云南、西藏军队到昌都、黑河堵截，防止罗卜藏丹津逃往西藏。部署完成后，年羹尧率军至西宁，先解西宁之围，接着于1724年正月与四川提督岳钟琪合兵攻打佑宁寺，杀叛军僧俗6000余人，并将佑宁寺烧毁。接着，年羹尧又进兵塔尔寺，塔尔寺僧众于军前投降，被年羹尧处死数人。以往一些书籍中说帮助罗卜藏丹津反清的塔尔寺大喇嘛是察罕诺门罕（又称白佛，其寺院为今天尖扎县的拉穆德钦寺），并说他在军前投降，被年羹尧处死。但藏文史籍不载察罕诺门罕参与罗卜藏丹津之乱被处死的事，仅说总法台嘉堪布阿齐图诺门罕·罗桑顿珠胆

小逃遁，死于乱军之中。清实录载年羹尧奏章中说："堪布诺门罕系边口内塔尔寺喇嘛，乃察罕丹津亲侄。唆令罗卜藏丹津叛逆，又令伊等喇嘛与我兵交战。虽势穷来投，情难姑恕，到日，臣即行正法。"另一奏章中说："据侍卫达鼐报称，（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与副将纪成斌等搜寻罗卜藏丹津属人，探得夹木灿堪布喇嘛在布代山后藏匿。恐由西藏一路逃遁，遣人往调台吉济木巴等，派蒙古兵往西藏邀截。即率兵前进，至梭罗木地方，夹木灿堪布等拒战败遁。……将夹木灿堪布、垂扎木素二人擒斩枭首，送至军营。"那么，帮助罗卜藏丹津反清的应是当时塔尔寺的法台嘉堪布罗桑顿珠，而以前史学界多认为是察罕诺门罕，似属误说。罗卜藏丹津兵败后逃往柴达木盆地，清军冒着严寒进兵，紧迫不舍。罗卜藏丹津在各路清军的围追堵截下丢弃部众，带领少数亲属越过大戈壁北投准噶尔部。罗卜藏丹津在准噶尔部一住就是 31 年，中间雍正皇帝曾几次派人要准噶尔部交出罗卜藏丹津，并声明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但都被准噶尔部拖延过去，直到 1755 年乾隆皇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之乱时，罗卜藏丹津才在军前投降，乾隆皇帝免其死罪，将他软禁在北京，还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侍卫。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雍正皇帝采纳年羹尧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仿照内蒙古各部办法分编为旗，设立扎萨克。除和硕特部以外，在青海的土尔扈特、准噶尔、喀尔喀、辉特部落也编为旗，不隶属和硕特部。1725 年，清朝派官将青海蒙古各部共编为二十九旗，另外的察罕诺门罕旗虽属蒙旗之中，但旗民都是藏族，掌旗的是佛教僧人。清朝又将当时属陕西省的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属四川的松潘、打箭炉、理塘、巴塘，属云南的中甸等处的原归青海蒙古管辖的藏族部落

统统收归清朝管辖，清朝在这些部落中设置卫所，给归顺清朝的藏族部落首领以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由附近的道厅管理，让这些藏族部落向清朝官府交纳粮草，以改变这些藏族部落“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的状况。清朝还在青海隔离蒙藏，不准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迁到黄河以北蒙古地区，蒙藏上层之间以及蒙古各旗王公之间的交往要受清朝官府的监督。1725 年，清朝又设置驻西宁办事大臣，发给“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的关防。西宁办事大臣的主要任务是监督青海蒙藏统治阶级，管理青海军政事务。后来又增加了协助驻藏大臣办理转输粮饷、调遣兵员、塘递运输的事务。当时清朝规定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的区域，基本上就是今天的青海省的范围。

鉴于青海藏族佛教寺院多数积极参与了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政府决定对青海地区的寺院加以整顿和管束。对于积极参与乱事的上层僧人，清朝采取一律严惩的办法。年羹尧在攻下塔尔寺以后。只选留 300 名老成持重的僧人，发给大将军印信执照，谕令学习清规，其余的悉数遣散，并明令禁止喇嘛在寺中聚众议事，滋生是非。后来清朝又规定青海各地寺院房舍不得超过 200 间，喇嘛多者不得超过 300 人，少者十几人。每年派遣官员到寺院稽查两次，令为首的僧人具结保证，不得闹事。又规定寺院不得向藏族百姓收租要粮，寺院租粮交给地方官管理，按寺院和僧人每年的用度发给。喇嘛衣服所需，由地方官府发给银两。由于这些规定的实行，青海藏区寺院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实力都受到重大打击和削弱。虽然后来清朝渐渐放松了这些管束，寺院的许多封建特权又恢复了旧的一套。但是比较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和青海地区的藏族寺院，西藏寺院的封建特权还是要比青海的寺院强得多。

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是清朝雍正、乾隆、嘉庆皇帝在位的时期，也是清朝的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乾隆皇帝最终平定了准噶尔部，又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侵扰，清朝初年对西北、西藏接连用兵的局面结束了。乾隆皇帝对格鲁派也采取尊崇和利用的办法，迎请上层僧人到北京，并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在这一时期，塔尔寺由于其原先的政治上的支持者青海和硕特部的势力衰落而在政治上的作用有所削弱，但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转而注重于宗教活动，寺院的规模又有发展。这一时期塔尔寺的大规模兴建有以下几次：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第二十四任法台根敦顿珠遵七世达赖喇嘛之命将三世佛殿维修扩建，使之成为现今的九间殿的格局；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清朝在西藏所封的郡王颇罗鼐布施白银27000两，重镀大金瓦殿金瓦，并在殿脊安置大金顶宝瓶；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第二十八任法台却藏·洛桑丹贝坚赞创建曼巴扎仓（医宗学院），并修建了曼巴扎仓的经堂；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由阿嘉·洛桑丹贝坚赞、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拉萨尔大喇嘛罗桑却太尔等集资，将塔尔寺大经堂扩建成有一百五十四根大柱的宏伟建筑；同年，拉科部落头人桑结伦珠在塔尔寺广场内修建了如来八塔；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修缮了居巴扎仓（密宗学院）；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将小金瓦殿的屋顶改建为鎏金铜瓦殿顶，与大金瓦殿的金顶相互媲美；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却西·阿旺协珠丹贝尼玛

任总法台时，维修了大金瓦殿，将该殿砌成琉璃砖墙；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却西·阿旺协珠丹贝尼玛创建丁科尔扎仓（时轮学院）；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由色多堪钦和当采活佛负责兴办印经事业，刻印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由此发展成塔尔寺印经院。

经过这一系列的修建，塔尔寺的建筑格局基本定型，以后虽然还有一些小的兴建和重建殿堂的工程，但是已经无改于整个塔尔寺的基本格局。

这一时期中，塔尔寺宗教上层人士的地位日渐巩固，一些大活佛受到清朝朝廷的册封，在北京、五台山、青海、西藏都有较高的威望。塔尔寺的阿嘉、赛赤、拉科、色多、香萨、西纳、却西等活佛被清朝封给呼图克图或诺门罕等封号，其中的阿嘉、赛赤、拉科还当过驻京呼图克图，有的还当过北京雍和宫和山西五台山的掌印喇嘛。塔尔寺的活佛数量很多，有的说最多时达八十三家，有的说最多时为七十多家，就以七十多个活佛而论，共数量之多在青海、西藏也是很少见的。由于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又受朝廷和藏族僧俗各界的重视，所以除塔尔寺本身的活佛以外，甘青藏区的一些大活佛也常来塔尔寺活动，有的还不惜花费重金来当一任塔尔寺的法台以提高自己在藏族社会上的身价和名望，如甘肃拉卜楞寺的寺主二世嘉木样活佛于1765—1768年任塔尔寺法台，佑宁寺大活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于1789—1793年任塔尔寺法台，三世嘉木样活佛于1849—1851年任塔尔寺法台。由于甘青藏区宗教首领都以塔尔寺的法台为他们心目中的崇高职务，世俗首领和群众都以朝拜塔尔寺为无上的光荣，这就大大提高了塔尔寺的地位，使塔尔寺成为甘青藏区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另外，这为数

众多的活佛又在塔尔寺修建起大小不等的私人公馆（西藏称拉章、佑宁寺称昂、拉卜楞寺称昂欠、塔尔寺称噶尔哇），拥有私人的侍从和办事人员。塔尔寺的各个噶尔哇交错参差，紧接殿堂，使塔尔寺形同城镇。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塔尔寺的一件大事是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入京朝觐并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时路过青海并在塔尔寺过冬。据清实录记载，当章嘉呼图克图向乾隆皇帝奏报六世班禅准备进京祝寿后，乾隆皇帝十分重视，于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下旨将六世班禅要经过的地区的负责官员陕甘总督勒尔谨、山西巡抚巴延三召到北京陛见，布置接待事宜。并决定让六世班禅 1779 年六月前从西藏动身，到塔尔寺留住过冬，次年春由西宁到北京。据《六世班禅传》记载，六世班禅于 1779 年藏历十月十一日到达湟源县东科尔寺，受到西宁办事大臣和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十五日，六世班禅到达塔尔寺，塔尔寺法台却藏·阿旺图丹旺秋、居巴扎仓堪布却西·阿旺丹巴、曼巴扎仓堪布色直堪钦·官却南杰等率领僧众出寺至德马塘迎接，钦差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西宁镇总兵等分别向班禅大师献哈达、水晶眼镜、绸缎等礼品。十七日，西宁办事大臣在塔尔寺大经堂宴请六世班禅。十九日，六世班禅为塔尔寺 3000 多僧人讲经，前来朝拜献礼的还有附近寺院的僧人和蒙古温布扎萨克、柴达木扎萨克等，讲经完毕，六世班禅巡礼塔尔寺所有的经堂佛殿。十一月一日，三世赛赤活佛阿旺图丹旺秋贝丹成勒嘉措（当时年仅 7 岁）向六世班禅献礼，并从六世班禅受沙弥戒。十日，六世班禅给三世阿嘉活佛罗桑嘉央嘉措（当年 12 岁）授沙弥戒，并为却藏、察罕诺门罕、赛赤等活佛讲经。十二月初，六世班禅为当时青海境内所有大小佛寺的 28312 名僧人发放熬茶银两及物品，总

计6798两银子。同月，六世班禅在塔尔寺接到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对他的进京大加赞扬，并希望早日在京会见（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江南巡幸），还赐给他一件大红袈裟和一个手炉。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正月初一，六世班禅到塔尔寺居巴扎仓诵经，祝愿皇上万岁，国家兴盛。乾隆皇帝派人给他送来新年礼物，六世班禅上表谢恩。青海蒙藏僧俗首领纷纷来塔尔寺向六世班禅献礼祈寿，班禅大师又向各地寺院僧人发放熬茶布施。初八，六世班禅又在大经堂向塔尔寺僧众发放布施。十三日，六世班禅巡礼塔尔寺各殿堂经院。十五日，班禅大师为前来朝拜的上万僧俗群众"放头"（摩顶祝福）。三月五日，清朝陕甘总督和西宁办事大臣来塔尔寺看望六世班禅，并在塔尔寺组织演唱汉戏，为六世班禅送行。三月十日，六吐班禅离开塔尔寺，转经宁夏、内蒙古去热河。总计六世班禅在塔尔寺停留了140多天，在这期间他为青海的30名扎萨克和塔尔寺五部落的首领灌顶说法，为数百名僧人授戒，还会见了数万名来自各地的僧俗群众。1780年七月，六世班禅行抵热河避暑山庄，乾隆皇帝派六皇子和章嘉呼图克图到路上迎接。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在热河参加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典礼，并率领众呼图克图诵经祝愿，乾隆皇帝及随驾的王公大臣多次宴请六世班禅。九月初二，六世班禅来北京，十月底染痘症，十一月初二在北京圆寂。乾隆皇帝除大加赏赐外，还在北京西黄寺为六世班禅建衣冠塔纪念。由于六世班禅在塔尔寺停留和多次向僧众布施，所以在塔尔寺流传着六世班禅由北京回藏时曾被河州人刘琪搭救，刘琪因而成为鲁沙尔山神的传说。

这一时期，由于全国的政治、经济都比较安定，塔尔寺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也比较兴盛，塔尔寺的僧人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成就的学者，著名的有曾任塔尔寺法台并在塔尔寺建有噶尔

哇的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他的全集有 17 函，5000 多页，其中尤以《宗派源流晶镜史》、《佑宁寺志》、《章嘉国师传》及《诗集》等著作知名于世。第一世赛赤活佛罗桑丹贝尼玛在乾隆年间曾与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将藏文大藏经译成蒙文。此外，还有许多活佛在宗教、文学、历算、医学、历史等方面写有著作，分别收入他们的全集之中。

四、鸦片战争以后的塔尔寺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加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民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清朝走向没落，塔尔寺也逐步走向衰落。

1850 年，为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1861 年西北回民举行反清起义，清朝调兵四处镇压，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陷于战火之中。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四月，回民起义军与清军在塔尔寺交战，塔尔寺的密宗学院、时轮学院、达赖遍知殿、森康贡玛（上寝宫）以及拉科、当彩、却四、土观、嘉木样、西纳、嘉雅等活佛的噶尔哇都被毁坏，寺内保存的供品、珍宝、法器等也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和劫掠，大拉让、小护法殿和阿嘉、却藏、米纳、香萨等活佛的噶尔哇也相继失火，塔尔寺遭到建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破坏。由于战乱，当时的塔尔寺法台扎西活佛·意西克珠尼玛辞去法台职务，避居到蒙古地方。

1904 年，西藏人民在江孜的抗英战争失败，英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入城前带领随从 70 余人逃离拉萨，经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河西嘉峪关外前往外

蒙古，于当年十月到达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1906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准备回藏，于九月份到达西宁，受到西宁办事大臣和青海僧俗首领的欢迎。九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塔尔寺全体僧众之请，由西宁移住塔尔寺，在大经堂内向全寺 3000 僧众讲经说法。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不愿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命十三世达赖喇嘛暂住塔尔寺。当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宗喀巴大师忌辰朝拜了塔尔寺大金瓦殿内的纪念宗喀巴的大银塔，并献供品。1907 年正月初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大经堂宴请蒙藏汉各界人士，章嘉、东科尔等呼图克图向达赖喇嘛献了新年礼品。此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向清朝政府要求入京陛见，得到同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 1907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塔尔寺起程入京，先经西安、太原到五台山朝佛。1908 年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五台山到达北京，数次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召见，并到雍和宫、白塔寺、嵩祝寺等寺院礼佛献供。清朝政府颁赐给他金册一份，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就在这一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北京去世，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十三世达赖喇嘛乘此时机提出返藏要求，得到清朝政府批准。十一月二十八日达赖喇嘛启程离京，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达塔尔寺，塔尔寺的活佛、僧众及西宁办事大臣在大拉让设宴为达赖喇嘛洗尘接风。1909 年的正月法会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按惯例在塔尔寺宴请各地僧俗首领，为前来朝拜的各族群众“放头”。接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为回藏做准备，并于四月三日至九日去夏琼寺朝拜宗喀巴大师的老师敦珠仁饮的灵塔。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任免了一些塔尔寺僧职人员，整饬寺规，严申戒律。四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塔尔寺的宗喀巴铜像献哈达和供品，然后在全寺僧人和地

方官员们的欢送下离开塔尔寺向西藏进发。

1920年，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从日喀则出走，经藏北和青海柴达木到河西走廊，转赴北京。1929年达赖、班禅两集团都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关系，在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1931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给玉印，定年俸为十二万元。1932年12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次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众电请九世班禅回藏。1934年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组织班禅行辕，派护送专使送班禅大师入藏。1935年5月14日，九世班禅从内蒙古阿拉善旗经兰州、西宁到达塔尔寺，受到塔尔寺僧众欢迎。九世班禅在塔尔寺期间经常到大经堂主持"时轮金刚法会"，并将班禅行辕移至塔尔寺内办公，积极作入藏准备。其间，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派代表六人、后藏民众和寺院派代表300多人，先后到塔尔寺欢迎九世班禅回藏。1936年4月，九世班禅率领全体随从人员离开塔尔寺，经甘南拉卜楞寺、拉加寺到达玉树结古，准备进入西藏。此时英帝国主义竟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班禅大师入藏，拉萨方面的亲英势力也积极活动，企图以武力阻止九世班禅入藏。在这种形势下，九世班禅被迫停留在玉树地区，于1937年12月在玉树去世。

1933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摄政热振呼图克图随即派出专人，分别在西藏、康区和青海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中来青海的由纪仓活佛带领，于1937年到青海，经过一年多的寻访，访到今平安县祁家川藏族农民祁却才郎之子、塔尔寺当采活佛之弟拉木登珠灵异显著。这一消息传出后，青海地区蒙藏王公千百户和塔尔寺的僧

众都很注意，希望拉木登珠能继立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和塔尔寺僧众提出，先确认拉木登珠为达赖喇嘛，然后护送入藏，后经国民党政府疏通，并拨给十万元作为护送灵童入藏的费用，马步芳才于1939年7月派师长马元海率兵护送拉木登珠入藏。1939年7月15日，拉木登珠离青赴藏，他的全家随行。据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说，他是先从祁家川到塔尔寺，然后从塔尔寺入藏的。该年10月7日，拉木登珠到达拉萨。次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免于抽签，继立为十四世达赖喇嘛。2月22日，拉木登珠在拉萨坐床，他即是现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1942年8月，在抗日战争中撤退到重庆的蒋介石以视察西北各省军政为名，到西北地区活动。8月26日蒋介石乘飞机到西宁，27日，蒋介石由宋美龄、钱大钧、朱绍良、胡宗南、戴笠等陪同到塔尔寺参观，并接见塔尔寺活佛，题赠匾文，捐赠布施，当天返回西宁。

九世班禅1937年在玉树圆寂以后，班禅行辕即着手寻访其转世灵童。1942年冬，在青海循化县边都沟找到了灵童官保慈丹，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3年2月，官保慈丹移驻塔尔寺，由甘南拉卜楞寺请来拉古活佛为他灌顶授戒，讲授经典。在此期间，后藏僧俗大众曾几次派人来迎接官保慈丹入藏，都因英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西藏当局中的亲英派阻挠未能成行。1949年5月，逃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明令公布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并准许在塔尔寺先行坐床。当年6月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批准官保慈丹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7月21日，国民党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玉吉为主持班禅坐床典礼

的专使，马步芳为副使。当年8月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大典在关玉吉的主持下在塔尔寺隆重举行。这一天，塔尔寺悬灯结彩，远近藏民纷纷赶来朝拜。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宁。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电文中说："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随着青海的解放，塔尔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原载《塔尔寺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及其《颐和园礼赞》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伟大祖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各兄弟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和发扬光大的。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曾创造出自己光辉夺目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异彩。在大量的优秀民歌、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藏族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早在公元 7—9 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随着民族统一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藏文的创制和使用，藏族就用藏文记录下了生动活泼、文采绚丽的浩瀚诗章；公元 11 世纪，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和封建经济的发展，藏族文学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著名的宗教活动家米拉日巴通过歌吟来教授门徒，他的歌由其弟子记录整理，流布民间，被称为道歌。米拉日巴的道歌虽然以宣传佛教教义为主，但是部分道歌却是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生活以及赞美家乡景物的佳作。在写作技巧上，米拉日巴道歌多采用比喻手法，写人状物都十分生动细腻，继承和发展了藏族诗歌的特色。继米拉日巴之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 13 世纪初

写下了著名的格言诗集《萨迦格言》，它吸收了古代藏族人民生活斗争的丰富经验，通过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总结出很多富有哲理性的名句，把藏族诗歌的题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摈弃其中的佛教对世俗生活的简单否定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萨迦格言》的大部分不愧为藏族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高峰，在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元、明、清三朝，随着国家统一的巩固和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施政的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紧密，藏族的文化也更加繁荣发达。由于造纸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从“萨迦五祖”起，许多藏族学者的著作被整理成全集，刻印刊行。数百年间，藏族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学者，有著作全集遗留于世的即达几百人之多。他们的著作中除宗教、历史、哲学、科技外，文学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藏族的书面文学，包括了小说、剧本、传记、诗歌，是我国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地进行发掘和整理，以飨各族广大读者。

藏族学者的诗歌创作不乏歌颂我们祖国壮丽山河的作品。元代以来，藏族人士到内地传教、任职或游历的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大大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交往，还担负了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使命。北京、南京、五台山、承德等地，当时均是各民族文人学者汇聚之地，它们壮丽的湖光山色，自然也成为各族学者共同讴歌的对象。元代八思巴的著作中，就有赞颂五台山和中都（今北京）的诗篇；到了清代，藏族学者歌颂北京、承德等地的诗歌就更多了。这些诗篇不仅抒发了作者对这些风景名胜的赞美，也表达了藏族人民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心情，因而在中国文学史和藏族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清代藏族著名学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颐和园礼赞》，

可说是这些诗歌中的代表作。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林乡人，藏族，公元1737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蛇年）生，6岁时被认定为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阿旺却吉嘉措的转世灵童，被迎请到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土观活佛，并跟从当时青海著名学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受戒。土观呼图克图是清代青海著名的转世活佛，为甘青藏区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第一世土观活佛名罗桑拉丹，出身于今青海互助县李土司家，故称其转世系统为“土官”，后以土官一词不够文雅，改称“土观”。第二世土观活佛名阿旺却吉嘉措（公元1680—1736年），于1704年任佑宁寺第二十四任法台。1720年奉康熙帝之命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青海塔尔寺去拉萨坐床，得到西藏和蒙古各部上层人士的敬重。1737年乾隆帝追封已故二世土观活佛为“静修禅师”，并赐印信。乾隆帝的这一封赐，大大提高了土观活佛系统的地位，为三世土观活佛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年轻时在佑宁寺学习佛教因明学多年，19岁时（公元1755年）前往拉萨，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在拉萨7年，他主要从甘南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布为师学习因明，同时向六世班禅贝丹益西、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等人学习密宗典籍。1757年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到西藏处理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的政务，解决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拉萨与章嘉活佛交往甚密。1761年，他返回青海，任佑宁寺第三十六任法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他27岁时奉诏进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颇受乾隆帝垂青。他在京任职期间与章嘉·若必多吉在清廷活动奔走，使毁于青海罗卜藏丹津

之乱的佑宁寺得以全面修复，并参与了《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工作，因而得到朝廷和佛界人士的敬重。他从北京返回青海后，于1789—1793年任青海塔尔寺法台，在塔尔寺建立土观噶尔哇（活佛公馆）。后来他常住佑宁寺，专心著述，于公元1801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鸡年）去世，享年65岁。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大师，宗教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甚多，全集共计十七函五千七百余页。他的名作有《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传》，《宗派源流晶镜史》、《佑宁寺志》、《密宗经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自传》及诗集等。《宗派源流晶镜史》成书于1801年，全面而扼要地叙述了印度早期各种宗教及佛教、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苯教、汉地道教的历史和教义，是研究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著述。此书在19世纪末由印度人达斯译成英文，流布各国，现在有日文等译注本，国内有刘立千先生的汉译本。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全集首先由青海佑宁寺刻版刊行，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和四川德格印经院都曾翻刻印刷过他的著作。

1763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奉诏进京，当他到达北京时，正值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落成。

清朝前期国力比较强盛，皇室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了许多园林，以西山群峰为屏障而修建的京西一组大规模的园林，统称为“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这些园林以宏大秀丽著称于世。万寿山原名瓮山，山下有一瓮山泊，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修建白浮堰时，导引昌平县的白浮泉和玉泉山的泉水入瓮山泊，形成一个大水域，称为西湖。明代在瓮山上修建了一座圆静寺。1751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六十大寿，乾隆帝为了给母亲祝寿，

于一年前将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特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西湖改名为昆明湖，全园命名为清漪园。1764 年，清漪园全面竣工，费时十余年，耗银 480 多万两。清漪园建成后，乾隆帝常到园中休憩游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作为乾隆皇帝的禅师，自然有许多机会随侍皇帝到这皇家林苑中游览。乾隆皇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不仅在文治武功方面有许多建树，在语言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他在巡幸时喜爱题咏，各地风景名胜多有其墨迹。乾隆皇帝除自己写御制诗外，常命臣工唱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颐和园礼赞》有可能是酬和之作。此诗组笔调清新明快，想象奇特，堪称君臣唱和诗作中之佳品。

土观·却吉尼玛的《颐和园礼赞》，结构十分完整，前六首分别描绘清漪园中的水、鸟、花、树、山、泉，最后一首作结。每首自成一个单元，合起来又浑然一体，将整个清漪园的景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清漪园的独特景色是拥山抱水。浓绿的万寿山下，昆明湖水碧波荡漾，无限胜景，皆以昆明湖水为依托。所以，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第一首诗即写昆明湖的水：

湖水清澈，令人心爱，
像是铺展开一片绿色琉璃；
群群水鸟，点点繁星，
昼夜交替在湖中尽情沐浴。

作者以一片琉璃比喻昆明湖水，已道出了昆明湖平如明镜、水碧如染的特色。紧接着，作者并没有停留在静态的描写上，他进而写湖面上嬉戏的水鸟和夜晚倒映在湖中的繁星，想象它们也是因为喜爱这一泓碧水，所以昼夜交替在湖中沐浴，借助于水鸟和繁星，作者又巧妙地烘衬了湖水的清澈可爱，这

就从诗歌的一开头就使人感觉到作者观察景物的深刻和下笔不同凡响。

接着作者描写了园中的飞鸟和鲜花：

羽毛绚丽的各种飞鸟，
在天空变幻美妙舞姿，
鸣声像阵阵鼓乐响起，
真真是伎乐天降落尘世。

被花露沉醉的六脚蜜蜂，
盘旋在莲花金色花蕊里，
是因为贪恋芳香不肯离去，
也由于无形丝带系在脚底。

作者写鸟，写花，都没有离开写清漪园的景致。正是因为这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群鸟才在这里翻飞翱翔，自由鸣啼，如同伎乐从天而降，就是这里的鲜花，也似乎比别的地方更加美丽芬芳，吸引着蜜蜂留恋不去。作者虽然用的是藏族诗歌中习见的比喻，但在这里却别有一番深意。那使蜜蜂不能离去的丝带不也同样系在作者的脚上，使他在园中流连忘返吗？写到这里，作者自己也陶醉于那如画的美景之中了。

接下来的三首，作者进一步用拟人的手法，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清漪园的树木、山岗和泉水：

惟恐名园秀丽的脸庞，
在暑热中消退了娇嫩，
绿树撑开一柄柄阳伞，
让她在树阴下静静乘凉。

披着翠绿大氅的山岗，

山上长满名花和异草，
为使子女在怀中安睡，
山岗屹立着不动不摇。

泉水披着泡沫织成的白纱，
淙淙作响慢慢向山下流去，
被风姑娘吹落的片片花瓣，
她弯着腰耐心地一路拾取。

在作者的笔下，清漪园中的树木、山岗、泉水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树木撑伞为园林遮荫，山岗是守护着安睡的子女的母亲，泉水像披着白纱拾取落花的少女，正是由于它们的精心守护，清漪园才能永葆美妙的青春。草木有情，源于人的有情，作者写出这样美妙奇特的联想，能把草木山水写成热爱园林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形象，不正是由于作者本人对名园的热爱吗？也正是由于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他的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美妙的图画。

最后，作者总结道：

园中平地、山岗和湖边，
树阴遮覆，像天生处处亭楼，
珍宝堆聚，巧修成座座宫殿，
神力人工，在这里比美竞秀。

清漪园建成后不到百年，1860 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三山五园”中的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者劫掠一空，不仅圆明园被焚毁，清漪园也遭到劫难。1885 年，慈禧太后开始修复清漪园，到 1892 年完成，更名为颐和园。今天，颐和园是北京现存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典园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我国

各族劳动人民和国外友人来这里游览的，络绎不绝，人们在颐和园中仍然可以得到与土观·洛桑却吉尼玛200多年前一样的美的享受。

近年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相信，倾注了许多藏族学者的心血的其他藏族古典诗文中的精华，也必然会受到人们的珍视和赞美，并更加广泛地展开对藏族古典文学的研究，取得更多的丰硕成果。

原载《藏学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

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公元1617—1682年）是公元17世纪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1617年10月21日（藏历第十饶迥火蛇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谷的琼结（vphyong rgyas，今西藏自治区琼结县）。1622年由当时担任扎什伦布寺住持的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公元1567—1662年）等人主持，寻访到三个灵异儿童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公元1589—1616年）的转世的候选人，在热振寺举行摇糌粑团子挑选，选中他为转世灵童，经过哲蚌寺的代表和支持格鲁派的土默特蒙古首领的代表向当时控制西藏地方行政权力的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通报，并经第悉藏巴同意，把他迎请到哲蚌寺坐床，使他成为第五世达赖喇嘛。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公元1582—1654年）率兵入藏，与格鲁派联合攻灭第悉藏巴政权，格鲁派与固始汗联合掌握了西藏的宗教和行政权力，五世达赖喇嘛因而成为西藏最主要的宗教和政治领袖。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因清朝顺治皇帝的召

请从拉萨到北京朝觐，并在 1653 年春夏之交，在返回拉萨的途中，清朝顺治皇帝派大臣到内蒙古凉城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于 1653 年年底回到拉萨。1655 年 1 月（藏历木马年十二月），被清朝册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的固始汗图鲁拜琥在拉萨病逝后，五世达赖喇嘛逐步地把委任西藏行政负责人第巴和各级僧俗官员，以及给贵族、寺院封赐庄园、土地、属民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特别是在 1658 年 4 月（藏历三月）首任第巴索南饶丹去世后，他先后任命自己的亲信和侍从仲麦巴·赤列嘉措（grong smad pa vphrin las rgya mtsho，1660 年藏历七月至 1668 年藏历二月任第巴）、洛桑图道（blo bzang thub stobs，1669 年藏历八月至 1675 年藏历七月任第巴）、洛桑金巴（blo bzang sbyin pa，1675 年藏历七月至 1679 年藏历二月任第巴）、仲麦巴·桑结嘉措（grong smad pa sangs rgyas rgya mtsho，1679 年藏历二月至 1705 年年初任第巴）担任负责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第巴职务，更使五世达赖喇嘛在实际上牢固地控制了大部分的政教权力。

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大权在握的政治宗教领袖，他对当时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努力增进西藏和清朝中央政府和蒙古各部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文化联系，在清朝初年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中维持了西藏地区的相对平静，使得西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西藏文化的一个新的高潮时代。同时，五世达赖喇嘛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一生中勤奋学习佛学和各种传统文化知识，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他在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历算、藏医药、工艺美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许多作品被后世奉为经典之作。由于他的政教地位和杰出的学术成就，使他

在当时和身后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他被西藏广大僧俗人士敬称为“阿巴钦波”（lnga pa chen po，意为伟大的五世）。

作为17世纪西藏政治宗教领袖和一代宗教文化大师，五世达赖喇嘛与他以前的一些宗教领袖相比，他与当时东亚各种民族宗教文化接触的机会要更多一些。他在从拉萨到北京的往返途中，曾与汉地佛教的僧人、西宁的伊斯兰教的人士有过接触，甚至有可能在北京接触过当时在清朝朝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他的自传中提到过给顺治皇帝掌管钦天监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名字和事迹。通过他在蒙古准噶尔部的弟子噶尔丹汗，五世达赖喇嘛收到过大概是来自俄罗斯的西方工艺品。五世达赖喇嘛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宗教领袖，他努力了解和吸收各种外民族的文化，希望把它们容纳到藏族文化之中，促进藏族文化的发展。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的联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五世达赖喇嘛对佛教徒认为是宗教圣地的印度的文化，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亲近之感，其兴趣有时远远超出对其他文化的兴趣。不过由于印度在17世纪佛教已经绝迹，所以像许多西藏的佛教徒一样，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向往与实际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17世纪西藏文化与印度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的渊源感，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自传中关于他的家族的来历的大段叙述之中。五世达赖喇嘛说，他出身的西藏山南的琼结巴家族（vphyong rgyas pa）亦名萨霍尔家族（za hor），源于古代孟加拉地区的萨霍尔国的王族。萨霍尔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的附近，在印度的波罗王朝和森那王朝时期是依附于这两个王朝的一个小邦。五世达赖喇嘛说琼结巴家族的先祖达玛巴拉（dha ma pa ra）是吐

蕃赞普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公元755—797年在位）时在西藏传播佛教的著名印度高僧寂护（zhi ba vtsho）的侄子，随同寂护入藏，并在西藏娶妻生子，繁衍后裔，后来发展成为琼结巴家族。[①] 五世达赖喇嘛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来源于他的家族内部的一种世系传说，因为在此前的历史文献中还没有见到足以证实此事的资料记载。琼结巴家族在西藏发达起来开始于霍尔·宣努桑布（hor gzhon nu bzang po），他是公元14世纪中叶取代萨迦政权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的建立者大司徒绛曲坚赞（tavi si tu byang chub rgyal mtshan，公元1302—1364年）的主要家臣，为帕竹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许多战功，并因此成为世袭的显要贵族。大司徒绛曲坚赞的自传中对霍尔·宣努桑布的事迹有很详细的记述，但是并没有提到霍尔·宣努桑布的家族是印度萨霍尔王族的后裔，甚至没有提到后来广泛使用的冠于宣努桑布名字之前的“霍尔”这一表明该家族与萨霍尔王族的血缘关系的姓氏，可见至少在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时期这一家世传说在社会上还没有广泛流传，或者还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②] 但是，从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琼结巴家族与印度萨霍尔王族的渊源关系来看，家族内部的这一家世传说从幼年时代起就对五世达赖喇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幼年的五世达赖喇嘛对印度文化产生强烈兴趣的另一个

---

① 五世达赖喇嘛著：《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21—23页。另见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文版，第163—166页。

② 大司徒·绛曲坚赞：《朗氏家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编辑室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第148页、348页、366页。赞拉阿旺、佘万志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104—105页、249—250页。

重要因素可能是在西藏十分著名的觉囊派（jo nang pa）的高僧多罗那它（taranata），他是以记载印度佛教历史而著称于世的藏文《印度佛教史》的作者，是当时控制后藏地区的第悉藏巴家族信奉的主要上师之一，也是五世达赖喇嘛的母亲贡噶拉则所出身的浪卡子家族所供奉的宗教上师。五世达赖喇嘛的父母的婚姻曾请他占卜测算，受到他的祝福。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后第一个为他祝福起名的人即是多罗那它，[1] 在他三岁时就因为琼结地方的动乱而由母亲带到浪卡子舅父家中生活，直到六岁时被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这些年中护持和影响他的主要宗教上师即是多罗那它。尽管后来作为格鲁派首领的五世达赖喇嘛对觉囊派和多罗那它的“他空见”理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多罗那它以及外祖父家的人士对印度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的强烈兴趣和丰富知识仍有可能对年幼的五世达赖喇嘛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从1622年起，五世达赖喇嘛在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林麦夏仲·嘉央官却群培（gling smad zhabs drung vjam dbyang chos vphel）等人的指导下按照格鲁派的例规学习佛法经论。自宗喀巴大师开始，格鲁派僧人的学佛和修行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主要的教程是使用西藏的高僧特别是格鲁派的学者对佛教经论的注疏和阐释。但是年轻好学的五世达赖喇嘛在学习的过程中仍然对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文化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说，在他15岁的前后，虽然蒙古各部的首领们多次邀请他去蒙古，而且许多格鲁派的僧俗人士为了格鲁派的生存和发展也极力鼓动他去蒙古，但是他始终不

① 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43—44页。

情愿去蒙古地方，而是对以前西藏的高僧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玛尔巴（mar pa）等人到印度去学习佛法然后返回西藏弘扬佛法的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向往之情。他当时很想效法他们前去印度学习，但是后来因为受到种种的限制，不能前去印度，这种念头也就逐渐地消失了。①

分析五世达赖喇嘛不能去印度学习的原因，应当是当时西藏和印度的客观历史环境决定了像他这样的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不可能再去印度学习佛教。从西藏方面来看，藏传佛教从后弘期开始出现了众多的教派，而且公元13世纪以后各教派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结合更加紧密，许多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地方上的重要的政治领袖，他们必须把许多精力用在地方政治和宗教事务之中。同时各教派之间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断断续续的冲突和斗争，各教派与汉地、蒙古的政治宗教关系也需要这些宗教领袖们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从萨迦派的八思巴（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公元1235—1280年）开始，再没有作为藏传佛教的教派的宗师或首领的西藏高僧到印度去学习佛教的记载。这也可以说是从13世纪中期开始，印度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逐步衰减，那以后藏传佛教的发展和演变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看到，藏传佛教早期的诸教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等，在其创立的阶段或者是有印度的高僧入藏传法，或者是有西藏的高僧到印度去学习佛法，但是到14、15世纪之交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的时期，这种事例就没有再出现。另一方面从当时印度的情况来看，五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佛教的一位领袖也不可能去印度学习佛教。从8世纪开始，佛教在印度就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已经开始衰落了，先是印度教，接着是伊斯兰教成为印度的主要的宗教，到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大部绝迹。还在五世达赖喇嘛出生之前约100年，原先活动在中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人进入印度，并建立起一个统治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的莫卧儿王朝。五世达赖喇嘛生活的时代，正是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公元1556—1707年）。1602—1658年在位的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杰汗吉尔和沙阿·杰汗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还对印度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而1659—1707年在位的奥朗则布则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1669年他下令禁止印度教，毁坏印度教的寺庙甚多，以强力推行伊斯兰教。印度教尚且如此，印度佛教的寺庙和僧团组织更早已是历史的陈迹。在这种形势下，五世达赖喇嘛即使到了印度，也无学习佛法之可能。[①] 多罗那它撰写《印度佛教史》的材料多来自入藏的印度零星旅客的口述，五世达赖喇嘛时仍有一些印度的印度教徒入藏，因此格鲁派人士和五世达赖喇嘛对印度的宗教情形是大致了解的，他们也不可能认真地考虑实行到印度去学习佛教的任何计划。

尽管如此，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一生中对印度文化仍然抱有极大的热情。根据五世达赖喇嘛自己所著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他始终在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和学习、吸收印度的各种文化知识，就现有的资料记载看，他对印度文化的巨大的热情主要表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

① 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132页。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5—480页。

一、努力学习梵文和梵语语言学

五世达赖喇嘛在学完格鲁派规定的学经僧人必修的显宗经论并且接受比丘戒之后，仍然十分热心地学习各种知识。1638年他在哲蚌寺以宁玛派的高僧苏尔钦波为师继续学习历算、占星术、声明学、《造像量度经》等。由于西藏的这些学科的知识和读本大多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他深感要学通这些学科，需要认真学习梵文，于是他又跟从拉萨地区的学者香喀哇·坚贝多吉（zhang mkhar ba vjam dpal rdo rje）学习梵文。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因为当时西藏真正精通梵文的学者很少，香喀哇·坚贝多吉就向五世达赖喇嘛推荐了甲尔波译师·喜饶巴桑（rgyar po lo tswa ba shes rab dpal bzang）等人，请他选择良师继续学习梵文。次年，五世达赖喇嘛派人去召请甲尔波译师·喜饶巴桑前来传授梵文，才知道甲尔波译师·喜饶巴桑已经去世多年，于是只好以达垄译师、芒域译师·才旦坚赞等人为师继续学习梵文，并自己阅读在西藏流传的《声明集分论》、《旃陀罗波声明论》、《诗镜论》等梵文著作。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学习梵文，还不顾当时格鲁派的一些高层人士的批评和嘲讽，派人召请后藏学者班钦门卓巴的俗人弟子嘉央旺杰多吉到哲蚌寺，以他为师学习仁蚌巴·阿旺济扎所写的《诗镜论注疏》、《声律学》等著作。①

通过自己认真学习梵文所遇到的困难，五世达赖喇嘛痛感当时藏传佛教界中学习梵文的传统的衰落，于是决心创造机会

---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178页。

直接向印度学者学习梵文。1655年年初，有一个名叫班智达郭古拉（pandita go gvo la）的印度人（可能是印度教的僧侣）在西藏云游之后要返回印度波罗奈斯城，波罗奈斯是印度的佛教历史名城，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向往的圣地，所以五世达赖喇嘛听说后，在色拉寺会见了他，赠给他黄金等贵重礼品，并请他帮助在印度搜求有关《波你尼声明论》的典籍，约请其兄班智达瓦拉巴扎（pandita ba labha dra）一起前来西藏。1658年藏历五月，班智达郭古拉和其兄班智达瓦拉巴扎一同到达拉萨，并带来了在印度找到的《波你尼声明论》的梵文书籍。五世达赖喇嘛即请他们兄弟为自己讲授《波你尼声明论》，由一个名叫达尔巴译师（dar pa lo tswa ba）的西藏人在他们之间充当口语翻译。五世达赖喇嘛这次以印度游方僧人为师学习梵文，持续了半年多。他还命达尔巴译师在担任教学的口语翻译的同时，与班智达郭古拉兄弟一起把《波你尼声明论》译成藏文。到1659年藏历二月中，达尔巴译师和班智达郭古拉兄弟完成了把《波你尼声明论》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工作，五世达赖喇嘛为此赠给班智达郭古拉兄弟衣服各一套、黄金110钱、白银150两，礼送他们返回印度。[①] 像五世达赖喇嘛这样在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以后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学习梵文，并直接以印度学者为师进行学习的，在西藏历史上并不多见，在他以后的历辈达赖喇嘛中，也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事例。

---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页，534—535页。

二、热心吸收印度的医学知识

五世达赖喇嘛始终对西藏医学给予极大的重视，就在格鲁派1642年在前后藏取得掌权地位的次年，他下令在他的本寺哲蚌寺创建一所以尼塘仲钦·洛桑嘉措为导师，以强俄巴·囊索达杰为主管的索哇卓盘林（医学利众院）学校，在日喀则创建以擦绒巴为主管的常松堆白林（仙人会聚院）学校，聚集医学人才，招收有志于医学的青年，学习和传播西藏的医学知识。五世达赖喇嘛自己也很喜欢阅读医学书籍，他还多次亲自主持学习医学的青年僧人参加的藏医《四部医典》的考试，并对一些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特别是由于他从青少年时开始，就每年到西藏各地旅行，还长途旅行到北京，所以到他40岁以后，常患手脚疼痛之病，身边经常离不开医生。在当时西藏的医疗条件下，除由擦绒巴（cha-rong-pa）、强俄巴（byang-ngos-pa）、达尔巴（dar-pa）等几家医生世家的医生用药物和针刺放血等方法治疗外，还经常在前后藏各地区的主要寺院举行大规模的诵经法事，祈祷五世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五世达赖喇嘛还按照他的医生们的建议，到一些著名的温泉去洗浴，或取来泉水擦洗疼痛部位，以求治好疾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世达赖喇嘛对医学和医生特别重视和关心。他曾经给擦绒巴、强俄巴、达尔巴等医生家族赐给庄园和属民，使他们成为世袭的贵族，在当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仅对西藏的医生如此，五世达赖喇嘛对当时零星入藏的汉族医生也很重视，请他们在西藏传授医学知识，给病人看病。也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五世达赖喇嘛对印度的医学也有强烈的兴趣，他和当时入藏的一些印度云游僧有过一些交往，并争取他们帮助治疗自己的疾

病。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在他 50 岁以后和印度的游方僧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件：

1672 年 11 月 8 日（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鼠年十月十九日），一个名叫扎夏纳邬达雅的班智达（pandita grashanaudaya）从印度来到拉萨，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一些用印度各圣地的泥土做成的泥丸，并献上一首赞颂达赖喇嘛的梵文诗，这首诗由达尔巴译师译成藏文，很受五世达赖喇嘛喜爱，达赖喇嘛赠给印度班智达黄金等物品。①

1674 年 8 月 24 日（藏历第十一饶迥木虎年七月二十四日），西印度罗那提婆（rvanadeva）地方的舍雅什雅穆格日（senaysiyasmagiri）和郭尔达那（gordana）二人来到拉萨，向五世达赖喇嘛献上两瓶恒河水，达赖喇嘛回赠他们黄金五钱等物品。恒河是婆罗门教、印度教崇拜的圣河，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许多赞颂恒河的故事和诗歌也被佛教的典籍所吸收，西藏的佛教徒正是通过佛经故事和印度文学作品的藏文译本了解恒河的。这两位印度人以恒河河水来献给达赖喇嘛，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印度教教徒，五世达赖喇嘛接受印度人所献的恒河河水，除了宗教文化的感情之外，更重要的极可能是受了印度人关于恒河河水可以净除罪业、医治病痛的说法的影响，恒河河水不仅被当作带来吉祥的圣水，也可能是用作擦洗疼痛的手脚的药水。②

1675 年 5 月 23 日（藏历第十一饶迥木兔年三月二十九日），五世达赖喇嘛派人把当时在西藏云游的印度医生玛纳霍（rmanaho）请到拉萨，并派自己的医生达摩哇向玛纳霍学习医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05 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13 页。

术，玛纳霍和达摩哇为许多人治好了眼病。五世达赖喇嘛还下令由第巴供给玛纳霍在拉萨停留期间的生活所需，以及他返回印度时所需要的沿途取得差役供应的路引文书等。[①] 同年6月17日（藏历四月二十五日），又有印度罗奈斯城的婆罗门哈日达娑（bram ze haridvasa）和茶雅达娑（jayadasa）二人来到拉萨，向五世达赖喇嘛献恒河河水，五世达赖喇嘛回赠给他们黄金及粮食等物品。[②]

1677年8月9日（藏历第十一饶迥火蛇年七月十一日），五世达赖喇嘛会见了印度游方僧赞玛格底（Araya jamakvirti）、玛努那（manunva）、毕夏巴（vishapa）等人，并赠给他们黄金和绸布等物品。[③] 同年9月2日（藏历八月五日），五世达赖喇嘛又会见了印度婆罗奈斯城的婆罗门姿那巴底（bram ze Jinawanti）和噶尼夏德哇日（ganeshatevari），看来这两位婆罗门是有学问的印度教僧侣，所以五世达赖喇嘛专门向他们询问了一些印度教的教义和神祇的问题。听了他们的回答后，五世达赖喇嘛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他们大概是遍入天（即婆罗门教信奉的造物主毗湿奴或译毗瑟纽）的信奉者。五世达赖喇嘛还赐给他们黄金、茶叶和褐布等物品。[④] 同年11月29日（藏历十月六日），又有一个印度的婆罗门提婆难陀（bram ze Devananda）来到拉萨，向五世达赖喇嘛献海龟、歌舞鸟（bya me na 鹦鹉?）、石黄等印度的方物，五世达赖喇嘛回赠黄金、茶叶、绸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476页。

② 同上。

③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89页，95页。

④ 同上。

缎、红色褐布等物品，并发给他返回印度时所需路引文书，还给陪同他前来拉萨的印度人迦迦罗室利赠送黄金、茶叶等。[①]

1679年10月29日（藏历第十一饶迥土羊年九月二十六日），五世达赖喇嘛会见了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地区的小邦国王那罗哈日鸠摩罗派来的婆罗门罗摩旃陀（Rvamacandra）、雅夏曼达格日（Yashamantagiri），接受了他们带来的国王的书信和礼物，并回赠了银元宝、黄金等物品。[②]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时期，仍然有一些印度的游方僧和医生、使者等人士先后到西藏旅行，五世达赖喇嘛出于对印度文化的热情，与这些印度人士有过多次接触。由于当时印度宗教文化的演变，佛教的衰落，西藏和印度的宗教文化交流已经难以和吐蕃王朝时代相比，甚至和元明时代相比也大为逊色，所以没有见到传播或讲论佛法的任何记载。但是五世达赖喇嘛与印度文化的这些接触，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另外，《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还记载了一件西藏和印度文化关系的趣闻。1656年8月8日（藏历第十一饶迥火猴年六月十八日），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释迦罗遮（Shakya Raja）国王的次子孟加拉的执政者沙哈苏扎（Shahasuja）派遣穆罕默德沙贝（Mahvadhashapi）等来到拉萨，向五世达赖喇嘛献了许多印度及西方的财货作为礼品。从使者的名字看，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人，而当时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国王正是沙阿·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89页，95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该书藏文版上、中、下三册已由陈庆英、马连龙、马林汉译，即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杰汗（公元1628—1658年在位），正与五世达赖喇嘛所记的释迦罗遮相符合（罗遮 Raja 为梵语，意为国王，释迦 shakya 当为沙阿·杰的音译。不过从五世达赖喇嘛称他为释迦罗遮来看，释迦罗遮正是沙阿·杰汗的完整准确的对译，莫卧儿王朝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国王使用这样一个完全是印度的传统的名字和称号，正反映了从沙阿·杰汗的祖父阿克巴开始的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实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使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室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五世达赖喇嘛说，印度使者此次来拉萨是为了国王宝座上所需要的许多水晶石饰件，因为拉萨附近的“旬”（shun）地方有一个叫做“白水晶石洞”（shel dkar brag khung）的岩洞，相传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行地，许多朝山者宣称里面有水晶石的柱子和屋梁，此话如鼠穴通异地一般传到了印度，所以印度国王派使者前来求取。[①]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位莫卧儿国王沙阿·杰汗在他在位时用了22年的时间（公元1632—1654年）在亚格拉为王后穆姆塔斯·莫哈尔兴建了举世闻名的陵墓——泰姬陵。泰姬陵的墙面用纯白色的大理石砌成，它坐落在一个规整的花园中，背后是朱木那河，庄严的白色大理石墙面和伊斯兰风格的尖塔在印度灿烂的阳光下闪烁，光彩夺目，和陵墓前的水池倒影交相辉映，产生一种秀美和宏伟奇妙相混合的感觉，被几乎所有的观光者认为是无法描述的奇迹。[②] 此次莫卧儿国王的使者到拉萨，由于是听信错误的传闻而来，自然不能取得任何成果，

---

①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496页。

② 叶公贤、王迪民编著:《印度美术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

只能空手而回，五世达赖喇嘛还就此评论说“错把假象当真情，是众生流转轮回的根本原因，这些人正是如此”。但是我们考虑到沙阿·杰汗兴建泰姬陵和五世达赖喇嘛兴建布达拉宫差不多是同一时期，而这两座建筑现今都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那么沙阿·杰汗派使者到西藏访求水晶石一类奇异的建筑材料或者就是为了实地察看传说中的水晶石岩洞的建筑，不论是否有具体的收获，这都是西藏和印度文化交往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从汉文史籍看，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史来说，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一个高峰期，史料记载很多，元明时期也仍有不少交往，史料中还有一些记载，但是到了清代，中印文化交流的记载就十分罕见。从已知的藏文资料来看，也是记载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印度的宗教文化交流的资料较多，至元明时期的高僧传和教法史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印度的记载，进入清朝以后此类记载就很少见。所以，《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的这些记载虽然显得很零散，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但是从年代的准确、记事的可信程度来说，从填补资料空缺来说，这些记载仍然是值得重视和发掘的。

原载《西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弘宣佛法与记录人生

——略说藏传佛教传记文学作品

藏族的佛教文学作品中，人物传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等描写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作品，总数有多少，至今尚难估计。类似于汉文名僧传、高僧传的人物合传，在藏文中多以教法史、教派史、寺院志、家族史的形式出现，如第悉桑结嘉措编著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一书，在讲述格鲁派各寺院的历史时，记载了各个寺院和扎仓的历任住持和堪布，有的附有简略事迹，亦可以看作是格鲁派高僧的一部合传①；又如阿旺贡噶索南所著《萨迦世系史》，记载了萨迦款氏家族的数十个人物的事迹，其中多数是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所以也可以看作是萨迦派高僧的一部合传；② 而阿芒班智达所著的《拉卜楞寺志》，记载了拉卜楞寺的历任法台和密宗、

① 第悉桑结嘉措编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

② 阿旺贡噶索南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此书有陈庆英、周润年、高禾夫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时轮、曼巴等扎仓的历任堪布的事迹；色多罗桑崔臣嘉措所著的《塔尔寺志》，记载了塔尔寺的历任法台和显宗、密宗、时轮、曼巴等各个扎仓的历任堪布的事迹，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高僧的合传[①]；篇幅更为巨大的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的《安多政教史》，记载了甘肃、青海、川西北藏族地区的主要寺院的历任法台和堪布的主要事迹，涉及的人物达数百名，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安多地区的格鲁派高僧的一部合传。[②] 近年出版的藏学图书中，在北京的民族图书馆从1984年起，出版其馆藏书目《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至1997年已出齐上中下三册，该目录收入有文集传世的学者183人，除个别人如第悉桑结嘉措为在家俗人以及有少数人为用藏文写作的蒙古僧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藏族高僧。该目录对这183人均附有一简略的小传，而这些简略小传大多是依据他们的藏文传记编写的。1990年5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八世达赖喇嘛坚白嘉措的经师益西坚赞于藏历第十三饶迥火羊年（公元1787年）遵照八世达赖喇嘛的指示编写的《道次师承传》（藏文版），收集有噶当派和格鲁派的重要高僧约70人的小传。这些目录类书籍收集的只是藏族社会上广有名声的著名人物的传记，其他散布在各个寺院和私家藏书中的高僧传记，其数量应该更多，有的著作称藏文的高僧大德的传记“就目前已见著录的便不下千种之多”。

如果只就已知的高僧合传中立传的人数来说，汉文高僧传

---

① 阿芒班智达著，毛兰木嘉措校订：《拉卜楞寺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色多罗桑崔臣嘉措著《塔尔寺志》，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此书有郭和卿汉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主编：《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修订再版，下册，第515页。

有南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十四卷，收入高僧257人，附见者又200余人，唐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收入高僧485人，附见者又219人，宋释赞宁撰《宋高僧传》，收入高僧532人，附见者又125人，[①] 明如惺撰《明高僧传》，收入高僧138人，附见者又71人，总数几近2000人之多，20世纪又有严修撰《新续高僧传四集》，接《宋高僧传》，收入1500多人[②]，使有传的汉僧总数达3300人以上。藏文高僧传立传之高僧数可能不及汉文之多，但也相差不是很多。而且汉文史籍中为高僧单独写传者十分罕见，惟玄奘有十卷本之传记，而藏文史籍中为高僧单独写传者，则为数甚多，而且此种高僧个人的传记又品种繁多，有弟子为上师写传，有师父为弟子写传，有数代之后的弟子为先祖师写传，有高僧为自己写的自传，有纯用偈颂体写的传记，有偈颂体与散文体结合的传记，还有纯用散文体写的传记，此外还有高僧记述修习密法经过和体验的秘传，有弟子记述上师奇异事迹的秘传等。汉文高僧传自释慧皎开始，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十门，对传主的家世、经历、社会活动等记述简略，只突出他在佛教的某一方面的事迹，因而文字程式化，文学性不强。而藏文的许多高僧传能够以一部书专写一人，对其家世、经历、社会活动等往往能够做充分的描述，而且用偈颂、民谚、典故、对话等文学语言加以细腻的描述，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藏文此种传记文学作品数量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泛、史料价值之珍贵，不仅汉文的高

---

①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毛双民：《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三朝高僧传》，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8页。

僧传与之相比显得逊色，就是在整个佛教世界的文化遗产中，也属十分罕见。因而藏文的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应当引起研究佛教文学的学者特别的重视。

藏文佛教传记文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甚至它的一些文学特点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藏族先民还生活在各个分散的部落之中时，民间的口头文学即有相当的发展，这种口头文学的内容，以苯教的神灵故事、部落首领的传说和动物的故事为主。吐蕃王朝建立时代，王室的故事与官方的历史记载相结合，成为社会文学之主体。《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历代赞普传略和大相的故事，可以说是此种文学作品发展的最高峰。这些作品文字简洁，生动记述了历代赞普开疆拓土、统一诸部和平定内乱的功绩，记录了吐蕃王朝历史的许多主要方面。在文学形式上，赞普传略在散文叙述中插入长段的诗歌体的对话、诗歌体的对话中又广泛采用形象的比喻、大量使用民间谚语、在记述中自然地加入苯教的宗教观念和术语，这些特点都为后来的藏文佛教传记文学所继承①。另外，在吐蕃王朝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藏文的创制和推广，翻译佛教经典的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些佛经故事和佛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故事被翻译成藏文，藏族传统的口头文学形式和佛教文学作品的接触，为藏文佛教传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吐蕃王朝时代佛教依赖于吐蕃王室的扶植和印度高僧的入藏传法，吐蕃有出家僧人实始于公元 779 年桑耶寺建成以后，至 843 年朗达玛赞普灭佛，不到 80 年，这期间佛教

---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 年版，赞普传记部分。

寺院在政治、经济上都仰仗于吐蕃王室的支持和保护，虽然在赞普赤德松赞和热巴巾时期有钵阐布娘·定埃增、贝吉云丹位居群臣之上，有参与国政之权，但是总的来说，佛教首领的地位还无法与赞普相比。因此虽然在吐蕃王朝时期已经有不少关于吐蕃高僧的事迹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并且在据信撰写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协》（亦称《桑耶寺志》）一书中用文字记录了巴·塞囊和桑希、毗卢遮那等吐蕃的最早的佛教僧人的事迹，但是在书中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赞普墀松德赞从出生到晚年的事迹，居于主要的地位，[①] 在谐拉康的两通碑文中讲述了钵阐布娘·定埃增的功绩，但是碑文是赞普以君上对臣下的语气写成，也并未详细介绍娘·定埃增的生平和学佛传法的经历。[②] 因此，可以说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的传记文学还处在萌芽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佛教高僧的传记文学作品。

公元843年赞普朗达玛灭法，造成西藏地区佛教中断近百年之久，到10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复兴，进入后弘期。后弘期的佛教是在西藏的分裂割据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没有吐蕃王朝那样的统一政权的情况下，佛教依靠与分散的地方政治势力的结合而发展，因而在后弘期中出现了因师徒传承和教法仪轨的不同而形成的教派。教派形成之初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各派僧人对佛法教理和修行仪轨的探索，而且刺激了佛教文学在西藏的发展。在后弘期出现的佛教文学作品中，传记文学以其易懂易记、便于在民间流布的特点首先占据了重要地位。复兴的佛教在理论上和感情上都极力把自己和

① 巴·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巴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直接联系起来，所以早期出现的作品多以“伏藏”的形式即宣称是吐蕃王朝时期为避免法难而埋藏的经典，这些作品都以一种真假参半的吐蕃王朝时期的作品的面貌出现，同时也就限定了它们的内容以吐蕃王朝时期的往事为主。由于这一原因，松赞干布、墀松德赞、热巴巾“祖孙三法王”尤其是吐蕃王朝的开创者松赞干布成为“伏藏”作品的主要赞颂和描述的对象，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学代表作品有《噶钦噶阔玛》（亦译《松赞干布遗教》）①、《玛尼全集》②、《娘氏教法史》③、《第吾教法史》④ 等，都是以松赞干布为主要人物，集合有关松赞干布的各种传说故事，并加以详尽的文学描写，把松赞干布奉为观世音菩萨为教化雪域众生而降世的化身，把松赞干布的历史功绩和迎娶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兴建拉萨大昭寺、小昭寺等弘扬佛法的伟业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佛教的菩萨降世传法的文学传记。同时，松赞干布创建吐蕃王朝、建立吐蕃王朝的军事行政制度、创制藏文、统一青藏高原等历史事迹也仰赖这些佛教为弘法而作的文学作品而保存下来。墀松德赞、热巴巾的事迹亦以护持佛法的法王的形式而流传于世。另外，“伏藏”作品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印度的高僧莲花生大师，著名的《莲花生大师传》⑤ 以及他的明妃益希错杰的传记

---

① 亦译《柱间史》，相传是阿底峡大师 1049 年从拉萨大昭寺的柱子内取出，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亦译《嘛呢全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 年铅印出版。

③ 娘·尼玛沃色著：《娘氏教法史》，亦译《娘氏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铅印出版。

④ 第吴贤者著：《第吾教法史》，亦译《第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铅印出版。

⑤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了《莲花生大师传》的汉译本。

即写成于这一时期。松赞干布和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的流行，反映了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初期佛教传记文学对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传统的继承，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各教派对密法的重视超过对显教的重视，而莲花生大师的传奇故事又极富文学色彩，故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在人们所记忆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印度和吐蕃的佛教僧人中占据了最为突出的地位。

随着西藏佛教教派的发展，各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宣扬本教派的教理和教法，吸引社会各阶层的信众，总之为了使自己的教派在当时的藏族社会上站稳脚跟，必然在继承吐蕃王朝佛教的遗产的同时，在佛教文学作品中加进自己教派的内容。在宣传自己教派的过程中，将本教派的祖师和高僧神格化和形象化，叙述他们的出生和家世（有的还述及他们是菩萨的化身或者关于他们的降生存在某一些授记等）、信奉佛法的缘起、学习佛法的经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的功绩、修习密法的成就等，以此作为范例进行宣传，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一批以后弘期的西藏佛教人物为传主的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就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中，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萨迦派、帕竹噶举派的高僧传，这些教派与某一特定的家族紧密联系，教主由该家族的成员世代承继，故传记中详细记述该家族的历史传说，强调家族的神圣，在佛教内容之中，又加入传统神灵崇拜的内容，不过历代家族成员弘扬佛法的事迹仍然是传记作品的主要内容，此类作品以《萨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萨迦班智达传》为其代表。现在所见到的《萨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固然已经经过若干世纪的不断的补充和加工，但此种特点是在其形成阶段即已成为格式。同时，这类作品中突出高僧兴建寺院、招徕属民、广收门徒、调解纠纷、安定地方、撰写论著、接纳地方首领、获得布施等事迹，大乘显

教的入世思想的倾向显得突出。另一类是宁玛派、噶当派、噶玛噶举派的高僧传，强调潜心修行，不染尘缘、不畏艰苦、舍弃今生利乐追求即身成佛，表现了后弘期佛教中一般僧人对佛法的执著的追求。此类作品以《玛尔巴传》①、《米拉日巴传》②、《仁钦桑布传》为代表，尤其以《米拉日巴传》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米拉日巴传》以米拉日巴对其弟子热穷巴的讲述的形式写成，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虽然现在通行的是在15世纪时由桑结坚赞整理加工写成的定本，但是其蓝本可能即是热穷巴在12世纪所写的当时的记录。《米拉日巴传》通过米拉日巴幼年时家产被夺，母子受苦，投师学习咒术，以咒术报仇雪恨，后来悔罪学习佛法，拜玛尔巴为师，几经磨难才得到传授，然后自己单身在雪山艰苦修行，直到获得成就，颂扬了他为求法艰苦卓绝、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类作品中突出了大乘密教的出世的思想，同时也以强烈的文学色彩感染藏族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藏文的佛教传记文学的这两种主要类型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前一种强调入世功绩的类型的后继作品，可以《萨迦世系史》的续编、《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传》③、《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④ 为代表。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出身于夏卡哇家族，在元末明初该家族成为统治江孜地方的贵族，热丹贡桑帕巴1418年创建江孜白居寺，成为政教结合的地方统治者，他

① 查同结布著：《玛尔巴译师传》，藏文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张天锁等人的汉译本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此书的藏文本和汉译本都有几种版本。

③ 晋美扎巴著：《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藏文本由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陈庆英、马连龙汉译本由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的传记记载了该家族的历史、白居寺的创建过程、他对地方政治宗教的管理乃至他与周围各地方首领的交往和政治军事斗争等。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为清朝乾隆皇帝所尊崇的喇嘛，对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和西藏地方当时的政治都有重要影响，他的传记除记载他参与创建雍和宫寺院、学习佛法、在五台山修行、翻译藏文大藏经为满文、教授弟子等佛教活动以外，还记载了他参与清朝对蒙古西藏的管理的许多政治活动。后一类强调出世学法的后继作品，可以《至尊宗喀巴大师传》[①] 为代表。宗喀巴大师在明朝初年，以其毕生精力学习佛法、教授弟子，创建了后来成为藏传佛教主流的格鲁派，被弟子们尊奉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以全身心修习佛法、在显密教法方面都获得最高成就的典范。宗喀巴大师圆寂后，即有他的亲传弟子克珠杰（后来被尊为一世班禅大师）所写的《宗喀巴大师传》刊布于世，后来蒙藏地区的许多格鲁派的高僧依据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和对宗喀巴大师的认识，撰写了许多部不同体裁的宗喀巴大师传，其中影响巨大的是周加巷所著的《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此外，现已铅印出版的《博东班钦传》[②]、《汤东杰布传》[③]、《夏嘎巴传》[④] 等也属于这一类型。

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对藏文的佛教传记文学的长期兴盛

---

① 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藏文本由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郭和卿汉译本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② 吉麦邦：《博东班钦传》，藏文本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③ 居美德钦：《汤东杰布传》，藏文本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年版，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④ 此夏嘎巴为清代宁玛派高僧，此传记是他所写的自传，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 年版。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活佛转世以佛教的轮回思想和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为理论基础，认为菩萨经过无数劫的修持，行六波罗蜜获得正果之后，为了履行其普渡众生的宏愿，推迟进入涅槃世界，以化身在世间利乐众生，这样的化身与因为业缘和无明而漂流轮回的众生不同，在历代的转世中能够不迷失其本性，能够前后世灵性相通。从现实社会的观点来看，活佛转世至少代表了人们对历史上德高望重、功绩卓著、学识渊博的著名高僧大德的实在的纪念，同时通过后世对前辈的学识功德的继承，建立起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以外的另一种传承方式，对于实行政教结合并常常处于教派竞争之中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领袖人物的继承方式。自 13 世纪噶玛噶举派首先采用活佛转世以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纷纷实行，至明清两代藏族地区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活佛转世制度的理论和寻访、认定活佛的转世灵童，更突出了记录历辈活佛的事迹和言论的重要。因此，为历辈活佛立传成为活佛转世系统能够维系和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历辈活佛的政治、经济、宗教地位的继承，又使得各个活佛在佛教僧人处于某种比较优越的地位，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和著述的活动。因此，活佛转世制度普遍实行以后的明清两代有大量的藏文的活佛传记出现，就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

在为数众多的活佛传记中，以历辈达赖喇嘛和历辈班禅大师的传记最为重要。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宗教环境的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同，虽然同是地位崇高的格鲁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传记又有许多差别。今以历辈达赖喇嘛的传记为例，来略作说明。

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传记有他的弟子益希孜莫所撰的《根敦珠巴传》和贡噶坚赞所撰的《根敦珠巴的十二功业》两

种。前者依年代的先后，记述根敦珠巴一生从一个贫苦的牧民的儿子到创建扎什伦布寺成为格鲁派的一位高僧的事迹，而以兴建扎什伦布寺的过程最为详细。当时格鲁派还没有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所以书中开始处虽然隐约提到根敦珠巴的先世曾经是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但是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而且在根敦珠巴晚年安排其身后之事时，是命其弟子轮流继承扎什伦布寺的法座，没有关于转世的提示。后者则仿照佛陀行传记载释迦牟尼十二事业的形式，讲述根敦珠巴的降生、出家、投拜名师、守持戒律、勤学三藏经论、讲辩著情形、不为世间八风所动、继承仲敦巴弟子三尊的事业、获得奇特授记、专心守护佛法、教导具缘弟子、圆寂等十二功业，这表现了佛本生故事和佛陀行传对藏文佛教传记文学的影响和藏传佛教各教派所强调的“视师为佛”的观念。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的传记包括根敦嘉措自己所写的一篇自述和他的弟子为他所写的传记，主要讲述他出生时父母的各种梦兆和幼年时的奇异行为，他到哲蚌寺学法、兴建曲科杰寺、为格鲁派的存在和发展所建立的功业以及成为格鲁派的主要领袖人物的情形。他们的传记反映了达赖喇嘛这一活佛转世系统还处在酝酿阶段的特点。

三世达赖喇嘛和四世达赖喇嘛的传记的作者都是五世达赖喇嘛，属于活佛传记中很少见的后世活佛为自己的前世写传的例子。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1543 年出生，1546 年即作为根敦嘉措的转世被迎请到哲蚌寺坐床，1552 年就任哲蚌寺的法台，1578 年在青海会见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赠给他“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达赖喇嘛”才成为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随后索南嘉措在安多、康区和蒙古传法，于 1588 年在应邀到北京的途中圆寂。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为俺答汗的曾孙，生于 1589 年，虽然他在

1592年就被拉萨三大寺一致认定为索南嘉措的转世，但是他一直到十年后才在拉萨坐床，并在1616年年底在哲蚌寺圆寂。他们的时代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建立后的早期发展阶段，是格鲁派通过蒙藏联合走向新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虽然都寿数不长，但是他们的事迹却对格鲁派十分重要，因此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联合格鲁派取得西藏地方的政权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就在到北京会见顺治皇帝的往返途中亲自为他们撰写了传记。由于时代的特点，蒙藏之间的交往成为这两部传记的主要内容。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传记是藏文高僧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五世达赖喇嘛在世时自己编定的自传，一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由第悉桑结嘉措撰写的续传，总计达六函之多。他是第一位成为全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所以他每天的活动都有专人负责记录，而他的自传就是在这些当时的记录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因此颇类似于起居注和实录的形式，以五世达赖喇嘛的日常生活为线索，全面地展现了掌握西藏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的各个层面，成为研究达赖喇嘛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该书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泛，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派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俗、艺术、文学、医药等，其中所记载的蒙藏关系的内容，在汉文和蒙古文的史料中也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不详，因而成为研究当时的蒙古各部的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传记又是另一种情形。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悉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入定修行，不见外人，诸事由第悉桑结嘉措办理。同时第悉桑结嘉措秘密主持寻访和认定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直到1696年才把已经14岁的仓央嘉措迎请到布达拉宫坐床。

1705年第悉桑结嘉措被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死，仓央嘉措被拉藏汗废黜，在解送北京的途中在青海湖附近圆寂。第悉桑结嘉措写了一部《六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了仓央嘉措从出生、认定直到在布达拉宫坐床后的事迹，这是仓央嘉措的一部没有完成的传记。后来阿拉善的蒙古族僧人阿旺多吉又写了一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说仓央嘉措并没有在青海湖边圆寂，而是脱走到阿拉善，埋名隐姓，在蒙藏各地继续修行传法。由于这些事迹难以判定真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成为藏文高僧传记中最引起争论的一部。此外，拉藏汗在废黜仓央嘉措之后，另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得到清朝政府和五世班禅大师、一世嘉木样活佛等格鲁派高僧的承认。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进藏，击杀拉藏汗，废黜意希嘉措。结果意希嘉措成为惟一的一位曾经是达赖喇嘛而没有传记、事迹不明的人物。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传记是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撰写的，1757年格桑嘉措圆寂后，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奉乾隆皇帝之命进藏，主持七世达赖喇嘛的超荐法事和寻访转世灵童事宜，章嘉·若必多吉依据格桑嘉措的生平记录在很短时间内就写成了长达两函的《七世达赖喇嘛传》。从八世达赖喇嘛到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传记，是由他们的经师或摄政第穆活佛、嘉旺活佛、普布觉活佛等人所撰写，其格式仿照五世达赖喇嘛、六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的传记的形式，只是有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11岁时就圆寂了，所以他的传记的主要内容是他出生及寻访、认定、坐床的经过，十世达赖喇嘛在寻访认定的过程中经过几次反复证认，才得到清朝嘉庆皇帝的认可而在布达拉宫坐床，他的传记又是参与此项事务的嘉旺活佛洛桑赤列南杰所著，所以这一过程占了

传记的很大一部分篇幅。与其他的达赖喇嘛传记相同，它们都有记事准确、时间清楚、涉及西藏社会各个方面等特点，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则有过于程式化之憾。

收入《佛学与文学》，台湾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 年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简论

到西藏去访问或者旅游的人，都会听到（许多人还会多次听到）有关佛教是如何传入西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认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和佛陀的两尊金铜造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在公元7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的创建者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光胄王（vod zer go cha）的女儿赤尊公主（khri btsun）为王妃，赤尊公主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带到拉萨的嫁妆中最主要的是一尊释迦牟尼八岁身量的铜像，藏语称为觉卧米觉多吉（jo bo mi bskyod rdo rje），译成汉文即是不动金刚佛像。后来松赞干布又迎娶唐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据《新唐书》记载是唐太宗将一位宗室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到拉萨的嫁妆中最主要的是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的铜像，藏语称为觉卧仁波且（jo bo rin po che）或者觉卧益西诺布（jo bo ye shes nor bu）、觉卧释迦牟尼（jo bo shakya mu ne）。为了安置和供奉所带来的佛像，赤尊公主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帮助下新建了一座“羊土神变寺”（ra sa vphrul pavi gtsug lag khang，因为开始时由山羊驮土填湖，建成后地面光洁如仙境幻现，所以称为羊土神变寺，藏文

地名拉萨 lha sa 就是从该寺寺名的前两个字逻些 ra sa 音变而来），后来又被称为“大昭寺”，寺内供奉觉卧米觉多吉像；文成公主新建了一座“惹莫且寺”（ra mo che gtsug lag khang，因为建在叫做“惹莫且”的地点而得名），后来又被称为“小昭寺”，寺内供奉觉卧释迦牟尼像。据说在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在位的时期，吐蕃与唐朝发生了战争，吐蕃担心唐朝会要回觉卧释迦牟尼像，就将其移到大昭寺中的一个殿堂里隐藏起来，并在外面砌墙遮蔽。后来唐朝的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她到拉萨后，努力寻找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觉卧释迦牟尼像。最后从大昭寺的隐藏地方将觉卧释迦牟尼像请出来，安置在大昭寺的正殿的中央，又把赤尊公主带来的觉卧米觉多吉像迎请到小昭寺中供奉。这两尊西藏最著名的佛像就这样掉换了位置。

这两尊金铜佛像至今仍然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中，它们是最受藏族人崇拜的两尊佛像，同时也是与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最为密切的金铜佛像。在后来的时期中，有许多热心的佛教信徒和富有的施主，甚至有不少的著名佛教大师为这两尊佛像做过多次贴金装饰，增加了黄金和宝石制成的头冠和衣饰等。例如，在元代拉萨地区的地方首领蔡巴万户长和阿里地方的土王等人曾出资维修大昭寺，用 5 万斤铜和 500 两黄金为释迦牟尼佛像的佛殿建造了金顶。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 1408 年年底就曾经为觉卧释迦牟尼像奉献新制佛冠和佛衣，接着在 1409 年正月创办拉萨祈愿大法会，在法会期间每天为觉卧佛像的面容上涂金，在初八和十五两天则为觉

卧佛像的全身涂金。[1] 在这次法会以后，宗喀巴大师又创建甘丹寺，后来在西藏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格鲁派由此形成。在五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期都对大昭寺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直到现代，对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和不动金刚佛像每年都要涂金，隆重供祭。不辞千万里高原跋涉的艰难困苦，不辞生命危险，有的人甚至是磕着等身的长头到拉萨朝礼的佛教信徒，他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绕行大昭寺，而绕行大昭寺实际上就是绕行和礼拜觉卧仁波且和觉卧米觉多吉。拉萨城中最著名的街道八角街和林廓路，就是千百年来信徒们朝礼这两尊金铜佛像的道路。每天早晚两次的绕行大昭寺的队伍，通常都在万人以上，浩浩荡荡的队伍肃穆庄严，使见到的人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政治和宗教的历史与两尊金铜佛像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整个佛教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由于进行过无数次的涂金和装饰，所以一般人都认为，现在看到的觉卧释迦牟尼像和觉卧米觉多吉像与当年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将它们带进西藏时的形象有了许多改变。同时由于这两尊佛像在藏传佛教中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只在很少的时间才能去除佛像的头冠和衣饰，因此一般人难以见到佛像的真正全貌，更不可能允许研究者对它们做任何的成分化验分析来确定它们的制作年代。我们只是从有关的书籍中知道，觉卧释迦牟尼像为坐像，高 1.5 米，铜铸，通体镏金。[2] 由于这些原因，

---

① 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54—256 页。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索南旺堆、张仲立主编：《拉萨文物志》，1985 年版，第 20 页。

在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史的学者的著作中，这两尊金铜造像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的学者把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带来佛像的千古流传的故事当作一种文学的虚构来看待，对此不予置评。实际上，从大昭寺的一些殿堂的建筑风格和树立在大昭寺大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尤其是在赤德松赞所建的位于拉萨河南岸若玛岗地方的噶迥寺建寺碑，明确记载了松赞干布兴建拉萨大昭寺等寺院的事迹，足以证明大昭寺是建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古刹。[①] 而且成书年代可以确定在12世纪的《娘氏教法史》就有关于这两尊佛像的详细记载，据信成书年代还在此之前的《拔协》也提到了金城公主进藏后寻找文成公主带进西藏的佛像的故事[②]，这就从文献学的角度说明这两尊佛像至少是在吐蕃王朝的时代就在西藏受到广泛的尊奉。另一方面，我们从发表的这两尊金铜佛像的照片看，也可以看出它们确实是唐代中原汉地和尼泊尔两种造像风格的代表。有学者指出："表现理想的佛需要善于体现佛性，善于表现那种超凡的而又能激动人心的神圣情态。艺术家把庄严、慈祥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使佛像既威严神圣，又慈祥感人。庄严而不可畏，慈祥而不可冒犯。唐代佛像之所以激动人心，也许正是在追求塑造佛性中，创造了寓慈祥于庄严的美的佛教造像典型。"[③] 还

①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165页。

② 娘尼玛沃色（myang nyi ma vod zer，公元1124—1192年）所著的《娘氏教法史》（chos vbyung me tog vphreng ba sbrang rtsivi bcud），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272页。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西藏学者巴桑旺堆最近考证，《拔协》的主体部分应当是写作与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的时期。

③ 金维诺：《石佛遗珍》，见徐政夫《观想佛像》，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版。

有学者在分析唐代佛像的特点时说："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高17米多，面圆颐丰，微睁的秀目，是通过上眼皮的下垂造成的，狭长的眼角，凝重的双睛，微微向前倾斜的身体，都给人关注世间疾苦、温和可亲之感。而高大的身躯、主尊的地位，在整铺造像的烘托下，又显得神圣肃穆，犹如人间君王，驾临一切之上。'功成妙智，道登圆觉'的主尊威严，与近在咫尺、和蔼可亲的慈悲心怀，巧妙地融合于卢舍那佛一身。"① 而这一时期的印度—尼泊尔的佛像为帕拉王朝的造像风格，其特点是"帕拉造像建立在笈多美术的基础上，印度东北本土特色浓厚，与克什米尔像某些细节相互影响，但风格迥然有别，面貌颇具印度人特点，如上眼睑突显，嘴唇丰厚，眼大有神，体形粗壮，但与克什米尔像发达的肌肉刻画不同，身材曲线流畅圆润"②。而拉萨的觉卧释迦牟尼像和觉卧米觉多吉像，仅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佛像的面部，就可以体会出7世纪到8世纪时南亚和汉地的佛像造型风格的这种差别。笔者问过曾经许多次朝礼过这两尊佛像的家在拉萨的藏族朋友，他们也说尽管拉萨民间传说这两尊佛像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表情，但是总是感到觉卧释迦牟尼慈悲可亲，觉卧米觉多吉威严肃穆。应该说这种自觉上的差异准确地反映了最早传入西藏的这两尊金铜佛像确实在造像风格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事实上藏族的金铜铸造工艺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就有了长期的历史，藏文史料记载，在松赞干布的27世祖止贡赞普的

---

① 冯贺军：《中国佛教造像风格的演进》，见徐政夫《观想佛像》，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王家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时代，就能够制造多种刀剑武器，还制造了铜棺。[①] 公元 646 年，唐太宗征讨高丽后返回长安，松赞干布遣使奉献金鹅，祝贺唐太宗凯旋。“其金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唐代以十斗为一斛，吐蕃所献的金鹅可装酒数百斤，可见工艺并非寻常。唐玄宗时，吐蕃多次进献金鹅盘盏和金银器玩，有时一次达数百件，而且形制奇异，工艺精绝，唐玄宗下令在宫门陈列，让百官参观。[②] 可见吐蕃的金铜铸造工艺本来就有很高水平，因此在佛教传入后用来铸造金铜佛像，应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尽管由于“朗达玛灭佛”和吐蕃王朝崩溃后的长期战乱，吐蕃王朝时期西藏的佛教造像遗留下来的很少，但是我们从文献上还可以看到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的发展。当时应当有大批印度、尼泊尔、中亚和唐朝的艺术家受聘在西藏进行早期佛殿和寺院的装饰艺术创作和塑造佛像。《拔协》在记述赞普赤松德赞兴建桑耶寺塑造佛像时的情形时说：“雕塑匠问道：‘佛像是塑成印度式还是塑成汉地式的？’大师说：‘佛陀降生在印度。所以塑成印度式的吧！’赞普说道：‘大师，我希望让吐蕃喜欢黑业（指黑苯教）的人们，对佛法生起信仰。所以无论如何，也请把佛像塑成吐蕃的式样！’大师说：‘那么把全体吐蕃民众召集起来，就照着塑成吐蕃人模样的佛像吧！’于是从召集起来的全体吐蕃民众中，挑出最英俊的男子枯达擦，照着他的模样塑造了二臂圣观音，挑出最美丽的女子觉若妃子布琼，照着她的模样在左边塑造了光明天女像，挑出最美丽的女子觉

① 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82—83 页。

② 《新唐书·吐蕃传》。

若妃子拉布门，照着她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救度母像。照塔桑达勒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六字观音（四臂圣观音）像。照着孟耶高的模样，塑造了圣马鸣菩萨为守门者。”① 该书还说：“然后是中层佛殿，以麝香树和檀香树为木料，以野黄牛皮为塑像的材料，照着汉地的模样塑造。主像是大日如来佛，右边塑的是过去佛燃灯佛，左边塑的是未来佛弥勒佛，前面是晦日佛释迦能仁（即释迦牟尼）、八日佛药师佛、月中佛无量光佛；左右菩萨是亲近眷属八大弟子、大善知识（居士）无垢称、喜吉祥菩萨；愤怒护法是‘哼’、‘哈’二将，‘哼’、‘哈’是汉话。”“上层殿的木料全用松树和杉树。塑像的材料用布和茅草。塑像以印度式样为准。”② 这说明正如觉卧释迦牟尼佛像和觉卧米觉多吉佛像所代表的那样，早期西藏的佛教造像受到来自汉地和南亚印度—尼泊尔的佛教造像风格的深刻影响，同时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到赤松德赞兴建桑耶寺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西藏本地的佛教造像风格。从桑耶寺建成到朗达玛灭佛的 60 多年间，是西藏佛教急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赞普赤德松赞和热巴巾都兴建过许多寺院，佛教造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吐蕃王朝时期西藏的金铜造像，出自 16 世纪的一位主巴噶举派的活佛、西藏著名造像大师白玛噶波的藏文手稿《鉴别青铜佛像论——心愿口饰》（Li ma brtag pavi rab byed smra vdod pavi kha rgyan），对西藏佛像雕塑中的各种艺术风格和运用的合金材料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把吐蕃王朝时期的金铜佛像分

①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1 页。

②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5 页。

为三个时期：

松赞干布开始的早期法王所造，主要用红响铜（响铜，藏文称为“利玛”）制造，佛像面部饱满，脸部的上部比下部略大，表情愉悦，脸微长，鼻子造型妙好，眼睛修长，上下唇造型端丽、准确，身体伟岸，手脚柔软，衣褶小；整个雕塑造型精美。法座为单排或者双排的莲瓣组成的莲座，但有的佛像既无宝座，也无坐垫。佛像身披大氅，足蹬靴，显示西藏俗人的形象。佛像或火镀金，或用树脂或油脂涂光，或根本不涂任何东西。

赤松德赞时期（约755—797年）的佛像大量使用“紫利玛”制作，与以前制作的佛像相比面型粗短，手指造型略欠精美；佛像表面敷有树脂或油脂，镶嵌设色；底部边缘衔接不很完满；大多数佛像都带有三叶冠；法王塑像无头巾，发饰悬垂于肩部两侧。有的镀金（镀冷金），有的根本不敷任何脂液。

赤热巴巾时期（9世纪）所造，与印度雕塑家创作的塑像相同，均用“白利玛”为胎浇铸，和印度（中部）所造佛像相同。不同之处是面型较小，眼睛镶嵌有白银和紫铜，镶嵌技艺高超（所谓的桑塘玛佛像的特点是以白银为眼，紫铜为唇）。塑像造型优美，有三叶冠装饰。①

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以后的金铜造像，应当有两种风格。一种是随着“上路弘法”和阿底峡入藏而兴盛起来的受印度克什米尔造像风格影响的造像，藏文文书称为“噶当利玛佛像”。据说这些造像用天然铜混以金银做成的合金和“紫利玛”及“花利玛”做原料铸造，工艺十分精美。由于在噶当派的主寺

① 参见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热振寺供奉有许多这种佛像，所以称为“噶当利玛佛像”[①]。另一种是随着“下路弘法”而来的受汉地和中亚造像风格影响的佛像，下路弘法的发源地青海河湟地区的唃厮啰政权为藏族部落所建立，盛行藏传佛教，曾经在其都城青唐城（今西宁）兴建广五六里的大寺庙，造大佛像，以黄金涂其身，并建十三层高的佛塔守护大佛像。[②] 西夏王朝本来就与藏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西夏佛教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深，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僧人在西夏王朝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还被西夏封为帝师、国师。西夏的佛教绘画、金铜造像也很发达，至今还有不少文物遗存。西夏的佛教艺术又对西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元代是西藏金铜佛像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元朝统一了西藏并且扶植萨迦派首领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萨迦政权能够集中西藏各个万户的力量兴建萨迦南寺大殿这样的巨大的佛殿，并铸造精美的大型金铜造像。萨迦寺中留存至今的八思巴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建造巨大的释迦牟尼镀金铜像和精美的背光，以及大量的本尊铜像和祖师铜像，夏鲁寺的金铜造像是这一时期西藏金铜造像的代表。八思巴1269年带到大都的工匠中，有著名的铸造铜像的大师尼泊尔人阿尼哥等24人，阿尼哥因造像的技艺得到忽必烈的宠信，在元朝担任官职数十年。阿尼哥的儿子阿僧哥及弟子刘元也因铸造佛像而名重于当时。阿尼哥带来的尼泊尔艺术和藏传佛教及汉地的艺术在元朝宫廷逐渐走向融合，逐步形成了一支具有

① 参见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② （宋）李远《青唐录》，转引自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浓烈汉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流派，对后来明、清的宫廷和西藏本地的藏传佛教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元代画塑记》等文献记载，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命宣政院院使也纳令阿僧哥主持塑造大圣寿万安寺内五间殿、八角楼的四座佛像，并禀明帝师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造。另外还塑造大小佛像140尊，其中南北角楼塑马哈哥剌等15尊，东西角楼塑马哈哥剌等15尊。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又令塑工张提举和画工尚提举二人率众工匠在兴和路的寺院西南角楼内塑马哈哥剌佛及伴绕神像，画十护法神。《元代画塑记》还记载了塑造和绘制这些藏式佛像所用的西藏的颜料和材料。[①]元代在宫廷中建造的藏式佛像，被称为“西天梵像”。杭州飞来峰的藏传佛教造像则代表了西夏的藏式佛教造像艺术和汉地造像艺术的融合。[②]

明朝前期藏传佛教金铜造像有在南京和北京制作的“永乐利玛佛像”，实际上其制作年代是从永乐延续到宣德年间。扎雅活佛指出，永乐利玛佛像“铸像所用的材料是黄白色的响铜，这种铜的颜色与象牙色相近，黄色不很明显。永乐利玛佛像还可以细分为两类：1. 皇帝本尊像；2. 事奉佛像。‘皇帝本尊像’亦可称为‘誓愿佛像’，是旧永乐利玛佛像中较好的一种。‘皇帝本尊像’这个名称是指特意为皇帝个人观修而制作的佛像。其造型极为优美，焊铆缝隙光滑平整，脸呈‘国’字形，两眼细长，衣服紧贴躯体，衣褶线条清晰。由双排莲花瓣组成莲座，在莲座的上缘和下边镶嵌有珍珠，但有的佛像的莲

① 《元代画塑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8—10页。

② 熊文彬：《元朝宫廷的“西天梵像”及其艺术作品》，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

座边缘并不镶嵌珍珠。佛像铸成以后要镀金，所镀金颜色艳丽。所有的皇帝本尊像都在莲座的上侧边刻有金刚杵。底座的内膛出口用盖子盖严实，然后用掺有朱砂的封蜡封好盖子周边的缝隙。在莲座上刻有‘大明永乐年施’表明制作年代。‘事奉佛像’这个名称大概是指永乐皇帝召请众僧举行诵经事奉佛法仪式时使用的佛像。这些佛像略带白色，光洁度也不如皇帝本尊像，底盖极为简朴。”① 关于永乐时期为什么在宫廷制作大量的藏传佛教的佛像，国外有学者研究永乐时期明朝和西藏帕竹政权、噶玛噶举、萨迦派、格鲁派的首领们之间的使者来往和互相馈赠佛像的记载后指出：“就永乐青铜塑像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它业已展示出西藏和明朝、明朝和西藏之间连续不断的使团往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塑像交换中，每一次都是以西藏一方首先开始的。这同现存的永乐画像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藏人容貌和肖像风格上的密切同源，和明廷中也许受雇于明帝国画坊的为数众多的藏人的持续存在，以及中部西藏（前后藏）对同一时代风格的紧紧追随等，所有这一切都指出了永乐风格确切的渊源。”② 实际上，我们知道永乐时期在明朝的宫廷中有许多从甘肃、青海藏族地区来的藏族僧人和工匠，如著名的明成祖派往西藏迎请宗喀巴大师的使者侯显就是出身于甘南藏区的藏族人，而南京雕版印刷的最早的木刻版藏文大藏经也是由这些藏族工匠完成的。所以永乐青铜造像应当是由藏、汉工匠在南京和北京共同

---

① 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② 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0页。

完成的，永乐铜像的风格正反映了藏汉造像艺术融合的风格。由于永乐利玛铜像和法器制作精美，适于作为礼品赏赐和进贡，所以有不少永乐利玛佛像是在明代由皇帝赏赐给西藏的高僧和寺院，到清朝时又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的宗教领袖作为贡品进献给清朝皇帝。因此在清朝宫廷中有不少的永乐利玛佛像，甚至还有一些流落到民间，本书所收的永乐利玛佛像，应当是循着这一渠道又回到北京的。[①]

比永乐铜像稍晚的西藏的青铜造像是来乌群巴利玛（slevu chung li ma）佛像（清朝宫廷中称为流崇干利玛，见王家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序言，流崇干即藏文的 slevu chung gi，意为来乌群巴）。扎雅活佛指出："来乌群巴利玛佛像指由艺术家来乌群巴铸造的佛像。这类经过镀金的铸像与明朝永乐利玛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双派的莲花瓣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瓣之间的连接处嵌入较深，花瓣脉络清晰，结构严谨。"[②] 关于来乌群巴的历史，在一世达赖喇嘛兴建扎什伦布寺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据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弟子意希孜摩所写的《遍知一切之上师根敦珠巴贝桑布传——奇异宝串》（即《一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根敦珠巴在 1447 年创建扎什伦布寺后，在 1458 年，"根敦珠巴还想到应当先在扎什伦布寺建造密宗五部佛（gsang ba vdus pa rigs lnga）的像，以及为我等举行长寿仪轨而建造尊胜白度母像。首先，他派人将建造五部佛像的材料及功德钱（给工匠

---

① 朱家溍：《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收入《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19 页。

② 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43 页。

的薪资）送到前藏去，交给化现的工匠勒穷巴（slevu chung pa），勒穷巴造成佛像后送来扎什伦布寺。又由达孜巴（stag rtse pa）的一位能工巧匠先建造了一尊作为样品的尊胜白度母药泥塑像，然后再照此建造一尊一箭杆高的有加持力的殊胜的黄金尊胜度母像，根敦珠巴赠给他许多报酬，使他大为欢喜。"[①] 这里的化身的工匠"勒穷巴"（slevu chung pa），即是"来乌群巴"，而达孜巴（stag rtse pa）应当是拉萨东郊的达孜县的工匠。从这段记载看，"来乌群巴"应当是15世纪中期西藏拉萨地区的著名工匠。该书接着还讲述了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建造强巴大佛像的详细经过："为建立弟子们及众施主全都转生到弥勒净土、享受大乘教法的利乐的殊胜缘起，应当兴建这尊弥勒大佛像，根敦珠巴不仅派弟子们将这一指示传遍各方，而且他自己也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一问题。当他思考应当请什么样的工匠来建造这尊佛像时，他召集高僧大德们来商议，一些人说勒穷巴（slevu chung pa）适合，一些人说拉堆绛的首领扎西仁钦（bkra shis rin chen）适合，不过多数人一致认为应当请尼泊尔的工匠，他们说：'建造这样的大佛像，尼泊尔工匠不仅技艺好，而且费用较低。'这时大德顿珠坚赞（don grub rgyal mtshan）说：'建议由有识者提出，决议由福德者断定。还是由上师您自己思考决定！'无论怎样，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请尼泊尔工匠担任。此时根敦珠巴心想：'要是请尼泊尔工匠，给他们的工钱就必须是金银和绸缎。'因此说：'今天晚上还不能决定，待向三宝祈祷后再议。'此后，根敦珠巴邀请各

---

① 意希孜莫：《一世达赖喇嘛传》的第四章兴建身语意依止处，收入印度达兰萨拉1975年铅印本《历辈达赖喇嘛传记》，第260页。承蒙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萧金松教授1995年惠赠此书的复印本，在此顺致谢忱。

位高僧，制作了糌粑丸子，丸子里放着写有各个工匠名字的纸条，对着尊胜度母祈祷后进行占卜，结果得到的授记说：'由扎西仁钦担任工匠比较适合，但是会有大的违碍。'……当时有一批尼泊尔工匠在伦波孜（lhun po rtse）建造佛像，即派人通知他们，请他们来建造佛像，但是由于他们要的工钱太多没有谈成。于是按照以前的考察，决定从拉堆绛召请工匠。在当年春天（公元1460年），根敦珠巴把他对大司徒（拉堆绛地方的首领）所提的教法方面的问题的答复对我们讲解了一遍，由我们笔录成册，派我给大司徒送去这份答复并且召请工匠，于是我在秋末去了拉堆绛，途中还在梅巴等地募化资财。冬季法会时我到了昂仁（ngam ring），向大司徒呈上根敦珠巴的答复，大司徒十分高兴，但是召请工匠之事却因唐东杰布（thang stong rgyal po，公元1385—1509，是著名的建造铁索桥和组织藏戏剧团的佛教大师）的作梗而被阻止。我没能立即动身，直到昂仁的祈愿法会结束后，我们才启程前往扎什伦布寺。我们回到扎什伦布寺，正是阴铁蛇年（公元1461年）春季法会时，……从当年住夏时开始，进行弥勒殿的土木工程。到蛇年（公元1461年）秋天，从乃宁寺（gnas rnying，在江孜县和康玛县交界的地方。宗喀巴大师曾多次到该寺学法，寺院规模宏大。该寺1904年毁于英国侵略军的炮火。）请来了铜匠，并由一部分铜匠在朗浦（glang phu）打造铜叶片等。此时众人又议论建像的工匠应请谁担任，根敦珠巴说：'会有天界工匠毕夏嘎玛（bi shwa karma，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天界的工匠）从兜率天宫前来。'说完笑了起来。过了一个来月，那塘地方的首领绛曲仁钦（snar thang pa dpon po byang chub rin chen）送来了弥勒（强巴）佛像的样品，是铸造的像，形制奇特。根敦珠巴说：'就由绛曲仁钦设计安排，由重孜哇（vbrong rtse ba，重孜在江

孜和日喀则之间的白朗县，该地有一座大寺院叫重孜寺，在明代是一座大寺。该寺在1904年也遭到英军的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毁过，现在重建的重孜寺规模比原来小很多）的铜匠建造。’遂决定由他们二人担任工头，……第二天，根敦珠巴向化身工匠们（应当是指勒穷巴等人）显示了已加工的铜叶片。他们说：‘现在造像的材料已经具备，铜叶片也打造得很好。’事情已经开了头即可建立作坊。工匠们说：‘我们白天用手建造，晚上用心建造，会造得又快又好。’根敦珠巴说：‘作坊工头由绛曲仁钦担任是否适合？是不是再向三宝祈祷进行抉择？’工匠回答说：‘三宝虽然很尊贵，但是我的工艺是父亲教给的，而不是三宝教给的。’于是委任化身工匠为绛曲仁钦之上的负责人。根敦珠巴又问：‘大匠人，我们以前开了一个很大的头，现在不能不把它完成，现在材料还不那么多。’工匠说：‘诚然如此，不过会成功的，珍宝如同一眼好的泉水，水随尽随生。’开工之后，一些尼泊尔工匠看到藏人工匠选来挑去没有多少合适的人选，稍微生起傲慢之心，工作遂生散漫。此时工头在梦中见到嘉钦拉康（rgyal chen lha khang）中有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右手做期克印（威胁的手势），指着工匠们做威吓的姿态。工头惊怕，发出‘阿妈’的喊声。众人惊醒，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把梦境说了一遍，众人俱感恐怖，自那以后一刻也不敢松懈，努力造作。最先造成了弥勒佛像的头部，为此举行了开光和祈愿，此时头像眉间的白毫上出现了一朵花，右耳耳饰的中间出现了一尊像，有的人说是宗喀巴大师，有的人说是根敦珠巴本人的像，总之这是一尊自然生成的奇特的上师像，是所有众生的愿力所造成的。另外，在当时还举行了向护法神施食等仪轨，护佑尼泊尔工匠等建造佛像的工程顺利进行。当时，举行仪轨的僧人和建造佛像的工匠们

都感觉到有神奇的精灵白天以人的形象晚上以神的形象出现，不断地促进建造佛像的工程。由于有这些神助，在不长的时间中，到阴水羊年（公元1463年）就建成了高二十五肘（一肘相当于正常人身高的七分之二）的合乎规格的奇特的弥勒佛像。作为弥勒佛像的胎藏，装入了许多高僧大德的舍利子以及佛、菩萨的舍利子，用各种珍宝建造的佛像。在弥勒佛像上下各个部分还按经典所说装入了许多咒文、佛经，以及各种药物、谷物、食品、绸缎等，诸物皆备。此外，佛像胎藏中还有一些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宝物，是根敦珠巴夜间独自前往装入佛像胸间的。他还在佛像前一再祈祷发愿。"[①] 这里所说的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像，是在该寺大经堂西北的高11米的强巴佛大铜像，而不是九世班禅时期建造的高达26.7米的强巴佛大铜像。我们在这里不惜篇幅地（实际上，我们仍然删节了许多细节描述）摘引意希孜摩的记述，除了说明来乌群巴利玛佛像的时代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僧人建造金铜佛像的认真的态度，除了筹集资金和材料外，要举行多种法事仪轨，慎重选择设计图案，造出模型，还要认真地选择适合的工匠。佛像造成以后，要举行装藏的仪式。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仪轨建造的佛像才会具有加持的法力，才是合乎标准的佛像，主持建造佛像的高僧和施主才能因此积聚功德，造像的藏族工匠也才能通过造像完成一次宗教的修行，得到佛和菩萨的护佑。二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西藏的许多地方，如拉萨、拉堆绛、乃宁寺、重孜寺都有藏族自己的建造金铜佛像的工匠和艺术大师，来乌群巴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西方的一

① 意希孜摩：《一世达赖喇嘛传》的第四章兴建身语意依止处，收入印度达兰萨拉1975年铅印本《历辈达赖喇嘛传记》，第262—270页。

些研究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将这些代表不同时期的西藏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的巨型佛像放在极为次要的地位，仅从他们收集的部分小型铜像出发，不仅否认元代以来汉地造像艺术和西藏金铜造像艺术的关系，而且否认西藏自己的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的风格和工艺大师的存在，他们片面强调阿尼哥以来印度—尼泊尔金铜造像艺术对西藏的影响，认为西藏的金铜造像都是出自尼泊尔工匠，或者是在尼泊尔工匠的主持下完成的，把尼泊尔的工匠在西藏的作用夸大到完全占据主导的地位，甚至认为这种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他们甚至在没有掌握资料的情况下就宣称“像扎什伦布寺弥勒佛这样纪念碑式的大型佛殿雕塑对藏族艺术风格的发展和演变史的重新构建没有太大的价值。这种大型镀金浮雕铜像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在尼泊尔人的监制下完成的，同时在战争期间极其容易被毁，之后可以用新塑的佛像来替换，或做一些新的部件同原有的部件重新组合而成。因此，这些佛像永远都不可能判断出准确的创作年代。”① 实际上，这些巨型的金铜佛像才是各个时期的西藏的金铜佛像制作工艺的代表，仿制它们比仿制小型的铜像要困难得多，而且由于对这些巨型的金铜佛像的制作过程有详细的文献记载，可以使研究准确和深入。从元代以来，佛教在印度和尼泊尔都已经衰败，尼泊尔人主要信奉印度教，尼泊尔工匠在西藏建造金铜佛像主要是以技艺赚取西藏的黄金和来自汉地的绸缎，他们与虔信佛教的藏族人在建造佛像时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可能是大型的金铜佛像建造的组织者

① Von Schroeder, Ulrich, Indo - Tibetan bronzes,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1981。冯·施罗德《印度和西藏的青铜佛像》，香港，可视达摩出版社。熊文彬译，蒙译者惠允利用他的待刊译稿，谨此致谢。

和设计者。出于宗教仪轨上的考虑，设计和主持建造金铜佛像的是西藏的高僧和工匠，尼泊尔工匠只是以他们的技艺参与建造，造像的艺术风格应当是西藏的，上述的这一段建造扎什伦布寺大经堂的强巴佛像的当事人和参加者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扎什伦布寺的一世达赖喇嘛建造的强巴大佛像同时代，还有几尊著名的巨型金铜佛像，而且这几尊巨像都是弥勒像，也即是强巴佛像。《西藏通史》中说："除了在西藏分裂时期的后期绰浦译师所造的绰浦寺弥勒大佛像和20世纪初期九世班禅大师图丹却吉尼玛新造的扎什伦布寺的弥勒大佛像以外，西藏著名的弥勒大佛像如昂仁（拉堆绛）弥勒大佛像、绒（仁布县）弥勒大佛像、扎什伦布寺大经堂的弥勒殿中的弥勒大佛像、哲蚌寺的弥勒像见者解脱等，都是在帕竹统治时期即公元15世纪中建造的。上述六尊用金铜材料建造的佛像，虽然大小方面有差别，但是总的说来，这些佛像不仅是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可以算得上是用金铜材料建造的佛像中的巨大者。"① 其中昂仁的弥勒金铜大佛像是1434年由拉堆绛的首领南杰扎桑主持兴建的，绒弥勒大佛像是1469年由仁蚌巴诺尔布桑波主持建造的，据记载高达39庹，即39个人的高度，其高度应在60米以上。

比来乌群巴利玛佛像稍晚的是白玛噶波利玛佛像，扎雅活佛说是"由艺术家白玛噶波铸造的佛像称白玛噶波利玛佛像，这类佛像铸好之后也要镀金，但铸件的接缝处的光洁度不如来乌群巴利玛佛像，镀金层也非常之薄。造型方面的特征有：下

---

①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中国西藏》杂志社联合出版，1996年版，第472—473页。

颏微突，身材苗条，僧衣饰有鲜花图案”①。依据藏文史籍《白玛噶波传》记载，白玛噶波 1527 年生于工布地区，1536 年被认定为主巴活佛的转世，迎入浪卡子县和江孜县交界地方的热隆寺坐床。他勤奋好学，拜过许多名师，著述也很多。他一生中创建寺庙十座，维修和扩建寺庙二十座，在许多寺庙中兴建佛殿和主持建造佛像，有弟子徒众数千人。他还为拉萨哲蚌寺建造佛像捐赠了大量的黄铜。他于 1592 年去世。②

清代藏传佛教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留存至今的当以十万计数。依照制作地点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清朝宫廷造像。清朝在康熙三十六年（公元 1697 年）正式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其职责之一就是铸造佛像。乾隆时期将雍和宫改建为皇家的藏传佛教寺院，同时大量铸造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乾隆时期的佛像有许多铸有建造年代，成为鉴别清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标准。紫禁城出版社，1992 年出有《清宫藏传佛教文物》，文物出版社，1996 年出版了王家鹏所著《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对此已有详细介绍，故不在此赘述。

拉萨“多觉边肯”（vdod vbyor dpal kang）利玛佛像。多觉边肯是位于布达拉宫山脚下的铸造工场，扎雅活佛说：“铸造材料使用掺有大量紫铜的青铜合金。多觉边肯铸造的佛像质量最优。多觉边肯一些传统的艺术品，特别是工艺精细的艺术品，造型精美绝伦。多觉边肯铸造佛像的历史始自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时期，到西藏和平解放时为止。所有为噶厦政

① 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43 页。

② 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目录》（三），民族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35 页。

府制作的佛像或专为噶厦政府送礼而制作的佛像都在多觉边肯铸造，从而使得多觉边肯工场铸造的佛像非常之多。由于多觉边肯铸造的佛像质量优异，信誉好，因而这类佛像的知名度最高，在晚近期所铸的各种佛像中也最为难得。”①

扎什伦布寺利玛佛像。是由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工场铸造的，知名度也很高。历辈班禅大师进贡的佛像，多属这一类。

德格利玛佛像。主要是在德格的八蚌寺铸造的，为康区金铜佛像的代表。由于与汉地接近，德格利玛佛像流入到汉地民间的数量不少。

藏传佛教小型的金铜造像的铸造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失蜡法”，即先用蜡制作模型，然后在模型的表面上均匀地涂上一层特别调制的泥土或者石膏，晾至半干后用火烘干，当外形烧硬时，里面的蜡像溶化掉。再向干硬的外壳即泥范中浇铸熔化好的铜液，待凝固后去掉泥范，一个铜像就铸造成了。所以每个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像都是工匠创作原形后制作的，能够表现工匠艺人的艺术创造和风格。另一种是模具法，与一般的砂型铸造的工艺大致相同，即是以现有的佛像或者固定的模具作为模型，把用四块木板围成的砂箱放到一个木板平面上，然后在砂箱中填入潮湿的类似黑色泥炭的泥沙土，填到三分之一时夯压挤实，将模型放入砂箱的正中位置，再填入泥沙土，一直填到和砂箱的顶边相齐，再夯实后，将预先留好的可以松开的两块边板的连接处松开一条隙缝，用锋利的长刀小心地将泥坯切成两半，轻轻地分开后，把泥坯中间的模型取出，然后对泥坯和泥坯的内层表面进行修整，保持光滑，并留出浇

① 扎雅活佛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铸孔。然后在两半泥坯的接触面上洒上炭粉，防止黏接到一起。再把取出了模型的泥坯合到一起，将砂箱绑紧，等一天以后，再将泥坯分开，让它们干透。就可以用来进行浇铸。后来又出现了用两个砂箱来浇铸的工艺，先将一个砂箱装上适量的砂土，将模型放入，使模型刚好一半露在上面，夯紧挤实后在砂土的表面洒上炭粉，再放第二个砂箱，填入砂土，将砂土夯紧挤实。然后将两个砂箱捆到一起放置一两天后，将两个砂箱分开，取出模型，进行修整，让两个砂箱的泥坯干透后就可以进行浇铸。用模具法铸造的金铜佛像实际上是作为模具的佛像的翻造，它与模型的差别主要是工艺的精细程度和各个时期和地方常用的金铜材料的区别。而小型金铜佛像的铸造大多数是采用模具法，这就给鉴别小型金铜佛像的制作年代和艺术风格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对一些小型金铜佛像的制作年代问题，就是多年潜心研究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专家，也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

浇铸时在模心的中央要放一块近似方形的泥土团，使浇铸成的佛像有一个空腔，用来放置装藏的圣物。浇铸成的佛像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首先要用錾子对佛像面部轮廓、眼睛、鼻子、衣饰等部位略加整修，并将佛像的整个表面磨平擦光。有的还要按设计雕刻图案、花纹，一般还要镀金或者鎏金，需要上色的部位还要涂色。还有一些佛像需要镶嵌宝石珍珠等。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心认真的加工，一尊精美的金铜佛像才算是制作成功。[①] 作为佛教信众供奉的金铜佛像，还要经过请高僧装藏，举行开光仪轨，制作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

① 张天锁编著:《西藏古代科技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大象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7—168 页。

大型的金铜佛像的制作就更复杂艰巨，在动工之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除了筹集资金和材料外，选择设计的艺术家和胜任的工匠头领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些确定之后，要制作佛像的小样，以观察制作出来后的艺术效果，甚至认为制作小样是否顺利是代表造像工程进展情况的征兆。如果不顺利，就要举行宗教仪轨来禳解，或者为了保证造像工程的顺利，先要建造有法力的护法神像。在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才能召集工匠，建立作坊，按照设计将要铸造的佛像分成若干部件，分别铸造，然后将这些部件铆焊到一起，再进行修整、镀金、镶嵌珍宝等工序。当然，最后的装藏和开光仪轨也更加隆重。一些巨型的金铜佛像往往耗时多年才能够完成，对这些巨型佛像的建造过程，藏文史籍中留下了许多详尽的资料，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发掘这些资料，将使我们对藏传佛教的金铜佛像艺术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一书所写的绪论

《白狼歌》新探

范晔《后汉书》列传七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录有《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诗三章。诗前面的记载说，这三首诗的来历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远。诗曰：臣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繦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因朱辅的奏疏中说这三首诗是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所作，所以后世习惯称之为《白狼歌》。

《白狼歌》是有明确年代和作者的部落名称记载的汉代西

部少数民族的诗歌，特别是《东观记》一书记载了白狼语的诗文的汉字记音，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又将《东观记》中所载的“夷人本语”录入《后汉书》，由此使它成为一份十分罕见的汉代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有汉文记义记音的珍贵的历史文献。《白狼歌》对研究汉代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特别是分布在青藏高原上的众多的部落群的历史和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民族史和民族语文学者都对它进行过研究，80年代以来又有一批新的论著发表，使得对《白狼歌》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不过，由于它是形成于1800多年前的文献。在形成的过程中翻译注音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因此对它研究至今仍存在许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白狼歌》虽是由益州（辖今四川西部、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当时州治在雒城，即今四川广汉北面）的官员奏报东汉朝廷的，但是白狼部落与汉代活动在青海地区的西羌部落群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史料认为它即是后来的白兰，属西羌的一支（详说见后），因此透过对《白狼歌》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青海古代史上的一些需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众多的西羌部落的语言和系属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对《白狼歌》的研究也应当引起青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即是想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白狼歌》再做一些探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有关的专家和学者。

一

在对《白狼歌》歌词本身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应当对白狼分布的地域和社会情况做一些分析。

按《后汉书》的记载，白狼的地域是“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可见白狼是在汶山以西，而汉代的汶山郡，治所在汶江道（今四川茂汶县北面），辖境相当于今四川松潘、茂县、北川、汶川、理县、黑水等县。《后汉书》又说白狼王等来益州时，“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繦负老幼，若归慈母”，是则白狼之地，又在邛崃山以西，从地图看，邛崃山在四川西北岷江和大渡河上游之间，从这一方看，白狼应在今四川阿坝州西部、甘孜州北部、青海果洛州南部一带。《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七《南蛮、西南蛮、东女国传》东女国条记：“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按此记载则白狼夷在东女国和茂州，党项、雅州之间。《北史》列传八十五称：“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则东女国为苏毗的一部分，地在藏北、昌都至玉树一带，那么白狼当在玉树东南面的甘孜、阿坝、果洛一带。从地望上看，《后汉书》与《旧唐书》关于白狼的记载是基本相符的。

《后汉书》说：“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这里所列的户数和口数都过于庞大，不知是白狼王唐菆有意向朱辅夸大其部落的人口，还是朱辅有意向东汉朝廷多报归附户口以邀功，实际白狼的人口不会有这么多，因《后汉书》紧接着又说：“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其间不过相距30来年，人口不应减少得这样快。《白狼歌》记述白狼的生活环境说：“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

肉衣皮，不见盐谷。”可见白狼是一个依赖牲畜为生的游牧部落。没有或很少有农耕。《后汉书》提到白狼时一词称“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一次称“牦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正反映了白狼这种游牧部落在当时处在部落联盟阶段所具有的社会组织特点。白狼是一个部落联盟总的称号，它或者是源于氏族的姓，或者是源于地名，或者是源于某位祖先的名字，部落联盟之下，又由若干小的部落构成，这些小部落又有其名号，这与后期藏族的游牧部落的组织是一致的。《后汉书》中所说的槃木，唐菆、楼薄等，应当是白狼部落联盟中的小部落的名字。唐菆当是白狼王唐菆自己统率的小部落，故以其名字称呼，这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说“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相符。直到《新唐书》党项传中还说：“永徽时（公元650—655年），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冻就率众来属，以其他为剑州。”这里的“特浪”即是白狼的异译，卜楼当即楼薄。可见这种大的部落联盟中包含小部落或小部落联盟的情形一直延续下来。

像白狼这样的游牧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极可能发生迁徙和分化组合。这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还在东汉时期，白狼部落就可能有一部分北迁到青海，成为《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的卑湳羌。东汉光武帝时，卑湳羌曾与先零羌一起与烧当羌发生冲突，西羌传记其事为：

“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富强。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合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人，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就在汶山以西的白狼部落“举种奉贡”之时，陇西寨外的卑湳羌与东汉地方官府发生冲突，西羌传记载说：

“肃宗（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三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湳等战，斩首虏数百人。”

正是因为白狼部落像其他游牧部落一样经常处在迁徙和分化组合之中，到南北朝中后期，有一部分白狼部落与西羌的另一大部——党项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以至《北史》和《隋书》直接称白狼是党项羌的一部分。《隋书》党项传说：“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犛牛尾及羖𦍩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与此同时，“白狼”的异译“白兰”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汉文史籍中，《旧唐书》党项传说：“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羌，自龙朔以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同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其先居于徙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子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新唐书》党项传记“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为维、恭二州。贞观六年，与契苾数十万内属。永徽时，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冻就率众来属，

以其地为剑州。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藉其兵为前驱。”同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洮水之西，南抵白兰，地数千里。”可见白兰的位置在吐谷浑南部，党项以西，多弥以东，这一方位正与“白兰”一词出现以前的白狼的位置相符，因此很早就有人认为白兰即是白狼。宋代人郑樵撰写《通志》，其《四夷二·党项》就把“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句中的“白狼”改为“白兰”。事实上当时吐谷浑、党项、白兰三者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吐谷浑本是鲜卑系统，立国西羌诸部落中，并未将党项、白兰等西羌部落逐出其辖地，而是通过联盟、通婚、征服等手段将这些部落纳人其统治之下。由于吐谷浑在北面和东面遇到强敌时往往退保白兰，以图再起，所以白兰成为吐谷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吐谷浑王视连就在公元390年被西秦乞伏乾归封为沙州牧、白兰王。唐初吐蕃兴起，势力由西藏进入青海，与吐谷浑争雄，白兰也是首当其冲。《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说：

“弄赞（即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

因吐蕃是从西南方向袭来，吐谷浑不能重施退保白兰之故伎，只能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这就更加证实白兰是在吐谷浑之南松州以西。而唐朝此次反击吐蕃，设四道行军总管（当弥道、白兰道、阔水道、洮河道），其中的“当弥”即是“多弥”，在今玉树一带，阔水应即嘉良水，即雅龙江上游，可见唐朝也认为白兰在玉树、甘孜、果洛之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近年在他的长篇专著《论藏

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对白狼部落的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认为白狼为古羌人之一部，当属牦牛种羌，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属关系是很密切的，纳西族的先民摩沙夷与白狼槃木有亲属关系。他还认为现代四川甘孜州新龙、甘孜一带讲扎巴语的扎巴人当是古牦牛羌的后裔，唐代以后被藏族同化为藏族。“现在牦牛羌和牦牛羌种的白狼、槃木等羌人部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他们的话言一直延续下来，即现代属羌族支的扎巴语”。① 不过他在该书另一处又指出“汉代居住在甘孜州巴塘一带的白狼国为牦牛羌之后裔”②，即认为白狼应在四川甘孜巴塘。至于白狼与白兰的关系，他提到“汉代金沙江流域巴塘一带又有‘白狼国’，其‘狼’与白兰之‘兰’也当是同一字之不同音记”③。不过他没有直接肯定白兰是“白狼”后期的异译。格勒同志提出吐蕃称白兰为丁零，是藏语 dung gling 的音译，白兰来源于地名巴塘，藏文为 vbav thang，也即是白兰、白狼的“白”在藏文中为 vbav，这是很有见地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李文实教授和聪喆同志在《青海社会科学》上曾就白兰国的位置进行过讨论，李教授主张在果洛一带，聪喆主张在柴达木盆地东南巴隆一带，④ 此外还曾有学者主张白兰在通天河流域一带。这几处恰好都有藏语称为巴塘或巴隆的地名，柴达木盆地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7 页、326—327 页、389 页。

②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7 页、326—327 页、389 页。

③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7 页、326—327 页、389 页。

④ 聪喆：《白兰国址辨》，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聪喆：《白兰国址再辨——答李文实同志》，分别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 年 2 期、1984 年 1 期、5 期。

的巴隆现为蒙古族地区，但巴隆作为一个地名当来自藏语，玉树通天河流域玉树县境亦有一巴塘，现今藏文记作 dpal thang，古代应是 vbav thang，八思巴文集的题记中有八思巴 1275 年在返藏途中在 vbal 地方停留的记载，这里的 vbal 应即是玉树的巴塘，vbal 与 vbav 相通。李教授主张的果洛地区，实际应在稍偏北的海南同德地区，同德的巴水藏文作 vbav chu，巴沟藏文作 vbav lung，巴滩藏文作 vbav thang，准确的汉文音译应为巴曲、巴隆，巴塘，此外邻近的贵南、泽库也有称为 vbav 的地名，如贵南的巴仓，藏文亦写作 vbav thang。[①] 从地理环境看，这一地区北阻黄河和碛尾，南靠黄河和玛沁雪山，境内山岭纵横，水草丰美，对于北面袭来之敌来说确实是易守难攻，吐谷浑在这一地区可以东连党项，东南出松潘、茂汶，东北通河州、临洮，若再不利，可西渡黄河经兴海沿柴达木南缘奔南疆于阗，与吐谷浑"退保白兰"的意图完全符合。《旧唐书》称居于雪山之下的雪山党项与白兰、白狗、春桑等羌相连，所说的雪山应即是玛沁雪山（亦称阿尼玛卿山）。明朝后期蒙古火落赤部入据青海，进扰西宁、河州，也是以黄河以南的茫拉、捏工、巴曲一带作为根据地，利用该地区的这一地理环境条件。

如果以上所说白狼、白兰与藏文的 vbav 有关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对于白狼、白兰有关问题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白狼最先是西羌里面的一个称为 vbav 的部落，vbav 在藏文中意为羊的叫声，说明这一部落是以牧羊为主的游牧部落，从部落的名称发展到称部落所在地为 vbav lung 或 vbav thang，意为"白狼"部落所在的河谷或草原，译为汉语即是白狼或白兰。

① 青海省测绘局编印《青海地名录》，第 7—9 页。

该部落所在地区的河流称为 vbav chu，可译为巴曲，或半音半义译则为白河。该部落首领的姓为“唐”，应即是藏文的 ldong，是藏文古籍所说的藏族先民的四大姓之一，吐蕃统一白兰之后，将姓氏称之为 lbong gling，即 ldong 氏（又译为董氏、冬氏）之国，即《新唐书》所说：“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作为游牧部落，白狼在历史上可能有过迁徙，而且作为部落联盟的分化组合过程，白狼部落可能多次有部分迁移他处之事发生，白狼部落的一部分迁移至某处，有可能将 vbav lung 或 vbav thang 的地名带到新的地方，这是在青藏高原上多处见到巴塘、巴隆等地名的原因。

这一说法还有可能为源于与白兰有密切关系的党项羌的西夏的有关文献证实，西夏诗歌中有一首追述其祖先的诗，前三句为：

黔首石城漠水畔，
红脸祖坟白河上，
高弥药国在彼方。

这里的弥药即藏文的 mi - nyag，为藏族对西夏的称呼，红脸即“赭面”，指青藏高原古代居民为防御太阳光强烈辐射而在脸上涂一种暗红色颜料的习俗（这一习俗至今在西藏阿里地区仍有存留），后又演变为对藏族等民族的称呼，这三句的意思是说西夏的祖先住在漠水边上的石城，也在白河的河畔，称为弥药国。研究西夏史的学者多认为“白河”即甘肃东南的白龙江，而漠水是黑水，指祁山以北的黑河即额济纳河（古称弱水），石城指黑水边上的黑城。但白龙江与黑河相距数千里，该诗即要指明西夏先祖所在之地，不应横跨这样大的范围，而且西夏占有黑水，是在其建国之后，将其先祖所居指为此处，与事实不符。还有的学者以西夏文中西夏自称其国为“大白上

国”，肯定此诗所指的西夏发祥地必在白龙江流域。但白龙江并不是白河，它的来历是因甘南两条邻近的河流中，洮河上游藏语称碌曲（klu chu）、白龙江藏语称舟曲（vbrug chu），译成汉语都是“龙河”，汉语为了区分它们才将舟曲译为白龙江，而且白龙江流域古代是宕昌羌、武都羌活动的地城，史称“周灭宕昌，党项始强”，所以党项不应起源于白龙江流域。陈炳应先生指出：“也许，诗中的‘石城’另有含义，给我们指示着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据《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三年，段颎追击张掖的烧当等羌，经四十余日，出寨两千余里，‘遂至河首积石山’，‘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这里的‘石城羌’似乎是在河首积石山附近，在党项羌的分布范围内；‘石城’的名称也与诗文符合。这样，党项羌的前身可能就是‘石城羌’，党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溯到东汉。当然，这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来证明。”① 从诗歌本身看，漠水、石城、白河三者应当是在一起的，若叫作石城，定在河首积石山附近，则可对此诗做出比较完满的解释。“漠水”应是藏文的 rma chu，即是黄河，“白河”应是藏文的 vbav chu，即同德县的巴曲河，是黄河的支流，石城即是在黄河和巴曲河边上的一座城堡，这三句诗实际是指西夏的先祖发祥于黄河河曲的巴曲河畔，即今海南州同德县境内。如果将东汉时的白狼国址也确定在这里，那么史籍中关于党项与白狼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得到解释，白狼是地名或部落名，党项即 ldong thang，是因部落首领的姓氏而得名的称呼，黎宗华先生近年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安多藏族把西夏称为 ldong shul mi

---

① 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2期。

nyig，即是“党项弥药”。[1]《北史》、《隋书》记载白狼为党项的一部分，更早的时候党项也可能是白狼的一部分，或者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的不同部分。汉代时白狼为该部落的名称，到隋唐时党项成为部落的名称，所以西夏人在讲到本国先祖的历史时，为表示源远流长，以本部落的古称“白狼”来作为自称，此即是“大白上国”的来历。“白上”即是“白狼”，是部落的名称，都与“白颜色”无关。蒙古是通过西夏与藏族接触的，对于西夏与白狼、西夏与藏族的这种亲缘关系较为了解，所以忽必烈封八思巴兄弟时往往与西夏相连，按《萨迦世系史》的记载，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时是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以赐八思巴，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被封为“白兰王”，八思巴的侄孙琐南藏卜及其弟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侄扎巴坚赞还相继被封为白兰王。[2] 如果“白兰”只是历史上西羌的一个部落的称号，与西夏的国号无关，那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元朝要用它来作为元朝在藏族中所封的惟一的一个王爵的封号。

二

学术界对《白狼歌》的研究，正如马学良老师和戴庆厦先生的《〈白狼歌〉研究》[3] 一文（以下简称《研究》）指出的：“过去多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考证这首歌是怎样产生的，

---

① 黎宗华：《“西羌”与多康藏族》，载《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3期。

② 参看笔者的《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4期。

③ 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该文是提交给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学术论文，收入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一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417页。

也就是弄清这首歌的性质和价值。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正确认识《白狼歌》的语言特点。二是研究《白狼歌》的语言特点，看看这个近两千年前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有哪些特点。三是探索《白狼歌》语言的系属，即研究它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确定同哪个语言最近。”他们的研究即是从考证《白狼歌》是怎样产生的入手，从语序上分析“汉语句通顺流畅，符合古代汉语诗词的造句规则，而白狼语句词的顺序，基本上是按汉语的语序直译的，因而出现译文不通顺的语句”；在用字上“汉语句中出现一次以上的字，在白狼语句里大多数是用相同的字与它相对。这也证明白狼语句属于按词注义的性质”，诗中用了许多汉语借词，……其中多数是封建社会官场文章中常用的词。可以看出，这些借词用在白狼语里则比较生硬。”因此《研究》认为《白狼歌》是先有汉语诗，然后再用白狼语以词为单位注义的，而且是由汉官根据白狼人的读音去注的，所以《白狼歌》的价值主要在于语音、词汇的研究，语法的研究价值不大。在解决这一关键难题之后，研究从肯定白狼语属于藏缅语族的前提出发，从《白狼歌》中挑出 26 个同藏缅语族语言同源比例较大的词，用 19 种藏缅语族语言及藏文、缅文与其对照，观察《白狼歌》词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关系。经过仔细分析对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同源词的比较上看，在 26 个词中，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同源的词最多，都在 20 个以上。如‘天、不、来、见、多、赐、甜、肉、飞、长、处、出、心、食、盐、山、木、家、父’等词，白狼语同这两个语支大多数语言都是同源的。但同其他语支语言比较，则都不到 20 个。如同藏语比较，同源词只有‘不、见、多、赐、肉、飞、长、处、出、心、食、盐、山、木、家、父’等 16 个。‘天、来、甜、深、石’这几个最基本的

词，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是同源的，而同藏语却是不同源的，同嘉戎语比较，相差就更大些。同源词只有‘不、甜、肉、深、心、食、盐、石、木、家’等10个，‘天、来、见、多、赐、长、出、人’等基本词是不同源的。同普米语比较，同源词有‘天、不、多、甜、酒、肉、飞、长、冬、雪、食、盐、木’等13个，‘见、赐、处、出、深、心、石、父’等基本词是不同源的。同源词多少是确定亲属语言远近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从上述的比较情况看，白狼语显然是同缅语支、彝语支比较接近。”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像两位老师这样在确定一种未判定的语言的某些词的音、义的条件下以多种语言的意义相同的词与之对比，根据同源词的多少来确定亲属语言的远近关系，自然是一种最严密，最准确的研究方法。不过从实际的语言翻译实践来看，这种准确性有时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两种语言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达习惯有时会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其次是因为所选择来比较的语言中还存在古今用词不同以及一义多词的问题。而这些不同往往会影响到同源词的确定，因而得出不同的对比结果。例如，同是用藏语和白狼语对比，格勒同志发现的同音同义词有“盐、父、不、见、来、赐、木、人、合、看、我、户、多、肉、飞、长、处、出、心、食、山、家”等22个。[①] 而王兴先同志则从《白狼歌》的“夷人本语”的各句句义出发进行分析，认为“有不少词、句与藏语有相同或相近之处”。[②] 因此，我们感到单从藏语与白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第354—355页。

② 王兴先：《格萨尔论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346页。

狼语的对比来说，还有必要在两位老师的文章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将《研究》文中经过校勘的《白狼歌》的歌词抄录如下：

一章　（远夷乐德歌）

	汉　文	白狼语汉字记音
第一句	大汉是治	提官隗权
第二句	与天意合	魏冒逾糟
第三句	吏译平端	罔译刘脾
第四句	不从我来	旁莫支留
第五句	闻风向化	徵衣随旅
第六句	所见奇异	知唐桑艾
第七句	多赐缯布	邪毗堪绅
第八句	甘美酒食	推潭仆远
第九句	昌乐肉飞	拓拒苏便
第十句	屈伸悉备	局后仍离
第十一句	蛮夷贫薄	偻让龙洞
第十二句	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
第十三句	愿主长寿	阳雒僧鳞
第十四句	子孙昌炽	莫稚角存

二章　（远夷慕德歌）

第十五句	蛮夷所处	偻让皮尼
第十六句	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第十七句	慕义向化	绳动随旅
第十八句	归日出主	路且栋雒
第十九句	圣德深恩	圣德渡诺

第二十句	与人富厚	魏菌渡洗
第二十一句	冬多霜雪	综邪流藩
第二十二句	夏多和雨	荏邪寻螺
第二十三句	寒温适时	藐浔泸漓
第二十四句	部人多有	菌补邪推
第二十五句	涉危历险	辟危归险
第二十六句	不远万里	莫受万柳
第二十七句	去俗归德	术叠附德
第二十八句	心归慈母	仍路孳摸

三章　（远夷怀德歌）

第二十九句	荒服之外	荒服之仪
第三十句	土地垸埆	梨籍伶伶
第三十一句	食肉衣皮	阻苏邪犁
第三十二句	不见盐谷	莫砀粗沐
第三十三句	吏译传风	罔译传微
第三十四句	大汉安乐	是汉安乐
第三十五句	携负归仁	趴优路仁
第三十六句	触冒险陕	雷折险龙
第三十七句	高山岐峻	伦狼藏幢
第三十八句	缘崖磻石	扶路侧禄
第三十九句	木薄发家	息落服淫
第四十句	百宿到洛	理沥发雒
第四十一句	父子同赐	捕莒菌毗
第四十二句	怀抱匹帛	怀藁匹漏
第四十三句	传告种人	传言呼敕
第四十四句	长愿臣仆	陵阳臣仆

我们认为，《研究》所指出的《白狼歌》是先有汉语诗然后再用白狼语以词为单位注义，并且是由汉官根据白狼人的读音去注的，甚至注义的汉官可能不懂白狼语，是以词为单位一个个地问了白狼人以后，根据自己的实际听音记上去的，是研究《白狼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不过《白狼歌》实际的产生过程可能比这要稍微复杂一些，大概唐蕺等人先向汉官吟唱过一首比这三章要简单得多的表示倾慕汉朝的诗歌，将其大意译为汉语后，由汉官依照汉语的习惯加以整理扩充，即《后汉书》的注中所言的“重译训诂为华言”。在写汉文歌词以后，再由汉官通过翻译向白狼人询问汉语每个字的白狼语的同义词的读音，写为“夷人本语”，由于语言习惯的不同以及翻译的困难，有些字在白狼语中没有对应的词，就记下了白狼人借汉语词的音，有些还可能是以词组或一句诗的意思反复询问后记下了白狼语中类似的或意思相近的表达方式。因此汉语和白狼语歌词之间不完全是每个字相对应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对应有时要视具体情况去思考分析。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对《白狼歌》里的一些词句的对应问题可以做一些新的探讨。

第二句“与天意合”对应“魏冒逾糟”，其中“天”在白狼语中读为“冒”，与西夏语称“天”为“没”相同，藏语称“天”为 gnam，显然不同。不过白狼语和西夏语在这里可能用的是藏文的一个古词 rmu，藏族苯教认为古代的人去世后沿着一条天绳返回天界，这天绳即称为 rmu thag，亦称 gnam thag，可见，rmu 本身具有天界之意。西夏语中“天”也不止有“没”一词，《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多数以“没”对“天”，但是也有用“鱼骨”对“天”的，“鱼骨”即藏文的 dgung 的记音，也有上天之意。吐蕃称大相为 dgung blon，西夏称首席大

臣为“谟宁令”，应即是 rmu blon，宋人释其意为“天大王”，可见 rmu 与 dgung 乃是同义词（关于西夏语与藏语的词汇对比，拟另文讨论）。“逾”则是藏语 yid（心意、意识）的对音，“糟”汉语古音为 tsou，应是藏语 mtshungs（相符、相合、相等）的对音。

第四句“不从我来”对应“旁莫支留”，“不”在白狼语中作“莫”与藏语的否定词 ma 或 mi 同源。《研究》中以藏语的 yong（来）与白狼语的“留”对比，认为不同源。不过藏语表示“来到”的另一个词 sleb 与“留”的古音 ljəu 正好相符，可以认为在这个词上藏语与白狼语是同源的。

第五句“闻风向化”对应“微衣随旅”，“闻风向化”是一个抽象的汉语习语，大意为听到消息就向往倾慕，白狼语可能是曲折表达其意。“微”有可能与藏语的 phrin（音讯、信息）相同，“随”古音为邪歌切，可能与藏语的 phyogs（方向，作动词用时表示朝向、对向）相同。

第六句“所见奇异”对应“知唐桑艾”，“见”在藏语中作 mthong，与白狼语记音“唐”相近。王兴先教授提出此处的“桑艾”与藏语 sing nge（明亮、清晰）音义相近。

第七句“多赐缯布”对应“邪毗甚𬘡”，“甚𬘡”即汉语“缯布”的变音，藏语的“赐、赠送”为 byin，在一些方言中读作 bin，与白狼语记音“毗”相近。藏语的“多”为 mang-po，但是在这里可能是用 che ba（本意为“大”）来表示多，即将“多赐”用“大量赐给”方式来表达，che 与白狼语的记音“邪”相近。

第八句“甘美酒食”对应“推潭仆远”，甘美酒食是汉语的习用语，表示美味的食品和酒，作为游牧民的白狼人，不一定习惯汉语的这种表达方式。因此“推潭”不一定是“甘美”

的直接对应词。《研究》将甘作为“甜”来与藏语 mngar 对比，认为不同源。实际此处可能是用牧民的甜味美食酥酪糕来对应的，藏语称为 thud，是用酥油、食糖及奶酪等制成，为牧民招待贵客的食品，《格萨尔王传》在提到美味食品时也往往首先说到它。thud 与白狼语记音“推”正好相符。

第十一句“蛮夷贫薄”对应“偻让龙洞”，“蛮夷”为汉族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白狼人自然不会用含有侮蔑性质的词语来称呼自己，因此“偻让”不会是“蛮夷”的直接的对应词。王静如教授认为“偻让”即是“白狼”，但读音差别较大，而且记音的汉官熟知“白狼”一词，不应又另记一音。王兴先同志认为“偻让”即藏文的 lho rong，意为南戎，汉语称为南蛮，但 rong 在藏语中是指从事农业之人，白狼为游牧民，亦不应以此自称。偻的古音为来侯切，可能是藏语 vdi - rang 的古词 vo rang（即我们自己）的记音。王兴先教授认为“龙洞”为藏语的 lung stong，为“旷野无人空地”之意。

第十三句“愿主长寿”对应“阳雒僧鳞”，长寿按藏缅语族的表达习惯是“寿长”，藏语为 tshe ring，与白狼语记音“僧鳞”的音、义都很接近。

第十九句、二十句“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对应“圣德渡诺、魏菌渡洗”，这里的深、厚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意义接近，白狼语可能是用同一词“渡”来表达的，藏语的 mthug po vthug pa 都含有厚、稠密的意义，与白狼语记音“渡”接近。

第二十一、二十二句“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对应“综邪流藩、莋邪寻螺”，冬夏对应的是“综、莋”。青藏高原的高山牧区一年实际只有两个季节，因此白狼人可能正如《隋书》党项传所说“但候草木以记岁时”，而不像从事农业的地区那样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此这里的“综、莋”可能只

是表示冷热两个季节，藏语的 grang（寒冷、寒冻）和 drod（温暖、热）与白狼语记音的“综、莋”音、义相符。

第二十四句“部人多有”对应“菌补邪推”，这里的“有”白狼语记音为“推”，与藏语的 vdug（居住、坐下、有、存在。《藏汉大辞典》解释为叙述涉及间接人物存在状况）的音、义都很符合。

第三十二句“不见盐谷”对应“莫砀粗沐”，“盐谷”意为盐和谷物，粗的古音 tshag 与藏语的 tshwa（盐）很符合，王兴先同志认为此处的“沐”应是“沭”的笔误，如果此说成立，则沭的古音船物切与藏语 vbru（谷物、粮食）的读音也很符合。

第三十九句“木薄发家”对应“息落服淫”，木薄的意义按上下文义当是指时间，依西羌游牧部落的“但候草木以记岁时”的习惯看，当是指树叶初生或树叶落叶之时，因此白狼语记音“息”应是指树木，与藏语的 shing（树木）的音义相符，“落”应是指树叶，与藏语的 lo ma（树叶，植物的叶子）的音义相符。发家应是离开家、从家中出发之意，白狼语记音的“发”按古无轻唇的规律应 biwat，与藏语的 bud pa（分离、外出）的读音相近，而“淫”则与藏语的 khyim（家、家庭）的读音相近。

第四十四句“长愿臣仆”对应“陵阳臣仆”，长愿的白狼语记音为“陵阳”，藏语表示这一概念的习惯沿有 nam yang，意为“无论何时都……”或“无论到什么时候也……”或者是 yun ring yang，意为“时间再长都……”或“时间虽长也……”这两种习语本身都带有祈愿、发誓的含义，而 nam yang、ring yang 与白狼语记音的“陵阳”的读音都非常接近。这说明白狼语与藏语的某些习惯用语也有类似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白狼歌》看，白狼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它与彝语支、缅语支在词汇对比上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与藏语支也很接近，甚至藏语与白狼语的接近程度还有可能更深一些。白狼作为汉代活动在江河源头的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其语言与藏语有这样的类似联系，这就为探讨古代江河源地区的西羌文化与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白狼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原载《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第5集，1994年10月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宗教领袖的传承方式，从13世纪在西藏出现后，在800来年的时间里，在藏族社会僧俗各界的推动下，有许多时候是在西藏地方政权甚至中央皇朝的参与推动下，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为活佛转世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同时，活佛转世本身对藏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以及程度不同地对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藏族地区的苯教也仿效藏传佛教的办法，出现了转世活佛。某些时候，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甚至影响全中国的政治生活，这种影响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在清朝达到高峰，并且在不同的范围里一直延续至今。

对于活佛转世，从过去到现在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认识。信仰佛教的人士和不信仰佛教的人士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信仰佛教的人士内部，其实对活佛转世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把各种相关的观点综合起来，结合活佛转世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简要地说明就是：活佛转世制度是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西藏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协调

起来，在某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或者著名高僧去世之后，由其弟子和寺院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各地新出生的儿童（在前一世首领去世以后出生的）中寻访、认定他的“转世”，然后接入寺院坐床，并且加以特别的培养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宗教首领的宗教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力。通过这样的继承和延续，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形成了许多活佛转世的系统，也就在藏传佛教中形成了“活佛”这样一个具有特别身份的僧人群体。因此，转世的活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具有他以前的历辈的转世的传承，而且这些转世得到该系统所在的寺院和藏传佛教界多数人的认可；第二，这一转世系统具有明确的活佛名号及身份，并有延续这一转世系统的经济基础；第三，他本人出生后通过一定的宗教程式，得到寺院和信徒的认可，承袭前世名号、地位等；第四，拥有一些固定的信仰和供奉该活佛系统的信徒，即要有世俗的施主；第五，如果是地区和教派中的重要的活佛，则需要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特别是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的重要活佛，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和封授更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当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部分是一致的。总起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转世活佛是藏传佛教中一群身份特殊的僧人，是信徒出于对上师的信仰而将其与佛、菩萨相比拟，加上高级僧侣的宗教和社会地位的继承的需要，因而一些僧人被寺院和信徒承认为前一世高僧的转世，而且这种承认往往还要经过相关的地方政权和中央王朝的认可。每一个转世活佛有自己所在的根本寺院，并拥有自己单独的住所和一些照管其生活、办理事务的侍从人员，有的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庄园和属民，他们或者是该寺的寺主，或者是该寺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具有担任本寺院或者本教派的高级僧职

和完成重要宗教使命的备选的资格。他们在自己的寺院和信徒中被认为是佛菩萨的化现，享有崇高的宗教威望。在整个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和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而继承前辈高僧地位的宗教领袖人物是同样被承认的高级僧人，而且往往比后两种传承方式产生的宗教领袖更容易得到僧俗信徒的广泛接受。

不过，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佛教从 7 世纪中叶传入藏族地区以后，吐蕃王朝的 200 多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吐蕃王朝王室控制下的佛教，并没有活佛转世。中间经过朗达玛赞普灭佛，佛教中断了一百来年。11 世纪初藏传佛教复兴，开始出现各个教派，成为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但是在后弘期的前 200 年中，也没有出现活佛转世。13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活佛转世，也并不是马上就被各个教派所接受，而只是在噶玛噶举派一个教派中实行。元代在西藏掌握政权的萨迦派和明代在西藏掌握政权的帕竹噶举派并未实行活佛转世。到 15 世纪，中新兴的格鲁派为了在教派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自己而采用活佛转世制度以后，才出现了各个教派竞相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培植自己的宗教领袖的局面。在格鲁派于 15 世纪后期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蒙古各部，并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 17 世纪中叶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以后，格鲁派把活佛转世普及到蒙藏各地。因此，活佛转世在藏传佛教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固有的制度，它有一个长期酝酿和建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噶玛噶举派中完成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和分析活佛转世的出现和建立过程，并由此研究活佛转世的历史发展，首先应该了解噶玛噶举派中活佛转世制度的演进过程。

一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最早出现在噶举派的一个支派噶玛噶举教派中。在藏语中，“噶”（bkav）是佛语或语旨之意，“举”（brgyud）是传承之意。“噶举”（bkav brgyud）有两种意思：一是可以解释为一切护持传习佛法之三藏和四续的传承者，也就是佛语的继承者之意；二可以解释为秉承传习密教金刚乘部主金刚持开始的，经过萨乐和、龙树等印度的大成就者传至谛洛巴大师的“四大语旨教授”（藏语称“噶博希”bkav vbab bzhi，即1.父续密集；2.母续胜乐轮；3.梦境修和中阴修；4.往生和夺舍）的传承者，即密教语旨教授的传承者之意。其实，第一种解释可以统指佛教的一切传承和流派，因为佛教的一切流派都是源于佛陀之语录，第二种解释则专指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因为噶举派认为，他们的四大语旨教授等殊胜教法皆源于谛洛巴祖师。关于噶举派的教法的渊源，噶举派的典籍中说，谛洛巴被金刚持佛所摄授并传授给四大语旨教授，谛洛巴的弟子那若巴领得谛洛巴的四大语旨教授，并使之条理化，归总为著名的《那若六法》，而那若巴的明妃智慧空行母妮谷玛被金刚持所摄授传法，后传出内容与《那若六法》大同小异的《妮谷六法》。萨乐和、德洛巴、那若巴在藏传佛教的典籍中都被归入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八十四大成就者之列，可见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从一开始就是特别重视密法的教派。

噶举派在西藏的祖师是玛尔巴（mar pa 公元1012—1097年）、琼波南觉、米拉日巴（mi la ras pa 公元1040—1123年或者公元1052—1135年）等人。琼波南觉去印度学法以后，在西藏南木林一带传法，形成的传承称为襄巴噶举。玛尔巴出

生在今山南地区洛扎县的秋切卓窝隆村，父名玛尔巴·旺秋维赛，母名嘉姆萨朵德，他出生后取名达玛旺秋。因为小时性情暴躁刚烈，又极好饮酒争斗，所以，父亲把他送到当地一名上师处学习佛法，取名曲结洛追（chos kyi blo gros 法慧）。15 岁时来到今日喀则地区拉孜县的芒卡木古龙寺，从卓弥·释迦益西（994—1078 年）译师学习翻译，求闻佛法。由于卓弥译师不轻易向人传法，传法时要向弟子索取很多黄金，玛尔巴认为与其交那么高的学费在西藏学法，不如直接到印度去。虽然遭到父母亲的阻拦，他还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兑换成黄金，毅然去尼泊尔和印度学法。玛尔巴曾多次到印度学法，拜那若巴等印度高僧为师，学习了《那若六法》、《胜乐金刚》等教法。玛尔巴回到西藏后定居在卓窝隆寺，其所作所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青史》说玛尔巴“对真实的证悟似流水不断，但劣等凡夫只看见他占有妻妾，与乡人打斗，尽干修房种地等事。而在具缘者看来，他曾实施四次《夺舍》法，是仲毗巴的真实化身。”① 玛尔巴的弟子很多，有四大付法弟子，四大心传弟子，四大有缘弟子等。四大付法弟子又称为“四柱”，其中俄、楚、梅三人继承讲说传规，米拉日巴秉承修行传规。米拉日巴出生在拉堆芒域贡塘地区（即今吉隆县）的甲俄杂。这个地方原属于阿里，被称为阿里下部，曾有过阿里贡塘王，现在属于日喀则地区。米拉日巴出生时他的家庭在当地是有声望、家境富裕的一家。但是在米拉日巴尚未成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产被叔父和姑母所霸占瓜分，母亲依靠为乡邻做纺线活来养育米拉兄妹俩。为了报仇，米拉日巴的母亲卖掉仅

---

① 见桂译师·宣努贝:《青史》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89 页。

剩的一块土地，供米拉日巴去学习法术。遵照母亲的意愿，米拉日巴前往卫藏地区，跟雅隆地区的雍顿曲杰学习咒术，咒死叔叔和姑母家的亲朋35人，又学会降雹术，摧毁了家乡的庄稼。为此他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自觉罪恶深重，产生学习佛法消除罪孽的念头，又辗转到玛尔巴那里学法。他38岁时到玛尔巴处，直到44岁时离开，共依止玛尔巴6年多。玛尔巴并未立刻给米拉日巴传法，而是不断变换花样刁难折磨他，叫他用咒术对付自己的仇敌，让他建造碉堡和寺庙，并常常羞辱他。米拉日的背部溃烂了，脓血像水一样流淌，而且常遭到上师的谩骂和羞辱，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对上师的信念。最后玛尔巴终于接受了他，剪下他的头发，传授居士戒和菩萨戒，取名多结坚赞（金幢），又在《胜乐金刚》曼荼罗中传授灌顶、教授并赐密名为协贝多吉（笑金刚）。其后米拉日巴回到家乡，这时他母亲早已离开人世，熟悉的房屋也已倒塌，只留下残垣断壁，而心爱的妹妹也不知去向。米拉日巴心生无限悲哀，也感受到了世事无常。于是在家乡附近的山中修持6个月，获得拙火定的成就。米拉日巴创作了许多道歌，他每到一处或每遇一个弟子、每做一件事情时总要唱出道歌，内容包括讲述佛教的道理、降伏凶神恶鬼等，歌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影响很大，以此引导具缘弟子趣入成熟解脱道。米拉日巴有许多弟子，其中的塔波拉杰建寺授徒，传出了塔波噶举教派，因此人们称玛尔巴译师为塔波噶举派的初祖，米拉日巴为二祖。

塔波拉杰（公元1079—1153年），又译作达布拉杰（dwags po lha rje）。“塔波”（dwags po）是古地名，指今西藏加查县、朗县、隆子县一带。“拉杰”（lha rje）藏语对医生的尊称，合起来意为塔波地方的医生，因为达尔玛觉早先精通医学，是一

个有名的医生，故人们尊称他为“塔波拉杰”，他出家时取名索南仁钦（bsod names rin chen 福宝），故人称其为塔波拉杰·索南仁钦。又因为他跟随米拉日巴学法后，在加查县和朗县交界的地方兴建了塔拉岗波寺，并在那里长期传法，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岗波巴。塔波拉杰出生于西藏塔波的涅地区（今隆子县）的斯瓦隆村，家族为尼瓦氏，这是当时塔波地区的著名氏族。他少年学医，以医术高明著称，并娶妻生子。后来在一场瘟疫中妻儿都死去，他由此认识到人生无常，决心出家学法。他先学噶当派和宁马派的教法，在 32 岁时听到米拉日巴的事迹，立即产生特别的信心，就前去投奔，拜米拉日巴为师。据说塔波拉杰在后藏扎西岗地方见到了米拉日巴，即向米拉日巴献上黄金和茶叶作为拜师礼。米拉日巴对他说：“黄金不合我意，我又没有煮茶的灶具，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米拉日巴拿一个盛满酒的颅碗给塔波拉杰，让他把酒喝完。塔波拉杰因为以前在噶当派中受过比丘戒，所以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遵照米拉日巴的吩咐，把酒喝得一干二净。此时，米拉日巴就在心中确信塔波拉杰将来会成为自己法脉的继承人。米拉日巴询问了塔波拉杰的家庭和学习噶当派教法的情况，对塔波拉杰讲了噶当派不注重传习密法的局限，并对他说：“供养三世诸佛不如供养上师一毫毛福德大，不折不扣地修证上师的教授，才最有福德。”又说：“一个对此生没有任何依恋的弟子，向合格的上师求得教授并修持不断，那么，最好的能即身成佛，差一点的能在中阴界成佛，最差的也能在七到十六世中得到解脱。”[①]由此可见，米拉日巴把“视师为佛”和“即身成佛”的思想当

①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97—302 页。

作自己教育弟子的主要原则。塔波拉杰跟随米拉日巴学习一年多，然后返回山南。1121 年他在岗波山上兴建了塔拉岗波寺，广招门徒，创立了噶当派道次第和噶举派大手印相结合的塔波噶举派，因而名噪一时。他住持塔拉岗波寺直到 1151 年，在 30 年中他不仅传授那若六法等密法，而且重视传授显宗的经典，并自己著书立说。塔波拉杰有许多弟子，有雪绒帕巴、僧辛·益希宁波、色贡·益希宁波、壤尼哇·曲吉雍仲等四大成就者，塔波·贡巴楚臣宁波、帕木竹巴·多吉杰波、拔绒巴·达玛旺秋、噶玛巴·都松钦巴等四大继承法系的弟子，所以由他开始的教法传承被称为塔波噶举。

1151 年，塔波拉杰在他去世前两年，把塔拉岗波寺交给其侄子塔波·贡巴楚臣宁波管理。贡巴楚臣宁波生于 1116 年，是塔波拉杰兄长加瓦色日的长子，也是塔波拉杰的付法弟子之一。他在任期间，扩建了塔拉岗波寺，新建了佛殿和禅院。由于塔拉岗波寺在雅鲁藏布江边的高山上，交通十分不便，所以他后来又在堆隆修建了楚布拉龙寺，曾将卫藏康三地的大量僧人集中于此地。1160 年拉萨地方的巴、热二派发生长期混战，贡巴楚臣宁波依靠雄厚的财力和宗教声望，出面调解，并把遭战火摧毁的大昭寺维修后交给当时在拉萨和山南地区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弟子贡塘喇嘛尚（即蔡巴噶举派的创始人）。1169 年，贡巴楚臣宁波去世，由他的弟弟塔波贡穷·喜饶绛曲（公元 1130—1173 年）继任。但是塔波贡穷·喜饶绛曲在任仅一年，就因意外事故从悬崖上掉下而去世。看来塔波噶举派在开初也和萨迦派等教派类似，教派首领的传承采取家族传承的办法，由首领的出家的侄子或者兄弟继承。不过到塔波贡穷·喜饶绛曲时，因为他突然去世，而家族中又没有男性成员继承，所以在他以后由塔波拉杰的弟子塔波都增继任塔拉岗波寺

的住持。但是他的继任者遇到了许多困难，寺内出现一些矛盾，一些僧人离寺出走，他不得不宣布自己去闭关修行 8 年。这时塔波拉杰的弟子帕木竹巴的一个弟子止贡巴·仁钦贝出来帮助他，把他从闭关地迎请回来，支持他担任塔拉岗波寺的住持。塔波都增以后，塔拉岗波寺由止贡巴·仁钦贝的侄子温·喜饶迥乃继任。这样造成了塔波噶举的主寺塔拉岗波寺的住持要由其分支教派止贡噶举的止贡寺来委派的局面。[①] 作为噶举派最主要的一支，它的分支帕竹噶举、蔡巴噶举、噶玛噶举，乃至帕竹噶举的分支止贡噶举、达垄噶举都发展成为大的教派，而塔波噶举本身却衰落到仅限于塔拉岗波寺的系统。这表明宗教首领由其家族传承的办法，往往与该家族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宗教首领的家族衰落的时候，寺院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累，也随之衰落。

塔波拉杰的大弟子都松钦巴是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1110 年出生在西康者雪（tre shod），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境内的朱倭下区热达地方，其父亲名叫多杰贡（rdo rje mgon），据说是修持密教的《大威德金刚》的一位瑜伽行者，其母亲名叫拉妥萨·冈江梅珍（lha thog bzav sgang lcam me vdren），据说她是自性瑜伽母。这样看来他出身在一个修持旧密法的家庭中。他自幼从父母学佛法，16 岁时即 1125 年随阿阇黎恰·僧格扎出家，取名却吉扎巴。在他成名以后，弟子们宣称他能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所以号称都松钦巴（dus gsum mkhyen pa，都松意思是三时，或译三世，钦巴意思是知者），而不称其名讳。1128 年他动身前往西藏，次年到堆

①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97—302 页。

龙德庆县境内的之嘉玛寺，拜噶当派桑浦寺系统的著名善知识嘉玛哇和恰巴·曲结僧格为师，学习中观、因明和慈氏诸大论，在显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开初应该是一个噶当派的僧人，并在噶当派中受了比丘戒。堆松钦巴 30 岁时即 1139 年来到塔拉岗波寺，与塔波拉杰叔侄相见，并拜塔波拉杰为师，从此改学噶举派教法，成为塔波噶举派的僧人。他在 38 岁（公元 1147 年）时，曾到康区的类乌齐（ri bo che），并在该地附近的噶玛地方（今属昌都县）建噶玛丹萨寺（karma gdan sa，噶玛噶举派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寺，一说此寺建于都松钦巴 76 岁的 1185 年）。他一生主要活动地区在康区，据说他在西康聚有徒众千人，曾调解当地头人之间的纠纷，并以大量财物献给塔拉冈波寺和前藏其他寺院。晚年，他又到前藏，劝说向蔡巴（zhang tshal pa）停止与人争斗，平息了拉萨地区因教派斗争发生的战乱。1187 年，他 78 岁时（一说 1189 年 80 岁时）在堆隆的江浦地方（地在拉萨西北）兴建了一座楚布寺（mtshur phur），并亲自住持此寺，一直到 1193 年在楚布寺去世。①

都松钦巴即是后世公认的第一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他一生从事学佛和传法的事业，对藏传佛教的噶当派、萨迦派、宁玛派的教法都有深入的了解，30 岁以后成为塔波噶举派的弟子。在 50 多年中奔波于康区和卫藏各地，在藏传佛教各派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还在 70 多岁的高龄时创建了噶玛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修订版，第 117—118 页。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10—314 页。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28—234 页。

丹萨寺、楚布寺，吸引和培育了大批弟子，并形成了塔波噶举的一个主要的支派。他的名声甚至引起了远在黄河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的注意，据《智者喜宴》记载，西夏国王曾派遣使者到楚布寺迎请都松钦巴到西夏去，都松钦巴这时年龄太大，没有前往，而派遣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格西藏波哇送来了黄金、铜器等物品。[1] 按照他的事迹和贡献来说，他确实已经具备了传出转世的条件。作为一个传授噶举派大手印密法的上师，在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弟子和信徒提到过他是某个菩萨或者高僧的转生，所以《青史》在讲述他的事迹时提到他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名僧嘉哇却央和噶当派的高僧博多哇的转生的说法。在后来的藏文史籍中也有他临终时留下了关于他将在某地投生的预言的说法，但是在他去世时，藏传佛教中还没有过活佛转世的例子，楚布寺和他的弟子们并没有提出给他寻找转世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去考察或者寻找他的转世，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七天即将他的遗体火化，并建了一座佛塔来纪念他。

都松钦巴去世后，楚布寺住持的职务由他的弟子继承，“(楚布寺) 由塔拉岗波来的拉雅巴任住持三年。他离开后，都松钦巴的弟子堆隆真巴哇和让迥桑杰住持寺院六七年。继由甲瓦冈巴，继由温波嘉措喇嘛任住持。此后由温波嘉措喇嘛的温波仁钦扎任住持”[2]。这样看来，楚布寺在都松钦巴去世时采

---

① 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下册，第1410页。

②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

用的还是当时通行的师徒传承的继承办法，并没有考虑到要给都松钦巴寻找转世或者都松钦巴的转世会来住持寺院的问题。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个康区的青年僧人噶玛拔希被宣称为都松钦巴的转世，并且在楚布寺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楚布寺，可能这种师徒传承的方式还会在楚布寺一直继续下去。

在都松钦巴去世十年以后，噶玛拔希出生在康区。噶玛拔希（karma pakshi，公元 1204—1283 年，《贤者喜宴》说他生于火虎年，即 1206 年，《青史》认为他生于木鼠年，即 1204 年），汉文又译噶玛巴什、噶玛八合失，旧译哈立麻拔希等。“拔希”是蒙语“八合失”之音译，“八合失”据说来源于汉语的“把式”，就是“师傅”之意，因此“噶玛拔希”实际上是其本名却吉喇嘛之意译。噶玛拔希出生在康区金沙江流域的止垄丹巴却秋（vbri lung dam pa chos phyug）地方，大约在今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其家族为哉波务家族，父名粗擦章达（tshur tsha myang thar），母名为森萨芒吉（seng za mang skyid），是他们的三个儿子中的幼子。他幼时起名曲增，五岁时就精通文字读写，九、十岁时就能熟识佛典，十一岁时跟从堆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出家，取名却吉喇嘛，听闻《大手印俱生导引》等噶举派教法。由噶托巴强巴崩做亲教师，仁波且崩扎巴做轨范师，京俄芒布哇为屏教师，受比丘戒。对噶举派的《脐轮火》、《幻身》、《光明》、《大手印》等密法广作闻思修，生起证验。受奔日地区施主之邀前往奔日建寺弘法，曾经入禅定修行 11 年之久。对噶玛拔希一生的命运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的，应该说就是他的这位给他授戒的上师崩扎巴(sbom brag pa，《洛绒史籍》作 spom brag pa)。据《青史》记载，崩扎巴是都松钦巴的弟子桑结热钦的弟子，而桑结热钦是山南雅隆地方人，他是先结识了都松钦巴的几个弟子以后才在

37岁时拜都松钦巴为师的。这样看来桑结热钦是都松钦巴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收的一个弟子，而崩扎巴是在14岁时拜桑结热钦为师的，这样崩扎巴和都松钦巴的年龄差距应该比较大，所以即使考虑到都松钦巴活了84岁，崩扎巴有可能在都松钦巴晚年时见过都松钦巴或者和都松钦巴有过接触，但是他和都松钦巴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且《青史》还说都松钦巴去世时桑结热钦正在康区传法，是后来才返回楚布寺去追悼自己的老师的，而崩扎巴当时也是在康区传法的，所以他们虽然是都松钦巴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但是从楚布寺这方面来说，他们并不是都松钦巴的弟子群中的主要成员，对于都松钦巴以后的楚布寺的事务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所以藏文史籍中记载的他们的事迹和楚布寺并没有多大的联系。①

但是在都松钦巴去世20年之后的某一天，当在康区传法的崩扎巴第一次见到虚岁11岁的噶玛拔希的时候，一件将来会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悄悄地发生了。《青史》记载当时的情形说："本来他（噶玛拔希）未和崩扎巴见过面，可是崩扎巴一见就认识他。当崩扎巴和他见面时，崩扎巴对他说：'今天虚空中现见勇士空行如云来集，你是一位由空行加持的人士。'当天晚上崩扎巴给他灌顶后说：'你是一位有福缘者，都松钦巴等噶举派诸师都明显地来到了。现在我给你传授的教法，你去修持吧。'"② 如果我们假定《青史》的这一段记载是准确的，我们就可以看出，崩扎巴在这里实际上正是要表示噶

①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318页。

②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意思。对一个十来岁的还没有受沙弥戒的幼年僧人，立即宣称他是“由空行加持的人士”，这在注重密法修持的噶举派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受空行加持的人应该是像都松钦巴这样的有成就的上师，而崩扎巴这样称赞一个刚刚见到的幼童，显然是把这个幼童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重要人物来看待的。在给噶玛拔希传授灌顶后所说的话，更是对噶玛拔希以成为都松钦巴这样的噶举派的上师相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崩扎巴可能是闪过一下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再世的念头，但是他并未能直接说出来。他可能宣称他似乎一见面就认识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孩，但是还不能说他认识这个小孩就和都松钦巴幼年时一样，因为崩扎巴见到都松钦巴的时候，都松钦巴已经是老年人了，所以他只能是表示从精神上认识到噶玛拔希是他的老师的老师都松钦巴的转世的意思。在以后的几年里，崩扎巴一直把噶玛拔希当作都松钦巴的事业的继承人来培养。《洛绒史籍》说：崩扎巴与噶玛拔希见面后，崩扎巴就没有离开过噶玛拔希，一直到崩扎巴在康区的寺院中去世。[①] 当崩扎巴去世时，还对噶玛拔希叮嘱说：“你应该思考如何努力来弘扬法王都松钦巴的教法。现在，直至楚布寺以下的都松钦巴的这一教法，你应当抚育一下。”又说：“噶举派这一教派，弟子比上师的事业还大。我以前的噶举派的一切事业，都将会比不上你的事业大。”[②] 在这里，他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要噶玛拔希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至于如何继承，显然崩扎巴考虑过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转世的问题，也想到噶玛

①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②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拔希总有一天要到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可以说，崩扎巴已经做了后来的那些培养自己的上师的转世灵童的佛教高僧们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只是由于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转世灵童的先例，所以崩扎巴只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进行一种崭新的探索，他在许多年中默默地努力，但是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能够公开地清楚地说明自己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把噶玛拔希培养成为都松钦巴的转世，并且要进入到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生动有趣而又意义深远的一幕，也即是庄严神秘的活佛转世的序幕。在距离楚布寺上千公里的康区的一个寺院里，一个年老的高僧正在对他的年轻的弟子进行精心培养，而培养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弟子在将来到楚布寺去继承寺院的创建者的事业，继承他的宗教和经济地位，让楚布寺僧众承认他是都松钦巴的转生。而这时楚布寺的几百名僧人包括接连几任担任住持的高僧们，对此却全然不知，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个远方的僧人以上师的转世灵童的身份来到寺院继承他的事业。而这一老一幼的僧人要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只是老年的僧人是寺院创建者的弟子的弟子，曾经见过这个著名的祖师，他是自动地而不是受到委托地在选择和培养自己的祖师的接班人，而且他确信自己传给幼年僧人的教法就是祖师正宗的传承，可能他还给这个幼年的僧人传授了一些本教派的历史典故和祖师的传法经历等。但是，甚至到老年僧人去世的时候，他的计划还是看不到实现的前景，不过他却把多年的真诚的愿望和坚强的信心一起留给了自己的弟子，并坚信弟子作为转世灵童一定会实现自己设想的目标。这样的场面，在以后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在许多地方和寺院注定要大同小异地重复上演，并且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的

规则。

但是在当时，崩扎巴如何在见到噶玛拔希以后立即想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计划，并且用自己余生的全部精力来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践，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一些历史学者和社会人士看来，人们宁愿相信这是因为藏传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由于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出于解决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而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崩扎巴最先得到这样一种“灵感”，而且他培养的弟子噶玛拔希在后来取得了成功，才走出了影响后来历史的第一步。在佛教人士和信徒看来，人们宁愿相信这是佛、菩萨对崩扎巴的授记，或者说是一般宗教意义上所说的“神启”或者是“天启”，即是得到神的启发而想出了这样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宗教首领的继承方法，这本身就可以构成活佛转世的神秘性的一部分。事实上，菩萨和神灵的授记和启发等等，很快就在以后的活佛转世的事例中出现了，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噶玛拔希的成功可能有他的幸运的成分。崩扎巴去世后，他并没有直接到楚布寺去继承都松钦巴的事业，而是继续在康区传法授徒，积聚力量。直到1240年蒙古军队进入西藏之前的一些年，楚布寺由于管理不善而衰败，殿堂坍塌而无力修复，不少寺院的僧人离寺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噶玛拔希才能够从康区来到楚布寺，顺利地从温波仁钦扎的手里接过楚布寺住持的职务，并把温波仁钦扎送到宗布寺去当住持。[①] 噶玛拔希在担任住持的6年中，运用自己的财力和能力，完成了修缮楚布寺殿堂的工作。看来噶玛拔希是得益于楚布寺遇到经济困难的机会，才顺利地实现了崩扎巴对他的期望的。反过

①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楚布寺在师徒传承的几位堪布的治理下发展得很好，或者在噶玛拔希进入楚布寺以前有一个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长期担任楚布寺的堪布，在楚布寺形成一个巩固的宗教和经济的领导核心，那么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也可能在他们之前确实已经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对一个自己见到的最聪明而且活泼健康的一个幼童进行精心的培养，然后寻找各种理由把这个幼童说成是某个大寺院的已故的著名高僧（在许多情况下就是策划者自己的上师）的转世，送到那座寺院去继承高僧的事业和地位。这种尝试常常会遇到两种情形，或者是策划者本身就在该寺院担任职务，他想培养的幼童就在僧众的视线以内，这样他的想法就需要僧众立即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决定，这样往往会受到习惯于恪守成规的寺院的抵制而不能成功，或者是策划者在远离寺院的地方，并不能对寺院施加必须的影响，他的计划能不能实现是很大的未知数，所以进行计划的人在中途就往往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而放弃了。

关于都松钦巴去世后楚布寺衰落的原因，继任的几位堪布能力不足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都松钦巴的去世使得楚布寺在当时拉萨附近的几个教派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正是在楚布寺 1187 年建寺的前后，在拉萨的附近兴建了蔡巴噶举的蔡巴寺（公元 1175 年）和贡塘寺（公元 1187 年在今拉萨市城关区蔡贡塘乡），止贡噶举的止贡替寺（公元 1179 年在今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达垄噶举的达垄寺（公元 1180 年在今拉萨市林周县），修赛噶举的修赛寺（公元 1181 年在今拉萨市曲水县），加上 100 年前兴建的噶当派的大寺院热振寺（公元 1056 年建寺，在林周县）、杰拉康寺（公元 1012 年建寺，在林周县）和桑浦寺（公元 1073 年建寺，在堆龙德

庆县)，形成了拉萨附近寺院密集的局面。都松钦巴建楚布寺时年龄已经很大，他原来主要是在康区和山南达布地区活动，在拉萨地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兴建楚布寺主要靠他在康区的信徒和弟子的支持。因此他在楚布寺建寺后6年就去世，使得楚布寺在这些大寺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我们只要看在元代时，蔡巴、止贡、达垄都是万户府，而楚布寺并不能建立一个万户，就可以看出蔡巴噶举在拉萨附近不能和这几个同门的噶举教派相比拟的情况。也可能正是因为噶玛噶举派的主要信徒和高僧在康区而主寺楚布寺在拉萨的地理分布特点，使得活佛转世首先在噶玛噶举派中出现。

从更广大一些的角度也即是从当时亚洲的宗教和政治的变化形势来看，应该说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这个行动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噶玛拔希生于1204年，而这一年刚好是印度佛教高僧喀且班钦① 进藏的一年。从佛教开始传入藏族地区开始，或者是寂护、莲花生、阿底峡、喀且

① 喀且班钦名释迦室利，印度西部喀什米尔地方查哇斯热城人，父亲是大商人萨玛杂雅。生于藏历第二饶迥火羊年（公元1127年），卒于第四饶迥木鸡年（公元1225年），享年99岁。他10岁起系统学习五学知识，23岁出家为僧，随赴印度东部修习佛教哲学，直至30岁。受比丘戒后修持密乘教法，成为著名的大班智达。第一饶迥末期即公元13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哈里发兴兵侵犯印度，除了印度南方和东部部分地区，其余西印度、中印度及北印度均被伊斯兰教的军队占领。所以印度境内信仰佛教的绝大多数班智达、学者和僧徒逃往印度以东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当时喀且班钦等少数人向北逃至与西藏卓木（亚东）地区相邻的拜智雅集市，在那里避居约三年之久。第三饶迥木鼠年（公元1204年），他受西藏绰浦译师·强巴贝敦之请，从亚东入藏到绰浦寺，那时他已经78岁，而绰浦译师只有30岁。他在西藏留居10年，弘扬佛法，培养了萨迦班智达、绰浦译师等弟子。他于第四饶迥木狗年（公元1214年）88岁高龄时返归喀什米尔。在喀什米尔又传教12年，于99岁谢世。见《东嘎藏学大词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286页。

班钦等印度佛教大师入藏，或者是仁钦桑布、玛尔巴等西藏大师到印度求法，藏传佛教在教理和修行等方面主要是接受印度高僧的教导。到喀且班钦入藏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彻底衰亡了，印度在宗教上被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所控制。所以喀且班钦以后再没有印度的佛教大师进藏传法的记载，喀且班钦可以说是到西藏传播佛教的最后一位印度佛教大师。喀且班钦的进藏标志着藏传佛教最后一次从印度接受教理和宗教指导，然后转入依靠自身发展的时期。在新的时期里藏传佛教已经感觉到推出藏族本身的佛教大师的需要，而这样的大师，从后来的藏传佛教历史来看，一种是像萨迦班智达、八思巴这样的在教派和家族紧密结合的政教势力中，出身于宗教首领的家庭，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并受到社会上的政治势力的推崇和供奉，从而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一种是像布顿大师和宗喀巴大师这样的出身于民间，自幼就出家学佛，经过终生的勤苦钻研和修行，最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还有一种就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像五世达赖喇嘛这样的自幼被认定为转世活佛，被确定为终生奉献给佛教事业，在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受到特别的精心培养教育，在信徒们的眼中他们从出生不久的幼童时代就取得了佛法高僧的地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世代继承的佛教大师。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培养佛教的领袖人物，是藏传佛教界隐约感觉到的一种需要，而崩扎巴和噶玛拔希的尝试，是这种社会需要的一个表现，他们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当噶玛拔希进入楚布寺并顺利地继承了都松钦巴的事业也

即是成为了噶玛噶举派的新的领袖人物的时期，在青藏高原的东北方向也在发生重大的历史变化。1206年成吉思汗成为新兴的蒙古汗国的大汗，在西征中亚兵锋及于西北印度之后，1227年蒙古灭亡了西夏。西夏王国与西藏和藏传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西夏王朝的后期，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噶举派的僧人曾经活动在西夏的王廷，并受到西夏王室的封赏，有的藏传佛教僧人还当过西夏王国的国师、帝师。所以西夏王国的灭亡应该会使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人物产生重大的震动，他们也随即被卷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

1239年驻守在凉州负责管理西夏故地的蒙古皇子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到达西藏。约在1240年蒙古军队在拉萨北面的地区击破以噶当派的寺院为主的抵抗力量，摧毁了杰拉康寺，杀死抵抗的僧人500名。杰拉康离楚布寺不远，蒙古军的到来对楚布寺自然会产生极大的震动，噶玛拔希离开了他刚刚住持了六年的楚布寺，经过工布地区返回康区。所以在随后的阔端邀请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到凉州去会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提到想邀请噶玛拔希的记载。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应邀去了凉州，完成了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的会谈，和蒙古建立了政治关系，使得萨迦派在元代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主要的藏传佛教的教派。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汗派他的弟弟忽必烈带兵出六盘山，穿过藏族地区的东部远征云南大理，以实现对南宋的包围。可能是考虑到进军大理正要经过噶玛拔希活动的康区，因此忽必烈在驻兵六盘山时，除了召请在凉州的八思巴以外，也派人去召请噶玛拔希。噶玛拔希接到忽必烈的召请书后，对于是不是应召前往犹豫不决，他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255年忽必烈已

从云南军中返抵汉藏交界的绒域色堆地方时，他才到达忽必烈的营帐。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可能是看到忽必烈的地位并不太稳固，考虑自己的寺院在蒙哥汗的幼弟阿里不哥的封地之内，想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直接建立关系，因此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然后到了噶举派以前就有传教基础的宁夏一带，修复了许多被战争毁坏的佛寺。① 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剌兀鲁朵的诸王会聚之所。② 当时蒙哥汗正在那里召集诸王百官商议大举进攻南宋之事。据《红史》记载，噶玛拔希给蒙哥汗等人传授了灌顶，使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等归依了佛教，每月守护分别解脱三时戒律，发菩提心，并下令在每月的四个吉日中任何人不准欺凌别人，不准杀生食肉，不准危害僧众，使其护持各自的教法。蒙哥汗尊噶玛拔希为上师，还赐给噶玛拔希一枚金印和一千锭白银。噶玛拔希还在哈剌和林新建了一座大寺院。③ 后来被噶玛噶举派奉为重要宝物的黑帽系活佛的黑色僧帽，应当也是在这个时期由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1259年蒙哥汗在四川军中病死，蒙古皇室中随即发生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争位的斗争。1260年，忽必烈先自称可汗于开平，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亦称可汗于和林，当时噶玛拔希可能是留在和林阿里不哥的身边。忽必烈在取得这场争位斗争的胜利后，对当初未能挽留

① 《历辈噶玛巴传略》，藏文木刻本，25—37叶。

②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本，第91页。

③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本，第91—92页。

噶玛拔希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噶玛拔希又有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所以忽必烈认为噶玛拔希是阿里不哥一派的人物。据说忽必烈派 300 名士兵拘留了噶玛拔希，对噶玛拔希百般加害。《红史》说："故忽必烈下令对他（噶玛拔希）施行火烧、抛入水中、用兵器砍、喂毒、头上钉铁等刑罚，并派人分三班轮流看守，七天不准进食。"其弟子随从等亦受牵连，据说有两人被处死。噶玛拔希还被流放到海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忽必烈考虑到噶玛拔希毕竟是藏传佛教一个教派的领袖，在康区还有重要的影响，才将噶玛拔希释放，并准许他自由传教。1264 年底噶玛拔希动身返藏，一路讲经说法，先到康区噶玛寺，后前往楚布寺，历经八年回到楚布寺。回楚布寺后，他在寺院中生活了十来年，又一次对楚布寺进行修缮，并建造佛像，组织抄写佛经。他还在楚布寺会见过从大都返回萨迦的帝师八思巴。1283 年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去世。

噶玛拔希一生的经历确实是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他在崩扎巴的培养下取得了丰富的宗教学识和领导噶玛噶举派的能力和经验，当他成为楚布寺的住持并开始发展楚布寺时，由于历史潮流的推动，他又和萨迦派的领袖一样，也参加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宫廷中的早期传播，积累了藏传佛教和中原王朝宫廷政治相配合的经验，并且有了在其他民族中传播藏传佛教的经验。他活动区域之大，在此前的藏传佛教僧人中是没有过的，但是由于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没有从一开始就拥护忽必烈，结果在和萨迦派的竞争中失败，成为一个终老于自己寺院中的僧人。这一点正如王森先生所指出的："看起来，噶玛拔希在中央同萨迦派的斗争虽然以失败结局，可是他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活动，却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从他这一辈开始，才确立了噶玛派的转世

相承的制度。”①

噶玛拔希在楚布寺最后的十来年中，可能对自己的一生和噶玛噶举将来的发展作了认真的思考。他考虑到当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所处的形势，特别是1280年前后，在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发生的战乱“止贡林洛”（即止贡寺院之乱）带来的各教派斗争的形势，看到要保持噶玛噶举派的地位和前途，最重要的是保证噶玛噶举派有一个有威望的宗教领袖人物。他从崩扎巴培养他的过程中体会到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对噶玛噶举派是一个最适合的方案，并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安排。他在多年的传法活动中培养了一批弟子，但是对后来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他去世前一年才收的一位弟子邬坚巴·仁钦贝（公元1230—1309年）。邬坚巴是安多地方人，幼时随伯父学法，16岁时离家出走到珀东艾寺从珀东法主仁钦孜摩听闻因明、中观等。后从主巴噶举派高僧郭仓巴·贡布多杰受沙弥戒，20岁时从珀东仁钦孜摩受比丘戒，学习《时轮》各类传规。后依止郭仓巴学习主巴噶举派教法。曾赴印度、邬仗那等地朝佛、学法、修行，还以北方大德身份施财修缮中印度圣迹，因此被称为邬坚巴（即去过邬仗那的人）。他在1282年53岁时才到楚布寺拜噶玛拔希为师，但是他受到噶玛拔希特别的重视。1283年噶玛拔希去世时委任他继承楚布寺住持的职务，并把寻找自己转世灵童的任务托付给他。②《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去世和认定他的转世灵童的情形说：“大成就者噶玛巴临

---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21页。

② 东嘎·洛桑赤列：《东嘎藏学大词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265页。

死之前说过：‘我之身躯请停放七天，不要动。’故将尸体移至寓所内，他变化为彩虹前往天界，众天神献大供养，历时八天。他前去夺舍复生时，见以前之躯体已被火化，楚布河谷充满哭声，见众生如此悲苦，他伤心得昏迷过去，他苏醒后，又去寻找夺舍之尸体。在堆隆帕仓找到一个完整无损刚满三岁的小孩的尸体，夺舍转生后，刚转动眼珠，死者家的人认为死人转动眼珠不祥，其母立即用针将其眼珠取下，安在脸上。他想没有眼睛就不能做利他之事，于是又脱出再找尸体，在北面的外房中只找到一只长着虫子的死鸽子，因此大为灰心，准备前去兜率天宫，守护地方之二十五空行母前来劝其还是转生为人。他说再至人间甚难，二十五空行母在六十二胜乐佛之坛城中为其灌顶，赞颂吉祥，并授记他将降生于芒域贡塘秀莫雪山边上的沃玛龙堪塘之扎普龙雪地方，送他踏着彩虹之路，来到上为水晶房下为中阴界的地方时，据称爱欲道的血浪涌来，所有空行母都逃走了，登九重天有九层天梯，他又登上一层，故未逃脱，他大声喊道：‘业缘解脱之道如此困难啊！’便晕倒过去。醒后，他感觉到身体特别疲劳。此事记载于他的传记之中。此后，按以前之授记，攘迥多吉于阳木猴年（公元1284年）一月八日降生，父亲名叫阿强却贝，是一旧密学者，但生活贫困，以制作陶器为生。此儿子出生后有多种奇特之征兆，生幻化之梦，能述说前世及转生情景。攘迥多吉对读、写和一切教法都一学即通，并能深晓其意，在家乡渐有名声。两三岁时，去参加朗科法会，见圣像放光及融入，故得护佑，深晓一切善教诫。他祈请父亲传授教诫。当堪布色康巴询问时，他讲述了自己前世和中阴界之事迹。他在吉隆观世音像面前预试伟大菩提心，启知其为大成就者噶玛巴钦波之转世者，故给大成就者邬坚巴捎去一顶黑帽和三身像，并带话说：‘以后我自己

前来，以此作见面之因缘。’大成就者邬坚巴答应与其相会，他们到达浦扎的当天晚上，大成就者邬坚巴的本尊显现说：‘大成就者明天会到此借宿。’邬坚巴醒来后对近侍者说：‘今天噶玛巴钦波会到此，你们奏乐前去迎接，看究竟谁来。’近侍者出去一看，没有别人，只有一对制作陶器的夫妻领着一个小孩。近侍们回来禀报后，邬坚巴说：‘正是他们，请把这一小孩邀请到此。’小孩进来后，同邬坚巴并肩坐于左右座位上。邬坚巴平素具有无限福泽和身威，修习秘密主法时，其见地之威严更甚，故父母跪下礼拜，但小孩不礼拜，并毫无惧色地摇弄佛堂前面的铃铛。邬坚巴看后笑着说：‘这个顽皮的小孩，具有特别殊胜之因缘。’然后让其坐在坐垫上，问：‘你是何人?’这个小孩答道：‘我就是著名的噶玛巴，心中具有圆满法力，但身体四大力未圆满，故到此祈请你护持。’邬坚巴说：‘既然如此，对我来说也得到多种清净显像。’所以邬坚巴十分喜爱和高兴，如同保护眼睛那样护持他，并授予居士戒，使其产生愿心，授给灌顶教诫，修习深密之教法，如同大海中的水层出不穷。以后，并教给他许多道歌。七岁时，他跟随堪布衮丹喜饶出家，起法名为攘迥多吉，此为前世噶玛巴的密宗名。”①

从这一段记载看，当时为转世设想的理由是，噶玛拔希本来是要对自己的遗体实行夺舍复生的，但是因为遗体已经被火化，于是找到一个三岁小孩的尸体实行夺舍，但是又被不了解情况的母亲刺瞎了眼睛，只好再去寻找夺舍对象，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夺舍的对象时，才在空行母的鼓动下，用投胎出生的

①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第83—85页。

办法来转世。可见在开始的时候活佛转世的策划者和宣传者认为，去世的成就者用夺舍的办法来转世，是最容易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的转世办法。按照这种办法，应该是在前一世的高僧去世时，在附近有一个刚去世的小孩或者成人“死而复活”，并且表明自己是去世的高僧的转世。用夺舍的理论来说，这就是去世的高僧的灵魂用夺舍的办法进入了新的躯体。但是这种夺舍转世毕竟是难以实行的。据说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的事例中，只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实行过一次，是夺舍转世到一个死去不久的 18 岁的青年的身体中，成为新的东科尔活佛。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设想了投胎转世的模式。但是从一开始投胎转世的模式就遇到如何认证的问题。从当时的过程来看，首先是在贡塘地方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出现一些奇特的征兆，父母亲的梦境，小孩宣称自己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等。不过最主要的负责认定转世灵童邬坚巴的活动，他和要认证的幼童的会见，似乎有预先经过安排的意味。但是在另一部攘迥多吉的传记中提到邬坚巴和幼童的对话，就代表了后来人们认为的认证转世灵童应该有的内容，即认识前世用过的物品，或者记得前世的某一事情。《贤者喜宴》中说，攘迥多吉五岁时来到楚布寺，楚布寺的住持邬坚巴为了考验其真伪，入金刚手菩萨禅定，但没有威慑住他。他进殿后也不向邬坚巴顶礼，拿起金刚铃摇了起来，随后径自走到法座上。邬坚巴问：“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噶玛拔希。”邬坚巴问过去他们师徒二人的交往情形，他一一回答。最后邬坚巴问：“你曾给我什么东西?”他说：“黑帽和经书。”攘迥多吉说罢从法座上下来，向邬坚巴顶礼说：“虽然以前我是你的上师，但现在请你护佑我。”邬坚巴说：“你如果是我的上师，应该会读经文。请你读吧!”说着把经书交给他。他有的经文念得很顺利，有的念得

不熟练，有的读得含混，并笑着说：“比这可笑的经文没有读到过。”说完笑了起来。当邬坚巴询问其出生年月后就说：“我的上师是羊年九月三日圆寂的，而你生于猴年一月八日，怎么中间只有五个月？你不是我的上师的转世。”他说：“我把灵识投入到已怀孕四个月的胎儿身上了。……”邬坚巴问：“其他还有什么记忆吗？”他把曾试图在楚布帕尔仓施夺舍未果之事告诉了邬坚巴。为辨真假，邬坚巴立刻派人去核实，结果一切真实无疑。”① 《红史》是蔡巴噶举的学者贡噶多吉所著，成书于元末，但是关于攘迥多吉的这一段记载可能是明代时加进去的。而《贤者喜宴》是噶玛噶举派的学者巴俄·祖拉陈瓦写的，成书于 1566 年。这两位噶举派的学者讲述的认定攘迥多吉是噶玛拔希的转世的过程大同小异，但是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别。这说明至少在噶举派当中关于第一个转世活佛的出现和认定，当时就有一些不同的传说，一些人可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来看待这一新出现的奇特的事情的。

邬坚巴是在攘迥多吉五岁时认定他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的，他随即给他授居士戒并起名。但是与后来的转世灵童在认定后立即享有前世的地位的做法不同，攘迥多吉并没有能马上登上噶玛拔希的法座，成为楚布寺的首领，甚至他没有能够在楚布寺住下来。看来邬坚巴还需要对噶玛拔希的其他弟子和寺院的僧人进行说服，使他们相信自己作出的这个选择。在两年以后攘迥多吉受了沙弥戒，在楚布寺的噶玛拔希的主要弟子们对攘迥多吉是不是噶玛拔希的转世消除了疑问以后，才由当时任楚布寺的堪布的年热巴为首的僧人们把他正式迎接到楚布寺的。尽管这样，据说当时还是有一部分僧人不相信这个孩子就是噶

①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第 926—927 页。

玛拔希的转世，于是攘迥多吉显示了他的神通："攘迥多吉来到一块岩石上说：'如果我是噶玛巴，岩石底下流出泉水。'话音刚落，干涸的岩石底下立刻喷出泉水。又把一根烧焦了半截的棍子插在地上说：'如果我是噶玛巴，这根棍子会马上生长，如果我不是噶玛巴，就不会生长。'话音刚落，插下去的棍子就生长起来。此水称为修行水，此树称为修行树。至今犹存。"① 据说，经过这样的神通表现，才使得楚布寺的僧众全都真正相信他确实是噶玛拔希的转世。这当然是后人在事过多年以后的追记，不免有道听途说和失真夸大的成分，但是从藏传佛教的宗教史籍中记述这种为了让僧众和信徒相信而显示神通的故事，恰恰说明活佛转世这样一个新的事情，尽管一些高僧已经从教理上作了解释和说明，并且作了精心的安排，但是要得到寺院僧人广泛一致的赞同，也仍然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无论如何，经过邬坚巴·仁钦贝的努力，按照噶玛拔希的安排，实现了认定噶玛拔希转世灵童的工作，攘迥多吉作为噶玛拔希的转世顺利进入了楚布寺。这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包括了活佛转世的传承办法从酝酿到实现的全部过程。活佛转世这一新的事物，在噶玛噶举派中确确实实地出现了。

三

噶玛巴·攘迥多吉1290年被迎请到楚布寺以后，邬坚巴·仁钦贝当然成为噶玛巴·攘迥多吉的老师。但是在不久以后，

---

①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28—929页。

由于邬坚巴在藏传佛教界有很高的声望，元世祖忽必烈召请他到朝廷。《贤者喜宴》说在此之前忽必烈曾打算派遣军队经过西藏去攻打印度和尼泊尔，由于邬坚巴去过印度，所以派大臣来询问沿路的情况，邬坚巴以河流流向不同说明印度和西藏差别很大，劝止用兵，并写了奏章，所以忽必烈派人来召请他进京。邬坚巴于公元1292年到达大都，为忽必烈等人传授了时轮灌顶等教法，并给许多大臣传授了胜乐金刚的教法等。当忽必烈赐给他大量财物并准备对他加封时，他连赏赐品都没有要就不辞而别，返回了西藏。① 从当时的情况看，忽必烈已经年近80，年老多病，可能是希望供养藏传佛教高僧以祈求延长寿命，才召请邬坚巴的。《元史》说当时忽必烈还准备在五台山为萨迦派的高僧丹巴国师建寺，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形。至于邬坚巴不辞而别地返回西藏，可能是在忽必烈去世以后，在元成宗在位时才离京返回楚布寺的。邬坚巴在朝廷的活动虽然没有为噶玛噶举派和楚布寺取得特别显著的利益，但是他可能最先把刚刚转世的攘迥多吉的奇特的情形介绍给皇帝和大臣们，为后来攘迥多吉的进京埋下了伏笔。

攘迥多吉7岁时跟从绰浦哇·贡丹喜饶出家并受沙弥戒，按他的前一辈噶玛拔希的密宗名字起名为攘迥多吉，18岁时（公元1302年）又从堪布宣努绛曲、根敦仁钦等人受比丘戒，并听受戒律。作为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像普通僧人一样举行出家和参加僧团的仪式，并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拜师，请有资格传授戒律的上师授沙弥戒和比丘戒，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这对后来的转世活佛也是一个例规，它表明从活佛转世一出现，活佛转世的理论和主持人就认为经过投胎转生的转世灵

①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16—917页。

童虽然继承了前辈的功德和学识，但是从儿童开始又要经历一个新的人生，因此要成为一个寺院和教派的领袖人物，也就必须履行出家受戒的手续，取得比丘的资格。这样，又将转世活佛在形式上暂时地拉回到普通僧人的行列，使得转世活佛可以兼顾其佛菩萨转世和普通僧人的双重身份。这在开初可能只是使攘迥多吉容易被楚布寺的僧众所接受的一种权宜的办法，但是在成为一种定规以后却对活佛转世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更加明确了活佛转世的目的是为僧众培养具有权威的首领人物，转世活佛必须是寺院中的出家僧人，而且是履行了正规的出家和受戒手续的比丘。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儿童被宣称为某某高僧的转世，但是不被该高僧的寺院所接受，或者寺院寻访到某个儿童是其高僧的转世，但是没有履行出家受戒的手续而成为该寺院的僧人，这种转世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排除了寺院掌控以外的转世，把活佛转世和众生的六道轮回的转生的界线区划得更加清楚。第二，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以后，出现了将一些世俗的国王和贵族说成是某个菩萨的化身的学说，如宁玛派一些高僧首先宣称吐蕃王朝的“祖孙三法王”即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热巴巾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的说法。转世活佛的出家受戒就把活佛转世和菩萨化现国王作了明确的区分。第三，转世活佛出家受戒，规范了转世活佛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转世活佛必须像一般僧人那样遵守戒律，并且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显密佛法，这就对防止具有转世活佛身份又如同不守戒律的游方僧那样行事的人的出现，促进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巩固。第四，转世活佛拜师受戒，就必然形成转世活佛和另外一些高僧的师徒关系，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一种特别的高僧的标志，后来的一些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新的转世活佛系统建立的起点，促进了活佛转世

从单个向群体的演变。

大约攘迥多吉受戒的当时邬坚巴已应召动身赶赴朝廷，所以没有担任为攘迥多吉传戒的老师。但是在邬坚巴从朝廷返回楚布寺以后，实际上邬坚巴是他最主要的上师，直到 1309 年邬坚巴去世。攘迥多吉不但跟从邬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曾多次到藏区各地学法修行和讲授佛法，足迹遍及后藏的拉堆、昂仁、萨迦、江孜以及前藏的拉萨、工布、塔布等地。他在类乌齐附近修复了噶玛拉顶寺，派他的弟子主持在索曲河上架设过铁索桥，还曾到青海黄河上游一带调解过阔提（kol ti）地方的纠纷。在拉萨时他还调解过蔡巴万户与康区的纠纷，为拉萨大昭寺的觉卧佛像造过黄金宝盖。① 在这种情况下，攘迥多吉成为了噶举派各支派中一位有很高名望的活跃的宗教首领。可能是由于噶玛噶举派在前藏和康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和它没有参与反对萨迦派的“止贡林洛”，所以萨迦派对攘迥多吉比较敬重，八思巴和他的侄子达玛巴拉相继去世之后，因八思巴的另一个侄子达尼钦波桑波贝被忽必烈流放到江南，所以萨迦款氏家族无人掌权，由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三部弟子中的夏尔拉章的绛漾钦波·仁钦坚赞执掌萨迦派的法座 20 多年。公元 1305 年，绛漾钦波·仁钦坚赞作为萨迦派的主持者之一，受元成宗完泽笃（铁木耳）的迎请前往大都时，途中曾在朵甘思地方会见过攘迥多吉，交谈佛法，据说当

---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一版，第 97—100 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下册，第 928—938 页。

时出现了菩萨们相见时的景象。① 另一方面，噶玛巴·攘迥多吉也似乎在努力与萨迦派修好。他曾经向萨迦等寺院的僧伽和佛殿布施法器用具等。② 因此，据说他到达萨迦寺时，萨迦的僧人们都向他请教佛法并请求他给予加持。③

除了像噶玛拔希一样以修炼密法获得成就著称因而被称为法力广大的“大成就者”之外，噶玛巴·攘迥多吉还撰写过一些有影响的佛教著作。至今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里还保存有他写的《佛百行传》、《甚深内义注疏句义明解论·嘉言大宝鬘》等木刻本两卷和手抄本一卷。④ 另外，攘迥多吉研究了宝石、植物和动物等的性能，并研制了830多种药物，其著作《药名大海》中记述的药物比《四部医典》增加了两倍，为后来的藏医研究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噶玛巴·攘迥多吉具有噶玛噶举派转世活佛的身份和教派首领的地位，以及他在当时藏传佛教界的巨大声望，使他引起了在剧烈的宫廷斗争中登上皇位的笃信佛教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注意，终于下诏迎请他前往元朝的宫廷。

关于图帖睦尔迎请噶玛巴·攘迥多吉进京的经过，在《历辈噶玛巴简传·如意藤》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图帖睦尔扎牙笃于蛇年（公元1329年，这是指图帖睦尔再次即位）即

---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② 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933页。

③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④ 民族图书馆编：《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皇帝位之后，于铁羊年（公元 1331 年）派遣金字使者巩卜丞相等来到西藏。从工布迎请法主（噶玛巴·攘迥多吉），与从萨迦前往朝廷的靖国公贡噶坚赞相会。”该书还全文抄录了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迎请诏书：“依仗三宝护持的大福德，皇帝圣旨。赐攘迥多吉。因如来教法将由北方诸帝王弘传之授记之法力，（北方诸帝）对佛陀教法生起胜解。此后，薛禅皇帝（即忽必烈）依止和尊奉众多高僧大德，使佛陀之教法在此方弘扬，显明一切。朕亦愿对佛法善为护持服侍，闻得你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故遣巩卜等人为金字使臣前来迎接你。如果你以其他藉口推脱不来，岂不犯了使信仰者灰心失望的过失。沾染不愿离弃自己富足处所之恶臭习气，毁坏广利他人之善愿，造下不为佛法着想的罪业，种下不顾有情众生苦痛之业障？又岂不会因为违背朕之法度大诏命，使朕心中不乐而使佛法受到损害？故此，望你为以朕为首的有情众生着想，尽快前来！到此之后，佛法之事业都将照你的心愿完成。羊年春三月十三日在大都有的时分写来。”[①] 据记载，作为送交这份诏书而赐给攘迥多吉的礼品，有当年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金印等。

这份诏书，在文字体例上与公元 1244 年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的诏书十分接近，大约是蒙古皇室写给那些与他们关系还不大密切的佛教领袖的邀请信的通用格式。诏书中的金字使臣巩卜，噶玛巴传记中称为巩卜丞相，有可能是指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 1335 年）起担任中书右丞的巩卜班，后至元五年（公元 1339 年）出任为甘肃行省平章。据《元史》记载，这份诏书发出的羊年三月（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 1331 年）正是

① 转引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3—254 页。

图帖睦尔大封佛教僧人的时候，就在这一个月中“特命沙律爱护持（佛教总统）必剌忒纳失里为三藏国师，赐玉印”，“以西僧旭你迭巴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赐金印”，所以图帖睦尔迎请贡噶坚赞和噶玛巴·攘迥多吉，很可能是他广封佛教僧人的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约是担心忽必烈在位时与噶玛噶举派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的关系，以及攘迥多吉的师傅邬坚巴曾经不辞而别，会使得攘迥多吉拒不奉命，图帖睦尔还专门命宣政院给萨迦等西藏各地的高僧和首领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协助金字使臣们完成使命。这道命令说：“奉皇帝圣旨，谕令贡噶坚赞、德嘉沃都元帅、意希贝、贡噶多吉、绛曲坚赞等：命你等与奉旨前往迎请喇嘛噶玛巴的金字使臣巩卜等人一起，无论噶玛巴上师住于何处，你等均应协助。”① 这里提到的贡噶坚赞是萨迦派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生于公元1310年，属萨迦款氏家族的拉康拉章，当时他在西藏已经受封为靖国公、国师，入朝后被晋封为帝师。这里的贡噶多吉即著名的《红史》的作者蔡巴·贡噶多吉，他从公元1323年起担任蔡巴万户长，1324年曾到朝廷朝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这里提到的绛曲坚赞更是藏族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担任帕竹万户长。由此可以看出，图帖睦尔为了迎请攘迥多吉到朝廷，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力气。图帖睦尔为什么突然对楚布寺的攘迥多吉这样重视起来，把一个没有官职和封爵的僧人和帝师、万户长、宣慰使等人并列起来，要他们协助迎请攘迥多吉到京城，这里面攘迥多吉的转世活佛的身份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① 转引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255页。

题。

但是，攘迥多吉似乎对前往大都还有一些疑虑，他在拉萨的蔡贡塘与帝师贡噶坚赞会见后，贡噶坚赞劝他前往朝廷，他答应了。于是贡噶坚赞动身先去大都。当噶玛巴·攘迥多吉走到当雄一带时，隆冬响雷，天空出现了日食，他说："皇帝将有违碍，恐怕不能见面。"于是返回楚布寺度过冬天。① 这一方面可能是他对自己到朝廷去后的吉凶还有些担心，因而他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决定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对图帖睦尔上台前后皇室内部激烈的争夺皇位的斗争情况比较了解，觉得图帖睦尔的皇帝宝座还未完全坐稳，因而不急于前往大都。

次年二月一日，攘迥多吉再次从楚布寺出发。他的随从人员似乎不少，据说沿途需要 1000 名乌拉差役。为了不扰害百姓，他自备马匹驮牛。当他走到朵甘思地方时，图帖睦尔从汉地派热扎答知院和桑巴沃二人前来迎接。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诏书说："皇帝圣旨。赐大德攘迥多吉。朕派遣巩卜前来迎取你，闻得你不违朕之诏命，动身前来，故遣热扎答知院和桑巴沃二人携带文书礼品前来。望你不要在临洮停留，二月二十日前赶来皇宫中。猴年（公元 1332 年）正月二日，大都有的时分写来。"为了保证攘迥多吉一路顺利，中书省的大臣们还发给了一份路引文书："奉皇帝圣旨，闻说噶玛巴法师自备马匹前来，彼已有金字牌符，对其自备马匹，应供给草料，官员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1 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下册，第 939 页。

人等应按喇嘛钦波来往时的例规迎接。"① 这里说的喇嘛钦波，是元代对担任帝师、国师的藏族僧人的称呼，图帖睦尔下令沿途驿站对攘迥多吉按帝师、国师的规格接待，说明了他对攘迥多吉人朝一事的重视。元朝对人朝的藏族僧人厚给赏赐，从藏族地区来的僧人不绝于途，朝廷又发给他们牌符，命沿途驿站供应，给西北一路的驿站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曾说："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这还是一般僧人往来的情形，如迎取帝师，规模还要盛大得多，"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迎送。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②。对于比攘迥多吉早动身的帝师贡噶坚赞，图帖睦尔"遣兵部尚书也速不花。同佥通政院事忽纳不花迎帝师"③。所以《历辈噶玛巴简传》中所录引的图帖睦尔给攘迥多吉的诏书、路引文书以及派遣热扎答知院等远至朵甘思迎接的记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但是正月发出的诏书要攘迥多吉在二月二十日以内赶到大都似乎有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攘迥多吉及其随从要在一两个月内从朵甘思赶到大都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尽管攘迥多吉加快行程，也是在十月赶到大都，所以很

① 转引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256页。

②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③ 《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文宗四。

可能是《历辈噶玛巴简传》在抄录时将“十二月”误为“二月”。《智者喜宴》记载，公元1332年藏历八月十二日，发生地震，攘迥多吉知道是皇帝遇到违碍[①]，赶到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时，皇子阿剌忒纳[②]将他奉为根本上师，并修建了噶玛噶举派寺院。当时已知元文宗图帖睦尔去世，虽然信使还未到达，攘迥多吉就立即为图帖睦尔作了除障和超荐的法事。元文宗图帖睦尔坐稳皇帝宝座后，也想到要保证以后由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排除侄子参与争位。公元1330年4月，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将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大青岛中，不让他与外人接触，过了一年，又下诏说明宗在漠北时曾说妥欢帖睦尔非其己子，又将他迁移到广西静江。在去除这一障碍后，1330年12月，图帖睦尔立自己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但是不到一个月，阿剌忒纳答剌就死去了。公元1332年8月元文宗病死前，因为原先夺了他哥哥的皇位，在蒙古诸王中遭到非议，为了在死后留下个好名声，遗诏将皇位传给明宗的儿子。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为便于控制，于1332年10月4日立年仅七岁的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皇帝，是为元宁宗。噶玛巴·攘迥多吉正是在这个时刻抵达大都的，据《红史》记载，攘迥多吉于10月18日抵达皇宫。元宁宗懿璘质班和大臣们向他奉

① 《元史》卷三十六，本纪第三十六，文宗五，至顺三年八月条记：“己酉，陇西地震，帝崩，寿二十有九，在位五年”。与藏文的记载正相符合。

② 为西平王奥鲁赤的重孙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是与燕铁木儿一起发动政变，拥戴元文宗上台的主要人物之一，后受元文宗之命征讨云南，镇守陕西，加封为豫王。

献了大供养，他为懿璘质班传授了灌顶。[①] 据《元史》卷三十七，宁宗本纪记载：十月甲子，“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儿麻哇”。燕帖古思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次子，比懿璘质班小，所以称为皇弟。对照藏汉文史籍看，可以确定《元史》中所说的“西僧加儿麻哇”即是噶玛巴攘迥多吉，“加儿麻哇”是噶玛巴的音译。

懿璘质班只当了40多天小皇帝就死了，燕铁木儿及群臣主张立燕帖古思为帝。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不同意，主张立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为皇帝，遣使从广西接回妥欢帖睦尔。关于妥欢帖睦尔即位的经过，《元史》卷三十八记载说：“燕铁木儿既见帝，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且曰：‘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奉上玺绶劝进。（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有趣的是，藏文史籍对此有“帝位空悬”的记载：“占卜者说：‘和世㻋之长子妥欢帖睦尔如在鸡年六月前等待，然后即帝位，在位时间可与薛禅皇帝（忽必烈）相等’。对此大臣们说：‘这样将帝位空悬，国政大事由谁承担？’燕铁木儿说：‘你们再好好卜算卦象，果真如此，皇帝圣寿绵长，最好不过，其间的国政大事由我来承担。’因此，

---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参见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939页。《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56页。《历辈噶玛巴简传》说攘迥多吉十一月十八日到京可能是笔误，从《元史》的记载看，他是十月到京的。

将帝位空悬，国政诸事由燕铁木儿担任。到阴水鸡年六月八日（妥欢帖睦尔）在上都即皇帝位。"[①] 在这皇位交替之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也参与了皇室的事务，也作出过妥欢帖睦尔鸡年六月即位的预言[②]，并与妥欢帖睦尔（即元顺帝）建立了关系。据说当妥欢帖睦尔1333年正月十五日从江南抵达大都时，千百万人前去迎接，道路拥塞不通，攘迥多吉头戴黑帽，口诵六字真言，众人都为他让路，妥欢帖睦尔在大蒙古包前迎接他，并向他顶礼。皇太后、诸王、燕铁木儿太师等也向他请求灌顶，并任命攘迥多吉的侍从扎尊为太徽院的佥院。当一些大臣暗害燕铁木儿引起大动乱时，攘迥多吉前去尽力使之安定下来。[③] 当妥欢帖睦尔在上都即位时，噶玛巴·攘迥多吉为其赞颂吉祥，并承担使国家平安的责任，并派侍从扎尊到西藏去分送布施。[④]

公元1334年正月，据说观世音菩萨授记攘迥多吉应该返回西藏，恰好这时妥欢帖睦尔因前几位皇帝都在位时间不长，寿命很短，向攘迥多吉请求赐给其长寿甘露，于是攘迥多吉以到西藏桑耶寺取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长寿泉水为由，请求让他返回西藏，得到当时年仅14岁但一心追求长寿的妥欢帖睦尔的允许。妥欢帖睦尔准许他暂时回西藏，但是要在两年内返回

---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页。

②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939页。

③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④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

朝廷，攘迥多吉答应了这一条件。当年五月，噶玛巴·攘迥多吉动身时，妥欢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国师玉印、金字圆符，并赐给他的弟子康区人定增桑布、蔡巴·格迥钦波以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工布扎日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兴建元文宗的影堂，在粗垄地方设立管理噶玛噶举派属民的“达尔罕”①。这是噶玛拔希之后噶玛噶举派首次得到元朝皇室的大量封赏，标志着噶玛噶举派地位的再次上升。在返回西藏的路上，攘迥多吉朝拜了五台山，在西夏故地修复了一些战争中被毁坏了的佛教寺院，并委任这些寺院的僧职人员。公元 1335 年 8 月，攘迥多吉到了藏北达木地方，西藏各地的高僧和首领都前来迎接，攘迥多吉宣布了妥欢帖睦尔所赐的三道诏书，向众人分发了礼品，据说因为他带来的物品中食品少而礼品多，所以受到众人敬仰。冬天，攘迥多吉住在桑耶寺的秦浦地方，一面为徒众传授佛法，一面为妥欢帖睦尔取长寿泉水。② 他还将妥欢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的金银交给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丹珠尔》，共计一百六十函，并为其举行开光仪式。③ 在这期间，妥欢帖睦尔多次派遣使臣带着大批礼物前来迎请攘迥多吉回大都，其中公元 1336 年 1 月太皇太后所发的书信为：“依止

①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7 页。《红史》，第 102—103 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下册，第 940—941 页。达尔罕为蒙古语，意为长官、首领。

②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7—258 页。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2—103 页。

③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3 页。

三宝之护佑，太皇太后[①]之懿旨。送法主仁波且噶玛巴尊前。去年喇嘛西去之时，曾以良善之心意，答应完成利益我等之善业后尽快返回。如今喇嘛离去已有两年，回回忆喇嘛所说佛法，对喇嘛更生信仰。先前已派出迎请之金字使者，但是至今仍未听到喇嘛何时动身前来的确实消息，故又遣以格西顿仁为首的金字使者们前来迎请，望喇嘛为吾等着想，为利益佛法尽快前来。假如喇嘛不能遵守诺言尽快前来，将使具有信仰的弟子们灰心，而其他对佛法持邪见的诸人则会说：'像他这样不遵守诺言前来，其他话语又怎能真实'，会对佛法产生危害。故望此次金字使者们到达后，上师为吾着想，为服事佛法、利益众生，尽快前来。随同此书信之礼物有袈裟一整套、黄金一大锭献上。鼠年正月十日写于大都。"

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噶玛巴·攘迥多吉于公元1336年8月从西藏出发，据说虽然有按照帝师的例规接送和供给的诏书，但是实际上只受到了与金字使臣相同的待遇，连食物供应也没有，所以由藏区的官员和站户依次护送，于公元1337年3月1日抵达大都，受到盛大欢迎，妥欢帖睦尔本人也亲自出皇宫内门迎接。[②]关于攘迥多吉的这次进京，《元史》中也有不太明确的记载，《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二，后至元三年末尾记有："是岁，……征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对照藏汉文史料，可知"西域僧加剌麻"即是噶玛

---

① 此处的太皇太后为元文宗的皇后卜答失里，是文宗与明宗争位斗争的重要参与者。文宗死后，她遵文宗遗诏力主立明宗之子为皇帝，故妥欢帖睦尔尊她为母，奉为皇太后。公元1340年，妥欢帖睦尔追查文宗谋害明宗的事情，将卜答失里迁往东安州安置，流放燕帖古思去高丽，卜答失里等在途中被杀害。

②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260页。

巴·攘迥多吉，“加剌麻”应为“加剌麻哇”或“加麻哇”，是《元史》在转抄时漏掉一个“哇”字，“加剌麻哇”也是“噶玛巴”一词的音译。

攘迥多吉到大都后，在许多天中为妥欢帖睦尔传授灌顶和佛法。此时掌握朝政的是太师、中书右丞相伯颜，而攘迥多吉与伯颜也建立了关系。据说有一次只有妥欢帖睦尔、伯颜、攘迥多吉三人在一起商议护持佛教及安定国家的大计，攘迥多吉将从桑耶取来的长寿泉水献给妥欢帖睦尔，妥欢帖睦尔献给他黄金四锭。[①] 攘迥多古第二次进京后的另一件大事是他预报了公元1337年3月大都的大地震。《红史》说：“牛年八月，（攘迥多吉）察知将发生叫做‘鸡鸣山’（gim mi shari）的大地震，法主从房中出来，住在平地。大地震动，村庄毁坏，汉人全都逃出，请求法主护佑。法主师徒所住之处丝毫未受损害”[②]。《智者喜宴》则说：“（攘迥多吉）在鸡鸣山（gyi mi shan）居住时，知有发生地震的危险，说：‘我们到外面去住’。在外面寝帐居住。皇帝亦听从上师之话，在蒙古包居住。阴土牛年八月，发生大地震，村镇全部毁坏。先前听从法主劝告的，以及前来请求护佑的师徒、施主们，都未受到任何损害”[③]。据记载，当时大都地区确实是接连发生过几次地震，《元史》记载，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八月：“辛末，……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众。”至元三年（公元1337

①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②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③ 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941页。

年）八月："壬午，京师地大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压损仪物，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补御殿壁仆，压损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① 可见《红史》作者是因鸡鸣山在地震中崩坍，误以为鸡鸣山在汉语中即指地震，《智者喜宴》作者知道鸡鸣山为一地名，以为攘迥多吉地震时住在鸡鸣山，将1334年8月的地震和1337年8月的地震混为一次。实际上攘迥多吉于1334年5月离开大都回西藏，1337年3月才返回大都，因此攘迥多吉所遇到的京师大地震，只能是1337年8月的这一次。

攘迥多吉在大都时，还参与了为维护佛教僧人的利益而与主张限制僧人的大臣们的辩论，据说当时因汉地、脱思麻的一些不良僧人的行为，不喜佛法的大臣们商议，下令将各处不净的僧人（指娶有妻室的僧人）全都勒令还俗，让他们支应赋税、兵差、劳役，并拆毁他们的寺庙。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生效。这时攘迥多吉突然赶到皇宫中，在午门前群臣聚会的地方，对以伯颜太师为首的大臣们说："是你们王臣将我等以帝师为首的僧人们强行召来，如今为何不服事佛法，还定下这毁坏佛法的规矩？你们以为我们是今生衣食不足来向你们乞求的吗？难道是薛禅皇帝等先帝做错了事，要由你们来纠正吗？如果你们能担起保证皇帝圣寿和社稷的重任，那你们就承担起来，我们全部都回西藏去。"由于攘迥多吉的指责，大臣们都惧怕了，立即发布了由国库修复旧有的佛殿，僧人无论净与不净都不受地方官管辖的诏书。同时在大都和临洮修建了噶举派的寺院，给止贡和帕竹派的法座赐给玉印，给楚布寺的法座赐给金印。有一次，妥欢帖睦尔对攘迥多吉说：

① 《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

“别的上师都要求我赐给施主和土地，你没有这样的请求吗?”攘迥多吉回答说：“我在东方工布地方有大约十万户人家。”妥欢帖睦尔说：“那就作为我的布施，将管辖该地的官职献给你。”他说：“那是我自己向观音菩萨祈愿用佛法教化之地，如果当地方的官员，是不能教化的”①。尽管当时噶玛巴·攘迥多吉在朝廷的地位迅速提高，对妥欢帖睦尔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当时元朝的整个统治已接近崩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已无法遏止，虽然妥欢帖睦尔愈加把挽救自己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佛教及噶玛巴·攘迥多吉等高僧的护佑，然而攘迥多吉也没法挽救佛教在汉地的势力随着元朝的没落而没落。此后又有哈丞相等不喜爱佛法的大臣限制佛教僧人，使攘迥多吉大为失望，要求返回西藏，妥欢帖睦尔又不同意。在这种郁闷的气氛中，攘迥多吉于藏历第六饶迥土兔年（公1339年）五月十四日离开大都赴上都，六月八日在上都患病，太师伯颜曾到病榻前探视敬礼，弟子们向他请问身后之事。据说他答应将转生于工布地方。六月十五日，噶玛巴·攘迥多吉在上都去世，以伯颜太师和国师为首的大臣们为他发丧，将尸体火化，妥欢帖睦尔对舍利进行了大供养，并将舍利运回西藏楚布寺，修建了灵堂，并建造等身金像纪念。②

噶玛巴·攘迥多吉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首位经过认定而继承前世的地位和事业的转世活佛，在他一生的事迹中，他在元朝宫廷的活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其实活佛转世从一开始

---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941—942页。

②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

就是和西藏地方的政治以及西藏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的。在他两次进京的过程中，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和中原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经过他以及他以后的噶玛巴·乳必多吉、噶玛巴·得银协巴的努力，在萨迦派之后，噶玛噶举派成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藏传佛教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 年 5 月攘迥多吉动身返回楚布寺时，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国师玉印、金字圆符，并赐给他的弟子康区人定增桑布、蔡巴·格迥钦波以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工布扎日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兴建元文宗的影堂，在粗垄地方设立管理噶玛噶举派属民的“达尔罕”。我们知道，在元代西藏十三万户中并没有噶玛噶举派的万户，噶玛噶举派被排斥在西藏的行政系统之外。而这时元顺帝赐给攘迥多吉封号印信，尤其是设立管理属民的“达尔罕”，显然是为攘迥多吉而设立的。1267 年八思巴从西藏返回大都时，仿照蒙古封建主的怯薛制度，为自己设立了十三种侍从官员的职务，建立起自己的拉章，从而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人物参与行政管理、实现政教合一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元顺帝为攘迥多吉设立管理属民的“达尔罕”，标志着攘迥多吉有了自己的属民和与寺院剥离开的单独的土地、财产等，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是转世活佛的社会经济地位发展的结果，也是转世活佛设立自己的拉章的开始。而具有拉章办事机构，是转世活佛特别是一些大活佛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的基础。在楚布寺的管理方面，从攘迥多吉开始由噶玛巴活佛任命楚布寺的住持。《青史》记载说：“此后由噶玛巴的外甥任

住持，故名温仁波且；此后由噶玛拔希的侄子喇嘛乃囊瓦和噶玛拔希的兄弟祖多觉的儿子阿旺益希旺久以及益希旺久的儿子喇嘛扎西崩巴任住持。此后由扎西崩巴的兄弟温波阿贝的长子喇嘛旺仁任住持。他取得因明班级的班智达称号后任住持，六个月后去世，也有的说喇嘛旺仁任住持数年。后由法主攘迥多吉委任喇嘛乃囊瓦的侄子喇嘛仁钦贝为楚布寺住持，此师别名喇嘛那布（意为黑色上师）。此后由喇嘛那布的父系兄弟喇嘛曲强任住持，尔后阿贝的二子喇嘛曲杰任住持很长时间。此师先获国公职务及金印，后又被封为灌顶国师，得水晶印、诰书和属民。"[1]《红史》说："法王攘迥多吉生前居于楚布寺时，委任噶玛拔希的侄子、侄孙为历任楚布寺住持。"[2] 这也就是说，攘迥多吉由于自己经常需要离开寺院到各地去传法，或者应邀到大都去，因此自己并不直接担任楚布寺的住持的职务，而任命噶玛拔希的一些亲属担任寺院的住持的职务。这种情况开始了后来的"寺主活佛"的先例，即活佛并不出任寺院的具体的堪布、住持等僧职，但是对寺院的一些重大的人事任免和事务等拥有决定的权力，其事实上的权力比堪布、住持要大得多。这种体制是那些大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难以动摇的真正的宗教和权力的基础。

待刊稿

---

① 桂译师·宣努贝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②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87页。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

一、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

（一）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的背景

金瓶掣签制度是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族属转袭的流弊，防止弄虚作假而制定的在活佛转世的最后认定阶段实行的一种签选制度。由清朝政府颁发两个金瓶，一个用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拉萨大昭寺，一个用于确认蒙古各部及甘青藏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北京雍和宫。所制金瓶的形状像个紧口大膛的无嘴壶，质地为铜质鎏金，瓶上镶嵌珠宝，典雅庄重，富丽堂皇，具有藏族传统工艺品的特点。清朝规定，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均须将寻得的若干名“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3种文字写在牙签牌上，放进瓶内，聚集高僧诵经祈祷后，由中央政府派员监督，指定人员当众抽签掣定。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后，立即上报中央政府，获

批准后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完成活佛转世的程序。

1751年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和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之间发生冲突，傅清、拉布敦诛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同时傅清、拉布敦也被杀害。此次事件后，清朝所派的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在得到乾隆帝批准后由驻藏大臣晓谕全藏。乾隆帝决定以此次平乱后措置转关为契机，改革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废除郡王独理专擅西藏政务的制度，规定由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掌管西藏政务，分权于一僧三俗四位噶伦手中，噶伦之间地位平等，遇事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地方各项事务，不得独断专行。同时把原属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当雄）蒙古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理，增强了驻藏大臣对西藏事务的控驭能力。[①] 经过清朝的长期经营和治理，1751年以后，西藏地方渐趋稳定。清政府在加强对西藏地方管理的同时，因西北、西南藏族地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相应地也加强了对西北、西南藏族地区的统治。在西北，清中央任命了西宁办事大臣，其主要职责是专门管理青海、蒙、藏诸事务，如派兵驻防、筹办粮饷、驿站运输等事务。在西南，清朝加强了对四川、云南入藏交通线的控制和管理，并由四川总督管理川滇两省和西藏有关的事务。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建立了在寻访新的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年幼期间由朝廷任命某一位活佛代行达赖喇嘛职权的摄政制度。1757年，

① 《驻藏大臣颁布善后章程十三条晓谕全藏告示》，西藏档案馆藏藏文档，汉文译文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1—555页。

第穆活佛阿旺绛贝德勒嘉措被任命为首任的摄政。1777 年，阿旺绛贝德勒嘉措去世，乾隆皇帝派当时在北京雍和宫担任堪布的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策墨林）进藏担任摄政。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摄政共同掌管政务的体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1779 年清朝迎请六世班禅进京，1780 年 8 月六世班禅抵达热河，参加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的活动，然后到北京。10 月底六世班禅因病在北京黄寺圆寂。六世班禅圆寂后，乾隆皇帝即在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正月颁布诏书，敕令八世达赖喇嘛亲政，并依前世达赖喇嘛之例，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改授册命，俾其“弘宣教法，益广善缘，护国福民，以光我国家亿万年之休命。图伯特事务，悉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董率噶布隆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安宁，众生蒙福。”① 1784 年，八世达赖喇嘛亲政，1786 年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去世，清朝召策墨林活佛回京掌管京城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僧人，命济咙呼图克图出任摄政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务。乾隆朝对西藏的这种管理体制的确立，为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管理体制在压制了世俗贵族世家掌政权力的同时，突出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摄政等转世活佛参与地方行政的作用。在西藏的权力结构中，转世活佛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因而转世活佛的寻访、认定等以前主要是宗教事务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清朝政府参与活佛转世事务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文件，转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第 219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的管理的客观必要。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寻访认定八世达赖喇嘛的过程中，乾隆皇帝虽然专派他所信任的三世章嘉活佛进藏负责，但是结果选定了与六世班禅有亲戚关系的强白嘉措为八世达赖喇嘛，而后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又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三世章嘉活佛的弟弟和侄子又被认定为却藏活佛和拉科活佛，形成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所指出的“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的局面。更令乾隆皇帝担忧的是，活佛转世中的这一趋势，在蒙古也有发展，“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即如锡呼图呼图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布藏多尔济之子；诺木绰尔济呼图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诺门罕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①。清朝自建立以来，即以联合蒙古王公以及汉地地主官僚为立国的根本，对于蒙古王公和活佛转世的结合有可能造成政教结合势力的崛起，自然极度关切，视为一大隐忧。乾隆皇帝碍于三世章嘉活佛是他宗教上的老师和密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崇高地位，不便即刻发作，但是也经常在思考限制这一发展趋势，以及清朝政府介入活佛转世事务的适当办法。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公元1788—1789年），廓尔喀

---

①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收入《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0页。

军第一次侵藏，乾隆五十六年夏（公元1791年），廓尔喀军第二次侵入西藏。廓尔喀在短期内竟敢两次燃起兵火，进入中国西藏地方，除了探知西藏边防空虚、官员平庸偷安外，还与六世班禅之兄弟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当时的文书上称为沙玛尔巴，其法名为却珠嘉措，公元1738—1791年）的贪婪有关。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六世班禅到热河向乾隆皇帝祝寿，沿途获得蒙藏王公群众供献的大量金银财宝和无数的牛羊马匹，在京时又获皇帝丰厚赏赐。六世班禅圆寂后，这些财物均由六世班禅之兄扎什伦布寺的仲巴呼图克图掌握，除一部分牲畜转交扎什伦布寺外，余皆据为已有。红帽系活佛与仲巴呼图克图同为六世班禅的兄弟，却因教派不同而未分得分文，遂起怨恨，萌生报复之心。他借朝礼佛塔的名义去廓尔喀，告诉廓尔喀人说扎什伦布寺财富丰裕，而西藏的防务空虚，怂恿廓尔喀王派兵侵藏，劫掠扎什伦布寺[1]。廓尔喀人1791年侵入边界后，未遇到有力的抵抗，9月，驻藏大臣保泰以保护七世班禅的安全为名，自行将七世班禅移往拉萨，使得扎什伦布寺僧俗人心散乱，降神的孜仲喇嘛与扎仓堪布等又借降神宣称神的预言是“不可与贼拒战”。而仲巴呼图克图则只顾携带贵重财物弃寺潜逃，无人组织僧众抵抗，四散逃亡。廓尔喀军一千余人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扎什伦布寺，大肆抢劫寺内财物。只有几十名清军坚守日喀则清军营寨，抵挡住廓尔喀军。10月，廓尔喀军携带抢得的财宝撤出日喀则及扎什伦布

① 福康安奏报廓尔喀遣大头人乞降送出丹津班珠尔等折，后附《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来禀（一）》，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六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8—750页。

寺，退居聂拉木等地。清朝在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报告后，立即征调军队，授福康安① 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率军进藏反击。福康安一行到藏时，八世达赖喇嘛及济咙呼图克图、众噶伦等一同表示：

抵藏官兵所需马匹、驮畜、口粮、运送等，诚愿竭力筹措。……至大军进兵廓尔喀，一应引路等，均有随军代本、定本效力，不另行指派，恳请允准。其口粮除由达赖喇嘛内库、扎什伦布、萨迦寺及贵族、僧俗官员倾囊以供外，属民则只留年内口粮、种子，余下尽数征收，共备齐粮九万石，正予炒磨。②

福康安统率近两万大军，在西藏僧俗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击败了廓尔喀军，并一度攻入尼泊尔境内，逼进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投降求和，退还抢掠的财物，保证以后向清朝按期进贡，不再侵犯边境，并将已在尼泊尔亡故的红帽系活佛的尸骸骨灰和随从交给清军。清军胜利地结束了反击廓尔喀侵藏的战争。

在这次廓尔喀军入侵的战争中，突出暴露出活佛转世与家族亲戚结合以及降神决疑的办法的一些弊病，使乾隆皇帝更加感到加强对活佛转世的管理的重要。在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

①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为乾隆皇帝的皇后的亲戚。初与其兄福长安同任侍卫，参加第二次金川之战有功，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后历任吉林、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等职，指挥过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等战争，廓尔喀之战后，指挥镇压贵州苗民起义，以功封贝子，嘉庆元年福康安因病没于贵州军中，追封郡王。

② 《八世达赖喇嘛为大军进藏竭力筹办口粮乌拉事致福康安咨文》，藏历铁猪年（公元1791年），西藏档案馆藏藏文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4页。

战争结束后，清朝首先惩办了一些在战争中犯有罪过的人员，除处分有过错的驻藏官员等人外，特别破例惩处了一批藏传佛教界的人员，首先是惩办祸首，废止红帽系活佛的转世，其金银、田庄、牛羊、百姓完全充公，每年收入作为藏兵军饷，其管辖的噶玛噶举派羊八井寺院，房屋赏给掌办商上事务的济咙呼图克图，寺中原有红帽喇嘛103人，一律强迫改奉格鲁派，拨给三大寺管制。廓尔喀人攻至扎什伦布寺时，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洛桑金巴）"不思率兵保护庙宇，辄收拾细软物件，先期逃遁，其罪甚重"，乾隆皇帝令将仲巴呼图克图解送北京治罪。至于廓尔喀人攻至扎什伦布寺时，孜仲喇嘛等托词占卜降神，宣称不可抵抗，"致众喇嘛纷纷逃散，贼匪始敢肆行抢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拿到前藏，对众剥黄正法"①。同时，反击廓尔喀军入侵的胜利为清朝政府提供了整顿藏政、完善管理章程的时机，这一事件也成为清朝在活佛转世中推行金瓶掣签制度的直接动因。

（二）乾隆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的考虑

清朝政府鉴于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废弛、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福康安依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先后会晤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八世达赖喇嘛，重申制定善后章程、永保地方安宁的问题，将议定章程的设想告诉八世达赖喇嘛与七世班禅，他们二人都很赞同，八世达赖喇嘛表示必须"立定法制"，"实力奉行"。福康安会同西藏地方有关人员共同商议，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善

①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后章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1. 在行政管理制度上，确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一切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及其以下的官员、活佛，无论大小均须服从驻藏大臣指挥；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选择噶伦、代本、孜本、强佐等官吏，呈报大皇帝任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不得参与政事；边境宗本均由小宗宗本及武弁之干练者中选派；选官以能力与贡献为依据，不能完全依靠出身；使用乌拉须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杜绝私用。2. 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首先确定以金瓶掣签方式确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各主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各大寺庙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即摄政）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上述三人印章之执照；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之活佛及喇嘛，一律详造名册备案；青海、蒙古王公前来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西宁大臣，以便查考，活佛外出也须领取护照，否则即予惩罚。3. 在财经及税务管理方面，铸造乾隆宝藏，并加强货币管理；驻藏大臣审核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商上用度；减免后藏遭受战祸之各地人民的赋税差徭；规定货币对换数额。交易要公平；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协商负责免役、免税执照之颁发；活佛及喇嘛之俸银不得提前预支；百姓交给政府的赋税、地租及物品不得提前征收，或转嫁加重百姓负担。4. 在军事方面，建立正规的地方部队（藏军），分驻前后藏各要地，设官统领；规定代本、如本、甲本、定本等军官管辖兵员数额及升降制度；建立军粮武器装备的供应制度；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并检阅军队；以工布为基地制造军火，并新增火炮，加强防卫力量。5. 在外

侨、外贸及外务管理方面，对来藏的尼商、克什米尔商人等限定次数并加强管理，达赖喇嘛派往尼泊尔的工匠或朝塔人员，须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限期返回；在西藏与廓方（即尼泊尔）邻近要地树立界碑，加强巡逻；达赖喇嘛与外番的往来信函，驻藏大臣应详为查看；在济咙、聂拉木两地抽取的进出口税，不经驻藏大臣同意，不得私自增加税额。①

在整顿西藏的各项事务中，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问题。针对寻访认定转世灵童中的一些流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第一条就是设置金瓶掣签制度，即：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须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师徒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

①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5—836页。

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①]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此条具体事务的管理办法列于善后章程之首，可见乾隆皇帝和福康安等人对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视程度。

乾隆皇帝多年关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认定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活佛转世系统成为格鲁派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是西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清朝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即他在《喇嘛说》碑文中所总结的“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同时他也认为“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明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

① 原文为藏文，藏于西藏档案馆，此处据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的汉译文。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3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的汉译文为：“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蒙古和西藏地区活佛及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时，依照西藏旧俗，常问卜于四大护法神，因依口传认定，未必准确，兹大皇帝为弘扬黄教，特颁金瓶。嗣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七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暨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掣签认定。如四大护法神初定仅一名，则须将初定灵童名字之签牌，配一无字签牌置于瓶内，若掣出无字签牌，则不得认定为初选之灵童，须另行寻访。因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弟，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拈定。掣定灵童须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牌上，方能公允无弊，众人悦服。大皇帝如此降谕，旨在弘扬黄教，以免护法神作弊，自当钦遵执行。金瓶应净洁不污，常供于宗喀巴佛尊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825—826页。

来已久，不可殚述。”① 因此他认为活佛转世实质是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寻访灵童实际上是一种“海选”，也即是初选，即广泛选择候选人的过程，从前世活佛去世后不久出生的男孩中选择“聪明有福相者”，从中选出最符合条件的数名儿童，再经过最后的终选，决定一名，认定为前世活佛的转世。从职位继承的角度出发，乾隆皇帝对一些重要活佛转世的寻访认定过程进行了分析，力图从中寻找最重要而且最适合中央政府介入的过程。

因为海选过程中涉及大量的宗教理念和仪式，并且已经形成固定的传统，大部分都难以改易。乾隆皇帝始终对活佛转世中护法降神（吹忠降神）耿耿于怀，认为买通护法是活佛转世中形成“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弊病的关键，因此乾隆皇帝曾经命福康安等人传集护法，在大昭寺考察他们的法术的真伪，如果可以清楚揭露护法降神的虚妄，就将护法降神这一程序取消。结果福康安在护法降神时“以藏内现在有何休咎，试举一二事以作征验”相问，护法说将有痘症，十几天以后西藏还真有200余人患痘症，尽管福康安认为这是和西藏春季多发痘症相巧合，而乾隆皇帝则说福康安“不当问此事”，但是这给完全取消护法降神造成了难度。由于这一情况，加上福康安、乾隆皇帝看到西藏民众对护法的信仰难以动摇，又考虑“虽吹忠之指认呼毕勒罕不甚可凭信，但不由吹忠指认，不特签上无凭开写，转难入瓶备掣，尤恐各呼毕勒罕之徒弟众多，纷纷冒认，弊窦丛生，更属毫无实据，且吹忠不过四名，即降神所指之呼毕勒罕，亦不过数人而止”，“凡有吹忠认出之各呼

①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收入《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0页。

毕勒罕，总以入瓶签掣为准，既可坚番民信奉之心，又可潜杜从前彼此授意私相传袭之弊，实属法良意美"，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金瓶掣签可以起到防止"吹忠降神指认"的弊端的作用，才放弃了取消护法降神的想法。①

而活佛转世的终选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过程中本来就是一个最具有争议，又没有合适解决办法的问题。通过章嘉活佛等人的介绍，乾隆皇帝知道他的上师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的最后认定就有过争议，是二世土观活佛通过上奏雍正皇帝才解决的②，而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则是四世班禅等人在热振寺用设糌粑丸子抽选的办法来解决的③。而用抽签的形式从几名候选人中决定最后的人选的办法，在明清两朝的官员诠选制度中已经广泛实行。明代"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④ 创立掣签选官办法的人是孙丕扬，他在万历"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⑤ 明代，掣签是用在官员晋升和派放中，即从几名有资格的候选人选择一名，或者是资格差不多的官员分派不同地区

---

① 《福康安等遵旨复奏吹忠降神指认呼毕勒罕骤难革除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810页。

②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

③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④ 《明史》，志四十七，选举三。

⑤ 《明史》，列传一百十二，孙丕扬传。

不同职务，以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以此杜绝说情风和经手人从中舞弊。清承明制，这一办法在清代依然在实行。清朝顺治年间，有人指出“文选推升，概从掣签”，应有所变通。[①] 直至光绪年间仍有人“上陈补官、掣签、度支、讼狱四事，宜变通成例”[②]，可见清代的选官制度中掣签仍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雍正时期西藏在任命噶伦的问题上遇到争执不下的情况时，已经使用过摇糌粑团抽选的办法。据《颇罗鼐传》记载，1723年雍正继位后，派钦差鄂赖进藏传旨，在原有的康济鼐（khang chen nas）、阿尔布巴（nga phod pa）、隆布鼐（lung bu nas）等三位噶伦以外，增加两位噶伦。在确定颇罗鼐（pho lha nas）任噶伦后，另一个人选争执不下，于是“驻藏大臣派颇罗鼐台吉和毕切齐两人到哲蚌寺，在密宗经堂那尊具有极大加持力的本尊大威德像前，大摆供云，诵曰：‘当选定噶伦。’于是，写出各个名字，一一揉在糌粑团里。最先摇出的糌粑团，里面是扎尔鼐（sbyar nas）的名字，因此，扎尔鼐当了噶伦”[③]。这里鄂赖已经将清朝掣签选官的办法和西藏摇糌粑团确定转世灵童的办法结合起来，用摇糌粑团的办法来抽选噶伦，可以说是开了西藏掣签选官的先例。在乾隆朝决定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掌管西藏行政事务，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以及摄政活佛在达赖喇嘛亲政以前代行达赖喇嘛职权以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摄政活佛等转世活佛的身份，已经有了与清朝高级官员相类似的成分，因此乾隆皇帝结合藏

---

① 《清史稿》，列传二十五，成克巩传。

② 《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一，曾鉌传。

③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rdo mkhar zhabs drung tshe ring dbang rgyal）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5页。

传佛教认定转世时使用过的设糌粑丸子抽选的办法和明清两朝选官制度中的掣签办法，想到在确定藏传佛教高级活佛的转世的终选时实行金瓶掣签的办法，并与福康安商议。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此办法是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让福康安等在西藏的大臣们讨论是否可行，福康安回复说：

臣等敬译圣谕，以指认呼毕勒罕与吏部掣签相比，实为此事切喻。窃以吏部掣签本系堂官亲掣，即使书吏指缺撞骗，偶尔符合，亦系其人应得此缺，并非书吏有权，可见一命之荣，胥关命数，何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总领黄教，管辖卫藏，上受圣主优渥恩施，下为众蒙古番民信奉，纵非实有根气，其福命亦自不凡。今既专用钦颁金本巴瓶掣签，即吹忠所指不尽可信，而于瓶内掣出，承嗣衣钵（朱批：仍应防弊）。自可令僧俗人等同心悦服，从前弊窦似可革除。现在如有应出之呼毕勒罕，不拘大小呼图克图，即遵旨先行试掣，以垂法制。①

福康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吏部掣签与指认呼毕勒罕认定活佛确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最后决定是看被抽签的几个人中谁最有运气，即“一命之荣，胥关命数”，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应该是“其福命亦自不凡”，其认定可以与掣签结合起来。而且掣签可以革除流弊，又可“可令僧俗人等同心悦服”。可见乾隆君臣设立金瓶掣签的用心，是将活佛转世的最终认定和清朝的选官制度结合起来，既不对认定转世活佛的程序做大的变动，可以得到西藏僧俗的拥护，又可以昭示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从而突出清朝对西藏的

① 《福康安等遵旨复奏吹忠降神指认呼毕勒罕骤难革除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0页。

主权。正是经过这样的反复考虑，乾隆皇帝才确定了实行金瓶掣签的制度。

（三）金瓶掣签的初试

1792年9月，皇帝派御前侍卫惠纶，乾隆门侍卫阿尔塔锡第把一个特制的金瓶送到拉萨，明令为了禁绝活佛转世过程中的流弊，废除全凭吹想指认的办法，实行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金瓶送到拉萨时，受到八世达赖喇嘛等西藏僧俗人士的热烈欢迎。① 关于如何实施二十九条章程，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金瓶掣签（gser bum dkrug vdon）的诏书后不久，八世达赖喇嘛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其中强调指出：

天命文殊大皇帝常施无上恩惠，且弘扬黄教，慈爱西藏人民，恩德无边。尤其是文殊大皇帝关心宗喀巴大师的黄帽教法，勤奋修习，甚至一直希望出家为僧。为了报答大皇帝宏恩，我等应多诵经为大皇帝祈寿，勤奋努力，不可懈怠，祝祷皇上长寿而解脱，逐渐登上遍知之果位，这样做才有黄教僧人的德行。如今多数喇嘛活佛不习佛法，选认灵童时，无法确定，故得不到全体僧人的敬重。同时，往往迎请几位护法，按照其指示，作为选认的根据，实际上（护法）看钱财，选一个有钱粮的家庭的孩童，不管是非，以致众人议论纷纷。现在按照以宏恩关切佛教的大皇帝的谕旨，寻找真正的灵童，是为了发展黄教。大皇帝经过深思熟虑，特赐金瓶，派专人奉戴送

① 《大将军福康安等奏报金本巴瓶到藏八世达赖喇嘛欢欣迎接情形折》，《驻藏大臣和琳奏报八世达赖喇嘛因废吹忠颁给金本巴瓶谢恩折》，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208页。

来，设于大昭寺宗喀巴大师像前，以后不管藏区的哪位喇嘛活佛降生，首先将岁数、月日、名姓写在签上，呈报我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同时邀请几位护法降神指示。当出现几位灵童时，应将他们的岁数、出生年月日、名姓等写在签牌上，共同放入金瓶，我达赖喇嘛带领几名有学识德行的喇嘛祝告三宝，祈祷宗喀巴大师，然后请驻藏大臣至拉章当众抽签决定，抽出谁的签牌，谁就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非按照旧例选定。另外，经护法降神等仍然只有一名灵童时，应将其名字如实写在签牌上，以同样的方法，和没有名字的签牌一同放进宝瓶掣签，当抽出的签牌上没有名字时，说明这一孩童并非真正的转世化身，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寻找。从现在起仍然依旧例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①

金瓶掣签制颁行后，即在蒙藏地区的局部范围进行了初步实践。1793 年 2 月驻藏大臣和琳等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兹有西宁送到逊巴呼图克图② 之呼毕勒罕，并年班回藏堪布囊素带有科尔沁地方达喇嘛四人之呼毕勒罕四人。兹有一人送到呼毕勒罕三名，又有三人每一人各送到一名。现在送到之呼毕勒罕，共计九名。所有各呼毕勒罕俱非大呼图克图，向来转世，并不报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认，惟将本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名字，送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诵经指定，历来俱系

---

① 《水牛年文告》，第 108—110 页。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出版，第 789—790 页。

② 这是指青海佑宁寺的松巴活佛，亦称松巴堪布、松布活佛，此次金瓶掣签是认定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公元 1704—1788 年）的转世，他曾进京任职，受封额尔德尼班智达，著有《如意宝树史》，是当时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六世松布活佛 1921 年生，土族，青海省互助县人，曾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2005 年 4 月在西宁去世。

如此办理。臣等伏思钦定颁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应将送到之呼毕勒罕，各按名字人数，分别入瓶试掣，因先期令济咙呼图克图等，带同喇嘛于大昭宗喀巴像前虔诚诵经。二月十一日，达赖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亲往监视，写签入瓶，公同抽掣。查逊巴呼图克图之呼必勒罕送来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哲布丹之子；又达喇嘛罗卜藏多布丹之呼毕勒罕送来者亦有三名，掣得乌珠穆沁地方第巴克之子；又达喇嘛罗卜藏丹津、罗卜藏达布凯、伦珠布班珠尔三人之呼毕勒罕送来者每人只各一名。是以写名签三枝，分三次入瓶抽掣。其达喇嘛罗卜藏丹津及罗卜藏达布凯之呼毕勒罕俱系掣得名签，准其指认。惟伦珠布班珠尔之呼毕勒罕掣得空签，自非确实，应令该地方另行寻觅。"① 在乾隆皇帝生前，由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等著名活佛并没有转世，所以，也就没有重大活佛转世实行金瓶掣签。

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作了太上皇。乾隆帝退位后，受了出家戒和比丘戒，派人专程给西藏送来他自己穿着僧装的画像。公元1798年，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寝殿内特设殿堂供奉乾隆皇帝的肖像。《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说：

文殊大皇帝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赏赐他自己的比丘持金刚装束的肖像，作为汉藏人民敬拜的对象。达赖喇嘛决定修建精舍供养。他指示："大皇帝乃诸佛之严父至尊文殊菩萨化现的人主，为天神等众生的供拜对象。大皇帝慈爱雪域众生，护佑黄教。仰仗大皇帝之慈恩，弘扬宗喀巴大师之圣教，我等需圆满地供养圣像。"该精舍由噶伦夏扎巴（Bshad sgrag pa）和

---

① 松筠：《卫藏通志》卷五，喇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266页。

孜强佐格桑曲扎（Rtse pbyag skal bzang chos grags）负责修建。精舍建在三界殊胜殿的中央，顶部用杨木制成，金质屋脊宝瓶，装饰极为华丽，纯金座，以窗棂隔断，内挂锦缎围幔，圣像前摆放着各种供品。像前方的阶梯上供放着金器、银器和羊脂玉、水晶石制成的各种器具，富丽堂皇。殿内陈放五种供品。①

在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康熙皇帝的牌位也供在此布达拉宫三界殊胜殿中。由于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全力主张制定的，所以清代的决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的几次重要的金瓶掣签都是在这里的皇帝的画像和牌位前举行的。

以上这些措施，实质上是清朝借福康安率军击败廓尔喀之时机，加强了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权威，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进行章程化的管理。由此，藏传佛教才正式有了符合政教所需的完备的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程序，并延续至今。

这一制度是西藏活佛转世的一个根本制度，一直到清朝统治崩溃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也不敢宣布废除，它具体体现了西藏地方与祖国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

二、对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

（一）对九世达赖喇嘛免于金瓶掣签

1804年年初，八世达赖喇嘛患了重病，噶厦通过驻藏大臣向朝廷报告，“皇帝派来俄大臣和汉族御医。当他们到达四川成都府时，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圆寂。大皇帝得奏后，命俄大

①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2—793页。

臣等人继续进藏，按汉地风俗吊唁。办理丧事期间，加尔果齐等官员先后抵藏，办完丧事后回京”[①]。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嘉庆皇帝于当年7月命令济咙活佛丹贝贡波担任摄政，同时下令寻访八世达赖的转世。

这是在清朝制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首次遇到寻访认定达赖喇嘛这样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方面西藏的传统的习惯力量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完全按照旧例办事，另一方面摄政和驻藏大臣等主管其事的官员还缺乏经验，僧俗信众中许多人对寻访转世灵童仍然持固有的认识，因此寻访和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受到旧习惯的很多影响。最先从四川邓柯地方传来那里有一名1805年在当地出生的男婴具有多种奇特征相的消息。于是，摄政济咙活佛（即功德林活佛）丹贝贡波和四位噶伦共同协商后，在公元1807年派遣侍从饶丹嘉措进京时将这个儿童的情况报告嘉庆皇帝。同时在当年九月，就把灵童及其父亲迎请到蔡贡塘寺，并呈报驻藏大臣，请驻藏大臣转奏，等候嘉庆皇帝决定。虽然当时又有两名灵异儿童报来，但是看来摄政济咙活佛心中已经认为邓柯地方出生的儿童是转世灵童。为了说服众人，十月初一日，在日光殿摆设供品，请来大护法神，摄政达擦诺门罕、四位噶伦、索本堪布、森本堪布、却本堪布等人问大护法：“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尚有争议，请明示哪位是真正的呼毕勒罕？”大护法金刚授记说：“母亲顿珠卓玛的怀中宝光圆满。”班禅大师向拉木降神师仓巴（Tshang-pa）问卦，回答与大护法相同，而顿珠卓玛是邓柯地方出生的儿童的母亲的名字。在这之后，摄政又将驻藏大臣和噶

① 丹增班觉:《噶锡哇世系传》（亦名《多仁班智达传》），中国藏学出版社，藏文本，第1226页。

伦等僧俗官员请到蔡贡塘寺聚会，把灵童从楼上卧室接到大经堂，让他辨认前辈达赖喇嘛的器物。上茶后，驻藏大臣玉宁对第穆活佛说："请你让灵童辨认器物。"第穆活佛说驻藏大臣的这句话如同让一个凡人去考佛一样，使他感到非常惊慌。但是，他又不能不听从驻藏大臣的指示，只好顺水推舟，呈上前世达赖喇嘛的用具，让灵童辨认。首先呈上前辈达赖喇嘛的本尊像、阿底峡曾经随身携带的度母授记过的度母像和宗喀巴大师的佛像扎西多喀玛，以及铃杵、鼗鼓、半月形大氅等，每件都有真假两样。然后问灵童哪尊像是真的，哪件物品是真的？据称当时灵童一一指点着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全部辨认无误。十月二十六日，驻藏大臣当着全体喇嘛和官员的面缮写奏折，上奏皇帝，称："呼毕勒罕确实认出佛像、器具，行为举止与众不同。"①这一记载，出自后来继任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的图丹晋美嘉措，如果说像他这样地位很高的活佛在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奏折称："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征呼图克图等率领众堪布喇嘛、噶布伦、戴琫、营官、第巴及阖藏大小僧俗人等跪奏。

钦差大臣转奏：……今丹怎吹忠之子，又会说前辈话，又会念经，实在是真呼毕勒罕，求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具奏大皇帝，将丹怎吹忠之子，免掣金瓶，赏作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实在感激不尽等语。臣僧等当即谕以此系高宗纯皇帝圣旨，如何敢违？众从又说，高宗纯皇帝当日圣心，不过是要得真呼毕勒罕。如今呼毕勒罕是真的，只求具奏。如不具奏，我们自己到京中求大皇帝恩典去等语。臣僧等因想唐古忒人甚糊涂，今既敬信所访丹怎吹忠之子，若遵旨掣签，有高宗纯皇帝在天默佑之恩，自不致有差错，但恐臣僧等修行浅薄，不能上格神天，掣得之人，非其所信，众人不敬，关系匪轻。是以不揣冒昧，叩恳大皇帝天恩，可否赏准丹怎吹忠之子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实于全藏僧俗，大有裨益。……前认八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时，系高宗纯皇帝特派前辈章嘉呼图克图前来指认，今亦否赏派人来之处，伏候钦定。"《清实录》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条，转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255页。

一个据宣传有灵异的有可能会成为新的达赖喇嘛的幼儿面前尚且有这样的敬畏的心理，那么对一般的僧俗信众来说，只能是更进一层。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在认定达赖喇嘛这样的掌握一方政教权力的大活佛的转世时，较早被宣称具有灵异的和得到寻访人员及摄政等人首肯的儿童比其他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就增加了实行乾隆皇帝设想的从三个儿童中掣签选择的办法的难度，这可能是乾隆皇帝当年所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经过驻藏大臣和班禅、摄政一起进行的这次考察，即由摄政和噶厦请求，认为这个儿童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真身转世，希望两位驻藏大臣联名向皇帝上奏，请求免于金瓶掣签，批准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于摄政和西藏僧俗大众一致请求，驻藏大臣转奏，嘉庆皇帝又刚继位不久，对金瓶掣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于是在嘉庆十三年（公元 1808 年）一月批准了免予掣签的请求。嘉庆皇帝颁旨说：

康巴垫曲科（康区邓柯群科）土司丹增曲窘之子，确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自幼会诵经，明辨佛像及用具等，无可怀疑。设当我皇考（乾隆）时，遇有此奏，必立时加恩，无须于金瓶掣签。盖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将其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并特赐呼毕勒罕哈达一个、无量寿佛像一尊、铃杵一份、灵珠记仿碧霞念珠一挂，令成都将军博清额赏赴西藏颁发。①

紧接着在当年二月，嘉庆帝又强调这次免于金瓶掣签只是特例，并要博清额在颁赏九世达赖喇嘛时再次询问试验。他

①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97 页。

说：

特清额驰抵西藏后，当晓谕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等，以从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合附会，或仅小著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签掣，以防弊混。今达赖喇嘛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似此信而有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签掣。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并著驻藏大臣等将此旨敬谨存记，一体钦遵办理。仍著特清额于颁赏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时，令通事询问试验如何灵敏出众之处，将实在情形详细复奏。①

关于为灵童剃度的问题，驻藏大臣与夏卜拜（噶伦）赤门、堪布贝丹、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一起商议后上奏。② 得到批复后不久，迎请班禅大师丹贝尼玛为灵童剃度，起法名为洛桑丹贝迥乃阿旺隆朵嘉措。

二月初三日，大皇帝就以前的奏折作出批复。摄政诺门罕、地方政府官员、钦差两位驻藏大臣等人……一起来到（蔡贡塘）寺大经堂，在宝座前面铺设红色方形缎褥，请灵童入座，面朝东方。两位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列队，禀报呼毕勒罕说：大皇帝已定尔为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献上译成藏

① 《谕军机大臣等九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著准免予掣签》，《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9页。

② 第穆活佛：《九世达赖喇嘛传》，27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96页。另见王维强译《九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3年印，第29页。

文的圣旨。施主福田法物关系圆满。当时，小灵童未经任何人提醒，说："大皇帝颁发此旨，谢谢！"说话慢而清晰，向大皇帝敬礼。当年9月份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九世达赖坐床仪式，清朝政府特派喀喇沁亲王都楞，噶勒丹席力图活佛作为专使到拉萨看视坐床。①

尽管嘉庆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但是皇帝的圣旨中同时也说这是一种"加恩"，是皇帝看了驻藏大臣转奏的西藏僧俗的请求以后，也认为"无须于金瓶掣签"，批准了免予金瓶掣签，因而只是皇帝的一种特别的处置，而不是说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都不需要实行金瓶掣签。因此，摄政和转世灵童也把这当作皇帝的一种恩典，要特别地表示感谢。在九世达赖喇嘛坐床的第二天，西藏僧俗首领和驻藏大臣等专门到本应举行金瓶掣签的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殿皇帝的牌位和画像前，表示感谢。《九世达赖喇嘛传》对此记载说：

坐床后的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为报答大皇帝钦准免于金瓶掣定之宏恩，在三界尊胜殿乾隆皇帝肖像和嘉庆皇帝牌位前奉献五供。达赖喇嘛、摄政诺门罕、钦差大臣、两位驻藏大臣、经师嘉赛活佛、第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赤钦活佛、赞布诺门罕、阿钦诺门罕、策却林活佛、赛巴活佛等色拉、哲蚌二寺的诸大活佛以及南杰扎仓的轨范师、翁则、诵经僧一起诵经祈祷。之后，达赖喇嘛念诵回向经，祝愿佛法昌盛，国政兴旺，皇帝万岁。他的声音洪亮，悦耳动听，使众人诚服，十

① 第穆活佛·图丹晋美嘉措：《九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27—28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798页。另见王维强译《九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3年印，31—32页。

分欣慰。[①]

（二）对十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

虽然九世达赖喇嘛是以自幼极为灵异、为僧俗信服而免予金瓶掣签继任为达赖喇嘛的，而且在西藏的奏报和嘉庆皇帝的诏书中都有他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真身再世的说法，显然他们都是希望九世达赖喇嘛能够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长寿和享有威望，但是和大众的期望相反，九世达赖喇嘛只活了 11 岁，在 1815 年初就去世了。

在九世达赖喇嘛在世的时期，嘉庆十九年（公元 1814 年）根据水牛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大小寺院的喇嘛、僧人须登记造册"的规定，摄政和噶厦完成了对西藏和康区、内蒙古的主要活佛的登记造册。并以藏文名册再次与驻藏大臣的汉文名册详加对照，增补抄写名册，在上报的名册的前言中写道："木狗年，驻藏大臣瑚图礼和祥保下令：凡是达赖喇嘛之属下历辈活佛的降生、出生地、名字、年岁等，务从原有名册与汉文名册进行核对，新造名册。"名册共收大小活佛 167 人，其中汉地、安多、蒙古地区活佛 33 人，西藏和康区活佛 134 人，记载了从第一辈到当时的那一辈的名字、出生地、卒年、年龄。显然，按照清朝的命令进行的这次对活佛的登记造册，也是为了加强对藏传佛教特别是活佛转世等事务的管理。其最直接的动因就是，金瓶掣签并不能够对所有大小活佛都实行，朝廷可行的办法也只有管理一些重要的活

① 第穆活佛：《九世达赖喇嘛传》，96 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99 页。另见王维强译《九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 2003 年印，第 79 页。

佛的转世问题，所以要在区分出在册的和不在册的活佛以后，才便于对登记在册的活佛实行金瓶掣签。

1815年2月，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圆寂。嘉庆皇帝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丹贝贡波摄政，并下令寻访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得到朝廷的指示后，摄政第穆活佛立即组织人员寻访。1818年12月，寻访到1816年3月在理塘出生的洛桑年扎的儿子，当年年底由噶伦和三大寺堪布等集会，请求按九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免于金瓶掣签，认定这个儿童为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这个情形按侍从堪布达尔罕洛桑赤列南杰所著的十世达赖喇嘛的传记《奇异珍宝串珠》记载说：

(理塘灵童) 其身、语、意的若干特别灵异事迹如太阳不可阻挡的光明一般向众人显示出来，所以他身边的人以及从各方聚集来的贵贱人等都对他们信仰礼敬，赞颂他的声名的讯息传遍各个地方，在西藏各地方的汉藏众人亦同声议论他的事迹，理塘的僧俗官员也按历次的（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通知的要求先后做了真实无欺的报告，使得众人都一心敬仰。为了不延误灵童认定事宜，土虎年（公元1818年）十二月的吉日，以诸噶伦为首，孜雪郎玛勒参（西藏地方政府各机构的总称）和上、中、下三等仲科尔、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拉萨上下密院、南杰扎仓等寺院的堪布、讲经师、执事僧人等全都到大昭寺拉章森穷尼沃寝殿集会商议，一致同意请求按以前火兔年（公元1807年）认定九世达赖喇嘛之例，免予金瓶掣签，认定理塘雪周卓东地方出生的灵童为达赖喇嘛，准予迎请坐床，并应向大皇帝上奏请求尽快恩准。为此写了明确

文书，呈献给摄政第穆诺门罕。①

看来这次西藏的摄政和僧俗上层人士仍然希望皇帝恩准免予金瓶掣签，他们的这一请求经过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转报两位驻藏大臣，又由驻藏大臣向嘉庆皇帝上奏。但是在得到朝廷的批复之前，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即因染上重病而于公元1819年3月突然去世。因此当务之急又变成了确定摄政的人选。《印鉴清册》一书记载说：第穆诺门罕“土兔年三月三日在丹吉林法苑去世，因当时达赖喇嘛的转世尚未定，当时的安班玉（麟）、珂（什克）二人即将（摄政）印封存，收取钥匙。立即召集会议，商议应由谁来办理政务，众人议决后向两位安班呈报，由安班在三月五日将第穆活佛的银印、花押印交给额尔德尼萨玛第巴克什的转世阿旺坚白楚臣嘉措（即策墨林活佛），命他从即日起代替摄政管事。”② 此时接到了嘉庆皇帝对请求免于金瓶掣签的奏折回答的谕旨：

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设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谋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玉宁等奏称，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第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此玉宁等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

---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35—36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6页。

②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7页。

犹以为悔。今理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该喇嘛狃以为常，将从前皇考圣断设瓶签掣之例岂不日久渐废。倘各处所报呼毕勒罕亦俱援此为例，又将何以应之。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为错误。玉麟、珂实克均著传旨申饬。此次理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其有具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其掣出者方系达赖喇嘛真呼毕勒罕，必能驻世长久，为众信奉。著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若伊等无知，竟有欲求来京求情之事，即严行饬禁。倘不行禀明，私自前来，即著查拿治罪。①

显然嘉庆皇帝认为九世达赖只活了11岁，因此以前请求免于掣签时所说的灵童所具有的种种灵异并不准确，而且正可借此突破推行对达赖喇嘛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的阻力，因此此次一定要实行金瓶掣签。嘉庆帝命令除这一儿童外再寻访两个灵异儿童，将三名幼童进行金瓶掣签，以确定达赖喇嘛转世。按此圣旨，策墨林诺门罕向前后藏、阿里、藏北、甲尔、达布、朵甘思、朵思麻等地各个宗谿头人等发出通知，要他们访查，将所有灵异幼童据实呈报。结果在工布属下访得一名，仁蚌宗属下访得一名，嘉德噶如访得一名，昌都阿塘仲访得一名，昌都萨岗访得一名。依各处所呈报的情形，专门派人赴各

① 《玉麟等遵旨传谕班禅等再寻灵童两名一同入瓶签掣十世达赖喇嘛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2页。

地仔细考察；待各路人员返回之后，又请班禅大师丹贝尼玛辨查在原先的理塘的幼童之外，其他的幼童之中身、语、意等仪态方面谁更灵异。班禅大师答说，理塘之幼童以外，以昌都呈报的两名幼童灵异显著。于是在藏历铁蛇年（公元 1821 年）的正月四日，召集所有僧俗首领到布达拉宫森穷康松殿（gzim chung khams gsum 即三界殊胜殿），由策墨林诺门罕通过众噶伦对大众指示，说明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前后详细经过，并请大家商议今后如何进行为好，摄政和僧俗首领商议的结果是：

众人商议后一致同意，此次在原先的理塘幼童之外，以昌都寻获的两名幼童与护法降神指示相符，应以此三名上奏大皇帝，请求恩准掣签。按照众人一致意见，策墨林诺门罕致函驻藏大臣文（干）安班和灵（海）安班二人，请求向大皇帝代奏，准予入金瓶掣签。二位安班答复说，关于此事西藏大众已取得一致意见，不过达赖喇嘛转世事关重大，因此再由班禅额尔德尼写一同意此项的文书，也有必要。……因此班禅大师也写交了一份与西藏大众意见相同的盖印文书，然后由两位驻藏大臣于铁蛇年（公元 1821 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发出了给大皇帝清楚详细的奏折。①

虽然嘉庆皇帝在这以后不久去世，但是新即位的道光皇帝又在道光元年（公元 1821 年）重申：

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拟确验签掣一摺。达赖喇嘛掌管西方黄教，其呼毕勒罕出世自必有灵异可征。前据玉麟等奏昌都幼孩二人，均有吉祥佳光。前后得有三人，已符入瓶签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36—40 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09 页。

掣之例。但系各该处具报之词，或恐言过其实。著照文干等所奏将幼孩三名，令其亲属师傅等携至前藏，文干等会同噶勒丹锡图萨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均有灵异之性，即照例写签入瓶，对众讽经掣定，核实奏闻。若试验未确，仍令另行访查，俟灵异幼孩数足三人再行照例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1]

在具体实施以金瓶掣签确定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之前，摄政、噶厦和驻藏大臣等人还在乾隆皇帝的规定之下，对具体细节做了安排，并报请道光皇帝批准。这些细节是：在金瓶掣签之前，令三名候选幼童的父母亲属和师傅等，把幼童带到拉萨，由驻藏大臣和摄政等面试，合格后才能入瓶掣签。如有幼童不合格，则暂停金瓶掣签，再行寻访，等“实在灵异幼孩数足三名，再行办理”。此即驻藏大臣文干的奏折中所说：

兹据（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称：九辈达赖喇嘛圆寂已久，各蒙古部落及阖藏僧俗人等，盼望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早为出世，得所皈依。前巴雅尔堪布、年班堪布等差竣自京回藏，叠蒙颁赏敕谕，令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早为寻获。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钦遵谕旨，屡次通饬前后藏及附藏各处地方一体留心查访，如有灵异幼孩，即行据实具报，毋许隐匿，亦不准捏饰。并拣派妥实细心之喇嘛，分起前赴各处，认真访查。迄今达赖喇嘛虚位已经六年，除理塘前报灵异幼孩一名外，各地方未据续报。惟察木多所属萨冈地方番民策忍敦柱之妇四郎扁宗，于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生有一子；又搭堡阿汤桑补地方番民册旺敦住之妇央金竹玛，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五日生有一子，均有吉祥佳兆，形貌聪慧，心性灵

[1] 张其勤编：《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392页。

敏，俱经差查确实，并无虚捏情事。至理塘从前所报幼孩灵异之迹，亦经密差妥人前往，复加访查属实。以上共计幼孩三名，应请奏明照例入瓶签掣一名，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惟达赖喇嘛掌管西方黄教，将来掣定时，仰受大皇帝恩典最重，非寻常呼图克图可比。今所报幼孩三名灵异情形，虽经据报专差密查并无捏饰，但未经面试，不足以昭慎重。应请传令各幼孩亲丁、师傅等，携带幼孩来藏验实，再为入瓶签掣。商之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小呼图克图等，意见相同。为此咨请酌办。等情。奴才等查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咨报，续经访获萨冈等处灵敏幼孩二名，连从前所报理塘地方幼孩一名，已足三名之数，与入瓶签掣之例相符。惟达赖喇嘛系黄教中最大之喇嘛，为各蒙古及阖藏僧俗所信奉，我国家振兴黄教，寓有深意，关系甚重。据报幼孩等一切灵异，是否确实，能否仰承恩眷掌管黄教之处，未经面试，似不足以昭慎重。且一经掣定奏准之后，即系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彼时派人前往迎接照料，沿途支应一切倍常繁费，奴才等拟照所请，一面恭折奏闻，一面将理塘等处幼孩三名，令其亲丁、师傅等携至前藏，由奴才等会同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确加试验，如果均有灵敏之性，再行照例写签入瓶，令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对众讽经，奴才等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掣定后，再将掣出何人恭折奏闻，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如所报幼孩三名内，或有言过其实、毫无灵异之处，即毋庸入瓶掣签，仍令上紧访查，俟有实在灵异幼孩数足三名，再行办理。奴才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并将译出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原咨内所报幼孩三名灵异情形，

摘缮清单，恭呈御鉴，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①

这里以掣签后迎请转世灵童来拉萨路途事务繁复为由，请求在掣签前将灵童及其家属请来拉萨。但是，这一新增的安排在皇帝批准后，就在事实上明确了金瓶掣签的结果一出来，中签的幼童的达赖喇嘛的身份即已确定，再无变易，即可受僧俗的祝贺朝拜。这里显然是考虑到达赖喇嘛地位的重要，若掣签的结果必须等待奏报皇帝后才最后决定，则数月之间，中签的和未中签的幼童的身份仍然难定，易生事故，所以应该实际上肯定金瓶掣签的结果即是最后的结果，奏报皇帝批准只是形式上的手续。这就更加突出了金瓶掣签的庄重严肃和至关重要，同时两名驻藏大臣，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让相关僧人等经手，也是为了强调金瓶掣签的公正性。

这些安排经过道光皇帝批准后，1822 年 1 月 15 日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萨松南杰）殿举行了金瓶掣签。这是历史上首次就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而实行的金瓶掣签，其具体情形，在《十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说：

藏历第十四饶迥的水马年（公元 1822 年）正月十五日，当太阳出山之时，班禅大师从罗布林卡前往布达拉宫，僧俗官员等一起到皇帝御像前就坐，不久两位驻藏大臣亦到达。当藏汉官员、喇嘛会齐后，由满文文书将三位幼童的名字用满文书写到三个名签上，然后由藏文文书在三个名签的另一面上用藏文书写三位幼童各自的名字，并共同看验核对无误。然后由灵（海）安班对金奔巴瓶磕头致礼三次，再将三个名签放入金奔巴瓶中，然后和颂经师等一起念诵祈请三宝慈悲护佑的真言，

① 《文干等奏拟确验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765—1766 页。

三次猛力祈祷，然后由文（干）安班向金奔巴瓶跪拜三次，将金奔巴瓶中的三支名签摇动，最后掣出确定灵童名字的一支名签，看视后高声宣布是理塘出生的幼童，并将名签交给班禅额尔德尼、策墨林诺门罕和灵（海）安班等在场的汉藏官员、喇嘛、贵族僧俗人士看视。然后将名签插到放在金奔巴瓶上面的一个盛满青稞谷物的容器中。由于金瓶掣签的结果与大众的愿望相符，真实无欺地完成了掣签认定，所以众人都极为欢乐和崇信……①

由于是第一次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看来驻藏大臣等官员为此做了许多准备。掣签的结果一宣布，驻藏大臣文（干）和灵（海）两位安班通过摄政策墨林诺门罕交给转世灵童一件文书，为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合璧，要转世灵童心记大皇帝历辈父祖与以前历辈达赖喇嘛结为施主与福田，对达赖喇嘛加恩尊崇的情形，为报答皇帝的恩德，努力闻思佛法经典②。掣签结果立即呈报皇帝批准，并请求皇帝批准选择吉日为转世灵童举行盛大的坐床典礼。同时在西藏已经开始为举行坐床典礼进行准备。

接着，在接到关于为灵童举行坐床仪式的奏折的批复后，要经过两位驻藏大臣向灵童正式宣布。为此，在当年四月间，七世班禅大师和摄政诺门罕、两位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高僧等一起前往聂塘热哇堆的德哇坚寺，在众人到大经堂会齐后，转世灵童等“在坐垫上面向东方磕头跪拜，由仲译玉康·坚白德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60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9—810页。

②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69—71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0—811页。

勒宣读诏书，诏书内容为：'道光二年四月七日上谕：文干所奏按旧例达赖喇嘛转世入金奔巴瓶掣签确定情形及坐床月日，及班禅额尔德尼可否返回后藏之折已览，据文干所奏寻认达赖喇嘛转世情形，三名幼童俱缄名入金奔巴瓶中掣签，掣出理塘藏民罗桑年扎之子格桑坚赞一名，经查该童灵异显著，为达赖喇嘛真实转世、黄帽教法之主持，大众欢悦崇信，出现多种吉相。览此奏折，朕心甚喜。此次赐呼毕勒罕哈达一条、无量寿佛画像一幅、金刚铃杵一套、珊瑚念珠一串，由文干递交。另给班禅额尔德尼、阿旺坚白楚臣嘉措等亦各赐哈达一条、无量寿佛画像一幅，亦同时递交。达赖喇嘛坐床将于八月八日举行，朕派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等共同看视尔坐床。章嘉呼图克图由北京派去，由广储司拨给银300两供路途所需。所有颁赏达赖喇嘛等之敕书、例赏等件，由理藩院派司员二人帮同照料。班禅额尔德尼已为达赖喇嘛剃发、传戒，而达赖喇嘛坐床尚有数月，故可准其返回后藏。坐床事务即交文干、宝昌、苏冲阿等会同办理。将此谕令知之。'宣读诏书完毕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各大呼图克图及僧俗贵族人等，对大皇帝行三跪九拜大礼谢恩……"① 关于为呼毕勒罕委派容增（经师，负责传经及生活的师傅）的经过，《十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说，在五月二十二日皇帝的批复中说："据文干所奏，请求为达赖喇嘛委派经师，故准予以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正师傅，以卸任噶勒丹赤巴阿旺年扎及容增班智达坚白意希丹贝嘉措二人作为副师傅，

---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77叶。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1—812页。

俾令认真传习经典。"① 与此相似，《十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赐给达赖喇嘛颁金印的情况时说：依照奏请，皇帝给以批复，"道光二年六月二日降旨说，据文干所奏，……以前前世达赖喇嘛所用金印于坐床时启用，今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后，请恩准使用。著照以前例规，赏给金印使用。又降旨说，据文干所奏，……前世达赖喇嘛处赏有黄轿、黄缰使用……"② 当年七月十四日皇帝所派的章嘉呼图克图到聂塘拜见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当时传达大皇帝的圣旨，赏给呼毕勒罕之父罗桑年扎一等台吉的顶戴。"③

关于十世达赖喇嘛坐床的情形，在藏文史料中记载，水马年八月五日，达赖喇嘛在聂塘德哇坚的法苑中"戴上唐徐帽，坐在轿中"，按以前达赖喇嘛出行时的例规盛陈仪仗，然后启行。途中在年地方的喀那山崖前向佛法之主的身像（聂塘益那山角处摩崖雕刻的释迦牟尼巨像）献了敬神哈达，向喀那地灵庙献了礼冠，向神湖献了供品，然后到堆隆岗地方午餐，饭后启程，"到达嘉德蔡附近时，大护法噶哇东·云丹杰波降附人体，十分恭敬地迎接，献了哈达，达赖喇嘛做了祈愿和向护法嘱托事业"。接着到达参尼林卡，达赖喇嘛进入在林卡中搭起的大帐幕中，完成多种仪式，当晚即在毡帐中住宿过夜。次日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87叶。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

②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90叶。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

③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94叶。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813页。《清实录》记道光二年六月丙寅，谕内阁："文干等奏达赖喇嘛之父罗桑年扎可否赏给爵衔顶带之处请旨一折。达赖喇嘛之父罗桑年扎既随呼毕勒罕处奉养，著加恩赏给头品顶带。"与藏文所记赏给一等台吉顶戴略有不同。

即六日上午，“摄政诺门罕请求说：‘因当天达赖喇嘛首次进入布达拉宫，为了目前和久远的吉祥的缘起，而且路上有无数贵贱信徒前来欢迎拜见，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因此请达赖喇嘛骑马前往。’按照这一请求，达赖喇嘛非常高兴地骑上前世达赖喇嘛骑乘的名叫‘阳恰卓噶’（g. yang chags gro dkar）的乘马。在盛大的仪仗队伍的导引下，达赖喇嘛一行依次前进，到达吉蔡鲁顶西藏地方政府设灶郊迎的地方时，钦差苏老爷和两位驻藏大臣等在此迎接，按照例规和达赖喇嘛互献哈达，请达赖喇嘛到大帐幕中升座，达赖喇嘛向钦差大臣和驻藏大臣等人问候，并细心护持。在饮用茶点之后，汉官等人先行离去。”达赖喇嘛为前来叩拜的众人摩顶祝福后，继续前行，队伍的前面有各个寺院的僧人队列和百姓歌舞等作为前导。“走到扎果噶尼（brag sgo kakni）① 时，为右旋绕行布达拉宫，遂折向哲林谿卡方向，此时恰赤大护法降附人体前来欢迎，献了哈达，达赖喇嘛向护法嘱托事业。此后经雪村大门，从‘多仁朗玛’（布达拉宫下面雪村内的石碑）起，达赖喇嘛下马，改坐桥子上山”。达赖喇嘛在手持熏香的高僧们的引导下进入布达拉宫大门，经“彭措堆朗”上山道，到达德阳厦（意为东广场），在此下轿。为建立第一次的殊胜缘起，达赖喇嘛径直到普陀无量宫的至尊圣者洛迦夏惹像（即旃檀木中自己出现的观世音菩萨像）前朝礼并献敬神哈达，“然后达赖喇嘛到萨松南杰寝殿的文殊大皇帝的画像前行礼。在途中还顺带向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世界一庄严和曾经发声说话的天女像等献了敬神哈达，并作祈祷，然后达赖喇嘛到日光喜漩殿，登上达赖喇嘛的崇高的

---

① 连接布达拉宫所在的玛波日山和药王山的山嘴处，以前有一佛塔，塔身中间为通道，此塔名为扎果噶尼。

无畏狮子法座，由噶厦敬献首次升座的喜宴和礼品”。

接着又说，在上弦月的第二个殊胜日即初八日，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带领侍从“从寝宫日光喜漩殿前往布达拉宫的旧大经堂司喜平措殿，此时钦差章嘉呼图克图、苏冲阿大人、驻藏大臣两位安班等也前来大殿会齐，按次落座后，向达赖喇嘛呈献了事先陈列在桌上的大皇帝颁给他的大量无价珍宝和物品。达赖喇嘛接受后，在坐垫上面向东方下跪，摄政诺门罕、经师策却林活佛、公、噶伦等贵族官员也恭敬下跪，在琵琶等器乐奏响时，颁发了皇帝褒封达赖喇嘛的诏书。由仲译堪布玉卡哇宣读的皇帝的诏书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谕达赖喇嘛：

朕抚驭天下，惟期万方各安生业，振兴道学。现据两位驻藏大臣奏称，自呼毕勒罕尔降生后，屡现奇异吉祥光相，且尔容貌端方，举止沉稳，经卷熟练，并能辨认前代达赖喇嘛供过之佛尊、用过之物件，故普藏僧俗皆倾心悦服。择于二月吾等导师释迦牟尼示现大神变之吉日①，在布达拉宫令众呼图克图念经七日，力行法事，并在班禅额尔德尼前祈祷诵咒后，至布达拉宫所供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毕，由金奔巴瓶中将尔名掣出。朕览奏实深欣悦，降旨将尔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并派驻藏大臣文干、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等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在布达拉宫会同办理尔坐床之事。所有赏尔各色物件派蒙古衙门（理藩院）司员带往交给，别有礼物清单着文干递交，物件到时由尔呼毕勒罕祗领。尔正聪明长进之时，理应感戴朕恩，勤习经卷，阐兴黄教，俾僧俗人等均安居乐业，勿

① 此年神变节藏历为正月十五日，汉历为二月十二日。

急。特谕。道光二年闰三月六日。

听完宣读圣旨后，众人依制行三跪九拜大礼。然后由驻藏大臣、钦差官员等向达赖喇嘛敬献哈达，官员们从皇帝所赐物品中取出坐垫、衣帽等呈献于达赖喇嘛宝座。达赖喇嘛从御赐物品中取僧帽、大氅穿戴，如同事先量裁而缝制的一般，与达赖喇嘛的头、身十分合适，这是自然而成的吉祥圆满的缘起……"①

在进行了这些与朝廷有关的仪式后，然后再按以往西藏的庆祝达赖喇嘛坐床的例规举行了祝贺坐床的隆重的献礼仪式。

在布达拉宫的萨松南杰殿的皇帝牌位和画像前举行了认定十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后，西藏僧俗进一步接受了金瓶掣签作为认定活佛的转世灵童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清朝的皇帝牌位和康熙、乾隆皇帝的画像的神圣性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从《十世达赖喇嘛传》的一段记述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形。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藏历三月里，"本年布达拉宫红宫南部的萨松南杰寝殿等堂需要维修，因此大皇帝的画像和牌位需要迁移供奉地点，而达赖喇嘛不久也要到帕崩卡寺去，故而决定在本月二十六日将大皇帝的画像搬迁到森穷强康。当天两位驻藏大臣前来后，在萨松南杰寝殿和达赖喇嘛互献了哈达，并互相问安。当奏第一遍乐时，达赖喇嘛、两位驻藏大臣、摄政诺门罕等一起向大皇帝的画像礼拜，然后由噶伦夏扎恭捧大皇帝画像，由噶伦吞巴恭捧皇帝万岁牌，右面由南杰扎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95—104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4—815页。

仓的20名僧人列队引导，左面由官员贵族列队引导，在奏第二遍乐时，将大皇帝画像和万岁牌送至森穷强康中安放完毕，在奏第三遍乐时，达赖喇嘛向皇帝画像敬献内库黄缎敬神哈达，并向皇帝画像礼拜，然后由南杰扎仓的10名僧人为此举行开光仪轨。"①

当年十月，又按与上述相仿的程序，将皇帝的画像（圣容）和万岁牌搬迁到以前的萨松南杰寝殿中供奉。

（三）对十一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

1837年9月，十世达赖喇嘛圆寂。由摄政二世策墨林活佛主持，请各个护法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并请七世班禅等活佛打卦占卜，根据所得到的征兆，经过驻藏大臣和摄政、三大寺堪布等汉藏僧俗官员商议，派哲蚌寺堪布洛追丹巴、布达拉宫森噶桑结贝桑等人到拉萨以东的各地寻访，经过挑选，确定了4名灵异儿童为候选的儿童，其中西藏山南一名，工布一名，四川两名。并由驻藏大臣在1840年12月向道光皇帝奏报，请求批准以这四个儿童进行金瓶掣签。② 1841年，在得到道光皇帝批准后，摄政和噶厦将四名候选儿童和他们的家属接到拉萨附近达孜县的德庆桑阿喀寺，先由七世班禅、驻藏大臣、摄政、三大寺的堪布以及噶伦等对四名儿童分别进行考察，让儿童辨认前辈的遗物，认为四名儿童都比较灵异，就由驻藏大臣向皇帝上奏，请求批准举行金瓶掣签。当年

---

① 《十世达赖喇嘛传》，第258页。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6、817、810页。

② 嘉旺活佛·洛桑赤列南杰：《十一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11—12叶。《驻藏大臣孟保等奏报验看十一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均有灵异拟入瓶掣签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83页。

5月，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结果抽中了在康区泰宁出生的儿童。① 驻藏大臣的奏折中记述这次掣签的情形说：

先是布达拉山上及各寺呼图克图、众喇嘛等念经七日。届期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等复率领众喇嘛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念诵经典，虔心默祷。奴才（指驻藏大臣孟保自己）等于五月二十五日恭诣布达拉山，谨于圣容前将金本巴瓶供奉黄案，焚香九叩，将幼子等之乳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唐古特字写签，给予该亲丁师傅及众喇嘛等看视毕。奴才海朴族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敬将名签缄封，储入金本巴瓶中。签小瓶深，极为严密。复族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讽经一遍，奴才孟保向案上瓶内用手将签拨转数次后，敬掣一签，与该亲丁师傅众喇嘛等同观，签写泰凝寺番民策旺登珠所生之子，乳名那木觉木多尔济，现年四岁。其余三签，亦眼同大众取出看毕。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及大小呼图克图、众喇嘛等，诚欢诚忭，佥称：仰蒙大皇帝振兴黄教，遵照定制，签掣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今掣得此幼子，系出平素卖柴贫苦番民之家，灵敏异常，诚符众望，实是达赖喇嘛真正呼毕勒罕出世，黄教得有主持，众心悦服，小僧等实在钦感不尽。随即向上敬谨行九叩礼，恭谢天恩。奴才等悉心体察，不惟班禅额尔德尼等钦感皆出于至诚，即阖藏僧俗亦无不举手加额，同深庆幸。所有奴才等确验幼子灵敏、照例签掣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并众心感激信服情形，理合恭折据实奏闻。

① 嘉旺活佛·洛桑赤列南杰：《十一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14—18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21—822页。

伏乞皇上圣鉴。①

金瓶掣签后，即由七世班禅给转世灵童剃度，起法名为克珠嘉措。同时驻藏大臣孟保等还另写奏折请求皇帝批准选择来年四月十六日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的吉期。

道光皇帝批准了金瓶掣签的结果和呼毕勒罕坐床的日期，清朝政府特派成都都统什蒙额和五世章嘉呼图克图进藏看视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并赐银一万两作为坐床典礼的费用。1842年4月16日，由驻藏大臣和摄政等将转世灵童迎接到布达拉宫，当天布达拉宫排列僧队，迎接驻藏大臣和钦差章嘉活佛等到布达拉宫，由摄政和噶伦等捧香引导圣旨到布达拉宫的司喜平措大殿，呼毕勒罕在坐垫上向东方跪拜，接受皇帝颁赐的金册金印，恭听宣读圣旨，然后与驻藏大臣互相敬献哈达。随后呼毕勒罕登上大宝座，接受摄政策墨林活佛、章嘉活佛敬献哈达，然后在器乐声中接受僧俗各界人士的献礼。②

（四）对十二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

1855年底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咸丰皇帝下令由热振活佛再次摄政。由摄政向卫藏、达布、工布、阿里、藏北、康区发出文告，要各地将近年出生的灵异儿童上报，依照这些通知，山南的桑日、沃卡、曲科杰、达布的拉索、北方蒙古地区、绒波的穹波争扎、拉萨附近的娘真、东北方向的云南中甸的冬若等处都呈报了有灵异儿童出生的情形。于是将可能性大

---

① 《驻藏大臣孟保等奏报掣定十一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情形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9页。

② 嘉旺活佛·洛桑赤列南杰：《十一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18—22叶。见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合编《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4—776页。

的众人传称的灵异儿童名单送给护法和大喇嘛请求授记，结果桑日、沃卡、达布拉索三地所出的灵异儿童获得吉兆。接着又派人员去进行初步考察，派遣了上一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果莽格西阿旺诺布、色拉寺麦扎仓工布格西阿旺楚臣二人前去上述三个灵异儿童的出生地，分别验看灵异儿童的身相及行为举止，对其灵异之处进行认真考察。经过他们的实地观察后，认为沃卡地方所出灵异儿童比其他两个更为殊胜，将三个幼儿的情形以及父母、亲朋乡邻所说的灵异的征相事迹向摄政热振活佛做了汇报。经摄政和噶伦、基巧堪布等人商议后，再次请经师洛桑钦饶旺秋（德柱活佛）和却藏意希嘉措、贝拨活佛进行占卜，并向拉木护法，桑耶护法、昌珠护法等3位护法神请求授记，他们都一致认为以上述三个灵异儿童姓名入金瓶掣签最为适合。接着又召集以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为首的各大寺院的堪布、执事僧和地方政府的各级僧俗官员举行大会，摄政向大会介绍了先后派人寻访和考察各个灵异儿童的情形以及请求占卜和降神所得到的回答，“按天命大皇帝以前所做的规定，需要进行金瓶掣签确定，是以这三个灵异儿童入瓶掣签，还是另外再寻访灵童，……需要毫无徇私地进行认定。听了摄政指示后，参加大会的僧俗贵贱人士一致说寻访依怙达赖喇嘛的转世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而且认定转世之事不宜延误，因此议定将这三个灵异儿童迎请到拉萨，由汉藏官员、喇嘛等进行观察，若众人信服，则可进行金瓶掣签，若将此三个灵异儿童请到拉萨进行观察时众人不能信服，那就只好再寻访其他的灵异儿童。众人在议定的文书上盖章后呈报给摄政，摄政热振呼图克图遂按大会议定，将详细情形写成文书，递交给驻藏大臣。”又说：“摄政还行文给驻藏大臣说，尤其为了便于在进行金瓶掣签之前汉藏官员、喇嘛等众人观察，想在不久之后将

桑日、沃卡、拉索三处出生的灵异儿童迎请到拉萨，进行仔细观察，若众人信服此三位灵异儿童具有入瓶掣签资格，则请驻藏大臣将此情形，以及依照往昔文书择定日期进行金瓶掣签之事上奏大皇帝，请求恩准。驻藏大臣复函说定将此事上奏"①。《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的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在进入金瓶掣签之前，在寻访转世灵童的各个过程中都要经过僧俗官员、驻藏大臣等人多次协商，才能逐步进行。在得到皇帝的批准后，"将他们（指三个幼童和他们的亲属、师傅等）迎请到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在主要官员和活佛会聚之处，陈列历辈达赖喇嘛供奉过的本尊像、用品及串珠等，而且都有与之相似的物品与之混杂，让三个灵异儿童在众人面前自己认取，结果只有沃卡出生的灵异儿童正确无误地认出了前辈用过的所有物品"，"十三日，热振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喇嘛等在罗布林卡格桑颇章的日光寝殿会集，迎请三个灵异儿童前来，由驻藏大臣亲自看验，驻藏大臣看三位灵异儿童身相都很美好，一见之下就感到很满意。于是由驻藏大臣向大皇帝上奏，请求允许择吉日将这三个灵异儿童的姓名牌放入金瓶中掣签"。

在接到皇帝同意所奏事项的批复后，"藏历第十四饶迥的土马年（公元1858年）正月初二日将金奔巴瓶从拉萨大昭寺迎请到布达拉宫中有皇帝画像唐卡的萨松南杰殿，由经师普布觉活佛等高僧和南杰扎仓的僧众一起对金奔巴瓶行了11天供养诵经仪轨。当月十三日，当热振呼图克图、两位驻藏大臣等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木刻本，27—28叶。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1—852页。另见熊文彬译《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2003年印，第32—33页。

人会齐后，由满文书吏等在名签牌的一面分别用满文写上各灵异儿童的名字，由堪仲等在签牌的另一面用藏文分别写上各灵异儿童的名字，然后送摄政和驻藏大臣核查无误，由驻藏大臣向皇帝画像唐卡磕头，将签牌放入金奔巴瓶中。此后按照举行仪轨念诵经文的例规，在场的众人齐声念诵，猛力请求圣者大悲菩萨和三宝慈悲护佑的真言和祈愿偈颂三遍，然后由驻藏大臣向皇帝的画像唐卡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并摇动金奔巴瓶使三个签牌在瓶中很好翻动，最后无欺无假地从金奔巴瓶中掣出一个签牌，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等人共同查看，随即向众人宣读沃卡洛桑丹增居美的名字，当时众人由于对三宝的敬信和抑制不住的兴奋，高声呼喊'拉嘉洛'（神胜利了！）驻藏大臣即向沃卡灵童的父亲平措次旺说：'你的儿子洛桑丹增居美经金瓶掣签确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你向大皇帝磕头谢恩。于是平措次旺向皇帝的画像唐卡磕头谢恩，并向驻藏大臣和呼图克图献了哈达……"①

金瓶掣签后，热振呼图克图立即专门派噶伦夏扎·旺秋杰布前去灵童居住的官萨日楚，向转世灵童报告。并随即将转世灵童迎请到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居住，当月十五日，由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为灵童剃发，起名为阿旺洛桑丹贝坚赞赤列嘉措(通常称为赤列嘉措)。

不久接到皇帝的圣旨说，经金瓶掣签正确认定达赖喇嘛的真实转世，皇帝心中无比高兴，作为首次交往赐给呼毕勒罕敕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木刻本，32—34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3页。另见熊文彬译《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2003年印，第38—39页。

书和礼品。驻藏大臣和摄政确定四月十五日向转世灵童颁给皇帝的诏书和礼品。当天，从位于麦吉的驻藏大臣衙门到罗布林卡之间，由色拉寺、哲蚌寺、木如寺、四大林、甲波日、南杰扎仓等寺院的僧人排列僧队，由众噶伦、公、扎萨克、布达拉宫堪布及各大小寺院的代表等人专门恭迎诏书从驻藏大臣衙门到罗布林卡，当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达罗布林卡的伦珠噶蔡寝殿时，刚好诏书也抵达那里，立即摆设供案，将诏书供于案上。当驻藏大臣随即抵达后，再将诏书迎请到大殿中，以热振呼图克图为首的地方政府的颇本、代本以上高级官员全都面朝东方跪下，由仲译堪布宣读诏书，读毕后汉藏众人全都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向灵童献了哈达。① 《十二达赖喇嘛传》还说："九月七日大皇帝封达赖喇嘛的父亲为公爵，并赐给一品顶戴。"②

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记述他坐床时的情形。藏历第十四饶迥的铁猴年（公元 1860 年）七月三日，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当奏响第三遍器乐时，由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和噶伦等人手捧香炉引导，年老的噶伦和基巧堪布二人手捧礼物，由吹奏唢呐、捧香炉和诸宝的队伍开道，达赖喇嘛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下缓步来到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钦差驻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木刻本，42—44 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54 页。另见熊文彬译《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 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2003 年印，第 50—51 页。

②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木刻本，49 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54 页。另见熊文彬译《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资料丛刊 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2003 年印，第 60 页。

藏大臣带着皇帝诏书来到，将大皇帝所赐的众多物品陈列在事先准备好的桌子上。此时达赖喇嘛和摄政呼图克图二人在坐垫上面朝东方下跪，公爵、噶伦等人也都恭敬下跪，由满文仲译和堪仲用满语和藏语朗声宣读大皇帝褒奖达赖喇嘛和摄政呼图克图的诏书，宣诏完毕，达赖喇嘛和摄政呼图克图等人都行三跪九叩大礼。接着两位驻藏大臣向达赖喇嘛和摄政献了礼品和哈达，达赖喇嘛和摄政向他们回赠了哈达。当达赖喇嘛首次登上由八只狮子托起的大宝座时，驻藏大臣将皇帝所赐物品请达赖喇嘛过目，然后粮台、把总、夷情章京、笔帖式等人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达赖喇嘛将哈达还赐给他们，并为他们摩顶赐福。摄政呼图克图向达赖喇嘛行礼并献了称为'长在久远'的哈达，然后落座。接着经师卸任甘丹赤巴、丹吉林、策却林、沃勒隆活佛、阿里活佛等人向达赖喇嘛和摄政二人行礼并献了哈达，达赖喇嘛给他们摩顶赐福，他们依次落座……"①

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未派专使，只是派了理藩院的两名司员携带礼品前来颁赏，并命令驻藏大臣看视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②

由于1853年即藏历水牛年，七世班禅大师丹贝尼玛在他70岁时圆寂，十二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时八世班禅还年幼，因此没有参与这些活动。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木刻本，42—44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4页。

② 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42—57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4—855页。

（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免于金瓶掣签

1875年3月，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俗公推济咙呼图克图摄政，并请驻藏大臣向朝廷奏报，“火牛年（公元1877年）（光绪皇帝）赐摄政以‘通善’的名号”①。从这时起达擦济咙呼图克图正式担任摄政，被称为通善呼图克图。② 同时由摄政主持，西藏噶厦派人到各地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1877年由八世班禅、摄政、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堪布、噶伦等全体僧俗官员向驻藏大臣呈报，说经过寻访，只找到在工布出生的一名灵异儿童，经各方公认，请求免于金瓶掣签，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驻藏大臣据此上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免于掣签。在光绪皇帝批准后，1879年6月1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寻访认定的过程，已经有文章作了详细的介绍。③ 应该说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的过程，记载最详细的是藏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料。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部传记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热振活佛图丹坚白意希丹贝坚赞担任摄政后，由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phur bu lcog rin po che blo bzang byams pa tshul khrims）编写的。在写作

① 《印鉴清册》，第32页。转引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62页。

② 《清实录》光绪元年十一月甲午条“西藏办事大臣希凯奏：‘请以达擦呼图克图阿旺贝丹却吉坚赞代办商上事务。’允之。”又，光绪三年正月庚申条：“驻藏办事大臣松淮奏：‘达擦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一年期满，恳请赏给敕书。’得旨：‘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未经出世以前，所有商上事务著该达擦呼图克图敬谨掌办，并加恩赏给达善名号，俟前辈达赖喇嘛章禅赍送布彦（当是给十二世达赖喇嘛致送祭礼）时再行发给敕书。”

③ 格桑卓噶：《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中国藏学》1991年第2期。

这部传记时，热振活佛正在主持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事务，因此传记中特别突出了确定灵童出生的方向、在拉姆拉措湖观湖景，以及依照湖景显示的灵童家庭的情况寻访到僧俗大众共同信服的灵童而免予金瓶掣签的内容。这些记载应该是根据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当局的记录整理而成，但是内容详略的取舍可能结合了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进展和需要，实际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这些记载，对热振活佛主持的寻访认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亲政后不久，于藏历木猪年、清光绪三年（公元 1875 年）三月二十日早晨在布达拉宫圆寂，时年 20 岁。当天中午噶厦即向驻藏大臣报告，驻藏大臣希凯立刻赶往布达拉宫查看并祭奠，将朝廷赐给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玉册玉印、金册金印和图章等装匣封存，并命总堪布和噶伦等人确查达赖喇嘛死因，料理后事。在查明十二世达赖喇嘛确实是因病去世后，在当年四月二十八日向朝廷奏报，同年十一月光绪帝批准功德林·阿旺班丹（即济咙活佛）代办西藏事务，负责寻访认定达赖喇嘛世事。① 根据西藏僧俗尽快寻找灵童的要求，广做佛事祈祷达赖灵童早日转世。

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说：十二世达赖喇嘛是在布达拉宫的被称作尼沃噶丹朗色的东寝宫内面向东南圆寂的，当天夜里侍从们将达赖喇嘛的灵体面向正南方向，保持盘腿打坐的姿势停放，到早上发现灵体在无人移动的情况下自己转向东南方。以后又将灵体移至叫做尼沃参期康的寝宫内的殓尸亭内，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1843—1846 页。

在围起的尸盐中让灵体面向正南打坐，后来在搬开尸盐时发现灵体又自行朝向东南方。《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还说，当时在场的普布觉经师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及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其他近侍都多次看到这些情况。①

依照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的安排，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鼠年（公元 1876 年）三月，向前后藏和康区各地的官员、管事等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们传达寻访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命令，将各地新出生的具有灵异征兆的儿童上报。同时，噶厦又请乃穷和桑耶护法神的降神师降神，并请八世班禅等大活佛打卦占卜，据称降神和打卦占卜都显示：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如果出生在东南方，将大有益于西藏的佛教和众生。按照乃穷护法神之卜示，西藏地方政府将打箭炉（康定）以上凡属东方和东南方各远近地方均开列了地名，派专人前去寻找。当向护法神请示应该派谁去观湖为宜时，乃穷护法指示：可派拉萨上密院的堪苏（卸任堪布）洛桑达杰从拉萨往东南方曲科杰地方的拉姆拉措圣湖畔，念《十万般若颂》经，并前往观看圣湖显影，自然会明白。②

居堆堪苏洛桑达杰带着 40 多个随从僧人，从拉萨来到拉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34—35 叶。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是 1894 年圆寂的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的转世。普布觉活佛与热振活佛同属色拉寺杰扎仓，热振拉章和普布觉拉章关系密切，因此当热振活佛图丹坚白意希丹贝坚赞担任摄政时，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当是热振活佛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参见热振扎萨·江白降村（re sgreng dza sag 'jam dpal rgyal mtshan）《第五世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传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民族出版社，1995 年版。

② 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35—36 叶。格桑卓噶：《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中国藏学》1991 年第 2 期。

姆拉错湖附近，做了念诵《十万般若颂》的佛事。堪苏于佛事将要结束之前，独自来到湖畔观看湖中的“显影”。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说：当时正值（藏历）九月底，往常湖面早已结一层薄冰，而这次湖水还异常清澈，湖面上显现出一个东西两边相距较远的河谷，东部的上方田地重叠，东北面有一座较大的古塔，东南面有一较大的四方围墙，离此不远有一座大约三四层楼的房子。后来又在楼房和古塔之间看到连成一片的村庄。这之后因为寒冷，湖面上大部分水面自然结冰合拢。又看到南面的一角有不少骑马的人往东方走着，似乎又像往西走。上述佛塔、方砖墙及房子等，在冰上亦看得清楚。①

在观湖即将完成时，曲科杰地方的官员报告说，在曲科杰地区的塔布地方朗敦村的一个家庭，丈夫名叫贡嘎仁青，妻子名叫洛桑卓玛，于火鼠年（公元 1876 年）五月初五黎明时生下一男婴。据说在婴儿出生前发现了预兆：木猪年（公元 1875 年）七月三日，一个酥油包突然胀裂，酥油外溢，这象征着吉祥。另外，该年九月间，门前有几株梨树，其中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该地的男女百姓都看到了。这家人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帐篷。同时还报告了其他的征兆，如灵童母亲的梦兆等。② 于是居堆堪苏亲自前往朗敦地方，据说沿途的景物证实了他看到的圣母湖中的显影。堪苏洛桑达杰到朗敦家去，看见了当时才五个月的婴孩，当堪苏抱起他时，婴孩用手指摸着堪苏的额头和脸，当堪苏问婴孩：你想去拉萨吗？婴孩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37—38 叶。

② 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31—32 叶。

露出喜悦之情。后来堪苏说：我告辞了，不久再见。婴孩露出喜悦和要跟过来的样子。① 从这次初见灵童的情况看，这个灵童的许多“预兆”与占卜指示的情形完全相符。

居堆堪苏洛桑达杰返回拉萨后，报告了观湖及寻访的详细情况。以摄政济咙活佛及噶伦、基巧堪布为首的僧俗官员认为：为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各大活佛及四大护法神均打卦占卜和降神指示，尤其是主要护法神乃穷明确指出寻找灵童的方向、父母的名字、出生地的景物等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因此可以说是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灵童。灵童出生日期又逢良辰吉日，均极圆满。塔布朗敦出生之婴孩极其灵异，符合僧俗一致的意愿。噶厦随后又派近侍堪钦强秋朗卓和噶厦仲译拉旺罗布等二人再去核查，核查后的报告与堪苏洛桑达杰所说的完全一样。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以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已经有了认定朗敦的灵童的取向，但是从乾隆皇帝规定藏传佛教的大活佛转世要实行金瓶掣签以来，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都是经过金瓶掣签确定的，所以要确定朗敦的灵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真身，就必须考虑是让该灵童和其他两名幼童一起进入金瓶掣签，真正依凭其“灵异”来取得达赖喇嘛的地位，还是设法仿照认定九世达赖喇嘛的例子，请求朝廷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朗敦的灵童。

看来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等人是在努力争取清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他们一方面在官员僧俗集会的场合请乃穷护法降神，还请昌珠寺的仓巴护法神、桑耶护法神、噶哇东护法神降神，一致宣示朗敦的灵童是真正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同时由

---

① 普布觉活佛·洛桑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本，39叶。

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带头，八世班禅大师、甘丹赤巴等高僧大德打卦占卜，反复说明塔布朗敦出生的灵童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另一方面摄政等人对各地上报之其他灵童以不灵异或通过问卜方式全部否定，以此突出朗敦的灵童是惟一合乎条件的候选。按照噶厦政府原先发往全藏上下南北各宗之文告，各地已将灵异儿童陆续报来，据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称，所报的大部分小孩多系父母亲按各自的“梦兆”等上报，不可信服。其中征兆较好的有：距离拉萨1000里的东方，据达宗（边巴宗）宗堆报告，该地区边巴拉章属下有一户人家，父名拉旺达杰，母名平措白吉，于藏历木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一子。另外，在离拉萨以西2450里的地方，据阿里噶本和普兰宗本也呈报说普兰地区科恰乃曾地方父名仓巴江白丹增、母名次仁贡宗一家，于藏历火鼠年八月七日生一子。对报来的这两个“灵童”，经过打卦问卜，认为这两个灵童不适合入瓶掣签，摄政即将这两个灵童否定。①

在做好这两方面的铺垫之后，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向驻藏大臣递交了一份呈文，呈文详述了关于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父母名称、打卦问卜、观湖显景、上报查验等重要情况，指出有关灵童出生前后之梦兆、前兆、征兆等均极祥瑞。朗敦出生的灵童，经反复查验，全藏僧俗皆心悦诚服，一致确认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请求朝廷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并准予坐床。接着又以甘丹赤巴领衔，以各大活佛、格鲁派各大寺院的执事高僧、僧众、四个噶伦的名义

① 《济咙呼图克图为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致驻藏大臣松溎呈文》，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847—1848页。

写了公禀呈给驻藏大臣，请求免予金瓶掣签，认定朗敦出生的灵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争取驻藏大臣同意转奏，这份公禀在写作时费了很多心机。它首先肯定金瓶掣签已成定制，说“乾隆（五十）七年，乃穷护法神与额尔德尼班智达管家阿旺扎西相勾结，随心认定喀尔喀额尔德尼班智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之故，大皇帝特赐金瓶，置于拉萨。自此活佛转世之认定，均须金瓶掣签，将所寻灵童名签，置入其内，祝祷七日或九日，摇动抽签，已成定制。”接着又说：“嘉庆年间，八世达赖喇嘛之转世化身第九世达赖喇嘛，系西康邓科春科土司却江朗结之子，灵异非常，上奏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得以认定坐床。但因西藏佛教众生福分浅薄，年仅十一，遽然早逝。”本来，九世达赖喇嘛的夭折是嘉庆皇帝坚持在认定十世达赖喇嘛时必须实行金瓶掣签的重要理由，因此九世达赖喇嘛的免予金瓶掣签本来不能为请求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提供先例。但是公禀却煞费苦心地要从这里找出一条理由来，果然，公禀突然笔锋一转，又指出：“此后，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均着照圣旨金瓶掣签。不幸十世达赖喇嘛享年仅23，十一世也于世仅18岁，十二世又仅20岁圆寂。”这就是说，虽然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后短寿夭折，但是实行了金瓶掣签的三位达赖喇嘛的寿命也不长久，这就为请求恩准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摆脱了一个障碍。虽然公禀接着说：“究其缘由，概因卑等西藏众生福缘太浅，致使几代达赖喇嘛一一早逝”，先把原因归结到“西藏众生福缘太浅”上，但是接着又讲述历辈达赖喇嘛的享年情况后，说九世以前的达赖喇嘛除了四世和六世以外，“均享尽天年”。这就比较明显地表露出免予金瓶掣签达赖喇嘛有可能得享天年的意思，但是这话又不能说得太暴露，于是公禀返回来又说：“高宗纯皇帝赐

予金瓶，金瓶掣签系大皇帝之慈悲与神佛之谛语，本当灵验，然因时维浊世，西方众生福分浅薄，故先世达赖喇嘛多有早逝，甚为不幸。”在金瓶掣签本当灵验，但是也有可能不灵验等等假设的概念中转来转去之后，公禀还是归结到这次请求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主题上：“今寻得之灵童，生于达布朗敦，村后峨岭，其状如象，父名工噶仁青，灵童相貌不俗，虽年幼而言语举止超乎凡夫，无疑是分化人身之大菩萨怙主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曦轮晖晖，何能只手以遮；是非昭昭，何须徒生疑惑。故若能恩准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则实为施恩格外于西方佛教众生。众生必能宽慰，同享福乐。”为加强语气，公禀还从反面作了论述：“余下幼童，均无甚灵异之相，设若一并循例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人福浅命薄，难免阴错阳差，掣中凡童，致使僧俗笃信之达布朗敦灵童失掣，则无疑令僧俗人等遗憾不已，且有碍大体。利弊昭然，不言自明。”

为了使朝廷容易批准免予金瓶掣签，公禀还提出了一个由驻藏大臣和班禅、摄政等人“看验”灵童的办法：“为使主上大皇帝明察，驻藏大臣及摄政通善呼图克图等汉藏官员信服，拟将达布朗敦之灵童火速迎至拉萨近郊日甲桑木旦林寺，另将班禅额尔德尼亦迎请至拉萨。一则聚集汉藏官员，令灵童鉴认上世达赖喇嘛之本尊佛像及遗物等；再则着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如实呈报查访曲科甲聂堆、探明村落部族、双亲名讳、灵异征兆等情。待验无误，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即行坐床。敬请驻藏大臣迅即将此僧俗至诚公意、绝无反悔之念之

下情转奏主上大皇帝圣鉴。”① 实际上这一步骤在前几世达赖喇嘛的认定过程中已经存在，公禀在这里突出强调，也是在为驻藏大臣转奏和清朝朝廷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行动铺垫一个台阶而已，不过后来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时这个办法又被沿用过一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国力衰弱，清朝对西藏的政教事务的管理也有逐渐松弛之势。驻藏大臣松溎是1876年接任的，接任后就遇到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一件大事，在接到摄政济咙活佛·阿旺班丹的呈文和甘丹赤巴等人的公禀后，松溎于1877年5月11日向朝廷奏报，奏折中说：

奴才伏查，该呼图克图所称俱系实情，诚恐藏属福薄，以致以假惑真，而失众望。可否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便，据情直陈，谨将原禀切结灵异清单，译善妥协，送军机处，以备察核。此系因时制宜，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当时光绪皇帝新即位不久，朝政实际由慈禧太后掌控，6月29日驻藏大臣松溎就接到谕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② 也就是说清朝朝廷批准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的请求。

在得到朝廷批准后，1877年10月14日，按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之例，转世灵童被迎请到蔡贡塘寺，请二钦差驻

---

① 《阖藏大众请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金瓶掣签事公禀》，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850—1853页。

②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853—1854页。

藏大臣宣读圣旨。在蔡贡塘寺的日光寝殿，灵童面东而坐，其后有摄政济咙活佛、经师及僧俗大官员等，驻藏大臣宣读光绪帝的敕谕。宣读完毕，达赖喇嘛向东献哈达以谢皇帝之恩，并将献给皇帝的哈达请驻藏大臣转呈。僧俗官员向转世灵童献了贺礼。1878年正月11日，摄政和噶厦迎请八世班禅到蔡贡塘寺给转世灵童削发剃度，起名“杰尊阿旺罗桑土丹嘉措久扎旺秋雪勒南贝嘉瓦贝桑布”，简称土丹嘉措。正月11日，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摄政及各大活佛、僧俗官员等陪同下，从蔡贡塘寺出发，到拉萨河北面的日加桑丹林寺居住，按传统规定，灵童年龄达到四岁才能正式举行坐床典礼，所以灵童在该寺居住一年多，等候选定日期，举行坐床典礼。1879年2月，摄政济咙活佛向驻藏大臣报告，拟于藏历土兔年（公元1879年）6月13日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请转奏皇帝。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6月1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来到布达拉宫，先到三界殊胜殿，对乾隆皇帝的御像行三跪九叩礼，礼拜布达拉宫各主要佛像，然后进入日光殿，登上达赖喇嘛的宝座，接受僧俗官员的礼拜。6月14日卯时，在有寂圆满大殿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①] 从6月15日起的几天中，噶厦所属官员及拉萨三大寺、各教派之寺庙、活佛、各地百姓等均陆续前来庆贺。

清朝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仍然是当作一个特例来处理的，十年以后的1887年9月，在确定八世班禅的转世时，清朝仍然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殿乾隆皇帝的御像前实行

---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859页。

了金瓶掣签，从三个候选灵童中掣定了九世班禅曲吉尼玛。[①]

三、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时，七世班禅丹贝尼玛只有12岁。而七世班禅又比较长寿，到72岁时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正月十四日在扎什伦布寺的拉让内圆寂。因此在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世、十一世达赖喇嘛之后，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才遇到金瓶掣签的问题。在整个清代，只有八世班禅和九世班禅这两位班禅额尔德尼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一）对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金瓶掣签

七世班禅圆寂后，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集会念经祈祷七世班禅早日转世，同时派人前往拉萨向十一世达赖喇嘛、摄政活佛、驻藏大臣报告，请驻藏大臣转奏皇帝，并请十一世达赖喇嘛写一文告，通知全藏僧俗人民。同时扎什伦布寺在三大寺出资熬茶、放布施、诵经祈祷。[②]

在七世班禅圆寂将近三年时，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圆寂，这样在西藏形成了差不多同时寻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的特别的局面。

经过扎什伦布寺派人到各地寻访，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在前、后藏地区各找到了一名灵异儿童，由扎什伦

---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967—1971页。

②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布寺派七世班禅的森本堪布南杰群培前往拉萨向驻藏大臣报告，由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即向咸丰帝写了奏折：

谨将扎什伦布色呼本诺门罕郎结曲批禀报访获幼子二名灵异情形，摘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后藏属坠仓地方，番民丹增汪结、夷妇名扎喜拉姆二人，于咸丰五年八月初八日所生幼子一名拉木结汪堆嘉木参。前后所得灵异事迹，据该番民丹增汪结供称：咸丰三年班禅圆寂之后，小的之兄伊喜夺结，有一日晚上半夜过后之时做了一梦，梦见得班禅佛爷仍旧原样在于床上坐着，我前去朝见佛爷，当蒙佛爷赏给我哈达一方、银瓶一个，上画金字八宝，似觉内贮有水，我心中喜之不尽，当将此瓶装入怀中，即赴偏僻地方观看，将瓶颠倒拿出，有炒熟青稞，其时已醒。又于咸丰四年，未知何月何日，有一半夜做了一梦，耳听得铙钵声音，众人前去观看，小的亦即往视，见得干殿饶结寺迤北有一山坡，坡上喇嘛均各手持执事，向这边前来，内中执有三层大黄伞一把，伞底之下又有一小伞，系贴金五佛冠之样，似觉微微摇动，还有击鼓之声，觉得班禅亦在其内，即向坠仓家下有一房圈名彭岭楼上阴处设有大垫一个，上坐班禅之样，即时醒了，心中实在喜欢。又有幼子之父丹增汪结做了一梦，梦得有一白人，身穿盔甲，头戴黄帽，就在自居房顶之上插了白旗一杆，家内设有大床一架，上放有海螺一个，交与我吹，我说吹不来，他说这个海螺系象牙做的，比不得别样。等语。我就把海螺口上打扫洁净，吹了一下，声音实在好听。又于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早，看见西边山上出有五色霞光，一直落于坠仓家下，有邻居番民白哲观见。又于四年秋间，有一日早晨，现出五色霞光，一边照着玛尼拉康庙宇，一边照着坠仓之家，随后五色霞光成为一股白光，有该处寺院喇嘛丹巴仓珠及尼玛

夺结二人看见是实。次日向着众人言知，有些人言此光未知吉凶，即在免日寺内堪布处算卦，算得实系吉祥，不是凶兆。此幼子系于咸丰五年八月初八日天明时有，幼子之母无疾，降生生下时系白皮包身。是日一早又有一股白光照在坠仓院内，满屋发亮，当叫三柱康萨番民看视，次日又向铸造佛尊之人说了一遍。是日又出了三次霞光，照着坠仓家下，人人看见。后第三日，有番民扛江尼玛顿柱、策忍顿柱二人看见二股白光，连着两边均系五色，惟居中一股系白的，自初八日起至初十日止，连日出有五色霞光，该处番民以及干殿饶结寺内喇嘛群集眼见是实。又于咸丰四年内，该处孩子自攒附近孩子等，在于坠仓院内连日欢声鼓舞。又于五年，有孩子二人赴噶择柳林中采花，当时采得大菊花一朵，其根发出五枝，五枝上又加五枝，颠上发出此花，颜色鲜红，当时就问众人可曾见过此花否，众人言说不但未见此花，而自古未闻，实在奇异。又该处所栽柏杨树多半已焦，自从那年起从新开发，较前茂盛，人人觋见。随后飞来白画眉两个，系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飞在坠仓柳林内，有番民丹桑及邻居番民四朗顿柱等看见，向着小的说前去觋看，真有此鸟。又于十二月十二日复飞前来，在于鲁顶林内住宿三日，人所共知。以上情节均系实在情形，并无虚捏。为此小的坠仓番民丹增汪结及阖家人等出具亲供切结是实。并据坠仓附近僧俗人等公同结称，亦与前情无异。由该色呼本诺门罕核实具报前来。

一、前藏属霞克巴地方东科尔名第巴策旺觉结、夷妇名策忍央金二人，于咸丰四年九月二十日所生幼子一名倾批觉尔结。所得灵异事迹，据该夷妇策忍央金供称：小番妇自从前至如今，在于殴定寺内坐静，于咸丰四年八月内仍在原寺内坐静，于九月二十日生有一子，自从怀孕起，至生幼子之日止，

间或做梦，梦见人身牛头底下所穿虎皮围裙。产生此子之日，有使唤小妇拉木结策忍央宗夺结策旺纵巴等言，说天上出有五色霞光。实系真情，并无虚捏等弊。为此小番妇及阖家人等出具亲供切结是实。并据该处邻佑使役等结称，亦与前情无异。由该色呼本诺门罕查实具报前来。①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说："当时共在后藏找到了三个灵童，由扎什伦布寺派苏本堪布巴丹西热前往拉萨向驻藏大臣报告，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即向清文宗写了奏折。""本来找到七世班禅'转世'的'灵童'是三名，但其中的一个'灵童'的父母临时决定不参加'金瓶掣签'，因此只剩下了两名。"② 从档案看，驻藏大臣上报的就是两名，而不是三名，因此即使有一个灵童的父母临时决定不参加金瓶掣签，也应是在驻藏大臣奏报皇帝之前，在驻藏大臣上报之后，按常理应该是不能临时退出的。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十二月二十日，咸丰帝"谕内阁：赫特贺等奏，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现访得灵秀二童等语。七世班禅涅槃将及四载，今据赫特贺等奏称访得知觉异常灵妙二童，实属祥瑞，朕心快悦。著照所奏，即照定例将此二童之名入于金瓶内，唪经敬谨掣签，以定呼毕勒罕。俟掣定后由驿驰奏"③。

在接到皇帝的谕旨后，驻藏大臣满庆和帮办大臣赫特贺即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942—1944页。

②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页。

③ 《谕内阁班禅转世灵童现访得二名著准掣签以定呼毕勒罕》，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944页。

通知扎什伦布寺，命令他们将找到的“灵童”连同他们的父母一同带来拉萨，以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述金瓶掣签的情形说：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八月初四日，托布加谿卡的丹增旺杰夫妇带了他们的小孩，还有一个拭古夏白夫妇也带了他们的小孩，一同到达拉萨。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英萨诺门罕、前世班禅的苏本、森本、却本等三大堪布，还有扎寺僧俗官员数百人，也同时到达拉萨，以便参加金瓶掣签仪式。

金瓶掣签仪式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举行。按法定手续，将两个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投入金瓶，然后由扎寺来的喇嘛和三大寺的喇嘛若干人，念了金瓶经七天。九月二十四日，为掣签之日，摄政、噶伦等僧俗官员齐集布达拉宫，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满庆、赫特贺亲自主持，开瓶掣签，掣出的是托布加谿卡丹增旺杰的孩子的名字，就被认定为八世班禅。按过去旧例，由扎什伦布寺派卓尼一人，穿白衣、骑上白马，前往中签灵童在拉萨的住所（功德林拉让）向他本人及其父母报告喜讯，同时派人前往扎什伦布寺，向全寺僧众报告掣签的结果。为此，噶厦专门举行了一次噶卓，庆祝八世班禅掣签手续圆满完成。噶卓完毕，即将八世班禅由功德林拉让移到罗布林卡居住。次日，由摄政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担任堪布，给八世班禅剪了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曲结札巴丹白旺秋巴桑布（简称丹白旺修）。九月二十九日，八世班禅丹白旺秋由扎什伦布寺的数百僧俗官员护送，离开拉萨，摄政和全体噶伦均在坚赞鲁顶地方搭了帐篷欢送。扎寺僧俗官员决定，八世班禅先住

在仁布宗所属的强均寺[1] 内，以便选择吉日，迎接到扎什伦布寺举行坐床典礼。[2]

对于八世班禅掣签一事，《清实录》中记载：

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十二月十九日，又谕：赫特贺等奏详查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所遣幼子等签掣定拟奏闻一折。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等亲往布达拉山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本诺门罕，率僧俗人等唪经，由金瓶内掣出番民丹择旺结之子拉木结旺堆嘉木参之名签，拟定为呼毕勒罕。是日天气清和，诸事祥瑞，阖藏僧俗人等皆大欢喜。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按经理称为罗布藏班第衍垂济扎克巴丹贝旺序。实为祥瑞之事，朕心实深嘉悦。著赏给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幅、珊瑚数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哈达一幅、嵌玉如意一柄；色呼本诺门罕哈达一幅、嵌玉如意一柄，交该大臣等转行晓谕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及阖藏喇嘛，著该呼毕勒罕妥为护持，以副朕广兴黄教之至意。[3]

可见对班禅额尔德尼的金瓶掣签和对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一样，是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殿的皇帝牌位前举行的，而不是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的。八世班禅金瓶掣签后，在绛钦寺等待坐床等了三年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正是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后期，军务繁忙，加上英法

① 强均寺亦译绛钦寺，在今日喀则专区仁布县，明代仁蚌巴家族所建，距八世班禅家乡南木林县托卜加竹仓村不远。

②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3—184 页。

③ 《谕内阁认定已掣得拉木结旺堆嘉木参为班禅呼毕勒罕著即颁赏》，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1944—1945 页。

两国制造事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在1860年七八月间打到天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朝正处在国运艰难的多事之秋，二是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前后转世，清朝有意安排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差不多同时坐床，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十二世达赖喇嘛坐床后，清廷安排十月初二日为八世班禅坐床典礼之日。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述说：

当时摄政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热振活佛）和驻藏帮办大臣恩庆前来扎什伦布寺主持，咸丰帝派理藩院司员二人，前来扎什伦布寺，赍送敕书、赏品等件。也赏赐白银一万两，作为坐床经费。当时八世班禅年满五岁，已到了受沙弥戒的年龄。清文宗“又谕内阁：……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现届坐床，又值受戒之期，达赖喇嘛尚属年幼，未能前往。前班禅额尔德尼披剃更取法名时，经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前往办理，甚属吉祥。仍著派令前往扎什伦布照料坐床、受戒，以示朕振兴黄教至意。”

十月初三日，为八世班禅举行坐床大典并受沙弥戒的吉日，扎寺全体僧俗官员齐赴八世班禅到日喀则后的住所贡觉林夏宫，迎请八世班禅赴扎什伦布寺，坐床大典在扎什伦布寺一世达赖喇嘛兴建的坚赞彤波寝宫的日光殿上举行，摄政、驻藏帮办大臣、噶伦以及扎寺全体僧俗官员共千余人参加了坐床典礼。八世班禅在未登宝座之前，先面向东方，跪听宣读咸丰皇帝的诏书，接受了清朝皇帝的敕书及礼品等，然后向东方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向皇帝表示谢恩。礼毕，才登上宝座，接受了摄政、驻藏帮办大臣、噶伦以及扎寺僧俗官员献的哈达和礼品。随后扎什伦布寺即在日光殿上举行了盛大宴会和歌舞表演，表示祝贺。十月初七日，为八世班禅受沙弥戒之日。受戒

仪式在扎寺大经堂内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由摄政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担任授戒堪布，一切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圆满完成。①

关于八世班禅的金瓶掣签的情形，在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九月驻藏大臣文硕的奏折中说：

咸丰三年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访获出呼毕勒罕，经前任大臣赫特贺、满庆于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具奏，十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准军机大臣附报匣知会内开，九月初一日奉清字上谕：赫特贺等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慧幼子请旨一折，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将及四载，兹据赫特贺等奏称，访获灵敏幼子二人，聪慧异常，诚为吉祥佳事，览之深慰朕念，著准如所请，照定例将此幼子二人之名入于奔巴金瓶，虔诵经典，敬谨签掣，定为呼毕勒罕。俟掣定后，著即驰驿奏闻。钦此。遵于十月二十三日，率同前办理商上事务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在布达拉供奉圣容前讽经掣瓶，掣得番民丹增汪结之子拉木结汪堆甲木呼。经该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代达赖喇嘛遵佛典取法名曰罗布藏班垫吹吉扎克巴丹贝汪曲。复经奏闻，于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赫特贺等奏，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幼子出世，著实验看掣定奏闻一折。本年十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等亲身前往布达拉山，会同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色呼本诺门罕朗结曲丕，率领众喇嘛僧俗人等念经，由奔巴金瓶将番民丹增汪结之子拉木结汪堆甲木呼之名掣出，定为呼毕勒罕。是日天朗气清，诸事吉祥，卫藏众僧俗人等均皆不胜欢感。呼征阿齐图呼

---

①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186页。

图克图等遵依经典，取名罗布藏班垫吹吉扎克巴丹贝汪曲，诚为吉祥美事，朕心深为欣悦，著加恩赏给该呼毕勒罕大哈达一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色呼本诺门罕哈达一方、嵌玉如意一柄，著交该大臣转发呼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等承领。再，晓谕卫藏众喇嘛等，将呼毕勒罕妥为照料，以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钦此。钦遵在案。①

（二）对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金瓶掣签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八世班禅在患病几年以后，于藏历七月十五日在家乡托卜加圆寂，只活了27岁。八世班禅圆寂时，在他身边只有他的索本、森本、却本三大堪布，他们立即派人前往扎什伦布寺，向寺院的扎萨克喇嘛报告了八世班禅逝世的经过。扎萨克喇嘛立即率领扎什伦布的僧俗官员数百人前往托卜加，用黄轿把八世班禅的遗体运回扎什伦布寺，经过防腐处理以后，供奉在神堂里面，供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僧人与各宗豁的百姓前往祭悼。扎什伦布寺并派人到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摄政和驻藏大臣报告八世班禅圆寂的情况，请驻藏大臣向皇帝转奏。又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了一篇祈愿八世班禅早日转世的文告。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圆寂后，扎什伦布寺派出多人，四出找寻八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九世班禅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乳名叫仓珠嘉措，系前藏塔布地区噶夏村人，生于藏历十五饶迥水羊年（清光绪九年，1883

---

① 《文硕奏为访获班禅转世灵童请旨掣定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968—1969页。

年）正月十二日。他没有父亲[1]，母名当琼措姆，是一个哑巴。他的家庭非常贫穷，母亲给贵族放牧牛羊。九世班禅是在他外祖父家中长大的。九世班禅还有一个弟弟，后来出家当了喇嘛。[2] 九世班禅被认定后，他的母亲也出家当了尼姑。在确定三名候选人以后，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向驻藏大臣请求转奏皇帝批准举行金瓶掣签。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上奏折说：

奴才文硕跪奏，为据报访获班禅额尔德尼出世之呼毕勒罕，共有灵异幼子三人，循例恭折奏闻事。奴才先据后藏总管扎什伦布事务札萨克喇嘛苏呼诺门罕罗布藏顿柱，以访获班禅额尔德尼出世之呼毕勒罕敏悟幼子三人缕述吉祥瑞兆灵异情形，呈请具奏。等因。译看原呈，大指谓，自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遵照遗言所指方向留心寻访，务求灵异有征、端庄智慧者，方敢记取；其有稍不信心者，即不敢以滥竽充数。兹在后藏所属之托布甲热浪地方，访有番民顿柱宇结、番妇白玛竹马于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得一子，取名顿宇缴甚；又在琼科尔结所属达布仲巴地方，访有腔子期美汪波之女阿杼于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生得一子，取名仑珠甲措；又在墨竹宫所属纳木地方，访有降护法番僧丹增汪堆宇结、番妇宜玛布池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生得一子，取名丹增坚参。此三幼子屡经试验，均能辨认前辈班禅额尔德尼所奉佛尊及素用念珠等件，委实灵异有征，卜之达赖喇嘛及各寺院，亦皆佥

[1] 一说九世班禅的父名达贞，下落不详。当是九世班禅的父亲在生了两个儿子以后离家出走。

[2] 后来成为策觉林呼图克图。见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从文硕的奏折中说九世班禅的外祖父是“腔子期美汪波”看，他是在寺院的管事僧人强佐（即商卓特巴），应当是先娶妻成家，后出家为僧，并升任强佐，是有一定地位的僧人。

同无异。用谨开具灵异事实，呈请循例核办。等因。奴才见所叙托布甲热浪地方顿宇缴尕事实内，稍涉附会之疑，复行代办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并饬该苏呼诺门罕罗布藏顿柱确切复查据实申报去后。兹据该呼图克图诺门罕等先后申复，查得原报幼子内，顿宇缴尕一名，委实吉祥有兆，非敢附会其词，倘有捏饰，情甘重罪。等情。结报前来。今第八辈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现据前藏第穆呼图克图、后藏苏呼诺门罕呈报，访获出世灵异幼子三名，既据结称，委实吉祥有兆，试验足凭，理合循例奏闻。其应行面试、讽经、掣瓶等事，一俟钦奉谕旨后，由奴才督同代办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遵例办理。为此奏闻。谨奏。①

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十二月，文硕接到皇帝的批示："文硕奏访获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聪颖幼童三名请旨一折。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将及五载，今据文硕奏称访获聪慧异常灵异幼子三名，诚为吉祥好事，览奏朕心欣悦。著照所奏，循例将此三幼子名目入于金瓶，诵经敬谨签掣，定为呼毕勒罕。掣定后由驿奏闻。钦此。"驻藏大臣文硕即命扎什伦布寺将寻获的三个"灵童"都送到拉萨，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 年）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文硕奏报掣签的经过说：

自正月初九日起，由达赖喇嘛董率众僧诵经七日；初十日，奴才率同第穆胡图克图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验看得访获幼子三名，虽年皆童稚，而端庄凝重，迥异常人；十五日午

① 《文硕奏为访获班禅转世灵童请旨掣定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1968—1969 页。

刻，奴才率同随印司员理藩院员外郎裕钢，恭诣布达拉山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礼，缮签入瓶，诵经祈祷，一切如仪。既而奴才跪向金瓶，掣得原报琼科尔结所属达布地方幼子仑珠甲措，母名阿杼，是为仲巴腔子期美汪波之甥孙。奴才当将掣出名签遍示达赖喇嘛、第穆胡图克图以及苏呼诺门罕并各执事番官喇嘛人等，仍将其余顿宇缴尽、丹增坚参二签拆封传看。其时，自达赖喇嘛以下僧俗诸人莫不欢欣鼓舞，感戴鸿慈，将该幼子仑珠甲措定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达赖喇嘛即于十六日申刻，按依佛典，为该呼毕勒罕披剃，取法名曰罗布藏吐卜丹取吉宜玛格勒克纳木结。①

金瓶掣签认定九世班禅之后，扎什伦布寺派来拉萨的僧俗官员将曲吉尼玛迎回扎什伦布寺，住在贡觉林夏宫，以便选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

光绪十八年（公元 1892 年）正月初三日，为举行九世班禅坐床典礼之日，清朝政府特派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到扎什伦布寺主持，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也前来致贺。因为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己还没有受比丘戒，还没有给九世班禅传授沙弥戒的资格，所以在坐床大典举行以后，由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担任授戒堪布，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升泰奏报九世班禅坐床的情形说：

奴才升泰跪奏，为奴才遵旨看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礼成，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奴才准户部咨开，内阁钞出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于明年正月初三日坐床，著派升泰会同苏呼诺门罕前往看

① 《文硕奏班禅转世灵童已经掣定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1970—1971 页。

视。所有颁给敕书、赏赉等件，著由驿驰递，其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并著刘秉璋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派员迅速解往，一并赏给班禅额尔德尼祇领。钦此。当经恭录札知扎萨克喇嘛钦遵去后。即于本年正月初三日，率领第穆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等，将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由广佑寺奉迎扎什伦布山，奴才照例先期拣派文武员弁，会同番兵，一体照护。是日该呼毕勒罕出寺，复派汉番弁兵列队相迓，直至扎什伦布山下，复由奴才恭录谕旨安放黄亭内，是日亲往送赴山上。该呼毕勒罕到时，随同敬诣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行三跪九叩礼毕，随至大殿内，饬令委笔帖式等敬谨宣读谕旨，该呼毕勒罕望阙叩谢天恩，随即饬令扶持升床。奴才复与互换哈达贺喜，僧俗大众挨次行礼，该呼毕勒罕率同僧众敬诵吉祥经典毕，例设筵宴，坐床礼成。时值天朗气清，诸事吉祥。坐床后，奴才宣示朝廷德意。该呼毕勒罕神采隐秀，心性莹通，酬对始终均无失礼，年未一旬，而有成人之度。阖藏僧俗及汉番蒙古来朝佛瞻礼者，无不欢欣鼓舞，共诧神奇。除俟敕书、恩赏银两等件颁发到日，再由奴才转交该班禅额尔德尼祇领，另折代谢天恩外，所有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坐床礼成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①

九世班禅金瓶掣签和坐床的时期，正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我国西藏边境的时期，文硕、升泰在处理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的繁杂事务的间歇，仍按定制主持九世班禅的掣签和坐床等，执行金瓶掣签制度规定的驻藏大臣的职责，显示了清朝朝野上下对金瓶掣签制度的高度重视和坚持。

① 《升泰奏看视九世班禅坐床典礼成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1978—1979页。

四、其他活佛转世系统的金瓶掣签

除了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以外，金瓶掣签制度建立以后，对西藏的摄政活佛和各个教派的主要转世活佛也实行金瓶掣签。由于资料散失，现在难以找到这方面的系统记载，只能就现有的资料作一综合叙述。

实际上，西藏的呼图克图中最早实行金瓶掣签的是昌都强巴林寺的寺主活佛帕巴拉活佛。就在乾隆皇帝退位做太上皇、嘉庆皇帝新即位的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就在拉萨用金瓶掣签确定了第八世帕巴拉活佛洛桑晋美丹贝尼玛。本来，乾隆皇帝和福康安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时，曾经讨论过因为昌都距拉萨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考虑让昌都地区的呼图克图转世时仍按旧例办理。记载当时君臣讨论的情况的奏折说：

臣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成德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钦奉谕旨，前因吹忠降神作法，其事近于荒唐，业经降旨令福康安等试验，如其法不灵，即可向众晓谕永行禁止。嗣后应出呼毕勒罕时，在所生幼孩内择其稍能有符验智慧数人，于发去签上书其姓名，贮入金本巴瓶内，公同拈定。察木多等处呼图克图所出之呼毕勒罕，仍令其徒众寻觅，所办亦未允协。现在蒙古内外扎萨克供奉之呼毕勒罕，已于雍和宫所贮金本巴瓶内签掣，察木多等处竟应送交驻藏大臣，一体公同签掣。等因。钦此。又奉谕旨：昨据福康安等奏，察木多、类乌齐所出之呼毕勒罕，应仍令其徒众自行寻觅一节，朕思察木多等处系属番地，与蒙古各扎萨克不同，该处至前藏3000余里，距成都亦属遥远，驻藏大臣与四川总督皆属鞭长莫及，福康安等察看情形，如能遵照昨降谕旨，固属甚

善；若有碍难办理之处，即仍其旧，以免更张而从方俗，究亦不致为大弊，有害国政，亦无不可。等因。钦此。

又奉谕旨：察木多、类乌齐所出之呼毕勒罕，福康安等前请仍令伊徒众自行寻觅，所想亦是，总在福康安等因地制宜，不必稍存迁就。或者问彼处众情，如藏中办理，情愿与否亦可，总不必勉强滋事也。等因。钦此。至察木多、类乌齐等处各呼图克图所出之呼毕勒罕，因该处距藏3000余里，向来并不送至前藏，亦不由吹忠指认，俱系伊等徒众在附近地方自行寻觅。窃思该处呼图克图，本非达赖喇嘛等可比，诚如圣谕，察木多等处番地与蒙古各扎萨克不同，若将所出之呼毕勒罕皆强令远送至藏，恐非番情所愿。臣等公同筹议，体察情形，如各该处闻藏中现有钦颁金本巴瓶，将所出之呼毕勒罕送至前藏签掣，原所不禁。倘不欲远送到藏签掣者，似应仍循其旧（朱批：是）免致更张。如此办理，庶番众均各相安，亦不致有关政务。所有遵旨酌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①

乾隆皇帝和福康安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昌都地区的寺院自愿到拉萨去金瓶掣签，清朝不禁止，如果因交通困难不愿到拉萨掣签，允许其“仍循其旧”。看来昌都的寺院对于实行金瓶掣签是积极拥护的，所以在金瓶掣签制度刚刚设立，卫藏地区还没有活佛进行过金瓶掣签的时候，就将八世帕巴拉活佛转世的候选幼童送到拉萨实行金瓶掣签，这也是现在见到的在乾隆皇帝在世时对西藏的重要活佛实施金瓶掣签的惟一实例。记载

① 《福康安等复奏仍以吹忠指认呼毕勒罕及察木多等处寻觅呼毕勒罕仍循其旧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册，第813—814页。

这次金瓶掣签的资料有嘉庆帝的上谕和驻藏大臣松筠及和宁的奏折：

嘉庆元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松筠等奏，为掣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将访出三子之名书签入奔巴瓶讽经掣出理塘地方番民玉勒杰之子。等情。此乃善事，朕心大悦。达赖喇嘛呼其名为罗卜藏吉克米特班丹达木拜尼玛，亦属吉祥，即命罗卜藏吉克米特班丹达木拜尼玛为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赏给俐玛无量寿佛一尊、塔一座、经一套、大哈达一方、玉如意一柄、杵铃一份、念珠一串、蟒缎一匹、锦缎一匹、妆缎一匹、黄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赍往，松筠等俟其祇领，当即赏与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仍行晓谕其沙弥、卓尼尔等，侍奉呼毕勒罕勤习经典。钦此。

奴才松筠、和宁谨奏，为察木多帕克巴拉呼毕勒罕等叩谢天恩，代为转奏事。适据管理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印务锡瓦拉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沙弥等呈称：仰承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之恩，金瓶掣定我帕克巴拉呼毕勒罕，已极荣幸，今又蒙赏福运哈达、无量寿佛、如意、斋食等物，诚系宠恩优渥，察木多所有黄黑人等，同庆感戴。我锡瓦拉唯当率众喇嘛，时时讽诵无量寿经，祝祷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万万寿，以期还报于万一。至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所赏佛尊等物，已皆交付呼毕勒罕。而今呼毕勒罕及锡瓦拉、商卓特巴、卓尼尔等，一同谨备叩谢天恩哈达、佛尊，请代为恭进。等因。呈文前来。是故，将呼毕勒罕等所献吉祥哈达三方、俐玛佛三尊，另行装匣，恭呈御览。伏

乞圣上明鉴。①

在昌都强巴林寺和帕巴拉活佛的带动下，在清代，类乌齐、察雅等昌都地区的主要活佛转世都到拉萨进行金瓶掣签，并没有出现乾隆皇帝和福康安当初所料想的阻力。

现在见到的记载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外的西藏主要活佛实行金瓶掣签的情况的资料还有：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掣签决定第二世策觉林活佛。

《和宁等奏八世达赖喇嘛遵旨为班智达伊师伊希嘉木散觅得转世灵童三名由金瓶掣签折》："奴才和宁、英善谨奏，为遵旨具奏事。嘉庆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据和宁等代奏称，达赖喇嘛恳请掣定其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等情。此乃好事，著恩准达赖喇嘛之请，令伊派人访寻，具奏后入金瓶掣签，以为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仍住崇寿寺管束众喇嘛，以示朕推兴黄教之至意。钦此。钦遵前来。奴才等当即咨谕达赖喇嘛讫。兹据达赖喇嘛咨文内称：小僧谨遵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慈旨，当即派人访觅我师呼毕勒罕，现觅得后藏地方番子巴再策旺那木杰之子策凌朗杰、江孜地方番子恰多尔之子彭措朗杰、达朗地方番子萨奎旺杰之子扎西旺杰等三名。请大臣等代为奏闻文殊菩萨大圣皇帝，入金奔巴瓶，掣出者即为小僧之师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等因具呈前来。奴才等查得，达赖喇嘛之师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乃蒙皇上格外加恩初次掣定呼毕勒罕者。现既觅得三子，将此入雍和宫所供金奔巴瓶掣签，或入藏地所供金奔巴瓶掣签之处，

① 《谕认定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松筠等代奏察木多帕克巴拉呼毕勒罕并众僧为认定并赏赐事谢恩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40—2141页。

俟降旨后，奴才等谨遵办理。为此谨奏请旨。”《和宁等奏遵旨掣定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并达赖喇嘛等谢恩折单》：“奴才和宁、英善谨奏，为奏闻业经遵旨掣定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情形事。奉上谕：藏地亦设有金奔巴瓶，且又曾在彼掣定呼毕勒罕，相应将此次觅得策凌朗杰等三名幼子之名交付和宁等，仍照先前办理之例，将名签入藏地所供金瓶，念经掣定一名，作为达赖喇嘛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之呼毕勒罕。钦此。钦遵前来。奴才等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偕同达赖喇嘛、济咙呼图克图，召集精通经法堪布喇嘛等，在布达拉所供高宗纯皇帝圣像前念经，将觅得后藏地方番民巴再策旺纳木杰之子策凌朗杰、江孜地方番民恰多尔之子彭措朗杰、达朗地方番民萨奎旺杰之子扎西旺杰之名签，奴才和宁装入瓶内，时辰到，奴才英善谨从金瓶抽出后藏番民巴再策旺纳木杰之子策凌朗杰。达赖喇嘛极为欣悦，立地合掌，告奴才等称：此皆出自文殊菩萨大圣皇帝悯爱小僧，益加振兴西土黄教之厚恩至意。嗣后小僧但为文殊菩萨大圣皇帝金莲座永久巩固，随时诵念无量寿经祈祷，仰报圣恩。兹小僧谨叩谢文殊菩萨大圣皇帝之恩，敬备吉祥哈达一方、俐玛佛一尊，请大臣等代为进呈。等语。遂将哈达、佛尊交付奴才等。是故，奴才等将达赖喇嘛叩谢天恩哈达、佛尊另行装匣恭进外，谨将遵旨掣定达赖喇嘛之师傅班智达伊希嘉木散呼毕勒罕情形，恭折奏闻。”①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掣签决定九世济咙（功德林）活佛。

---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42—2143页。

《瑚图礼等奏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折》："奴才瑚图礼、祥保谨奏，为奏闻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情形事。窃查得乾隆五十七年奉上谕：兹颁发金奔巴瓶一只，供于西藏大昭寺，嗣后凡逢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勒丹锡哷图、第穆、章嘉、济咙等持京印大呼图克图及西藏所有上等呼图克图等圆寂，其呼毕勒罕转世，概免拉穆吹忠作法，由驻藏办事大臣等会同协理呼图克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将出世呼毕勒罕姓名，各写一签，贮于金本巴瓶内，供于佛前，召集熟习经典喇嘛，虔诚诵经祈祷，共同验视，由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亲自从瓶内拈出一签，确定呼毕勒罕。钦此。钦遵在案。兹据第穆呼图克图咨称：据济咙呼图克图下扎萨克喇嘛呈称，小僧等在此两年，一直访寻我等之师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兹访得喀木地方番民卓勒木加布之子拉杰勒，番民固木布杰之子喇布丹，年皆三岁，观其相貌，俱似我等之师济咙呼图克图，各显吉兆。等因具呈。请贮入金本巴瓶掣定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因前来。经复查，与前奉谕旨相符，奴才等谨遵上谕，即于九月十六日赴布达拉，会同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第穆呼图克图验视，将访得二幼子姓名，各写一签，奴才祥保敬贮入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率众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等讽宗喀巴经，迨及典成，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谨从金瓶拈出喀木地方番民卓勒木加布之子拉杰勒。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欣喜无比，当即遵照经典，为济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取名阿旺罗布藏丹悲嘉木参。继而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下扎萨克喇嘛等各献叩谢天恩哈达一方、佛一尊，各自具呈前来。是故，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等所献哈达、佛尊之匣，分别贴签，复行加封进呈外，奴才等业已

咨报理藩院。为此谨具奏闻。”①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掣签决定昌都察雅烟多寺七世察雅活佛

《满庆等奏掣定乍丫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奴才满庆、恩庆跪奏，为掣定乍丫呼图克图，恭折奏闻事。窃据达赖喇嘛咨称：乍丫呼图克图之徒众呈报，小僧等经此数年前往各处地方求访我们师傅，今在西藏宇乡地方访得番民策垫欧柱之子名洛桑朗结策忍一名，又在札序地方访得番民吐多卜云垫之子名尼玛结布一名，俱年三岁。观其形象，俱似我们师傅一样，皆各有吉祥应兆，恳为乍丫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等语。咨报前来。奴才等即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赴布达拉寺，会同达赖喇嘛，率领僧俗人等，将此二子名目书定二签，众僧于时讽经诵祷。奴才恩庆敬谨奉签入瓶，迨各僧虔诵经成后，奴才满庆跪于瓶前启掣，谨将宇乡番民策垫欧柱之子洛桑朗结策忍掣出，定为乍丫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兹经达赖喇嘛遵照经典，取名阿旺隆多丹贝坚参，定为法名。当即奴才等札行该徒众等遵照讫。理合缮折奏闻，伏祈圣鉴。为此谨奏。”②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掣签决定昌都强巴林寺六世锡瓦拉活佛

《景纹等奏掣定察木多锡瓦拉呼图克图折》：“奴才景纹、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49—2150页。

②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72页。

恩庆跪奏，为掣定察木多锡瓦拉呼图克图，恭折奏闻事。窃适据达赖喇嘛咨称：察木多呼图克图之徒众呈报，小僧等连年趋赴各处地方访求我们师傅，今在乍丫之旺卡地方访得番民该桑之子名札喜丹增一名，又在噶斯地方访得番民柱玛棍之子名披充养摆一名，俱年二岁。观其相貌，与我们师傅俱是一样，诞生之际，皆各有吉祥应兆。恳为转请驻藏大人们俯准，由金瓶签掣一名，以凭遵定。等语。具信字呈报前来。奴才等即于本年八月初六日赴大招，会同诺门罕，将此二幼子名目分书二签，众僧于时讽经祝祷，奴才恩庆敬谨奉签入瓶，追讽经典成，奴才满庆跪自瓶内谨将噶斯番民柱玛棍之子披充养摆掣出，定为锡瓦拉呼毕勒罕。兹据达赖喇嘛遵依经典，更名阿旺济克美青饶丹增称勒，定为法名。当即奴才等札饬该徒众等知悉遵照讫。是以理合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①

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掣签决定三世德柱活佛

二世德柱活佛曾经担任过十一世达赖喇嘛和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被封为诺门罕，成为呼图克图，因此对于他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德柱活佛成为有资格担任摄政的转世活佛。此次金瓶掣签的记载有：

《松淮奏遵旨掣定诺门罕罗布藏青饶汪曲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奴才松淮跪奏，为圆寂诺门罕呼图克图罗布藏青饶汪曲转世之呼毕勒罕幼子，遵旨掣定，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兹据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禀称：前充协理商上事务诺门罕罗布藏青饶汪曲，于同治元年因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2172—2173 页。

剿办瞻逆案内，仰蒙大皇帝加恩赏加呼图克图名号，并准接辈转世承袭，嗣于十一年九月圆寂。该呼图克图深通经典，实系黄教众僧正主，当即遵旨饬查转世幼子，降生何方。兹据报称，错拉营官属下扪地方番民桑噶娃、番妇白玛纵巴二人，于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得生一子，名罗布藏汪曲甲错，又藏属栋喀地方番目汪堆夺吉、番妇拉木策忍二人，于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得生一子，名罗布藏丹贝汪曲。查此二子，俱有灵异，必系真正呼毕勒罕，恳请照例掣定，据情代奏。等因前来。奴才伏查无异，即令虔心讽经，于四月十二日亲赴布达拉山，恭谒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虔诚默祷，会同济咙呼图克图，眼同大众缮妥清字、唐古忒字名签二只缄封，放入金奔巴瓶内，供奉黄案。焚香礼毕，该呼图克图率众讽经一遍，奴才开瓶，将签拨转数次，敬掣一签，开封视之，上书番民桑噶娃之子罗布藏汪曲甲错，遂宣示大众，又将未经掣出之签取出开封，亦令众视，以免猜疑，无不欢欣悦服。济咙呼图克图谨按佛规，拟定法名为阿旺罗布藏丹贝卓美。当即率领大众，望阙叩谢天恩。所有奴才亲赴布达拉山掣定呼毕勒罕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①

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掣签决定十世热振活佛

《松溎等奏遵旨掣定热振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奴才松溎、奴才桂丰跪奏，为遵旨掣定呼征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僧俗人等同欢感戴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接理藩院咨开：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前据满庆

---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2178—2179 页。

等奏参，呼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称坚参因散放布施失察起衅，带印逃走，当经奉旨将该呼图克图名号、敕印一并注销，不准再令转世。该呼图克图赴京呈诉，旋即病故。兹据松溎奏，现在众喇嘛等禀诉，已故呼征呼图克图从前劳绩被屈情形，据情代奏。等语。著照所请，准其查访已故呼征呼图克图转世之幼子，仍掌该寺事务，并将名号赏还。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等因前来。当即恭录谕旨，译行商上，饬查办理去后。兹据报称：西宁所属噶巴地方番民顿柱、番妇白玛磋母二人，于同治九年五月初五日得生一子，名工桑伊喜洛布；又番民格勒、番妇磋母二人，于同治九年九月初三日得生一子，名献潘达凹。查此二子俱有灵异，且行动作为与前辈呼图克图相似，必系真正呼毕勒罕，恳请照例掣定，据情代奏。等因前来。奴才等复查属实，即令虔心讽经。于六月十九日亲赴布达拉山，恭谒高宗纯皇帝圣容前虔诚默祷，会同通善济咙呼图克图眼同大众，缮妥清字、唐古忒字名签二只，封置奔巴金瓶之前，焚香礼毕，该呼图克图率众讽经一次，奴才桂丰敬谨将名签放入金瓶，以盖掩口，又令讽经一次，奴才松溎跪启瓶盖，拨转数次，虔掣一签，开封视之，上书番民顿柱之子工桑伊喜洛布，遂即宣示大众，又将未经掣出之签，取出开封，亦令众视，以免猜疑。该寺僧众人等，无不同声欢感。通善济咙呼图克图谨按佛规，与该呼毕勒罕拟定法名为阿旺罗布藏伊喜丹贝嘉勒参。当即率领大众，望阙叩谢天恩，敬备吉祥哈达一方、古佛一尊，呈请代进。所有奴才等亲赴布达拉山，掣定呼毕勒罕，僧俗人等同欢感戴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

上圣鉴。谨奏。”①

和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一样，其他的活佛转世中也曾经出现请求免于金瓶掣签的事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驻藏大臣曾经代奏请求对德柱活佛转世免于金瓶掣签，但被朝廷驳回，于是再寻访到一名幼童，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才金瓶掣签认定。

《文海奏报访获德柱呼图克图转世灵童请免掣签折》：“奴才文海跪奏，为据情代陈，叩恳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据达赖喇嘛咨称：转据德柱拉章管事仓储巴扎萨克喇嘛，并迭腔巴及布赉绷洛赛岭扎仓结戎康孜、木隆寺领袖众僧公同禀称，本寺前辈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贝卓美圆寂以后，僧等虔心卜算，认真念经，寻访呼毕勒罕。现在访获番妇策忍拉莫所生之幼子洛桑顿柱曲批一名，灵异昭著，实系呼毕勒罕正身，余无可访，呈递切结、异兆清单，祈请代奏，叩恳天恩，将真正呼毕勒罕幼子洛桑顿柱曲批免其入瓶签掣，作为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迎回本寺坐床，以孚众望，庶使将来无甚灵异之辈不能混淆。等由前来。奴才伏查向例，呼毕勒罕访有数名，即应掣瓶，以杜假冒。今德柱呼图克图转世，据称仅止访获呼毕勒罕一名，灵异昭著，请免掣瓶，以孚众望，自系实在情形。所有德柱呼图克图转世幼子，恳准免其掣瓶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便，谨恭折代陈。并将原递切结、灵异清单，译缮妥协，咨送理藩院查核。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79—2180页。

鉴训示。谨奏。”①

《有泰奏遵例掣定德柱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折》：“奴才有泰跪奏，为遵照定例掣定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查前大臣文海任内具奏访获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请免入瓶签掣一折。钦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嗣准理藩院咨开：以驻藏大臣文海所奏德柱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贝卓美圆寂，访出幼子洛桑顿柱曲批，灵异昭著，请免入瓶签掣。等情。似与定例不符，碍难照准。拟饬该寺遵例寻访幼子数名，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大昭供奉金奔巴瓶内，公同掣定，议复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咨行到藏。当经译行商上转饬遵办去后。兹据噶勒丹池巴转据德柱拉章管事仓储巴扎萨克喇嘛及木隆寺领袖等公同禀称：前经遵奉札谕，数年以来，在于各庙佛前虔诚卜卦，遍处求访，今于门霞错地方访得番民夺吉占堆之子名阿旺洛桑夺吉坚参，并前所访番妇策忍拉莫之子名洛桑顿柱曲批，年俱八岁，实与庶民之子有异，生时皆有吉祥征兆，此外并无年岁相等及有奇异可以求访，恳请转禀驻藏大臣。将此二子入于金瓶签掣，等情前来。奴才即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前赴大昭，率同噶勒丹池巴，将此二子之名书签封固，令僧众虔诚讽经，饬派委员奉签入瓶。讽经毕，奴才敬谨启瓶，虔掣一签，对众启封阅看，上书洛桑顿柱曲批，即定为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并按照佛规，由噶勒丹池巴拟给该呼毕勒罕法名吐布丹坚参青饶称勒朗结。除由奴才译行噶勒丹池巴转饬该寺徒众遵照外，所有遵照定例，掣定德柱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缘由，理合恭折奏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94—2195页。

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①

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事例，在清末还发生过驻藏大臣联豫为十世（一说是十五世）第穆活佛请求免于金瓶掣签的特别事件。九世第穆活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摄政和师傅，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以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发生“第穆活佛谋害达赖喇嘛”的“第穆妖鞋”事件，九世第穆活佛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逮捕监禁，死在狱中。朝廷根据驻藏大臣裕钢转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咨文，革除第穆活佛的呼图克图名号，查抄其庙产。1904年英国军队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后来驻藏大臣联豫因第穆活佛所在的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和第穆拉章僧众的请求，上奏朝廷请求为九世第穆活佛平反，并对第穆活佛的弟子寻访的转世灵童免于金瓶掣签，继任为十世第穆活佛。联豫的奏折中说：

窃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先于光绪二十五年为已革达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吉诬陷瘐毙，抄没财产，并由已革达赖拟定第穆转世幼子，许其迎回本寺，应列在各呼毕勒罕之下，不得再求各项大呼图克图名号，朦请前驻藏大臣文海、裕钢据情代奏在案。经臣查明实系冤抑，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沥情恳请恩施。五月二十三日准军机处十七日电开：本日奉上谕，此案既据联豫查明第穆呼图克图无端受祸，良堪矜悯。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饶结著加恩复其靖善禅师名号，并赏还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所有该寺内财物、田产，饬由商上查明如数给还，以彰公道而维黄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册，第2198—2199页。

教。该部知道。钦此。等因。当即钦遵行知，并饬商上将从前抄没第穆寺财产悉数发还。自将恩旨宣布之后，全藏僧俗同声悦服。兹据洛岭寺领袖众僧暨第穆寺僧联名禀称：前辈第穆呼图克图无端获咎，现蒙大皇帝赏还名号，准其转世，并饬商上交还财产，皇恩高厚，僧众唯有铭心刻骨，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政振兴，不敢稍懈。兹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于监所圆寂之后，僧等冀获真正呼毕勒罕，即派多人前赴各处认真查访，旋于工布阿批地方，访有父名顿柱汪吉、母曰仑珠曲宗，产有幼孩，具有各种灵异征兆，当将是否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在三十余寺卜问，均言即是此子。只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名号业经斥革，不敢呈请入瓶签掣，即具禀商上迎回本寺，现已十岁，其受戒所取经名曰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委系寻访确凿，真正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不独本寺僧众诚信，即各处僧俗亦皆信服无疑。吁恳奏请恩施，免其入瓶掣签，准予赏给名号。等情。据此，臣伏查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被屈瘐毙，已阅十有余年，其转世之呼毕勒罕，先绎第穆寺僧众访获迎回，只以名号业经斥革，未敢呈请掣瓶。现蒙赏还名号，该僧等公同呈请，即以当时访获之真正转世呼毕勒罕，赏给名号，情尚可原，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僧等迎回在寺前辈第穆呼图克图转世之呼毕勒罕罗布藏降白隆朵丹增甲错，免其掣瓶，赏给第穆呼图克图并靖善禅师名号之处，出自逾格鸿施。除饬催商上赶将第穆寺财物田产，确查给还外，所有该寺僧众感激吁恳下情，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谨奏。①

这可以说是清朝所办理的最后一件有关金瓶掣签的事务，联豫采取这一措施，固然是由于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希望借此削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影响，但是这一措施也反映了自金瓶掣签制度设立以来，直到清朝结束，这一制度在西藏一直具有深刻的影响。

除了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外的其他西藏在拉萨实行呼图克图在拉萨实行金瓶掣签以外，外蒙古地位最高的哲卜尊丹巴活佛虽然是蒙古地区的活佛，但是由于从三世哲卜尊丹巴开始，乾隆皇帝指定哲卜尊丹巴只能在西藏转世，因此嘉庆十四年（公元 1819 年）认定五世哲卜尊丹巴的金瓶掣签、道光年间认定六世哲卜尊丹巴的金瓶掣签、咸丰二年（公元 1851 年）认定七世哲卜尊丹巴的金瓶掣签、同治年间认定八世哲卜尊丹巴的金瓶掣签，都是在拉萨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组织进行的。②

格鲁派以外的噶玛噶举、达垄噶举、止贡噶举、主巴噶举以及宁玛派的主要活佛，都有以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的事例，由于资料比较缺乏，在此难以详细叙述。

---

① 《联豫奏请允准第穆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免予掣签即行赏还名号折》，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册，第 2207—2208 页。

② 蔡志纯、黄颢编著：《活佛转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83—184 页。

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事例有①：

1. 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年）金瓶掣签认定九世济咙（功德林）活佛洛桑丹贝坚赞（格鲁派）

2. 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金瓶掣签认定十世济咙活佛阿旺贝丹却吉坚赞（格鲁派）

3. 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金瓶掣签认定十一世济咙活佛阿旺土登格桑丹贝准美（格鲁派）

4. 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金瓶掣签认定八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晋美嘉措（格鲁派）

5. 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金瓶掣签认定九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饶杰（格鲁派）

6. 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十世第穆活佛洛桑坚白隆朵丹增嘉措（格鲁派）

7. 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金瓶掣签认定九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楚臣坚赞（格鲁派）

8. 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金瓶掣签认定十世热振活佛阿旺洛桑益西丹巴坚赞（格鲁派）

9. 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金瓶掣签认定三世德柱活佛阿旺洛桑丹贝准美（格鲁派）

10.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金瓶掣签认定四世德柱活佛土登坚赞钦饶赤列南杰（格鲁派）

11. 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金瓶掣签认定山南八世温嘉色活佛阿旺洛桑晋美楚臣嘉措（格鲁派）

---

① 张伯桢：《西藏大呼毕勒罕考》，收入《西藏佛教四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2 年印刷，第三册。不著传人《番僧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12. 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金瓶掣签认定山南乃东县昌珠寺十世洛善巴活佛阿旺洛桑益西嘉措（格鲁派）

13. 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金瓶掣签认定山南乃东县昌珠寺十一世洛善巴活佛阿旺隆热群觉嘉措（格鲁派）

14. 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金瓶掣签认定山南乃东县昌珠寺十二世洛善巴活佛洛桑土丹雪珠嘉措（格鲁派）

15. 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金瓶掣签认定江孜九世主巴活佛阿旺米盘晋美南杰（主巴噶举派）

16. 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金瓶掣签认定江孜十世主巴活佛土丹南杰格勒格桑（主巴噶举派）

17. 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金瓶掣签认定类乌齐十三世达垄玛仓活佛阿旺特却晋美巴俄（达垄噶举派）

18. 嘉庆二年（公元 1797 年）金瓶掣签认定止贡寺五世止贡切仓活佛嘉央丹增却吉尼玛（止贡噶举派）

19. 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金瓶掣签认定止贡寺六世止贡切仓活佛阿旺坚白却吉坚赞（止贡噶举派）

20. 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金瓶掣签认定止贡寺七世止贡切仓活佛洛桑丹增晋美南杰却吉尼玛（止贡噶举派）

21. 嘉庆五年（公元 1800 年）金瓶掣签认定楚布寺十四世噶玛巴活佛特却多吉（噶玛噶举派）

22. 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金瓶掣签认定十五世噶玛巴

活佛喀恰多吉（噶玛噶举派）[1]

23.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金瓶掣签认定觉摩隆寺六世阿里活佛洛桑丹贝坚赞（格鲁派）

24.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金瓶掣签认定觉摩隆寺七世阿里活佛阿旺楚臣丹贝坚赞（格鲁派）

25.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金瓶掣签认定觉摩隆寺八世阿里活佛克珠丹增却吉尼玛（格鲁派）

26.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金瓶掣签认定觉摩隆寺九世阿里活佛阿旺洛桑克珠丹增嘉措（格鲁派）

27.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金瓶掣签认定楚布寺九世贾曹活佛阿旺益西土丹嘉措（噶玛噶举派）

28.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瓶掣签认定楚布寺十世贾曹活佛丹贝尼玛（噶玛噶举派）

29.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金瓶掣签认定楚布寺十一世贾曹活佛扎巴嘉措（噶玛噶举派）

30.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金瓶掣签认定乃囊寺九世巴俄活佛古却丹贝贡布（噶玛噶举派）

31.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金瓶掣签认定八世贡噶尔甲善（铁索桥）活佛丹增钦饶图多（噶举派）

---

① 张伯桢：《西藏大呼毕勒罕考》一书记载在喀恰多吉之前，在同治九年曾经以金瓶掣签认定过一个噶玛巴活佛，名叫夺吉，在同治十三年圆寂。因此该书以喀恰多吉为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见《西藏佛教四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印刷，第三册，第16页。按此，则现在的噶玛巴活佛应当是十八世噶玛巴而不是十七世噶玛巴。但是现在关于噶玛巴的各种书籍和噶玛噶举派的人士都以现在的噶玛巴活佛为十七世噶玛巴，因此有可能是同治九年金瓶掣签掣出的噶玛巴活佛在同治十三年就去世了，不到十岁就夭折了，因此后来噶玛噶举派在给噶玛巴活佛排世系时没有将其列入，故以喀恰多吉为十五世噶玛巴活佛。待考。

32.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金瓶掣签认定九世贡噶尔甲善（铁索桥）活佛丹增却吉尼玛益西若必多吉（噶举派）

33.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金瓶掣签认定贡噶县多吉扎寺六世多吉扎活佛根桑晋美伦珠多吉（宁玛派）

34. 咸丰二年（公元1862年）金瓶掣签认定贡噶县多吉扎寺八世多吉扎活佛格桑土丹晋美白玛多吉（宁玛派）

35.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贡噶县多吉扎寺九世多吉扎活佛土丹却旺央坚多吉（宁玛派）

36.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金瓶掣签认定加查县四世达拉冈波活佛阿旺赤列南杰（噶举派）

37.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加查县达拉冈波寺五世达拉冈波活佛格桑土丹索南饶杰（噶举派）

38. 同治九年（公元1670年）金瓶掣签认定六世江卡俄色夏仲活佛洛桑赤列丹贝尼玛（格鲁派）

39. 道光二年（公元1622年）金瓶掣签认定六世觉仔活佛阿旺晋美楚臣嘉措（格鲁派）

40.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金瓶掣签认定止贡寺五世止贡琼仓活佛阿旺赤列旺秋（止贡噶举派）

41.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止贡寺六世止贡琼仓活佛贡桑土丹却吉尼玛（止贡噶举派）

42.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金瓶掣签认定林周县达垄寺五世达垄活佛贡噶丹增（达垄噶举派）

43.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金瓶掣签认定林周县达垄寺六世达垄活佛阿旺坚白（达垄噶举派）

44.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金瓶掣签认定林周县达垄寺七世达垄活佛阿旺贝丹（达垄噶举派）

45.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金瓶掣签认定五世达木

帐达尔干垫饶丹夏仲活佛阿旺坚白旺秋嘉措（格鲁派）

46.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六世达木帐达尔干垫饶丹夏仲活佛钦饶俄色（格鲁派）

47. 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金瓶掣签认定那曲六世达浦夏仲活佛阿旺洛桑丹增却吉迥乃（格鲁派）

48.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金瓶掣签认定那曲七世达浦夏仲活佛洛桑坚白丹增却吉嘉措（格鲁派）

49.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金瓶掣签认定那曲八世达浦夏仲活佛阿旺洛桑贝丹坚白丹贝额珠（格鲁派）

50.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金瓶掣签认定七世觉热夏仲活佛丹增晋美（格鲁派）

51.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金瓶掣签认定工布江达地方七世东嘎活佛阿旺洛桑丹增勒雪嘉措（格鲁派）①

52.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金瓶掣签认定哲蚌寺四世岭仓活佛阿旺隆朵云丹嘉措（格鲁派）

53. 咸丰九年（公元1859）金瓶掣签认定哲蚌寺五世岭仓活佛洛桑隆朵丹增赤列（格鲁派）

54.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金瓶掣签认定边巴县四世边巴夏仲活佛坚白丹巴坚赞（格鲁派）

---

① 第十世东嘎活佛东嘎·洛桑赤列（另一说法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第三世东嘎活佛嘉央珠扎为第一世东嘎活佛，则东嘎·洛桑赤列为第八世东嘎活佛），1927年生于工布江达县觉木雪kyog mo zhol村，早年入色拉寺学佛，1947年获拉让巴格西学位，曾任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国际藏学会理事等职，是国际知名的藏族学者、藏学家，为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培养藏学研究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1997年7月病逝。

55.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瓶掣签认定边巴县五世边巴夏仲活佛阿旺迥乃丹巴坚赞（格鲁派）

56.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强巴林寺八世帕巴拉活佛洛桑晋美贝丹丹贝尼玛（格鲁派）

57.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强巴林寺九世帕巴拉活佛洛桑米盘晋美格勒坚赞（格鲁派）

58.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强巴林寺六世锡瓦拉活佛阿旺晋美钦饶丹增赤列（格鲁派）

59.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强巴林寺八世甲热活佛阿旺丹贝迥乃赤列却吉坚赞（格鲁派）

60.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强巴林寺四世滚都活佛洛桑坚白丹增（格鲁派）

61.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察雅县七世察雅活佛阿旺隆朵丹贝坚赞（格鲁派）

62.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察雅县八世察雅活佛洛桑土丹晋美嘉措（格鲁派）

63.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杨衮寺四世帕却活佛阿旺伦珠（达垄噶举派）

64.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杨衮寺五世帕却活佛阿旺贡噶南杰（达垄噶举派）

65.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杨衮寺四世济仲活佛阿旺扎巴嘉措（达垄噶举派）

66.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杨衮寺五世济仲活佛赤列强巴迥乃（达垄噶举派）

67.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杨衮寺四世仔巴活佛阿旺坚白年扎（达垄噶举派）

68.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瓶掣签认定昌都类乌齐县

杨衮寺五世仔巴活佛阿旺洛桑楚臣（达垄噶举派）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到，自1793年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结束，近120年中，在拉萨执行的金瓶掣签达到70多次，平均每3年举行2次金瓶掣签。因此，金瓶掣签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的认定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项历史定制，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视和遵行，至今在藏传佛教重要的转世活佛的认定问题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4、5期



责任编辑\永红\封面设计\李建雄\技术编辑\姜宏

